译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是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历史学家罗伊·亚历山大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他于1925年生于梯比利斯市。他的父亲是红军的一名师政委、老干部，后来任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院的教员，于1938年死在科累马集中营。罗·麦德维杰夫从1964年起和他的孪生兄弟若·麦德维杰夫一起积极参加了持不同政见的队伍，主要是出版各种书刊，如《二十世纪》、《政治日记》、《论社会主义民主》、《赫鲁晓夫执政年代》、《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布哈林最后岁月》等，因此在西方被称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中的"社会民主派"或"民主改革派"。罗·麦德维杰夫原是苏共党员，1969年因在西方出版书刊被开除了党籍。他至今住在莫斯科，并继续进行写作活动。

作者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主张发扬和扩大党内民主，恢复列宁主义的本来面目，抨击苏共党和国家的禁锢制度。因此，他有别于苏联的其他持不同政见者。

罗·麦德维杰夫写本书用了十年时间，积累了大量材料。关于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想说明什么问题，要达到什么目的，他在前言中都作了说明，这里就不赘述了。

本书所提出的任务，是研究和分析苏联在一个发展阶段上实际生活的一个方面。作者在本书中没有给自己提出全面阐明苏联国家和党的历史上某一阶段的目标，他只作了一个专题研究，即研究无限复杂的历史实践的一部分。他认为把对历史实践的某些方面和对历史活动家的个别人物的分析和研究综合起来，才能得到苏联历史的较清楚的总的面貌。作者说："可以称本书为'病历'，是

那个根据某一症状（远不是最主要的）被我们文学和宣传领域称为'个人迷信'的极严重的和长期的病历。"很自然，既然本书只对这种病所产生的和经历的事实感兴趣，所以它所涉及的基本上是阴暗现象。作者曾声明说：苏联人民都知道，所谓"斯大林时代"并不仅仅是恐怖时代，这个时代也正是苏联人民取得伟大战绩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在国内外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所以历史科学不仅应该研究社会的光明面，也应该总结经验教训，去研究它的阴暗面，以求从中取得教训。正如雨果所说的那样，历史没有垃圾箱。

迄今为止，本书是苏联国内外研究斯大林问题较全面的书。作者说：他收集了大量材料，使用了暂时还没有出版的大批手稿、资料、回忆录和证明材料。提供这些材料的人大多数都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亲身经历了苏联各种事件的老布尔什维克。虽然本书中作者的某些观点尚待探讨，有些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但书中使用的大量材料可供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国际共运及苏联问题的同志和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本书第十二、十三、十四三章是展凡、信德麟、李奇三位同志翻译的，他们在百忙中帮助了我们，特向他们致谢。

本书内容涉及面甚广，译文如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本书边码系原文书页码。

我们编了一个"主要人名索引"附于书后，注明原文页数，以便读者查考。

赵 洵 林 英

一九八〇年十月于北京

“我们需要完整的和真实的情报。真实不应该以它将为谁服务而转移。”

弗·伊·列宁

“迄今那些已灭亡的革命政党，它们之所以灭亡了，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起来，不知自己力量之所在，因为它们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可是我们不会灭亡，就是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且能够学习克服这些弱点。”

弗·伊·列宁

“自我批评——无情的，尖锐的，深入到事物根髓的自我批评，是使无产阶级运动能够生气勃勃的阳光和空气。”

罗莎·卢森堡

“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亚·伊·赫尔岑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目　录

第二部分

斯大林主义产生和巩固的原因及条件

第三部分

斯大林的独裁统治。斯大林专政的某些后果

前　言

13

在这里提供给读者的书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酝酿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写成的。

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后，我国还有不少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算旧帐，把我们的毛病暴露出来，使我们的敌人高兴呢？在苏联人民中保持在过去的岁月中所形成的斯大林的形像，不是更好吗？把注意力集中到共产主义建设当前的问题上来，让未来的历史学家去分析斯大林的罪行，不也更好一些吗？

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听到类似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斯大林的罪行如此严重，如果去掩盖它，这本身也就是一种罪行。弗·伊·列宁曾写道："资产阶级的伪君子们喜欢讲的一句名言是：对于死人要么一言不发，要么称道几句。无产阶级既需要讲出活着的政治活动家的实情，也需要讲出死去的政治活动家的实情，因为凡是真正应该被称作政治活动家的人，即使他们的肉体已经死去，他们在政治上是不会死去的。"①

美国新闻工作者安娜·斯特朗在她写的关于斯大林的书中对三十——四十年代作了评价，她说："这是历史上一个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也许是最伟大的时代……它产生了千百万的英雄，也产生了不少恶魔。现在，胆怯的人可以事后为这一时代所出现的罪行开清单。但是，对那些经过斗争的火焰，甚至对那些在这斗争中倒下去的人来说，这些灾难只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付出的一部分代价。"②

14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16页。

② 见安·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对我们所经受的悲剧的这种评价是出自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热烈崇拜者、在中国被宣布为"名誉红卫兵"的人之口，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这一评价。

当然，要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的条件下摧毁旧社会并建立新社会，不仅存在着个别破坏革命法制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甚至还存在着不可避免性。然而，偏离正确的革命路线的程度可能不同，但如果在一定时期内违法和滥用权力的现象是属于国家政策性的，那就更没有任何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了。同时，即便是承认无政府主义和极权主义个别表现的历史必然性，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辩护或赦免这些现象的理由。在任何情况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坚决反对在其进展中出现类似的反常现象，应该公开揭露它们，以便在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中不再重蹈覆辙。

我们决不是因为胆怯才去开列斯大林及个人迷信追随者的罪行的清单。我们这样做之所以必要，首先是因为我们怀着尊敬的心情纪念牺牲的父老和兄弟，纪念几百万因斯大林的专横和违法行为而牺牲的人们。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一悲剧中吸取必要的教训，那么，在苏联社会史上整个一辈革命者和其他几百万无辜的人们的牺牲便只能成为一场毫无意义的灾难。

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如果不把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危险的有害后果及表现公开和诚恳地告诉全体劳动者，就不可能坚决和毫无保留地根除它们。不是通过隐蔽渠道的秘密指示，而是通过我们党公开和诚恳的自我批评才能够产生那种足以消除斯大林迷信的一切后果并防止新的迷信和新的专横出现的运动、感情和社会的愤慨。

苏联共产党在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坚决揭露了个人迷信的思想体系和实践，并严肃地谴责了斯大林犯下的罪行。恢复列宁的党和国家生活准则的工作开始了。成为斯大林时代血腥镇压的牺牲品的多数人平反了。六十年代上半期在文艺和社会科

学领域内广泛开展了对个人迷信的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我国的政治空气中开始清除冒险主义和独裁主义的恶习。

但是，就是现在，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谁也不能，而且也没有权力忘记过去的遭遇。这不仅是因为无辜的被残酷迫害致死的父老兄弟们的骨灰还在焚烧着我们的心。遗憾的是，在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中至今还在建立新的个人迷信并在恢复那些过去已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损失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违法行为的精神。遗憾的是，甚至在我们国家里还有一些人，以及某些有影响的人物，都企图那怕是部分地洗刷一下个人迷信时代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并且用各种办法恢复斯大林的“政治威信”。这些企图在最近几年不仅没有削弱，相反，有所加强。在我们的报刊上可以越来越多地看到斯大林的名字，不是作为莫大的罪人及列宁主义的歪曲者，而是被称为“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革命者”、“伟大的理论家”、“英明的国务活动家”、“勤勉的当家人”，甚至是“工人阶级事业的杰出战士”。由此，我们确信，斯大林主义不是简单的用以吓唬人的东西。斯大林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不管它采取何种形式，公开的还是极为隐蔽的，仍是我们运动的实际危险。这一切使在苏共二十大已经开始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探讨工作需要继续进行下去。这不仅是为了纪念已经去世的人们，而且也是为了使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不被歪曲。我们应该了解全部真实情况不仅是为了防止那已被党抛弃了的专横再度出现。而且，如果不研究和不重新评价我们的过去，我们就不可能朝着我们需要的方向前进。

“真实具有革命性”——安东尼奥·葛兰西① 在法西斯监狱中这样写道。我们知道，说真话正是列宁党为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斗争的主要武器。而说真话不仅是用于对待革命的敌人，说

① 安·葛兰西（1891—1937）——意大利工人阶级领袖，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于1926年被法西斯判处二十年监禁，在监狱里写了著名的《狱中札记》一书。1937年被法西斯迫害致死。——译者

真话也包括我们对待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列宁指出："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以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直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理论的真理来看，而且从实践方面来看，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有使我们看到旧方法的不正确，那么我们今天就决不能学会用新方法来解决自己的任务。"①

当然，共产主义的敌人力图利用党的自我批评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也是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严重后果之一。但是帮助我们克服这一后果的不是沉默，而是公开和真诚地查明真实情况。

列宁在1919年说过，我们的每一个字，敌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和歪曲，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强调说："然而我们说：让他们听吧！我们开诚布公地说真话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因为我们深信，即使这是一种沉痛的真话，只要讲清楚，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阶级代表、任何一个劳动农民都会从中得出唯一正确的结论。"②

显然，错误各有不同。我们的党在任何时候没有象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那么困难。我们的党从来没有过象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那样不得不去揭露那么多严重的罪行和缺点。这不可避免地为研究斯大林主义这一现象的起源造成了科学上和心理上的困难。个人迷信的严重病症至今还遗留下了尚未治愈的许多创伤。如果认为这些创伤会自然愈合，那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不，我们应该医治它们，而为此应该了解这一严重疾病的原因和性质，我们党和我们的运动已经患过了这场疾病，它的细菌还聚居在我们社会机体的一些角落。如果治疗如此严重的数不清和被耽误了的创伤会给我们带来痛苦的话，我们也仍然应该根治它们。

当然，在批评过去滥用职权和违法行为时可以站在不同的立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71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25页。

场上并得出不同的、也包括完全错误的结论。可惜的是，不仅在我们敌人的阵营里，就是在我们国内，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这样的人，他们企图打着批判个人迷信罪行的旗号而抛弃我们不能而且没有权利抛弃的那些东西。这些人力图否定在我国已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意义，也否定十月革命的民主和人道的本质。同这些趋势的斗争，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用否认和掩盖过去的错误和罪行的办法来进行，也就是不能站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上来进行。我们需要的不是否认，而是解释清楚这些错误和罪行。因为正是教条主义现在给机会主义提供主要的营养。所以我们决不能支持那些在要求我们克制和谨慎的口号下实际上力图阻止或者那怕是多少压制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人。

当然，从政治观点来说揭露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一切错误是不容易的事。过去我们的人民很少知道斯大林的违法乱纪行为，所以对他的揭露在部分苏联人民当中引起了无所适从、不知所措和灰心丧气的情绪。

但是如果认为不让人民和青年一代了解过去的错误和罪行，今后同样可以避免这一切不健康现象的出现，那么这简直就是十分有害的幻想。世界大得很，其中有多少政治势力继续出现为争夺人们的思想而斗争。历史教育我们，永远不要长时间地向人们掩盖真理，因为真理终归会找到通往人们的智慧和心灵的道路。而如果我们的人民不是通过他们始终信赖的共产党去了解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真实情况，那么克服个人迷信的严重后果的工作将遇到无法估计的困难。

应该记住，斯大林个人迷信不仅意味着政治暗杀和无休止的谄媚奉承。被斯大林迷信掩饰的长期的恐怖行为严重影响了我党的整个思想生活、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苏联人民的心理和伦理、国家和党的领导方法、工农联盟及千百万人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所以，毫不奇怪，围绕着我们为了简便而不太恰当地称之为“个人迷信”的那一大堆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极为激

烈的思想斗争。如果我们今天“为了不使我们的敌人高兴”而拒绝对斯大林时代进行极为深刻、而且是全面的分析和研究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这样，我们实际上会把思想斗争19中极为广阔和重要的阵地让给我们的敌人，并允许资产阶级宣传家继续利用我们的错误和困难进行投机。

应该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马列主义不仅不能叙述，而且也不能解释清楚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曾出现和正在出现的引起国家和党的机构的蜕化变质和官僚化，有时还产生个人迷信、发生全国范围内的专横和滥用权力这样一些极为反常的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的话，那么马列主义再也不能成为关于社会的科学理论，不能作为现代科学理论而继续存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对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优点和缺点都进行科学的分析，而他进行这项工作时应该如同共产党人对待所有社会主义前的形态一样，抱有同样的科学的认真态度和胆略。

伊里亚·爱伦堡曾写道：“在斯大林时代受损失的是思想还是人们？”他的回答是：“思想没有受到打击，受到打击的是我们这一辈人。”① 这一回答很不精确。实际上斯大林的违法行为，正象千百万人所看到的那样，给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以沉重的打击。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宣传家把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他们早就企图把社会主义描写为（并不是不成功地）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不能遵循任何法律，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永远受到损害和遭到压制。因此如果我们对斯大林的罪行和不法行为继续掩盖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把千百万人推离共产主义运动。所以我们的任务不仅是为那些斯大林专横的牺牲者恢复名誉，而且要为社会主义思20想恢复名誉。我们首先应该克服的是斯大林个人迷信留给我们的最危险的后果——不敢说出真话。

本书第一版（英文版和法文版）是1972年问世的，这些版本引

---

① 《新世界》杂志1962年第5期第154页。

起了许多反响。其中一些评论者认为本书犯了片面性的错误，而这种错误是不允许的。① 我不能认为这类谴责是公道的。我们的著作所提出的任务是要分析和研究苏联一个发展阶段的苏联实际生活的一个方面。本书并未提出全面阐明我国和我党历史上的某一阶段的目标。而历史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允许人们进行专题研究，即研究无限复杂的历史实际的一部分。把对实际情况的某些方面和对历史活动家的个别人物的分析和研究综合起来，才能得到我们历史的较清楚的总的面貌。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称本书为“病历”，是那个根据某一症状（远不是最主要的）被我们文学和宣传领域称为“个人迷信”的极严重的和长期的病历。很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对本病所产生的和经历的事实感兴趣。所以我们所涉及的基本上是反面现象和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想抹煞和贬低其它现象和事实的意义。不是的，我们一切人都知道所谓“斯大林时代”并不仅仅是恐怖时代。这是我党和人民取得伟大战绩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在国内外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我们的苏联历史科学对德涅泊河上的巨大拦河坝，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冶金联合企业，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攻克柏林之战和我国人民许多其它英雄业绩予以应有的重视。关于这一切已经写了成千上万册书，这一题目至今还是苏联文学和历史科学的主要内容。但是历史科学如果要真正深入了解和懂得我们的过去和现在，不能也不应该仅仅从“光明”方面分析我们历史的事实和现象。那些分析和研究过去时代这样或那样阴暗面的作品应在历史科学中取得他存在的全部权利。雨果说过，历史没有垃圾箱。

很自然，斯大林这一人物是作者注意的中心。但本书不是斯大林的传略，本书讲的不光是斯大林一个人。斯大林成为党的领导人虽不是什么历史必然性，但是他被推上领导地位和他的活动，却反映了我国和我们党在恐怖时代前就存在着的一种趋势，而这

① 见《人道报》1972年11月24日，Ж·卡纳帕的文章。

一趋势由于斯大林的原故才全面开了花。不管斯大林在本书所涉及的悲惨事件中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应该看到，他在自己活动中依靠了某些人，他们都受历史形成的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所制约。

特别要提到的是本书的材料来源。迄今为止，我国档案馆所保存的文件和资料远远不能为公开历史研究所利用。众所周知，许多涉及党史，其中和斯大林活动有关的文件已被销毁。根据谢·米·杜波罗夫斯基的说法，早在1924年，斯大林就指示他的助手И. П. 多夫斯图哈要检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档案并销毁一切“没有必要保存”的材料。三十年代有个规定，当一些党和国家著名活动家被逮捕时，他们所保存的全部材料、笔记本、日记等统统被没收并毁掉。甚至连列宁的信件和材料也全都无影无踪了。阿·马·高尔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谢·康·奥尔忠尼启泽和我国其他著名活动家的资料也全消失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个人的档案资料的一部分在斯大林去世后几个月内也被销毁了。当时管档案的是国家安全部，即贝利亚。此外，我们现在知道，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代，大规模地蓄意假造了历史文件，谎言是层出不穷的。

大家知道，二十大后苏共中央进行了有关基洛夫被暗杀情况的仔细的调查。但调查此事件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结果并没有公布出来。与此同时，还对1935—1938年有关政治审讯的材料也进行了调查。调查过程证实了在这些审讯过程中诬陷大多数被告的材料是伪造的。但在1962年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只是简单说明了一下这一情况，并没有公布有关的新材料。至今没有公布和审讯贝利亚案有关的记录(1953年)以及贝利亚一批主要助手和走卒的有关材料(列宁格勒的阿巴库莫夫等人，梯比里斯的鲁哈泽等人，巴库的巴吉洛夫等人)。这种情况给历史学家的工作带来了困难。

当然，现在关于斯大林及其时代的历史和政治文献是相当多

的，就是斯大林在世时这些文献也是大量的。但这些文献按其性质来说是不一样的，需要批判地对待它。例如，有关歌颂斯大林及其"著作"的全部文献，现在已没有任何实际的科学价值，而这些"著作"在个人迷信时期也是大量的。

国外关于斯大林和苏共党史的主要文献也没有什么大的价值，而且这些文献苏联历史学家是看不到的。虽然从表面上看，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似乎是客观的，但他们通常站在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去分析和批判斯大林的罪行。这些文献中个人迷信时期的罪行首先被用来与其说是丑化离开马列主义的斯大林，还不如说是丑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本身。另外，国外所公布的斯大林的真实的罪行和错误与造谣诽谤混在一起，其不精确和歪曲之处多如牛毛。更不必说白俄侨民所写的东西，这些材料中大部分贯串着对苏联的盲目仇恨，所以不可能对我们的实际情况作出科学的分析。

托洛茨基主义在国外的书刊对斯大林及其时代显然是更加有意歪曲。

本书主要是以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后在我国公布的大量材料为依据，因为这些材料是符合这两个大会所规定的方针，即对与斯大林个人迷信有关的事件真实地、老老实实地加以阐述。

同时，我们也用了许多暂时还没有出版的手稿、资料、回忆录和证明材料，这些材料基本上都是亲身经历了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政治迫害的老党员写的。

还应该考虑到，斯大林在世时，他的大部分违法命令和活动并没有反映在任何材料上。所以党内老干部的口头和书面材料就具有更加特殊和重要的意义。其中多数材料是在斯大林的集中营和监狱内经过了复杂的途径，从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所以如果我们不对这些证明材料加以比较和分析，而把它作为不真实和不客观的材料抛在一边，那么这就是对已经牺牲的同志的污辱。

作者曾得到上百人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协助，我的这一研究工作也不会有进展。我在这里谨向以下老布尔什维克表示感谢：伊·帕·加甫里洛夫、苏·奥·加扎梁、列·马·波尔特诺夫、A.И.巴比涅茨、Е.П.伏罗洛夫、A.M.杜尔马什金、彼得·琴金、С.И别尔季切夫斯卡娅、Д.Ю.佐林娜、巴·伊·沙巴尔金、阿·弗·斯涅戈夫、A.C.叶甫斯达菲也夫、M.B.奥斯特罗果尔斯基、И.M.达尼舍夫斯基、拉·波·列尔特、A.П.霍乔也夫、M.A.索恩采娃、Я.И.德罗宾斯基、亚·伊·托多尔斯基、叶·雅·德拉勃金娜、Б.И.伊万诺夫、索·波·勃里奇金娜，这些同志给作者提供了重要历史材料和证据。同时，我们还感谢曾给我们提供材料或提出意见的以下同志：伊·格·爱伦堡、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维·亚·卡维林、亚·阿·别克、米·彼·雅库波维奇、安·德·萨哈罗夫、列·彼·彼得罗夫斯基、克·伊克拉莫夫、尤·卡利亚金、列·扎·柯培列夫、Д.И.列夫、A.M.拉林娜、И.尼古拉也夫、З.Б.甘德列夫斯卡娅，以及波·雅姆波里斯基等许多同志。

24

我们当然也用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以前公布过的大量材料，并使用了各种党的大会、会议和全会的记录稿。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研究成果。作者按专业来说不是历史工作者，从来没有在研究历史和政治问题的科研机构中工作过。我们不可能使用任何不公开的和秘密档案馆的材料，包括任何国家的或党的档案，特殊档案等等。近十年来，我们虽然不只一次通知许多有关领导机构，把我们研究的工作性质和内容告诉了他们，但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组织和机关的帮助或者向我们布置什么任务。同时，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没有遇到有关领导机构的阻挠。

本书手稿的名称曾是《在历史审判面前》。但有人批评说，这名称太自负了。有人给我们提出：历史科学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认真研究刚刚开始，我们在研究中还很主观，将来历史不仅对个别人物，而且对当代一切的党和一切的运动都会给以精确的评价。所以我们为本书又起了现在这个名称，并希望今后几十年中

历史学家会对本书的材料和观点加以研究。当谈到不久以前的时代时，历史科学研究范围还很狭小，但在我们看来，现在我们已掌 25 握了足够的材料，使我们基本上可以解决斯大林个人迷信和斯大林主义起源的问题，可以讲清楚促使这些离开马列主义革命路线的畸形倾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和政治错误。现在我们已掌握了足以正确说明斯大林在我国和我党历史中的实际作用。

最后，作者愿再一次表明的是：共产党员应成为自己党的历史的最严厉的裁判员。没有这点就不可能恢复我们伟大运动的统一、道德上的纯洁和力量。这就是我们从事这一从各方面来说都相当艰巨的工作的主要动力。



第 一 部 分

斯大林篡夺国家和党的领导权

第 一 章

29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

一、斯大林1922年前政治经历的一些片断

苏联历史学早就抛弃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说斯大林是列宁最优秀和最有天才的学生，是从来不允许自己偏离列宁路线的、是最受到列宁宠爱的战友。现在我们都十分了解斯大林政治经历的不大光彩的片断，而这些是他在世时所不允许讲的。我们在叙述下面这些片断时，并不想给人们造成一个印象，似乎斯大林的活动是由一些罪恶和错误组成的。

不是的，我们并不想否定斯大林在革命前、革命期间和内战时期对党的一定贡献。当他还年轻的时候，在参加革命运动后，表现出他具有充沛的精力，有极大的组织才能、毅力和事业心，使他能比较早在运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就是在这些年代斯大林个人的许多缺点也很清楚地暴露出来了，如：残暴和粗鲁，自负和虚荣，狡猾和讳莫如深、个人主义，判断与行动的放肆和生硬，有权势欲。我们不得不惋惜地指出，这些缺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斯大林的晋升。

30

斯大林的许多缺点，部分普通工作人员和党的领导人是知道的。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现在还能讲不少关于斯大林年轻时对同志、母亲和亲友的粗暴态度的表现。当他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统委员会委员时，不仅能够用粗野的语言谩骂其他委员，而且还朝他们扔板凳。1903年被捕和流放到东西伯

利亚的斯大林在途中痛骂过一个同他一起流放的同志，仅仅是因为那个同志得知家里的不幸消息后感到非常难过。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斯大林是属于所谓“实干家”这样的人。他组织过一系列游行、罢工、地下印刷所，参加过某些武装剥夺活动。但斯大林同时也很注意理论问题的研究，可以从他在《斗争报》及《无产阶级斗争报》等报刊所发表的文章里看得出来。后来，在《全集》第一卷前言中斯大林自己讲过在第一次革命时期他所犯的一些严重错误。谈到斯大林关于土地问题的错误立场，他当时反对列宁土地国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的纲领。他那时还认为，在无产阶级不占多数的国家里社会主义胜利是不可能的。斯大林用谅解的口吻写道，这是“还没有完全形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斯大林在这里想说，在以后的革命路途中他没有再犯任何错误。但他这一断言是远远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81

现在我们知道，斯大林对待第一次革命后那次向马克思哲学的攻击，采取的是调和的态度，他在同召回派及取消派的斗争中是严重动摇的。在布拉格会议前斯大林给米哈·茨哈卡雅的信中非常放肆地把列宁为恢复党而进行的原则性斗争称为“杯水风波”①。

1909年斯·邵武勉被捕后，斯大林通过巴库委员会对《无产者报》编委会的争论做出一个专门的决议（此编委会实际上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心）。巴库委员会在决议里支持了多数的思想立场，坚决反对列宁的组织政策，这个决议是斯大林亲自写的。②

众所周知，《无产者报》1909年10月3日（公历16日），即49期，重登了弗·伊·列宁答复指责他所谓“分裂”政策的专门文章。

---

① 《邵武勉全集》第1卷1957年莫斯科版第267页；见И.杜宾斯基-穆哈泽：《奥尔忠尼启泽》1964年莫斯科版第92—93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58页。

斯大林显然不懂布拉格会议有关取消派的决议并再三号召要多让步。在对待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政治路线方面斯大林和《真理报》的估计相差更远。在列宁要求编委会直截了当和诚实地向工人解释取消派煽动的实质时，斯大林在为《真理报》撰写的第一篇文章中（大吹大擂地标题为《我们的目标》）却号召“无论如何”要团结，要“不分派别”地实现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的团结。①

和列宁相反，斯大林在1912年提出抵制第三届国家杜马。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拒绝抵制是“对老布尔什维主义的偶然的偏离”。斯大林在一封信中写道：“这能否证明，我们应该永远坚持这些偶然的偏向，小题大作呢？伊里奇对这些（合法——作者注）组织的作用估计过高了。”②

32

在土鲁汉斯克③流放期间斯大林的为所欲为、没有教养和粗鲁成性也不断发作。如：布尔什维克费利甫·扎哈罗夫（1909—1913年期间在土鲁汉斯克流放）的妻子P.Г.扎哈罗娃（原姓名：罗莎·勃隆特曼）在回忆录中提到扎哈罗夫讲述斯大林在1912年来土鲁汉斯克的情形。她写道：“费利甫告诉我，他怎样在那里见到了斯大林。根据传统作法每个刚到流放地的同志都要作一次关于俄国形势的报告。关于那个他们早已远离了的俄罗斯，难道还有谁比一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能作一个更为生动和深刻的报告吗?！流放在那里的一批同志，其中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费利甫，当时正在莫那斯特尔斯克村盖房子。斯大林本来应当先到那里去。杜勃罗文斯基已去世了。费利甫的性格是不喜欢崇拜任何人，加上他从杜勃罗文斯基口里已经听到过对当时所有著名革命活动家的公道的评价，因此他对斯大林的到来并不特别热心。这和斯维尔德洛夫不一样，后者是尽当时一切可能的条件努力更郑重地迎接斯大林的到来，给他准备了一间房子，还从有限的食品

---

① B.T.洛吉诺夫：《列宁和〈真理报〉（1912—1914年）》莫斯科1962年版。

②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5年第2期第39页。

③ 土鲁汉斯克为西伯利亚的一个流放地。——译者

中抽出一些给他。他来了!!! 进了他的房间……再也不出来了!关于俄国形势的报告也始终没有作。这使斯维尔德洛夫很为难……后来斯大林转移到他流放的村子里，不久大家知道，他把杜勃罗文斯基的书全归为己有了。可是关于这些藏书在斯大林来到之前，流放的同志就曾共同协商决定：为了纪念杜勃罗文斯基，他的书籍应视为大家共有财产，成为大家的流动图书馆。一个人有什么权利把这个图书馆归为己有呢？费利甫去和斯大林商量。斯大林对待他正如沙皇军队的将军对待一个敢于提出什么要求的普通士兵那样。愤怒的费利甫（所有的同志都很气愤!）一辈子记住了这次谈话给他留下的印象，并一辈子没有改变他对斯大林的极坏的看法。”①

斯大林在另一村里，即在规定他流放时期居住的村子库列伊卡的表现也并不比以前好。他几乎和所有布尔什维克不和，也包括斯维尔德洛夫在内。斯维尔德洛夫在流放初期写道：“在这里我们是两个人，和我在一起的是格鲁吉亚人朱加施维里，老相识。小伙子不错，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太自私。”② 过一时期斯维尔德洛夫对斯大林的反映更强烈了，他于 1914 年 5 月谈到斯大林时写道：“和我一起住在库列伊卡村的一个同志，我们彼此本来很熟。可是最可悲的是，在流放地、在监狱里一个人能从最细小的地方得到充分暴露……和这位同志现在我们分开住了，也很少见面……”③

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及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冲突一直延续到斯大林转移到莫那斯特尔斯克村，甚至一直到许多同志（包括斯大林本人）被征兵入伍以后。当时在土鲁汉斯克流放地的老布尔什维克 Б.И.伊万诺夫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十二辆马车离开

---

① 《扎哈罗娃回忆录》部分收入尤·特里弗诺夫的书《篝火的余辉》，莫斯科 1966 年版，第 47—48 页。

② 科·蒂·斯维尔德洛娃，《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莫斯科 1960 年版第 190 页。

③ 《斯维尔德洛夫选集》第 1 卷莫斯科 1957 年版第 276—277 页。

莫那斯特尔斯克，这是一件大事。这次被征从军的事件似乎应该使约·朱加施维里和A.A.马斯连尼科夫清醒过来，使他们能认识到有必要恢复和多数政治流放者的同志式关系。这从党组织的角度也是必要的，可是朱加施维里和马斯连尼科夫不这样作，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再也没有别人。斯潘达梁9月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医院里病逝了，维拉·什维采尔在他死后好象是住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因此朱加施维里和马斯连尼科夫只是可怜的少数，只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波兰社会党人及孟什维克托波诺格夫倾向于他们。朱加施维里从库列伊卡转移到莫那斯特尔斯克后和马斯连尼科夫住在一起，仍然不理睬整个政治流放组织，也没有和中央俄罗斯局的两名成员斯维尔德洛夫和戈洛舍金恢复党的关系，更没有和著名的党地下工作者博格拉德、布拉托夫、多尔别什金、麦德维杰夫、谢尔盖、诺夫戈罗德采娃、谢尔古舍夫-阿克谢诺夫、皮萨列夫等恢复关系。这种必要的和解没有进行。朱加施维里仍然是自高自大闭门造车，想他自己的那些计划……敌视斯维尔德洛夫的朱加施维里并不愿意和好，而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多么想伸出友谊之手，并由中央俄罗斯局三名成员共同讨论工人运动中的当前问题，这些问题当然是存在的。”

斯大林在土鲁汉斯克流放地的这种做法很快就在中央俄罗斯局里受到谴责，而中央俄罗斯局在列宁回俄国前体现了全党的领导。

大家知道，斯大林、穆拉诺夫和加米涅夫于1917年3月12日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当天中央局召开会议，会议记录上写道："下面解决穆拉诺夫、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问题。关于第一个同志，大家一致通过可以参加会议。关于斯大林，有人报告，1912年他曾是中央的代表，因此最好能参加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但是，因他本人的某些缺点，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提出，他作为列席代表参加。至于加米涅夫，由于他对审讯案① 中的表现和依据在西伯利亚和俄罗斯所通过的决议，会议决定，他如果愿意干的

话，只能做为《真理报》的工作人员参加，但要求他表明态度。他写的文章只能作为资料使用，不能以他的名义发表。”②

但第二天斯大林还是被吸收到中央局。同一天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由奥里明斯基、斯大林、叶烈梅也夫、加里宁和玛·伊·乌里扬诺娃组成《真理报》编辑部。斯大林到编辑部后实际上把大权抓到自己手里了。3月15日《真理报》(第9期)宣布：编辑部成员为斯大林、加米涅夫和穆拉诺夫。然而中央局通过的其他成员的名字根本没有提到。有关斯大林的这些作法，中央局于1917年3月17日通过了由奥里明斯基提出的决议，决议中写道：“中央局和彼得格勒委员会抗议强行把加米涅夫拉入编辑部，并将他的这种作法及他参加《真理报》编辑部问题提到近期将召开的党代表会上讨论。”③

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真理报》夺权后从第9期开始登载的那些文章和材料，在革命基本问题上不仅不反映列宁路线而且是直接违背列宁路线的。他们甚至自作主张地拒绝登载列宁的四封《远方来信》中的三封。在《真理报》上只登了一封信，而且只登了被歪曲了的摘录。④实际上由斯大林和加米涅夫领导的《真理报》在1917年3月下半月和4月初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持有半孟什维克立场。当时《真理报》主张对临时政府给予“压力”并要求团结孟什维克。那时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宣布：和孟什维克的“小小分歧”可以在同一党内加以克服。在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上(1917年3月27日—4月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斯大林在报告中对两个政权问题的评价是完全错误的。斯大林不仅没有提出布尔什维克完全不信任临时政府的口号，相反，他号召支持临时政府“因为这一

① 指1914年对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审讯事件，当时加米涅夫的作法很不恰当。

② 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所保存的资料。

③ 同上。

④ 见H·克鲁普斯卡娅：《在急转弯时》莫斯科1965年版。

政府正在巩固革命步伐。"[①] 甚至在列宁回到俄国后，斯大林和加米涅夫还在一段时期内反对列宁著名的《四月提纲》。《真理报》是于4月7日公布《四月提纲》的，8日报纸发表了由斯大林全力支持的加米涅夫激烈而教条式的批评列宁提纲的文章。列宁不得不相当坚决地改变由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推行的《真理报》路线，这是不足为奇的。

在第六次党代会前斯大林在评价当前形势时犯了一系列错误，他甚至企图不让党的骨干了解列宁关于国内政治形势的重要论点。[②] 在斯大林的积极参与下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第二次会议实际上否决了列宁(给六大)写的提纲《最新政治形势》。

斯大林在六大报告中也犯了一系列错误。例如：他宣布，布尔什维克在7月份是被孤立了，如果不是战争的话，提出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空想。斯大林把列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解释成为从社会革命党人到布尔什维克的联盟。在列宁是否出席临时政府法庭问题上斯大林的立场也是错误的。他认为，如果政府保证安全和保持"某种程度上的体面"，列宁和其他同志可以出席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法庭。斯大林这一建议遭到多数代表的坚决反对。

关于斯大林在1917年10月决定性的日子里的活动和政治态度现在暂时还不十分清楚。

37

众所周知，在斯大林迷信时期关于十月革命的全部历史及其它材料一直说斯大林似乎是十月武装起义的主要实际领导人，好象在这一时期中只有斯大林是列宁的最亲近的助手，好象斯大林是十月革命的第二个领袖和鼓舞者。

但十月革命有关材料和十月革命参加者的回忆并未证实这一无知的说法。例如：从材料中可以看到，由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刊物《工人之路报》在1917年9月、10月决定性的日子里，没有登载列宁的一些文章，或者登载时整段整段地删节。该

①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2年第5期第112页等。

② 《列宁和彼得格勒的十月武装起义》莫斯科1964年版第44页。

刊物的这种做法和党内上层的某种“高枕无忧状态”引起了列宁的强烈抗议，他开始往往甚至经过中央向党组织申诉。下面是列宁1917年10月写给中央、彼得格勒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及这两个城市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成员的信的摘录：“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要幼稚的形式主义的把戏，要可耻的形式主义的把戏，就是背叛革命。”“显然，我们党的许多领导者没有重视我们一致公认、一再重复的那个口号的特殊意义。这个口号就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就是起义的口号。”“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不能再等了。革命在夭折中。”“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危机时刻对议会主义产生了不正确的态度”，“关于党的‘上层’产生可能导致灭亡的动摇，是无可怀疑的。”“在我们党‘议会主义’上层中不是一切都正常。”“鉴于中央委员会甚至迄今没有答复我自民主会议开幕时起就坚持实行这个方针的要求，鉴于中央机关报删掉了我的文章中指出布尔什维克作出参加预备议会的可耻决定……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错误……我不能不认为这是中央委员会甚至不愿意讨论这一问题的‘微妙’暗示，要我住口，要我引退的微妙暗示。”“我不得不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现在我就提出，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①

大家知道，还在1917年10月10日党中央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立即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反对这个决议的只有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彼得格勒市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于10月11日也通过了列宁关于起义的决议。10月16日这个决议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得到批准。

为了反对列宁关于武装起义的路线，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步骤——在半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他们反对有关中央进行武装起义决议的声明。列宁当时严厉地谴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22—123、165—166、167等页。

责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叛徒立场。斯大林的做法则另一样。他自作主张，没有经过中央同意在《工人之路报》第41期上公布了季诺维也夫企图拒绝列宁谴责的声明。斯大林在前面加了《编者按》，这《编者按》实际上维护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一没有经过《工人之路报》编委会成员同意而发表的《编者按》引起了许多中央委员的愤怒。在当天的中央会议上斯维尔德洛夫宣读了列宁的信。唯一反对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中央开除出去的人就是斯大林。同时，斯大林拒绝了同志们的批评并提出了辞职声明，中央没有接受这一声明。

10月24日晨中央又开了一次会，中央委员为领导起义进行了分工。斯大林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因此没有叫他负什么责任。此外，就是在1917年10月24日起义已成为事实之后，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实际进行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小的。分析一下这"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事实、文件和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十月起义的真正组织者和鼓舞者是列宁。在起义的实际进行中，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的领导者当时是列·达·托洛茨基。

在武装起义中和对巩固其胜利发挥巨大作用的还有一些布尔什维克：克雷连柯、德宾科、拉斯科尔尼科夫、斯米尔加、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米柳亭、波德沃依斯基、斯维尔德洛夫等。斯大林在起义的日子里干了什么呢？他承担了中央的什么委托？许多传记家花费了很大力气，但至今几乎什么也不知道。在《简明教程》和《传略》中说，中央在10月16日选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起义领导中心。现在我们已知道，斯大林根本不是这个党的中心的领导者。这个党的中心究竟做了什么，现在还不太清楚。他是否召集过那怕是一次会？通过什么决议？在《十月革命小百科全书》① 中写道，以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

---

① 百科全书出版社莫斯科1968年版。

夫、斯大林、乌里茨基为成员的党的中心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成部分，并在此委员会里起领导作用。他的活动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和列宁本人指导的。在《历史百科全书》中还说明了党的中心成员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和斯维尔德洛夫承担了中央交给他们的委托。但一句话也未提到斯大林。不知道他是否出席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会议？发过言没有？我们只知道斯大林领导了《工人之路报》这一报纸，而在十月革命决定性的日子里这一报纸的作用是很小的，主要指示和动员工作并不是经过这份报纸进行的。任何人没有在10月24、25日看到斯大林和武装工人和水兵在一起或参加过士兵集会。所以毫不奇怪，美国共产党员约翰·里德在他写的关于十月革命的书中（《震撼世界的十天》）一字未提到斯大林，可是他却是这些事件的目击者。[①] 在《列宁全集》第5版，第34卷（1917年7月—10月）中收集的所有文章和信件中斯大林的名字只提到过一次，而且是和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捷尔任斯基一个错误有关。

十月革命后最初几个月里斯大林也犯了不少错误。例如：在中央讨论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就严重动摇。

关于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的"统帅活动"，又是对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

人所共知，1918年夏天，斯大林作为粮食特别委员被派往察里津。到察里津后他实际上把一切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凌驾于一切地方的、苏维埃的、党的和军事的机构之上。不可辩驳，斯大林为了向苏维埃俄罗斯工业中心区供应粮食在察里津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为了整顿城市和前线的秩序他在那时使用的方法就是大规模的恐怖。斯大林不仅枪决了几十个真正的苏维埃敌人，而且

---

① 大家知道，列宁在为这本书写的前言中给予该书以极高的评价，他建议用所有语言成百万册地出版此书。而斯大林实际上禁止出这本书。在个人迷信年代，这本书从图书馆的目录中吊销，直到二十大后才再版。1937—1938年有些党员只因为"保存了里德的书"而被关到监狱和集中营。

仅仅是因为怀疑一些人和白哥萨克人有联系而消灭了许多人。当时克·叶·伏罗希洛夫写过这些事情，但没有指责他。①

斯大林违背了列宁的指示和俄共(布)中央决议，一概否定所有的军事专家，撤他们的职，个别人被枪毙了。斯大林从南线拍的电报要求中央重新考虑"非党反革命分子中的军事专家问题"。斯大林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立场出发不愿考虑这些军事专家在红军建设中会发挥多么大的作用。其中，对北高加索军区的军事领导人A. E. 斯涅萨列夫，他更是敌视和不信任。②

旧沙皇军队上将，同时又是著名的东方问题专家 A.E. 斯涅萨列夫是最早自愿加入红军的人之一，并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条件地贡献给保卫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事业。他精力充沛地领导了军队，帮助组织了察里津自卫战，阻止了敌人，使之不能前进。可是斯大林就在这时候给莫斯科打了电报，说北高加索最高军区的军事领导人从事破坏活动。斯大林写道："军事领导人斯涅萨列夫，在我看来，非常善于搞阴谋破坏。"斯大林要求撤除斯涅萨列夫的职务，说他不能也不愿意同反革命作战，斯大林把斯涅萨列夫的城市防御计划宣布为带破坏性的，只是因为这计划有"防御性"迹象。1918年 7 月中旬察里津的形势已稳定了，斯大林在这时自作主张撤消了由军事专家组成的军区司令部所有成员的职务，然后把他们逮捕了，关在作为监狱使用的伏尔加河上的一个驳船上。然后把这条驳船连人一起突然沉掉了。为了调查这种独断独行、横行霸道的做法，1918年夏天以阿·伊·奥库洛夫为首的最高军事委员会检查团抵察里津。斯涅萨列夫被释放并被任命为西部地区防务的负责人。后来(在 1930 年重新被捕前)他是工农红军参谋本部研究院的院长。

1918年 8 月初斯大林企图拒绝斯涅萨列夫的"背叛计划"。他为了组织进攻坚持把前线北部部分军队撤到察里津西部和南部.

① 《消息报》1935年 1 月 3 日。

② 见《军事史学》杂志1965年第 1 期。

42 军事史学家 B.杜德尼克和 Д.斯米尔诺夫写道："费很大力气才组织好的防务的稳定被破坏了……8 月 1 日没有把握的进攻开始了，8 月 4 日和南方的联系中断了，察里津和中央失去了联系。迫不得已军队又被调回北部战区。"①在给列宁的电报中斯大林把不成功的进攻的责任全部推到仿佛"军委接受的是完全不中用的摊子，而原军事领导人的消极态度部分地起了瓦解作用。"

1918年 9 月 17 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任命著名的军事专家 H.H.绥廷②为南线司令员。斯大林和谢·康·米宁被派到南线军事委员会去，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副司令员。后来康·亚·梅霍诺申也被派到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去。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米宁，即"保卫察里津的老人"为一方，与绥廷、梅霍诺申为另一方，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其实质是察里津的干部不愿意执行党在红军建设中利用旧军事专家的路线，企图实行已被党否定了的集体管理军队的制度。由于斯大林的坚持，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撤消了绥廷的第一批作战命令，不久甚至停了他司令员的职务。这时斯大林拒绝服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不干涉前线司令员作战命令的指示。根据此种情形，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于 1918 年 10 月 2 日打电报给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米宁说："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前线军委必须执行。没有服从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军队。在执行决议的同时可以向最高机构——人民委员会议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诉，最后还可以向中央申诉。恳切建议你们实行革命军事委员会决议……任何冲突都不应该出现。"③但斯大林
43 没有重视这份电报。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发生的冲突极大地影响了南线战斗力，而 1918 年秋，南线的形势是非常艰难的。④党中央讨

---

① 见《军事史学》杂志1965年第 2 期。

② 似应为 П.П.绥廷，即巴维尔·巴甫洛维奇·绥廷，他于1938年被处决。——译者

③ 《斯维尔德洛夫选集》第 3 卷莫斯科 1960 年版第 28 页。

论此问题后决定，为了改变形势把斯大林从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中调回莫斯科。南线司令员仍由绥廷担任，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是：康·亚·梅霍诺申和Б.В.列格兰。内战后绥廷曾在共和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后来斯大林对他进行了迫害。⑤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察里津事件问题，特别是因为伏罗希洛夫和米宁在这次大会上参加了“军事反对派”，斯大林实际上也支持了他们，但在公开场合斯大林是反对“军事反对派”⑥的。可以设想：是列宁说服了斯大林不要公开反对中央的军事政策。同时列宁可能保证不在大会上批评斯大林。列宁在大会报告中（这一报告1970年第一次发表）甚至赞同察里津的枪杀行为，而过去列宁是持谴责态度，认为这种行为是错误的。列宁在大会上说：“我们有一些分歧和错误，谁也不否认这点。当斯大林在察里津枪杀人时，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我认为杀的不对，而伏罗希洛夫所引用的文件说明我的看法是错误的。我的错误被揭开了，我当时曾打过电报，要他们谨慎一些。我也犯了错误，我们大家都是人……”

但在主要问题上——关于利用军事专家和红军的纪律问

---

④ 见《列宁文集》第37卷莫斯科1970年版，第106—107页。

⑤ 见《军事史学》杂志1962年第2期。

⑥ 关于所谓“军事反对派”问题我们的历史科学研究极少。公开地参加“军事反对派”的有：阿·卡缅斯基、克·伏罗希洛夫、叶·雅罗斯拉夫斯基、格·萨法罗夫、菲·戈洛舍金、谢·米宁等。但站在他们背后的是斯大林，他显然是同情这反对派并力图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即列宁和中央不懂军事和过分相信了托洛茨基。而分歧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吸收军事专家参加红军的问题。众所周知，晚一些时候斯大林指示“不要再称军事反对派为反对派”，他极力强调，这反对派的矛头不是指向列宁和中央的，而是指向托洛茨基的。可是八次大会曾向卡缅斯基提出警告，中央决议中说，没有托洛茨基的军事政策，而只有由托洛茨基执行的中央政策。最老的党员之一Д.Ю.佐林娜前几年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关于军事反对派》，但这篇文章至今没有发表。总的来说要指出，往往因不满而反对列宁的斯大林却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公开的和“正式”的反对派。在关键时刻他始终放弃自己的意见并永远和多数人站在一起。如果说这是由于列宁的道理能说服人，那是难以置信的。

题——列宁是坚定不移的，于是他指责了察里津领导人的行为的不当。“怎么回事?”列宁问道，“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老游击习气没有根除，这从伏罗希洛夫和戈洛肯金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刚才伏罗希洛夫的发言就用事实说明了游击习气的遗迹还很严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伏罗希洛夫同志说：我们没有任何军事专家，我们的损失是六万人。这简直是太可怕了……察里津军队的英雄主义已深入群众之中，但说，我们却没有使用军事专家——这难道是保护党的路线吗？中央承担不执行党的路线的责任，但伏罗希洛夫也有责任，因为他不愿意放弃这种老游击习气……我们应该把正规军提到第一位，即转向有军事专家的正规军队。当你们在提纲中一方面说，我们赞成用军事专家，但另一方面又说，要有集体指挥，那么你们是在打自己的嘴巴。你们说，军事专家会背叛和会逃向敌人，那么我们在纲领草案中难道没有提出他们都是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我们的任务是阻止他们的任何反革命意图。这点大家都知道。奇怪，你们怎么只是从自己一孔之见去看事情……我们在纲领中提出要吸收军事专家，而你们说，要利用他们，集体指挥下可以利用。但这不是我们所要的。要他们指挥，而我们在他们旁边放上我们的人。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做法会带来好结果的。伏罗希洛夫同志甚至提出如此奇特的事，即摧毁军队的是奥库洛夫。这真是莫名其妙的事，因为奥库洛夫是执行了党的路线，奥库洛夫向我们汇报过，你们那里保留了游击习气。他用客观事实证实了这点。六万人可以倒下，但从我们总的路线的角度看，我们难道可以牺牲六万人吗……从党的路线，从我们所提出的任务的意义上讲，显然我们不能再牺牲六万人，而如果当时那里有专家，有正规军的话，我们就不会牺牲这六万人，因为对正规军我们是不能不重视的。”①

斯大林不仅对军事专家，就是对自己下属的党员，态度也很粗

① 见《列宁文集》第37卷莫斯科1970年版第138—139页。

暴。就是在那个时候，斯大林要求下面人员毫无保留地盲目地服从他。他排挤自己不称心的人，而所用的人只能服从这样的一个原则："听指挥，执行命令，汇报执行情况。"

1918年5月斯大林从察里津给在巴库的斯捷潘·邵武勉写了一封信，信中他的指示也能证明他极端残酷无情和放肆的性格。

斯大林写道："至于对达吉斯坦的和其他匪帮，如果他们阻挠火车开往北高加索的话，要特别无情地对待他们：焚烧他们的村庄，把一系列村庄烧成灰烬，使他们不敢再袭击火车。"① (斯大林在察里津进行这些恐怖活动的经验二十年后被推广到全国范围。)

1920年斯大林作为西南线军委的成员拒绝服从政治局有关西南线命运的决议，并给列宁发了一封措词激烈、粗暴的信。 46

斯大林还自作主张把第一骑兵军和其他部队卡下，不肯交给西线，造成了苏军向华沙进攻失利。②

斯大林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时也常常采取一些粗暴的做法。如：在乌克兰苏维埃大会和乌克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列宁于4月3日执行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议庆贺苏维埃乌克兰的决议，其中表示"对乌克兰劳动人民和被压迫群众的英勇斗争表示赞赏和同情，他们现在是世界社会革命的先进部队。"而斯大林于4月4日给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却拍了如下内容的电报："不要再玩弄什么政府和共和国游戏了，似乎是够了，该是丢掉这种游戏的时

---

① 《真理报》1963年9月20日。

② 当然，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斯大林的上述滥用职权和独断独行那么容易就如愿以偿了？这一问题不太好回答。第一，斯大林在1918—1920年已成为相当有力量的人物，不少人支持他，他也很会捍卫自己的利益。在极端残酷的内战条件下，苏维埃政权经常处在危机关头，列宁不能不考虑使用任何现实的力量，只要是这一因素当时对革命有利。在各条战线从四面八方受到攻击的年轻苏维埃共和国里，那个可称之为列宁和斯大林之间两种原则和趋势的斗争还没有展开，也不可能以相当的规模和尖锐形式展开。另外，不光是斯大林，而且中央派到内战前线的许多其他代表也采取过过份严厉的措施。也有不少人向中央反映了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的迅雷不及掩耳的、常常是十分不公平的镇压活动的牺牲者有时涉及个别部队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

候了。"为了回答这个不论从内容和调子都不能允许的电报，当时的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斯克雷普尼克于4月6日给莫斯科发了如下电报："我们必须对斯大林人民委员的做法表示坚决的抗议。我们必须声明，乌克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人民书记处不会以俄罗斯联邦这个或者那个人民委员对我们的态度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他们是代表乌克兰劳动群众的意志，而这意志已体现在第二次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里。象斯大林人民委员发出的声明是破坏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并直接帮助了乌克兰劳动群众的敌人。"①

1922年以前能证实斯大林严重个人品质的类似事实还有不少。

二、斯大林——联共(布)中央总书记

1921年12月底我们党遇到了极大的不幸——伟大领袖和十月革命领导者列宁病了。1921年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给列宁休假六个星期的决议，这一决议后来延长到党的十一大以前。诚然，列宁在这几个月里还继续写文章，写指示信，通过电话给予指示，和同志们谈话。1922年3月27日，列宁在党的十一大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列宁也参加了新选出的中央全会会议的工作，新中央全会于1922年4月3日在党内设立了新的职务——中央总书记，并选了斯大林担任中央总书记。

应该指出，当时总书记职务并不意味着这是党内最主要的职务。当时中央书记的职权和现在大不一样，中央书记处只管党内事务，并不干涉国家管理的主要领域。军队、国家政治保安部、国民经济和人民教育都不受中央书记处的约束。主要的各人民委员部是由著名的中央委员领导的，他们的活动是经过中央全会和政

① 见A.B.斯涅戈夫于1966年6月27—28日在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会议上的讲话。

治局会议讨论的。而中央书记处只是从属于政治局的一个中央机构。书记处的琐碎的日常“机关”工作在那沸腾的时代并不吸引党的最著名的领导人去做。1922 年以前中央书记没有一个是政治局委员。这也是书记处威信不高的原因之一，对它的工作也有所影响。为了改进书记处的工作，中央决定选一个政治局委员为中央总书记。 48

1922 年在全体政治局委员中斯大林毫无问题是一个最没有名气和最不突出的人物。不仅列宁，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布哈林在广大党员群众中比斯大林享有更高的威望。沉默寡言而又感情从不外露的斯大林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讲话声音很小并带有明显的高加索口音，事先不准备好讲稿的话，他就很难做演讲。所以毫不奇怪，在革命和内战的沸腾年代里，当到处都在不断地举行各种集会、示威游行时，革命群众很少看到和听到斯大林，他的主要活动是在政治事件的幕后。他在党的机关中已经是相当有名的活动家，大家已很了解他的组织能力和极厉害的脾气。当时也许估计到，任命斯大林这种人为中央总书记是有利于整顿党的工作机构的秩序。从列宁的大量信件和意见中可以看出，1921—1922 年期间，这些党的机构的工作不是很有成效的。因此，任命斯大林到这一新的岗位并不是出人意料的事。在党内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平常和普通的任命。叶·雅·德拉勃金娜在自己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一件大家认为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事情，甚至党内谁也没有注意到它。”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的。1922 年 4 月列宁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我国革命群众公认的领袖。所以 1922 年斯大林被选为总书记一事和后来树立起来的神话不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意味着提拔 49 一个新领袖和党的领导人，也不意味着列宁任命领导年轻苏维埃国家的自己的继承人。

1922 年总书记虽不是党内主要职务，但我们的一些当代人仍埋怨列宁同意把这个职务交给了斯大林，因为他的许多缺点多数

党的领导人是相当了解的。我们很难同意这种指责。第一，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是列宁建议在党内设立一个总书记职务，更谈不上是列宁提拔斯大林担任这个职务。大家知道，党的十一大后立即召开的中央全会的主席是列·加米涅夫（他主持了全会的开幕式）。就是他，正如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所证实的，建议斯大林担任中央总书记。更有甚者，还在中央全会前就对大会代表进行过一定的工作，其目的是对新的中央施加压力。根据十一大检票委员会成员 A.B.斯涅戈夫的说法，在中央委员选举中有些代表在选票上的斯大林名字旁边写上了“中央总书记”的字样。这曾引起检票委员会尼·斯克雷普尼克的不满，他要求将这些选票作为废票。因此，加米涅夫不得不在大会上解释说，中央书记处是由中央全会而不是由代表大会选举的。这样一来，许多事情说明在选斯大林为中央总书记时，列宁已被置于既成事实面前。第二，这是最主要的，列宁在党和国家内从来没有掌握那么大的权力，不象斯大林后来那样（列宁自己也并不想掌握这种权力）。所以列宁不可能个人决定这样或那样的重大政治问题，也不能决定和任命有关某些党员的这个或那个职务的问题。在这方面他经常不得不向许多中央同志让步。斯大林这次的事情也是这样，因为那时政治局重要成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竭力支持他，更不用说许多有威望的中央委员（奥尔忠尼启泽、伏罗希洛夫等）。

列宁在写给苏联外交人员阿·阿·越飞的信中说：“您（不只一次地）重复说，‘中央就是我’，您搞错了。这些话在神经异常紧张和异常疲倦时才会写出来。旧的中央（1919—1920年）曾在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回击了我，这点您从争论中可以了解到。在组织和人事问题上，无数次情况下我是处在少数地位。这点在您当中央委员时曾多次有机会亲眼看到。为什么要神经紧张，以至于写出完全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的一句话，即中央就是我……”①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2卷第99—100页。

1922年上半年列宁的病情继续发展。1922年5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发生了明显的恶化。在脑血管硬化的基础上，他的右手和右腿的活动能力削弱了，说话受到一些障碍。过了几个星期这些症状消失了，但列宁直到1922年10月才可能回到莫斯科开始工作。1922年10—12月列宁还是那样紧张地工作，但他不可能不想到他长期不能工作或甚至去世后由谁接替他工作之事。

从最近几年发表的列宁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1922年底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政治和个人关系开始逐渐正常化，他们的关系在所谓“工会问题”辩论期间曾大大恶化。列宁对加米涅夫也很信任。列宁当时作为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虽然已经有了两个很好的副手——亚·德·瞿鲁巴和阿·伊·李可夫，但他还建议任命一个“第一”副主席并提名列·波·加米涅夫担任。1923年列宁患病 51 期间，就是加米涅夫担任人民委员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主席。这不是偶然的。加米涅夫虽然有严重缺点和错误，但是他是党和国家的杰出的活动家，在党内享有极高的威信。列宁不会忘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时的表现，但这不妨碍他在后来年代中非常尊重加米涅夫。

至于在1922年4月被选为总书记的斯大林，列宁在1922年和1923年初不仅没有考虑斯大林有可能成为国家和党的领导人的继承人，相反，列宁对他的活动越来越有意见。这当中是有很重要的理由的。正是斯大林在1922年犯了一系列重大政治错误。例如：当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企图取消对外贸易国家垄断时，斯大林支持了他们。只是由于列宁的强有力的干涉，挽救了我们党，没走这危险的一步。正是斯大林于1922年在民族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1922年9月列宁患病期间，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上通过了他提出的关于“自治化”的建议，也就是在自治的基础上把各民族共和国通过参加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途径而联合起来。按斯大林的意见，我们需要的不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是包括一切民族共和国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宁知道后，在1922年9月27日的信中尖锐的批评了斯大林的立场，并提出完全不同的建议——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组织，特殊的国家类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是以各共和国完全平等权利为基础的。党所通过的就是这一决定。

斯大林在1922年发生的奥尔忠尼启泽和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领导之间冲突问题上，他的立场是不正确的。当时这一冲突使列宁很不安。正是因为这一冲突列宁在1922年底口授了自己的文章《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其中写道："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他是中央派去"调查"格鲁吉亚事件的一个委员会的领导人）说的情况，我只能感到莫大的忧虑。如果象捷尔任斯基同志告诉我的那样，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泽竟会动手打人，那么可以想象得出，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显然，这种'自治化'计划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我想，在这里，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臭名昭彰的'社会民族主义'的发脾气，起了决定的作用。发脾气通常在政治上一般都起着最坏的作用……我想，在这里，在对待格鲁吉亚民族方面，我们有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我们要是以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处理问题，就必须非常谨慎，必须采取关心和让步的态度。"列宁紧接着，首先指出了斯大林的问题，他写道："如果一个格鲁吉亚人蔑视事情的这一方面，轻蔑地滥用'社会民族主义'这个指责（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者"，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治摩尔达①），这个格鲁吉亚人就在实质上破坏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的利益……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②

---

① 来自果戈里的剧本《钦差大臣》里的警察的名字，一般用于行为象粗暴的警察的人。——译者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628—633页。

一个月后列宁又谈到奥尔忠尼启泽、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同格鲁吉亚党中央领导之间的冲突。《列宁值班秘书日志》① 中有莉·亚·福齐也娃于1923年1月30日写的记录：

53

“1月2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福齐也娃叫去，让她向捷尔任斯基或斯大林要来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材料，并仔细研究这些材料……他说：‘我患病前夕捷尔任斯基告诉我有关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和这一‘事件’，这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1月25日星期四他又问材料是否收到了。我告诉他，捷尔任斯基星期六才能回来，所以现在我还无法向他要。

星期六我又问了捷尔任斯基，他说，材料在斯大林那里。我写信给斯大林，他不在莫斯科。昨天（29日）斯大林来电话说，材料不经过政治局不能给……今天（30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叫我，问答复如何，并说，他要为取得材料斗争到底。”② （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毫不客气地拒绝把列宁要的材料交给他。这里，说列宁有病而不送材料是个借口，因为拒绝把材料交给列宁，使列宁比拿到这些材料更为不安。）

一个月后，1923年3月5日，列宁又一次关心格鲁吉亚事件，并证明这一点的是给托洛茨基写了如下的信：“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我请您在党中央务必承当维护格鲁吉亚的事。这件事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正在‘追究’，而我不能相信他们是公正的。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去维护这件事，那么我可以放心了。如果您不管因为什么理由不同意接受这一工作，那么就把全部案件材料退回给我。我就会知道这是您不同意的表示。致以最好的同志敬礼。列宁。”③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在病中还很注意和不放心斯大林作为总书记的活动。所以毫不奇怪，斯大林以他特有的毫无礼貌

①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2年第2期。

② 同上第80页。

③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29页。

54 和粗鲁态度，而且违背了一些医生的意见，在1922年实际上尽力使病中的列宁同党隔绝，并借口对列宁关心而不给他有关党内日常工作和分歧的材料。斯大林甚至还想监督列宁同克鲁普斯卡娅的谈话，他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态度也是很不知分寸的。克鲁普斯卡娅于1922年12月23日写给政治局加米涅夫的信就是证据，信中说："列甫·波里索维奇，关于我经过医生允许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口授下写的一封短信问题，昨天斯大林对我的态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党内不是一天了。在这三十年里，我一次也没有听到那怕是一个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话。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对我比斯大林更为宝贵。可是现在我需要的是最大的克制。和伊里奇能谈什么和不能谈什么，我比任何医生还了解，因为我知道什么问题会使他不安，不管怎样比斯大林要了解。现在我请求您和格里哥里①，因为你们是弗·伊·的最亲近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个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不应有的谩骂和威胁。斯大林用以威胁我的监察委员会的一致协议，我是不怀疑的，但是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去搞那个愚蠢的争吵。我也是活人，我的神经已紧张到了顶点。娜·克鲁普斯卡娅。"② 关于这次斯大林和克鲁普斯卡娅之间的冲突，列宁直到1923年3月23日才有可能从加米涅夫那里得知。为了斯大林的粗暴而异常愤慨的列宁把秘书叫了来，并且口授给他下面的一封信（这时冲突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您曾粗鲁地给我的妻子打电话骂了她。虽然她已向您表示愿意忘记说过的话，但是这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她那里知道了。我并不愿意轻易忘记反对我的事情，在这里不必说，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事就是反对我的。因此，请您酌情考虑，您是否同意收回您说过的话并表示道歉，还是愿意断绝
55 我们之间的关系。致敬。 列宁，1923年3月5日。"③

---

① 指季诺维也夫。——译者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674—675页。

③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29—330页。

第二天早晨，列宁又口授一封信，其中说：

"穆迪瓦尼、马哈拉泽等同志，并抄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同志。尊敬的同志们！我一心一意地在关心你们的事情。我为奥尔忠尼启泽的粗暴和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的怂恿而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笔记和讲话。致敬。　　　列宁，1923年3月6日。"①

列宁的上述三封信（3月5、6日）是列宁最后的书面材料。3月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发生了新的恶化，3月10日又出现了一次脑血栓，导致列宁失语和右手右腿的瘫痪加重。毫无疑问，列宁健康的恶化和他3月初因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而受的刺激有关。

我们当然知道，斯大林在1923年不敢和列宁断绝来往。斯大林向克鲁普斯卡娅道了歉，但这一行为，象后来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态度所证明的那样，是不诚恳和很表面的。

还应该指出，1923年夏天和秋天，当列宁的健康有些好转后，列宁在哥尔克接待了许多人，他能散步了，而且还来一次莫斯科。列宁在这几个月内和一系列党和国家著名活动家见了面并谈了话，但他一次也没有会见斯大林。

三、关于列宁的"遗嘱"

1922年底，一方面由于斯大林的粗暴和独断独行，另一方面由于托洛茨基的个人品质和政治品质以及他的自负，党面临着分裂的实际威胁，而这又对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是异常危险的。

列宁具有天才的预见性，他清楚地看到党内形成的分裂危险，而这又引起他越来越大的忧虑，这种忧虑是有原因的。列宁1922年写的信和文件绝大部分都在讲这个问题，即怎样使党的领导核心团结起来，阻止分裂的威胁。列宁带着这样的动机，建议改革整

56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30页。

个党和国家的监察制度，并增加中央委员的名额。列宁还建议在中央进行一系列的人事变动，而首先是要免除斯大林的中央总书记职务。

列宁的"遗嘱"应该包括由他在1922年底——1923年初口授的全部的信件、文章和便条。但从狭意看，列宁的"遗嘱"往往被认为是他谈到中央工作和对较有名望的中央活动家给以评价的那几封信。考虑到这些信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在下面将摘录这些文件中的大段引文。

"(一)给代表大会的信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实行一系列的改变。

我想把我认为极重要的一些想法同你们谈谈。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一百人。我想，假使事情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是不能作这样指望的)，假使我们没有实行这种改革，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构，为了防止中央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全党的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57 我想，我们党完全可以要求工人阶级有50—100个中央委员，工人阶级也可以不太费力地拿出这样多的人来。

这种改革会大大增强我们党的巩固性，并使它容易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在我看来，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列宁　1922年12月23日"①

"(二)口授记录(续)，1922年12月24日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是指防止分裂的措施，这种措施一般是可以采取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615—616页。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假如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党的不稳定性是可能产生的，它的垮台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采取这种或那种措施，一般地来议论我们中央的稳定性，都是无益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是我希望，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也是极难以置信的事。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闹分裂，我打算在这里分析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在我看来，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避免分裂的办法之一，应该是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 50 人到 100 人。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象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品质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这种事件也可以不要太多去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可以不必太多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与皮达可夫谈几句。在我看来，他们是最卓越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

12月25日，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信赖他的。

当然，对两人的评语只是就现时来说的，同时还假定这两个卓越而忠诚的工作者不去找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消除自己的片面性。

列宁

1922年12月25日"①

"（三）口授记录（续），1922年12月26日

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在我看来，可以达到两重甚至三重目的。中央委员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锻炼的人就愈多，因某种不谨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帮助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构。我们的机构 59 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改造它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重建我们的机构。起初应该起这种作用的工农检查院，结果干不了，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他们的助手。在我看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的不应该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我的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总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和一定的成见。这种传统和成见正是应该反对的。

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低于最近五年内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各种会议，出席政治局各种会议，阅读中央各种文件，能够成为忠心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616—618页。

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进机构。

列宁

1922年12月26日”①

过了九天以后，列宁又口授对1922年12月24日信的补充：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这种情况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60

列宁

1923年1月4日”②

列宁12月23—26日致大会的信（和1923年1月4日的补充）是写给党的十二大的，这次大会应在1923年春天召开。这是从信的整个内容可以看到的。列宁建议即将召开的十二大把中央委员的数量增至50—100人，也建议给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议以法律的性质。正是为了解决十二大代表的问题列宁给所有的较有名望的中央委员作评价，并建议更换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

《致大会的信》根据列宁的愿望复制成了五份：一份留给列宁本人，三份给克鲁普斯卡娅，一份给列宁秘书处。列宁请求将这些材料保存在用火漆印封好的信封里，信封上面注明，拆启这些信封的只能是列宁本人，在他逝世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有权拆封。但列宁的值班秘书玛·阿·沃洛迪切娃不忍加上这样的说明③，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619—620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618页。

③ 列宁的秘书不忍在列宁病中，写上“逝世后”这样使人难过的、不吉祥的话，故未如实抄录。——译者

因此"逝世后"字样没有写上去。

列宁这封信以后的命运如何，有些情节还不太清楚。

在《列宁的信件、便条和托办事件登记本》里（由列宁的值班秘书负责登记）写道，列宁口授的《致大会的信》前半部分当天寄给了斯大林。显然，值班秘书并没有认为这件事应该保密。只是第二天第一次口授后列宁才告诉沃洛迪切娃说："昨天（12 月 23 日）和今天（24 日）口授的内容是绝对保密的。"还不止一次强调这点。61 列宁要求，所有口授的材料要在特别的地方由专门人员负责保管，并作为"绝对保密材料"保存。所以可以断定，《致大会的信》第二部分和 1 月 4 日的补充因列宁的要求没有寄给斯大林和其他中央委员。

我们还知道，列宁信的第二部分没有让十二大（于 1922 年 4 月举行）代表知道。大会代表看到列宁的许多其它的信和文章（有的在报纸上发表了）。十二大考虑了列宁致大会信中第一部分提出来的愿望——大会给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一些法律职权，中央委员会也扩大了。但扩大中央委员数量的工作不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从"低于最近五年内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的人中选出新的中央委员。在十二大上，除了原来的中央委员还增选了新的中央委员：格·叶·叶甫多基莫夫（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彼·安·扎鲁茨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埃·约·克维林（顿涅茨省委书记），谢·米·基洛夫（阿塞拜疆中央书记），尼·阿·库比雅克（远东局中央书记），米·米·拉舍维奇（中央住宅委员会主席，苏联最高国民经济会议主席团成员），德·扎·曼努伊尔斯基（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阿·伊·米高扬（中央东南局书记），瓦·米·米哈伊洛夫（莫斯科委员会书记），格·列·皮达科夫（中央租让委员会主席）；亚·彼·斯米尔诺夫（粮食部副人民委员），德·叶·苏利莫夫（苏联最高国民经济会议乌拉尔工业局主席），尼·亚·乌格拉诺夫（下诺夫哥罗德省委书记），康·瓦·乌汉诺夫（电力技术中心主席），莫·马·

哈科尔诺夫（萨拉托夫省委书记）和亚·德·瞿鲁巴（人民委员会议和劳动国防会议副主席）。总之，十七名新中央委员中一个工人和农民也没有。十二大选的十三名候补委员中同样一个工人和农民也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呢？最大可能性是十二大代表还不知道列宁1922年12月26日的便笺，这个便笺里列宁解释他增加中央委员建议时直截了当地说，选进中央的应是这样的劳动者代表，他们“更接近于普通工人和农民”。这个便笺直到十三大才公开发表。但应当指出，十三大也没有遵循列宁的建议。十三大选出的新中央委员是当时有名的苏维埃和党的干部，他们是：尼·科·安蒂波夫（莫斯科委员会书记），亚·伊·多加多夫（全俄职工会总会书记），尼·尼·柯希季洛夫（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委书记），斯·维·柯秀尔（中央西伯利亚局书记），列·波·克拉辛（对外贸易部人民委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联共（布）十三大还补选了二十四名新的中央候补委员。但这些人都是人民委员、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的领导人，就是那些革命五年来在苏维埃俄国或苏联成为高级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那一阶层的代表。显然，我们并不否定这些人的重大功绩，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应该选进中央的。但我们还是要指出，1922—1923年增加中央委员这件事并不是按列宁的建议进行的。 62

列宁信中的基本内容，包括他对中央委员的个人评价，在十二大并没有公布出来。大会并没有讨论斯大林从总书记职务调动的问题。① 应该认识到，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某人的恶意而发生的。用火漆印封保存的严格保密的信只能由列宁自己启封，但他当时已瘫痪和失语。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只能在列宁逝世后把这封

---

① 斯大林是否知道列宁“遗嘱”第二部分的内容？有些历史学家估计，他可能会从福齐也娃或沃洛迪切娃或甚至从他的妻子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她当时在列宁秘书处工作并主管他的档案材料）那里知道此事。我们认为，这个估计是不大可能的。

信打开，而当时列宁虽已病危，但还活着，所有亲属对他的好转还 63 抱有希望。这种情况是列宁在处理这一文件时没有估计到的。

大家知道，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启封了这些信件。在下届，即十三届大会开幕前几天把列宁《致大会的信》交给了联共(布)中央。显然，她并没有事先和斯大林商量。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示过强烈的愿望——把这些记录在他逝世后交给下一次党的代表大会。"①

列宁关于调动斯大林工作的建议成为中央内许多非正式讨论的内容。斯大林在知道列宁这个建议后，示威性地要求辞职，但当时在中央起主要作用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说服斯大林把辞职声明收回去。当时拟定了一个大会代表们和列宁"遗嘱"见面的很奇怪的程序。列宁的信没有在大会上正式宣读过，也没有组织代表讨论(这实际上违背了列宁的意志)，十三次大会文件中也没有这封信。列宁的信只是在各代表团内宣读过，而这当然有利于当时的斯大林保护者们用以拒绝列宁的建议。

季诺维也夫特别主张斯大林留在总书记岗位上，加米涅夫也积极帮助他。正是他们出面在较大的代表团内主持讨论了这个问题。也许在十三大以前，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斯大林同意季诺维也夫在十三大作为主要报告人，用这种办 64 法似乎是把这个虚荣心很强和相当没有原则的人推上了党的领袖地位。而季诺维也夫在加米涅夫(他是受季诺维也夫很大影响的人)的支持下应该在十三大争取保留斯大林总书记职务。

我们不知道，在各代表团讨论中有没有这个或那个同志主张免除斯大林。但是大家知道，绝大多数代表在一系列有威信的中央委员的压力下同意保留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1924 年，在那些不具有列宁那种远见的党的干部看来，斯大林并不是对革命有什么危险的人。那时斯大林还不能不考虑联共(布)中央其他领导人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45 卷第 594 页。

的意见和威望，这一点使他还不可能横行霸道。当时根本谈不上什么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和个人专政。相反，正是斯大林在1924年是“集体领导”的拥护者。他和政治局其他成员一起指责托洛茨基企图搞个人领导，并在托洛茨基攻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站出来保护他们。所以当相当一部分中央委员表示拥护托洛茨基而在许多党的积极分子看来托洛茨基主义成为最大威胁时，至于积极反对托洛茨基的斯大林本人的一些缺点问题则被许多中央委员视为小事。列宁所预见到的，党中央却未能看到。党中央相信了表面上已接受列宁批评的斯大林的保证，把他留在总书记的岗位上。这是重大而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列宁所预见的而在1924年和斯大林在一起的许多同志认为是小事的东西以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导致国家和党的极大的悲剧。

* * *

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是，列宁“遗嘱”后来的命运如何。1936年，波里斯、苏瓦林在法国和马克斯·伊斯特曼在美国，把这份“遗嘱”公诸与世，大概是反对派的什么人把它转移到国外去的。我们的报纸起初宣布“遗嘱”是伪造的，是造谣。但是1927年关于列宁的“遗嘱”问题在联共(布)中央内部也不断被人提出来。这时斯大林时常歪曲列宁文件的基本内容，并企图按他自己的想法解释列宁给他的鉴定。1927年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联席全会上，斯大林在讲话中宣读了列宁“遗嘱”的一段话之后说：“同志们，我是粗暴，我的粗暴表现在对待那些粗暴和背信弃义地破坏和分裂我党的人。我过去和现在并不掩盖这点。”正象列·斯·邵武勉①公正地写过的那样，斯大林在这里是有意识地歪曲列宁这一文件的内容，因为列宁指责斯大林的粗暴态度不是指对敌人和破坏党的那些人，而是指他对待对党有重大贡献的同志方面。②

关于列宁“遗嘱”问题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也讨论

65

① 列·斯·邵武勉是俄共(布)著名活动家斯·邵武勉的儿子。——译者

② 见《哲学百科全书》第3卷第114页。

过。这次大会的参加者 E·П·伏罗洛夫在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1927 年12月 9 日主持会议的格·彼得罗夫斯基宣布第十三次午前会议开幕时说：'我们忘记对奥尔忠尼启泽的建议予以表决，即满足中央委员会和中监委联席会议在 1926 年7月提出的把列宁的信收入《列宁文集》中发表的请求。关于列宁的这封往往被称为"遗嘱"的信，联共（布）十三次大会曾通过决议不公开发表。现在请同志们表决吧。'紧接着发言的是李可夫，他建议不仅发表那封称之为'遗嘱'的信，而且还要发表那些涉及党内问题的其他未发表过的信件，'遗嘱'作为大会记录速记稿的附件予以保存。大会拥护他这个建议并由全体表决通过关于发表'遗嘱'和其它有关党内问题的信件的决议。"

但是，1928 年出版的大会速记报告中没有包括"遗嘱"，《列宁文集》中也没有登载，其它许多列宁的信件也没有发表。但"遗嘱"的内容十五大代表（大会代表共一千六百六十九人）可以在《简报》中读到，这些《简报》只在大会期间"仅供联共（布）党员阅读"而付印的。[①]

66

根据印刷所出版数字，这些《简报》的发行量为一万三千五百份。只有大会代表才能得到它们，剩余的份数如何处理的——不得而知，反正党的组织是得不到这些《简报》的。

这样，在十五大后党内骨干中已经有更多的人看到了列宁的"遗嘱"。

三十年代期间，没有人再提"遗嘱"了。它开始成为年轻党员完全不知道的秘密文件。在大规模镇压开始后，列宁的"遗嘱"被宣布为伪造品。手中保留十五大文件的同志除了极少数幸免，其他都被镇压了。幸免于被逮捕的人大部分宁愿把这个"致罪"的文件销毁掉。有些在个人迷信时代被监禁的老布尔什维克讲，他们在监狱和集中营里遇到过一些党员，他们被判处长期监禁或死刑，只是因为保存了"反革命文件"，即所谓列宁的"遗嘱"。

① 见《简报》第 30 期附件一，第 35—37 页。

第 二 章

67

关于斯大林同反对派斗争的问题

如果想懂得斯大林主义在我国的产生、发展和巩固的历史，就必须那怕是最简短地和概括地研究一下二十年代中期和末期的联共(布)党内的斗争史。这项任务是很艰巨的，因为我们党史的其它任何一个问题比起同反对派斗争问题，在以后的年代中都没有遭到那样明显的伪造。就是二十年代曾经宣传过的许多现象和事实，以及当时发生的斗争趋向，在公布的时候都是有倾向性的和主观的。还有一种情况促使这种现象的发生，那就是我们党内斗争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异常尖锐的形式，斗争的每一方都力图把自己的对立面说得很不象样子，这样或那样的论点都被歪曲到无法辨认的程度，对错误和不确切之处都加以夸大。粗暴和不实事求是不仅不被阻止，相反，都被双方所提倡。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估计到：反对派领导人的许多重要声明和反对派联盟的纲领并没有在苏维埃和党的报刊上发表过，这些文件的手抄本只是半公开地被传播着，今天也只能在“秘密的”档案库里得到它，而本书作者是未得到许可看这些文件的。

三十年代期间阐述党内斗争的主观程度更加厉害了。我们且不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那里所有反对派的领导人都被说成是从苏维埃政权最初的年月起就被帝国主义间谍机构招募去充当外国的奸细和特务。 58

今天，这种指控已经不再提了。但是，六十年代所发表的论述苏共党史方面的大多数历史著作和普及读物在叙述二十年代党内斗争时仍然带有片面性和成见，甚至还有公开的伪造。

众所周知，联共(布)党内的几乎所有积极参加了反对派的人在三十年代大规模镇压活动中都牺牲了。这些反对派的极少数普通成员在苏共二十大后得以回到自己家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为这个或那个反对派领导人辩护时说，他们在二十年代都正确而大胆地，但不成功地反对了斯大林。对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斯大林在战胜了反对派后篡夺了国家和党的一切权力，从肉体上消灭了大多数原来的对立面，也消灭了自己昨天的同盟者，但这也绝不能说明，斯大林在和反对派的斗争中统统都是错误的，而他的对立面在一切方面都是正确的。

另外，把我党各派之间的斗争，象一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那样，描写成是一种争夺权力的无原则斗争，说成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劳动人民而披上了各种理论外衣的斗争，也是错误的。不是的，二十年代我们党内不单是发生了争夺权力的斗争，而且也发生了严肃的理论(和实践)分歧和思想斗争，特别是关于当时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道路和方法问题。

显然，我们在本章中不可能也不准备对二十年代所有的异常复杂的党内斗争变故加以评论。但是，我们认为这一斗争的某些现象还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 * *

众所周知，我党发展各阶段中在它的成员之间曾发生过各种意见分歧，而这同时又导致了紧张的党内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革命前的历史充满了各种思潮、小组和派别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并没有随着社会民主工党的彻底分裂和布尔什维克党组成为独立的党——不久命名为共产党——一事而宣告结束。仅仅在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列宁就经受了几次斗争：同"左派"共产主义者，同"军事"反对派，同"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之间的斗争，1920—1921 年党内发生了关于工会问题的激烈争论。

当时布尔什维克对这种几乎不间断的党内斗争气氛不感到有什么异常。他们常常为这种气氛感到自豪，认为这是党的原则性

和政治健康的标志。确实如此，真正的政治运动和政党如果没有内部思想斗争，没有这样或那样的争辩和讨论的话，就不能存在。一个政治组织的完全思想统一和一致并不说明它的正确，因为这种情形很难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原则。

不用说也清楚，1923年以前正是列宁一直处在我们党内斗争的中心。列宁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和组织者，他同时又是能够把党内大多数人团结在他的口号和主张周围的伟大辩论家。在这些斗争中列宁的态度经常是毫不客气的，有时甚至是粗暴的。这种毫不客气的态度有时在复杂的形势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在某些情况下是令人惋惜的。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管这个时 70 期或那个时期的辩论显得如何尖锐，列宁总是力图不把那用来对付党的敌人，即思想和政治对手的形式和方法搬到党员之间的思想斗争中去。

在分歧没有涉及党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原则之前，列宁仍然把他的对立面看成是党内同志，他耐心地说服他们，详细讲明他们所犯的错误，以便把所有可以团结的人团结在正确口号之下。在这期间，列宁通常力图避开采用做组织结论的手段，设法使犯错误的同志留在党内或党的领导机构中。例如，1921年在俄共(布)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同所谓"工人反对派"进行极为尖锐的斗争之后，列宁不但建议在决议中指出"工人反对派"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的功绩，而且安排了反对派的领导人亚·加·施略普尼科夫进入了中央。列宁说："吸收'工人反对派'的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这是表示同志的信任……这在党内可说是最高的信任了。"① 当施略普尼科夫提出辞职时，正是列宁建议大会通过拒绝他辞职的决议。

列宁对待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雷斯库洛夫同志所犯错误的态度也很说明问题的。雷斯库洛夫是一个忠诚的和富有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46—247页。

忘我精神的干部，他积极参加了在中亚细亚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但是，他于1920年犯了一系列民族主义性质的严重错误。其中包括他坚持建立一个独立的“突厥共产党”和成立“突厥共和国”。列宁建议不批准雷斯库洛夫的报告并把他召回莫斯科。但是，列宁对待党的干部是很谨慎的，他反对对很快就承认了错误的雷斯库洛夫在党内给予任何打击。1921—1922年雷斯库洛夫被任命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人民委员，1922年党提拔雷斯库洛夫担任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议主席。

1920年10月，列宁在致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写道：“对待那些因在苏维埃和党的事业中失败而使心理上十分紧张的所谓反对派代表人物，应采取小心的个别对待的方法，往往就是采取治病的态度，要将这样的态度作为特殊任务介绍给监察委员会。应该努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把事情讲清楚，寻找（不是用命令的方法）一种适合于他们的心理特点的工作。有关这方面的工作，应该给中央组织部以一些建议和指示等等。”①

当然，当党员间的分歧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当他们那怕是最著名的领导人的行为超出党性和党的纪律所允许的范围时，列宁毫不犹豫地和自己昨天的党内战友决裂。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也是不记旧恶的。他从本质上就没有任何报复人的思想，他从来不会对承认错误的同志揪住不放，从来不会要求他们作出什么公开悔过的表示。在这方面列宁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评价是很说明问题的。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1917年10月公开反对进行武装起义之后，很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们马上在苏维埃政权机构中担任了重要职务。正是加米涅夫在起义期间召开的苏维埃第二次大会上主持了会议并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诚然，几天后加米涅夫又力图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94页。

取得“一致”并建立一个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当遭到布尔什维克中央拒绝后，加米涅夫和苏维埃政府其他七名人民委员提出辞职。但是，在加米涅夫和他的拥护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后，列宁又让他们从事党和苏维埃的负责工作。列宁于1920年致意大利共产党人的信中在讲到这一问题时写道：“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及革命后，俄国的一些优秀共产党人犯了大家现在不愿意提及的那些错误。为什么不愿意提呢？因为，如果没有特别需要的话，再提这些已经完全被改正了的错误是不对的。向意大利工人提一下这个错误是有益的。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诺根、米柳亭这样有名的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在此期间表现了动摇，担心布尔什维克会过分孤立自己，进行起义太冒险了，对一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太不做让步了。冲突到了上述这些同志示威性地退出了他们所负责的所有岗位……事情发展到我党中央对这些辞职的同志在报刊上极为尖锐的辩论。但事过几个星期，最多过几个月，所有这些同志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回到了自己最重要的……岗位。”①

不过，列宁在“遗嘱”中指出，十月事件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来说不是偶然的。但列宁无论如何没有反对过这两位著名布尔什维克作党的领导人的可能性和权利。

就是对待孟什维克，列宁也不是采取一概不信任的态度。列宁在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同志们，我观察过孟什维克活动的发生和发展，大概没有别的任何人比我观察得更多更细心了。根据我十五年的观察，我确信……孟什维克的发展，特别是当俄国革命历史上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时刻之际，他们之中表现的严重的动摇，从总的方面可以归结为一点：即要他们违背自己的意志去脱离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偏见是非常困难的。许许多多次他们都勉勉强强地开始朝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接近，虽然是非常缓慢，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417页。

但是到底还是朝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走动，而且再过一年，他们还会走近几步——这一点我是完全相信的。”①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虽然列宁同他的反对论者争论时是不讲情面的，然而他的尖刻却绝不毁伤人们的个人尊严，绝不去污辱他们。玛·伊·乌里扬诺娃写过这样的对列宁的回忆，她说：“列宁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善于持宽容的态度，如果这些错误不是出于恶意和有意玩忽职守……这时犯错误的同志总是可以得到列宁的帮助。当人们要求对这个有错误的人进行严厉的处分时，他总是可以得到列宁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身上找到新的力量去改正错误，这比采取严厉措施和追究责任好得多，因为这种方法不会唤起仇恨的感情，不会使一个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的人感到压抑……”②

斯大林对自己对立面和所有不同意见者的态度则完全另一样。

还在1918—1923年党内斗争时期，即列宁在世时，斯大林在对待犯了思想或实践错误的同志就表现得特别粗暴和不客气。与此同时，斯大林根本不考虑如何说服自己的对立面和如何吸收他们共同工作。他只是想压服他们，使他们听从他的意志，如果达不到这点，他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抛在一边。

列宁善于看到犯错误的同志和敌人之间的明确界限，而斯大林和列宁不同，他把所有反对他的人都看成是自己的敌人，对他们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可以侮辱他们，损害他们的尊严等等。

正是斯大林在罗列自己对立面的各种错误和缺点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对我党许多著名活动家的功绩完全置之不顾，只知道大摆他的政敌的实际存在的和捏造出来的缺点和错误。结果使大家莫名其妙，他们问：这些人怎么能成为列宁领导我党和革命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415—416页。众所周知，列宁所期望的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接近并没有实现。

② 《回忆列宁》莫斯科1928年版。

的最亲密的战友呢？

为了更清楚地看到列宁和斯大林在和反对派进行斗争时采取的形式和方法多么不同，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这类斗争的一个事实，即斯大林和列宁于1921年5月18日在工会第四次全俄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根据A. M. 杜尔马什金的回忆，在这次会议上达·波·梁赞诺夫对俄共（布）党中央提出了尖锐批评，要求工会独立于党。他提出一个他自己的、同中央路线相矛盾的决议，决议里蛊惑人心地提出了当时代表们都异常关心的向工资自然形式普遍过渡的建议。这个建议因货币的购买能力急剧下降而得到了支持。党团的大部分成员无意中支持了梁赞诺夫的决议，而没有通过党中央的决议。斯大林来到党团会议并力图改变已经形成的局面。但他的讲话，就问题的本质来说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而且态度粗暴又不耐烦，对托姆斯基和梁赞诺夫以及党团本身进行了粗暴的个人攻击。这引起了到会的人的抗议、喊叫和急躁情绪。当梁赞诺夫反驳时，斯大林不是采取原则批评的态度，而是粗暴的骂了一句："住嘴，你这瞎胡闹的小丑！"梁赞诺夫跳起来，用同样的语言回敬了他。

会议气氛越来越紧张。甚至连那些反对梁赞诺夫决议的代表也对斯大林的讲话表示不满。

列宁不得不干涉这次中央和党团的冲突。列宁的讲话同斯大林的讲话只有一个"细微的"差别——就是列宁的讲话有着充分根据和说服力。在讲话中反对托姆斯基和梁赞诺夫的那一部分，列宁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性质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列宁在批评梁赞诺夫、托姆斯基、拉林和哥尔茨曼时，没有进行任何个人攻击和带有侮辱的因素。列宁运用了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不加掩盖地把问题的真实情况摆了出来，结果他取得胜利：刚才以绝大多数的优势通过了那个和中央决议相违背的、梁赞诺夫提出来的决议的大会党团，最后通过了中央的决议。杜尔马什金写道："列宁的这次讲话深深地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它是列

75

宁善于和人们谈话和说服他们的一个鲜明范例。”①

一、1923—1924年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

1923年当列宁因病重不能再领导国家和党的时候，年轻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是异常复杂的。工业和运输业还没有摆脱破坏的状态，农业正以极端缓慢的速度从两次战争的灾难和1921年饥荒中在着手恢复。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仍然很艰难。1923年7、8月间许多城市，包括莫斯科、哈尔科夫、索尔莫沃等发生了工人罢工事件，原因是工资有时发不出来，以及严重的经济困难。与此同时，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私人商业在城乡中普遍发展起来，私人工业企业、商店、印刷所、饭店、交易所等开始出现。小企业主、商人和富农抬起了头，都从革命、余粮征集制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造成的休克状态中复苏过来。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经济形势的改善，使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容易得到解决了。但是，这种变化同时给党带来了不少复杂的政治问题和困难。

1923年西欧的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当时西欧劳动人民正在掀起新的革命高潮。年轻的共产党在等待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党给他们出主意和给予援助。

这时俄共(布)党中央就如何克服那些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困难的途径以及关于这些问题性质方面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因此，新的争论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党的十二大期间，至少在政治局委员间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争论。但是，事过刚几个月，托洛茨基就提出了他的特别纲领(同时用很不隐蔽的方式提出要求党的领导权)，他当时是比较出名的党领导人之一。

---

① 《回忆列宁》莫斯科1963年版第528—532页。杜尔马什金所提到的斯大林和列宁的讲话没有记录和保存下来。

本书还会不止一次地提到托洛茨基，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妨对这个充满矛盾的政治人物作一个简短的介绍。

列·达·托洛茨基是在社会民主工党最初几个小组刚刚形成的时候加入党的，他十九岁时被逮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1902 年从那里逃到国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是和孟什维克站在一起的。他作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积极参加了 1905 年的革命。早在那时，托洛茨基就犯了一系列政治和理论上的错误，但不能因此否定彼得堡苏维埃和他作为主席在 1905 年革命中的整个革命活动。在彼得堡苏维埃成员被捕之后，托洛茨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他中途逃跑了，并于 1907 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工作。

77

1912 年托洛茨基住在维也纳时，组织了所谓“八月联盟”并开始出版《真理报》。据他自己说，他的主要目的是调和社会民主党所有的各派和各种思潮，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此时托洛茨基的矛头首先指向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愿意和取消派及召回派妥协。列宁自然也予以反击。正是在 1912—1913 年期间列宁在自己的文章中，特别是在私人信件中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是不好的，态度是不讲情面的，而这些评价在二十年代及后来时期在我们的报刊上广为引用。列宁指责托洛茨基，说他是在直接欺骗工人，因为他没有告诉他们关于取消派的真实情况。列宁说托洛茨基是“最卑鄙的野心家”、“冒险家”、“阴谋家”等等。也正在这时候列宁称托洛茨基为“犹大什克·托洛茨基”，把托洛茨基的调和活动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犹大什克·格洛夫略夫① 为进行家庭里的和解而作的虚伪的尝试加以比较。

1917 年二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回到俄国并参加了称为“区联

① 犹大什克是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小说《格洛夫略夫先生们》的主人公，犹大什克是他的外号，即小犹大。他以虚伪、两面派、狡猾、奸诈等反面的形象著称于文学作品中。——译者

派”① 的国际主义小组。“区联派”那时在当前革命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接近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立场。所以毫不奇怪，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区联派”成员被吸收到布尔什维克党，托洛茨基本人被选进了中央。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争取到多数之后，托洛茨基担任了主席。

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的几个月里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进行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

老布尔什维克亚·彼·斯蓬德② 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总的来说，托洛茨基在 1917 年发挥了自己的长处。他成为彼得格勒集会上最受欢迎的人，他的政治路线引起了大家对他的好感。当时他简直成了 1917 年的丹东。③ 他在各方面表现出他的果断和胆量。但是，他不具备列宁那样的远见卓识和不象列宁那样善于把自己个人的一切感情无限地服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这些东西当时在实践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托洛茨基是最优秀的革命演讲家之一。他具有惊人的演说才能，特别善于用通俗的语言阐明很难表达的思想，但他的演说天才往往和原则性不相一致。”

在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前不久，于 1917 年 10 月 8 日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推选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时，列宁还指出托洛茨基有巨大功绩。列宁说：“提名托洛茨基作代表，我看谁也不会提出争论的，因为，第一，托洛茨基一回来，他的立场就是国

78

---

① “区联派”，即各区社会民主联合会(1913—1917 年)，是彼得格勒的革命组织，它的成员大部分是孟什维克，小部分是布尔什维克，常常采取中间立场，有动摇性。它在十月革命问题上赞成布尔什维克，1917 年提出加入俄共(布)，被接受。——译者

② 亚·彼·斯蓬德是首届苏维埃政府的成员，曾任财政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全苏劳动国防会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国立银行副主席和外汇管理局局长。1937—1938 年他没有被逮捕，但是被开除党籍后，他在莫斯科苏维埃商业局当会计、出纳和簿记员。1947—1949 年期间他写了革命回忆录。苏共二十大后他被彻底平反。他的革命回忆录保存在他家里。

③ 乔治·雅克·丹东(1759—1794)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译者

际主义的；第二，他为‘区联派’成员参加党进行过斗争；第三，在7月艰难的日子里他的工作是胜任的，他拥护革命无产阶级政党。”①

关于托洛茨基在十月日子里的作用，即关于他在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组织和实践中的作用问题，流传过并正在流传着许多各种各样的神话。（其中一些神话的作者是托洛茨基本人。）

一方面，至今有一种夸大托洛茨基在1917年10月的影响和作用的趋势。例如，哈尔科夫的达什科夫斯基教授于1965年给《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写道：“这时期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名字总是并列着，他们不仅在十月革命的旗帜、标语和口号上，而且在党、人民和国家的思想深处都是十月革命的化身……从这个意义上，就全党的成员来说，当时可以在同等的程度上称为列宁党和‘托洛茨基’党”② И·К·达什科夫斯基这种断言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说在广大群众心目中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名字在十月革命日子里并列在一起的话，那么在“党的思想深处”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我们党和十月革命只有一个鼓舞者，只有一个领袖，这就是列宁。在我们前面已引用过的在推选参加立宪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列宁在介绍托洛茨基时还说道：“‘区联派’的成员很少有根据我们党的方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经受了考验的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着重点是作者加的），然而，提出托洛茨基做代表，是不会有争论的……”③ 以及其它等等。

---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345页。

② 《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的公开信》（手稿）。达什科夫斯基教授，生于1890年，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参加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在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里，他发表了有关经济问题约一百篇文章和著作。曾是“民主集中”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党籍，后来在三十年代期间不断地因各种诬陷而遭到迫害。苏共二十大后，1927年到1956年期间对他的一切指控被推翻，为他恢复了名誉。1956年因年老退休，住在哈尔科夫市。他是许多未发表的有关苏共党史的文章、信件和简介的作者。

③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345页。

但是，贬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日子里的作用也是不对的。列宁和托洛茨基虽然在进行革命的条件和日期方面有分歧，而在这些分歧中列宁往往是正确的，但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实际准备和执行中的作用是异常巨大的。正是托洛茨基是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而从革命第一天起，即临时政府被推翻后，彼得格勒的一切权力移交给了这个委员会。

80

关于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决定性事件中的巨大作用，可以举出许多足以证明的材料。有关这些情况可供引用的有约翰·里德著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① 我们在这里仅提供一个证据，即于1918年11月6—7日《真理报》发表的，署名“约·维·斯大林”的文章《十月转折》。这篇文章写道：“这个转折的鼓舞者始终是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坚定地说，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善于作日常工作是分不开的，这些方面党首先并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同志的主要助手是安东诺夫同志和波德沃依斯基同志。”（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初期以前曾把这篇文章收进自己的著作选集中。）

我们不再分析布列斯特期间托洛茨基的错误做法。但每个客观的历史学家显然都看到，在这些危机的日子里，在托洛茨基的言行中是连“有意”“叛变”、“投降”和“出卖”的影子都没有的，而这一切指责是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写进历史科学的。②

81

① 约·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莫斯科1959年版第76、78、128等页。

② 最近社会科学院集体编著的《十月革命后的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一书（莫斯科1969年版第18页）中关于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时期的路线写道：“托洛茨基及其同谋者的奸细路线是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及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派的目的相吻合的，而他们是渴望消灭苏维埃俄国，削弱革命力量，保存和巩固垄断资本主义的阵地。”这真是斯大林式辩论方法的好榜样！列宁怎么会不知道，不懂这些呢！正是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之后，列宁建议任命托洛茨基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列宁竟然把组织红军一事交给“帝国主义帮凶”，那么他在政治上是多么的盲目无知啊！

关于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期间的活动也流传着不少神话。有人企图把托洛茨基说成几乎是我们红军的主要创建人，是红军主要胜利的组织者。另一方面，有人企图抹杀托洛茨基全部军事工作的意义，而且不仅后来几十年中的历史学家这样做，就是在当时事态发展的过程中也有人企图这样做。例如，还在1919年7月老布尔什维克和军事干部瓦·安·特里弗诺夫在给他的朋友阿·索尔茨的信中写道："在南方曾发生和正在发生极大的混乱和犯罪行为，关于这点应该在广场上大声疾呼，但可惜我现在还不能这样做。根据我们这里所流行的风气，我们永远也不能结束战争，而我们自己因饥饿很快要死去。南方战线是托洛茨基的产儿，南方战线和它的……无才能的组织者有血肉联系。我们的人民应该予以重视，红军不是托洛茨基建立的，而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军队干部建立的。托洛茨基参加工作的任何地方，每在他来到之后，马上就引起极大的混乱。任何一个应该准确无误地工作的单位不允许这种把事情弄得混乱的人来参加，而军事正是这种单位。"①

还有奥尔忠尼启泽从南方战线给列宁写信道："出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接近于叛变的现象……规章、纪律和托洛茨基的正规军都到哪里去了？他怎么允许事情发展到一塌糊涂的地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②

关于当时已经和托洛茨基很敌对的斯大林对他的反映，在这里就不必说了。

我们认为，真理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什么地方。应该指出，党和军队的一些干部对托洛茨基有许多意见，都强烈反对他，列宁对此是很了解的，但是他一直对托洛茨基的军事活动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并始终没有提出撤换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82 阿·马·高尔基在回忆列宁时写道："我对列宁高度评价托洛茨基的组织能力觉得很奇怪。列宁注意到我的惊奇。他说：'是的，我

① 尤·特里弗诺夫：《篝火的余辉》莫斯科1966年版第151—152页。

② 谢·奥尔忠尼启泽：《文章和讲演》第1卷莫斯科1956年版第101—102页。

知道，关于我和他的关系有人在胡说。但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点我也知道。他就是能把军事专家组织起来。’沉默一下后他又小声和不愉快地补充说：‘但无论怎么说，他不是我们的人！跟我们在一起，但不是我们的人。他太图虚荣。他还有些什么，……不太好的东西，是从拉萨尔① 那里学来的’。”②

有关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态度的神话也不少。众所周知，在革命前的争论中，托洛茨基对列宁的评价常常是粗暴和不公正的。实事证明，从1917年起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帕尔姆·杜德③ 那样的断言显而易见是错误的。他说：“托洛茨基对列宁，对他的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布尔什维克，始终怀着刻骨的几乎是病态的仇恨。”④ 老布尔什维克B．E．格罗莫夫在他未发表的手稿⑤ 中对列宁同托洛茨基关系的评价是较正确的（当然也不是无可争辩的）。他写道：“托洛茨基是杰出的革命者。他当然不是列宁主义者，但在我们党内他和列宁一起工作得相当融洽。我们的党是由列宁缔造的，他有能力制止托洛茨基放

83

肆的虚荣心和毫不加掩饰的个人野心……我们党内没有比列宁更加了解托洛茨基的人了。这个充满矛盾的人物所具备的长处和短处都被我们的领袖准确和认真地描绘了。因此，如果想了解托洛茨基的悲剧必须首先读列宁的书。不要相信斯大林写的关于托洛

---

①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德国工人运动及社会民主党内一种机会主义（拉萨尔主义）的创始人。——译者

② 马·高尔基：《弗·伊·列宁》莫斯科1959年版第12页。不能不指出，在高尔基单行本第1版中这段话的内容是这样的：“‘是的，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和他的关系有人在胡说。谎话太多了，特别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他拍了一下桌子说：‘请您给我指出另外一位能够在一年里组织一个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取得军事专家尊敬的人来，我们已经有一个这样的人！’”（第37页）但是，我们认为，1930年版中这段话是较准确的。1924年高尔基不能也不会把所有列宁对他讲的关于托洛茨基的话写进去。

③ 帕·杜德（1896年生），是英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译者

④ 帕·杜德：《国际》，译自英文，莫斯科1966年版第188页。

⑤ 手稿的题目是《斯大林（思考和事实）》写于1966—1967年。

茨基的东西……也许，托洛茨基是唯一没有想躲避斯大林强加给他的斗争的对手，因为在列宁去世后，他自认为有可能成为党的领袖。托洛茨基始终对自己评价很高，并十分珍惜自己的名誉。这个虚荣心很强的人总是被他的同时代的人们的鼓掌声所陶醉，但他首先关心的是：后代能把他作为历史人物来承认。这就是所谓进行‘历史的赌博’。他的错误，首先是脱离实际，只关心自己政治名誉的知识分子的错误……列宁自己告诉了当代人和后代人应该如何对待托洛茨基及他的‘非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不仅因为托洛茨基有功绩尊重他，而且在自己致代表大会、即最后一封给党的信中称托洛茨基是‘现时中央最卓越领袖’之一。这不是空谈，而是我党的缔造者对托洛茨基的最后一次，也是最终的评价。列宁曾在异常尖锐、有时捉摸不清的环境中和托洛茨基工作了二十多年……

在党内托洛茨基享有很高的威望，特别是在青年中间。但是，在老布尔什维克队伍中，即在地下工作时期进行过反对他的斗争的人们当中，他的威信就不那么高了。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他的威信也是非常高的。在我们革命队伍中，除了列宁，其他任何人在演说才能方面都没有能超过他。”

下面我们就转到1923—1924年期间托洛茨基反对派问题上来，不再谈和托洛茨基有关的1920—1921年间的事情，包括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众所周知，这个新争论的中心议题一开始就是党内民主问题。还在1923年9月因为工厂发生闹事和罢工，党内又形成了“工人反对派”，俄共(布)召集了中央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捷尔任斯基作了报告，他指出党内出现了党的生活停滞的状况，委派制度代替了选举制度，前者占了统治地位，这种现象在政治上是危险的，这就麻痹了党对工人阶级实行政治领导。中央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委员会，交给他的任务是研究如何改进党内制度并提出具体建议。

但是，托洛茨基并不与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合作。他于1923年10月8日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出了一封激烈批评中央工作的信。这封信在提出正确批评的同时，包含了许多没有根据的武断的说法。例如，托洛茨基提出，1923年党内民主少于内战时期，书记等级制指挥一切，不让普通党员发表自己的意见。托洛茨基写道："十二大以前基本上形成的和十二大以后得到最后巩固和完成的制度离开工人民主比军事共产主义最严酷时期的制度还要远。"和托洛茨基意见一致的四十六名负责干部在10月15日给中央的信中所提出的批评更加尖锐。这封信中写道："党内所形成的制度已经无法忍受。这个制度扼杀着党的自主性，党被精心安排好的官僚机构所代替。这个机构在平日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在危机关头必然出故障，而在即将到来的严重事件面前可能成为完全不能胜任工作的机构。"此信的作者对俄共（布）中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断言，如果中央继续实行原来的政策，这将导致国家的灭亡和革命的失败。这些信没有发表，只是在党组织内部传阅。1923年10月底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谴责了托洛茨基的信和四十六人的信，认为这是向派别分裂活动迈出的一步。但会议决议没有在1923年10月和11
85 月公布出来。这显然是因为政治局领导（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想避开新的辩论。

但不久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党的各级组织的情绪使有关党内民主问题的辩论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时政治局决定把辩论的主动性掌握在自己手里。11月7日《真理报》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一篇题名为《党的新任务》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充满批评精神的，文章中强调指出："近来，在党内生活中真是太风平浪静了，有些地方甚至简直就是停滞不前。"季诺维也夫写道："我们主要的灾难往往是：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是上面决定了后再下来。这就使广大党员群众的创造性受到限制，使基层党支部的自主性减少了。"季诺维也夫还号召说："为了较满意地解决上述各项任务，为了适应正

在引起我们注意的国际事件，为了使党内生活更加积极起来，……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运用党内工人民主——加强党内关于一般政治、经济及其它问题的自由辩论，特别是把普通党员的注意力集中到有关生产方面的迫切问题上面去。”与此同时，《真理报》号召就季诺维也夫的文章在报刊上和党组织内展开最广泛的辩论。《真理报》从11月13日起开始定期登载有关党内民主问题辩论的各种材料和文章。这一辩论引起了广大读者、一般党员和中层干部的极大兴趣。这时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和他们的对立面的各种文章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双方都认为党内形成的局面是一种不正常状态，并且号召全面发展党内民主。辩论中提出了不少积极建议，其中有些至今还未失去它的意义。当然，党内许多积极分子非常明白，托洛茨基对党内民主问题突然表示关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蛊惑宣传性质。托洛茨基工作作风的行政官僚性质和他对党的纪律的蔑视还在列宁离开党的领导工作以前就已相当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他和许多普通党员及领导干部接触时表现得高傲和自大，使甚至有些他最亲密的拥护者们有根据地称他为老爷。二十年代初期，正是托洛茨基提出了把工会“抖落得干净点”、“拧紧螺丝帽”等口号。那时就在他的拥护者当中开始散布对他个人迷信的因素。 86

但是不管怎样，1923年11月底——12月初发生的党内辩论基本上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它使妥协成为可能。1923年12月5日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这一妥协实现了。在这次会议上对每一处改动都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还是一致通过了决议，并于12月7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可惜，这项决议没有成为党内生活的基础，而后来也都没有被收进联共(布)和苏共决议汇编里去。决议中写道：

“只有经常的、生气勃勃的思想生活，只有经常批判地研究自己的过去，改正自己的错误，只有集体地讨论重要的问题，才能保存我们的党象它在革命成功之前和革命当中刚刚形成时的那样的

党。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真正地保障那些个别问题，各别时期的意见分歧不至于变成党派的小组织。为了避免派系的产生，就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倾听党内广大群众的呼声，不要一见到各种批评就看成是派性的表现，否则就会把诚恳的、纪律性强的党员推上缄口不言和派性的道路……必需扩大党内探讨问题的俱乐部网。当党员在自己的权力和义务范围内讨论他们有兴趣的问题和做出结论的时候，不要滥用'党的纪律'压人。为了能够保证在实现党内民主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上述的措施，必需不是说空话，而是实际地做起来，建议基层支部、区、县、省的党的代表会议在定期的选举中经常地更新下层机构，把那些在实际上有能力保证党内民主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工作岗位上来……今天监察委员会的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党的机关和党的实践中和官僚主义对党政策的歪曲行为进行斗争，对那些妨碍在党组织日常工作中实现工人民主原则的负责干部追究责任(如：限制在会议上的言论自由，或在选举时进行党章未规定的各种限制等等)。"

看来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的辩论很顺利地结束了。但实际上事情并非如此。托洛茨基显然认为，所通过的决议是他和他的拥护者们的胜利，而这为他进一步对政治局的多数施加压力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就在12月8日晚上，在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宣读了托洛茨基以《新方针》为题目的致党的会议的信。从形式上看这是托洛茨基对刚刚通过并发表的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决议的个人解释。但实质上这是新的派别行动，是全党辩论新阶段的开端。就是从派别斗争的角度说来，托洛茨基的信不仅是重大的政治错误，而且在策略上也是错误的。它对托洛茨基派极为不利，因为从这封信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托洛茨基把自己的派别利益置于全党利益之上，关于民主问题的辩论对托洛茨基来说，只不过是改变党领导的手段而已。托洛茨基用自己的行动把他自己同其他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对立起来，粗暴地破坏了刚刚经

过艰难斗争达成的妥协。历史学家Ю·戈洛索夫在他那十分吸引人的、内容丰富的文章《党史记事》中，在分析托洛茨基1923年底的所作所为的时候写道："托洛茨基在这次辩论中的所作所为很代表他这个人，因为这些行为是出于他的某些个人品质。他是一个很有天才的人。如果把他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及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同当时其他领导人的讲演和文章加以比较的话，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超过了他们所有的人（除了列宁）。但正象可以经常看到的那样，他的优点按辩证法的规律变成了缺点，他的天才导致过份自信和特殊感，特别是在列宁因病不能工作以后，而他对列宁又尊重又害怕……有趣的是，托洛茨基的自信心往往导致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他蔑视说服别人的麻烦的组织工作，他认为，只要是他拿出唯一正确的思想去讲演（他是很优秀的演说家），那么所有的党员马上会转到他这边来。而斯大林正好和托洛茨基相反，他不重视公开演讲，他的演说往往不是很深刻的。斯大林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到机关工作，用各种办法说服和强迫人们站到他这方面来。列宁具备了这两个优点，把讲演和文章的说服力及鲜明性同巨大的组织工作结合起来。"①

托洛茨基的信于1923年12月11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这封信虽然提出一些正确的和好的主张，特别是关于党机关的官僚化所蕴藏的危险，但总的来说，这封信没有吸引大批新拥护者到托洛茨基方面来。相反，它使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能够在托洛茨基反对派处于最为不利的情况下向后者进行坚决攻击。托洛茨基的对立面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托洛茨基的一些蛊惑人心和模棱两可的说法上。托洛茨基正好在这封《新方针》的信中说，青年是党的最准确的晴雨表，他并且暗示说："列宁的学生们"蜕变为官僚主义分子了。引人注目的是，连托洛茨基最亲密的一些拥护者和《四十六人来信》的一些参加者拒绝支持他新发表的信并指

---

① 未发表文章的手稿第88—89页。

责《真理报》发表了它。

1923 年 12 月后半月和 1924 年 1 月上半月，几乎所有的党组织都召集了会议或代表会议，在这些会上绝大多数党员谴责了托洛茨基反对派。报刊也开展了广泛的讨论，《真理报》两次（1923年12 月 28 和 29 日）刊登了托洛茨基关于《新方针》的文章——一篇是关于党内派别问题，另一篇是关于党的接班人问题。同时《真理报》登载了当时大部分领导人反对托洛茨基的文章和讲话（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加里宁等）。为了更清楚地看到 1923 年底党内力量对比的情况，可举莫斯科各党支部表决数字。这些材料是在莫斯科党的代表会议上公诸于众的。①莫斯科党委会工作报告宣布，莫斯科四百一十三个工人支部中支持中央的有三百四十六个（九千八百四十三人），支持反对派的有六十七个（两千二百二十三人）。高等学校支部支持中央的有三十二个支部（两千七百九十人），支持反对派的有四十个支部（六千五百九十四人）。在苏维埃机关中支持中央的有一百八十一个支部，支持反对派的有五十七个支部；在军队中支持中央的有七十七个支部，支持反对派的有二十二个支部。在区一级党代表会议上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共有百分之三十六的人。②这说明托洛茨基在党内还享有相当的威信。后来的任何反对派都没有在普通党员中获得
90 如此多的支持者。但是，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反对派显然遭到了失败。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对这次辩论作了总结。会议上托洛茨基反对派被谴责为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同时又指出这次辩论也有一定的积极成果。这次会议还通过一项决定，将俄共二十大③关于团结的决议中的秘密的第七条公布出来，根据这条决议，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有权以三分之二的票数把

① 《真理报》1923 年 1 月 13 日。

② 《真理报》1923 年 1 月 18 日。

③ 原文如此。查十大有此决议。——译者

任何一个违犯党纪和从事派性活动的中央委员从正式中央委员降至候补中央委员，甚至有权开除他。[①] 1924年5月，列宁去世后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同意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将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归入俄共(布)十三大决议案中。

1924年上半年在全党范围内的各种会议上托洛茨基拥护者遭受的失败并不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结束。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以各种形式在整个1924年一直继续进行着。在这期间反对派的成员所提出来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党内制度的范围。

关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总前途问题在这时显得特别尖锐。托洛茨基一直认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可能胜利，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欧洲、特别是社会主义德国直接支持的话，革命是不可能持久的。托洛茨基早在1917年就写道："现在于如此大有希望的俄国革命开始之后，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还在这次战争期间在全欧洲掀起强大的革命运动。显然，它只是以全欧洲形式出现，才能顺利地发展和取得胜利。如果它被限制在国家范围的话，那么它必然会失败……俄国革命只有变为全欧洲性的时候，才能得到挽救……欧洲革命不必等待亚洲和非洲的革命，也不必等待澳大利亚和美国。但是，在俄国或英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德国革命的话是不可想象的，反之也是如此。"[②]

在1917年的时候，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包括列宁在内，都持这一观点。列宁也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俄国开始，但如果没有革命的欧洲支持的话，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俄国取得胜利。可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论证这一观点时的论据是完全不同的。

列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如果没有欧洲无产阶级支持的话，就不可能持久掌权，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俄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比帝国主义国家薄弱几十倍。如果欧洲的工人阶级不夺取政权的话，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会直接扼杀俄国

① 《联共(布)决议汇编》第1卷莫斯科1936年版第151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88—89页。

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知道，实际情况不是列宁所担心的那样。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虽然没有取得政权，但他们用自己的压力破坏了资本主义国家对俄国的更广义的干涉。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尖锐矛盾并没有随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得到解决。还在1921—1922年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苏维埃俄国为自己夺得了和平喘息的机会，它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可能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改变了自己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前途的观点，他制订了有关俄国社会主义长远建设的纲领，这一建设是依靠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对外贸易垄断和农业各种合作社形式的发展。列宁坚定地认为，如果没有外来入侵的话，俄国内部的条件，特别是已形成的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间的联盟，创造了在我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足够的条件。

托洛茨基接受不了这个观点，因为他认为，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不可能，正是因为内部原因和条件，主要是由于国家经济落后和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利益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例如，他在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说："局部的革命，某国的起义绝不能援助我们。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及封锁使我们的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只有引进大批的技术力量，大批的优秀的熟练工人，大批火车头、机器等等，才能对我们有所帮助，而不是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局部的、不成功的起义。同志们！关于苏维埃俄国只能在世界革命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和发展下去这一点，你们可以在我们历来所写的文章中准确无误地读到。你们可以确信，我们在十五年以前就写过，由于俄国阶级斗争的内部原因，俄国革命必然使俄国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但是这一权力作为胜利的社会主义专政形式只有在下面的情况下才能坚持和得到巩固，那就是它成为国际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出发点和组成部分。这条真理至今还有效。"①

---

① 列·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五周年》文集1924年版第250—251页。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在他的讲话里企图使他的“不断革命”论死灰复燃，而他的理论只是从表面上和马克思、列宁的不断革命论有相似之处。托洛茨基革命论的主要缺陷是对无产阶级主要同盟者农民的革命可能性估计不足，这不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这里指的是贫苦农民），甚至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托洛茨基直至二十年代初期还坚持对农民的错误的“左”倾观点，这可以从1922年出版的《1905 年》一书的前言中得到证明。在这篇前言里我们可以读到：“在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不仅要和在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他的所有资产阶级派别发生敌对冲突，而且要和协助他取得权力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同样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里，工人政府的矛盾状态只能……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得到解决。”①

93

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前途的不同观点决定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前途的不同看法。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长远的政策，是社会主义关系逐渐战胜资本主义关系的政策，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整个时期。在托洛茨基眼里新经济政策只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权宜之计，是为等待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讲话中说：“新经济政策是一定空间和时间条件下的产物——这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工人国家的权宜之计，这个国家坚信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我们特别指望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新经济政策是适应这种发展速度的办法。”②

托洛茨基对新经济政策的这一错误看法导致他对党在经济战线上获得第一批成就的偏见。

例如，反对派的成员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对党的经济政策持批评态度。托洛茨基反对派在夸大国家经济困难和经济领域领导的缺点时，预言苏联会出现对外积极活动的完全瘫痪，全面经济危

94

① 列·托洛茨基：《1905 年》彼得格勒 1922 年版第 4—5 页。

② 列·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五周年》1924 年版第 487—488 页。

机和其它灾难。托洛茨基看不到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可能性，不懂得列宁合作化计划的实质，随便埋怨党有“富农倾向”。与此同时，他首先寄希望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要求把苏维埃俄国的全部工作都置于这一命题之下。

但是，1923 年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行动遭到失败。德国工人阶级也遭到失败，而当时正是对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寄予了特别大的希望。西方国家进入所谓资本主义“稳定”时期。这在联共(布)部分同志中引起了张慌失措和悲观失望的情绪。最恼火的是托洛茨基，他看不到欧洲革命运动衰退的客观条件而一味埋怨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首先在于共产国际的领导，而当时共产国际是季诺维也夫领导的。

托洛茨基一些有名的支持者因为看到近几年不能指望社会主义欧洲的援助，于是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建议主要借助农民的力量加快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例如，托洛茨基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什么为了社会主义积累可以实行“无产阶级对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1]的剥削。”[2]这种论点在党内刊物上引起了强烈指责。

许多托洛茨基分子把从小商品生产过渡到大的社会主义生产不是设想为对小商品生产通过合作化加以改造，而是设想它应该遭到破产和崩溃。

在阐明党史问题方面也引起了党内严重分歧。

95 1924 年秋天，托洛茨基出版了他的轰动一时的书《十月的教训》。在这本书中他显然夸大了自己对革命的贡献，同时又歪曲了列宁的立场和作用。但是，托洛茨基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而这两个人 1917 年 10 月曾反对举行武装起义，列宁当时称他们为“工贼”。托洛茨基在书中认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立场是党内的“右翼”。

《十月的教训》一书导致了党内斗争的新高潮，因为这次辩论

---

① 指农民。——译者

② 《共产主义学院通报》第 8 期。

的内容主要是讨论十月革命史的问题。托洛茨基的行为受到中央领导的谴责。反对托洛茨基最坚决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列宁格勒州委于1924年底通过了开除托洛茨基出党的决议。（州委的实际领导人是季诺维也夫。）1925年1月，在中央全会上加米涅夫也同意了列宁格勒同志的意见。但是，斯大林坚决反对这一主张，中央的多数人也支持了他。全会只是免除了托洛茨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托洛茨基被任命为中央租让委员会主席和全苏最高经济会议产品质量特别委员会主席。这些职务当时被认为是次要的岗位。托洛茨基不但没有被开除党籍，而且还保留在联共（布）中央和政治局内。

最后，我们还想提出这样的问题：1923—1924年间形成的托洛茨基的观点体系能否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呢？对此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哈尔科夫市的达什科夫斯基[①]强调指出，作为较特定和较完整的思潮的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并没有存在过。他写道：在革命不同阶段中，当出现有关党的政策具体问题的分歧时，"托洛茨基拥护者确实有过，但成员是变动的。"那些小组是随着那些争论问题的发生而产生，也随着问题的解决而解体了。他们从来没有组成为什么独立的思潮或"主义"。 96

另一方面，有些历史学家非常夸大托洛茨基主义的作用，认为，它始终是完整的反列宁的观点体系。例如，谢·巴·特拉佩兹尼科夫写道："在俄国革命一切阶段，托洛茨基主义作为政治思潮是最有害的。托洛茨基主义是无产阶级中异化的产物，是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部分知识分子中吸收的一群各色政客。"[②]托洛茨基主义有时变成一种吓唬人的东西，甚至对于中国当前歪曲马列主义，除了"现代托洛茨基主义"外，也找不到更为合适的名称。

---

① 关于此人的情况参见原书79页。——译者

② 《列宁主义和土地-农民问题》第2卷，思想出版社莫斯科1967年版第45页。

我们认为，在这里无论达什科夫斯基还是特拉佩兹尼科夫都是错误的。

实际上托洛茨基主义在二十年代无疑是一个特定的思潮，也不完全是无产阶级异化的产物。这是在国际革命和工人运动中的反列宁主义的左倾思潮。在 1917 年革命形势最尖锐的条件下及在内战年代，托洛茨基和列宁共处在一个营垒里，这没有什么奇怪。但是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越来越明显地分道扬镳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在这个意义上说，托洛茨基主义的崩溃是完全符合规律的。

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新”反对派

托洛茨基反对派刚刚以失败告终，我们党内又出现了以两名政治局委员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列·波·加米涅夫为首的“新”的或称为“列宁格勒”的反对派。

97 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在长时期内都是我党最驰名的领导人之一。早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前，他只有二十岁时就成了一名布尔什维克并且很快就青云直上了——季诺维也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他参加了《无产者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国外季诺维也夫直接在列宁的领导下工作。那时列宁把许多重要任务交给季诺维也夫，并认为他是自己党内的最亲密的同志之一。这时季诺维也夫和列宁之间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在二月革命后，季诺维也夫经过和列宁一样的途径回到了俄国，他在 1917 年最初几个月里积极参加了党的革命工作，七月事件后又和列宁一起躲在有名的拉兹里夫车站的草棚里。

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友谊并没有影响列宁在 1917 年 10 月的关键性的日子里尖锐又坚决地谴责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行

为。十月革命后，季诺维也夫因为主张建立联合的“社会主义”政府而示威性地向中央提出辞职，但后来服从了党的纪律，回到党和苏维埃的重要工作岗位上来。内战时期季诺维也夫是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实际领导人。不能不指出，季诺维也夫在这一时期执行的政策往往是很严厉的，但采取这些措施往往并不都是有理由的。他甚至认为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莫·索·乌里茨基和他的职务相比太“软弱”了。1918 年秋天，赤色恐怖在苏维埃俄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里都没有象彼得格勒那么普遍，这里枪杀人质也广为流行。但是，当尤登尼奇进攻彼得格勒时，季诺维也夫表现得张慌失措并准备疏散城市人口，这引起了列宁的强烈反对。有人说，正在这个时候，季诺维也夫和刚到彼得格勒的托洛茨基发生了激烈冲突，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变成敌对的了。

第三国际建立以后，季诺维也夫根据列宁的推荐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同时又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从 1924 年起改称为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后，同时兼任好几个重要职务，因此否定他对革命的贡献是不对的。但许多对季诺维也夫很熟悉的同志有根据地指出，他的工作很积极，但同时又指出，他的缺点是不择手段、虚荣心、好高骛远，喜好搞阴谋伎俩以及意志薄弱等等。

列·波·加米涅夫也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年仅二十岁时就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后来他参加了第三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并且担任了《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12—1914 年革命新高潮时期加米涅夫被党派回俄国，领导了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工作。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以前他负责《真理报》编辑工作。1914 年加米涅夫犯了第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由于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案件，他出席了法庭，但在法庭上他的表现很不象样子，他宣布自己不同意列宁关于“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失败”的口号。加米涅夫的做法引起了布尔什维克的极端不满，包括受审判后和加米涅夫一起被流放到土鲁汉斯克边疆区的同志们在

内。

关于加米涅夫于 1917 年 3 — 4 月期间犯的严重错误，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了。同时不能不指出，正是加米涅夫主持了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并根据列宁的建议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列宁在阐明他的建议时说，同加米涅夫的争论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部分布尔什维克党人所持有的错误意见，这样我们就能够为了实现党在正确口号下的统一去制定更有说服力的论据。(诚然，正是列宁在 1917 年 10 月要求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从中央和党内开除出去。但这时候是我们革命的决定性时刻，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错误当时不仅带理论性质，而是对整个布尔什维克事业形成了威胁。)

1918 年加米涅夫已经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和中央委员了。在这个岗位上加米涅夫仍犯有错误。但对他在十月革命后的整个活动列宁总是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例如，1922 年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扩大会议上最后的讲话中称加米涅夫为一匹“骏马”，说他同时拉了两辆车——莫斯科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议。(他是 1922 年根据列宁的提议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议的第一副主席。)米·彼·雅库波维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加米涅夫“无疑是天才非凡的人物，他知识渊博，忠于社会主义革命，是能够在极端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辨明方向的人。他还具有特殊的文学才能。列宁看到了这点，很了解他，所以他才如此重视加米涅夫，不止一次地让他主持党的代表大会和会议。加米涅夫还是非常善于总结各种思想的人，没有谁象加米涅夫那样能对争论的问题作出总结，而且是如此客观地去做出这些总结。”① 雅库波维奇还指出，与此同时，加米涅夫对俄国革命的各种事件也暴露了他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观点，他没有列宁那种天才的政治敏感和伟大的革命理论思想。

1923—1924 年加米涅夫不仅主持了人民委员会议，而且还主

---

① 米·彼·雅库波维奇：《列·波·加米涅夫》未发表的手稿第 22 页。除此稿外，雅库波维奇还写了关于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引人注目的回忆录。

持了政治局会议。对他熟悉的同志认为，加米涅夫并不是虚荣心很强的人，他是善于让步的领导人，他无疑是受了政治上的朋友季诺维也夫的影响的。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政治联盟中善于活动的，而且虚荣心很强的季诺维也夫显然起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

在列宁不能继续领导党的工作之后，正是季诺维也夫（在加米涅夫支持下）提出由他承担党的主要"领袖"、主要理论家和列宁主义解释人的作用。季诺维也夫认为，当时对他威胁最大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水平不太高的理论家，在党内也不是很有威望。作为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总是强调，托洛茨基直至1917年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100

但是，托洛茨基也不是不回击的。他把批评的主要矛头指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不断提醒党，他们俩人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有投降行为，而列宁曾称他们为革命的"工贼"并要求开除他们出党。

因此，1923—1924年尖锐的党内斗争的结果，不仅使托洛茨基反对派遭到失败，而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影响和威信也大为削弱。相反，斯大林在党内领导的阵地则大大加强了。

身居联共（布）中央总书记职务的斯大林，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仅对他的地位所占有的优势作了充分估计，而且进一步利用了这一优势。中央书记处虽然从表面上是从属于政治局的，但这两个中央机构的关系在实际上则是另一种情况。1924年期间，政治局是一周开一次会，而中央书记处是中央的常务工作机关，他支配了中央各个领域的工作，领导了各州和大城市的党的一切组织，有权任命和调动国家和党的许多活动家的工作。而这一切使书记处有可能在实际上实现党的领导。因为书记处给政治局准备开会议程，而且这些应该讨论的问题经常是在形成决议以前，早就事先决定了的。

大家知道，列宁同时是人民委员会议和俄共（布）中央的领导

人，而且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人民委员会议的工作上，列宁签署的主要指示也是按人民委员会议和劳动国防会议系统传达到下面去。101 这种情况提高了苏维埃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在列宁离开党和政府领导之后，联共（布）中央领导和人民委员会议主席的职权被分开了，联共（布）中央实际领导者不是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加米涅夫，而是总书记斯大林。（这个职务的设置，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最初并不是为了领导全党的工作，它的职权范围只是较狭窄的日常行政工作性质。）

因为在我们国家里共产党是唯一执政的党，所以在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和联共（布）中央领导人的职权分开后，党的领导人的作用就成为主要的了。这样一来，总书记的岗位就成为苏维埃国家最主要和决定性的岗位，而这点最初大家并没有注意到。

斯大林很巧妙而灵活地利用了领导机构关系中的所有这些变化。斯大林依靠了党内的许多“武将”和“实干家”，暗地里挑起他们对“理论家”把持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与此同时，他在政治局内和布哈林——李可夫派结成了联盟。所以1923—1924年间，托洛茨基反对派失败的结果，在中央取得决定性地位的，出人意料的不是季诺维也夫，而是斯大林。同时，斯大林的同盟者李可夫在列宁去世后当了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而且在列宁患病期间实际上领导人民委员会议的第一副主席加米涅夫却没有被选上，借口他是犹太人。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斯大林说：“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俄国的农民性。”

其实，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在新中央第一次全会上一致通过了斯大林任总书记，于是他立即坚决想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挤出党的领导。与此同时，他利用自己在中央机构中的地位企图把这两个人的一言一行置于他自己的控制之下。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及加米涅夫三人之间那不久以前还存在的“友谊”现在102 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三周后《真理报》登载了斯大林在中央县委书记训练班上作的《关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的报告。在这

次讲话里，斯大林指责加米涅夫对党的理论不闻不问，说他在一次讲话里歪曲了列宁一段有关将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转变为社会主义俄国的引文；说加米涅夫在"新经济政策的"一词中多加了"ман"字①。实际上这个错误是由于记录员和校对员的粗枝大叶造成的，过几天《真理报》发表了更正。

除了攻击加米涅夫，斯大林在同一报告中不指名的批评了季诺维也夫。斯大林说："我们这里常说'党专政'。我记得，我们党的一次大会决议里，也许是十二大决议里，也用了这个字眼，当然，这是一种疏忽。显然，我们党内有人认为，我们是党专政而不是工人阶级专政。但是，同志们，这是胡说。"② 毫无疑问，斯大林很明白，季诺维也夫曾经在俄共（布）十二大报告中提出了关于党专政的提法，并力图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而这个提法在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里被采纳了，这不是什么疏忽。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反应是强烈的，而且是过分敏感的。根据他们的要求中央召开了党的领导核心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二十五名中央委员和全体政治局委员。在这次会上多数人谴责了斯大林关于"党专政"的发言，同时赞同了季诺维也夫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在《真理报》上作为编辑部的评论发表了。③ 斯大林提出辞职以示抗议，但被拒绝了。会议通过决议，以后党的高级领导人的言行应该互相配合。同时还通过了关于扩大党的"领导核心"，即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三人小组"的建议。

103

中央内部针对托洛茨基命运问题展开了更严重的斗争。我们已讲过，在《十月的教训》问世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要求开除托洛茨基的党籍。斯大林提出了反对意见，这时中央的多数支持

---

① "新经济政策的"一词为 НЭПОВСКАЯ，多了一个 М 就变成 НЭПМАНОВКАЯ，即"耐普曼分子的"意思。——译者

② 《真理报》1924年6月19日、20日。

③ 《真理报》1924年8月23日。

了斯大林。中央多数同志也不同意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所以没有同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同志的建议，是因为我们知道，割除政策对党是很危险的，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们正是要求流血——是危险的，是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① 在这次大会上米·伊·加里宁也说："我以为，托洛茨基同志个人所积累的威信是党所积累的资本，使用这个资本要非常慎重；所以同他的斗争形式应该是这样的：在取得最大成果时要使党所积累的托洛茨基的威信受到极少损失。"②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企图借助共青团中央(那里大部分人是他们的支持者)的力量对党的领导施加压力。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突然通过要求开除托洛茨基党籍的决议，政治局的回答是很迅速的——俄罗斯共青团中央十五名成员被免职。这些事件使联共(布)中央内部关系极端尖锐化了。

"三人小组"之间的这些分歧，多数情况下是带私人性质的。但是，在解决一些原则问题时分歧就逐渐明朗化了。1924—1925年党在我国的农村政策正经历着重大转折，其实质是克服军事共产主义的残余并在更加彻底执行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发展农业生产。农村中雇用长工制合法化了，租地也容易一些了。许多限制富农经济发展的规定也被废除了。农业税减少了，工业品价格降低了。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活跃中农——这个农村中心人物——的经济活动。但农村的整个富裕阶层也从中得到了好处。

104

总的来说，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这些决议是正确的，是符合新经济政策精神的。但是，有些决议从经济角度来说并没有经过仔细的推敲。例如，在商品匮缺条件下降低工业品价格和减少农业税这些措施显然是为时过早。而提出这些农村新转折建议的布哈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17页。

②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稿》莫斯科1926年版，加里宁的发言。

林和李可夫往往太陶醉于自己的长篇大论，因此犯了一些原则性错误。例如：李可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号召要统统取消对富农和城市私人资本有压力的任何行政措施。李可夫认为，对待富农应和对待中农一样，就是说不要用行政措施压制他们，不要对他们“施加压力”。布哈林走得更远。他在会议上批判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思想时，提出了他那个“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布哈林问道：“农村中将会有哪些成份呢？贫农合作社，即集体农庄。销售、采购、信用等方面的中农合作社。一些地方还会有富农合作社，它们大概在信用合作社中也会取得支持。这一阶梯都将长入我们银行、我们的信用机关的体系里去，并同时长入我们一切经济机关的体系之中。总的来说，我们这里会是怎样的呢？总的来说，我们这里会是这样的：如果富农长入总体系，这将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份；如果贫农和中农长入总体系——这将是弗拉 105 基米尔·伊里奇所说过的社会主义合作社。这将是一幅五彩缤纷的图画。”与此同时，布哈林不是把集体农庄类型的生产合作社摆在第一位，而是把销售、采购和信用的“中农合作社”摆在第一位。布哈林说：“集体农庄是强大的东西，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① 布哈林的有名口号“发财致富吧！”也是错误的，这一口号是他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前3天在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出来的。布哈林在这一报告中说：“我们在农村的政策应该摆脱和消灭阻挠富裕农民和富农经济发展的许多限制。应当告诉全体农民：发财致富吧！发展自己的经济，不要担心会有人压制你们。”②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利用了布哈林发表错误声明的机会开始反对布哈林和李可夫，他们指责中央多数有“富农倾向”，而自己是贫农的保护者。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企图依靠农村的共产党员，因为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央的新农村方针

①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速记稿》，布哈林的发言。

② 《真理报》1925年4月25日。

毫无准备。例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出加强对富农的压力，而不是削弱这种压力。他们不是要求减轻农业税，而是要求坚决提高对富农的税收。加米涅夫主张每年对农村富裕阶层增加税收一、二亿卢布，并在农村中为工业化需要进行临时性的一次征收，约十亿卢布。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显然把革命后农村中的富农比重和他们的影响夸大了。二十年代中期富农经济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五，而1917年占百分之二十，所以反对派所担心的富农威胁显然是太夸大了。当时国家急需的是商品粮，所以加米涅夫建议部分地恢复"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106

为了评价党内在农民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不妨对布哈林和一些反对他的人关于剥夺农民的观点加以比较。早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布哈林就确信，苏维埃政权就是在十五年、二十年之后也不会剥夺富农和城市资产阶级上层。尤·拉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反驳布哈林时说："我们公开承认，在我们的农村中有剥削者，他们暂时还能够存在，因为他们公开的而不是秘密的存在对我们更有利一些，但同时我们要组织贫农，搞好经济，减轻被奴役的条件。然后，再过十五至二十年，当时机成熟时，我们将没收和剥夺大的私人经济。我们在十五至二十年后确实要没收，如果他们不自愿交出来的话。因为我们到了那时，不这样做，难道我们还有其它什么办法吗?"① 可见，布哈林和他的反对论者对我国富农的实际命运的估计是多么错误的。

格·季诺维也夫还在党的十四大前出版的《列宁主义》一书中，也有一系列的错误提法。季诺维也夫评价我国经济和许多工业企业时说：这些企业就其优势说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这一评价显然是错误的。季诺维也夫认为，新经济政策就其主流说来是退步。季诺维也夫也没有能够清楚地区别开列宁在1921年和1923年对合作化(和合作化的不同性质)的不同观点。这一切错误很快

①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稿》，拉林的讲话。

就成为布哈林、李可夫及其支持者激烈批评的题目。

可以设想，斯大林是心满意足地在观察着这一辩论的发展。他基本上支持布哈林和李可夫，但从来没有完全和他们一致行动，使他自己可以保留着行动的自由。例如，斯大林坚持要布哈林承认"发财致富吧！"这个口号是错误的。但同时也是因为斯大林的坚持，联共（布）中央没有允许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激烈批评布哈林这一口号的文章发表。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坚决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认为我们党内存在着"富农倾向"。但是，斯大林承认我党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对富农危险的估计不足，另一种是夸大富农危险，即在富农危险面前张皇失措。与此同时，斯大林号召党在反对这两种倾向斗争中还是应该"集中火力反对第二种倾向"，[①]就是集中力量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进行斗争。

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前，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总的前景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也暴露出来了。

大家知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我党其他领导人都在等待着西欧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较迅速的发展。大家认为，俄国应该开个头，而欧洲应该继续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并且会发展得相当迅速。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匈牙利1919年革命，眼看要证实这样的期望。但是，德国十一月革命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侵略者扼杀了。虽然如此，但是共产国际的建立，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持续到1923年的欧洲新革命高潮，这一切使世界革命的迅速发展又有希望了。

1924年欧洲革命运动显然处在低潮。所谓的资本主义稳定时期开始了。这一切在部分革命者中必然引起了灰心丧气的情绪。我们党也没有能避免这种情绪的产生。在全体党员面前，首先是在党的领导人面前提出来了这样的问题：处在资本主义包围条件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79页。

下的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可能性将如何？

我们在上面已讲过，我们党内在这以前存在着几乎是共同的看法，即俄国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欧洲的支持和帮助的话，在落后俄国的条件下不能继续发展，更不能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

在革命胜利后的前几年中，列宁也持这种看法。例如，1919年3月12日列宁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讲话时说："只有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去评价苏维埃的作用，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弄清楚国内生活中的细小的事情，并且及时地加以调整。建设的事业完全决定于革命在欧洲的重要国家取得胜利的速度如何。只有在这样的胜利之后，我们才能够认真地进行建设事业。"①

1920年11月6日，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讲话时说："如果我们现在一般地看看国际关系，——而我们从来强调我们是从国际的观点看问题的，——那么我们看到要在一个国家里完成象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事业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看一下反对我们苏维埃的战争史，那么，我们会看见……"②

109 1921—1922年期间，当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已推迟而我国已开始实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改变了自己有关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分析一下列宁的最后几篇著作，特别是《论合作制》、《论我们的革命》等文章，就可以看到这一观点。但是，党的许多领导人没有对列宁在对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新的立场给予充分的重视，仍然继续认为，在个别的而且是落后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是这些领导人中

---

① 载于《北方公社报》1919年3月14日第58期上，收入《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33页。第3、4版也收集了这篇文章，并在注解中说，是按《北方公社报》的稿子排印的。然而，我们加着重点的段落被删节了。

② 《莫斯科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总结速记稿》，大会简报第15期。在《列宁全集》第2、3版中，全文被收集进去，然而在第4、5版中，这篇文章尽管也注明为简报速记稿，但我们画了着重点的句子被删节了。

的一个。例如，斯大林在他的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前几版中写道："为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一个国家特别是象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的努力是不够的，为实现这点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努力。"[①] 后来，于 1925 年初斯大林改变了这一观点，并修改了他的著作中的有关地方。

季诺维也夫最初也改变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无论如何，他于 1925 年 4 月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完全肯定地说：我们国家虽然是技术上落后的国家，但"我们可能和应该建设，应该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不管国际革命的速度如何迟缓。"[②] 但是，几个月后，在《列宁主义》一书中（1925 年 9 月）季诺维也夫又开始维护自己原来的观点。他又坚持说，苏联无产阶级不可能单独地，在没有国际革命帮助的条件下克服内部的困难，俄国的技术和经济的落后不允许他建成社会主义，一切其它的提法都带有民族局限性的气味。

但是，还应该指出，党的领导者中间的这场斗争大部分是关着门进行的，即在政治局和中央内部，而不是在全党面前进行的。当时决定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任何全党的辩论都不要开展。我们的刊物对政治局内部的严重分歧不仅保持沉默，而且极力否认其存在。在大会以前关于这个或那个观点的任何表决都未进行，甚至连反对派自己的立场都未表明清楚或在任何专门文章中公开宣布过。在这一方面"新"反对派的做法和 1923 年 10—12 月间托洛茨基的做法有本质上的不同。直到大会前夕冲突才激化了。党的大会召开的两周前，在列宁格勒党的会议上，有些代表显然是在季诺维也夫的怂恿下开始极力批评布哈林和中央活动的某些方面。针对这些做法莫斯科党的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指责列宁格勒的同志是取消主义、失败主义和"阿克雪里罗得

---

①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稿》莫斯科 1926 年版第 429 页。

② 《真理报》1925 年 4 月 29、30 日。

主义。”① 事态的变化必然导致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公开的政治斗争。

众所周知，在党的十四大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基本上只有列宁格勒代表团和其它州的个别代表（其中包括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因此，“新”反对派时常被人称为“列宁格勒反对派”。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形：在斯大林作中央工作报告后，紧接着由季诺维也夫作了代表反对派的补充报告。季诺维也夫的发言软弱无力，不可能吸引大会代表站到自己这方面来。还有一种情况使“新”反对派的处境更为复杂，那就是在许多重要理论问题上反对派的重要人物从本质上就是很不一致的，这也反映到他们在十四大的发言中。

自然，在反对派代表的发言中也还是有许多正确的意见。他们对中央在农业方面的一些措施的批评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反对派批评说，党内的禁锢制度被党的统一口号掩盖着，这一说法也是正确的。例如，克鲁普斯卡娅在十四大会上提出反对压制党内民主，反对把反对派成员调离党的领导岗位的路线，反对要求反对派成员不仅执行大会多数所通过的决议，而且还要求他们立即公开放弃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种要求列宁从来都没有向自己的反对派提出过。

现在也不能不承认，一些反对派活动家关于对党的个别领袖，而首先是对斯大林个人迷信不断发展提出的警告也是正确的。(在这方面大会上最突出的发言是列·波·加米涅夫和格·雅·索柯里尼柯夫。)遗憾的是，当时党还没有成熟到能够阻止这种极端危险的发展过程。大会的多数代表对待几乎所有批评斯大林的发言都表示愤慨，而且对斯大林歌功颂德。加米涅夫在自己发言中说：“正是因为我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斯大林同志本人，正是因为我不止一次地告诉过一些列宁主义者同志们，所以我今天在大会上重复

① 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版，第九章，阿克雪里罗得为不稳定火星派分子。——译者

说，我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即斯大林同志不能起到统一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作用。”讲到此处时，加米涅夫的讲话被多数代表的愤怒的叫喊所打断。代表们接着喊起来：“要斯大林！要斯大林!!! 要斯大林!!!”他们站起来为斯大林长时间地鼓掌。① 就是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开始在政治局其他成员里面突出了斯大林。

不出所料，“新”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四次大会上遭到了彻底失败。党在 1925 年拒绝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提出的领导中央的要求，正象它在 1924 年拒绝了托洛茨基类似的要求一样。

112

斯大林取得的对“新”反对派的胜利，急忙从组织上加以巩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虽然继续当政治局委员，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务被免除了。1926 年起这个职务本身也被取消了。这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为首的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也从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被调回，列宁格勒州委的领导权也从季诺维也夫分子手中夺去。谢·米·基洛夫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加米涅夫也从劳动国防会议主席及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的岗位上撤下来了，而代替加米涅夫被任命为劳动国防会议主席的是李可夫。

三、米·瓦·伏龙芝和菲·埃·捷尔任斯基的逝世

斯大林在党的领导层中的阵地进一步巩固了。这不仅是由于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反对派的失败以及紧接着采取的组织措施。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和影响还由于两位著名的老布尔什维克突然去世而加强了，而他们当时在苏维埃政府里占

---

①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稿》，莫斯科 1926 年版。

据着关键的岗位。在这里我们首先指的是国内战争时期杰出的将领米·瓦·伏龙芝，他于1925年1月代替了托洛茨基被任命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伏龙芝是一位聪明、有毅力、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他不仅在军队里，而且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这位还很年轻、精力充沛的人的突然死亡一方面是很不幸的事，另一方面也是很奇怪的事。

伏龙芝患胃溃疡病，有时因此不能坚持工作。大家知道，胃溃疡本身并不是危险的恶性疾病，对患者的生命没有威胁，而且可以指望疗效良好。这种病可以用根除的手术疗法，也可以用保守疗法，用后一方法规定进行饮食疗法是很重要的。就是在1925年，任何有经验的医生都很清楚地知道，治疗胃溃疡首先应该试用保守疗法，只有在治疗无效时才采用手术疗法。

我们知道，伏龙芝不愿意进行手术，他宁愿接受保守疗法，而且他在1925年秋天健康情况良好，胃溃疡病几乎没有犯。有一封伏龙芝于1925年10月26日，即在去世前五天给他妻子写的信。信中说："我受的折磨很快要结束了，明晨我要被转到索尔达钦斯克医院，后天(星期四)要动手术。你收到此信时，也许你手里会拿到通知你手术结果的电报。我现在感到身体非常好，所以我不但觉得要去做手术是可笑的，而且就是想到去做手术这件事都是很可笑的。可是，两次会诊都是这样决定的。〔仿宋字系按作者斜体字改排的——译者〕我对这个决定是满意的。让他们一劳永逸地看清楚我的病究竟是怎么回事，以便决定真正的治疗方案。我自己则越来越时常考虑，我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病，否则我在疗养后健康迅速得到恢复又如何解释呢？"①

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保守疗法取得如此显著疗效时，两次会诊都作出做手术的决定呢？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这样无法解释的决定只能说明这种决定是来自外部压力

---

① 见《红星报》1930年10月31日，C.西罗廷斯基的文章《最后的日子》。

的结果。而这种压力是存在的。大家知道，关于伏龙芝的病情甚至提交政治局讨论过，而且正是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坚持进行手术。

伏龙芝在给妻子的信中有一点没有讲真话。他无论如何对两次会诊的决定是不会满意的。但是，这两次决定使这位勇敢的将领却非常为难。拒绝进行手术会使别人指责自己胆怯，犹豫。所以伏龙芝同意了，但是同时他心里很难过。1965 年曾发表伏龙芝 114 的友好老布尔什维克 И.К.加姆堡的回忆录。加姆堡在谈到伏龙芝生前最后几天时写道："手术前不久，我去看望他。他情绪不高，并且说，他不愿意上手术台……他觉得手术会不顺利和犯了什么无可挽回的错误的预感使他很难过。我劝伏龙芝，既然不愿意做手术，就拒绝进行这次手术。但是，他只是摇头说，斯大林坚持进行手术——说这样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胃溃疡。我决定上手术台……"①

手术是 10 月 29 日白天进行的。麻醉药用的是氯仿，可是当时已经有效果更好的药——醚。根据加姆堡的说法，麻药对伏龙芝的作用很差，使他不能在麻醉下入睡。主持手术的罗扎诺夫教授决定把氯仿的量加倍，而这对伏龙芝的心脏有危险。自然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健康情况没有什么特别不好，为什么要这样冒险呢？

手术是 12 点 40 分开始的。这时马上就发现了手术是不必要的。医生没有发现任何溃疡，只是在治愈处有一个小瘢痕。然而，伏龙芝的心脏承受不了增加一倍的氯仿的剂量，他的情况急剧恶化。10 月 29 日晚 5 点，即在手术后，斯大林和米高扬来医院，但是没有让他们进病房。斯大林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好朋友！今晚 5 点我们（我和米高扬）来到罗扎诺夫同志这里。我们想进去，他不让进去——这个瘟神。我们不得不屈服于压力。别难过，

① И.К.加姆堡：《事情就是如此》莫斯科 1965 年版。

好朋友。敬礼。我们还要来，我们还要来……柯巴①。”②

115 斯大林和米高扬再也见不到伏龙芝了。手术过后只三十个小时，伏龙芝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真理报》于 1925 年 11 月 1 日发表了政府通告：“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瓦西里也维奇·伏龙芝于 10 月 31 日清晨在手术后因心脏麻痹逝世。”

同日，报纸上发表了病理解剖报告，报告中说：“病理解剖学诊断……已愈合的十二指肠圆形溃疡处有明显的瘢痕收缩……在胃通向十二指肠上部的幽门处有新旧不等的表浅溃疡。急性化脓性腹膜炎。心肌、肾、肝均有实质性变性……”③

同一天的报纸也发表了内容含糊不清的伏龙芝病情《结论》。《结论》说：“病理解剖表明，伏龙芝的病一方面是十二指肠圆形溃疡修复后又引起瘢痕的扩大……另一方面，由于 1916 年动盲肠手术时留下腹膜炎症。1925年 10 月 29 日进行十二指肠溃疡手术

116 引起原有慢性炎症急性发作，这又导致心力迅速衰竭和死亡。经过解剖发现，大动脉和小动脉发育不全和甲状腺肿大。据估计，这些情况乃是引起机体对麻醉药反映不良的原因，同时也是机体对感染抵抗力较差的原因。”

1925 年 11 月 3 日《真理报》发表了几篇纪念伏龙芝的文章。(例如，米·柯尔佐夫写道：“我们怎么能埋怨可怜的心脏没有经得起六十克氯仿呢？这颗心脏曾经受了两年的死囚牢的日月，经受

---

① 柯巴，即斯大林在党内用过的名字。——译者

② 见C.西罗廷斯基的文章。

③ 显然，伏龙芝在手术前没有患“急性化脓性腹膜炎”，因为根据伏龙芝本人和他的朋友的说法，他那时感到身体很健康，完全能坚持工作。这个急性腹膜炎无疑是致伏龙芝死命的主要原因；而此病是由于手术期间感染所致。一昼夜之内，手术后的腹膜炎发展迅速，在 1925 年的时候还没有有效的医治办法。至于心肌、肾和肝的器质性病变是伏龙芝用氯仿过量的结果。任何医疗手册里都可读到，氯仿是剧毒物，它能引起心律失调、心肌营养不良、脂肪肝、肝硬变和肝萎缩。它会导致新陈代谢，特别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失调。

了套在他脖子上的刽子手的绞索。")同时,《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官方文章:《伏龙芝同志的病历》。文章中谈到手术时说:"为了满足同志们对伏龙芝同志病情的关心,编辑部认为发表下面的文件是适时的。"

紧接着发表了对米·瓦·伏龙芝的两次会诊和手术结论。在这个结论中写道:"1925年10月29日,在波特金医院为伏龙芝同志进行了手术,手术是由弗·尼·罗扎诺夫教授进行的,参加手术的人有格列柯夫教授、马尔丁诺夫教授和奥奇金医生…… 在全麻下,手术共进行三十五分钟。打开腹腔后……发现……幽门粘连扩大和十二指肠上部有小瘢痕,这些瘢痕可能是溃疡愈合处……患者对麻醉药耐受力很强,很难入睡,患者在麻醉下共一小时五分钟。"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引用一个文件,即和格列柯夫教授的谈话内容,谈话是11月3日在《消息报》上发表的,谈话中充满了各种矛盾的和模棱两可的提法。

格列柯夫说:"最后一次会诊是在10月23日。这次会诊的细节全部告诉了伏龙芝同志,并建议他进行手术。虽然把手术可能产生的不良结果都告诉了伏龙芝同志,但他自己还是选择了手术治疗,因为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从事领导工作。伏龙芝同志只要求手术快些进行。手术后心脏的功能不全引起不安……手术后任何人都没有被允许去看望病人,但是当伏龙芝知道斯大林同志捎来了一个条子时,他让别人读了一下并高兴地微笑了……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手术,而且是由水平很高的外科医生进行的,所以如果不考虑手术进行中及开刀后才了解到的具体情况,这种不良结果简直是无法解释的。显然,不幸的结果是由于患者身体的一些特点造成的。"接着他又讲了革命和战争已经使伏龙芝的身体变得很衰弱了。格列柯夫在结束他的谈话时说:"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不进行手术是否可以?在手术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变化都说明:如果对伏龙芝同志不进行手术,那么他的病是不能治好的,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死亡的威胁,甚至于是突然死亡的威胁。"

117

伏龙芝在比较简单手术后突然逝世和进行手术的医生的极端混乱的解释，在广大党员中引起了怀疑。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市的共产党员（伏龙芝的早期革命活动是在这个城市里开始的）要求建立一个调查伏龙芝逝世原因的专门委员会。1925 年 11 月中旬，在尼·伊·波德沃依斯基主持下召集了一次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管理委员会的会议。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被邀请到协会作报告，从报告及谢马什柯的回答中可以清楚地知道，无论主治医生还是罗扎诺夫教授都没有催促过进行手术，参加会诊的许多人不是医治这类疾病的专家。进行这次手术的手续不是经过卫生人民委员部办的，是经过中央治疗委员会办理的，而对领导该委员会的一些人，谢马什柯的评价是很不好的。我们还搞清楚了一点，在会诊前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召见过罗扎诺夫。此外，由于麻 118 药过量，伏龙芝的生命在手术台上就曾受到威胁。当时不得不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伏龙芝逝世后，罗扎诺夫教授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使他不能坚持工作了。人民委员会议主席李可夫专门拜访了他，安慰他并告诉他说，任何人都没有把伏龙芝死亡的责任推到罗扎诺夫身上。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管理委员会在讨论了这一问题后，通过了一项谴责对老布尔什维克态度恶劣的决议，并决定将这项决议通知党的代表大会。

1925 年 12 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没有讨论过伏龙芝逝世的问题。但是，《新世界》杂志 1926 年第 5 期发表了作家波·皮利尼亚克的文章《永远明亮的月亮的故事》。该故事的序言中写道："这个故事的情节使人们想到，写本故事的原因和材料同伏龙芝逝世有关。我本人可以说并不认识伏龙芝，仅仅和他见过两次面……我之所以认为有必要把这点告诉读者，是希望读者不要在这个故事里寻找真实情况和实际存在的人物。"然而，实际上故事是在描写伏龙芝之死，而且皮利尼亚克对伏龙芝的手术经过和去世前后的实际情况是非常了解的。无怪乎，这期杂志全部立即被没收。幸而偶然保留下来几份，今天已成为非常宝贵的珍本了。

斯大林于11月3日在伏龙芝的追悼会上说："老的同志这样容易这样简单地走进坟墓，也许这正是需要的。"① 显然，党并不需要这些人死去，但这是当时斯大林很需要的，因为代替伏龙芝被任命为陆海军人民委员的是克·叶·伏罗希洛夫，他对党和革命虽有一定的贡献，但无论如何不具备伏龙芝那样的聪明才力，而且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斯大林影响的人。

1926年7月，"革命骑士"菲·埃·捷尔任斯基猝然去世了。他在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一直是担任惩办机关领导工作的，是个无人能代替的领导人。二十年代中期捷尔任斯基还担任过苏联最高国民经济会议主席。

敌人是仇恨捷尔任斯基的，但是在党内他不仅受到尊敬，而且受到人们的爱戴。一些情况表明，1925年在党的十四大前，部分中央委员在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家里召集了一次半秘密的会，讨论了必须罢免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此时，会上菲·埃·捷尔任斯基被提为担任总书记职务的合适的人选。谢·奥尔忠尼启泽当时反对替换斯大林，他认为这等于党向托洛茨基让步。党内斗争的激化使捷尔任斯基很难过，而正是这些情况加速了他的死亡。

菲·埃·捷尔任斯基的逝世，在短期内使党内各派暂时团结起来。根据米·彼·雅库波维奇的说法，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布哈林和李可夫一起把捷尔任斯基的遗体抬到红场。这是党在他的宠儿和英雄的遗体旁边最后一次团结的象征。因为正是在1926年夏天，联共(布)党内斗争的烈火又以新的规模和新的形式燃烧起来了。

捷尔任斯基的著名战友维·鲁·明仁斯基被任命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明仁斯基有许多长处，但是他在这个极重要的岗位上代替不了捷尔任斯基，同时他又经常生病，很少管国家政

---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07页。——译者

治保卫总局的事务。因此，在他任职期间，该局的副主席越来越起更大的作用，而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亨·亚哥达，他是受到斯大林庇护的人。

四、1926—1927年的“联合”反对派

1925年托洛茨基没有参加那次开始是秘密的，后来是公开的中央的多数成员和“新”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作为政治局委员的托洛茨基故作姿态地置身于政治局内经常发生的激烈的辩论之外。他来参加党的最高机关的会议时，甚至有时带来法国小说，在辩论进行时置若罔闻，继续看他的小说。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本来想用激烈措辞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但朋友们劝阻了他，他们已估计到有可能即将出现和这些人进行“联盟”的局面。不过，待到选举时，代表中的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又投票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纲领。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党的十四大遭到失败后，决定改变自己原来的政治方针。因失败而气得要命的季诺维也夫建议和托洛茨基进行接触并制订共同的行动纲领。1926年4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进行了私人会晤。关于两个反对派联合的建议一开始遭到了托洛茨基及季诺维也夫两派领导层中许多人的反对。但是，这个联合很快实现了，我们党内出现了所谓的“联合”反对派。每派在共同反对派中虽然保持了各自的一定独立性，但“联合”反对派的实际领导权却落到托洛茨基手里了。在两派联合过程中大家互相之间都已经既往不咎了。

1923—1924年期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托洛茨基的纲领骂得不亦乐乎。正是季诺维也夫极力反对托洛茨基提出过的警告：党的机构内出现了官僚主义的蜕变，而且认为这是一种谣言。正是季诺维也夫宣称，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加米涅夫当时支持季诺维也夫。正是加米涅夫

在他的讲话中要求党“在反对托洛茨基小资产阶级影响时准备好战壕。”

待到1925年，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反对派和宗派时，他们仍然不仅反对托洛茨基，还埋怨中央的多数在对待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上的调和主义态度。季诺维也夫的拥护者们在列宁格勒于党的十四大前夕，还称中央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季诺维也夫在意识形态阵地上组织他的反对派时，广泛引用他对中央的谴责，说什么中央怂恿了托洛茨基主义。 121

然而，这些反对派头子们1926年的讲话却完全变了调子。例如，季诺维也夫说：“有那么一段悲惨时期，我们两派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本应团结起来，以反对正在蜕化变质的斯大林以及他的朋友们，但因为对党内的一些情况的本质不清楚，我们在两年期间互相打架。对这点我们非常惋惜并希望今后再也不会重复。”①

同时托洛茨基也说：“在《十月的教训》一书中，我无疑是把党的政策的一些机会主义动向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名字联在一起。中央内部思想斗争的经验证明，这是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的原因在于我不可能了解七人内部的思想斗争并及时断定机会主义的动向是来自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以斯大林为首的那一派。”②

出乎人们预料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联盟，使党内情况更加尖锐化，党内斗争更激化了。但是，这个新的反对派无论如何也不会使反对派的力量加强。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大家还记忆犹新，而在这期间两派头头的对骂是毫不留情的。因此，这些头头们的急转弯和他们相互间的“谅解”导致许多普通成员离开了他们。

---

① 格·季诺维也夫1926年6月26日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讲话第62页。

② 列·托洛茨基：《关于个人问题的声明。1926年7月14—23日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第4版第103页。

"联合"反对派就其整体来说并不比每派分开时强些。无怪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一些拥护者认为"联合"反对派的建立是122 他们领导人的重大政治错误。

当然，如果把1923—1924年托洛茨基的纲领和1925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纲领加以比较的话，那么可以找到他们之间的不少共同之处，而这就成为"联合"反对派的新纲领的基础。

在本书中我们不可能比较详细地阐述和分析这个纲领。

但是可以指出，"联合"反对派的一些批评无疑还是公正的。以后的事态表明，反对派提出来要谴责"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也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理论(建立这一理论的不仅是斯大林，还有季诺维也夫)使共产党人在普通的社会主义者眼里威信扫地，它只是有利于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这一理论还阻挠一切民主力量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进行统一行动。党内越来越禁锢的制度也不能不引起人们持不同意见，这样的制度当时训练出来的人们只会百依百顺。

对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及其拥护者的经济政策的某些观点的批评，其中也有许多正确意见。1925—1926年的工业生产虽然以极快的速度在增长（每年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三十五），但是正是这时我们国民经济开始出现一些危险的失调现象。

工业生产虽然在增长，但是国内的商品匮乏在扩大，而这首先和城乡购买力的迅速提高有关系。商品缺乏使整个经济形势显得更加紧张，这又同时妨碍农民出售余粮。出口明显缩减，主要是因为粮食供应不上。理所当然，进口计划也不得不缩小，减少的主要不是工业设备，而是原料(如棉花)。而这又给纺织工业造成了困123 难，使工厂部分停产和许多产品的质量降低。金融困难更加突出，对外贸易逆差逐月扩大。苏联欠外国公司的债务增加了几亿卢布。不得不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以种种借口拖延接受从外国公司预购的商品，为了维持苏联的信用开始出口黄金，建立一个专门的金融委员会等等。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当然制订了并实行了一定的措施，以便使暂时的经济困难不转变为全面的经济危机。但远不是所有的措施都经过周密的考虑，并且不是都很有成效的。看来，反对派所激烈攻击的联共（布）中央在1926—1927年实行的降低工农业产品的批发和零售价格的政策也是属于这类的措施。购买力的迅速提高和与此同时商品缺乏不可避免地应该导致批发和零售价格的一定上涨，而不是下降。显而易见，对这种情况应该加以调节，能不使价格上涨太快，又能提高职工的工资等。实现实际的物价下降只能通过发展和扩大稀缺商品的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商品成本。但是，联共(布)中央的决议使党和经济机构立即实行了降低全部商品的批发和零售价格。①

1927年夏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征购粮食出现危机的警告是正确的。可是，1927年秋天，斯大林和他的许多当时的同事对反对派的这些“预见”百般挖苦。 124

然而，事过一、两个月，国内的粮食征购危机成了严酷的现实。同时又发现国家在粮食市场上没有任何认真的调度能力。1927年12月和1928年初，斯大林在解释那党内大部分同志感到完全突如其来的粮食征购危机时所叙述的原因和加米涅夫早已讲过的原因是一模一样的。

“联合”反对派的个别批评意见和建议虽然是正确的，但总的政治纲领却是错误的。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仍然是从象俄国这样单独的国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论点出发的。反对派的多数领袖认为，我们的国家在没有西方无产阶级国家援助的情况下不可能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例如：1927年6月2日，十五位著名领导人的声明说：“我们国家的技术水平的落后和由此而来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低下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巨大障碍。由于这一点，在没有先进国家的援助，没有世界社会

① 《1927年联共（布）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国家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29—30页。

革命的情况下，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此时工人从劳动力变为生产的主人，而生产的商品性质被消灭）的过渡是不可能的。"①

还应该指出，"联合"反对派的所有领导人毫无例外地在激烈的辩论过程中把缺点无限夸大，而这导致党的干部的抗议。还只是成为倾向的东西被他们说成是已经展开的过程；还没有成熟的东西被他们说成是完全成熟的。当蜕化还只涉及小部分党的领导时，反对派却说，党的大部分成员或中央的大多数人已经蜕化变质。因此，反对派提出来的必需进行"党制度的革命"，在多数党的干部看来是"左"的东西。反对派否定已取得的成绩，认为党的方针是在不断后退。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自然出现富农和耐普曼资产阶级的增加，反对派从这一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和布哈林正在复辟资本主义。反对派的一个纲领断言："国内存在两个互相排斥的基本立场：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另一个是企图转向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资产阶级立场…… 在这个立场中间——离后一立场近一些——还有一个斯大林的路线（应读作：中央路线），它是由向左的短小曲线及向右的很大的曲线组成的。"② 反对派还断言，私人资本的积累速度比公有成份快，这也是错误的。总的来说，反对派的那些一目了然，蛊惑人心的企图，使他们把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因素及由此产生的危险加以夸大。反对派向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反建议》说："……实际上，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增长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它正以极快的速度在发展，苏维埃国家及其工业对农村富裕农民及富农的原料和出口资源的依赖性日益增长。促使城市资本主义活跃的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足够唤醒全国资产阶级分子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之所在，而且他们还意识到在自己背后有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巨大靠山。"③

反对派断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们对工业和财政的控

---

① 《反对派的新孟什维主义》真理出版社莫斯科1927年版第4页。

② 《布尔什维克》杂志1927年版第19—20期第13页。

③ A.库兹涅佐夫：《党和反对派》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版第31页。

制超过了布尔什维克党，这种武断也是完全错误的。季诺维也夫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声称："在莫斯科的乌斯特利亚洛夫（还有米留可夫）的'全权代表'……他们实际上指导着财政部、农业部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他们的作用大于我和加里宁。表面上他们这些'转换路标派'①教授们仅仅是'进行研究'，而实际上他们在支配着一切。"②

126

托洛茨基宣称："当权派越来越上升为苏维埃耐普曼社会的上层。产生着两个阶层、两种生活方式、两种习惯、两种关系，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产生着日常生活上两重政权的因素，再发展下去可能要变为政治上的两重政权，而这已经在直接威胁着无产阶级专政……应该使无产阶级懂得，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错误的政策下苏维埃可能成为把政权从无产阶级基础上转移到资产阶级手里的机构，以后资产阶级就会彻底抛弃掉苏维埃这个'踏板'，把政权变为拿破仑式的。"③显然，1926 年并没有发生什么党和国家的上层同耐普曼资产阶级上层的结合。党内某些环节的变质是具有更复杂和隐蔽的另一种性质的事物。

反对派的一些领袖们在正确批评商品缺乏的条件下降低批发和零售价格政策时，却相反地提出把工业品价格提高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这也是不对的。稍微提高一点较稀缺商品的批发和零售价格在当时虽然是必需的和受欢迎的（按高价转卖这些商品使一些私商得了大利），但是多数日用品的普遍提价是不能允许的。

为了纪念十月革命 10 周年曾经提出改工作日为七小时的意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从他们的口气和论据来看，都是很说明问题的。我国劳动人民想用较

---

① "转换路标派"指某些流亡国外的白俄分子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希望恢复资本主义而有意回国者。——译者

② 《文件汇编：党和反对派》第 1 卷，莫斯科 1927 年版第 57 页。

③ 同上，第 58 页。

127 重大的社会性措施来纪念十月革命10周年，这是很自然的。当然，可以肯定地说，在 1926—1927 年那样的经济困难的条件下过渡到七小时工作日还为时过早，这一措施在经济方面的条件是不成熟的。大家知道，1940年战前通过一项决议，又重新把工作日改为八小时了，而且还实行了每周七日制（过去每周六日制）。战后十五年中，我国一直保留了八小时工作制。不管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

身也已经是很清楚的事情。斯大林把斗争的重点放在党的统一问题上面，他指责"联合"反对派组织宗派并扩大宗派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谁战胜谁"的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党员群众特别盼望实现统一，所以斯大林利用这点把党的绝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了。

实际上，1926 年秋天，即"联合"反对派成立几个月之后，它的失败已是显而易见了。当反对派的领袖觉察到这点，他们马上开始了退却。1926年10月17日，《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托洛茨基和叶甫多基莫夫的声明，声明中说：

"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及大会闭幕后，我们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和大会的多数代表及中央委员会发生了意见分歧。我们在正式文件中、在大会的讲话中、在中央全会及政治局会议上都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们至今还坚持自己的这些观点。我们绝对反对'宗派和派别自由'的理论和实践，我们承认这和列宁主义原理及党的决议是背道而驰的。党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我们在实践中有义务遵守。

120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公开向党承认，在维护自己观点的斗争中，我们和同我们持相同政见的人们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后曾几次采取了违反党纪的、越出党所规定的党内思想斗争的范围，走上了闹宗派的道路。我们认识到，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并声明我们坚决抛弃为维护自己观点而采取的宗派手段，因为这些做法危害党的统一，我们号召一切支持我们观点的同志也这样做。我们号召，立即解散所有为维护反对派观点而成立起来的宗派组织……

我们每个人保证，我们将在党章、中央和大会决议规定的形式范围内维护自己的观点，我们相信，所有这些观点的正确部分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将会被党所接受……"

然而，"联合"反对派的领导人没有能够实现这一宣言。1926

年10月18日，托洛茨基的一个在外国的拥护者伊斯特曼在《纽约时报》上公布了列宁的《致代表大会的信》。这又引起了政治局内部的激烈争吵。斯大林强制托洛茨基发表专门的声明，宣布列宁的这一真的文件是伪造的。

斯大林在取得对反对派的胜利后，立即着手从组织上加以巩固。

10月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了决议：鉴于进行宗派活动，免除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免除加米涅夫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季诺维也夫是早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会议上就从政治局除名了。

1927年春天，国内的经济形势又遇到了新的严重困难。国外的政治形势也尖锐化了，甚至产生新的入侵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斗争又以更尖锐的形式开始了。1927年党内斗争的特点是：斗争双方的讲话和声明都带有异常敌对的情绪。就在这几个月里，托洛茨基想起了克列孟梭。① 大家知道，这个人在1915—1916年当德国人已经在离巴黎只有八十公里的地方驻扎了军队的时候，对当时的法国政府展开了疯狂斗争，而且达到了更换政府的目的。托洛茨基建议在苏联重复类似做法。他宣称："为了工人国家的胜利，如果有人说，把那些愚昧无知和没有良心的弄虚作假的人们(他这样称党的领导人)的政治路线当作垃圾扫除掉，那么这人决不是'失败主义者'。相反，在这种具体条件下他是革命防御的真正代表，因为思想垃圾不会带来胜利。"

这时反对派的领导人立即违犯了自己1926年10月16日关于抛弃宗派斗争方式的声明。实际上，反对派在全国各地把自己的

① 克列孟梭(1841—192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外号"老虎"。历任内务部长(1906)、总理(1906—1909、1917—1920)等职。任期内残酷镇压国内工农革命运动，积极组织协约国的反苏武装干涉。1919—1920年任巴黎和会主席，参加起草《凡尔赛和约》。1920年竞选总统失败后，退出政界。——译者

拥护者广泛地组成为秘密小组网，在这些小组里面他们采用了党在革命前的秘密工作经验。宗派组织有自己的领导、自己的纪律，甚至还交纳自己的组织费。他们还定期召开半公开和秘密会议。宗派组织的材料是在国家印刷所秘密排印的，后来还建立了自己的专门的秘密印刷所。所以反对派并没有在"党章规定的形式范围内"维护自己的观点（也就是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向党提出意见书和声明等途径）。

与此同时，斯大林在非常警惕地观察反对派领导人的行动的时候，也很少考虑如何遵守列宁关于党内斗争生活的规定。他百般阻挠正常的辩论和科学讨论的进行，而这又促使一些党员走上宗派活动的道路。为了监视反对派的活动，斯大林使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甚至不惜使用阴谋手段。（关于"白俄军官"的著名事件，后来明仁斯基也承认了的。这个白俄军官在反对派的一个地下印刷所工作，但他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连列宁的"遗嘱"在这几个月里也被宣布为反革命秘密文件，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搜查记录中，这个文件也经常被列为犯罪的"物证"。于是国内掀起了第一次逮捕反对派积极分子的浪潮。 131

斯大林显然不愿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讲和。他意识到自己处在优势地位，是控制局势的主人，所以他企图完全击溃自己的政治对手并在党内建立他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独裁统治。斯大林号召反对派忠诚老实并指责他们搞两面派活动的同时，却掩盖了自己的真实企图，他自己正在搞两面派，正在欺骗党。斯大林首先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托洛茨基，然后又支持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种做法不是把党团结起来，而是在分裂党。他的全部消灭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的路线，使党内的分歧越来越激化。

我们看到，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雅罗斯拉夫斯基及他们的其他拥护者为一方（同样，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他们的同伙为另一方）把过去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过的粗野和生

硬态度带进二十年代的党内斗争中来。思想斗争越来越被组织斗争所代替，这个或那个同志的小缺点或动摇被夸大到不可想象的程度，许多党员的话被歪曲或给予完全错误的解释。反对派对中央多数的微小的不同意见立即就被宣布为“敌对行动”，“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而反对派本身被宣布为“积极的反革命力量”。对反对派这样的“批评”根本不是为了说服反对派成员及他们的领导人，把他们争取过来在党内共同工作。在这里首要的目的，是恐吓反对派组织的成员和同情他们的“调和派”，对他们施加压力。在外国共产党眼里，享有崇高威望的那些不久前还是党的领袖之间的这种斗争的性质，削弱了共产国际，这种做法遭到西方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的抗议。例如，不久前，大家都知道的安·葛兰西写的信，这是他设法从法西斯监狱里送给联共（布）中央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对苏联党内斗争采取的非常粗暴的方式表示遗憾。

132

在这种情况下，1927 年 8 月中央的多数和“联合”反对派之间所达成的“和解”不可能是长期的，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实际上，就在 1927 年秋天，党内斗争又掀起了新的高潮，甚至有时采取上街游行示威的新形式。

1927 年秋天，阿·阿·越飞自杀了，他的葬礼成了反对派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示威游行。越飞是党内有名的活动家和外交家，他有过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二十年代中期他成为托洛茨基的亲密拥护者。这一安葬仪式的目击者米·彼·雅库波维奇在回忆录中写道：“安放越飞遗体的棺木正等待送到新处女墓地，这时棺木还放在大踣比扬卡大街的外交部大楼内。大楼周围人山人海，街道水泄不通，交通也全部停止了。托洛茨基由卡·拉狄克和穆拉罗夫陪同费很大力气才从人群里挤出来…… 送葬的人群里面还有斯大林的妻子——娜·阿利卢耶娃。送葬的人很多，主要是支持托洛茨基的共青团员和青年学生，还有不少过去在托洛茨基领导下工作过的复员军人和军政干部。人们

唱起了国内战争期间的歌曲，其中提到托洛茨基，歌词中有这样的重唱部分：'红军领袖托洛茨基万岁！'契切林代表中央致悼词。此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讲了话。托洛茨基的讲话主要是号召恢复党的统一……没有什么公开的攻击，根本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可是季诺维也夫的讲话带有愤怒和挑衅的情绪，他讲了斯大林出卖党利益的罪行，说他践踏党员的权利，赝造党的意志。追悼大会结束后，人们走出了新处女墓地的教堂。不远的地方，列队站着一支部队，可能是准备执行鸣枪入葬仪式的。从托洛茨基周围的人群中走出来一个青年人，他走到部队旁边喊道：'红军同志们！为红军领袖托洛茨基同志喊"乌拉"吧！'出现了紧张的时刻！当时部队中人们连动都没有动一下。笼罩着死一般的沉静。托洛茨基站在几步远的地方，他也沉默着，眼睛看着地。接着，他转过身去，上了汽车。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跟在他后边。这个场面的目击者应该明白：托洛茨基是彻底地毫无希望地失败了。红军的新一代战士根本不知道他，他们根本没有参加过内战，他们是在新的精神下培养起来的人。托洛茨基的名字对他们来说非常陌生，或者说根本不知道。组织送葬示威这件事也令人深思——其中没有工人，说明'联合'反对派并没有无产阶级的基础。"①

133

关于反对派继续从事半公开或秘密的宗派活动问题在1927年10月底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成为中心议题。全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从联共（布）中央开除出去，但保留了他们的党籍。

1927年11月2日，《真理报》第251号（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辩论增刊第2号）发表了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十月全会上的讲话，这实际上是托洛茨基在联共（布）中央的最后一次政治讲话。这次讲话相当清楚地说明了"联合"反对派和托

① 米·彼·雅库波维奇《列·达·托洛茨基》一文（手稿）。

洛茨基本人的立场和纲领是不现实的。他们的纲领以极端尖锐的方式批评党领导的缺点，但是纲领带着蛊惑人心的因素。这样的纲领不仅不会在领导层里取得成功，就连在当权党的多数普通党员中也不会取得成功。但是，这个纲领在非党反对派人们当中，在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当中，在少部分党内青年和知识分子当中却得到了同情。

托洛茨基在讲到中央主要领导成员时说，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办公机关”，是“斯大林”式的“当权”宗派，他们“恐吓”党，把“最优秀的列宁分子”赶了出去。托洛茨基声称：“列宁说过：粗暴和不忠诚老实已经不是什么个人的品质问题，这已经是当权的宗派，他的政策，他的制度的品质。这里讲的不是外部的表现形式。今天的路线的基本特点是：它相信暴力的万能——甚至在对待自己党的时候，也是如此。”①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的对手的粗暴行为也给人留下沉痛的印象；如：彼得罗夫斯基、斯克雷普尼克、温什里希特、伏罗希洛夫、戈洛舍金、邱巴尔、洛莫夫、加里宁等人就是这样。托洛茨基的讲话不断地被这些人的愤怒的喊叫声打断。我们在速记稿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叫骂的话：“胡说八道”、“自吹自擂”、“叛徒”、“打倒坏蛋”、“打倒内奸”、“看，这样的流氓”、“说谎”、“造谣”、“卑鄙下贱”、“革命的掘墓人”等等。讲到最后时，速记员写道：“吹口哨声，越来越大的杂乱的噪声，什么也听不见，主席摇铃，口哨声，‘从讲台上滚下去’的喊叫声，主席宣布休会。托洛茨基同志一直在讲，但一句话也听不清。出席全会的同志们站起来，散会了。”

季诺维也夫也在“滚蛋！”、“赶出去！”的叫喊声中下了全会的讲台，没有讲完话。

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开除出中央，反对派想以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名义进行单独游行作为回答。这次游行

---

① 《真理报》1927年11月2日辩论增刊第2号。

时，反对派领袖站在沃兹德维任卡大街和莫霍夫大街角上的大楼的阳台上，并且发表了演说。然而，这不是反对派力量的检阅，而是反对派软弱无力的检阅。在这一“平行”游行队伍中几乎没有工人，占优势的是青年大学生和一些机关的职员。和莫斯科官方的劳动人民的节日游行相比，反对派的游行给人留下了非常可怜而软弱苍白的印象。在列宁格勒组织“反对派”示威的企图更加不成功，对自己在这个城市中的影响估计过高的季诺维也夫差点没有被节日游行的队伍打伤。在这些日子里，在一些企业里，甚至在党的会议上，有人散发匿名传单，上面称中央领导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号召工人阶级以“反奸细和恐怖”手段给予反击。 135

Ю.戈洛索夫在他的《党史札记》中问道：“反对派领袖们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曾几何时，他们一再认为，在党内必需有铁的纪律，可是同时他们却又支持肆无忌惮的宗派活动！他们坚信，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执行的是亡国方针，所以他们——革命的组织者、列宁的继承者——的责任是无论如何要阻止这种热月政变性质[①]的蜕变。而对他们自己的纲领，反对派却称之为真正列宁式的，他们送交大会的提纲称之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致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在十月全会上季诺维也夫甚至把列宁本人也算进反对派的行列，这不是偶然的，他接着说：‘在当前形势下，要为列宁路线而斗争，为纠正党的阶级路线而斗争，反对斯大林违犯党纪，除了现在我所采取的手段，没有其它的手段。（噪杂声）因此，为纠正现今领导的错误，总得有人把自己摆在受打击的地位。（噪杂声）。’加米涅夫同样声称：‘我们声明，不管发狂和冲昏头脑的斯大林分裂主义者把我们逼到怎样的地步，我们仍然要维护列宁党的事业、1917年列宁的十月革命、列宁的共产国际，反对机会主义者、反对分裂主义者、反对革命的掘墓人。’许多老革命者，国内战争的英雄（例如，因为参与秘密印刷所 136

① 指1794年7月27日法国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译者

事件，那位反高尔察克斗争的领导人之一——牡拉奇科夫斯基被逮捕了）参加了反对派，他们真诚地认为，他们是为革命的理想而斗争。反对派批评的主要火力集中在斯大林身上，他们指责他犯了一切不可饶恕的罪行。当然，如果通过后来斯大林所犯的罪行来看，这一批评就显得是公正的。但如果历史地对待斯大林，那么当时对他的这些指责是过分的，在许多方面则是不公正的。这些指责所产生的副作用是党的机构更紧密地团结在斯大林的周围。党的其他领导人不可能不起来维护他们的总书记，因为他们这样做是维护他们和斯大林一起制订和执行的党的政策。"①

戈洛索夫引用了1927年许多维护斯大林的讲话。这些讲话表明，无论是反对派领导人，还是中央多数的代表对斯大林的了解是多么少。例如，米·托姆斯基于1927年11月15日在列宁格勒州党的代表会议上说："反对派的一切努力是为了贬低斯大林，为了证明他们的没有原则的政策的正确性，为了把一切归咎于一个人，为了在党内造成混乱，为了把事情说成是这样的：即党内只有一个居心叵测的人，他是阴险凶恶的人，他的周围是一群在他领导下的小牛犊和小绵羊。显然，对斯大林这样的评价是不对的，他不是什么恶魔。几十年来，我们同他相处，对他很了解。我们还认为，上述的描绘一点也不象我们，就是说不象中央；我不知道事情会是这样，你们也许更容易评价，但是我们自己一点也不能承认我们是处于某一个人的领导之下。我讲这些是代表全体政治局委员，我想，如果我说，我们过去和将来都是为党工作，而不是为领袖工作，那么我是正确代表了多数中央委员的意见，至少代表了在座的全体中央委员的意见。（热烈鼓掌）斯大林是抛弃了个人因素的人，他根本不愿把自己装成领袖。你们向他单独地表示敬意时，把他和中央分开时，这都使他很不舒服，因为他根本不同意这样做……反对派归根到底要把斯大林说成是个阴险凶恶的人，而政

137

① 未发表的手稿第266—267页。

治局和中央委员是由他控制的、惧怕他的一部纺车而已。只有白痴才相信这些。"与此同时，阿·李可夫于 1927 年 11 月 20 日在乌克兰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反对派陷害斯大林同志的真正动机在于，第一，他们认为，他是最彻底的列宁主义者之一，因此是他们最危险的敌人，第二，反对派出于战略考虑，力图易于跟党斗争，所以他们要用对多数当中的一个人，党的一个领袖进行斗争的办法，以掩盖自己的企图。"①

正象预料到的那样，反对派上街公开游行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然而，他们却给了斯大林以盼望已久的机会，即彻底处理反对派领袖们的机会。1927 年 11 月底，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了党籍。反对派的其他成员也被开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不仅同意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而且还通过了决议，把 75 名"联合"反对派的积极分子开除了党籍，其中有：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拉狄克、拉柯夫斯基、萨法罗夫、斯米尔加、拉舍维奇等。大会还建议，全部党的组织要纯洁自己的队伍，清除"一切显然是不可救药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分子"。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从组织上完成了击溃反对派的工作。在大会上对反对派的态度充满了不耐烦的气氛，个别反对派成员的发言被粗暴地打断，到处是一片毫不留情的污辱性的喊叫。大会速记稿有关某些反对派成员和他们的反对论者的讲话，现在令人读不下去，读时心里非常难过。大会的许多代表要求对反对派成员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并要求限制在党内进行辩论。甚至"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发出号召，把党内制度更加严格。例如，车里雅宾斯克代表K.雷金说："对这些党的骗子一点也不能给予信任，不要相信他们的话，不要相信他们的保证。这些保证他们已重复过三次了。愚弄党愚弄够了，党和无产阶级不能再忍耐下去。我

① 未发表的手稿第 268—269 页。

们想工作，我们没有时间去吵闹，我们没有功夫建立什么各种审查委员会去瞎折腾。我们要工作，妨碍我们工作的人要赶出党，党内没有他们的地位。"中央委员菲·戈洛舍金声明："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更强硬的路线，要把党从反对派的胡说中解放出来。同志们，我们应该给党、给苏维埃、给无产阶级以正常工作的可能性。我们党内要建立严厉的制度，在苏维埃工作中要建立严厉的制度……如果我们继续纵容反对派，那么我们，同志们，就要出丑。"① 人民委员会议主席李可夫甚至说："按反对派想造成的那种形势，关在监狱中的人会很少。我想，不能保证近期内监狱的人数不有所增加。"(插话："对！")莫斯科代表Г.米哈伊洛夫斯基在歪曲历史事实的同时，他还建议从根子上消灭党内辩论。②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加米涅夫、巴卡也夫、叶甫多基莫夫及其他一些"季诺维也夫分子"发表声明服从大会的决议。不久，季诺维也夫也投降了。1928 年中期，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他们的大部分拥护者被恢复了党籍，并在苏维埃及经济机构中安排了一些职务。至于一些最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主张继续同"斯大林宗派"作斗争。中央领导决定扩大对托洛茨基分子镇压的范围。凡是没有交出谴责自己原来持有的观点的书面声明的托洛茨基分子几乎都或被逮捕，或被关在政治隔离室，或被流放到边远地区。最先决定流放的是托洛茨基，规定的日期是 1 月 16 日。流放的事托洛茨基分子都知道了。许多人到火车站为托洛茨基送行。显然，他还享有相当的威信。根据M.A.索恩采娃的说法，有些送行的人卧轨了。于是托洛茨基出发的日子又改为 1 月 18 日。但是，1 月 17 日国家保安局和中央机构的工作人员来到托洛茨基住宅，要求他立即离开。托洛茨基拒绝了，可是人们硬把他抬出去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

②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稿》，莫斯科 1928 年版；参见有关代表的发言。众所周知，雷金、戈洛舍金和李可夫于 1937—1938 年期间奉斯大林的命令被枪决。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后来命运不详。

并推进那停在门口等待他的车子里。接着，他被送上了开往哈萨克斯坦的列车。在这里，我们很遗憾地应该指出，布哈林积极参加了遣送托洛茨基的一切行动。

托洛茨基和他的家庭在阿拉木图住了一年，在这期间他继续与他同观点的人保持公开的或半公开的联系。此时，托洛茨基对国内发生的事情作的评价，内容是自相矛盾的，观点是不清楚的。在党内出现“右倾”时，托洛茨基开始时主张和“中央”（斯大林）联合反对“右倾”，因为他认为，“右倾”比斯大林一派更加危险得多。然而，托洛茨基很快又想建立同布哈林一派的秘密联系反对斯大林。有一段时间，托洛茨基担心在农民的压力下会建立以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为首的反对斯大林的军事专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建议自己的追随者支持斯大林反对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1929年决定驱逐托洛茨基出境。2月，托洛茨基全家被秘密地送到敖德萨，从这里乘“伊里奇”轮船离开了苏联。起初，没有一个国家给予这位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签发入境签证，在国外，一般都认为，他比斯大林“左”得多。根据和土耳其的协议（当时苏联和土耳其的关系较好），托洛茨基先被安排住在太子群岛。后来他迁居挪威，接着又抵达墨西哥。 140

托洛茨基之被驱逐出苏联，对一切反对派残酷镇压的政策，刚刚开始的反“右倾”斗争，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更加坚决的反对富农的政策以及开始推行的全面集体化——这一切导致“左”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走向迅速瓦解。反对派的多数领导人和普通成员在书面或公开的讲话中都放弃了自己对托洛茨基的效忠，不但承认了自己实际存在的错误，而且往往还承认了臆想出来的错误。这些人之中的大多数已完全丧失了和斯大林斗争的意志。然而，正是在二十年代末斯大林越来越走上了冒险主义和专横的道路。最先投降的是格·列·皮达可夫和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接着投降的是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卡·伯·拉狄克。

拉狄克在他写的一封信中说道：“斯大林分子比反对派想象的

更值得钦佩。”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坚决和“不断革命”论划清了界限，而过去他们是无条件地支持这种理论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他《致反对派的同志们》声明中写道，反对派之所以失败似乎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取得胜利的结果。“斯大林实行了左的方针，但和反对派所建议的不一样，因为反对派设想在无产阶级民主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和集体化。但是，斯大林还是实行了反对派的要求……我们现在的责任，是向党靠拢，而且要回到党内来，这是为了制止在农民国家，因为推行社会主义积累和反对农业资本主义的政策而可能引起的不满情绪……我们应该对那些我们提出警告的事情负起责任，我们将服从那些我们曾不能同意的方法。如果恢复我们的党籍，那么我们每人应得到党证，这等于我们背起了十字架，但对于那些愿意有效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人，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把十字架背起来。”拉狄克在被押回莫斯科途中，在一个车站上在被流放的托洛茨基面前发表了讲话，号召他们投降。他谈到国内严重的形势：粮食不足，工人的不满和农民闹事的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反对派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党团结起来。“是我们自己把自己闹到流放地和监狱中去的……我和托洛茨基的关系已经破裂了，现在我们是政治上敌对的人。”

1928年底，伊·帖·斯米尔加、列·彼·谢烈布里亚科夫和伊·尼·斯米尔诺夫也脱离了托洛茨基。

进行反抗时间最长的是克·格·拉柯夫斯基。他写道：“那些和正在实现反对派经济纲领的和斯大林进行和解的人，希望斯大林能实现他们的政治纲领。他们的做法和过去满足于局部让步的改良派是一样的。一个强迫人家承认非真正存在的错误的党的领导是不值得尊敬的，这样的领导和那种要求临死的无神论者改悔的天主教堂是一样的。”① 但是到1929年底，克·拉柯夫斯基和他

① 引自伊·捷依奇尔的书《被缴了械的预言家》。

的小组成员索斯诺夫斯基、穆拉罗夫、穆迪瓦尼等写了一封《致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这封信虽然包含了对斯大林政策的一定程度的批评，也提出了希望托洛茨基能返回苏联的要求，但同时号召和解。这个小组大部分成员不久就完全投降了，并且回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的许多托洛茨基分子代替了布哈林反对派成员的位置和职务。

众所周知，1929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一方，布哈林—李可夫小组为另一方，有几次秘密接触。但是，这些对话没有导致 142 任何协议。1932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因为“和留京小组有关系”(下面还要提到这个小组)又一次被开除党籍。后来，他们甚至被逮捕并关进了“政治隔离室”。但是，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一次“悔改”之后，他们不仅被释放了，而且又恢复了党籍。他们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还发了言，表示要痛改前非。

实际上，所有“联合”反对派的领导人当中，只有托洛茨基还继续在国外和斯大林进行斗争。在国外他从事广泛的写作活动，一本接一本地出了新书，写了文章。托洛茨基甚至在国外办了反对派的刊物，而且把这刊物送回苏联。然而，在苏联国内他的追随者已经不多了，所以他出版的《反对派简讯》对国内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影响。从主观上说，托洛茨基在这一时期内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而不是斯大林所急忙宣布的那样，是一个法西斯式的反革命分子。但是，因为托洛茨基所特有的教条主义，因为他消息不灵通以及托洛茨基具有的仇恨心理，所以他对待国内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三十年代遇到的非常复杂的过程所持有的观点是极端片面的，而且怀有成见。结果他没有写成一个可供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托洛茨基的三十年代的作品中正确的批评意见总是和有意或无意的对事实歪曲交织在一起。而在他写的关于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以及恢复时期最初几年的那些文章和书中，有着最突出的伪造的事实和自我标榜的东西。这样，托洛茨基企图用自己所编造的神话去代替斯大林的神话，那么这神话同样远离

了历史事实。

总而言之，托洛茨基在国外的活动充满了各种令人发指的矛盾。例如，托洛茨基还在三十年代初曾完全正确地要求德国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结成反对法西斯进攻的统一战线。为此，他143 们不仅批评了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还写了一封给联共(布)政治局的秘密信，此信没有得到回答。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却对1930—1931年莫斯科政治案件("工业党"案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盟局"案件)信以为真了。他一会儿提出"打倒斯大林"的口号，一会儿自己又反对这个口号。1933年，托洛茨基号召在苏联的反对派建立一个新党，但同年他又写道，在苏联单一共产党的存在，即便是在斯大林胡作非为时期，也是革命复兴的必要条件。1939年，托洛茨基在反对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和约的同时，又为苏联反芬兰战争辩解。

从苏联被驱逐之后不久，托洛茨基开始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谈判建立新国际。在谈判未获成功之后，他又提出口号，要求托洛茨基分子加入社会民主党。后来，又提出建立独立的托洛茨基国际组织问题。托洛茨基的小组虽然在许多国家都建立起来，但几乎在一切地方，托洛茨基分子没有能够把相当多的人吸收到自己这方面来。所以托洛茨基所建立的，至今还有活动的第四国际，始终是影响极小的宗派组织。实际上，托洛茨基作为政治家已经声嘶力竭了，所以他虽然展开了热火朝天的活动，但是不管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还是"右"及"左"派共产党人都没有去跟随他。还应该指出，托洛茨基在他自己建立的组织中实行了专横制度，他要求所有成员无条件地服从"领袖"的意志。正如在三十年代批评了斯大林，又批评了托洛茨基的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安杰伊·斯塔瓦尔所写的那样，……"如果斯大林对共产国际来说是一个绝对正确的教皇，那么托洛茨基分子树立了一个反教皇的偶像，一个教皇宝座的觊觎者，这就是他们的托洛茨基。"

五、斯大林同"右"倾的斗争

144

同"左"派反对派的激烈冲突还没有安静下来，党的反"右"倾斗争又开始了。

大家知道，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因素的决议。布哈林在党的大会召开的前两个月，在莫斯科第八次工会代表大会上说："执行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和第十四次党的代表大会的路线使我们与中农的联盟更加巩固了，巩固了无产阶级在农村的阵地。现在，我们和中农在一起，依靠贫农，依靠苏联和党的加强了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有可能和有必要加紧向资本主义因素的进攻，特别是向富农的进攻。"① 但是，和"左"派的要求相反，这次进攻主要是用经济方法，即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进行的，而不是用恢复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方法。所以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坚决反对"左"派所建议的强制剥夺农村富裕阶层粮食的政策。同时，大会反对在主观和客观因素都还未成熟的时候，急急忙忙地去普遍实行集体化。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宣布的农业政策并没有在实际中实施。还在大会以前，1927年晚秋，我们国家在粮食征购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初冬时这些困难也没有得到克服。为了克服国家在粮食平衡方面的赤字，联共（布）中央在1928年1月发出了反对富农的非常措施的指示，其中包括强制没收余粮制度。实行这些措施必然会触及到中农的富裕阶层。实质上，在这里涉及到的是改变党在农村的原来政策的突然急转弯。此时，新的政策不仅不是来自刚闭幕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而且有时甚至完全违背了这些决议。中央的新指示比起党领导的原政策来，是更符合刚刚被击溃了的"联合"反对派的建议。所以毫不奇怪，这种急骤

145

① 《真理报》1927年10月13日。

的转弯会引起相当部分农村干部的惊慌失措。

我们已经说过，布哈林和李可夫积极参与了制订1924—1927年联共（布）中央的农业政策。所以完全可以预料，这个政策的急转弯在政治局内部也会引起分歧。事情正是如此。我们不知道，1928年上半年政治局的口头辩论是怎样进行的。但在1928年6月布哈林给斯大林寄了一封专门的信。在这封信中，布哈林指出，中央的许多措施已成长为一条新的路线，而它是不符合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路线的精神。这一切“使党从思想上迷失了方向。”布哈林说，党的领导“没有一个共同的意见和没有完整的计划。”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外贸人民委员部部长莫·伊·弗鲁姆金在1928年6月15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里，更加激烈地批评了中央的农业和经济政策。斯大林很快就给了相当激烈的回答。①

1926年6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展开了不同意见的激烈辩论。为了克服这些分歧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它的成员是：鲍曼、布哈林、米高扬、李可夫、斯大林。这个委员会准备了一个粮食征购政策的折衷的提纲，1928年7月2日政治局通过了这一提纲。

政治局内部的分歧很快传到党内外。正在这时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为了批驳说我党内部存在着分歧，1928年7月30日全体政治局委员签署了下面一个文件：“……签署本文件的联共（布）政治局全体委员向大会的主席宣布：他们最坚决地抗议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员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的那些流传着的任何谣言。”②

146

1928年10月，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讲话时说，联共（布）出现了右倾危险。但是，斯大林在这里并没有指出任何人的名字。他强调指出，右倾危险的传播者主要是在党的乡村组织之中。至于中央，那么在这里有“一些显然是和右倾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01页。

② 《苏共决议案汇编》第2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538—553页。

危险相妥协的极少数人。”按斯大林的话，政治局中既没有“右派”和“左派”，也没有和他们妥协的人。

一个月后，1928 年 11 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在讲话中他阐述了联共(布)“右倾”的存在。而在“右倾”的传播者中，斯大林点出了弗鲁姆金的名字，在“妥协分子”的名单中点了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尼·亚·乌格拉诺夫的名子。斯大林说，至于政治局，“那么在政治局中我们全体委员都是一致的。”①

但是，到了 1928—1929 年冬天，农村形势更加紧张了。粮食征购工作很不顺利。重新采取非常措施的问题又被提出来了。政治局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出现了。三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起来反对继续在农村中执行非常措施的政策。于是发生了冲突，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提出辞职。诚然，李可夫很快又撤回了辞职书，但是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不顾政治局多数人的要求，拒绝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

政治局里发生的分歧已无法向党隐瞒了。1929 年 4 月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会，斯大林在这个会上讲了话，讲话中他用大部分篇幅广泛地并具有相当倾向性地批评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集团”。斯大林以其特有的粗暴方式称托姆斯基为“工联主义政客”。斯大林还说：“布哈林附和了米留可夫之流，充当了人民敌人的尾巴”，他“不久以前还是托洛茨基的门徒”，他是“一个狂妄自大，忘乎所以的人”。布哈林的理论是荒谬的“胡说八道”，布哈林派的宣言是“无耻的粗暴的造谣”等等。布哈林、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想用和斯大林不久前还存在的个人友谊来缓和他的这些讲话和评价，但斯大林坚决排斥说，所有这些“牢骚和喊叫连一个破钱都不值得。”②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全会决定坚决谴责布哈林

---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11 卷第 249 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3 页。

的观点并认为这些观点和党的路线不能相容。全会决定把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从他们在共产国际、《真理报》社和全苏职工会总会的岗位上撤下来。但是，全会决定让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留在政治局内。李可夫仍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主席。

* * *

我们觉得应该简短介绍一下这一新的，现在已被称为"右倾"的反对派。

尼·伊·布哈林是1906年十八岁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布哈林从他开始作党的工作时起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极大兴趣，他写了不少理论问题的文章和小册子。这些著作并不是没有错误观点的，列宁为此批评过布哈林，而布哈林并没有坚持自己的错误。1917年从国外流亡归来后，布哈林成为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承认这位二十九岁的革命者有着重大贡献。众所周知，1918年布哈林领导了"左派共产党人"派，他们是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列宁称他们为"口头革命者"。然而，象伏龙芝、古比雪夫、捷尔任斯基、波克罗夫斯基、克列斯廷斯基、洛莫夫、布勃诺夫、乌里茨基等几十名党的著名活动家都在不同时期属于"左派共产党人"。但是，所有这些人后来都承认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到1918年底，"左派共产党人"的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大家知道，在工会问题辩论中布哈林是所谓"缓冲提纲"的作者，在1920年他没有能够弄清楚年轻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前途问题。列宁在遗嘱中深刻和细致地指出布哈林理论错误的基本原因在于他的观点里面带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因为他从来没有学过，而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但与此同时列宁在这里指出，布哈林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是完全"应当被认为是全党宠爱的人"。

列宁逝世后，布哈林一直是党最高领导的成员之一，他积极参加了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联合"反对派的斗争。实质上，和

这些反对派进行的理论上的斗争，基本上是由布哈林承担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1925—1927 年所执行的经济政策和共产国际方面的政策，在制订这些政策的工作中，布哈林如果说不是起了决定作用，也是作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政策，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样，不是没有错误的。其原因就是列宁所讲的布哈林思想中的烦琐哲学的东西，而布哈林至死也没有克服掉这些错误。我们在分析布哈林关于经济、政治、国际共运、哲学、文学研究（布哈林的学识渊博是无可怀疑的）方面的著作，几乎在他的所有理论构思中都可以发现这种烦琐哲学的因素。对布哈林来说，最重要的是能首先找到某种体系、公式，而这些体系和公式远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把这个或那个现象的最实质的方面包括进去。可是斯大林，正如费·拉斯科尔尼科夫后来公正地指出那样，却比布哈林更加烦琐哲学化和公式化。 149

布哈林虽有错误，但是在列宁逝世后的时期，他作为党的理论家和实际领导人，对党还是有不少贡献的。在这期间，斯大林简直是奉承布哈林，他对布哈林关怀备至，同时也广泛地利用了布哈林多方面的才能。党的干部基本队伍对布哈林仍然非常爱戴，他在共青团中也享有很高的威信。

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谢·奥尔忠尼启泽、米·加里宁、维·莫洛托夫、安·日丹诺夫、斯大林和其他一些发言人都称布哈林为“我党最优秀的理论家”，“我党最优秀的干部”，敢于“说出自己的思想，甚至当他的思想和全党背道而驰时，他也是这样做”，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我们大家全体爱戴和支持”的人。①

阿·伊·李可夫也是我党重要干部之一。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成为布尔什维克后，积极参加了同沙皇的地下斗争。几次被流放，他在纳雷姆边疆区流放时，发生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后，他

①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稿》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223页、第471—472页。

作为内务人民委员进入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那时，由于坚持要建立一个联合的"社会主义"政府，李可夫以及加米涅夫、诺根和其他布尔什维克一起退出了人民委员会议。但不久李可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又重新进入政府。在国内战争艰难年代里，李可夫领导了苏联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后来又成为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和全苏劳动国防会议副主席。从1924年起，李可夫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这是一个在他之前只有列宁曾占有过的岗位。这对一个四十三岁的布尔什维克来说是很光荣的任命，当时党给予了他充分的信任。在那些年代里，放在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肩上的工作量有多么的大，就不必说了。

150 米·巴·托姆斯基也是从工人阶级中来到革命队伍的，他的职业是石印工人。他是在俄国第一次大革命准备和进行时期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后，他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积极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他被逮捕过，而且被判处五年苦役。二月革命把他从苦役中解放了出来。1917年期间，他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十月革命不久，托姆斯基成为我国工会领导人，一直到二十年代末，他都是全俄职工会总会的领导人。

* * *

联共(布)中央四月会议并没有结束同"右倾"反对派的斗争，因为布哈林小组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们在这里并不想对这一斗争的所有细节进行分析。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布哈林和李可夫的经济政策包含着一系列的错误(在1925—1927年间的这项政策的基本论点，不仅斯大林而且中央的大多数都同意)，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粮食征购危机和1927—1928年的非常措施。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至少是值得商榷的。他并没有明确认识到，富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反对者。1924—1927年间，布哈林和李可夫认为，对城乡资本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因素可以作出比当时党可能和应该作出的更大得多的让步。

现在某些历史学家企图说明：如果把布哈林派的政策拿来和斯大林不正确政策相比较，那么布哈林的政策是我们党农村中唯一正确的政策。我们并不想站在这样的立场看问题。如果说斯大林在农村中的政策实际上离开列宁合作化计划很远的话，那么布哈林派的建议也不是没有漏洞的。也许，他们这些建议在1929—1933年的条件下，比斯大林的冒险主义的极端政策（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谈到此问题）对工农联盟来说，包含着的危险会更小一些。 151

布哈林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对农村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轨道问题，对城乡新经济政策的前途给予明确而清楚的解答。显然，布哈林对集体农庄估计不足，不知为什么他一直把建立集体农庄仅仅是和贫穷经济联系在一起。布哈林说："我们的一些同志认为，通向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是集体农庄。我认为，这个断言是错误的。光明大道是通过普通的合作社，销售、征购、信贷，总而言之，通过农业合作社。"[①] 布哈林有时把合作化的商业形式同生产形式对立起来。他在设想农业合作化的前景时写道："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网将由一些不是富农式的，而是'劳动'式的合作社细胞组成，这些细胞将会长到我们的全部国家机关的体系上面去，因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富农的合作社巢穴，也会同样经过银行等等长到这个体系上面去；但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类，例如，象租让企业那样。这些富农合作社以后将变成什么样呢？比方说，我们假定有一个富农领导的信用合作社，富农在合作社里享有全部的威望。这个富农合作社如果要能够发展壮大，同样必需象其它一切合作社那样，与国家的经济机构联合在一起；比如说，它会把自己的闲置的现金存入我们的银行，以便取得一定数量的利息，即便这类的合作社成立自己的银行组织，它们也非得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强大的信用机构联结在一起不可，因为后者掌握着国家的主要信贷资金。富农和他们的 152

① 引自Ф·M·瓦加诺夫一书《联共（布）中的右倾及其被击溃》，莫斯科1970年版，第83页。

组织反正无路可走，因为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以及这一专政的经济组织的已经相当强大的力量早已规定了总的发展范围。如果富农（不管他是否愿意）必须把款子存入我们的银行，如果他（不管他是否愿意）通过各种关系同我们的经济机构联结起来，那么他不可避免地被迫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①

在布哈林这些话中可看出一些烦琐哲学的东西，但更正确地说，布哈林没有把他对于富农和他们的合作社在我国未来的命运这些观点全部说出来。因为，1925—1926 年（正是在这些年里布哈林所讲的观点受到了指责），对苏联资本主义和富农经济的命运的问题讲得太清楚，特别是用公开发表文章和出版小册子的方式去讲，从政治上考虑是不恰当的，而且是为时过早的。

关于在监督下发展富农经济以有益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问题，米·伊·加里宁不止一次地讲过，而且讲得比布哈林清楚得多。例如，他在《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一文中说：“许多人认为富农的发展，是令人不愉快的农村分化的令人不愉快的结果。实际上，分化本身之所以受到抨击，就是因为其结果是富农的发展。但是，如果农村没有和农村生产率实际发展平行的分化的发展，难道还能谈得上前者吗？如果幻想，农村的福利和文明的花园中的树木能根据花匠的意志来成长，那么这样的幻想当然是令人向往。但是，在苏联现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状态下这种想法是不折不扣的空想……农村分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苏维埃政权利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帮助农村的经济发展，也就是间接地促进分化。153 谁如果想阻止分化，谁就必然要停止农村的发展。分化过程中产生的有利因素多于不利因素。因为和分化同时，整个农村的福利在提高，包括贫农在内。如果说真话，而不是附和着贫农讲话，那么农村生产力的提高是改善贫苦农民地位的唯一方法。显然，和分化现象进行强制性的斗争从经济上来说是有害的，从政治上来

① 尼·布哈林：《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工农联盟》，莫斯科版第 49 页。

说也毫无目的，因为这会阻止生产力的发展…… 靠牺牲弱小经济的利益扩大强大劳动经济的比重，我认为是应该欢迎的，因为这是农民经济和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许多人担心，强大劳动经济阶层的主动性的发展，恐怕随着这些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富农意识会在这一阶层的农民中相应扩大，通过他们更进一步在全体农民中扩大。我认为，这种想法是建立在对农民的旧的农村关系的推理上面的。在苏维埃制度下强大的劳动农民阶层从生产方面是和国家资本相联系的，从思想意识方面和苏维埃舆论和苏维埃国家制度相联系，并从中吸取自己思想意识。这一切说明，我们国家的思想影响大大超过了资产阶级。农村的分化会产生少量真正小资产者阶层：小业主、手工业者、小商人、家庭小手工业者、还会产生有限数量的高水平的商业经济。但是，如果我们允许商业中存在私人资本，签订租让协定，并满怀信心地将这些因素用在发展集体经济的利益方面，那么农村小资产阶级通过国家信贷、国家贸易和合作社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毫无疑问的。综上所述，我确信，农村分化不仅不妨碍集体经济的发展，相反，它使农业生产力及商品比重提高，因此为向集体化过渡创造条件，而且它能为建立苏维埃农村扫清道路，不管这种说法听起来显得多么离奇。"①

加里宁的这些话在1925—1927年期间是非常正确的，但后来由于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而后者和"强大的劳动经济"的利益相违背，在农村中就需要另一种斗争的策略和实践了。

不管怎样评价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1925—1927年的观点和看法，他们在1928—1929年对斯大林新政策的批评意见就其多数而言是正确的。例如，1927年"右倾"的领导人支持了采取反对富农的非常措施，但后来他们公正地开始反对滥用这些措施，反对把这些措施变成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右倾"分子正确地反对

① 《消息报》1925年3月22日。

了强制地、急急忙忙地实行集体化政策，指出用过快的速度实现集体化和普遍建立国营农场缺乏物质技术前提，同时相当一部分贫苦农民和中农从主观上说，还没有为过渡到集体耕作形式作好思想准备。“右倾”分子并不是无根据地预言：斯大林所采取的高速度强制实现集体化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方针会导致饥荒和破坏粮食出口计划。果然，在 1932—1933 年间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也不是毫无根据地反对工业建设方面的“好大狂”，反对过多的和经济上没有基础的许多基建投资。他们关于改变粮食征购价格的建议也是非常合理的。1927 年粮食征购价格是很低的，比粮食成本还低，这自然不会从经济上刺激农民增加向国家交售的粮食数量。

布哈林和他的政治朋友设想，1928 年在国外购买一些轻工业 155 商品、甚至粮食，以代替再一次采取非常措施。也许，在 1928 年的条件下这一措施的危害会更小一点。“右倾”分子完全正确地指出了忽视国内轻工业发展的动向。在保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轻工业应当得到更快的发展，因为它提供城乡销售的大部分商品。如果在苏联不遵守重轻工业之间的一定比例，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商品匮缺，即购买力大大超过商品的供应。而这终归会使劳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破坏了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经济刺激的意义，因而会使行政措施占据主要地位。

现在分析布哈林的文章和书籍时，我们可以看到，他当然不认为，富农和耐普曼带着他们的资本主义本质可能长入社会主义。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作为党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还没有发挥完它的作用，在二十年代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不仅发展社会主义因素，就是部分地发展资本主义因素也有其广阔的天地。完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的发展将来会导致耐普曼资产阶级和富农剥削经济的消灭。但是，布哈林认为（1928 年以前斯大林也在这方面支持过他），城乡资本主义因素主要是要靠经济压力被排挤掉，而不是靠行政压力，主要是竞赛的结果，而在这种竞赛中一切王牌都握在城乡社会主义企业的手中。这样的观点当然还可以讨论，但是

在那个时期它完全可以有存在的权利，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近二十五年来，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有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城市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农村社会主义大经济和小的私人经济的结合形式，包括一些小的资本主义企业（如：东德、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这里指的是，在存在着共产党的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的情况下，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应该采取各种不同的态度。

在对待农民的政策方面，正是斯大林突然完全采纳了、甚至深化了托洛茨基关于“原始的社会主义积累”的观点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关于对农村富裕阶层实行非常税收的建议。不仅如此，斯大林为实现这一政策使用了不久前还是“左派”反对派的许多著名人物。

所以毫不奇怪，在这样的事态急转弯的情况下，许多共产党员正确地反对了斯大林错误的和唯意志论的观点，他们必然被毫无根据地认为是“右倾”。

斯大林从完全错误的极“左”的和宗派教条主义的立场出发，

大林本应该采取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结成反对法西斯和垄断资本及反对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但是他却号召共产党人集中火力去对付那时和工人阶级群众建立密切联系的社会民主党左派。所以毫不奇怪，在这种错误的政策下无论是我党还是许多西方共产党内的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毫无根据地都被划成“右倾”或“妥协派”。

还应该指出，斯大林和许多其他中央委员在反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小组时，把许多和布哈林小组没有任何组织和思想联系的派别和小组也放在“右倾”总的概念下面。把许多完全不相干的政治小组，只是因为它们比斯大林路线右，不管其右的程度如何，都混为一谈，这就使斯大林反布哈林小组的斗争更加容易进行了，因为这可以把那许多与布哈林及其追随者的实际立场和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指责也加诸他们身上。

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在反对布哈林及其小组的时候，在辩论中还经常粗暴地利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没有共同之处的庸俗的社会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当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学、艺术和科学上都广为运用。这种方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文化领域中的这一或那一现象，或者某种政治上的观点、提法立即直接和某一阶级立场和政治情绪连在一起。

由于布哈林的纲领在1928—1929年比斯大林的建议更为城乡资本主义分子所欢迎，所以斯大林马上把“资本主义因素的保护者”，“富农思想的代言人”，“联共（布）富农影响的执行者”等帽子扣在布哈林头上。有些人还加上一个“客观上”的字样，但多数情况下是不加的。对政治辩论的这种态度显然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从这种庸俗的社会学观点出发，也可以把1921年的列宁称为富农利益和城市资产阶级残余的保护者，因为列宁所建议的新经济政策比起继续执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更受到这些人的欢迎。

遗憾的是，直至今日，苏联许多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到斯大林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活动的那些大部分不公正的

指责。例如，谢·巴·特拉佩兹尼科夫在他的一本书中说："布哈林—李可夫小组是在1928年起来反对党的，这正是国家遇到粮食危机之时，由于囤积粮食的富农的破坏行为，他们不愿按规定价格向国家出售粮食，形成了粮食极端困难的局面。正当农村形势极端尖锐化的时候，布哈林—李可夫小组公开转到富农和国内一切反动力量方面去了。"①

1970年出版的《苏共党史》第四卷也保留了对二十年代党内各派的类似评价。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从来没有在党内组织一个任何固定的宗派，这点连斯大林也不得不承认。斯大林在一次讲话中说："右倾分子有没有派别组织呢？我认为没有。能不能说他们不服从我们党的决议呢？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根据拿这一点来责备他们。能不能断言右倾分子一定会组织自己的派别呢？我对这一点是怀疑的……"②

因此，"右倾分子"并没有从组织上违背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的著名决议，而斯大林不久后开始镇压"右倾分子"，从组织上展开了反对他们的斗争并宣布：如果有人维护"右倾分子"的观点，他们就不能留在党内，——这一切做法实际上是反对联共(布)党章所保障的：每一个党员都有权自由讨论党的政策的各种问题。 159

* * *

直至三十年代，还不时可以听到谈论"右倾"危险，但实际上斯大林用于反对"右的"反对派，即"右倾"的斗争本身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年左右。还在1929年11月的中央全会上，李可夫宣读了布哈林、托姆斯基和自己的书面声明。其中说，在存在着统一的总路线条件下，他们"三人"曾主张并正在主张采用另一方法去执行这条路线，这一方法和中央大多数人所主张的不同。"三人"接着

① 谢·巴·特拉佩兹尼科夫：《列宁主义和土地-农民问题》第2卷莫斯科1967年版第187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46页。

承认，“就是在党现在采用的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方法的轨道上”“总的来说，也取得了很大的良好战果”。因此，这一声明的作者在承认“党的无可非议的成就”的同时宣称，“我们认为，我们和中央多数之间的分歧已不复存在了。”①

但是，这个声明并没有被认为是“满意的”，斯大林对布哈林要求的是彻底的不讲任何条件的投降。因此，中央十一月全会把布哈林开除出政治局，并给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以警告处分。

十一月全会结束后，布哈林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立即向政治局呈交了承认自己错误的新的声明。1930 年除夕，斯大林正和他的朋友在家中欢庆新年的时候，突然有人敲他家的门。门外站着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他们手里拿着酒。他们此行是为了向斯大林表示和解，言归于好的。虽然表面上和解了，但是“右倾”领袖们没有一个被恢复他们在党内的原来地位。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后，托姆斯基被开除出政治局，1930 年中央十二月全会上李可夫也被免除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1931 年李可夫也被撤除了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主席的职务，把他任命为邮电人民委员部部长。布哈林被任命为《消息报》总编辑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科研计划局局长。托姆斯基被任命为国家图书联合出版局局长。但是，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被选为中央委员，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又被降为候补中央委员。

以后原“右倾”领导人再也没有反对过斯大林，尽管此后又发生了许多事情。1930 年初，实行了强制合作化，接着农民大批地离开集体农庄；此后是消灭富农之为阶级，而且触动了相当部分中农；整个的居民点、村庄和乡村从南方被迁移到北方去定居；出现了1932—1933年几百万农民的大饥馑；但无论布哈林、李可夫还是托姆斯基都没有对这些反常现象表示过任何抗议。

---

① 《布尔什维克》杂志 1930 年第 2 期第 8 页。

在“超级工业化”方面斯大林同样犯了不少错误。例如，还在1930年，从来不参加人民委员会议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突然来参加当时还是由李可夫主持的会议，并建议实行纯粹是冒险主义的计划——把冶金、汽车制造等其它重要工业部门的最佳指标的控制数字提高一倍。李可夫和其他成员一起都举手同意了这个从未能实现的建议。

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初期所强加给工业的巨额基建投资，我国经济是无法承担的。许多项目不久就被迫长期停工（有些部门达百分之五十），使巨额资金被冻结。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布哈林、李可夫还是托姆斯基也都没有表示过任何抗议。

原“右倾”分子虽然如此顺从，但是我们的出版物在整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在继续骂他们。甚至在1935年，《布尔什维克》杂志仍然称布哈林为“右倾投降主义者”，说他提出了主张摒弃苏联工业化和集体农庄及国营农场的建议，又说他同时却给予私人资本主义因素以无限的贸易自由。他们还说，这个纲领的富农本质被斯大林领导的党揭穿了等等。这一切很符合斯大林的精神，他继续变本加厉地打击已经被击溃了的对立面。 161

* * *

这样一来，党内一切反对派都被击溃了，但今天很难说，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各反对派失败和投降后，党内的状况不是好转了，而是更恶化了。正是在这“空前统一”的时期，斯大林走上了大规模犯罪的道路，给了党至今还未能完全恢复的重大打击。

所以说，斯大林对反对派的胜利决不是列宁主义的胜利。当然，反对派本身也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我们党的悲剧不仅因为二十年代中央的领导人是斯大林这样的人，而且也因为反对派的领导人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这样的政治活动家，他们并不善于把我党转到真正的列宁的道路上去，而且也不善于向斯大林这样的领导人提出可供他选择的方案。

163

第 三 章

斯大林在集体化和工业化时期的错误

弗·伊·列宁不止一次指出，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困难和在这项事业中犯各种错误及缺点的不可避免性。这不仅是因为我国落后和缺乏足够数量的有文化的人才，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因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没有探明，必须沿着一条新的没有人走过的道路前进。

这一切必须在分析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成绩和缺点时考虑到，特别是在分析这些根本性革命改造的最初时期。从事如此复杂的事业，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能使我们不去最认真地研究所有的错误和歪曲。还应该指出，到二十年代末期在党内已相当巩固了自己地位的斯大林的领导不是有助于避免和改正所犯的错误。恰恰相反。热衷于命令主义、暴力和用压服代替说服，在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时的简单化和机械化；经验主义和不善于预见这样或那样行为的后果；粗暴和过分虚荣——斯大林的这一切品质使我

164 国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这些已经极为复杂的问题就更难以解决。

简单地回顾一下斯大林在集体化和工业化时期的歪曲和错误，对理解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及以后年代的对内政策是有极大意义的。

一、农业集体化的前提

众所周知，二十年代后半期苏联工农业发展中发生了明显的

比例失调。国家工业化的开始、城市的扩大和居民的增加，外贸的活跃——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商品粮。然而，国家粮食征购增长得很缓慢，远远落后于许多其它农产品。到1927年农业总产值比起革命前总产值最高的1913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但是这一增长主要是靠畜牧产品和技术作物。至于粮食作物，不论是耕作面积还是总产值都未达到战前水平。尤其急剧下降的是商品粮的生产。如果说1909—1913年间商品粮平均年产量是十亿一千八百万普特，① 那么1923—1927年间这个数字降到五亿一千四百万普特。②

造成商品粮的这种状况有很多原因。例如，过低的粮食征购价格，使粮食经济的发展得不到刺激。如果说1926—1927年畜牧产品征购价格指数为百分之一百七十八(1913年为百分之百)，技术作物为百分之一百四十六，那么粮食征购价格指数仅达到百分之八十九。③

但是，问题显然不仅仅在于征购价格。粮食这一基本农作物征购价格的提高又要求大大扩大农民所需要的各种商品的供应量。农民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用这些钱可以购买的消费品和机器。当时国家的工业生产还不能消灭城乡的商品匮缺。

我国十月革命后形成的新的农业结构也阻碍了商品粮生产的迅速发展。第一，地主经济——不久前还是商品粮的主要供给者——被消灭了。富农经济在革命和内战期间也大大削弱了，而他们以前也向市场提供大量的商品粮。十月革命后，中农和贫农的小农经济成了粮食、包括商品粮的主要生产者。到二十年代末这些农户生产了四十亿普特的粮食，而革命前是二十五亿普特。但是，这些农户提供的商品粮不多——总共只有四亿四千万普特（商品率仅为百分之十一）。这主要地也造成我国粮食战线的巨大困难。

① 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译者

② 《1958年苏联国民经济》，中央统计管理局年鉴，莫斯科1959年版第311页。

③ 谢·巴·特拉佩兹尼科夫：《列宁主义和土地农民问题》第2卷第55页。

当然，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最初时期就可以预料到这一切困难。不管怎样，列宁在1921—1922年清楚地看到出现这类困难的必然性，因此他极其明确地提出了克服这些困难的途径。

列宁首先指出，必须全力帮助贫农和中农的个体经济，使它能发挥潜在的力量。在农村实行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正是在于支持贫农和中农经济的生产活动。

166 但是，也不能忽视富农经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期，富农生产有些加强和发展，这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什么威胁。因此，"新"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由于农村富农的一些发展而发出的那些不安的，甚至有时是惊慌失措的叫嚣大部分是没有根据的。列宁多次指出，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内我国农村的灾难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还不够。内战结束并转到新经济政策后，正是列宁马上提出把提高农业生产作为主要任务。与此同时，他还建议在这一阶段内全力支持勤奋农民的生产主动性。由于国内缺粮，而农民的生产合作社刚刚迈出了第一步，所以有必要不仅鼓励贫农和中农，而且也鼓励富农生产商品粮。这时列宁认为，甚至可以因增产而奖励富农。当然，列宁所说的奖励富农不是给他们生产资料，而是奖励生活必需品和家庭日常用具。①

理所当然，这个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是完全正确的政策不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的长期的基本政策。在苏维埃国家中，如果把农业发展的长期计划建立在发展富农生产的基础上，那是不对的。不能一方面在城市里提倡发展社会主义工业，而另一方面在农村里却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富农显然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同这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的妥协无论从哪一167 方面来说都只是暂时的。因此毫不奇怪，列宁认为，共产党在农村比较长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包括生产合作社。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合作社等于发展社会主

① 《苏联历史》杂志1965年第2期第18页。

义。列宁写道："农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是，必须稳固地保证它能进一步过渡，而进一步过渡就必然使利益最小的、最落后的、细小的、孤立的农民经济逐渐联合起来，组织成公共的大规模的农业经济。"①

但是列宁懂得，在原沙皇俄国实现农业集体化是异常艰巨的，所以他的合作化计划并不是打算通过发动一次短期运动来解决，而是通过长期的紧张的劳动，以提高农村的识字水平和文化水平，生产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逐渐训练农民从事共同的农业生产。列宁于1923年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写道："但是，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个个参加合作社，还须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但这终究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如果不经过这一历史时代，不作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理解能力，没有充分教会居民利用书报，没有这一切物质基础，没有相当的保障，如防荒、防饥等的保障，——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②

当然，认为列宁的合作化计划是一个指出了合作化的确切时间和形式的详细计划，那是不对的。列宁仅仅指出了农业改造的总的方向和原则。其它一切问题要靠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来解决。至于所谓"列宁的党的总路线"也是如此。而斯大林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则是完全歪曲的。其实列宁任何时候都没有想到要为将来描绘什么完全定形的路线，稍稍偏离这条路线便是"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倾向。赫伯特·威尔斯同列宁会见后正确指出："列宁以极坦率的态度（他这种坦率有时使他的拥护者都大为震惊）不久前逐散了人们最后的幻想，即认为俄国革命是一种什么和进入不断摸索的时代不一样的东西。那些肩负消灭资本主义艰巨任务的人应该明白，今后他们不得不试探一个又一个方法。"③ 168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75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425页。重点是作者另加的。

③ 赫·威尔斯：《黑暗中的俄国》伦敦1921年版第133页。

* * *

列宁关于发展个体经济和合作化农民经济的指示是我党农村政策的基础。但是在前所未有的破产和疲惫的条件下，当需要党不仅表现坚定性，而且要表现最大的灵活性时，实现列宁所拟定的计划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事情。

大家知道，遭到两次战争破坏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同托洛茨基提出的关于建立“工业专政”的口号相反，它强调指出，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当前阶段正是发展农业是对我国整个经济具有首要的意义。可是就在1923年农业的发展遇到了一系列的严重障碍。

事情就在于农民经济当时还几乎没有什么积累，农村能够支配的剩余农产品是寥寥无几的。但另一方面，销售给农民的工业品的成本和价格都是很高的。所以工业虽然很薄弱，可是国内出现了销售危机，使商品过剩，而这又多次引起一些工业企业停产，职工工资发不出去以至引起罢工。为了阻止普遍的经济危机，需要立即采取一系列能够减轻农民困难的措施。这样的措施实行了。农村所需要的许多工业品的价格降下来了，另外，一系列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在农村中实行了低廉信贷制度，特别是对贫农和中农。富农经济也获得了取得信贷和机器(排在第二位的)的机会。最后，于1925年根据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的建议“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力”通过了关于扩大雇用农业工人权利和扩大租用国家和农民土地权利的法令。这一法令被农村富裕阶层广为应用，使富农和富裕中农有可能大大扩大招用雇工和租用国家和农民的土地。这一法令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利于贫农，因为它使雇工合法化(1925年以前实际上也广为实行)，使雇佣条件有可能受到监督。

在实行以上措施后，消除了销售危机和商品过剩的情况，在发展农业和工业间开始出现一定的平衡。但这一平衡保持的时间不长。就在1925—1926年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又开始出现新的严重比例失调，但这次来自另外一个方面。事情是这样的。发展农业

的各项措施当然要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可能性及工业发展的可能性和要求相符合。没有工业的一定发展，也不可能有多少是长久的和巩固的农业的发展。可惜的是，在二十年代中期发展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正确和恰当的比例没有得到应有的实现。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就整个来说继续执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正确政策，但于1925—1927年推行了一系列虽然符合于新经济政策精神的措施，但不久后的实践表明这些措施是不够适宜的。 170

例如，当时通过了降低统一农业税的决定。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说，"为了减轻农业积累过程"必须把统一农业税降到二亿八千万卢布。

实际上农业税在1925—1926经济年度从三亿一千二百九十一万四千卢布降到二亿四千四百八十二万二千卢布。诚然，富农的税收这时降的不多——只有一百万卢布。从中得到好处最多的是中农——他们的税收少了六千万卢布。① 但是很明显，在1926—1927丰收年期间税收的降低无害于中农，特别是有利于富裕中农，而且对富农也有好处，他们的农产品剩余数量很明显地增加了。

统一农业税的降低和农民购买力水平的提高是同时发生的。根据我们计划和财政机构的统计：农民的购买力水平从1923—1924年的十六亿一千八百万赤卢布②提高到1925—1926年的二十五亿九千万赤卢布。如果说1923—1924年交纳农业税的比例占农户购买力的百分之十六点八，那么到1925—1926年只占了百分之十点八。③ 如果如此迅速提高的购买力水平有与之相适应的同样迅速增长的农村所需要的工业品的生产，那么只能说这是好事。 171

就在这些年代，工业品的零售和批发价格又一次大大降下来了。而这次降价发生在越来越扩大的商品荒的情况下，而不是在商品过剩情况下，这使整个形势和过去有本质区别。第一，在商品

---

① 《苏联历史》杂志1963年第4期第199页。

② 赤卢布等于10个纸币卢布，是苏联二十年代发行的特殊货币。——译者

③ 《布尔什维克》杂志1926年第19—20期第52页。

匮缺的条件下降低零售价格时常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这会使农村消费者无从得到商品。另一方面，批发价格的降低又使工业企业利润下降。在商品荒情况下降低批发价格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批发和零售价格剪刀差的扩大，这就使私商发财致富，因为1927年期间他们手里还掌握了至少是百分之四十的零售商品的流转。①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应供给农民比资本主义价格更便宜的商品。但是1925—1927年期间实现这个指示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工业品极少。因此，批发价格虽然很低，但是私商，甚至商业合作社都维持相当高水平的零售价格。结果许多私商的利润增加了，而工业得不到所需要的积累。可是当时工业对积累的迫切需要在急剧增加，这是由于1925—1926年旧工业企业的恢复工作基本上结束了，要着手开展新的建设。

批发价格虽然降低了，但是私商通常并不把工业品的零售价格降下来，然而通过消费合作社系统农村消费者虽不完全地还是会从批发价格下降中得到好处。这又促使农村购买力提高，而国家当时还没有足够数量的工业品，以满足增长的需要。因为增加这些商品运往农村没有提供一切应有的效果，所以按总的数量商[172]品供应增加了，而总价格由于价格下降没有提高。

例如，1927年底和1926年底比较，日用品的生产（降价因素也算进去）只增加了百分之一、二，而与此同时国营工业工人的工资总额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农民收入（只算计划收购和减少税收部分）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城乡总的购买总额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②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斯大林、布哈林和李可夫没有远见的政策，农民首先是富裕农民手里积攒了大量的货币，他们没有办法用这些钱去购买所需要的工业品。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富裕阶层并不急于向国家出售粮食，这并不奇怪。1927年主要余粮

① 《苏共决议案……》第2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351页。

②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稿》第2卷莫斯科1962年版第857页。

户——富农和富裕中农——无论从紧急财政需要上还是从个人的经营利益上都没有尽快出售余粮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数量不大的农业税农民可以用在市场上出售副产品和技术作物所得到的钱去缴纳。(当时副产品和技术作物的收购价格也是很高的。)果然，1927年收购的麻、葵花子、大麻纤维、萝卜、棉花、油类、蛋类、皮革、毛皮、肉类比1926年大大增加了。但1927年底在征购粮食方面的情况则另是一个样子。

二、1927—1928年粮食征购困难和斯大林的政策

173

斯大林、布哈林和李可夫在经济方面的失误和富农在粮食征购方面的怠工，使我国在1927年底受到粮食危机的威胁。这年是丰收年，但粮食征购比前几年还困难。富农和许多富裕中农力图把余粮保存到春天，然后以高价出售。1927年1月征购的数量是四亿二千八百万普特，而1928年1月所征购的粮食刚刚达到三亿普特。城市和军队的粮食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党如何克服困难？有不少各种各样的建议。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认为，现在正是利用苏维埃国家机构的全部力量向富农展开坚决进攻的时机。其中，他们建议用暴力剥夺富农和富裕中农的至少一亿五千万普特粮食。这些建议在党内引起了多数人的强烈反对，1927年8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否决了这个建议。全会1927年8月9日决议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拒绝反对派关于用暴力剥夺余粮的荒诞的，预谋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造成更多困难的蛊惑性的建议……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认为，这些建议实际上要推翻在列宁领导下由党制订的新经济政策。"①

① 《苏共决议案……》第2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160—161页。

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些建议，而当时粮食征购危机已完全暴露出来了。斯大林在大会的报告中虽然避开了农村所发生的主要困难，但是谈了关于党对富农政策问题，他说："在农村中富农有一定程度的增长。这是我国经济平衡表上的一个负数。我们是否在采取了一切办法从经济上限制并孤立富农呢？我认为并不是一切办法都采取了。有些同志认为可以并且必须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去消灭富农，认为下道命令，盖个印，就完事了。这是不对的。这种手段是轻而易举的，但决不会是有效的。我们应该根据苏维埃法制采取经济上的办法去战胜富农。而苏维埃法制并不是一句空话。这当然不是说不能采取某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去对付富农。但是行政手段不应当代替经济措施。必须严重注意我们合作社机关的实践中在和富农进行斗争方面、特别是在农业贷款方面歪曲党的路线的情形。"①

174

斯大林的许多支持者和助手在大会发言中讲得更清楚得多。例如，莫洛托夫在关于党在农村政策的专门报告中说："关于'借债'的建议是对党的整个政策，对新经济政策的直接破坏。那些现在建议我们实行这个强制借债政策，即从占农户百分之十的富农和部分富裕中农阶层手里强制剥夺一亿五千万至二亿普特粮食，不管建议者的愿望如何良好，他们是工人和农民的敌人，是工农联盟的敌人；他们推行的是破坏苏联的路线。"根据速记稿记载，此处斯大林喊了一声："对"。②

米高扬关于粮食征购政策讲得更详细。他说："至于粮食征购方面，我们现在遇到许多困难，我们应该承认，近半年来，党和我们的机构在这方面的注意力减弱了。我们不能把一切责任推到客观条件去。我们的党如此强大，以至于在客观困难的情况下能及时的扭转局面，使我们不受很大的痛苦而摆脱不可避免的困难处境。

175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66--267页。

②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稿》第2卷莫斯科1962年版第1222页。

去年春夏我们实行了降价政策。我们的整个机构和工作人员全部动员起来了，在商品荒的条件下我们相当顺利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以后又是党内的辩论，这一辩论使我们两个月注意力不能集中。最后，应该指出：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错误和疏忽，又使形势恶化了。（插话："对"。）大批商品在城市堆积，到不了农村，因为无论什么地方对商品的需求都是非常迫切的。为了争取粮食征购的根本扭转，需要采取果断的措施。这一措施应该是：那怕是城市市场暂时（几个月内）无货供应也要把大批商品转移到农村去，使农民能拿出粮食。如果我们实现不了这个扭转，那么我们将面临着影响整个经济的异常巨大的困难。"①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米高扬公开承认，粮食征购困难与经济和决策机构的一系列错误和疏忽之处有关。他建议采取一些经济措施以最小的痛苦摆脱困境。他这些建议和想法成为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政策决议的基础。

大会代表还没有来得及回到地方，莫斯科又发出了完全相反的指示。就在联共（布）十五大闭幕刚刚几天之后，斯大林在农业政策方面突然来了一个向"左"急转弯，并开始推行那些刚刚被党作为冒险主义措施而坚决给予回击的强制剥夺富裕农民余粮的建议，而大家知道正是这次大会把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首领开除了党籍并拒绝在闭幕会上听取"非党的"加米涅夫的声明。还在 1927 年 12 月斯大林把对富农采取非常的强制措施的指示发到地方了。这一指示使几乎所有的地方干部毫无思想准备，因为他们不久在大会上听了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等人的上述发言。斯大林于 1928 年 1 月 6 日又发出一个按它的调子和要求来说都是很特别的指示。这一指示最后对那些在短期内不能实现粮食征购决定性转变的领导人，进行了威胁。

170

不必多说，1927—1928 年冬天在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时，不

---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稿》第 2 卷莫斯科 1962 年版第 1094—1095 页。（加重号是我加的。——作者）

仅没收了富农的余粮，而且对富农进行了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但是，1928 年春天向国家缴纳粮食的数量又急剧下降。斯大林说："我们从 1 月到 3 月收购了将近三亿普特粮食，当时收购的是农民的机动粮；从 4 月到 6 月我们连一亿普特也没有收购到，因为那时我们不得不在收成的好坏还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触动农民的防荒粮。但粮食还是必须收购的。于是重新采取了非常措施，产生了强迫命令、破坏革命法制、挨户巡视、非法搜查等等现象，这就使国家的政治状况恶化，给结合造成了威胁。"① 确实如此，1928 年夏天农村的政治状况极端尖锐化了。

现在对 1927—1928 年冬春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一事是否有道理的问题不是太容易回答的。前几年斯大林及其顾问们在经济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虽然没有给政治和经济留下多少机动的余地，但是主要用经济的而不是强迫命令的办法、也就是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而不是在军事共产主义的轨道上，看起来，还是有足够的可能性去改变已经形成的局面。

事情就在于，在"大"政策（即国家和党的领导）领域内有它自己的规律和逻辑，如果我们转向另一条道路，那么再想回到原来的道路通常是不可能的。这次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也是如此。

1927—1928 年 12、1 月期间斯大林发出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指示时，他显然并没有准备在以后几年中把这些指示当成农业政策的基础。非常措施不能成为农业政策的基础，因为富农必然会以缩小和减少农业生产来回答这些措施，而这在没有足够数量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情况下要导致全国性饥荒。斯大林用他的这一指示显然只打算吓唬一下富农，使他们顺从，在收购粮食方面更随和一些。1928 年春夏间发出的新指示可以证明上述情况，新指示中说，不要再采取非常措施，把从农民手里收购粮食的价格提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扩大供应农村的工业品数量等等。1928 年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11 卷第 178 页。

7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列宁格勒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为“防止可能重新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必须做些什么？“为此必须：(甲)立刻制止挨户巡视、非法搜查以及任何破坏革命法制的行为；(乙)立刻制止各种各样重新实行余粮收集制的行为和任何封闭集市的企图，同时保证由国家灵活地调节商业；(丙)根据不同的地区和谷物种类，酌量把粮价提高一些；(丁)对粮食收购区组织合理的商品运送……在目前收成良好的条件下，如果能够老老实实地有步骤地实行这些措施，那就会造成一种情况，使在即将开始的粮食收购运动中不必采取任何非常措施。”[①] 众所周知，中央七月全会根据斯大林这些指示的精神通过了专门决议，禁止各种非常措施，提高粮价，把商品运到农村去等等。同时1928年下半年党的报刊也登载了许多关于当前绝对不允许采取非常措施的说法。

178

但是，斯大林不可能顺利实现这个新的急转弯，因为1927—1928年冬天所采取的非常措施实际上向富农宣了战，那就是意味着新经济政策在农村已结束了。斯大林几个月后虽然声明结束对富农的战争，并对农村富裕阶层作了相当实质性的让步，但是回到原来的关系及收购形式已几乎不可能了。这是由于已在1928年春天富农和一些富裕中农为了回击非常措施缩小了耕地面积。许多富农“自行消亡”了，他们出卖了自己的主要生产资料，把钱财藏起来了。所以毫不奇怪，1928年秋天的粮食收购计划又受到了威胁，而这一年是丰收年，夏天又采取了经济让步政策。

1928年中央十一月会议确认，“农业方面计划预订指标没有完成，粮食方面尤其严重”，这引起了“国家粮食和原料平衡的极度紧张”，“出口计划的破坏”，“轻工业的开工不足和一些其它部门的一定程度的混乱”。因此，1928—1929年冬天斯大林断然拒绝了“右倾”分子关于从国外购买粮食的建议，完全忘记了自己不久前

---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82—183页。

179 号召立刻制止非法搜查和没收，挨户巡视，关闭市场等破坏革命法制的各种行为，——这一切没有什么奇怪的。相反，这几个月新的指示发到地方上，其精神是对富农采取更加严厉的非常措施。

1928—1929 年冬天对农村富裕阶层再一次采取的非常措施使这几个月内的粮食收购总额增加了。但是到 2、3 月间，收购工作已很吃力，到 1929 年 4 月的收购总额比 1928 年同期还少。连莫斯科的面包都不能不间断地供应了，市场价格和收购价格之间的差额更大了。其结果各种渠道的粮食投机活动扩大了。与此同时，新的压力使富农又一次缩小了耕地面积，并加速了富农“自行消亡”的新浪潮。当然，这时采取了扩大贫农和中农户耕地面积的措施，但是这不会使国家商品粮有明显增加。1929 年虽然是丰收年，但在城市和工人村中不得不实行职工粮食和其它许多产品的定量供应。

这样，1929 年中期苏联出现了相当危险的形势。和富农进行的未宣布的战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很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的，它造成了整个国民经济完全混乱和饥荒的威胁。需要紧急采取措施，但是斯大林的错误政策给政治和经济机动权留下了比 1927—1928 年更小的余地。当时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向富农做出相当大的让步。但这是非常艰巨的道路。农村的富裕阶

180 层已不愿再相信新经济政策，所以为了稳定农村的局面要向这些阶层作出相当大的让步。党就是为改正错误也不能走这一条路。

另一条道路是加速农村的集体化运动，也就是在农业中建立相当强的集体农庄成分并消灭富农对商品粮的垄断。

我们知道，党选择了第二条，同样是很困难的道路。在 1929 年的条件下这显然是正确的选择。遗憾的是，斯大林在实现这一党在农村政策问题上新的转变时（这是 2 年中第四个转变），也没有能够不犯最严重的和不可饶恕的错误，也没有能够避免过火行为。

三、农业集体化时期政策上的歪曲和错误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是一个革命性变革，伟大的经济和政治转变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决定性胜利。集体化的巨大诗史要求艰巨而紧张的劳动——它充满了全党和许多成千上万党员的伟大业绩。这个原来就是异常复杂的关键性转折由于斯大林的无能的冒险主义领导更加复杂化了，现在来描写这段历史是很痛苦的。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二十年代末以前生产合作化的发展是很缓慢的。二十年代合作化的重点是发展供销合作社。到1928年年中时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只有百分之二弱。

大家知道，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我们历史上非正式的称为"集体化大会"。实际上也是如此，正是十五大通过了迅速发展一切形式的合作社包括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大会关于中央工作报告的决议说，逐步把分散的农民经济在合作化的基础上转到 181 大机器生产和集体耕作的轨道上是党的首要任务。[①] 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也强调说，"把个体的小农经济联合和改造成为大集体的任务应该作为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②]

但是，在大会上谈到农村工作的所有代表都指出，集体化过程应该是缓慢的，谨慎的和逐步的。例如，莫洛托夫在报告中说："我们知道，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是缓慢的，长期的。为了使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集体）经济需要许多年。我们知道，个体经济的发展要延续许多年，但我们还是要提出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因素的比重和加快它们的成长的任务…… 应该懂得，实行新经济政策七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正如列宁还在1919年说的那样，从党和苏维埃政权方面在农业问题上不能犯任何急躁和匆忙的毛病。在执行农村新任务时，我们很需要记住这七年中我们所学到

① 《联共（布）决议案……》第2卷1936年版第230页。

② 《联共（布）决议案……》第2卷1936年版第256页。

的许多东西，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习惯就是谨慎、小心、不慌不忙、逐步发展等等。"①

大会的许多代表很公道的把集体化的逐步和缓慢发展和国家用来支持集体农庄的资金不足，国家的极度贫穷，特别是农业机械不足联系在一起了。例如，国家在这期间每年最多只能给集体农庄提供一千至二千台拖拉机。格·纳·卡明斯基在大会发言时说："当我们谈到我国的工业化时，谁也不会想到，在这方面只靠宣传，组织工作和其它什么美好事物就可以取得什么成绩。大家明白，发展工业的问题就是基本建设的投资问题。有人提供这样的办法：多搞组织生活，多搞农业技术工作，更重视宣传工作等等。毫无疑问，这都是需要的。这些工作我们都要加强，但我们不应该漏掉基本问题。合作化过程不仅是组织过程，它同时又是物质过程。如果不解决实现农民经济根本改造所需要的资金问题的话，这个任务也就无法解决。大经济——首先是掌握比小经济更多得多的资金的经济。我应该直截了当地宣布，通向生产合作化道路的运动，一方面依靠的是它本身的很弱小的积累，另一方面，又依靠国家方面很弱小的资金来源。"②

大会上也谈到农村中党和苏维埃干部培养不足的问题。约·米·瓦雷基斯说："现在我们的农村工作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农村支部就其主要部分是薄弱的，政治训练程度差，农村支部的领导干部政治水平低。支部的发展，农村组织的政治成长，他们工作质量的改善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进行得很快。"③

联共（布）十五大考虑到这些情况后指出，集体农庄的发展应

---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稿》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 年版，莫洛托夫的发言。

②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稿》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 年版，卡明斯基的发言。

③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稿》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 年版，瓦雷基斯的发言。

和全面帮助个体的贫农和中农经济结合起来，因为“个体所有制的经济……在相当时期内还是整个农业的基础。”① 联共（布）中央1928年的七月全会决议也讲到这点。斯大林于1928年7月宣称：“有些人认为个体农民经济已经完全没有发展的可能，不值得去支持它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种人和我们党的路线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既不需要个体农民经济的诅咒者，也不需要它的歌颂者。我们需要的是善于使个体农民经济最大限度地发挥它所能发挥的力量、同时善于把个体经济逐渐引上集体制轨道的清醒的政治家。”② 133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1924年4月）也强调指出，今后几年中农产品的增长主要是靠“个体的贫农和中农经济，这些小农经济过去和现在还没有挖掘自己的潜力……”③

第十六次党代会所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最佳方案）预订五年中集体化将包括百分之二十三的农民经济，这一公有化成分将占百分之十七点五的耕地面积和提供百分之四十九的商品粮。其中，五年计划第一年（1928年7月—1929年7月）的集体化数字是相当低的，全国集体化水平从百分之一点七提高到百分之二点二。

也许，在1928年这些计划是正确的和符合实际的。但是，到了1929年，当国内形势急剧尖锐化，当不间断的粮食危机连续三年不停，当国家掌握的商品粮缺乏以至于威胁到全国的出口计划和工业化计划的时候，这样的计划就不合时宜了。

所以毫不奇怪，党中央关于加速发展集体化运动的最初的几项指示全体共产党员都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指示，他们赞成这些指示。

1929年中期已经可以看到集体化的最初成绩，到6月1日为

---

① 《联共（布）决议案……》第2卷1936年版，第253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80页。

③ 《苏共决议案……》第2卷1953年版第459页。

184 止，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已达百万以上，而计划数字只有五十六万四千二百户。当然，这还是很小的数字，因为这意味着1929年中期每二十五户农民只有一户参加了集体农庄。

那时候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相当薄弱。1929年用拖拉机耕的面积只占耕地的百分之十弱，联合收割机只有几百台。农村中几乎没有集体的牲口棚，也没有青贮塔。①

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正确地估计农村的形势和集体化运动的最初成绩。他又开始冒险。他显然想弥补前几年农业政策中的缺点和失误，想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绩使世界吃惊，所以1929年底他再一次走上了命令主义和专横的危险道路，再一次将我们农业的大轮船来了个大转弯，而没有事先探测一下暗礁和浅滩的情况。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从1929年下半年起实行了集体化高速度发展的方针，并用各种办法催促地方机构，而他们没有考虑到当时国家的可能性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客观和主观困难。到1929年11月初为止，全国虽然已成立了七万个集体农庄，但这大部分是很小的合作社，它们只包括了一百九十一万九千四百个农户，只占百分之七点六。1929年集体农庄庄员绝大部分都是贫农，只是个别为数不多的村庄和地区，中农也加入了集体农庄。可是斯大林急急忙忙地把这个别事实加以综合，认为这是集体农庄根本的新的转折的开始。他在1929年11月3日发表的《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中宣称，“目前集体农庄运
185 动中的新现象是什么呢？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就是农民已经不象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这是农业发展中的根本转变的基础，而这个根本转变是苏维埃政权过去一年最重要的成就。”②

① 保藏青饲料并使之发酵的窖或塔。——译者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18页。

斯大林从这一显然是仓促而论据不足的结论出发，于 1929 年秋天提出普遍集体化的口号。在当时集体化运动还处在第一阶段的情况下，这一口号很明显是为时过早的。中农的基本群众在那几个月里还是动摇的，富农还没有中立，没有在中农中特别是富裕中农中被孤立。在这种情况下普遍集体化的口号必然会导致集体化建设中政策的歪曲，会导致对农民的强迫命令和强迫中农意志的现象。这些现象在 1929 年底——1930 年初发生了。

遗憾的是，最近有一些作者又一次力图驳倒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后已被历史科学证明了的在农业集体化中斯大林的冒险主义的领导。例如，Φ·瓦加诺夫写道："1929 年下半年是集体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标志……这一时期的最显著的特点是中农加入了集体农庄，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参加者。全国已有六万七千四百个集体农庄，他们占有百分之三点六的耕地，交出百分之四点九的农业商品。这一切证明，农业普遍集体化的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技术和政治前提已经具备。"① 瓦加诺夫也许是有意识地不举集体化农户所占的比例（百分之七点六）。可是这两个简单数字——百分之七点六和百分之三点六就足以说明，中农还没有加入集体农庄。百分之三点六的耕地和百分之四点九的商品——这两个数字也显然表明，关于立即实行农业普遍集体化所需要的物质技术和政治前提已具备的结论是没有充分理由的。

188

关于斯大林在领导集体化运动的不良作用，今天还从分析联共(布)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中也不难看出。这一委员会是 1929 年底专门为制订中央《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支援集体化建设的措施》决议草案而建立的。我们知道，许多中央委员在赞成加速集体化进度的同时反对了过高的速度，反对不必要的赶速度，因为这样做没有主观和客观基础。专门委员会考虑了这些意见。但是委员会所制订的决议草案受到了斯大林的严厉批评。草案根据他的意见

---

① Φ·瓦加诺夫：《农业的改造》，载《共产党人》杂志 1966 年第 3 期第 95 页。

被修正了，大不如从前了。斯大林的修改正好是以集体化运动过分快的发展速度为指针的。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决议草案取消了这样的项目；农民牲畜和农具的公有化程度，建立集体农庄公共基金和周转资金的程序。草案取消了下面一个重要原理："党中央对集体化方面工作效率的评价不仅要根据集体化了的农户数字，而首先根据这个或那个地区能否在生产工具和劳动集体组织的基础上实在地扩大耕地面积，提高收获率和增加牲畜。"在决议最后的定稿中，关于北高加索和中伏尔加的集体化期限缩短了一至两年，187 关于生产资料和牲畜公有化，农民手中保留小牲畜，工具和家禽的规定也被取消了。同样，关于消灭富农的途径和方法的规定被取消了，委员会关于如果富农服从和自愿履行集体农庄庄员的一切责任的前提下，可以把富农作为劳动力使用的建议也被取消了。决议规定，主要产粮区于1930年秋天，最晚不超过1931年春天完成集体化。其它地区集体化应在1931年秋天或1932年春天完成。许多地区的期限没有什么规定，这更加促进尽快结束普遍集体化。①

*　　*　　*

被斯大林弄糟了的决议草案《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支援集体化建设的措施》于1930年1月5日被联共（布）中央通过了。这个决议虽然规定主要产粮区于1930年秋天或1931年春天（其它地区再晚一年）完成集体化，但是1930年1月许多州和共和国的党组织主动承担了自己完全不能胜任的任务——不是1930年秋天而是春天完成农业集体化。1930年1、2月所有报纸要求克服社会主义的反抗，尽快实现集体化。

我们已经说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并没有谈到普遍集体化问题。因此国家计划中并没有安排组织成千成万集体农庄所需要的物质和财政方面资源。诚然，1月5日决议规定了加快生产拖拉

① Н·И·涅马科夫，《共产党是群众性集体化运动的组织者》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98—100页。

机，联合收割机和其它农业机器工厂的建设。当时为数不多的机器拖拉机站也转向为集体农庄服务，国家也承担了集体农庄土地规划方面的费用，集体农庄也得到1年的农业贷款——五亿卢布。但这一切措施是以集体化在一至两年内实现为前提的，而不是在一至两个月内。 188

大部分地方的党政和经济组织对仓促实现普遍集体化没有思想准备，更不用说农民本人。

所以毫不奇怪，为了完成来自上面的书面的，时常是口头的指示，几乎所有州和共和国的党政机关不得不对农民搞强迫命令，甚至对基层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也采取强迫命令。农村中实际上形成了非常状态的局面。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农村中的作用也得到畸形发展。

这种做法和马列主义根本原理是背道而驰的。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国家对农民的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①

列宁也不断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大家知道，列宁关于农民自愿地联合为集体农庄的原则被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以专门决议的形式通过了。这一决议指出："只有那些农民自己本着自愿原则建立起来的并被实践证明对他们是有益处的联合组织是宝贵的。这方面表现过分急躁是有害的，因为这只能引起中农对新事物的成见。利用直接的或者那怕是间接的方法强制农民参加公社的那些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应该负起重大责任并把他们调离农村的工作……"②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也最坚决地要求在集体化过程中遵守自愿原则。 189

就是在斯大林本人的讲话中也同样可以找出不少关于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实现渐进和自愿原则的正确思想。1927年他在和外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95页。

② 《苏共决议案……》第1卷1953年版第448页。

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想采取经济、财政和文化政治方面的办法，逐步地在农业中实行集体制……只有当农民经济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即通过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方法加以改造的时候，只有当多数劳动农民加入合作社组织的时候，只有当多数农村满布集体形式的农业合作社的时候，全盘集体化才会到来。现在正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但是还没有达到，而且也不会很快地就达到。为什么呢？其原因之一就是需要一大笔钱，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这一大笔钱，但是以后一定会积累起来。"① 这都是对的。但刚过两年，国内经济形势和 1927 年比较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可是斯大林关于建立集体农庄的说法则完全另一样了。他提出了新的口号——通过大规模的、迅速的、普遍集体化的道路培植集体农庄，而那时候实现这点只能通过命令主义和压制的方法。斯大林在 1929 年 12 月说："要使小农的农村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还必须在农村中培植社会主义大经济，即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作为能带领基本农民群众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的社会主义基地……社会主义城市只有在农村中培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并按照新的社会主义轨范来改造农村，才能带领小农的农村。"②（着重号是斯大林的。）

1929 年底——1930 年初，在斯大林及其一些最亲密的助手压力下列宁在集体化合作化建设中的自愿原则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被破坏了。农民中间的组织和解释工作被对中农甚至部分贫农的粗暴命令主义和暴力所代替。农民不得不在"作为富农没收土地和财产"的威胁下加入集体农庄。许多州提出这样的口号："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和强制同时，许多地方机构力图用各种不切实际的许愿引诱农民参加集体农庄。如：许愿给农民拖拉机和巨额贷款。"什么都给，加入集体农庄吧！"许多地区建立的不是集体农庄，而是公社，用强制办法把农民的全部小牲畜，家禽和自留地公有化了。

---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190、193 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132—133 页。

有些州不但不给农民以财政和物质的帮助，而且实行了所谓的“动员资金月”——强迫个体农户在加入集体农庄前付清所有债务——信贷、种籽贷款、股金。

集体农庄建设中的这些粗暴的歪曲和过火行为引起了农民，特别是中农的极大不满。许多农民在富农的煽动下加入集体农庄前屠宰牲畜、牛、羊、猪，连家禽也杀掉。1930年仅仅两个月（2—3月）内屠宰的大牲畜的数量是一千四百万，猪——三分之一，羊——四分之一。集体化的比例在加大，光1、2月内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达一千万，但农村的紧张程度也加强了。许多地区集体农庄的敌人煽动农民搞反苏活动。

农村的形势直到斯大林于1930年3月发表《胜利冲昏头脑》191 一文后才缓和下来，他是由于联共(布)中央要求而写此文章的。在这里斯大林正确指出，在建立集体农庄时存在违犯自愿原则的现象，存在着从劳动组合形式跳到公社形式的现象等等。但是他把犯这些错误的责任全推到地方机构，说他们是糊涂虫。这当然是由于斯大林所具有一贯的不诚实品质造成的，但是这引起了地方工作人员的极大慌乱。实际上正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以及联共(布)中央的一些其他领导人在集体化过程中不断在催促地方。关于集体化的专门简报每七至十天定期的送到每一个政治局委员手里。正是斯大林在1929年底——1930年初支持了一些同志关于提高集体农庄公有化程度的建议，包括公有小型农具、小牲畜、奶牛等。① 另外，在这期间所有的期刊都充满了关于集体化的材料，关于加速实现普遍集体化的各地区的保证，关于加速建立集体农庄的号召。很难设想，斯大林在此期间不看报不看杂志。所以说，斯大林想把集体化过程中的错误全部推到地方显然是欺骗人的。

德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市的一个工人别利克同志在给斯大林的

① 见《历史问题》杂志1965年第3期第12页。

信中写道："斯大林同志！我是普通工人和《真理报》的一个读者，我始终注意看报纸上的文章。难道要怨那些不善于在一片有关农业集体化问题和谁应该领导集体农庄问题的宣嚣和叫喊声中辨别方向的人们？我们所有的人——基层组织和报刊都忽略了关于集体农庄领导这一基本问题，那么斯大林同志在此期间也许是在睡

192 大觉，所以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我们的错误，因此同样地也需要纠正你一下。可是现在斯大林同志把所有责任推到地方，而对自己和上层采取保护态度。"①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于1930年夏天在莫斯科鲍曼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同样抗议斯大林的这种不诚实态度。根据这次代表会议代表С·И·别尔季切夫斯卡娅（1919年入苏共）和M·威穆赫列斯（苏共党员）的证实，克鲁普斯卡娅在讲话中说，我国的集体化不符合列宁原则。这种集体化按其方法和列宁的合作化计划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中央领导在实现集体化时不仅没有和党商量，也没有和基层及人民商量。克鲁普斯卡娅还说，没有必要把中央自己所犯的错误推到地方机构身上去。②

还应当指出，斯大林不仅仅把集体化事业中的错误推到地方工作人员身上。1930年春天我们许多州对地方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迫害。许多地区还举行了对"左倾过火者"的审讯。显然，许多被告因在农村中破坏了革命法制而受到十分严厉的制裁，这是应得的。但是使人莫名其妙和感到不平的是许多更高级的大干部并没有承担责任，而地方干部只是执行了他们的指示。

---

① 见《历史档案》杂志1962年第2期第194页。

② 克鲁普斯卡娅发言后紧接着讲话的是未参加代表会的卡冈诺维奇。他对克鲁普斯卡娅予以严厉斥责。从本质上否定她的批评，同时，卡冈诺维奇宣称，克鲁普斯卡娅作为中央委员没有权利公开批评中央的路线。他说："让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知道，不要以为她因为是列宁的妻子，就掌握了对列宁主义的垄断权。"安·布勃诺夫也严厉谴责了克鲁普斯卡娅的讲话，他说："克鲁普斯卡娅是一个不会把我们党引向好结果的灯塔。"

遗憾的是，至今还有一些历史学家企图用荫蔽的形式恢复斯大林的以下观点，即关于集体化过程中对政策的歪曲应由地方机构负责任，用以达到美化斯大林之目的。例如，谢·巴·特拉佩兹尼科夫在他1965年出版的著作中断言，转向普遍集体化不是根据某些个别人物的意志所决定的，象“资产阶级造假的人”所说的那样，而是客观上成熟的条件和前提所决定的。特拉佩兹尼科夫在书中说：“实践证明，党在这一政治步骤上没有考虑不周的错误。”① 他在本书中关于集体化时期的错误发挥了他特有的看法。他写道，中央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所有指示和原则决定似乎都是正确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无论是地方和中央机构都犯有严重的错误。事实当然不完全是这样。正确的指示应当不仅是及时的，它应该符合地方条件和干部的训练水平，同时它还应该指出在实践中实现它的真正正确的途径和方法。但是1929年——1930年关于集体化建设的指示并不具备这种特点。 193

Ф·瓦加诺夫在我们前面已提到的文章中也赞成特拉佩兹尼科夫的观点。他写道：“在集体化运动中很快发生了违犯列宁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原则的现象……对党的路线的歪曲有许多原因，这是极为复杂的新事物，中央和地方干部缺乏必要的经验，在极短时间内所发生的事态的规模和速度，对命令主义事实的不良后果估计不足等等。所以我们不能同意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他们不摆出事实和材料，而抽象地认为，犯错误的几乎唯一的原因是个别人物企图用各种手段加速集体化运动。”②

Ф·瓦加诺夫在1968年发表的新文章中问道：“如何解释集体化第一时期所发生的严重错误？资产阶级造假的人和托洛茨基及右倾机会主义者一样，幸灾乐祸地断言，歪曲政策和过火行为是来自党的政治路线的实质和个别领导人物的意志。但是，对现实 194

① 谢·巴·特拉佩兹尼科夫：《苏联共产党实现列宁合作化计划的历史经验》莫斯科1965年版第197页。

② 《共产党人》杂志1966年第3期第97页。

的分析推翻了这些臆测。集体化对全党来说是一件新的和极为复杂的事情。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成百万个体农业的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如果说关于集体化原则问题通过了正确的决议，但是实际执行是要经过无人探索过的道路，而且如此大的事物尚缺乏必要的经验。"①

关于瓦加诺夫的这些议论能说些什么呢？

第一，违犯自愿原则和命令主义现象不是象瓦加诺夫所写的那样，发生在一系列地方，而实际上是普遍发生的。第二，事态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并不是什么自发的现象，而是由领导机构的政策决定的。集体化过程并不是什么没有人指导的过程，这由斯大林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所发生的事情所证明。所以历史学家关于斯大林责任的看法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他们首先依据的是这样的事实：1929—1930年我们的党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就是他向地方发出关于集体化主要的指示，不仅书面，还有口头的。显然，地方机构因对普遍集体化如此迅速的发展没有任何准备，作了不少糊涂事。但是领袖们的任务就在于，当他们提出这样或那样问题时不仅要考虑到客观因素，还要考虑到主观因素，包括执行该任务的干部的才干和训练水平。而斯大林在1929年底并没有考虑到农村的主客观条件。所以在如此大的新事物中确实不可避免的错误和歪曲政策达到了如此广泛，深刻和普遍的程度。许多错误的产生并不是由于这条道路无人探索过，而是由于忽视了人所共知的列宁的指示，甚至忽视了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刚刚通过的决议，还有党的全会和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只是由于全党、工人阶级、农民的巨大努力，我们的农业从巨大损失中，或不管怎样从大灾难中挽救出来了，而这一切是和斯大林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

*　　*　　*

斯大林的文章发表后不久，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在集体

①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8年第2期第106页。

化运动中同对党的路线歪曲作斗争》的决议。其中建议停止在集体化运动中采取强制做法，允许农民退出集体农庄。这一决议导致农民大批离开集体农庄。（南方各州的春耕已经开始了，农民离开集体农庄和同时发生的混乱给春播以严重的损失。）

到1930年7月1日留在集体农庄中的农户还不足六百万，只占贫农和中农总数的不到四分之一。有些州1930年几乎所有年初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都解散了。农业集体化的艰难工作在许多情况下要从头做起。

在1930年还没有彻底纠正的过火行为和对政策的歪曲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损失。

农业的集体化本应该导致农业、畜牧业总产量的迅速提高，同时产品的商品率也应有提高。例如，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规定农业总产值从1927—1928年的一百六十六亿卢布提高到1932—1933年的二百五十八亿卢布，即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这是正确的和有根据的计划。但是在集体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错误很快使这些打算被打乱了，均衡和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的计划也被破坏了。原来估计农业总产值的提高被在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不断下降所代替。如果把1928年各种类成分的农业总产值作为百分之百，那么1929年为百分之九十八，1930年为百分之九十四点四，1931年为百分之九十二，1932年为百分之八十六，而1933年下降到百分之八十一点五。 198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下降最多的是畜产品生产，1933年只占1913年水平的百分之六十五。五年中牛的数量从六千零十万头下降到三千三百五十万头。羊、猪的数量下降三分之二以上。役畜首先是马的数量也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这一损失如此巨大，使三十年代初期开始大量供应农村的拖拉机也不可能弥补。直至1935年农业的牵引资源（包括役畜和机械）才超过了1928年相应指标。① 有机肥的资源也大大下降了，而这又影响了整个农业状

① 参见《苏联历史》杂志1964年第5期第6页。

态。总而言之，1933 年农业总产值不仅没有增加到二百五十八亿卢布，反而下降到 131 亿卢布。① 和平时期这种史无前例的农业生产下降的严重后果一直到第二、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可以感觉出来。

197 附带说明一下，Φ·瓦加诺夫在这些方面也企图用各种巧妙的手法缩小斯大林冒险主义领导的后果。他在其文章② 中写道，由于集体化运动农业总产值在 1937 年比 1913 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这些数字是正确的。但是 Φ·瓦加诺夫不知为什么忘记说，如果不但算农业产值，而且也算畜牧业产值，那么农业生产的增长数字 1937 年和 1913 年比较不是百分之五十，而是百分之三十四。另外，为了评价集体化的结果更合理地是和 1928 年比较，而不是 1913 年。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总产值增加的数字不是百分之三十四，而是百分之八。这对十年来说并不多。还应该指出，1937年是少有的丰收年。此外，在 1938、1939 年中，农业生产供给国家的农业产品少于 1928 年，而当时耕地面积大为扩大了。总之，战前年代农业总产值只有两次稍为超过了 1928—1929 年水平，这就是 1937 年和 1940 年。

其实，如果我们把三十年代后半期不同二十年代后半期比较，而同 1913 年比较的话，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额也基本上靠较值钱的技术作物和一些副产品，至于基本农产品，并没有任何增加。例如，1933—1940 年粮食平均年产量为四十五亿六千三百万普特，而 1913 年为四十七亿七千万普特。肉的产量 198 下降更严重，特别是如果我们不把小城镇和城市郊区职工所生产的肉食品计算在内的话。

* * *

① 数字摘引自中央统计局年鉴。

② 《共产党人》杂志 1966 年第 3 期。

四、消灭富农之为阶级

还应该谈谈和农业集体化同时发生的镇压运动，即消灭富农之为阶级。

大家知道，富农在革命前是俄国农村很强的力量。十月革命后最初几个月内，由于剥夺地主经济，富农的地位更巩固了，当时富农占全体农民的百分之二十，他们的土地在全国占百分之四十。我们也知道，还在1918年夏天富农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富农起义的浪潮蔓延到俄国各地。正是富农起来反对内战条件下必须采取的粮食垄断和余粮征集制度。党为对付富农的怠工组织了武装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列宁在这一时期要求同富农进行最残酷的斗争。他在1918年8月写道："毫无疑问，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或者是富农把无数的工人杀掉，或者是工人把少数反对劳动人民政权的富农强盗的暴动无情地镇压下去。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①

但是列宁在号召无情地镇压富农暴动的同时，从来没有号召完全剥夺整个富农阶级，更没有号召从肉体上消灭富农并把所有富农连同家庭成员一起迁移出去。列宁于1919年3月12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说："我们主张以暴力对付富农，但是不主张全部剥夺他们，因为他们自己经营土地，他们的一部分财产是靠自己的劳动积累起来的。要切实掌握这种区别。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全部剥夺；对富农则不能剥夺其全部财产（这样的决议从来没有过）……"②列宁于1919年5月23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对于地主和资本家，我们的任务是完全剥夺。但是对于中农，我们不容许采取任何暴力手段。甚至对于富农，我们也不能象对待资产阶级那样肯定地说，绝对剥夺富农。在我们党纲中是做

199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8页。

② 同上，第29卷第18页。

了这种区分的。我们说：镇压富农的反抗，镇压富农的反革命阴谋。这不是完全剥夺。"①

列宁规划新经济政策时，把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和私人资本之间经济竞赛的整个历史时期。列宁设想主要用经济措施排挤富农。他写道："如果你们给农民机器，那就能把他们提高起来，当你给他们机器或实现电气化的时候，几万或几十万的小富农就会被消灭掉。"②

二十年代中期正是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主张加速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分裂。许多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当时号召在农村中进行新的革命，建立贫农联盟和剥夺富农。当时党内多数人拒绝这类不切实际的冒险建议。还有，在制订农业集体化方针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没有一个代表号召用暴力消灭富农。

1928—1929年期间党的刊物还继续广泛讨论富农问题。这时没有一个作者提出用暴力剥夺富农和迁移富农问题。争论的主要内容是：是否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如果允许的话，在什么情况和条件下加入？这问题在第十六次党的代表会议上也引起了热烈

200 的讨论。代表们的意见不一致，使会议未能制订直接的指示。所以各州的党组织用各自不同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有些组织(西伯利亚、北高加索)通过决议禁止吸收富农加入集体农庄。中伏尔加联共(布)区委于1929年7月主张在一些情况下允许富农入集体农庄。1929年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等)在富农问题上也主张采取较缓和的方案，而他们却不支持所谓的"右"倾。甚至连1929年的中央全会也宣布消灭富农的口号为时过早。

一些有关在苏联富农命运的文章(例如，B·A·希多罗夫的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76—177页。

② 同上，第32卷第214页。

文章①)说，关于消灭富农的决定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集体化专门委员会(1929年12月成立)和富农问题专门分会(1930年1月成立)作出的。希多罗夫说："委员会在研究了关于集体化运动的材料后得出结论说：到了在极短历史期限内消灭富农之为阶级的时候了。"希多罗夫在文章中接着说，委员会在总结了各地同富农斗争经验后，为中央政治局准备了决议草案《关于在普遍实行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此草案由政治局通过了并于1月30日电发所有的地方组织。

B·希多罗夫在这里对下述一件事实保持沉默：还在1929年12月斯大林在农业专家一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没有等待任何委员会的介绍，提出了消灭富农之为阶级的口号，并号召在实行普遍集体化的地区把没收富农的财产作为集体农庄建立和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斯大林没有经过中央全会决定和违背以往各项决定而公布了这一指示。连特拉佩兹尼科夫在自己的书②中都写道：如此重要的决定至少应该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大家知道，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地方早在1930年1月30日电报之前就开展了通过没收富农财产的办法达到大规模的消灭富农运动。这时谁也不会想到富农有什么不同类型。因此中央政治局后来关于没收富农财产的程序和方式的决定都只是对早已开始的经常是自发的消灭富农运动加以整顿的尝试。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专门委员会建议把富农经济分为如下三类：

一类——积极反抗集体化运动并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富农。对这类富农建议逮捕他们并迁移到边缘地区。

二类——虽不是积极但还是对实行普遍集体化的措施予以反抗的富农。对这些富农建议把他们迁出州(区)之外。

---

① 见《历史问题》杂志1968年第7期。

② 谢·巴·特拉佩兹尼科夫：《苏联共产党实现合作化计划的历史经验》莫斯科1965年版。

三类——服从集体化措施并服从苏维埃政权的富农。委员会建议允许这些富农入集体农庄，但三至五年内取消他们的选举权。

但是，后来根据斯大林的修正，委员会通过的决定不吸收第三类富农加入集体农庄。

因此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议1930年2月4日指示中富农的分类已不是原来的方案。

202 例如，根据指示的规定，第一类富农是反革命富农的骨干、恐怖活动和暴动的组织者。对这些富农，建议立即对他们进行隔离措施——送进监狱或劳改营，甚至对恐怖活动和反革命暴动的组织者处以极刑——枪决。这些富农的家庭成员要迁移到边缘地区。估计，属于第一类富农有六万余农户。①

第二类是最富裕的富农中富农骨干的另一部分。对这一部分建议连家庭一起迁到国家边缘地区或本地区的边缘地方。指示中说，这部分富农约十五万户。

第三类是不太强的富农经济。对这部分富农，建议留在本地区，但是把他们迁到集体化居住区以外并另外分配给他们土地。这些富农要承担一定的生产任务和义务。据估计，这部分是占富农户的多数——约八十万户。

在各项有关的指示和决议中没有谈什么"富农的帮手"和富裕中农问题。

遗憾的是，就连这些较严厉的指示多数州在公布前后都没有

203 遵循。还在1930年由于农村的阶级斗争极端尖锐化被迁移到边缘地区，主要是北方地区，被关到劳改营和枪决的富农比年初计划的数字多得多。

根据联共(布)中央1933年1月全会的数字，1930年初至1932年底被迁出到边缘地区的富农达二十四万零七百五十七户（连同

---

① 为了比较说明一下，在俄罗斯联邦的领土上1928年发生了富农作案的1123起恐怖案件。(见《苏联历史》杂志1966年第1期第96页) 所以很明显，中央的委员会在列出反革命富农骨干的数字时只会夸大而不会缩小这一骨干的估计数字。

家庭成员一起约一百至一百五十万人)。但是有相当可靠的根据说明这些数字是低于实际的。

在我们的历史学中通常把集体化时期农村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这点仅仅算到富农账上。这是不对的。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相当一部分责任应该由那些在集体化建设中犯了极为严重的过火行为和歪曲政策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来负。集体化刚开始时大家看得很清楚,我们农业的根本改造是违犯富农利益的,因此富农一定会反抗集体化运动。因此,当时党和苏维埃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把中农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孤立富农。显然,在被孤立的条件下富农对集体化运动的反抗会大大削弱,相当部分富农将保持中立并不得不服从苏维埃政府的措施。如果没有成功的希望,没有中农的支持,多数富农就不敢搞反革命恐怖活动,组织反苏暴动,建立匪帮。但是现在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许多州和地区并没有把富农孤立起来和使其保持中立。由于集体化运动中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严重错误,相当部分的中农是反对成立集体农庄的,农民群众对富农的反苏宣传变得特别容易接受。在这样的情况下富农得以争取到许多中农跟着他走,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加强了,这使他们反抗集体化的力量加强许多倍。而这又同时导致更多的镇压。被镇压的不仅几乎是全部富农,而且有暂时接受了富农宣传或者加入集体农庄时表现动摇的相当部分中农。特别受重大打击的是那些偶尔使用雇佣劳动的各种类型的富裕中农。① 只是雇佣工人这一项,就经常可以成为"没收富农财产"的理由,而当时在不同季节里使用雇工的不但有富农和中农,甚至也有因种种原因不能耕种自己土地的贫农。②

204

几乎所有的州受到行政命令而迁出的不仅包括许多富裕中

---

① 我国多数地区在消灭富农时把他们个人的非生产性财富也分配给贫农。这种做法自然会促使人们把更多的富裕中农也列为被"没收富农财产"之列。

② 关于这种情况的一些很有趣的材料收进了小册子《驳反对派的蛊惑宣传和造谣、实事和数字》,1927年由联共(布)中央宣传部出版。

农，而且包括部分比较穷的中农、贫农、甚至雇农，因为他们接受了富农的宣传，为了使对他们的迫害更合法化，给他们的称呼是“富农的帮手”。这样，斯大林把惩办机构的打击方向指向了部分劳动农民，而正确的政策是把这些劳动农民从富农影响中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个别地区迁出的数量达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每一个富农后边跟着三、四个被逮捕的中农或贫农。①

1930—1931 年的党刊中有不少关于在“没收富农财产”时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的报道。例如，这些报道说，许多地区在集体化运动以前就开始“没收富农财产”了，而当时更谈不上什么前提，因为贫农和中农都没有对这样的行动做好准备。所以说，“没收富农”是突然进行的，用行政办法并导致了不良后果。例如，A·安加罗夫写道：“村苏维埃没收富农的做法是非常简单、机械和形式主义的，可以举很多例子说明这一点。在这过程中个人纳税和取消选举权往往混杂在一起。对中农增加税收通常被看成是个人纳税，而这又引起取消选举权，后者又是‘没收富农’的基本前提。所以很明白，把‘没收富农’强加在中农头上的情况是非常多的。在这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的是赫尔岑村苏维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它把一系列的中农当成富农没收了。其中理由是各种各样的。例如：一个中农因为过去卖给同村人十几把镰刀而当成富农被没收了；另一个中农是因为出卖了自己的余粮；第三个是因为买了自留地；第四个因为两年前卖了牛；第五个因为卖了鞋底子；第六个因为于 1927 年把谷草卖给合作社等等。这显然是违犯了和基本中农群众相结合的原则，使富农在争取中农群众方面得到了有力的王牌。在谢苗诺夫斯基村苏维埃（伊万诺沃市）‘有益劳动’集体农庄的一批贫农作出如下决议：‘要成立一个所有富农和中农财产的调查委员会，委托此委员会立即开始工作。’这一批贫农做出的另一条决议说：‘听取了关于登记缝纫机、镜子、壁镜和床的问

① 《苏共历史》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莫斯科 1960 年版第 423 页。

题；决定登记所有奢侈品。'中农群众很注意观察这一切过火行为，这时他们的动摇性起很大的作用。有时还把牧工当成富农，只因为他的祖父曾是富农或因他抚养了侄子（孤儿）。

巴图林区村苏维埃决定把三十四户当富农没收。检查后发现，其中只有三户是富农，其他全是中农。"① 这类例子成千上万，是举不胜举的。 206

有些地区在消灭富农时期宣布处于特别戒严状态，被迁出的富农连规定的最低的工具和资金数量都不留。连家里有人参加红军的富农户也被迁出，这和指示精神是相违背的。这种过火行为不是个别的，是普遍的。

难道还能够解释说那些（符合指示精神的）把同富农或其帮手一起逮捕全家，甚至其幼小子女的行为是正确的吗？② 在那些寒冷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车箱中成千上万的农民、妇女和儿童被运往东方——乌拉尔、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边缘地区。老党员Э·M·兰道1930年在西伯利亚看到这种情况。冬天，严寒天气有大批富农同他们家庭一起用马车运到本州三百公里的内地。孩子们因饥饿和寒冷而喊叫。有一农民实在忍受不了空吮母亲奶的乳儿的哭叫，从其妻子手里夺过小孩，把他的头往树上乱撞。

在许多情况下首先逮捕和关在集中营或监狱，甚至枪决的是富农本人。富农的家庭成员没有被触动，只是把财产登记一下，这时家庭成员好象作为看守已没收的财产的人。几个月后才迁出全家。 207

许多原富农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在那些人烟稀少的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苏联欧洲部分的东北地区里没有几年就死

---

① 《布尔什维克》杂志1930年第6期第20页。

② 关于被剥夺富农的全家迁出的严酷指示显然首先和这样的事实有关：即1930年苏维埃国家没有掌握为支援迅速产生的成千成万集体农庄所需要的物质和财政的资源。所以才决定把富农户的所有财产实际上移交给新成立的集体农庄。至1930年5月时，半数集体农庄的公共基金中来自富农财产的占百分之三十四。（《苏联农民》杂志，莫斯科，1970年，第237页。）这样，急促的加速集体农庄运动的结果必然导致在对待富农家庭方面的极端残酷性。

去了。这些地区那时建立成百、也可能是成千的"富农"专门居住区。这些居住区的所有居民都是流放者，所以没有迁移自由。在卫国战争时期，大概不会是在前几个月里，有指示从这些特别户村庄征青年人参加苏军。但直到战后才在这些"富农"村里撤消了警卫，允许这些村的居民有迁移自由。

显然，对人数最多的资产阶级阶层采取如此的残酷措施是没有必要的，在无产阶级国家正确的经济和农业政策下这些措施是可以避免的。

应该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他们发展一定的阶段上也要提出消灭富农之为阶级的任务。但是他们都避免了对富农全部剥夺。历史学家 Л·И·克雷洛夫写道："在人民民主国家里没有产生剥夺富农的必要性。在合作化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后，兄弟党认为有可能给相当部分富农参加共同建设性劳动的权利。例如，1956 年的捷共代表会议允许政治上和经济上巩固的合作社吸收个别富农加入合作社，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参加领导班子。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和匈牙利也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富农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加入农业合作社。这样，一个最大剥削阶级的成员有可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大家一起从事老老实实的劳动并得到改造。"① 作者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巩固决定的。但是，这样的解释显然是极不完全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民民主国家在农业改造过程中没有犯那么多的错误，和我国在斯大林领导下的情况不一样。

五、1932—1933 年农村中行政手段的镇压和饥馑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的下降当然会影响不断增长的

---

①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1966 年第 1 期第 8 页。

农产品征购和收买的计划的完成。

与此同时国内的工业继续发展，新城市在建立，城市人口每年增加二百多万人。结果，虽然建立和发展了集体农庄，但是迅速发展的工业的需要和农业总产量之间的比例失调不但仍然还是很严重，而且是大大增加了。

毫不奇怪，热衷于搞命令主义和滥用权力的斯大林在当时形势下只找到了这样的出路：重新走上用暴力剥夺农村的剩余的（甚至不光是剩余的）农产品。如下数字很说明问题：如果把1926—1929年平均农产品产量当作一百，那么以后十年（1930—1939 年）平均农业生产指数为九十五。可是三十年代国家征购和收购的农产品比二十年代后半期增加了许多。例如：粮食方面就增加了一倍。如果说，1932 年集体农庄交售给国家的粮食是四分之一多一些，那么1933—1934年是三分之一强，1935年几乎达到百分之四十。这还是1928—1930 年间为义务交售制而定的，直到1935 年没有变的指示价格①，这种价格比粮食和其他一些基本农作物的成本低好几倍。（是指专业农场的成本，集体农庄的成本没有计算，但肯定比农场高。）斯大林在讲话中明显地夸大提高收购价格的危险，说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中的零售价格必然要提高。如果提高粮价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危险，因为收购和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已实在太大了。1933—1934年粮食区的小麦收购价格是一公斤三点二至九点四戈比（按当时价格情况）。同时一公斤面粉的零售价格，按购粮卡是三十五至六十戈比，商业价格② 是四至五卢布。国家统一的零售价格是一公斤三点四卢布，比收购价格多三十九倍。一公斤土豆的收购价格是三至四戈比，零售价格，按购货卡是二十至三十戈比，商业价格是一公斤一点二至两个卢布，国家统一的价格是三十五至五十二戈比，按购货卡价格一公斤三至四卢布，商业价格十

209

① 即官方规定的收购价格。——译者

② 商业价格即指不用购货卡的高价。——译者

至十二卢布。国家统一的价格(在中央各区)为七点六卢布。①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从农业集体化最初几年起就实行了一套严重违犯集体农庄庄员在发展社会生产方面的物质利益的政策，一套按随意规定的收购价格强制购买集体农庄粮食的政策。不仅如此，还强制购买许多集体农庄所必需的饲料粮和口粮。

210 这种从集体农庄强行运出全部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的普遍的做法使三十年代初期许多集体农庄的劳动纪律涣散，粮食被大批盗出。绝大多数富农虽已被迁走，但是农村中敌对的反苏鼓动加强了。在这种煽动的影响下我国一系列地区特别是库班、顿河、乌克兰发生了独特的粮食怠工，这就是不仅个体农民，就是集体农庄把耕地面积缩小了，拒绝向国家交售粮食，把粮食埋在地里。斯大林并没有对自己所犯的歪曲政策的错误和过火行为加以改正，而是首先采取强化原来的暴力措施，对盗窃集体农庄粮食的行为实行了极残暴的政策。许多农民由于盗窃了自己种植出来的农业产品而被判处长期徒刑，甚至极刑。1932 至 1933 年间我国的个别地区实行了对农民的真正群众性的恐怖。对没有完成收购计划的地区停止供应商品，国家和合作商店关闭了。地方干部大批被免职，开除党籍，送交法庭审判。个别情况下甚至还用了如此残酷的办法：把整个村庄或村镇连同他的全部人口迁到边缘的北方地区。例如，1932 年秋天由于粮食征购困难以卡冈诺维奇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检查团到了北高加索，这个团实际上拥有无限的权力。1932 年 11 月党的边区委员会北高加索局在卡冈诺维奇的参与下通过了如下决议："由于库班特别可耻地破坏粮食征购工作和秋播工作，责成库班地区党组织完成一项战斗任务：击溃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所组织的粮食收购和秋播的怠工，打退部分农村共产党员的反抗，他们实际上已成了怠工的执行工具，并消灭和党员

211 称号不相容的对怠工的消极态度和调和主义。"② 根据这个决定北

① 见 И·Е·捷连宁在《苏联历史》杂志中的文章，1964年第 5 期第 19—20 页。

② 《大锤报》1932 年 11 月 5 日。

高加索有十六个村镇被迁出到北方地区，其中有波尔塔夫斯卡亚、梅德维多夫斯卡亚、乌鲁普斯卡亚、巴加也夫斯卡亚等村庄在内。这里讲的是全体人口，包括贫农和中农，个体农户和集体农庄庄员的迁出。被"空闲"出来的地方将非黑土地带农民迁进来住。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领导了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所谓"黑榜"[①]地区的迁出行动）农民的镇压。肖洛霍夫写的关于粮食收购人员在维申斯卡亚及其它村镇的使人气愤的行为的那封信很说明问题。1933年4月16日肖洛霍夫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在收购粮食的过程中对集体农庄庄员使用了'极恶劣的做法'：刑逼、体罚和打骂。"信中还说："这些例子还可以举下去。这不是个别的过火行为，这是已在边区成为法定的收购粮食的'做法'。这些事实我或者是从党员那里听到的，或者是集体农庄庄员亲自讲的，他们都是身受了这些'方法'之后，来找我并请我'在报纸上报导一下'。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你记得柯罗连柯的短文《在被平息了的村庄里》吗？可是现在'消失'的不是被怀疑偷富农东西的三个农民，而是几万集体农庄庄员。而且可以说使用的技术手段更加丰富，方法更加巧妙。"肖洛霍夫请斯大林"过问一下顿河地区所发生的一切，并调查一下那些直接采取这些不能允许的做法的人的事情，也请求调查那些指示他们这样做的人的事情。"[②]

但是斯大林对这类的警告是置之不理的，更甚者，他还企图给反农民的恐怖手段以"理论根据"。他在1932年11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和联共(布)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联席会议上说："什么是集体农民？集体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这些农民的大多数 212 是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支柱。但这不意味着，其中就没有个别队伍在支持对粮食收购的怠工。如果共产党人只因为集体农庄是社

---

① 所谓"黑榜"地区即指被指控为反苏的村镇，就是说上了黑榜的地区。——译者

② 肖洛霍夫的信是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引用的，（见《真理报》1963 年 3 月10 日）

会主义经济形式而对来自个别集体农民和集体农庄的攻击不给予摧毁性的回击，那么这是很愚蠢的。"①

新生的国营农场也受到不少行政手段的镇压。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1932年通过并公布的《关于畜牧业国营农场的工作的决议》。该决议说："人民委员会议、联共(布)中央和农业人民委员部认为，个别的畜牧业农场领导人企图借口畜牧业农场处在发展最初时期而抹杀自己因没有领导好而产生的缺点，这是不允许的和有害的。"接着列举了三十四名场长的名字，建议撤他们的职并交法院审判；还列举了九十三名场长的名字，建议撤他们的职，但不必交法院审判。在决定后边签字的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农业人民委员雅柯夫列夫。

斯大林对有关饥荒的警告也置之不理。饥荒是1932至1933年间由于歉收和大规模的强制征购（包括那些收成在中等水平以下的地区）而发生的。

这次可怕的饥荒蔓延到包括农业人口达两千五百万的广大地区。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被饿死，其他人跑到城市和铁路区域。但饥民几乎是没有得到国家任何救济，在道路和城镇入口处设有

213 哨口，用以制止饥民流进城市。报纸上，包括中央和州的报纸（饥荒蔓延的各州），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饥荒，也不象1920年伏尔加河地区发生饥荒时组织一些募捐资财的救济工作。在饥荒高潮时期(1933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全苏第一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也一字未提到饥荒。（在这次会上斯大林提出了"使所有集体农庄庄员富裕起来"的口号。）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仍拒绝讨论饥荒问题，例如：当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的一个书记P.帖列霍夫向斯大林汇报关于哈尔科夫州农村因歉收而造成的极端困难局面，并请求发给这个州一些粮食时，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反应是莫名其妙的。他粗暴地打断了汇报者的话，他说："我们

① 《布尔什维克》杂志1933年第1—2期第19页。

听说，您，帖列霍夫同志是一位很好的演讲者，原来您还是很好的故事员——您编造了关于饥荒的故事，以为可以吓唬住我们，但这是行不通的！您最好放弃州委书记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参加作家协会去，到那里编故事，供傻子们阅读吧……"①

还应指出，我们三十年代文学中并没有关于1933—1934年饥荒的"任何故事"，有关这一时期的饥荒一直到1956年我们的报刊都禁止提到它，三十年代许多人由于提到"南方饥荒"几个字就作为"反革命宣传"被逮捕。这一禁区至到现在才有一些作家在自己作品中敢于提及。米哈伊尔·阿列克谢也夫是这样描写那个1932—1933年可怕的冬天的："在富农后边从农村中走出去的是中农，但他们是自愿走的。不知由于谁的命令，所有粮食和饲料被运走了。马大批死亡。33年冬天——可怕的饥荒：整户的人死亡，房屋倒塌，街上没有行人，越来越多的窗户被逃到城里的人钉上木板……阿基木什卡的脸比锻铁炉还黑，只有那发出白光的眼睛引出人们的疑问：'这是怎么了？怎么回事，阿基木什卡？我们跟你走了，你是党的人呀？'阿基木什卡尽自己的力量答复，说上面会搞清楚的。斯大林会派人到维塞尔卡来，他会处分那些有罪的人——一切都会好的。但是什么人也没有来，而阿基木什卡这样的人幸好挺住了没有垂头丧气，劳动组合又慢慢地抬起了头。"② 214

B·Φ·坦德利亚科夫写道："彼得拉科夫斯卡亚村的牲口因没有饲料都死亡了，人们吃的是荨麻草和湖荻做的面包，独活草做的蒸粥。不光在彼得拉科夫斯卡亚是这样。整个国家处在1933年饥荒年之中。在区中心沃霍罗弗城的临近车站的街心小公园里从乌克兰迁出的富农在那里死亡。早上的时候在那里看见死人已成惯例，医院的马夫阿布拉木坐车到这里来收尸体。有些人没有死，

① 《真理报》1964年5月26日。

② 米·阿列克谢也夫：《面包是一个名词》，载《星火》杂志1964年第1期第37页。

他们在满都是尘土的小巷里拖着因水肿而变得象大象腿那么粗的没有血色的发蓝色的腿，用狗般的乞求的眼光探索过路的人。但沃霍罗弗人没有给他们什么，他们自己为了得到购货卡上的面包从晚上就开始排队。这就是 33 年……"①

克·伊柯拉莫夫在自己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描写了 1933 年几十万饥民从中亚细亚各地涌向塔什干的情况。所有车站拥挤不堪，人们绕过哨卡进入城市。消瘦不堪的人们在街头上流浪，许多人死在街头。

苏联著名作家瓦·格罗斯曼在他死后国外出版的小说中描写南乌克兰饥荒的悲惨局面：

"粮食往外运，运粮时，白天黑夜到处是尘土飞扬……人们六神无主了，连牲口都变得野了，总是恐惧，乱吼，狗半夜里唔唔地叫。土地龟裂了。后来秋天来了，不断下雨，接着是多雪的冬天。没有粮食，在区中心也无法买到粮食，因为实行粮食配给制。在车站货亭里也买不着面包，因为武装的哨兵不让进去。不用购货卡的面包不供应。

215

秋天起大家开始吃土豆，没有面包，土豆很快吃完了。圣诞节前开始屠宰牲口，没有什么肉，全是骨头。当然鸡也全杀了。肉很快就吃完了，但是牛奶，一滴也没有了，全村一个鸡蛋也见不着。而主要是没有粮食，颗粒没有剩，全拉走了。春播没有办法进行，连种籽全给拉走了。希望寄托在秋播作物，现在是在雪底下，春天还没有影子呢，可是全村饥荒已经来临。肉吃光了，黍米吃得一干二净，人口多的家庭土豆也吃光了。一片恐怖。母亲们看着孩子，怕得喊叫起来……怎么办？……夜里醒了，周围静悄悄，没有人声，也没有手风琴声。活象坟地一样，只有饥荒满村转，不睡觉。孩子们从早就哭个不停，要吃东西。母亲们给他们吃什么？雪？谁也帮不上忙……但是冬天真正的饥荒还没有到来。当然大家没有精

---

① В·坦德列亚科夫：《死亡》，载《莫斯科》杂志 1968 年第 3 期第 37 页。

神了，因吃土豆皮肚子鼓起来了，但是还没有全身肿。后来从雪底下挖起橡实子，把它烤干了，磨坊主人大转他的磨盘，把橡实子磨成粉，烤成面包，正确地说是烤成饼吃。橡实子面比大麦面还黑，但这也很快没有了。橡树林很少，二个村子都涌到这里来了。可是国家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发给饥民，他们吃的可都是农民种的粮食。难道斯大林不知道这些？所有的道路都设有哨卡——军队，民警，保安部门，不让饥民从农村出来，城市进不去，车站周围都是守卫队，连小车站都有守卫人员……

开始融雪的时候，全村真的全挨饿了。小孩不睡觉，连夜里都要吃的。人们的脸如土色，眼睛也昏了，和喝醉了一样……饥饿在折磨人们。人们已不多走路，总是躺着。他们有着幻觉，好象车轮响了，斯大林从区中心送面包救孩子们来了。妇女比男人更能坚持，活得更顽强。可是她们的负担更重——孩子们向母亲们要吃的。有些妇女亲吻着孩子，劝他们说：'呵，忍着吧，不要喊了，我从哪里弄吃的来？'另一些妇女和疯子一样，骂孩子：'别叫，弄死你！'她们随手拿到什么就用什么打孩子们，只要他们不再要吃的就行……猫，狗全没有了，全杀了。把猫狗也煮了，煮了头做肉冻吃。雪融化了，人们饿得全身浮肿，脸肿了，腿和枕头一样，肚子里浮水，不断小便，都来不及到院子里去。孩子们的头和铅球似的，脖子细如同仙鹤，能看得见手和脚上的每块骨头在皮肤下面活动，整个骨架子好象被黄色纱布包起来一样。小孩的脸衰老不堪、筋疲力尽、和七十岁的老头一样，青春时期已不成为脸了，不是人的脸，只有眼睛，上帝啊！斯大林同志，我的上帝，你见过那样的眼睛吗？也可能，他真不知道，他不是写了一篇关于冲昏头脑的文章吗……

216

全村一个接一个地死亡，起初是小孩和老人，后来是中年人。一开始还埋起来，后来也不埋了。死人就在街上，在院子里，最后的人在房子里扔着。全村安静了——全死光了。"①

---

① 瓦·格罗斯曼：《时过境迁》。在苏联只有打字稿流传。

作家阿·科斯捷林写道："1933—1934 年到村镇去很可怕，我在那时到过斯塔夫罗波尔州，顿河，库班河和捷列克河流域，到过萨拉托夫、奥伦堡、加里宁各州的几十个村庄。到处是门窗关闭，院子空空的，田野里是被扔了的农具，和可怕的死亡，特别是小孩的死亡。

田野和自留地无人管，长满野草。库班的哥萨克人讽刺说：我们村庄边上的野草里有狼了。

……人们都象傻了。在普罗赫拉德纳亚村我和农场的积极分子们都百思不解下面的一件事：一个妇女把小麦砌在炕内，可是她饿死在这个炕上。

217 我在斯塔夫罗波尔的路上遇到一个背包袱的农民。我们停了下来，互相打了招呼，抽起烟。我问他：同志，到那里去？

'到监狱去'。

我因惊奇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是看着他。他约 40 岁，生着农民的普通的胡子。（我们那时叫这样的胡子是'加里宁式'的）这个汉子慢慢抽烟，十分淡漠地说：我是中农，由于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和反对上面来的全权的代表，村的骨干按第 58 条 10 节（反动宣传）判了他 10 年徒刑。村里的民警不愿意也没有时间送他到斯塔夫罗波尔，所以他自己一个人去。

从表面上他对自己的命运是无所谓的，但实际上他有自己的农民的聪明的打算，在监狱里他不至于饿死。那时村里成百成百人地饿死。"①

我们知道，斯大林那时对饥荒的消息是置之不理的，当几千万的苏联农民挨饿的时候，并至少有三百至四百万人被饿死时，斯大林仍坚持把粮食输出到欧洲国家去。1928年出口的粮食不到一百万公担，1929 年为一千三百万公担，1930 年为四亿八千三百万公担，1931 年——五亿一千八百万公担，1932 年——一亿八千一百

① 未发表的手稿。

万公担。甚至在饥荒最严重的1933年还出口一千万公担粮食。[①]这时欧洲正处在经济危机，所以苏联的粮食实际上廉价出售。可是1932—1933年出口粮食的一半就足以把我国南方各省从饥荒中挽救出来。

西欧各国的人们在安详地吃苏联粮食，这是从我们的挨饿的和饿死了的农民口里夺过去的。有关俄国发生饥荒的一切消息，无论是苏联宣传机构，还是官方人士都予以辟谣。就连英国著名戏剧家肖伯纳三十年代初期在苏联旅行后回到西方说：俄国发生饥荒的消息是谣言，他可以证实，俄国的粮食供应在他旅行期间比任何时期都好。 218

这就是那个被"左"派反对派批评为"农民倾向"、"农民意识"，有时还称为"农民神"的人，他对我国农业毫无能力和冒险主义的领导的悲惨结局。

六、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

在苏联的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在文学作品中，对于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严重错误和滥用权力行为已经有过多次批判。

比较起来，对我国工业化的方法问题，特别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却研究得很少。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如果说斯大林在农村中确实犯了不少错误和歪曲了政策，那么在城市中建立工业基础方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已经可以指出，对斯大林在工业化方面活动的这样的评价是不对的。

当然谁也不会否定我国人民在联共（布）的领导下二十年代后半期和三十年代初在建立现代工业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所有的党组织在这期间确实作了巨大的工作。仅

---

① 《苏联农业》，载1935年年鉴，莫斯科1936年版第222页。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了将近一千五百个大型企业，其中有德聂伯水电站，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和库兹涅茨克钢铁公司，乌拉尔
219 机械厂，罗斯托夫农业机械厂，切利亚宾斯克、斯大林格勒和哈尔科夫拖拉机厂，莫斯科和索尔莫沃汽车厂，乌拉尔化学机械厂，克拉马托尔斯克重型机械厂等。正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建立了沙皇俄国所没有的新工业部门的基础：机床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拖拉机制造业，化学工业，发动机制造业，飞机制造业，重型轮机和发动机、特殊钢、钢合金、合成橡胶、氮气、人造纤维等的生产。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成千公里的铁路和运河开始通车通航。在原沙皇俄国的民族边缘区建立了工业基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外高加索和中亚细亚、哈萨克斯坦和鞑靼利亚、北高加索和布里亚特蒙古。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工业基地扩大了。在东方开始形成我国第二个钢铁和石油工业基地。这时期我国出现了成百的新城市和工人村。这为苏联进一步发展工业和巩固国防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大家知道，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在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在制订和实现党的技术政策方面党的许多活动家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菲·埃·捷尔任斯基、谢·米·基洛夫、弗·弗·古比雪夫、格·康·奥尔忠尼启泽、扬·厄·卢祖塔克、弗·雅·邱巴尔、伊·德·卡巴科夫、格·列·皮达科夫等等。斯大林为在苏联建立现代化工业巨大工作中也贡献了自己一定的力量。但现在已经应该指出，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不仅在农业集体化方面，而且在工业化方面常常不象是一个有头脑的国家活动家，而象是一个唯意志论者和空想家。所以在许多情况下“斯大林的领导”不是引向胜利，相反，在我国制造了多余的困难。

这里，我们基本上根据近年发表的材料分析一下第一个五年
220 计划期间斯大林作为工业建设的领导者的活动。

大家知道，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1928/29—1932/33)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了两个方案——“基本方案”和“最佳方案”，而前

者指标比后者的指标低百分之二十。

国家计划委员会在研制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最佳方案假定的条件是：1)在此期间农业不发生大规模的歉收；2)和世界经济更为广泛的联系，主要靠增加出口资源，特别是靠大量增加设备和技术援助方面的贷款。此计划需要有两个方案也因为我们的计划机构还没有制订长期计划的足够的经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是有条件的纯粹是大体上的、初步性的。在五年计划进行中确实出现了1928—1929年很难预料到的各种新情况(特别是普遍集体化)，而这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带来了许多复杂因素。因此，计划的两个方案同时存在是有道理的，也是必然的，而这当中主要的应该是初步方案。但是，在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过程中初步方案的许多拟定数字被看成是对"右"倾的让步。中央委员会实际上要求各级党组织完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就是最佳方案的指标。

1929年4月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和苏维埃第五次大会最后通过了五年计划的最佳方案后，全国展开了实施五年计划的巨大工作。苏联人民以极大的热情克服了许多艰难困苦，建立了新的厂矿，电站，油井和铁路。

221

但是，在前两年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实现最佳方案的一些重要条件还没有成熟。资本主义国家设备和技术援助方面的贷款并没有显著增加，苏联出口也没有增加多少。相反，由于1929—1930年席卷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和农业危机，我们的国家遇到了出乎预料的巨大困难。国外市场上原料价格狂跌。因此，苏联为了从国外购买机器而需要从国内出口比五年计划估价的加倍或加一倍半的商品。同时，1929—1930年农业产品总产值低于1928年。所以毫不奇怪，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和热情虽然如此空前高涨，但不是所有领域内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果都是顺利的。例如，1929年生铁和钢的产量只增加了六十至八十万吨，比1913—1914年水平略高一些。1929年的拖拉机产量仅仅三千三百台。轻工业

和食品工业的产量的增长也很缓慢。

我国国民经济的最薄弱环节是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

在这种情况下，刚刚通过的最佳方案的完成受到了威胁。所以有必要把控制数字从最佳方案降下来，甚至要求党和经济组织实现基本方案，而不是最佳方案。但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不是采纳这些理智的和符合实际的建议，而是突然建议人民委员会议通过比原来多数控制数字还高几乎一倍的任务。这些建议完全不符合实际、是冒险主义的，但是斯大林坚持通过他们的方案。

222

斯大林1930年6月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讲到此问题时说："中央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在加快速度和缩短期限方面修改五年计划并使它更加精确……下面举出中央根据提高建设速度和缩短完成期限的精神修改五年计划的几项重要决议。

在钢铁工业方面：五年计划预定生铁产量在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达到一千万吨；而中央的决定则肯定这个定额太低，认为应该把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的生铁产量提高到一千七百万吨。

在拖拉机制造业方面：五年计划预定拖拉机产量在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达到五万五千台；而中央的决定则肯定这个任务太轻，认为应该把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的拖拉机产量提高到十七万台。

汽车制造业的情形也是这样。五年计划原定在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生产十万辆汽车（载重汽车和轻便汽车），而中央则决定增加到二十万辆。

有色金属工业和农业机器制造业的情形也一样。有色金属工业的产量比五年计划初定数字增加一倍多，农业机器制造业的产量也比五年计划初定数字增加一倍多。

至于联合收割机的制造，就更不用说了。它根本没有被列入五年计划，而它的产量在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至少要达到四万台。"①

---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00页。

计划中的这种冒险主义做法引起了许多人的坚决反对，反对的不仅是在我们经济部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的非党专家，而且有许多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经济工作者。我们以后还会看见，斯大林是怎样对待那些被他指责为“进行破坏活动的”非党专家的。223 斯大林也粗暴地驳斥了党员中的批评者。当有色冶金总局局长阿·斯·沙赫姆拉多夫对有色冶金工业方面的惊人的新数字提出有根据和有说服力的批评时，他马上被撤职并下放到基层工作（后来被镇压了）。

当然这些镇压和威胁并不会使工业发展的速度加快。例如，本来规定1930年工业总产值增加的指标为百分之三十一至三十二。①但是根据中央统计局年鉴，实际上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规定1931年工业总产值的新指标增加百分之四十五，②实际上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1932年这数字降到百分之十五，1933年下降到百分之五。1932年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不得不放弃“为一千七百万吨生铁而奋斗”的口号，有色和黑色冶金及机器制造业方面的许多计划指标也不得不放弃。

大家知道，1933年1月斯大林宣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在四年零三个月中提前完成。还宣布，早在1932年工业产值就已达到五年计划的最佳方案所规定的1932—1933年度基本指标。根据斯大林在中央一月全会上宣布的材料，1932年底五年计划指标已经完成百分之九十三点七，而“甲”类工业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三点四。

由于1933年所宣布的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我国开始掀起相当规模的宣传运动。这次运动的许多参加者确实很诚恳地为取得的成绩而高兴。但是对斯大林来说，这次运动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问题在于正是1932—1933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危机年代。农产品的产量下降到最低水平，许多州出现了饥荒，工人的物质生活水 224

①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0页。

平也大大恶化。正是这一切迫使斯大林宣布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以证实人民所作出的巨大牺牲，这些集体化和工业化期间的牺牲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国民经济的实际需要，而是由于斯大林和他的一些助手的领导得很坏而引起的。

当然，我们的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所有产品的生产量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相对数字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经济干部队伍巩固了并取得了经验。但是前进的步伐并不象1933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一月全会所宣布的那样。

而首先不得不指出，斯大林所公布的1928到1932年期间总产值增加的数字不是太精确的。

大家知道，苏联最高国民经济会议所计划的工业总产值1932—1933年比1927—1928年度增加一点八倍，而重工业总产值增加二点三倍。实际上1932年底工业总产值和1927—1928年度相比只增加了一倍多一点，重工业增加一点七倍，比初定计划落后许多。按计划，日用品生产五年中应增加一点四倍，而实际上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①]

但问题还不仅在于这些总产值的指标。

225 今天我们很了解，光是总产值指标往往欺骗人和不说明问题到何种程度，应该用产品分类来说明，和补充其它许多经济指标来说明问题。

还应该说明，由于五年计划期间所积极推广的生产专业化，工业各部门的总产值在这些年代里经常并不因为实际产量提高而提高。这是由于同一个半成品的价值在计算中算了两次：第一次是计算在半成品企业活动之中，第二次是计算在把这类半成品变为成品的企业活动之中。

如果我们不仅按总产值，而是按实物指标来分析第一个五年

① 见《苏联工业》第12、13页，《苏联历史简明教程》第2卷《思想》出版社莫斯科1964年版第234页。

计划完成情况，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的成果远不是我们宣传机构所讲的那样大。确实如此，虽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发展重工业投入了巨额资金，虽然我国人民也尽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几乎所有的最佳方案的控制数字（按实物指标）都实际上没有完成。斯大林在第十六大讲的那些完全不切实际的任务更没有完成。下面我们举这方面的一些例子。①

上面已讲过，本来规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生铁的产量为一千万吨。斯大林1930年宣布把这任务提高到一千七百万吨，而1932年实际生产量为六百一十六万吨，甚至在战争前夕的1940年生铁产量只有一千五百万吨，直到1950年才超过了一千七百万吨。

黑色冶金其它指标的计划也没有完成。按五年计划最佳方案 226
1932年钢的产量为一千零四十万吨，实际上生产了大约六百万吨，钢材原定为八百万吨，1932年实际产量为四百四十三万吨。

按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控制数字电力生产在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应为二百二十亿瓩/小时，1932年实际达到的电力数字是一百三十四亿瓩/小时。煤和泥炭的生产量比控制数字少了百分之十至十五。石油开采量的情况好一些，1931年已达到两千二百四十万吨，比1932—1933年计划数字还高。但是后两年石油开采量又低下来了：1932年为两千一百四十万吨，1933年为两千一百五十万吨。

建筑材料生产也没有完成五年计划最佳指标。例如，1932年计划生产九十三亿块砖，实际生产只有四十九亿块砖。化肥生产情况更不好，计划生产八百——八百五十万吨，而实际生产量1932年为九十二万吨，1933年为一百零三万三千吨（其中过磷酸钙计

① 计划任务是按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于1928—1929年出版的三卷集的初定数字和联共（布）十六大材料。实际完成数字是按1956年后苏联每年出版的中央统计局的年鉴。

划生产三百四十万吨，1932 年实际生产仅达到十八万两千吨。）硫酸的生产也只完成了五年计划任务的约百分之三十。

机器制造业（包括农业机器）的许多重要指标也没有完成。原定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生产各种汽车十万辆，（1930 年斯大林宣布把这指标提高一倍。）实际上到 1932 年只生产了两万三千八百七十九辆，1933年——四万九千七百一十辆。直到 1936 年汽车生产才超过了十万辆。拖拉机生产计划数字五万五千台，1932 年实际完成的数字为四万八千九百台。至于斯大林所宣布的年产十七万台拖拉机的指标，不但战前没有达到，而且战后 10 年间也没有达到。斯大林提出的生产四万台联合收割机的完全不切合实际的数字更没有完成。马拉犁，拖拉机犁，播种机和其他许多农业机器的生产比最佳计划控制数字大大地落后了。

至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那么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业部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增长。例如：1928 年的棉织品产量为二十六亿七千八百万米，1932 年为二十六亿九千四百万米（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计划产量为四十五亿八千八百万米）。毛织品1928 年产量为八千六百八十万米，1932 年为八千八百七十万米（五年计划最后一年计划为两亿七千万至三亿米）。麻织品 1928 年产量一亿七千四百万米，1932年为一亿三千三百六十万米（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产量计划为五亿米）。食糖产量原计划要增加一倍，实际上 1932 年产量比 1928 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肉类和牛奶的产量比 1928 年也显著下降。

1932年国民经济许多重要部门（纸张、胶鞋，铁路运输额等等）的五年计划最佳方案的许多控制数字都没有完成。这些任务在1933年也大部分没有完成。

尽管计划的生产指标没有完成，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人数量的增加却比原计划的数字快得多。例如：此期间工人数量不是增加了三分之一（计划数字），而是增加了几乎一倍。① 这是

①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1967 年第 2 期第 53 页。

由于事先所没有估计到的因素造成的：许多重大工业项目建设时间迟迟不能完工；由于农村的严重形势大量农民流入城市；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计划没有完成。城市人口迅速增长造成了许多比例失调现象。1930—1932 年期间粮食生产虽然下降了，但是统一供应商品粮食的人数1930 年为两千六百万人，1931 年——三千三百二十万人，1932 年——四千零三十万人。① 228

几百万人从农村转到城市，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原来改善了，因为这基本上都是贫农阶层。自然，原失业工人的物质条件也改善了，因为他们都就业了。但是如果比较工人干部 1927—1928 年的生活水平，那么五年计划末他们的水平不但没有改善，而且是下降了。这当然和五年计划的任务相违背。根据十六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五年计划工业产品生产的增长要使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物质福利也不断改善，使苏维埃卢布的购买力水平不断提高。早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上可以找到提出的警告，反对“用侵犯工人阶级切身利益去实现节约”的任何企图。这种做法被看成是对党的政策的歪曲，对这些做法必须开展坚决斗争。②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也同样写道：“正确解决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决定着能够保障工人阶级福利改善的国民收入及其分配的增长……保障工资的提高，特别表现在其实际提高方面。”③ 这些重要指示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中都没有付诸实现。

例如，就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卢布行市下跌，私人市场上的价格上涨几倍。1929 年起对职工开始实行配给制，包括所有基本食品和许多工业品。开始设立议价商店，④ 在这里可以用高价买到稀缺商品。这一切导至职工实际工资的明显下降。历史学家 O·И·什卡拉坦根据列宁格勒的材料作了调查，他的计算表明， 229

①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1967 年第 2 期第 53 页。

② 《苏共决议案……》第 2 卷莫斯科 1954 年版第 297 页。

③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稿》第 2 卷莫斯科 1962 年版第 1450 页。

④ 即非配给制商店。——译者

1930 年所有部门的轻重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比 1928—1929 年低。从 1931 年起不再公布食品和工业品价格指标。① 这些商品消费额的缩小证明 1931—1932 年期间实际工资继续下降。只是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工资才开始回升，于 1960 年才达到 1928 年的水平。②

*　*　*

当然，按多数重要实物指标第一个五年计划没有完成，其中有许多原因，包括计划水平还不够高。还有一些客观原因，这些情况在制订计划的时候很难估计到。但是斯大林在对待发展我国国民经济许多复杂问题时所采取的错误的唯意志论态度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为我们工业提出一大堆过高的、显然无法完成的任务，这必然导致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浪费本来并不充足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归根到底不是加速，而是延缓生产发展速度。斯大林是一个“好大狂”，他不仅热心于建立巨大的没有生命力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而且还要建立巨大的工业企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许多情况下为建设这些企业还没有准备好相当的积累。其结果，这些企业的建设拖了很多年，他们很长时间不能开工，使巨大的物质财富长期被冻结。经常是这项或那项工程开了工，但是不得不因为资金缺乏而停工。

有关斯大林在我们经济中所使用的“大胆地”计划方法所带来的后果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只要举我国合成橡胶工业的发展历史就够了，第一批合成橡胶企业正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起来的。③ 大家知道，第一批试验性质的合成橡胶是于1931年 1 月制成的。接着提出建立一两个大工厂的问题。但是所有主要工程

---

① 根据Г·С·萨尔基阳书中的材料(《社会主义制度下实际收入增长的水平、速度和比例》，莫斯科1972年版第157页)，1940 年国家和合作社商业中的零售价格比 1928 年水平高 5.37 倍!

② 《苏联历史》杂志 1964 年第 3 期第 34—38 页。

③ 《历史问题》杂志 1964 年第 8 期第 38—39 页。

师和 C·B·列别捷夫院士(合成橡胶是根据他的方法制成的)提出对实际去实现这个计划没有把握。但是参加讨论的人急于尽快发展苏联化学工业决定建立一至两个合成橡胶工厂。但是使专家们惊奇的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政府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 10 个生产合成橡胶的大工厂。列别捷夫本人坚决反对一下子用如此大的规模搞还没有完全安排好的生产项目，因为其中许多问题还有待解决。化学委员会主席杨·厄·卢祖塔克也反对这十个工厂的建议。但是斯大林拒绝考虑这些合理的意见。于是开始找厂地，运输建筑材料。本来很不富裕的资金分散到十个项目上。1932—1933 年终于在三个工厂里开始生产第一批合成橡胶,但是其它工厂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都没有开工。巨额资金长期被冻结。

231

斯大林这类外行和冒险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使本来就很复杂的工业化遇到了更多的困难。

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回忆中叙述列宁和斯大林在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上的不同作风和整个会议气氛都绝然不同。著名的苏联经济工作者Ю·弗拉克谢尔曼写道:“列宁从来不会用自己的很高的威望去压服人。在人民委员会议上是一片同志式的气氛，大家觉得很自由。在讨论过程中经常提出一些和列宁不同的意见,他注意听取,并抓住其健全的思路以修正自己的建议。

我还记得我一次不成功的发言。正在讨论劳动和工资法案。列宁不喜欢其中一项提法。他很想把这一项内容提得细致一些，但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找不到适合的表现形式。伊里奇耐心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当所有同志都发表了意见，而所需要的方案还没有找到,我以为自己找到了所需要的方案,所以我请求发言。伊里奇很高兴地欢迎我的提议。当我讲完自己的方案,伊里奇甩了手说，

‘您说的还是那个意思,只是语言不同罢了’。

同样，我永远忘不了和这完全相反的中央的一个由斯大林主持的会议。那是在 1931 年。正在讨论的是一个新的大工业公司

的组成和布局问题，其中电力起很大的作用，所以叫我参加了。这时我已是电力工程师，是'电力中心'的副主席。会是白天在人民委员会议厅开的。我坐在旁边挨着窗户，这是我在列宁时代(1918年)通常坐的位置。委员会的委员，奥尔忠尼启泽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们都坐在长桌旁。斯大林抽着烟，来回走着。

发言的主要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们。后来斯大林发言了。他坐在主席旁边，面向长桌。讲话声音很低，许多地方听不清楚。一开始大家把手放在耳边，但还是听不清楚。后来大家都伏在桌子边上，想听清斯大林的话。整个发言过程中，大家都保持这种姿势。当他发完言，会议宣布结束，因为最后的真理已说出，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

这和列宁时代多么不相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和同志们商量，也解释，讲清楚自己的建议，力图使大家不仅通过，而且懂得了它们。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志式的集体劳动成果。"①

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我国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工业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如果有一个更明智的计划和领导，就不会这么大，在这方面斯大林的领导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把我们的人民为了工业化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同工业化初步结果比较的话，那么应该承认，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话，我们的成就可能会大得多。

① 《新世界》杂志1969年第11期第225—226页。

第四章

233

三十年代初期国内外形势的尖锐化。斯大林的新罪行及个人迷信的加强

一、苏维埃政权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集体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严重错误和失误导至劳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下降，工业中心的食品和工业品供应被破坏了，城乡联盟削弱了。城市里又重新实行了严格的定量供应的配给制度。这一切不能不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

很难把这些错误和缺点记在富农和"富农帮手"的帐上。人们自然会想到：斯大林会再找一个"替罪羊"以承担他在工农业方面所造成的一切罪恶。果然如此，革命前就已形成了的俄国(和乌克兰)知识分子队伍里面的那些专家们就成了斯大林的这个替罪羊。

众所周知，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还有不少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被称之为旧知识分子和被十月革命推翻了的剥削阶级的代表——在苏维埃的经济机构中、工矿企业中、科研机关和学校中、农业机构中、苏联国家计委和统计局里工作。

234

列宁写道："我们只能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材料来建成共产主义，只能用资产阶级环境培植的因而必然渗透着资产阶级心理(如果谈到作为文明机构一部分的人材的话）的文明机构来建成共产主义。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困难就在这里，但可能建成和胜利地

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保证也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也就在于后者不愿意用血腥的、肮脏的、掠夺的、商人的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大批人材来建设新社会，而愿意用在特别的温床和暖房里培养出来的特别仁慈的人物来建设新社会。"①

列宁还指出："如果我们的一切领导机关，无论是共产党、苏维埃政权或工会不能象我们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还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②

1918 年底列宁看了亚·伊·托多尔斯基著的小册子《持枪和扶犁的一年》（本书是在维谢冈斯克城出版的）后，对在重建锯木厂和皮革厂时如何吸收三个维谢冈斯克商人参加恢复工厂的工作一事很感兴趣，而且还特别注意到该书对这一措施所做的结论：

"仅仅战胜和消灭资产阶级是不够的，这不过是事情的一半，我们还必须强迫他们为我们工作。"

列宁后来在1922年说："看，这是多么精采的话呵。这句精采的话说明，甚至在维谢冈斯克这样的县城，甚至在 1918 年，对胜利的无产阶级和被战胜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就有了正确的认识。

235

我们痛打了剥削者的双手，使他不能为非作歹，甚至致他于死命，这还只是事情的一半。可是在我们莫斯科，在一百个负责工作人员里，大约有九十个都认为，问题仅仅在于致剥削者于死命，使他不能为非作歹，痛打他的双手，如此而已……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甚至在 1918 年，当那位维谢冈斯克的同志说到这一点的时候，这还是事情的一半，而现在连事情的四分之一都不到了。"③

可是斯大林恰好就是属于这种负责的干部，即认为"问题仅仅在于致剥削者于死命，使他不能为非作歹，痛打他的双手，如此而已"。斯大林作为政治活动家的这些极端严重的缺点不能不对二十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8 卷第 367 页。

②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591 页。

③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638 页。

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城乡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方法以明显的影响。

不出所料，党向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进攻和人民物质生活状况的恶化引起了国外各种反苏组织和苏联境内地下组织的反革命活动的抬头。不仅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组织和派别活跃起来了，而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国外总部及国内的地下委员会也活跃起来了。所有这些反苏组织、派别和委员会不但得到了富农和耐普曼分子的支持，而且得到了一部分在苏联政府、经济及其他部门工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必须取缔我们敌人的一切反革命活动。但同时又要尽力使旧知识分子和专家的基本队伍继续忠实于苏维埃政权，使他们能够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大力。遗憾的是，斯大林当时的镇压又远远超过了客观的必要性和具体情况所提出的理智的要求。为了把工业化过程中错误和失误的责任全推到"资产阶级专家"身上，斯大林及其一些亲信于二十年代末开始实行败坏和摧毁相当一部分非党专家的政策。

238

在这次运动中，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所审理的政治案件具有独特的地位，而今天这些案件不能不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极大关注。

二、1928—1931年的政治审讯案

大家知道，早在1928年在莫斯科在安·亚·维辛斯基主持下进行了所谓"沙赫特事件"的公开审讯。出庭受审的基本上是煤炭工业部门的工程师，其中大部分是旧专家。他们的罪名是：制造矿井事故，搞破坏活动，同原矿主保持罪恶的联系，购买无用的外国设备等等。指控材料说：这些破坏分子的活动资金是由国外白党中央提供的。审问时部分被告人承认了所有对他们的控告，但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有罪或者只承认部分被指控的罪行。五十三名

被告人中有四人宣判无罪，四人缓刑，九人被判一至三年徒刑，多数人被判四至十年徒刑，十一人被判死刑，其中五人于1928年7月被枪毙，对其余六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可以从轻判决。

237 那么，这个判决究竟是否有根据？关于"沙赫特案件"的整个控告结论是否正确呢？

老布尔什维克A·M·杜尔马什金有一次在集中营里遇见一位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干部，这个人于1937年被判了十五年徒刑。他对杜尔马什金说，"沙赫特案件"的大部分罪名是捏造的。作家B·T·沙拉莫夫被监禁时遇到过两名与"沙赫特案件"有关的专家：波雅雷什尼科夫和米列尔。他们对他说，早在1928年的审讯中就开始采用"车轮战"(即"长时间站立")，关酷刑牢房①，关热地板或冷地板牢房等卑鄙手法，逼着很多被告人招了假口供。

原孟什维克党员B·勃罗茨基，从二十年代末一直被关到1956年。他在写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我遇见无数被指控为搞破坏的人，也遇见很多曾指控别人为搞破坏的人，他们全都否认哪怕是个别事件是专家们有意搞的破坏。他们说生产中的确有过工人(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工人)直接破坏机器的情况(往轴承里撒沙子等)，就是这些事件也可能是由于无知或不会使用机器而造成的。我碰上的专家都说，事故(包括顿巴斯地区)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急于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指标；非专家领导者的外行作风；工人(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工人)的技术水平低下。"

老契卡人员苏·奥·加扎梁曾长期在外高加索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局工作。三十年代初期他在经济局担任领导工作。他说，敌人的反苏斗争的形式和方法中有搞破坏活动这一手段，但并不

238 普遍。至于所谓资产阶级专家整个阶层实行有意破坏这种情况，

① 指一些使用特殊刑罚的禁闭室，如橡皮禁闭室等。——译者

从来没有过。① 加扎梁对本书作者说，1928 年在顿巴斯确实出现了罪恶的经营不负责任，它造成了许多重大事故（矿井被淹没，矿井爆炸等）。从中央到地方的苏维埃政权机构和经济机构还不健全，这些机构中有不少人得势一时，对工作极不负责任，在一些经济和苏维埃机关中贪污、盗窃、轻视劳动人民利益的情况盛行。对这些罪恶行径，当然要按苏联法律严励制裁肇事者。也不否认1928 年在顿巴斯可能有个别的破坏分子。但大多数关于破坏活动及勾结国外反革命组织的控告是在审判过程中强加在各种刑事犯罪上面的（盗窃、行贿、经营不负责任等等）。这种做法是为了"发动群众"，"激起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提高他们的警惕性"。当时侦察人员也是出于这种"思想动机"搞了这些假案。

然而斯大林显然不想周密考虑"沙赫特案件"的一切细节。相反，他急于"总结"此案件的教训并向党员号召在各级苏维埃和党的机构中寻找"沙赫特分子"。斯大林在 1929 年 4 月的中央全会上说："决不能认为所谓沙赫特事件是偶然的。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业部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其中很多人已经落网，但是远没有捕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这种暗害活动所以危险，尤其是因为它和国际资本有联系。资产阶级的暗害活动毫无疑问地证明：资本主义分子还远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正在积蓄力量来进行新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发动。"② 239

---

① 苏联一个较著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新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尼·乌斯特利亚诺夫 1930 年在哈尔滨（满洲）出版的《在新时期》一书中写道："破坏是一种荒谬的、卑鄙的，极其可恶的犯罪和叛变行为，是公开转到反苏、反俄立场上去，现在就连侨居国外的米留可夫也不再为它辩护了。让那些'转换路标派'分子为这种行为负那怕是微小的和间接的责任，这只不过是破坏分子自己的愚昧无知和肆无忌惮的蛊惑宣传而已。至于那种消极中立，在我们看来也应该予以无条件的原则的指责。对科技知识分子来说，靠边站，放弃积极的活动……不去帮助国家的伟大改造，也是不对的……"乌斯特利亚诺夫给自己的信徒，在苏联工作的"转换路标派"专家以极明确指示："老专家应该怎么办呢？答案只有一个：保持对国家的忠诚，尽力帮助它……"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15 页。

毫不奇怪，在这类指示后，对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迫害更加强了。例如，1929 年乌克兰进行了对“乌克兰解放联盟”的公开政治审讯。著名的历史学家米·谢·格鲁舍夫斯基（没有被捕）和乌克兰科学院副院长 С·А·叶弗列莫夫被宣布为这个组织的领导者。他们被指控为推行和保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文化。然而这一条并不够构成进行法律追查的理由。不仅如此，对他们提出的另一条相当模糊的指控是他们在发展民族的乌克兰语言，术语学，正字法和字母表方面从事“破坏活动”。而对这个神话般的组织的主要指控是：他们根据“一些国家暗探组织的任务进行间谍工作”，并同波兰签署秘密联盟使乌克兰脱离俄国。根据老布尔什维克阿·弗·斯涅戈夫（当时在乌克兰工作）的证实，这件事是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人弗·巴利茨基由于斯大林的要求而组织的，其中有许多环节是很值得怀疑的。乌克兰某些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确实很严重，但是说他们和波兰有秘密联盟当然是荒谬的。

240

1930 年又宣布在苏联发现了新的反革命组织——劳动农民党。原临时政府粮食部长的同事经济学教授 Н·Д·康德拉捷也夫，经济学家 Л·Н·尤罗夫斯基和 А·В·查雅诺夫，有名的农学家 А·Г·多雅连科等人被宣布为这个党的领导人。据报导，劳动农民党在莫斯科有九个主要地下组织——农业合作社系统、农业信贷系统、俄罗斯联邦农业部、财政部、《贫农报》、农业科学研究所、杰米利亚泽夫农业科学研究院等。此外，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资料，劳动农民党联合了地方许多地下组织，特别是各种农业机构和原富农及社会革命党人。这个地下党的人数被说成为十至二十万人。

在新的地下党被“发现”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各机构开始准备大的政治案件的审理工作。其中，准备了大量的口供，审讯时拟定吸收许多人，主要是农技师和合作社工作人员。整个准备工作已经结束，但是斯大林不知因什么原因改变了主意，公开审讯没有

进行。对被捕的“劳动农民党的领导者和成员”的审讯是秘密进行的。在报刊中点名批判的不是劳动农民党成员的具体事情，而是这批莫斯科教授的理论观点和著作。

1930年秋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宣布发现了在主要食品，特别是肉鱼菜供应系统中的破坏性的间谍组织。政治保卫总局宣布，这一组织是以原地主A·B·梁赞采夫教授和原地主E·C·卡拉 241 蒂金将军及其他一些原贵族、工厂主、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为首的，这些人“钻进”了苏联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商业人民委员部、肉类联合公司、鱼类联合公司、果品蔬菜联合公司等类似组织。据报纸说，这些破坏分子破坏了许多城市和工人村的食品供应，在国内一系列地区组织了饥荒，同时肉类涨价，罐头质量差等责任也应由他们负责。所有提交审判的四十六人被秘密法庭判处了死刑。

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莫斯科举行了新的公开政治审讯，这次被控告的是一批有名的技术专家，他们的罪名是搞破坏活动和反革命活动，这就是所谓的“工业党”案件。

主持审讯的是维辛斯基，成员是B·П·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B·Л·李沃夫，П·A·伊万诺夫，国家起诉人是尼·瓦·克雷连柯和B·И·弗里德贝尔格。辩护人是И·Д·布劳德和M·A·奥采普。

被控告为进行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的共八个人：列·康·拉姆津——热工学院院长，热工学和锅炉制造问题专家；B·A·拉里切夫——国家计委燃料部主席；И·A·加林尼科夫——国家计委生产部副主席，空军学院教授；H·Ф·查尔诺夫斯基——国民经济委员会科技会议主席，教授；A·A·费多托夫——纺织学院科研委员会主席，教授；C·B·库普列雅诺夫——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纺织部技术主任；B·И·奥奇金——国民经济委员会科研部副主任；K·B·西特宁——工程师。

据称，这些人是所谓在二十年代末建立的地下“工业党”的领导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党的任务是组织暗害活动和间谍活动及怠

工，还要援助帝国主义入侵和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准备工作。
242 “工业党”党员的总人数被宣布为连地方组织在内约两千人，主要是高级技术知识分子代表。

审讯过程中所有被告都承认自己有罪并主动交代了最不能想象地破坏和间谍活动的细节，有关自己同俄国国外“工商联合”组织的联系，同在莫斯科的外国使团及与昂·彭加勒的来往。在进行审讯时，我国所有机关和组织都纷纷召开集会和会议，参加者都要求枪毙“工业党”领导者们。法院考虑到这些要求判处多数“工业党”领袖以死刑，但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减刑，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

在“工业党”审讯过程中及此后整个西方的资产阶级报刊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苏运动。法国的首脑昂·彭加勒也在《至上报》(Экс-цельсиор)发表了专门声明。彭加勒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在公众面前大叫大嚷地开始对一批俄国人的审讯，给这批俄国人起名叫‘工业党’，并指责他们在法国和英国的协助下从事什么反苏俄的阴谋。我不知道，拉姆津教授和‘工业党’其他成员是否组织了反自己政府的阴谋，我不是接受他们忏悔的牧师……但是我应该重复声明，无论是白里安还是我，还是法国总司令部无论在1928年还是早一些或晚一些时候对‘工业党’的什么真的或假的计划是一无所知的，因此，我们任何时候没有支持过和鼓励过他们。……至于我自己，在弗兰格尔进行远征的时候就公开谴责了这类做法，认为这是空想的和危险的做法。只要看一下1920年12月1日的《世界新闻》杂志，就会看到我的谴责是相当强硬的。……如果我事先知道所谓‘工业党’的打算，那么我无疑会认为这一冒险行为比弗兰格
243 尔的事还危险。我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参加这样的冒险行为。我很想别人告诉我，俄国的阴谋者在什么样的秘密场合同相貌和我一样的人商谈过，那个人受了谁的委托接见了他们。我首先想知道，我们法国总司令部的这一假想出来的计划是什么样的，并给我指出，那个所谓的进攻计划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打

算进行的。”

还应该说明，彭加勒这个声明的全文（和其它类似的声明）在《真理报》上发表了①，在审讯过程中当众公布过，并归入档案。这显然是为了表明我们法院的客观性。1930年对苏联法庭的信任在我国内还没有什么动摇。所以象彭加勒这样的法国帝国主义者的著名代表反对“工业党”的声明在当时被苏联人看成是这个阴谋实际存在的证据，而不是否认这个阴谋的证据。

在“工业党”审讯几个月之后，1931年3月莫斯科又进行了一次公开政治审讯——所谓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的“联盟局”案件。被告人是弗·古·格罗曼——国家计委主席团成员；瓦·弗·舍尔——国家银行管理局成员；尼·尼·苏哈诺夫——文学家；A·M·金兹堡——经济学家；米·彼·雅库波维奇——苏联商业部供应部副主任；弗·康·伊科夫——文学家；伊·伊·鲁宾——政治经济学教授；等等，共十四人。

主持这次审讯的是尼·米·什维尔尼克，成员是B·П·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和马·康·穆拉诺夫。国家起诉人是尼·瓦·克雷连柯和Г·К·罗金斯基，辩护人是И·Д·布劳德和Н·К·柯莫多夫。

被告人多数早在1921—1922年就退出了孟什维克党并担任经济和计划机关的重要职务。但是据控告结论说，所有被告人在二十年代末秘密加入了孟什维克党并组成为这个党在我国的领导总部。 244

“联盟局”被指控为进行暗害活动，特别在制订国家经济计划方面。如果相信控告结论的话，那么被告人为了拖住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不断地压低所有计划指标。控告结论还说，孟什维克和“工业党”及“劳动农民党”签订秘密联盟，为入侵苏联和在我国领土上举行武装暴乱做准备。与此同时，这个反革命联盟的个别参加者

---

① 《真理报》1930年12月3日。

根据协定承担这样的任务："工业党"负责和那些准备进行武装侵犯的国家的政府和总司令部进行预先谈判；为了进行破坏性的恐怖活动把工程师组织成为突击队；在工农红军最高指挥部个别人的参与下组织军事阴谋活动。"劳动农民党"承担组织农民起义和闹事，供应起义者的武器和装备，腐蚀那些派去镇压闹事的红军队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盟局"承担在城市组织公民近卫队，用来夺取政府机关并成为新的反革命政府的最早支柱。

关于"联盟局"控告结论和其它审讯材料广泛阐述了这一事件，并完全肯定地暗示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中的反对派之间的联系，首先是和托洛茨基派及右倾之间的关系。有些口供直接指向达·波·梁赞诺夫，他在三十年代初担任联共(布)中央马恩列研究院院长的职务。

245

"联盟局"审讯中的所有被告人都承认自己有罪，并详细交代了自己"暗害"活动的所有细节。在一次开庭会议上尼·瓦·克雷连柯宣布了——当然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客观性"——国外孟什维克党的领导对莫斯科进行的政治审讯发表的专门声明。其中说：

"……1)针对我党所提出的指责，说它进行了甚至组织了'暗害活动'，说它和俄国资产阶级反革命组织建立了联系，从这些组织那里得到货币援助，并以帝国主义强国对俄国进行武装侵犯为自己工作的指针，——所有这些指责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众所周知的立场和政策形成了明显的矛盾，每一个真诚的人会明显看到这些指责的造谣性质，这一点第二国际执委会已公开宣布过。

2)布尔什维克不能容忍苏联存在任何其它政党，所以我们的党失掉了合法存在的任何可能性，因此它不得不和沙皇时代一样通过地下组织进行宣传，在苏联是由中央局领导的。但是这个局从来不是由正在莫斯科受审的那些被告人所组成，这十四人是布尔什维克任意地把他们堆在一起的。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十年或十几年以前就离开了我们的党，后来一直没有回来过，其他的人从未加入过我们党。所以如果格罗曼、苏哈诺夫和舍尔确实宣布自

已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局'，正如控告结论所说的那样，那么他们的口供只能被理解成是为了挽救自己而不得不编出来的谎言。在1928年以前和以后我们真实的'局'是完全由另外一些人组成。无论是格罗曼，苏哈诺夫还是舍尔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个局，也不可能进入这个局……” 246

这个孟什维克国外代表团声明被宣布以后，被告人在法庭主席的建议下发言，否定了这个声明，再次证实自己原来的口供。

几天后法院决定所有十四人被判处五至十年监禁。

三、1928—1931年的政治案件是假案

遗憾的是，就是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后，关于1928—1931年政治案件问题的许多书刊、文章和党史教科书还是保留了1935—1940年时期的观点。

例如，在Д·Л·哥林科夫的长篇著作《文献概述》中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盟局"确实有此组织。他写道："1928年初，根据孟什维克党国外中央的指示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联盟局'"。接着，作者用很大篇幅讲述控告结论和口供的内容。①

关于1928—1931年政治案件的情况，C·A·费久宁的书讲的和上述内容差不多。②

费久宁在第一部分里用丰富的材料令人注目地分析了列宁对资产阶级专家的政策，这和该书的第二部分形成了使人莫明其妙的矛盾，在第二部分里他突然转述起二十年代末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专家转到反革命和暗害的立场上去了。

在苏共党史教科书第3版③中(鲍·尼·波诺马廖夫领导的 247

---

① 见《历史问题》杂志1968年第2期。

② C.A.费久宁：《苏维埃政权和资产阶级专家》莫斯科1965年版。

③ 《苏共历史》莫斯科1962年版第415页。

集体编著）和前两版一样，把“工业党”、“劳动农民党”和“联盟局”说成确有这些组织，说他们曾从事暗害和间谍活动。

显然，现在还象上述历史学家那样写作，只能是因为他们对待材料和文件，包括在1928—1931年我们自己苏联报刊所公布的材料（介绍这些材料毫不费劲就可以做到①）——采取了毫无批判的态度。

看了这些正式文件和材料给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在读了这些审讯记录，控告结论，起诉人和辩护人的讲话，报纸和刊物的文章，使人坚信，这些材料中的绝大部分是有意捏造的。

例如，和“工业党”有关的所有材料很值得怀疑。从控告结论起就可以看出矛盾，特别是在解释被告人为什么要建立反革命组织时。控告结论中说，促使被告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几乎所有总部的头子在革命前或者自己是大工厂主、资本家，或者是在大工业家下面任领取高工资的重要职务。但是审讯过程证明，八个被告人中没有一个在革命前是大资本家，甚至连资本家的儿子也不是。他们出身于手工业者、农民、职员、中等地主家庭。只有三个人革命前在私人工厂里工作过，而拉利切夫只工作了三年。控告结论还说：“建立反革命组织的出发点之一是旧工程师的政治观点，他们通常是动摇于革命立宪党观点和右派保皇党观点之间。”但是这样的断言没有被审讯所证实。八个被告人中只有费多托夫一人有较明显的革命立宪党观点。其余的人很少过问政治，有些过去参加过社会民主工党。连克雷连柯都不得不说有一些被告是

248

① 例如，见如下的书：《工业党审讯案》国家图书联合出版局莫斯科1931年版；《孟什维克反革命组织审讯案》苏联法律出版社莫斯科1931年版；《社会干涉主义者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庭上》党出版社1931年版；《五年计划的破坏者》莫斯科1931年版；《工人供应的破坏者》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30年版；A.A.萨多夫斯基：《结束对反动派的进攻》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版；《间谍分子和暗害分子在无产阶级法庭上》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版；《顿巴斯的经济反革命派》莫斯科1928年版；等等。

无政治头脑的人，对他们“政治问题不起任何作用”。接着控告结论还指出，被告人的政治观点还由于“革命前后工程师们的工作和生活地位差别太大，苏维埃政权自然对工程师们不信任而决定的。”但是审讯材料表明，所有被告人在逮捕前占据着重要的工作岗位，所以谈不上对他们的不信任。被告人的物质条件在逮捕前比革命前还好。总而言之，关于“工业党”进行“暗害活动”的动机问题，经过审讯完全弄得混乱不堪。克雷连柯完全不顾过去所讲的话，在起诉结束语中说：“他们没有，没有过，也不可能有什么思想或自在的信念，因为你们可以看到了他们出卖自己的代价……他们完全没有任何思想上的依靠，而是被金钱所雇佣，就一头扎进了反革命阵营而为他们工作，根本就不考虑什么思想领导和政治稳定性……拉姆辛不是那种为自己的信念而无私工作的人。说什么他没有得到钱，这是胡说八道。”拉姆辛在这以前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同意对他的控告，但此后他不得不在自己的最后发言中反驳克雷连柯。他说：“难道可能由于在工资以外得到百分之十、二 249 十、三十的钱而用自己的脑袋去冒险，搞叛卖，叛变，破坏？我想，谁也不会相信这点……如果政权变了，我会得到什么呢？无论怎样也不会比现在好，因为我在苏联所得到的物质条件和特别优越的科研环境，国外的科学家连想也不可能想到。”

就是在被告供出的有关他们反革命活动的性质和本质的口供中也可以发现大量的不合情理的矛盾。

例如，“工业党”领导人拉姆辛的口供很值得怀疑。他交代：在他去巴黎时，当他提出让国外的白俄组织证明法国确实在考虑进行武装干涉的计划时，给他安排了同法国总司令部某些著名工作人员的会面。这时他们不仅告诉了拉姆辛法国政府即将进行武装干涉的总的决定，而且还转告他法国总司令部的详细的作战计划。法国远征军及其盟国的主要攻击方向，派遣军的登陆地点，攻击的时间等等都通知了拉姆辛。有关所有这些问题拉姆辛“诚恳地”在审讯过程中作了交代。但是谁都知道，任何总司令部都不会把自

己的具体计划告诉拉姆辛这样的人，就是在某些有名的白俄分子介绍后也不会这样做。总而言之，在我国的领土上很难设想有什么组织良好的，拥有几千名成员，有自己的中央机构，向地方发布指示和文件，和国外总部及大使馆保持联系的地下党组织。还有，侦察机构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政治审讯中公开向法庭宣布，他们拿不出任何能证明地下党存在的物证和书面证件。这些党的任何一个指示、号召、信件、决议和全会记录都没有提交给 250 法院和社会舆论，而审讯过程中却不断提及这些材料。在审讯中宣布，被告人在被捕以前把所有这些材料全部销毁了。国家起诉人尼·瓦·克雷连柯在“工业党”审讯中的结束语里说：“再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有什么证据吗？有没有什么文件吗？我提过这问题。原来，什么地方是有过文件的，但就在当地被销毁了……我问过，也许偶然还留下了一份什么文件吧？对这点抱任何希望都是徒劳的……”①

诚然，克雷连柯还企图证明，在具备被告人的“真诚”的口供情况下，缺少任何物证或文件对法院不能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但他始终不能解释清楚：被告人在没有任何物证和书面证明的情况下提供“真诚”的口供的动机如何。因为在这里是那些苏维埃政权的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间谍、暗害分子和杀人犯。正是克雷连柯自己在发言中说：“对拉姆辛公民及其他人的口供，不管他们如何真诚地悔改，我不能相信，也确实不相信。”

在审讯过程中涉及里亚布申斯基一家（俄国有名的大资本家家族）时所发生的混乱状况也是很说明问题的。控告结论宣称，未来俄国政府中工商部长的职务拟由俄国大资本家巴·巴·里亚布申斯基担任。接着说：“1928 年 10 月‘工业党’中央的两名成员拉姆辛和拉利切夫和巴·巴·里亚布申斯基取得了联系。”同一处又说，巴·巴·里亚布申斯基和“工业党”中央委员帕尔钦斯基和赞

① 《无产阶级对暗害分子干涉主义者的审判》国家图书联合出版局莫斯科 1930 年版第 32 页。

多托夫建立了密切联系。但是，在我们报刊公布控告结论后，几乎所有的外国报纸都报导说，里亚布申斯基一家的家长早在1928年以前就死了，现在居住国外的只有他的几个儿子。这样就不得不在审讯过程中很笨拙地立即改变说法。费多托夫说："关于里亚布申斯基，实际上此处没有说清楚，我始终不明白在这里说的里亚布申斯基是哪个？因为那个有名的社会活动家巴维尔·里亚布申斯基这时已经亡故。我是指弗拉基米尔·里亚布申斯基。关于弗拉基米尔大家的反映不太好，据说，他这个人不能干，没有什么影响。"于是拉姆辛也不得不做一些新的解释，因为在这以前他说，在巴黎他见到的就是巴·巴·里亚布申斯基。他说："和我谈过话的里亚布申斯基的名字我不太有把握，是彼得？还是弗拉基米尔？……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描写一下他的外貌。"尼·克雷连柯说："重要的是要确定，看来这人就是弗拉基米尔。"拉姆辛说："这有最大的可能。"

在苏联有名的历史学家E·B·塔尔勒身上也出现同样的莫明其妙的事情。控告结论中说，未来白俄政府的外交部长拟由塔尔勒院士担任。塔尔勒当然马上被逮捕，并从苏联科学院开除了他。但是不久塔尔勒不声不响地被放出来了并恢复了他在科学院的工作。

同样，在被告人有关其他问题的口供中也可以看到许多矛盾。例如：关于"工业党"中央的机构问题及他们的分工；关于未来政府的组成；关于从国外得到的金钱的处理和数量等等。关于破坏行动的具体情况，被告人的口供也是非常混乱的。例如：被告人所参加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基本方案被告人认为是符合实际的，而"最佳方案"则认为是不符合实际的，破坏性的。但是被告人宣布，由于苏联人民的英勇劳动，最佳方案突然被发现是可以实现的。拉利切夫说："最高的计划和速度在我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但实践证明我们的看法被驳倒了。"

有时法庭主持人简直是要提醒被告人有关他们的暗害活动表

现在什么地方。在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维辛斯基同费多托夫之间的对话。

“维辛斯基：在现有工厂没有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有没有建立新厂的指示？

费多托夫：不，这样的指示没有。

维辛斯基：是没有吗？

费多托夫：请原谅，是有这样的指示，虽然已经有工厂，还要建立新厂。

维辛斯基：不，这方面没有什么破坏性的问题，新厂是需要建的。”

接着维辛斯基引导费多托夫考虑“指示的内容在于，现有工厂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建立新厂”。于是费多托夫同意说：“如果不搞破坏活动的话，那末有可能少建立那怕是一、两个工厂，当然少不了多少，但是这样可以节省一些外汇。”费多托夫还说：“加强建设是受到经济工作人员中的党员的极大的欢迎。”

在审讯过程中，连科研机构和生产联系不够等缺点也被宣布为破坏活动，可是我们的报刊至今还继续报导这方面的问题。甚至连在边缘地区排除沼地的水这些工程也被宣布为破坏活动，因为这似乎是给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创造了方便条件。

“工业党”审讯中的下面这样一个事实能够有力证明该案是假案：控告结论中所说的和“工业党”有直接联系的六十多个人中只有五人作为证人在审讯时发了言。多数证人（当时还活着）已被判刑或他们的案子已转归另一案件中，这种说法从法律角度看显得很可笑。在“联盟局”审讯中（1931年）“工业党”领导人不也是作为证人出席了吗？在了解这次审讯的材料时不也很容易就可以发现许多破绽和矛盾吗？

253

这一新案件的控告结论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和“工业党”的联系。在控告结论和被告人及证人的口供中有关这一联系讲得很详细。甚至还列举了不能令人信服的“工业党”和孟什维克党之间秘

密签署的"协定"，其中有以下几点："1）孟什维克尽力参加总的破坏活动，但认为自己不可能参与具体的破坏行动；2）孟什维克参加破坏性工作时自己个人不取报酬……"①

在"联盟局"审讯中拉姆辛作为证人发了言："为了完全清楚起见，我应该回忆一下在'工业党'审讯中所指出的一点，即关于'工业党'、'劳动农民党'和孟什维克组织之间签订紧密联盟和建立联系，是国外发出的指示。"但是在"工业党"审讯中实际上根本没有提到"联盟局"什么具体事情，任何实际联系和人员也都没有提及。可是在"工业党"审讯进行时（1930 年 12 月）所谓"联盟局"的主要人物（1931年初受审）已经被逮捕了：格罗曼——1930年 7 月13日，苏哈诺夫—— 7 月 20 日，舍尔—— 9 月 13 日，扎尔金德—— 8 月20日。为了解释这一矛盾，法院宣布，直至1930年 12 月才得到"联盟局"成员的"真诚的交代"。显而易见，斯大林及其助手们只是在"工业党"审讯"成功"后才想到组织"联盟局"审讯，并开始为举行这一审讯编造新的神话。毫不奇怪，在这期间必然产生审讯组织者们所头痛的矛盾。例如，控告结论中说，关于"联盟局"和"工业党"之间的合作问题是在"联盟局"第三次全会上讨论过的，这次全会是 1930 年 4 月召开的。可是在 1930 年 4 月以前（根据上次审讯的材料）"工业党"已经被粉碎，因此谈不上孟什维克和他的任何联系。因此，舍尔在发言中把这一条改成：和"工业党"的合作问题不是在"联盟局"三次全会上，而是在二次全会上（1929 年）讨论过。 254

在控告结论中引用了苏哈诺夫 1931 年 1 月 25 日的交代："我们同拉姆辛开始单独接触……过了两天我又给拉姆辛打电话，他约我在他家里再次会面。我们的会面时间很短……也是经过这样的途径，事先用电话联系好，我于 1929 年 10 月从他那里得到一万五千卢布，最后于 1930 年 3 月又得到一万五千卢布。"但是，在法庭上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证人"拉姆辛突然宣布，他同苏哈诺夫

① 米·查尔内：《历史的必然裁判》莫斯科 1931 年版第 30 页。

没有单独谈过话，他从来没有和苏哈诺夫见过面，也根本不认识他。苏哈诺夫也不得不证实这一点。从后来的审讯中"搞清楚"了，苏哈诺夫没有从"工业党"那里得到钱，钱是给了格罗曼的，送钱的不是拉姆辛，而是拉利切夫。

在审讯过程中对所谓"联盟局"的组成也没有搞清楚，只是弄清楚了多数被告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和孟什维克党没有任何联系，有些人根本就不是孟什维克。按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直至1927—1928年才参加了这个党。那么为什么他们如此快的成为这个党在苏联的领导人呢？芬-叶诺塔也夫斯基关于这个问题的口供是完全语无伦次的，包括他对辩护人所提问题的答复。被告人有关"联盟局"纲领委员会的交代也是杂乱无章的，连这个委员会是否成立过都没有搞清楚。关于"联盟局"全会的内容和会议日程以及这个局所举行的各种会议情况的交代也是充满了矛盾。有关被告人同孟什维克国外代表团的领导人阿布拉莫维奇会面的交代是没有说服力和充满矛盾的，阿布拉莫维奇似乎是为了给他的同盟者指示工作而秘密来苏的。

255

有关"联盟局""暗害"工作的例证也完全没有说服力。例如，索科洛夫斯基是这样描写自己的一次"暗害"事件。他说："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给我们一个任务，要我们在1929—1930年控制数字范围内把成本降低百分之十。我定了百分之九点五，并根据实在的客观事实坚持这个数字。这些年来(除了1927—1928年)成本实际下降数字比计划数字还少，而1925—1926年不是下降，而正如你们所记得的那样升高了。我甚至想连百分之九点五也没有完成(这点你们是知道的)。可以说在降低成本方面我的最低数字也总是订得过高的。再重复一遍，这样说来，这些数字毕竟是不正确的。"

"工业党"成员承认自己为了破坏目的提高了许多计划指标，"联盟局"则相反，被指责为制订了过低的计划指标、与此同时，把被告人在计委会议上反对把五年计划控制数字订得过高的发言引来引去。正是由于斯大林、莫洛托夫在1930年坚持大大提高五年

计划的多数控制数字，所以毫不奇怪，计委订的几乎所有的原来数字，包括一千万吨生铁，十万辆汽车等都被宣布为“带破坏性的”。现在当我们知道，五年计划大部分控制数字（按实物指标计算）并没有完成时，很难同意这样的指责。不管怎样，被告人在计委会议上和最高国民经济会议上的发言不是“带破坏性的”——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发言是内行对一些党的领导人的冒险主义和外行作风很有理智的警告。总而言之，听1930—1931年审讯时使人联想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没有详细地被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讨论过，没有被我们党和国家的各个环节的领导所通过。同样，被告人关于他们怎样有意破坏工人的供应，破坏城市的肉类和牛奶的供应，组织某些农村地区的饥荒，有意毁坏几百万吨蔬菜、肉类、鱼类、粮食，拖延开采煤和泥炭的发展速度，组织电力供应危机等等一系列口供，使人想到，似乎我们各部的领导都不是共产党员，在我们的经济和国家机构中完全是破坏分子称王称霸。以上这些至少是值得怀疑的。 256

“联盟局”成员有关第二国际活动的口供也显然是被逼出来的。当然，第二国际各党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敌对态度是不容怀疑的。但是说第二国际的领导人是对苏联进行破坏的组织者，外国社会民主党，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从物质上保障策划在我国进行武装起义——这一切断言很值得怀疑。这些指责对斯大林坚持的“社会法西斯主义”错误理论以强有力的支持，但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

对虚构的“劳动农民党”的许多指责也是荒谬透顶。例如，对“劳动农民党”反革命分子的指控说，他们不仅保护了农村富农阶层，而且还“认为有必要考虑到在苏联似乎以特殊形式起作用的商品货币规律”。在西伯利亚一些农技师反对草田轮休制也被说成是破坏行为。在其它一些地区把反对威廉斯草田轮作制① 说成是 257

① 见小册子《哈萨克斯坦的反对派》阿拉木图1931年版；《反对派和暗害活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莫斯科 1930年版等等。

反革命的破坏行为。还要附带地指出，被随意说成是所谓“劳动农民党”中央成员的有名的农业科学家A·Г·多雅连科几年后被释放了，好象是也被恢复了名誉。不管怎样，现在所公布的材料说，多雅连科在三十年代是根据诬告材料受到审判的。①

一些被告人后来的命运也很奇怪。所有“破坏供应”的四十六人被枪决了，可是他们的组织只是“工业党”的一个分局。而“工业党”的领导者拉姆辛，这个“独裁者的候选人”、“间谍”、“暗害和谋杀案的组织者”却不知为什么被赦免。监禁时他也被允许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过了五年他被释放了并授予列宁勋章。据苏联大百科全书上说，他于1948年去世时是莫斯科热工学院的院长，这还是“工业党”审讯前他担任的职务。

* * *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政治审讯中这些大量的伪造材料如何解释呢？为什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构要在这些年代伪造我国经济机构中存在一个暗害者和反革命分子组织的广泛的网，而他们似乎和帝国主义者一起在策划国内的武装起义和从国外的入侵呢？

《真理报》有关中国毛泽东政策的文章②中包含着对这一问题的间接的答复。《真理报》写道：“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切遭到失败的无原则政客的陈腐手段。如果事情越来越恶化，政治举动一个接着一个在崩溃，那么这种人所看到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敌人’那里，包括国内的，而特别是国外的。”

258

确实如此，斯大林有意识地组织了上述这些案件就是为了用这种办法掩盖自己的许多错误和失误。此外，斯大林还想借用这些审讯案件把制止和击退外国侵略的功劳记在自己的帐上。他想取得那一时期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虽然是假的）政治资本。

---

① 例如，见奥·彼萨尔热夫斯基：《普利亚尼什尼科夫》一书，莫斯科1963年版第182页。

② 《真理报》1967年2月16日。

斯大林在组织上述这些案件时，有意识地制造国内紧张气氛，迫使那些反对他的人保持沉默并使原反对派的领导人再一次受到怀疑。

至于被告人在这些“暗害”案件中的表现和“诚恳”的交待，那么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情况。任何一个自然灾害不会把灾区中的一切人都消灭掉，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暗害狂”的可怕的漩涡消灭了成百成千的人，但是还是有个别人活下来了，他们可以把当时实际情况讲出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盟局”案件的主要被告人之一米·彼·雅库波维奇经过二十四年的监禁、集中营和长期居住在卡拉干达残废人院里，最后活下来了。据同雅库波维奇关在一起的人证明，雅库波维奇在这一时期里表现了人类最高尚的品德。1966年夏天雅库波维奇从卡拉干达来过莫斯科，并同本书作者谈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是怎样准备三十年代初的案件。1967年5月雅库波维奇给苏联检察院发了一分专门的声明，全文如下：

259

“致苏联总检察长

苏联检察院正在复查我1931年被判刑的那个案件，我向该院提供下述情况：

任何‘孟什维克联盟局’实际上从来没有存在过。在此案件中被判刑的人相互并不认识，也不是所有的人过去和孟什维克都有关系。但多数人过去或多或少和孟什维克党有些关系。有些人只有很少或偶然的联系，有些则属于基本骨干甚至是领导人。但不管是那一种人，他们各自在不同情况下带着不同的动机早已脱离了孟什维克。这个案件的被告人中只有一个人同孟什维克总部还有关系，甚至他还是孟什维克政治局的主席或书记（这点我是后来在上乌拉尔斯克政治隔离室里从他那里知道的），那就是弗·康·伊科夫，可是他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以及在法庭上根本一个字都没有谈到自己真实的党的关系和自己的活动，甚至连‘莫斯科局’的存在本身在审讯过程中始终没有揭露出来。……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的调查人员也根本没有想揭开伊科夫或其他被告人的任何真实的政治联系和立场。他们已经有了现成的'暗害'组织的规划，这一规划也只能在国家机构的有影响的大干部的帮助下写出来，而实际存在的地下的孟什维克并没有这样的地位，所以他们对上述需要的那样的规划并不适合。看来，这一规划是前两个案件中的领导人——'工业党'的拉姆辛和'劳动农民党'的康德拉提也夫提供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后来他们两人在'联盟局'案件中都以证人身分出庭作证。为了使这些政治案件和政治内容更严谨一些，需要在原有两个案件的基础上再补充他们臆想出来的第三个政治暗害组织——即社会民主党。这些安排是到我的牢房与我同住的Л・Н・尤罗夫斯基教授对我讲的。看起来，他是为了向我解释案件进行的情况专门到牢房里呆几天的，他已经承认他是康德拉提也夫'影子内阁'的'财政部长'，是'劳动农民党'的重要成员之一。

260

康德拉提也夫的思想完全受到他的个人朋友格罗曼的支持。当政治保卫总局人员来逮捕康德拉提也夫的时候，格罗曼正在他家里，这就成为审查格罗曼的最初依据。人们答应格罗曼说：如果他协助组织好孟什维克暗害案件的审讯工作，那么将来保证恢复他的工作，而且以后还完全赦免他。后来，当"联盟局"案件的成员被送到上乌拉尔斯克政治单人牢房去的时候，格罗曼在车站的隔离室绝望地、满腔愤怒地大声喊道：'受骗了！'决定由格罗曼承担组织这一案件的责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是一个大酒鬼。侦察人员把他灌醉了，然后所有需要得到的口供都能够得到。

在伪造孟什维克暗害组织的过程中格罗曼的得力助手是被告人彼图宁，他是文化水平低，只在二月革命后才参加孟什维克，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离开了他们。后来他（在上乌拉尔斯克）说，他'衡量了一下'，在所形成的环境里对他最有利的是极力协助侦查人员组织一个暗害案件，这样他从政治保卫总局那里可以得到奖赏：恢复自由和工作。反之，他可能要被判长期徒刑，甚至死刑。正是彼图宁想出来的，按部门的原则组织'联盟局'：最高国民经济

会议——两名代表，商业部——两人，国家银行——两人，中央消费合作联盟——一人，国家计划委员会——一人。这是他逐一地点各部门人员的名字，选择那些据他了解原来是孟什维克的负责 261 干部。由于他不确切了解被他点了名的人的政治经历，所以他完全错误地把犹太复国主义者索科洛夫斯基（作为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的'代表'）也写进自己的名单中。对侦查人员来说，这类'不确切'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所关心的是得到被点出来的牺牲者的口供，而他是否是真正的孟什维克，对他们是无关紧要的。

这样一来，逼供就开始了。有些人和格罗曼、彼图宁一样由于许愿他们将来得到奖赏而交待的。有些人力图反抗，对这些人施用了体罚'使他们清醒'——殴打他们（打脸、打头部、打生殖器，把他们摔倒用脚踩，掐躺在地上的人的脖子直到脸发紫等等），长时间站立不让睡觉，关到酷刑室（只穿内衣、光着脚赶到外面冻他们或关到没有窗户的热得难以忍受而缺氧的房间里）等等。有些人只吓唬一下要用刑，并叫他们看上刑的情况就够了，对另一些人根据不同情况（反抗程度）严格区分地使用刑罚。反抗最顽强的是A·M·金兹堡和我。当时我们并不认识，我被关在布蒂尔卡监狱的北塔，金兹堡关在保安部内部监狱。但是我们得到同样的结论：我们没有能力忍受对我们使用的体罚，还不如死去。我们各自切开了静脉。但是我们没有死成。在我企图自杀后，我没有再挨打，但是长时间不让我睡觉。我的脑子到了如此疲乏的程度，以至于任何侮辱，任何诬陷（对自己和对别人），对一切都无所谓了，只要让我睡觉就行。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我同意给他们任何口供。那时我还为自己的脆弱而感到羞耻，因为我想只有我一个人如此没有毅力。可是这时让我同我的老同志舍尔对口供，我认为这个早在革命胜利前就参加工人革命运动，出身于富贵的资产阶级家庭的 262 人是思想上很纯洁的一个人。当我从舍尔嘴里听到他承认自己是破坏性孟什维克组织'联盟局'的成员并当场宣布我为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我马上完全投降了。以后我再也没有反抗，并写了任何

一个由侦查员授意给我的供词。这些侦查员是：Д·З·阿波列相、А·А·纳谢德金、Д·М·德米特里也夫。

我和Л·Б·扎尔金德被指控为在商业部策划利用工业品进行破坏活动，这些事是否确实有呢？不但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关于各经济区'输入工业品'计划是由我领导的工业品局所制订的，由我在商业部委员会会议上详尽地、逐个地加以解释。参加委员会会议的有经验丰富的党的负责干部和其他部门的专家——最高国民经济会议、财政部、大的经济联合组织，如：纺织辛迪加等。委员会主持人是米高扬，他对每一个数字都是批判地对待，甚至有些挑剔，然后才通过。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什么破坏。难道所有的人除了我都是瞎子吗？这种莫明其妙的假设本来是无从说起的。是的，我受到全委员会，商业部和熟悉我的负责干部的信任。但是这种信任是由于我在汇报中给予有根据的和有说服力的解释，由于我从最初起在苏联国家机构中的长期工作，最后，由于我所执行的'苏维埃政治路线'。我开始是在孟什维克党内的，后来由于确信我没有能力使孟什维克党能转向'苏维埃道路'而离开了他们。在审讯过程中我亲手写过交待，在那里写了一系列进行破坏活动的交待并指出商业部文件号码。但是在监狱里我连一份材料也没有看到过，也没有人送给我看过，所以这些号码是凭空瞎想出来的，我想那时谁也不会去查的。

263

……当'联盟局'在'国际基础'上'成立'后，根据侦查员的要求又不断补充新成员。其中有伊科夫，这对'联盟局'主要'成员'是非常突然的。这一补充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可以以М·И·泰捷里堡为例。当'联盟局'的组成已定，侦查人员和被告人已协商完毕时，侦查员阿波列相把我从牢房里叫出来。他的办公室里坐着泰捷里堡，任何被告人没有指出过他的名字。我早就认识他，他是一个党的工作者，社会民主党人。过去他是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转到孟什维克方面的，1917年是孟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书记，在十月革命后脱离了孟什维克并在外贸人民委员部国外机

构中工作。我走进办公室时，阿波列相站起来走出房间，让我们两个人单独留下。泰捷里堡对我说：'我早已关进监狱，挨了打，他们要求我承认在国外接受资本主义商行的贿赂。我实在忍受不了，'承认'了。这是很可怕的，带着这样的耻辱生活和死去。阿波列相突然问我：'也许您愿意改变自己的交待，承认自己参加了孟什维克反革命组织——联盟局？这样您就不是刑事犯而是政治犯。'我回答他：'我想，但不知道如何实现。'阿波列相说：'好吧，我叫雅库波维奇来。您认识他吗？'我说：'认识'。他就把您叫来了。雅库波维奇同志，我求您，请把我算进'联盟局'。我还不如作为反革命死去，而不是作为诈骗犯和'坏蛋。'这时阿波列相进屋了。他问我们：'怎样，商量好了吗？'我没有讲话。这时泰捷里堡含泪的眼睛望着我。我说：'我同意，我证实泰捷里堡参加了联盟局。'阿波列相又说：'这样就好了，回去写供词，其他人跟着您签上名。泰捷里堡，您重写您的交待，过去的材料我会销毁。''联盟局'就是这样组成的。 264

审讯前几天，在侦查长Д·M·德米特利也夫办公室里由他本人主持举行了'联盟局'第一次'组织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十四名被告人，还有三名侦查员参加了：阿波列相，纳谢德金和拉吉舍夫。在这次会议上被告人相互认识了一下，协商好并排练了一遍在审讯时应如何表现。在第一次会议上这项'工作'没有结束，又开过一次会。

我当时慌了。审讯时怎么办？否认自己在侦查过程中的供词吗？试一下破坏审讯？制造一次国际事件？这对谁有利？这不是从背后给苏维埃政权，给共产党以打击吗？我于1920年离开孟什维克后没有加入共产党，但是从政治上、从思想上我过去一直是和党在一起的，现在还是和党在一起。不管政治保卫总局机构犯什么罪，我自己不应该背叛党和祖国。我不掩饰，当时也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否认过去的口供，那么刽子手侦查员会把我怎样呢？想都可怕，如果光是死，我愿意死，我自杀过，想要死去。但是

他们不会让我死，他们会慢慢施以酷刑，无限长时间的折磨。他们不让你睡觉，到死为止，这样的死什么时候才到来？在这以前可能要得精神病。能下这样的决心吗？为了什么？如果我确实是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敌人，我也许因为恨他们而会找到胆量——精神依托。但我不是敌人。什么力量使我会下决心在法庭上这样做呢？

我正在这样想和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时，被带出牢房来到办公室，在那里这次审讯的国家起诉人尼·瓦·克雷连柯正在等待我。我早在革命前就认识克雷连柯，而且很熟。1920年我任斯摩 205 棱斯克省粮食委员时，他来过斯摩棱斯克，是作为党中央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全权代表视察和领导粮食征购工作。有一个时期他住在我家里，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斯摩棱斯克省当时在俄罗斯联邦第一个完成了余粮征购任务，并得到列宁的好评和表扬。总而言之，我和克雷连柯彼此很熟悉。

克雷连柯请我坐下，并说：‘我毫不怀疑您本人是没有任何罪过。我们两人现在都在我们党面前尽自己的义务，我过去认为，现在还是认为您是共产党员。我在审讯中是起诉人，您要证实过去已作的交待。这是我们两个人对党的义务。在审讯过程中可能出现无法预料到的复杂情况，我把希望寄托在您身上。需要的话我请主席让您发言。您会想出办法、知道应说些什么。’我沉默。克雷连柯问我：‘说好了吗？’我糊里糊涂地说了些什么，但意思是保证完成我应尽的义务。大概我眼睛里充满了眼泪。克雷连柯友好地摆了摆手。我被带走了。在审讯过程中，正如克雷连柯所预料到的那样，确实发生了复杂情况。孟什维克党的所谓‘国外代表团’给法庭打了很长的抗议电报，否认审讯中的材料。克雷连柯宣读了这个电报并请主持会议的尼·米·什维尔尼克让被告人雅库波维奇发言。如果‘国外代表团’在自己的电报中真诚地否认似乎在它指示下所进行的破坏活动是伪造的谣言而同时对在压力下不得不提供虚假交待的被告人表示同情的话，那么我的处境就会相当

困难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能说什么呢？但是‘国外代表团’自己减轻了我的任务。他在否认控告材料后，宣称，被告人从来没有和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发生过任何联系，他们都是被苏联政府收买了的内奸。这样我就可以坦率和真诚地在揭发‘国外代表团’撒谎和两面派面目的同时，讲被告人在孟什维克党史上的作用和功绩并谴责孟什维克领导背叛革命和出卖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这番话我讲得热情洋溢，很有说服力。这是我最好的政治讲演之一。它给在场的观众以深刻的印象（这点我根据自己的演讲经验感觉到的），似乎成为这次审讯的高潮。我向克雷连柯的保证完成了。 266

第二天，A·Ю·芬－叶诺塔也夫斯基在交待以前说，他完全同意我的有关‘国外代表团’的发言，还说，我是代表所有被告发的言。

整个审讯进行得顺利，表面上还很真实。但侦查员们在他们拼凑的案情中犯了不少明显的错误。特别是关于所谓孟什维克中央委员P·A·雷因－阿布拉莫维奇秘密来苏的这段插曲上。对阿布拉莫维奇要象我那样熟悉他才能懂得断言他秘密来苏这点的谎谬。在‘国外代表团’中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更不善于去从事这种冒险。在预审和在法庭上，我都成功地躲避了肯定和他见过面。但格罗曼和其他被告争先恐后地讲述他们同他会过面。后来我听到，阿布拉莫维奇在西方宣布他当时并不在现场，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克雷连柯在公诉发言中要求对五个被告人判处极刑，包括我在内。他在发言中没有侮辱我，而且还说，他对我个人的诚实和大公无私的品质毫不怀疑，还称我为‘老革命’，但是他认为我热衷于自己的思想，而我的思想是反革命的。所以要求枪毙我。我当时感谢他对我的评价，没有诬蔑我，在死前没有把我弄得满身污秽。我在我的‘辩护发言’时说，根据我所承认的罪行应该处以极刑，国家起诉人的要求一点也不过份，我并不要求最高法院保留我的生 267

命，我想死。在审讯过程中和法庭上我都作了假交待之后，我除了死什么也不想，因为我不愿意带着耻辱活在世界上。当我发言之后又坐在我的被告席上时，格罗曼抓住我的手小声说：'您发疯了！您会害死我们所有的人！您没有权利面对自己同志这样说！'

但是我们没有被判处死刑。

在判决公布后，我们步出法庭时，我在出门处遇到苏－叶诺塔也夫斯基。他的年龄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大，比我大二十岁。他告诉我：'我不会活到能把我们案件的所有真相公布出去的时候。您最年轻，您活到那个时候可能性最大。我嘱咐您把真相公布出来。'

为了实现我们老同志的遗嘱，我给苏联总检察院写了这份材料，并已作了口头交代。

米哈伊尔·雅库波维奇

1967年5月5日"。

米·彼·雅库波维奇给苏联检察院的声明不是唯一的揭露1930—1931年策划政治案件内幕的文件。最近，我们又得到一个文件——Б·И·鲁宾娜关于他的哥哥伊·伊·鲁宾的回忆，鲁宾也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盟局"案件的被告人之一。

伊·伊·鲁宾是政治经济学教授，参加过1905年革命运动。一开始他是崩得某一组织的成员，后来参加了孟什维克。1924年起他不再从事政治活动。他主要是从事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作，1926年起他是马恩研究院的研究员并受到院长达·波·梁赞诺夫的很大信任。完全有可能，把鲁宾列入"联盟局"首先是为了要株连梁赞诺夫，斯大林是痛恨他的。大家知道，在鲁宾"交待"后和"联盟局"审讯前，梁赞诺夫立即被免除了由他建立的研究院的工作，并由于"叛变党和直接帮助孟什维克干涉者"被开除了党籍。

伊·伊·鲁宾在"联盟局"案件之后过了三年单人牢房监禁生活，然后被提前释放，流放到阿克丘宾斯克市。他的妻子，然后妹妹来到这里。他向妹妹叙述了他如何不得不交待自己和梁赞诺夫

的假口供的情况。

鲁宾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的哥哥告诉我如下情况。1930 年 12 月 23 日他被逮捕时，他被指控为'孟什维克联盟局'成员。这一控告如此莫明其妙，使他马上交出了关于他的观点的书面声明。在他看来，这个材料足以说明这一控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把这一声明交给了侦查员，侦查员看了后，马上撕毁了。然后给我哥哥安排了与雅库波维奇对质。雅库波维奇早些时候被捕，并已承认自己是'联盟局'的成员。我的哥哥根本不认识雅库波维奇。在对质时，雅库波维奇告诉他：'伊萨阿克·伊里奇，我们都是一起参加了联盟局会议的。'我哥哥马上问：'这次会议在那里召开的？'这一问题引起了混乱，侦查员马上停止了审问说：'您也好象是个法学家似的，伊萨阿克·伊里奇！'我的哥哥确实是法学家，在此领域工作好多年。对质后，鲁宾作为'联盟局'成员的控告不成立，不久他被转到苏兹达尔市。这次转移情况很不一般，使人不安和害怕：站台上一个人也没有，空车箱里迎接他的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负责人盖伊。不管盖伊如何劝告，我的哥哥回答他的都是真话，他说他和孟什维克没有任何联系。盖伊宣布给鲁宾四十八小时考虑时间，他回答说，他连四十八分钟也用不了。

269

……在苏兹达尔的审问也没有给侦查人员以满意的结果。鲁宾被关到特刑禁闭室一昼夜。我的哥哥四十五岁时已有心脏病和关节疼痛。特刑禁闭室等于是一个石头袋子，有一个人那么高，在这里面不能活动，只能站着或在石头板上面坐着。但是我的哥哥连这个考验也经受住了，从禁闭室出来的时候他对自己有着内在的信心和精神的力量。后来又第二次关进禁闭室。这时同牢房的是雅库波维奇和舍尔，他每次从禁闭室出来时，同号的难友都以极大的关怀欢迎他、给他准备茶水，送给他糖和其他食品以表示对他的同情。在谈到这些时，鲁宾说这使他很奇怪，不正是这些人诬陷他，可是又如此热情地对待他。鲁宾很快被转移到单人牢房，这时一系列没有任何借口的折磨降到他的头上。他带进来的任何私人

东西都不给他了，连手帕在内。他患了感冒，鼻子肿了，又生了疮，衣服也脏了。监狱领导经常来检查他的牢房，稍微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就让他去打扫厕所。另外，还采取各种办法来磨灭他的毅力……说他的妻子病重，他说：'我帮不上忙，我连自己都管不了'。有时，侦查人员很友好地告诉鲁宾：'伊萨阿克·伊里奇，党需要您这样做。'同时还使用了夜审方法，不让人睡觉，一想睡，就把他弄醒，继续审问，嘲笑他的精神力量，称他是'孟什维克小耶稣'。这样持续到1931年1月28日。28至29日夜里把他带到地下室，许多监狱工作人员和一个犯人瓦西里也夫斯基在那里等着。当着我哥哥的面告诉瓦西里也夫斯基：'如果鲁宾还不承认的话，我们把您枪毙了。'瓦西里也夫斯基跪着求我的哥哥：'伊萨阿克·伊里奇，您就承认一下算得了什么呢？'但是，我的哥哥还是很坚强，甚至在当他面把瓦西里也夫斯基枪毙了时他仍然很平静。自己没有罪的信念如此强烈，使他连如此大的考验都经受住了。29至30日夜里，又把他带到地下室，这次等在那里的是个象大学生的年轻人，我哥哥不认识他。当告诉这个年轻人：'就要枪毙你，因为鲁宾不承认。'这个大学生撕破了自己胸前的衣服，喊道：'法西斯，宪兵，打吧！'当场就把他枪杀了，'他姓多罗德诺夫。多罗德诺夫被杀使我哥哥大为震动。回到牢房后他沉思起来：怎么办？我哥哥决定和侦查人员开始协商，这次协商时间是1931年2月2日至21日。谈判结果是：鲁宾作为'联盟局'成员这一点在莫斯科和雅库波维奇对质时被否定了。最后商定，我哥哥同意承认自己是'联盟局'纲领委员会成员，他在院里的办公室保存孟什维克总部的文件，他离开研究院时把这些文件封在信封里作为社会民主运动史的材料交给梁赞诺夫。与此同时，鲁宾请梁赞诺夫在短期内保存这些材料。在谈判过程中每一个字、每个提法都争来争去。鲁宾的交待材料不止一次被侦查人员改了又改。1931年3月1日，鲁宾出庭时，他的口袋里放着被侦查人员用红墨水改过了的'交待'。当时鲁宾的处境很悲惨，他要承认那些未曾发生过的事情，实际上什么事都没有

过——那些所谓他的观点不曾有过；和其他被告人的关系也未曾有过，多数他根本不认识，有些只是在偶然场合见过面；任何材料都不曾有过，特别是那个封好了的交给梁赞诺夫的一包材料也没有过。鲁宾被提审和在同侦查人员谈判时发现，梁赞诺夫的名字如果不在鲁宾的交待中出现，它将在别人的交待中被提到。鲁宾同意了在发言中提到那个完全神话般编造出来的一包材料。对我哥哥来说，反对梁赞诺夫等于是反对自己的亲父亲。这对他来说是最难过的时刻，所以他决定把这件事情说成是自己欺骗了梁赞诺夫，而梁赞诺夫对自己是无限信任的。所以后来我哥哥在所有交待中坚持了这一论点，说他利用梁赞诺夫对自己无限信任欺骗了他。他这一立场无论谁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2月21日的交待印在由克雷连柯署名的1931年2月23日起诉结论中。这份交待中说，鲁宾把文件封好后交给梁赞诺夫，请他短时期内保存在研究院里。鲁宾无论在审讯前还是在审讯中都坚持这一说法，在法庭上他叙述了几件事以说明梁赞诺夫为什么如此信任他……他这一交待是破坏了检察长的意图的。他直截了当地问鲁宾：'你们没有建立组织关系？'鲁宾回答说：'任何组织关系都没有，只有他对我的极大信任。'这时克雷连柯要求休息。当他和其他被告人转到另外一个房间时，克雷连柯对鲁宾说：'您说的不对，休息后我再叫您，您修改一下您的答复。'鲁宾断然回答：'您不要再叫我，我会重复一遍已说过的话。'这一冲突的后果是原来定的监禁三年改为五年。另外，克雷连柯在自己结束语中对鲁宾的评价比任何人都更为卑劣。所有对此事有兴趣的人都不懂，为什么在这一评语中包含着如此多的愤恨和恶意。 271

鲁宾给自己提出一个目标：尽自己一切力量'保护'梁赞诺夫……由于鲁宾有可能在法庭上做到这点，使他精神上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但是他这些法律上的细节谁也不懂，因为在政治上他的名誉已败坏。鲁宾本人已完全从配做一个真正的人活下去的名单中划掉了。他本人自从开始'交待'后把自己也从这种人名单中 272

划掉了。值得提到的是，我哥哥从苏兹达尔重新回到莫斯科的感受。当他这个被折磨的病人坐上雪橇时，他想起自己来到苏兹达尔时内心是多么健康，多么自信，而现在离开这里时他已精疲力尽，被毁灭了的，被弄得完全绝望了。鲁宾完全明白，他开始‘交待’意味着他的生命已完结，而在这以前他的生命是忠诚的，清白的，充满了在自己所选择的科学领域内的劳动和成就。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做为一个人已不存在了，他完全明白他的‘交待’会得到什么样的连锁反应。为什么鲁宾要诬告自己？为什么还要点梁赞诺夫的名？为什么他跨出了作一个人最起码的行为准则？大家都知道，鲁宾和梁赞诺夫这两个人互相尊重的关系。梁赞诺夫比鲁宾的年龄大得多，他把鲁宾看成是终身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很有才能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家。梁赞诺夫对鲁宾作为一个人是无限信任的，对这次发生的事情，他自己也觉得莫明其妙。在这里我还想提到对鲁宾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即他和梁赞诺夫对质。对质时侦查人员在场，鲁宾被折磨的精疲力尽，脸色惨白，他对梁赞诺夫说：‘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您想起来了吗，我交给您一包东西。’梁赞诺夫是否回答了，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我的哥哥被带回牢房，他在号子里开始用头去撞墙。谁要是了解鲁宾的那种安静而又能克制的性格，谁就懂得鲁宾被折磨成什么样的状态了。传闻梁赞诺夫说，他不懂鲁宾所发生的变化。

273 ‘联盟局’案件的被告人被法院判了不同限期的徒刑，所有十四人被转移到上乌拉尔斯克政治隔离室。鲁宾被判五年徒刑，关在单人牢房里。可是其他被判十年、八年和五年徒刑的人却是几个人关在同一牢房里。鲁宾始终是单独监禁，在此期间他继续从事科研工作。后来他得了病，怀疑是嘴唇癌症，1933年1月把他转移到莫斯科，布蒂尔卡监狱医院。国家政治保卫局负责人两次来看他，建议减轻他的处分，把他放出来，使他能够从事科研工作。鲁宾两次都拒绝了，他深知这种宽恕所需要的代价。他在监狱医院里住了六至八个星期，后来又回到上乌拉尔斯克。一年后，1934

年，鲁宾被提前释放了，被流放到图尔盖市——那时是几乎没有人居住的沙漠中的城镇。被流放的除了鲁宾一人外，那里没有其他被流放的人。几个月后，鲁宾被允许住到阿克丘宾斯克市去。他在消费合作社当计划经济工作人员。此外，他继续从事科研工作。1935年夏天他的妻子病重，他打电报给我，叫我来。我马上来到阿克丘宾斯克市。他的妻子住院了，他本人的处境也非常困难。一个月后他的妻子痊愈出院了，我就回莫斯科去了……我哥哥告诉我，他不想回莫斯科，不愿再见原来的熟人。这说明他所经历的事情使他的心灵受了多大的震动。只有他所具有的极大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他的极深厚的对科研工作的兴趣才使他得到活下去的力量。

1937年秋天在当时大批逮捕的情况下，我的哥哥又被捕了。阿克丘宾斯克市的监狱挤满了人，犯人的生活条件是非常可怕的。在监狱里短暂停留后，我哥哥被转移到另外什么地方去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274

值得提到的还有尼·苏哈诺夫的悲惨命运。他是《革命回忆录》的作者，他在1917年二月革命初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预审时苏哈诺夫的意志已被摧毁，他在法庭上也没有使侦查人员为难。后来，苏哈诺夫还是找到了反抗的力量，在几次绝食后被释放出来。但是1937年时，苏哈诺夫再次被捕，接着被枪决了。

四、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大规模的镇压。新经济政策的结束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政治审讯引起了一连串的镇压。其主要对象是老的技术知识分子，没有从苏联跑到国外的原立宪党人，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些原民族主义党的成员等。

我们的刊物指出，由专家领导的暗害活动已非常普遍，审讯中

只揭发了这些暗害组织的头头，并没有充分揭露这些组织的广泛阶层。[①]报刊还公布一些声明，说什么"应该毫无条件地认为旧工程师中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人是有反革命情绪的。"[②]

可以预料，这一时期进行的镇压并不是都没有根据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斯大林干预下，有时在他的直接压力下所进行的多数逮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被捕的和被流放的相当部分专家(例如：彼·彼·拉扎列夫院士和其他人)没有进行任何暗害和反革命活动。这些人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向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旧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斯大林持蔑视态度，对他也有所讽刺，不过这些他们只是在极狭小的圈子里讲的。总的说来，这一旧知识分子阶层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是忠诚的，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三十年代初的镇压不仅在技术知识分子中进行，而且还涉及一些"边缘"的领域。例如：1930年由于诬告建立保皇反革命组织，在各军区逮捕了很多军事专家，其大多数是忠诚的和有功绩的军事指挥员。其中有一些是我们军事科学的著名人物，如：H·E·卡库林，我们已经提到过的A·E·斯涅萨列夫，他是原总参学院的院长，此前不久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他劳动英雄称号。(现在卡库林和斯涅萨列夫已被平反。[③])

这时期内伪造了所谓"斯拉夫学家"案件，他们也被指责为反苏维埃国家。由于这个案件非法逮捕了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其中有维·弗·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对农学家和生物学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例如：苏联品种试验体系的创始人苏联最大的育种家B·B·塔拉诺夫被逮捕并于1931—1935年期间被监禁。自然科学史有名专家B·E·莱科夫教授和他的一些学生也在列宁格勒被捕。

---

① 例如，见《工业党案件的总结和教训》1931年版第3页。

② 见《通过暗害活动进行阶级斗争》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版第9页。

③ 《军事史学杂志》1965年第11期。

化学工程师德·维特科夫斯基在回忆这一艰难岁月时，在自传性回忆录《前半生》中写道："1931年1月我被逮捕浪潮抛进监狱。那时监狱已挤满了，我被带到临时改成牢房的地下室，唯一的通风口通向小路比扬卡街。……牢房挤的满满的，囚徒一个挨一个躺在两层的铺板上。大家小声说话，气氛令人压抑。 276

正如一本侦探小说一样，事情很快和有力地得到解释。仿佛我是一个反苏阴谋网的活动家……为消灭政府成员发明毒药……军人也参加了阴谋……侦探步步跟踪他们，现在一切都已查明，只缺我们的口供。

唉！我实在帮不上侦查员的忙，我不断地说，任何阴谋我都不知道，也没有接触任何搞阴谋的人。

过了三十年，我才从最高法院的决议中得知，所谓阴谋分子共三十三人，这个案件叫'三十三人案'，但这样的阴谋根本不存在……所有审讯都是夜里进行的，许多人都是通宵受审，这是疲劳战术……但是受审时犯人是坐着的。

一个月后，我作为已经进行过处理的人被转移到布蒂尔卡监狱。

部分犯人直接睡在水泥地上，有些人什么铺的东西也没有。我在时这个牢房共六十至八十人，其中有几个教授，主要是技术专家，不下五十名工程师和一些军人、作家和演员。不怪当时的监狱被爱说俏皮话的人说成'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休养所'。

……几乎所有的犯人当时通过审讯很快就屈服了，并在异常离奇的供词下面签名。实质上没有什么审问，只是逼供，威胁处以枪决，逮捕家属或许愿从宽处理。对党员经常要求他们'服从党的纪律'。 277

斗争有什么意思？所有的人从'沙赫特'和'拉姆辛'案件中吸取了充分的教训，只有诬告自己和别人才能活下来。谁想保持自己高尚品质，谁就会死亡。谁也没有对这些供词的价值有不切实际的想法。有些人对自己的堕落很难过，但多数人完全不管事情

的道德方面了——以卵击石，没有用！

……我没有照别人走的路子走去，所以受到惩罚；没有判处枪决，改判十年徒刑，并在刑满后还给我规定了各种‘中央禁令’①”。②

空军工程师C·M·丹斯克尔也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了有关情况。“1930年初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飞机制造试验第二十五厂工作。同年第二十五厂与第三十九厂合并，并搬到第三十九厂厂址。在第三十九厂（后来以明仁斯基命名）院里有一个飞机棚，被改为住所。在这里住着被捕的二十名老工程师，他们只有到工厂去工作的权利，不能到工厂外面去。这些没有自由的工程师被工厂的工作人员称为暗害者工程师。我记得以下十三人的名字：Д·П·格利哥罗维奇——航空设计师；H·H·波利卡尔波夫——航空设计师；A·B·纳达什克维奇——飞机装备工程师；П·M·克雷松——平衡试验工程师；Б·Ф·冈恰罗夫——气体动力学工程师；И·M·科斯特金——生产组织者；蒂索夫——计划师；沃兹涅先斯基——计划师；舍尔巴科夫——电炉设计师；德聂普罗夫——发动机专家；涅克拉索夫——教授；A·H·希杰里尼科夫——设计师……我观察了所有住在第七号飞机棚的暗害者。对那些和我有直接工作关系的人我有可能在两年中仔细进行观察。结果，我得到这样的结论，他们不是罪犯，而是一些很正派的人，甚至是很高尚的人。他们说话算数，保证做到的都按期完成。如果生产需要的话，甚至是在夜里，我通过看守第七号飞机棚的红军战士叫他们，他们马上就起来，到设计局办公室去，经过计算在值勤表上填写技术决定，使试验飞机的生产连夜里都能不停地进行。经过两年的观察我这样想：

这是一批有文化的有知识的专家，有很高的组织性，技术水平

---

① “中央禁令”即为重要政治犯刑满释放后做的各种规定，如不能在首都居住等等。——译者

② 德·维特科夫斯基在苏共二十二大后被平反。他的小说至今没有发表，但是有一个出版社已接收了手稿。

很高的认真负责的工程师，而且是很正派的，很诚实的工作人员。我们这些年轻工程师应向他们学很多东西。

他们根本不是什么破坏者！”①

对技术知识分子和其他专家的毫无根据的迫害，如果没有我党许多著名领导人的抗议，——当时斯大林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构还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那么这一镇压的规模会更大得多。例如，由于集团军军长雅基尔和有名的契卡叶甫多基莫夫的保护许多忠诚的军事专家被释放出来。他们还坚持在政治局讨论“军人案件”，使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得不重新进行判决。

卢那察尔斯基也反对在高等学校中进行过份频繁的迫害和清洗。谢·奥尔忠尼启泽坚决反对逮捕许多忠诚的和很有成绩的技术专家。② 但是那时绝大多数的受害者是在二十大后才被平反的。 279

* * *

实行非常措施政策和后来同时进行的消灭富农之为阶级和普遍集体化意味着农村中新经济政策的结束。同时城市经济形势的恶化，配给制的实行和其它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重来——这一切也极大妨碍了城市中新经济政策的实现。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城市和农村中新经济政策的政治和经济潜力都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不过，斯大林在这一时期已不考虑实行新经济政策了。第一

---

① 1932 年在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第一五六厂建立了由犯人专家组成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设计局——第二十九号。这个特种设计局就是丹斯克尔所提到的那些“航空设计师”所在的地方。关于他们后来的命运在未发表的匿名文章《图波列夫禁闭所》中提到。

② 应该指出，我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对三十年代初我们的监狱和集中营关了些什么样的“暗害分子”不是不明白的。谢·奥尔忠尼启泽于 1934 年告诉第九号军事联合企业的中央代表 A·B·斯涅戈夫说：“听说你需要专家，我可以给你三名优秀专家——他们是‘暗害分子’。如果你对他们很友好，而且不提他们的过去，那么他们会好好工作的。”确实如此，很快就被押送来三名专家，他们在许多方面帮助了厂子，把生产搞得很好。

个五年计划一开始，许多私人小企业被迫停产，另外强硬的税收政策也迫使私人活动停止。对小企业主——耐普曼，斯大林所实行的是强迫甚至恐怖政策。在这方面最值得提到的是所谓"黄金"运动，就是要求许多私商和企业主交给国家他们所保存的黄金。那些拖延不交黄金的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他们并作为人质直关到他们的家属交出黄金为止。① 这一镇压运动完全是滥用职权，只不过是把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作为借口。

280 总之，由于国内的困难，为了增加国库的黄金和外汇储备，斯大林是不择手段的。例如，他允许将一些国家文物卖给外国。其中，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出售了爱尔米达日② 保存的著名画家的一些画：替善的、拉斐尔的、魏拉斯科斯的、伦勃朗的、鲁本斯的、华托的、等等。

还应该指出，由于对专家们的迫害，在"沙赫特"事件前特别是"沙赫特"事件后，许多著名的技术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逃到国外。这一切都对我国造成巨大的损失。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新经济政策是1937年结束的。他们的理由通常是指三十年代前半期大部分农民还没有集体化这一事实。我们认为，对新经济政策这样的分阶段的作法是错误的。新经济政策作为对农民、私营工业及私营商业的特定政策早在 1929—1930 年实际上已结束了。整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超出了新经济政策范围。此时，新经济政策的结束并没有经济需要的根据，它的潜力并没有被利用到底，因此我国工业的总发展并不是加快了，而是放慢了。对这一错误的"提前"取消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应该进一步深入地加以研究。

---

① 应当指出，被没收的黄金的相当部分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衣工作人员不久前在私人市场上出售给耐普曼分子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巩固正在贬值的苏联卢布和减少货币流通量而做的。这里可以看到目的和手段之间的极大矛盾。

② 世界著名的列宁格勒美术博物馆。——译者

五、党内的镇压和党内制度的残酷化

从前面各节可以看到，斯大林远在1937年以前在进行对非无产阶级分子的镇压和迫害时已在准备和磨刀霍霍要对付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党了。

当然，就在那时许多人已领教过斯大林的厉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内制度越来越残酷化，而斯大林开始从使用党内迫害的方法越来越转向使用政治恐怖的方法。例如，"联盟局"案件以后不久，达·波·梁赞诺夫被开除了党籍，然后他又被捕了；梁赞诺夫是马恩研究院的组织者，为寻找和公布大量的有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手稿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梁赞诺夫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早就颇有讽刺挖苦之意，所以他的名字不断出现在"联盟局"案件被审讯的犯人的假供词中，这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三十年代初期在托洛茨基分子中间也进行了相当规模的逮捕。1932—1933年期间逮捕了几百名托洛茨基分子，其中包括过去是我党有名的活动家伊·尼·斯米尔诺夫，只因为他们和托洛茨基有联系(时常是伪造的)。原革命社会党人勃鲁姆金事件也是应该搞清楚的，1918年社会革命党曾安排他暗杀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勃鲁姆金被契卡机构逮捕后，根据列宁的批准被捷尔任斯基赦免了。后来他参加了契卡的工作。三十年代初期他到国外秘密会见了托洛茨基，但是回苏联后他又被捕了，而且后来被枪毙了。有一种说法，说他是由于和托洛茨基有联系而被逮捕的，另一说法(是拉脱维亚地下工作者И·И·桑德列尔讲的，他后来曾囚禁在沃尔库塔集中营)是：勃鲁姆金接受的任务就是取得托洛茨基的信任，乘机暗杀他。他确实取得了托洛茨基的信任，但是他不忍心杀害托洛茨基，所以回莫斯科后被枪决了。

三十年代初期还对所谓"民族主义倾向派"进行了相当广泛的

281

迫害运动。如果否定一些加盟共和国有时在外国怂恿下存在过的一些民族主义派别，那是不对的。但是斯大林三十年代初期借口反对民族主义，开始系统地限制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和破坏列宁制订的民族政策的基础。这必然引起了许多国际主义者党员的反对，因为他们随意被污蔑为民族主义倾向派。我们且不必说斯大林对一些不顺他心的共和国的党内同志经常夸大他们的错误，说成是无比重大的问题，对这些忠诚的党的干部进行粗暴的和毫无根据的批评。乌克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尼·斯克雷普尼克在三十年代初就遭受了这样的批评。

大家知道，斯克雷普尼克早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讨论列宁是否出席临时政府的法庭的时候就批评过当时立场不明确和不坚定的斯大林。1918 年斯克雷普尼克就斯大林对乌克兰态度问题，对这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斯克雷普尼克对斯大林作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毫无内容、十分抽象的报告，提出了批评。

当然，斯克雷普尼克在民族问题上的言论也远不是永久正确的。由斯克雷普尼克领导的"乌克兰化"运动也不是没有错误和过分醉心于乌克兰化问题。而且在一些地方某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也被安插进来，参加了这一运动。斯大林和波斯蒂舍夫对斯克雷普尼克的错误不是采取同志式的党内批评态度，不是对乌克兰这样的复杂民族政策问题进行坦率的讨论，而是掀起了一次大的政治运动，把所有滔天大罪强加在他的头上，甚至差一点把他说成是在文化战线上支持阶级敌人。同时把所谓"乌克兰解放联盟"案件有关的显然是伪造的材料也搬出来了。波斯蒂舍夫在一次讲话中说："'乌克兰解放联盟'案件已经表明，民族主义反革命派在乌克兰的最核心力量是在高等院校和劳动学校中，在科学院，出版社和作家组织中。但是乌克兰共产党（布）从这次案件中得出了哪些必要的结论呢？没有，它什么结论也没有做出。这种反映迟钝

的状态有时甚至失掉布尔什维克警惕性，使我们不得不在1933年说清楚：到最近为止，在斯克雷普尼克同志领导的领域内，我指的是乌克兰教育部和整个教育机构系统，混入的暗害分子、反革命分子、民族主义分子的数量最多。正是在这些机构中暗害分子表现得最猖狂，他们把自己的人安插在思想战线最重要的领导岗位上。"①

283

这些粗暴的做法经常还伴随有公然的造谣中伤，最后在乌克兰以悲剧告终。许多很宝贵的民族知识分子干部被诬陷中伤，有些乌克兰文化界的忠实干部受到迫害（从撤职到逮捕）。至于斯克雷普尼克本人，因为他受到了陷害围攻于1933年自杀身死了。②

在亚美尼亚，共和国有名的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教育人民委员涅·斯切潘尼扬三十年代初因"民族主义"的罪名被撤职。著名的苏维埃亚美尼亚诗人叶·查连茨也遭陷害，他写的《道路》一书被禁止，引起了许多亚美尼亚知识分子著名代表人物的强烈抗议（A·塔马尼扬院士，人民画家M·萨里扬等）。作家阿·巴孔茨也受到不公道的迫害。③

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和党机构的许多负责干部也于三十年代初期，因"民族主义"的罪名被捕。例如：名作家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活动家巴图，某科学研究所的领导人拉姆齐等。

这一时期，党内的一些小派别的成员也遭到严重的迫害。

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原反对派和他们组织的领导人在三十年代初期以前就已被镇压下去了，他们不再反对斯大林的政策。但是党内对这一政策的不满还是存在的。反映了这种不满的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维·维·洛米纳泽，1930年初他是外高加索区党委第一书记。洛米纳泽反对不重视工农的日常生活需要的态度，反对欺上瞒下的作风，反对外高加索某些党的干部封建老爷式

284

① 巴·波斯蒂舍夫：《从十六大到十七大言论集》莫斯科1934年版第59、203页。

② 《消息报》1962年1月25日。

③ 见Ц·阿加扬：《涅·斯切潘尼扬》埃里温1967年版第44—47页。

的蜕化变质(为此，洛米纳泽和他的助手尼·查普林通过区委会下达过一个专门决议)。著名的党工作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谢·伊·司尔佐夫也对斯大林的政策表示不满。司尔佐夫和同他意见相同的人反对过分扩大基本建设战线。他提醒人们注意农村中形成的极端困难局面，特别是在畜牧业方面，并提出：现在说什么社会主义在农村的胜利以及说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建设即将完成这类的话还为时过早。

1930年洛米纳泽到莫斯科找过司尔佐夫，他们俩人一连几小时谈了党和国家大事。斯大林知道了他们这次的谈话。为了编造什么司尔佐夫和洛米纳泽建立"右—左集团"的说法，这件事就足够了。报刊中开始粗暴地批评这一从来未存在过的"集团"以及胡诌出来的它的成员(其中有拉·沙茨金)。1930年12月司尔佐夫和洛米纳泽被开除中央。这件事是违背党章规定的，因为没有通过中央委员会和中监委全会，而是在中央政治局和中监委主席团会议上通过的。司尔佐夫被撤了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议主席的职务并被任命为唱片厂厂长。洛米纳泽也从外高加索区委会被召回来，他起初在商业部工作，后来被派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任市委书记。

三十年代初党内出现的另一个反对斯大林的反对派小组是M·H·留京小组。留京本人1930年是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早先是莫斯科市某区的负责人。留京和П·A·加尔金看到集体化和工业化出现了挫折，他们反对党内制度的残酷化，于是在莫 285 斯科组织了约十五至二十人的反对派小组。这个小组同布哈林的一些学生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个别拥护者有联系。过去是党的著名工作者彼·格·彼得罗夫斯基、尼·亚·乌格拉诺夫以及著名的哲学家扬·埃·斯特恩等都知道有这样一个小组存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看过留京小组的一些文件。

留京小组基本上是秘密性质的，他提出的任务是：改革党领导

的政策，使之更多地民主化、更多地考虑工农的利益，停止党内的迫害活动等等。留京认为，进行这些改变的主要前提是撤掉斯大林的职务。实际上据朋友们说，留京从斯大林被任命为总书记最初几个月起就反对斯大林。根据了解留京的Р·Г·阿里哈诺娃的说法，留京和接近他的持相同政见的人不止一次地谈过暗杀斯大林问题，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唯一摆脱他的办法。但是留京小组并没有作过任何准备或企图实现暗害的行为。

斯大林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机构了解到留京—加尔金小组的存在。他们很快受到了惩罚。斯大林蛊惑人心地指控留京和他的持相同政见者们策划了反革命阴谋，建立了“富农组织”，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不仅坚持逮捕了这个小组的多数成员，而且要求枪毙它的领导人。但是政治局没有同意斯大林的要求，只通过了开除这个小组成员的党籍并把多数人流放到边缘城市和地区去居住的决定。

《真理报》1932年10月11日发表了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1932年10月9日的如下决定：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在研究了留京、伊万诺夫、加尔金等反革命小组的成员和同谋者案件材料后决定：

236

第一节

留京（已被开除党籍）——伊万诺夫（党员）——加尔金（党员）反革命小组的成员和共谋者已经蜕化成为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工人阶级和党的叛徒，他们企图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用欺骗的方法通过秘密途径组织一个资产阶级富农组织，以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特别是富农阶级，因此将下列成员开除党籍：

1.П·А·加尔金，原右倾小组的成员，反革命小组的组织者；

2.М·С·伊万诺夫，反革命小组的组织者和秘书；

3.П·М·扎米亚京，1921—1924年曾被开除过党籍并因右倾机会主义的活动受到党内处分，反革命小组的组织者。

4.П·П·费多罗夫，1914--1920年为社会革命党人，反革命

小组的组织者。

5.В・И・杰米多夫，因对右倾机会主义者采取调和态度被撤除党的工作，反革命小组的组织者。

6.瓦・尼・卡尤罗夫，反革命小组的组织者，和原‘工人反对派’进行联系的全权代表。

7.А・В・卡尤罗夫，反革命小组的成员之一，印刷和散发小组的反革命材料。

8.А・Н・斯列普科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两次被开除党籍，协助反革命小组散发材料。

9.Д・П・马列茨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开除过党籍，协助散发反革命材料……等等(共二十人)

第二节

287 将下列诸人开除党籍，给予他们根据表现一年后提出重新研究本决定的权利：

1.扬・埃・斯特恩，原‘左派’机会主义反对派参加者，散发小组的反革命文件并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讯问时提供假口供。

2.彼・格・彼得罗夫斯基，原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派的参加者，对党隐瞒此小组的存在，协助了小组的反革命活动。

3.尼・亚・乌格拉诺夫，原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派参加者，了解该小组的存在及反革命活动，对党隐瞒，并协助了该小组的反革命活动。

4.М・Е・拉维奇-切尔卡斯基，对党隐瞒了他和该反革命小组的联系(接受文件)，促使了该小组的活动。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①

上述决定提到的多数党员很快表示了“悔过”并恢复了党籍，回到了莫斯科。但是1936—1938年大规模镇压开始后他们都遭

① 《真理报》1932年10月11日。

逮捕，并被消灭了。

显然由于党内镇压的开始，也由于对自己丈夫的越来越深的失望，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于1932年11月自杀了，她长期在联共（布）中央机关里工作，后来在工业学院学习。

三十年代初期，社会科学方面也发生了完全不正常的情况。例如，有关某些布尔什维主义历史问题斯大林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著名的信，这封形式异常粗暴，内容也非没有错误的信，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掀起了最初的迫害浪潮。许多历史学家被撤职，一些人甚至不公平地被开除党籍。1931年11月底历史研究所在给共产主义研究院主席团的信中说："历史研究所为了执行斯大林同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信中的指示，进行了以下工作：1）审查了历史研究所科研人员队伍，对那些伪造布尔什维主义历史和根据斯大林同志信中指示精神对不能完成历史科学当前提出的任务的那些工作人员，免除他们在研究所的职务。……4）改变了研究所的组织结构：取消了室……建立研究当务之急的历史问题的工作小组。"历史研究所被免职的有：И·М·阿里特尔和А·Г·斯卢茨基，斯卢茨基还被开除联共（布）候补党员的党籍。《联共（布）党史》多卷集的一些作者也被开除了党籍（Н·埃尔沃夫和Г·瓦克斯）。叶·雅罗斯拉夫斯基也受到批评。①

许多和历史学有关的科学领域也受到迫害。例如：共产主义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在1930—1932年工作回顾中说："根据斯大林同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信中的指示精神，共产主义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不仅在历史战线上展开了广泛的布尔什维主义历史领域中的揭露和解释工作，根除了托洛茨基主义、卢森堡主义、孟什维主义反革命匪帮，而且在经济、农业、文学和其它战线上也进行了同样的工作。列宁格勒分院的工作人员在党的区一级和州一级代表会上，在积极分子会上都做了报告，帮助党的组织阐明

---

① 见В·А·杜纳也夫斯基在《近代和现代欧洲》专集中的文章，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66年版第508—510页。

斯大林同志的这一指示的意义已远远超出苏联的理论战线。”①

三十年代初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卡冈诺维奇领导了对我党的著名活动家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迫害，那时，他的错误就被毫无道理地夸大了。

289 遗憾的是，至今还有人企图武断地辱骂波克罗夫斯基的活动，说什么他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列举波克罗夫斯基作为科学家和党的活动家在长期实践中确实犯过的科学和政治领域中的错误。但是难道只有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的人我们才称之为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者吗？恰恰是列宁不止一次地称米·波克罗夫斯基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在哲学“战线”上也出现了不能容许的过火行为。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研究德波林学派和杰米利亚泽夫——萨拉比扬诺夫派的哲学家们的著作中有什么错误。但是不能不指出，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同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谈了关于哲学战线的问题之后，哲学方面的争论变得异常粗暴。哲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各派之间的斗争采取了对付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敌人的形式。其结果不少著名的有才能的苏联哲学家遭到诬陷，在很多的情况下他们被撤职。正是在这些年代，哲学战线上象米丁、尤金和康斯坦丁诺夫这些人被提到第一位，但是他们的长期工作并没有给我们的苏联哲学带来任何富有成果的思想。二十多年来哲学文献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公式化、简单化和机械化，这些东西只是用辩证法的词句掩盖着而已！

三十年代初的斗争方式简直无所不包！什么反对“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的售宾派”的斗争，反对“布哈林的波格丹诺夫机械主义理论”的斗争，反对生物学方法论中的“莱科夫思想”的斗争，反对文学研究中的“沃龙思想”和“彼列维泽夫思想”的斗争，反对哲学中的“孟什维主义的唯心主义”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主义的修正”的斗争，反对教育学中的“学校消亡论”的斗争等等。在几乎

① 见B·A·杜纳也夫斯基在《近代和现代欧洲》专集中的文章，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66年版第509页。

所有这些斗争中都伴随着过火行为和颠倒事实的作法，提法上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差别被上纲为“原则上的区别”。提法上的一些不 290 确切之处就会有人试图在这里找出敌人的影响，在“革命警惕性”口号下，急燥情绪，粗暴的作风，以及宗派主义的狭隘性滋长起来了。例如，有一篇文章给新闻记者提出了如下的合情合理的建议：“报刊的同行们，读者们请求你们不要教训他们，不要号召，不要催逼他们，而是有条理地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阐明事情本身的真象，并说清楚它是在什么时候和如何发生的。教训和号召就会自然地得出来了。”针对这样合情合理的建议，共产主义新闻学院会议上却通过了一项专门决议，决议上说：“这是非常有害的资产阶级理论，这种理论否定布尔什维克报刊的组织作用，这些理论必须被彻底粉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共产主义新闻学院所使用的语言真是同所谓“文化大革命”期间各中国大学红卫兵出的大字报的语言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正是在1930—1933年期间，特·德·李森科和其他一些没有什么名望的科学界的冒险主义分子飞黄腾达的历程开始了。

在这个时期文学方面也形成了无法忍受的局面。

作家维·卡维林于1966年写道：“近几天我翻阅了一下《在文学岗位上》杂志三年(1928—1930年)合订本。那时，这些写得如此讲究的讽刺作品是使人惊叹的阅读材料。全部作品充满了威胁。文学被任意曲伸，象制作一张弓那样，在这弓里边的是被捧得天花乱坠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虚伪的拉普① 文学，某些人在塑造敌人，某些人在抚摩朋友。但是昨天的朋友如果跨到这神秘的弓弦之外，那么他马上就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然而这个弓弦界限有时被去掉，然后用新的界限来代替它并用新的证据去说明新的界限是不容争辩的。杂志充满了仇恨。另外一个看不见的凝结力就是嫉妒——这是更为可怕的力量，因为谁都不承认它，相反都在极

① 拉普是1925—1932年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简称。——译者

力谴责它。许多人的名字，只是浮光掠影地闪现了一下，当时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记住他，而现在早已都被完全忘怀了——这些人曾291作为文学的样板被需要过。另一些人变成了阶下囚，受到审判，被判了刑。布洛克被指责为'缺乏和集体的联系'（伊·格罗斯曼-罗辛）。马雅可夫斯基也被列为有嫌疑，令人失望，不可信任的人里面去……读《在文学的岗位上》杂志时，我在问自己：怀疑是从那里来的？头脑发热又是从那里来的？同我们的文学进行这样危险的儿戏是受了什么东西的鼓舞？我们文学的血管里本来流着新鲜的血液，它从心理上和革命紧密连在一起的，而且本来是正在正确的道路上向前迅速地发展着。难道是因为有人可能篡夺政权，难道是由于胜利冲昏了头脑？而这些说法在杂志里是郑重其事地逻辑清晰地被谈论着，可是今天看起来是多么可笑！"①

遗憾的是，三十年代初期文学界的气氛继续白热化。这一时期，就连象捷米扬·别德内依这样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著名代表人物，十月革命的诗人也受到毫无根据的粗暴的批评。斯大林对别德内依的一些诗（《从炉坑上爬下来吧》、《无情》等）进行了有道理的批评的同时，却对别德内依的人格和布尔什维克品质进行了粗暴的完全不能容忍的污辱。

由于上述的和其它许多"审查"运动，苏联的知识分子队伍被分裂了，在多数研究所，高等院校，作家和其它艺术组织中形成了争吵，造谣中伤，打小报告，污辱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对方的气氛。这种状况就是在当时也是不正常的，但这种情况被说成是在苏联阶级斗争形势尖锐化的表现。

三十年代初期在一系列外国共产党内也形成了十分艰难的形势，因为在这些党内也同"右倾"及"左倾"进行了残酷的斗争，而且往往是模仿我们党的斗争形式，同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斗争。在个别情况下甚至运用更为残酷的镇压形式。例如，早在二十年代末期，

① 《新世界》杂志 1966 年第 11 期第 141—142 页。

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把西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活动中的一些错误拚命夸大并沉重地打击了这个党。三十年代初期西乌克兰共产党又 292 被武断地和毫无根据地被指控为犯了叛卖罪，以 M·T·扎雅奇科夫斯基和 Г·B·伊万年科为首的许多领导人成了非法迫害的牺牲品。①

1933 年西白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也遭到了同样沉重的打击。原波兰议会的代表 П·П·沃洛申、Ф·И·沃雷涅茨，И·E·加甫里利克及其他共产党人被资产阶级的波兰判处徒刑，坐牢多年，后来被苏联政府交换回来，在苏联政府避难。可是后来他们被诬告为进行反革命和反苏活动而遭逮捕，同时遭到逮捕的还有西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Я·波勃罗维奇，A·Г·卡普茨基，П·A·科林采维奇，Л·И·罗德泽维奇等等。②

六、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在国际工运方面的政策

还必须简单地提到斯大林（以及他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三十年代初期在国际工运方面的政策。

震动资本主义世界的 1929—1933 年经济和财政危机引起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危机。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性的不满不但导致左派革命政党和小组的进一步加强，而且在这些年里许多国家里法西斯运动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了。法西斯作为最反动的，极右的民族主义运动利用了在社会上蛊惑人心的方法和群众的迷信思想，企图把一切有不满情绪的人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欺骗他们，为自己建立一个群众基础，然后孤立并粉碎工人阶级的最有组织性的和自觉的部分。法西斯主义不仅把自己打击的矛头指向共产党人，而且也指向社会民主党人，工会和所 293

① 《乌克兰真理报》1963 年 10 月 11 日和 11 月 18 日。

② 《共产党人》杂志 1963 年第 10 期。

有其它工人组织。法西斯主义也反对各种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企图夺去劳动人民在长期政治斗争中得来的那些民主自由权利。早在二十年代，法西斯在意大利取得了胜利。三十年代初期德国也出现了法西斯专政胜利的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德国当时是西欧最大的经济上发达的国家。

西方一些进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分析欧洲某些国家法西斯之所以能胜利的诸因素时也把苏联的影响算了进去。在这里指的并不是西方资产阶级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恐惧，而是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和小资产阶级对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灰心失望，因为苏联并没有发展成为无阶级的社会，而是一次又一次地经受了大规模镇压的震动。（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危机导致组织的瓦解，这种状态在适当的时候可能接受法西斯、民族社会主义等形式。）这是有道理的。我们必须去深刻研究与斯大林活动有关的那些对马列主义的歪曲以及他的罪行对整个国际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完全清楚的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苏联农村中的暴力浪潮，"黄金运动"，对技术专家的恐怖手段——这一切破坏手段及过火行为大大削弱了西方的革命运动。为什么 1929—1933 年间的空前罕见的资本主义危机却什么地方都没有引起革命形势，而且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加强了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大量群众，甚至一部分工人阶级在危机期间不是向左转，而是动摇，转向右翼，在一些国家里形成了法西斯运动的群众基础呢？不容怀疑，当时从苏联传出来的各种消息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这些事情的发生，当然我们的敌人也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消息以进行反共的宣传。

294 但是在本节里我想说的不是斯大林对内政策如何影响了法西斯运动，而是谈谈斯大林的政策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

资本主义国家中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使共产党政策必然会有一定的转变。在新的情况下争取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反法西斯全民战线具有特殊意义。这就是说，要执

行接近社会民主党并与之开展统一的行动，因为这些党在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中仍然是占优势的力量。但是这一转变并没有能够及时实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在十分残酷尖锐的相互斗争中，继续消耗自己的力量，使双方力量削弱，这在当时只对法西斯有利。当然，这种悲惨的局面的责任，主要应由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头子来负，因为他们已陷进反共的泥坑里去了。但是斯大林和以他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上的责任也不比他们小。

这一悲惨结局的一些主观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能原谅的）。大家知道，俄国的革命运动长期以来都伴随着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的尖锐斗争，而且还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党派进行尖锐的斗争。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最侮辱性的称呼就是指责他是社会民主主义或孟什维主义。

还应该看到，在俄国二月革命后，当时真正资产阶级政党（十月党人及立宪民主党人）对革命人民群众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正是这些政党同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建立了联盟，才保证了在国内维持资产阶级政权。毫不奇怪，在十月革命前夕的决定性的月份里，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任务就是孤立这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消除这些妥协性政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正是这些政党在十月武装起义成功以后就从政权机构中清除出去了。

295

1918—1923年间革命高潮时期，德国及西欧其它许多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形势。这时，正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帮助资产阶级维持政权并且去扑灭革命运动。所以，当时年轻的共产党把自己的火力集中在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批评方面，这是很自然的。

当然，当时也不应该象斯大林那样称社会民主党人为“社会法西斯”，“法西斯的温和之翼”，“法西斯的主要社会支柱”，这是不对的。不过，同样的称呼在当时时常可以从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口里听到。这些说法甚至写进了共产国际纲领中（1928年），纲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就是布哈林。

如果说共产国际在二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

党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话，那么可惜的是到1929—1934年时期就不能这样说了。

欧洲的资产阶级在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后越来越依靠的力量已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本阶级的右翼党。在意大利和德国这样的国家里（在亚洲是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主要依靠的力量是法西斯运动，并打算借助这一运动去对付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几乎所有国家中社会民主党已经被排挤出政权之外，这以后他们就变成了反对派。许多社会民主党在法西斯威胁面前所持的立场，完全可以肯定是反法西斯的，虽然不是非常彻底的。

无可怀疑，在这种新条件下如果是列宁的话，他就会及时地作出必要的政治上的转弯。但是斯大林在这些年里，是不胜任的，他在三十年代初期继续坚持首先去反对社会民主党。例如，1931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在斯大林的影响下通过了这样的决定："反法西斯斗争的顺利开展要求共产党动员群众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形式，反对它为法西斯专政扫除道路的一切反动措施。这一斗争要求迅速而坚决地纠正一切错误，即随意地将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对立起来，将资产阶级专政的议会形式和公开的法西斯形式对立起来，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在共产党队伍中的反映。"①（对斯大林来说，对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形式持这种特别敌对的态度，完全可能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斯大林在我国不断违犯起码的民主原则，没有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深化和扩大，所以他不可能也不愿意承认资产阶级民主的积极意义。）

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尤其热衷于反对那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有相当影响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正是斯大林称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为社会民主主义最危险和危害最大的潮流，因为按斯大林的说法，他们用伪装的革命性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本质使人民脱离

① 《共产党及资本主义危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速记稿，莫斯科党出版社1932年版第626页。

共产党人。对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这种态度是异常错误的。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后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就是在左翼社会民主小组基础上产生的。列宁称罗沙·卢森堡为“山鹰”、“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革命无产阶级和不是伪装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可是斯大林在1930年初却开展了反“卢森堡主义”的斗争。大家还知道，在反法西斯战争过程中和战后，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不仅同共产党结成了统一战线，而且后来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值得指出，东欧各国的左翼社会党战后和共产党合并了。但是这一进程显然因为战前斯大林犯的错误和宗派主义的政策受到了干扰。 297

对社会民主党及其他反法西斯组织的这种宗派主义政策，在德国，即法西斯威胁最大的国家里带来了特别大的危害。在三十年代初期德国共产党在执行“下层”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在它致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的宣传材料中却仍然继续坚持斯大林的所谓“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提法。例如，当时德共的一张传单中写道：“法西斯主义的另一个很不容易辨认清楚，却是极为有害的变种，就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甚至在1932年7月，法西斯上台的前夕德共的一个文件还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当社会民主党的头子还在群众中享有威信时，工人阶级要联合起来进行反对法西斯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无能为力的。无论在帕平时期还是在布留宁时期他们都起着资产阶级专政的执行机构的作用。”[1] 这件事发生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已完全肯定把赌注压在法西斯党上，并且为实现这一点已决定牺牲自己原来的走卒——右翼社会民主党头子——的时候。

斯大林的错误观点也反映在德国共产党对待工会的政策上。共产党人不去加强在工会内部反对改良主义分子的斗争，却是提出退出改良主义工会并建立独立的工会的任务。这使共产党脱离了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共产党在自己的日常宣传中忽视了宣传 298

---

① 见《近代和现代欧洲》专集中 Л·И·金茨别尔格的文章，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66年版第675—676页。

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对工人阶级的重大意义，这一忽视也是荒谬的。

在德国共产党内宣传斯大林论点最积极的是诺伊曼-勒麦烈集团。勒麦烈甚至于1931年在国会中宣布："法西斯统治，法西斯政府并不会吓倒我们。他会比任何政府更加迅速地崩溃。"① 1932年夏天这个集团在德共内部被粉碎了，但宗派主义影响还是很强大的。

苏联政论家恩斯特·亨利在给伊·爱伦堡的信中写道："斯大林的话对共产国际正如对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一样是命令。这些话使工人之间似乎形成了一道街垒。

……老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不仅从内心深处都感到了侮辱，而且异常愤怒。他们绝不会在这一问题上原谅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却咬牙切齿，执行他们'决死斗争'的命令。命令就是命令，党的纪律就是纪律。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如同疯子一样在法西斯面前厮杀正酣。这点我记得很清楚。我那时住在德国，我永远忘不了老同志怎样握紧着拳头，气愤地看着一切走向崩溃，忘记不了社会民主党头子如何兴高采烈，忘记不了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一理论如何月复一月，周复一周在为希特勒铺平道路。他们握紧着拳头，服从（斯大林的）'智慧'和'意志'，他们正走向那已在等待着他们的法西斯的刑讯室。"②

这些年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给意大利共产党的指示是完全错误的，当时这个国家的法西斯已经执政约十年了。意大利的许多共产党人建议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并同社会民主党合作。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这些正确建议的 299 评价是"廉价的右倾机会主义"。1930年初听了意大利共产党报告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给了这个党如下指示："有一小部分同志认为，如果资产阶级民主能取代法西斯主义，就会为工人阶级

① 见《近代和现代欧洲》专集中Л.И.金茨别尔格的文章，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66年版第676页。

② 未发表的手稿，1965年。

取得政权的斗争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使共产党合法化）……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在现阶段共产党应该和社会民主党并肩战斗，以便用民主取代法西斯主义。但是资产阶级实际上完全满足于法西斯专政，并不想用什么民主形式去取代它。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同法西斯斗争，而且，实际上是和它合作。真正反对法西斯专政的唯一的政党是共产党。因此它应该为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为什么民主幻想进行斗争。”①

甚至法西斯在德国取得胜利以后，共产国际领导的宗派主义情绪仍是如此严重，以致于当莫里斯·多列士在 1934 年 10 月向自由党提出建立人民阵线的建议时，共产国际认为这是机会主义并要求莫·多列士放弃他提出的建立人民阵线的建议。但法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建议，这就是法西斯在法国始终没有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②

大家知道，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虽然开得迟了，但是由于格·季米特洛夫的倡议，基本上改正了过去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所犯的许多错误。在七大决议后，斯大林的宗派主义政策在不小的程度上还继续阻挠许多国家实现统一战线政策。值得指出的是，在象七大这样重要的共产党人的集会上斯大林并没有讲话。斯大林也没有对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公开表示自己的态度。在联共（布）第十八次大会的工作报告中他也没有提到共产国际提出的口号和通过的决议。

300

斯大林对统一战线政策采取的明显冷淡的和暗中反对的态度严重影响了西班牙反法西斯民主革命的进程以及紧接着发生的 1936—1939 年的内战。众所周知，苏联帮助了西班牙共和政体拥护者们和西班牙共产党人。但是这一援助比起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给与佛朗哥将军的援助小得无法比较。正是这一原故最终决定了西班牙民主革命的悲惨结局，然而西班牙革命原来有希望转变

① 《布尔什维克》杂志 1930 年第 5 期第 7 页。

②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 1965 年第 12 期第 20 页。

为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在这些年代正在过分忙于苏联内部的镇压活动。正是在1936—1939年期间为消灭一切斯大林不称心的人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机构。如果在苏联被消灭的苏联的和外国的共产党人的十分之一能去西班牙参加战斗，那么西班牙革命的命运将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同时，在没有对西班牙给以应有的援助的情况下，斯大林经常干涉西班牙的事务，阻挠他们实行正确和明智的统一的人民战线政策，他甚至坚持从肉体上消灭一些左派组织和政治活动家，斯大林在西班牙的代表毫无根据地指控这些人秘密同法西斯合作。

七、国内和党内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开始

在谈到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时，当然不能不提到越来越增长的对他的个人迷信。正是这点混淆了一切关系，把斯大林和社会主义，共产党等同起来，使许多共产党员不能把斯大林的个人活动同整个党及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区别开来。

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当然并不是一下子出现的，一天工夫就形成的。也许从二十年代初期我党的生活中就已开始有一些个人 301 迷信性质的不正常现象。党的组织开始采取脱离群众、与世隔绝的态度。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界限加深起来，党内的军事化和命令主义的因素又发展起来，而党内民主得不到扩大。当时党内还没有形成对个别人的迷信现象，但是对这样的一些概念，如：党、苏维埃国家、革命、无产阶级已开始产生宗教迷信式的态度。对党员已经灌输这样的教育，说全党是不会有错误的，党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在党面前不能有任何保密的事情，即使是完全私人性质的秘密，在党面前什么都应该是公开的，如在上帝面前忏悔时那样。为了党和国家共产党员什么事情都应该去做——任何惨无人道的行为在革命面前都可以得到谅解。

早在列宁去世的时候，伟大的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写的纪

念列宁的长诗里说道：

“我害怕
　　送葬的人群、
　　　陵寝
　　和早已规定好的
　　　尊崇的仪式
　　会象甜腻腻的圣油一样
　　　浸没了
　　列宁的
　　　纯朴。
……………………
　　那代替头颅的辉煌的圣光
　　我害怕
　　会遮蔽了
　　　真实的、
　　　英明的、
　　　人的、
　　列宁的
　　　巨大的前额。”

马雅科夫斯基所担心的事情很快就成为现实了。早在1925年在我们国家里和党内对列宁开始出现十分明显的宗教崇拜的态度，真正的个人迷信已初具规模，这些东西离开我党的思想原则的实质，是非常远的。

对党的迷信，对列宁的迷信很快就转到对列宁的学生、对新的领袖，首先是对政治局委员的迷信。不但街道、工厂、集体农庄，而且城市都开始以这些人的名字命名（李可夫工厂，布哈林电车公司等等）。例如，1924—1925年根据政治局的决定，我国地图上不但出现了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还出现如托洛茨克、季诺维也夫斯克这样的城市。到二十年代末几乎所有的州和共和国都形成了对

当地领导人的个人迷信。在地方报刊上毫无分寸地颂扬斯大林，302 与此同时出现对卡冈诺维奇、波斯蒂舍夫、舍波尔达也夫、埃赫、拉祖莫夫、基洛夫、伊克拉莫夫等人的同样的毫无分寸的歌颂。

逐渐地对斯大林的歌颂越来越出格，形成了一种主要以斯大林个人迷信为首的迷信等级制。打从1929年12月，即从当时很少见的为斯大林五十寿辰举办盛大庆祝活动之后，我们的报刊出现了对“伟大的”、“优秀的”、甚至“天才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的祝贺。1929年12月国家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名为《斯大林》的专集，其中包括了米·加里宁、瓦·古比雪夫、拉·卡冈诺维奇、克·伏罗希洛夫、谢·奥尔忠尼启泽和其他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文章和回忆录。多数文章中的内容都有许多夸大和歪曲之处。反反复复贯穿着这样的思想，即“列宁在世时，作为他的学生之一斯大林是他的唯一的最可靠的助手，他区别于别人的是，当党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下所经历的全部重要革命阶段，一切大转折的关头时，斯大林始终毫不动摇地和列宁肩并肩地前进。”[1] 这本专集的一些作者还企图证明，在我们党内，大家公认斯大林是一个实干家，然而实际上他又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克·伏罗希洛夫写的《斯大林和红军》一文中，歪曲事实之处最多。这篇文章里也包括明显地歪曲制定粉碎邓尼金战略计划的真实历史。伏罗希洛夫把制订这计划的主要作用归功于斯大林，而实际上斯大林在研制这一计划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为了讨好斯大林，在我们党史文献中也出现了伪造我党史和内战史的另外一些尝试。

例如，在斯大林的过问下1929年出版了一本名为《里沃夫—华沙》的书，在这本书里违反事实地把同波兰作战中的错误，全部 303 归咎于总司令员谢·谢·加米涅夫和西线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身上。这本书否认同波兰作战中华沙方向乃是主要的战略

---

① 《斯大林》莫斯科1929年版第161页。（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

方向。

还是在1931年的时候在《列宁文集》六卷本的序言里，弗·维·阿多拉茨基就写道：列宁的著作必须通过斯大林的著作来研究。安·布勃诺夫，叶·雅罗斯拉夫斯基及其他历史学家在三十年代初期在他们写的关于党史著作的新版本中作了补充和改动，这些补充和改正都带有个人迷信的性质。

当然，1933年中央一月全会以后，那些大大加强了的对斯大林的歌功颂德的表示里面有不少诚恳的东西。但是更多的是受人精心安排的阿谀奉承，从这些歌功颂德的潮流中猜得出来，这乃是一场有意组织的和有指导的运动。首先毫无分寸地颂扬斯大林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特别是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这一事实本身立即赋与对斯大林的歌颂和迷信具有了官方的、政治方针的性质，使许多过去并不认为斯大林是从来不犯错误的天才，甚至于对他持一定不信任的态度的人也不得不跟着这一潮流走。

原反对派也参加了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大合唱，有时他们这些人的调子甚至比别人还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反对派的其他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发表文章，他们在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大讲这位"全世界劳动人民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是如何如何正确。《真理报》1934年第1期用了两版篇幅发表了拉狄克的长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简直是陶醉于对斯大林的颂扬之中。根据拉狄克的说法（大家知道，拉狄克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多年以来进行过反对斯大林的最积极斗争），正是斯大林"是列宁的最好的学生，是从列宁党脱胎出来的，党的骨就是他的骨，党的肉就是他的肉。"按拉狄克的说法，正是斯大林"对机会主义有着非常高的警惕性"、"他不屈不挠、沉着镇静"，"他体现了党的全部历史经验"，"他比列宁的其他任何学生，更紧密地和党溶合在一起，和党的基本干部队伍溶合在一起"，"他和列宁一样能够高瞻远瞩"，诸如此类。这大概是我党报刊上第一篇专门颂扬斯大林的大文章。应该指出，拉狄克的这篇文章很快以小册子形式出版了，发行量二十二万五

304

千册，这个数目在当时来说是很大的了。① 这一作法也很说明问题的。

正是在拉狄克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那些已经是没有分寸的捧场，这时就完全肆无忌惮了，歌功颂德已呈现膨胀的病态现象。“天才的和最天才的”，“伟大的和最伟大的”，“英明中的最英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明察秋毫”——这就是在提到斯大林名字时几乎每次都要加在前面的一部分形容词。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讨论工作的发言中没有任何对斯大林的歌功颂德。多数代表在讲话中当提到党的成就时，根本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然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则完全不一样了，这次大会是在吹捧斯大林的气氛中进行的。几乎每一个发言人都讲了斯大林如何伟大、如何是天才。这给人的印象是：这次大会首先是为了庆贺斯大林而召开的，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人民都应当感谢斯大林。

很突出的是，党的十七大没有通过贯彻中央工作报告精神的决议，而只是简单地建议各级党组织“在自己的工作中以斯大林同志报告所提出来的原则和任务作为指南”②，这在我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305 关于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个人迷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问题，我们的文献中从某时期起形成了如下一个公式：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使人民对党的领导人斯大林产生了极深的爱戴和感激之情。由于我国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所以人民和党似乎把自己的热情和欢乐都集中在斯大林身上。

我想，现在必须对这个公式作一些大的修改。正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三十年代初期对我国来说是很艰难的时期。许多地区

---

① 拉狄克就他颂扬斯大林一事在答复以前的反对派战友时说：“我们应该感谢斯大林。如果我们，即反对派，生活在法国革命时代，那么我们的脑袋早就被砍掉了。”但以后的事态很快证明了，拉狄克对斯大林是太不了解了。

② 《苏共决议案……》第2卷莫斯科1953年版第744页。

都在经受饥荒，农业生产下降，粮食实行配给制。在工业工作中也遇到严重的困难，并发生了停止生产现象。任何多少是客观的科学分析都应该导致这样的结论，即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建设的领导并不是令人满意的。但正是因为科学态度必然会揭露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和失误，所以斯大林及其拥护者们认为应该抛弃科学态度而代之以对任何那怕是萌芽状态的批评的压制，和对斯大林的无限的颂扬。因此这些逐渐变成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无限吹捧，如果说是由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造成的，倒不如说是为了掩盖斯大林已经犯了的，正在犯的和准备犯的那些错误、失误，乃至于罪行。确实如此，在我们党内天花乱坠地歌功颂德把斯大林推上非常特殊的地位，置他于党之上，置他于不可攀的高处，并使他完全和任何批评隔绝起来。斯大林已不受中央监督，党的领导结构中已经破坏了必要的平衡。

还应该提到，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通过共产国际很快开始灌输到各国共产党内，这不能不影响到外国各共产党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联共(布)的榜样促使许多党建立对自己的领导人的个人迷信，因此导致了对党内生活的民主原则的歪曲。 306

* * *

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坚决反对那些夸大他们活动的尝试。马克思在致德国政治活动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说："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① 恩格斯在回答为庆贺他组织晚会的建议时写道："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②

弗·伊·列宁同样毫不调和的反对夸大他个人活动的任何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2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09页。

试。大家知道，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闭幕会议上列宁对自发形成的对他的庆贺持以如何反对态度。为了抗议大会代表所表达的对伊里奇的爱戴和尊敬的少许的表示，列宁离开了大会会场。现在还保存着卢那察尔斯基的一段回忆录，1918年在受了重伤后正在康复中的列宁把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及其他一些人叫了来，说了如下的话（大意）："我很不满意地发现，有人开始颂扬起我个人来了。这令人难过，因为这是有害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事情不决定于某个个人。我自己也不便于出来禁止这类现象。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提出这一问题本身也似乎是有些可笑，似乎表示我有权去强求什么。但是我们必须逐渐刹住这样的事情。"①

307 阿·马·高尔基写的《弗·伊·列宁》一文，以及他给威尔斯的信（登载1920年《共产国际》第12期）也引起了列宁的极大不满。这些材料贯穿着个人迷信的精神，所以列宁阅后马上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份决议草案："中央政治局认为，在《共产国际》第12期上登载高尔基的文章极不恰当，特别是那篇社论，因为这些文章中不仅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因素，而且有许多反共产主义的东西。今后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登载这类文章。"②

那么就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即斯大林对不断增长的个人迷信持什么态度呢？

事实证明，斯大林不仅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些对马列主义者来说是很不体面的吹捧，而且他自己还指导和促进了这些颂扬。事实证明，他这个人简直有着病态的敏感，这种敏感不是怕人们对他个人的颂扬而正好相反，却是怕对他吹捧得不够或者对他的"伟大功绩"估计不足。事实证明，斯大林不仅没有制止他周围的近臣超出任何界限的阿谀奉承，而是相反，正是斯大林支持和提拔了这些善于阿谀奉承的人。

几年后，斯大林和访问我国的里昂·费赫特凡格尔谈话时，对

① 《关于列宁的片断》《消息报》出版社莫斯科1960年版第100页。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29页。

那些愚蠢的和畸形的歌颂，假装自己有所不满。据费赫特凡格尔说，他和斯大林谈过那些对他个人的低级趣味的，俗气的，没有分寸的迷信。费赫特凡格尔写道："对我的意见……他耸耸肩。他原谅自己的工人和农民由于忙于其它事情而没有可能培养高雅的兴趣，他还有点开玩笑地说，当游行的时候，他面前不断闪过成千上万的大到可怕程度画像，一个长着胡子的人的画像。我告诉他，甚至一些无疑是有欣赏能力的人却把他的半身雕像和画像——大到不得了的程度——摆到完全与他无关的，十分不恰当的地方，例如，摆在伦勃朗画展上。讲到此处，斯大林严肃起来。他说：他估计有一些人对现存制度承认得太晚了，所以现在加倍的努力证明自己的忠诚。是的，他认为有可能这是暗害者有意活动的结果，因为他们企图用这种办法败坏他的声誉。斯大林生气地说：'一个阿谀奉承的傻瓜比几百个敌人会带来更大的危害。'他还说，这一切喧嚣他之所以还在忍受，仅仅是因为他知道，组织这些节日活动的人们在节日的繁忙中会得到多么天真的愉快！他也知道，这一切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把他作为这样潮流的代表，即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比不断革命更为重要。"①

根据费赫特凡格尔的说法，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已通过了一项决议严厉谴责那些"对党的领导人进行完全不需要的和毫无意义的歌功颂德的虚伪作法。"而且报刊也不再登载那些兴高采烈的颂扬得过火的贺电。

我们不知道这项决议实际上是否存在以及何时公诸于众的。但是大家都知道，三十年代中期的报刊继续越来越兴高采烈地赞美和颂扬斯大林。

* * *

我在上面已讲过，在口头上斯大林反对任何机会主义，但在自己实践中他实际上实现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的许多原

① 里昂·费赫特凡格尔：《莫斯科·1937》莫斯科1937年版第51—52页。

理。现在当他提倡和建立对个人的迷信时，实际上是在实现着更“早”的机会主义者的一些主张。我们在这里指的是所谓的“造神派”，他们企图“从人类的集体力量”中造神并宣扬新的“社会主义的”“无神”宗教。这是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思想混乱的基础上产生的宗教哲学流派。他们号召把科学社会主义宣布为比一切宗教更有宗教性的学说，并建议为适应人民群众中最落后部分的水平，把马克思主义披上宗教外衣呈现在他们面前。大家知道，列宁如何极力驳斥了“寻神派”和“造神派”的这种僧侣主义思想。

但是，斯大林完全蔑视列宁对“造神派”的坚决斗争。他不仅完全实现了“造神派”的一切主要建议，而且还作了一些很实质性的补充。造神派企图建立没有神的“社会主义迷信”，斯大林企图建立这种有神的宗教。而且，斯大林自己被宣布为这种新宗教的万能的、全知的、造福一切的神。

当然，建立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一定责任不仅应由斯大林本人和在他周围的一些吹捧者来负，而且也应该由全党来负。正如老布尔什维克A·M·杜尔马什金在他未发表的杂记中写的那样：“党允许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产生，并犯了对他崇拜的如此重大的错误，因此使他的一言一行都自动地被认为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他的一切口号都成了指示。我们大家——我们这些老一代共产党人——都应为党内形成了这种局面而负有责任。”

第 五 章

[311]

谢·米·基洛夫被暗杀。对原反对派领导人的非法审判

一、1934年。斯大林新反对派的萌芽

上面讲了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十年中斯大林的许多错误和罪行。

很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党怎么会允许斯大林仍然继续当它的领导人呢？看来，这里有很多原因。

第一，在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已经很大了。党内各主要反对派和小组被击溃后，斯大林事实上已成为几乎是掌握无限权力的独裁者。斯大林不仅实际上已毫无顾忌地指挥大为加强的党的机器，而且还通过伏罗希洛夫指挥红军，通过亚哥达指挥安全机构。因此在三十年代初期的那种条件下想免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不管怎样，要完成这个任务，当时不可能有什么合法的民主程序。第二，要估计到，当今天我们在分析斯大林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所犯的错误和罪行时，是把这些错误和罪行从异常复杂和矛盾的国内外事件的洪流中抽了出来；而做到这一点现在自然比在当时的事件正在进行时要容易得 [312] 多。第三，斯大林在1934年前所犯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是后来才完全揭露出来，有的只是在他逝世后才知道。斯大林这些错误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在三十年代初不仅被小心谨慎地掩盖起来，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被我们的宣传机构说成是完全正确的，被认为是

伟大成就并说成是斯大林的功绩。

指出以下的情况也是重要的：即我国三十年代初形成的特殊情况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斯大林政权的巩固。在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前，党的许多领导者认为，为了不使形势更加复杂化，不能再开展任何新的党内斗争。几乎谁都不会想到，斯大林仅仅在几年后会走得那么远。同时，我党许多领导人到1934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点我们在后边还要谈到。斯大林不仅使相当一部分党的干部服从了自己，而且还使他们蜕化变质了。遗憾的是，我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很多领导人都积极参加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错误的、甚至是罪恶的活动，所以这些人都不可能成为足够坚决揭发斯大林的人。

* * *

如果不提一提在斯大林和相当一部分老布尔什维克之间在三十年代初已产生了的并不断加深了的某种疏远的话，也是不对的。这里指的不是原反对派领袖，而指的是同反对派斗争时期所形成的党的基本领导核心。

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在执行他的政策时开始越来越多地依靠由他自己挑选出来的较年轻的党的干部，而对革命老干部则持蔑视态度。在他看来，这些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313

从老干部方面说，部分老布尔什维克这时对斯大林也越来越失望，他们当中有些人为斯大林在党内增强自己的权力和专横而担忧。斯大林的一贯粗暴的态度，他越来越不愿意考虑任何人的意见——这一切引起了党的一些领导人的反抗，但却被斯大林断然顶回来了。甚至连斯大林过去的忠实助手和私人秘书И·П·托夫斯图哈，在三十年代初也开始表现出对斯大林的不满。

在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1933年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月全会审议的埃斯蒙特、托尔马切夫和А·И·斯米尔诺夫案件。全会关于该问题的决议按当时惯用的说法，即埃斯蒙特、托尔马切夫和斯米尔诺夫组织了一个地下派别，旨在破

坏工业化和集体化，特别是复辟资本主义和富农制度。因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通过了以下决议：

“1、……a) 同意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开除已蜕化变质的反苏分子埃斯蒙特和托尔马切夫的党籍，他们曾企图组织反对党和反对党的领导的斗争；b)依据党的十大决议，把斯米尔诺夫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去，并警告他，如果他在今后的全部工作中不能取得党的信任的话，就要开除他的党籍。

2、……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查明，中央委员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同志以及候补中央委员施米特同志本应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和党中央的现行政策，同反党分子进行真正的积极的斗争。但是他们不仅站在反对反党分子的斗争之外，甚至还和斯米尔诺夫、埃斯蒙特保持联系，实际上，在后者的反党活动中，鼓励了反党分子。他们用自己的全部行为使各种反党分子明白，他们可以指望右倾反对派原领导者的支持。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要求李可夫、托姆斯基和施米特同志彻底改变自己在对待反党分子斗争问题上的态度，并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继续坚持现在的做法，那么对他们将会进行严厉的党内处分。”

现在我们知道，斯米尔诺夫、埃斯蒙特和托尔马切夫的主要罪过在于他们暂且只在自己为数不多的支持者当中谈论过更换斯大林总书记职务问题。斯大林在处理此案时说：“只有敌人才会说，免除斯大林并没有什么关系。”① 斯米尔诺夫是1896年入党，曾在苏维埃时期任土地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中央书记等职务。几年后他和托尔马切夫一样被枪决了。埃斯蒙特早一些时候在一次不幸事件中去世。

但是，埃斯蒙特—托尔马切夫—斯米尔诺夫小组对斯大林并不构成严重的威胁，而新组成的政治局不时产生的分歧则是另一

---

① 见《全苏历史学家会议》莫斯科1964年第291页。

回事，这些分歧远不是每次都以斯大林的胜利而结束的。

上面我们已写过，斯大林在 1932 年要求枪决留京和他这一派的其他领导者，但是政治局只把他们流放了。反对斯大林建议的是谢·米·基洛夫，支持他的有：谢·奥尔忠尼启泽，瓦·古比雪夫，米·加里宁和政治局一些其他委员和候补委员。1933年饥馑时期，谢·米·基洛夫呼吁对农民采取克制态度（而斯大林则持加强镇压的态度。）

1933年谢·米·基洛夫在政治局主张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主张制度的某些“自由化”。1933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恢复党籍一事也和基洛夫的影响分不开。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坚决抵制对原反对派参加者采取任何镇压措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回到党的立场上来之后被恢复了党籍。基洛夫的这种独立性激怒了斯大林。基洛夫还认为，斯大林推行的无情镇压一切持不同政见者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主张改善党和作家以及其他从事创作的苏维埃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在基洛夫的参与下，第一次全苏苏维埃作家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开始进行。

1933 年夏天，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逮捕了几批年轻人。但是政治局指示说，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处以极刑。对这些反对派参加者的判决确实是比较轻的。

与此有关的具有特别意义的一些事情是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生的。从官方看，该大会显示了对斯大林的爱戴和忠诚。可是会外情况则是另一个样子。现在对照老布尔什维克提供的为数很少的材料，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在十七大上形成了一个由相当多的知名党员——主要是对斯大林政策的错误和缺点感受更深刻的州委书记和民族共产党中央书记——组成的秘密联盟。据说，这个秘密联盟的领导人之一是约·米·瓦雷基斯。谢·米·基洛夫被提出来当总书记。在这次大会刚开始或大会前夕，一批党的工作者和基洛夫谈过话，提出有必要撤换斯大林。参加这次谈话的有：奥拉赫拉什维里、彼得罗夫斯基、奥尔忠尼启泽、米

高扬。但是，基洛夫没有同意撤换斯大林的意见，也不同意自己被选为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的建议。据说，斯大林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这次谈话。

对斯大林的不满也反映在党的十七大选举联共（布）中央的表决上面。按票数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名单中是最后一个。在反对基洛夫的只有三票的同时，反对斯大林的有二百七十票左右。只 316 是因为中央委员的人数和候选人人数一样，斯大林才被选了出来。根据曾任十七大检票委员会副主席的B·M·韦尔霍维赫的证实，该委员会慌了，不敢向大会宣布选举结果。检票委员会主席弗·彼·札东斯基把负责这次大会组织工作的卡冈诺维奇请来。卡冈诺维奇命令销毁反对斯大林的大部分选票，在大会上宣布的结果是反对斯大林的和反对基洛夫的都是三票。但是，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选举的真实结果。

关于十七大的情况，在1962年出版的鲍·尼·波诺马廖夫编辑的《苏共党史》中也略提了几句。这本教科书写道："党内正在形成的不正常现象使部分党员，特别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十分忧虑。大会的许多代表，首先是知道弗·伊·列宁'遗嘱'的那部分同志认为，已到了把斯大林从总书记岗位上调到另一岗位上的时候了"。（后来的版本中这一句话和其它一些地方一样被删去了。）

同样，也不能不指出，在十七大上联共（布）中央的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些斯大林不喜欢的人没有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菲·伊·戈洛舍金、埃·约·克维林、尼·尼·柯洛季洛夫、维·维·洛米纳泽、格·伊·洛莫夫、马·德·奥拉赫拉什维里等。）从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的有：尼·伊·布哈林、阿·伊·李可夫、米·巴·托姆斯基、谢·施瓦尔茨等。在十六大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的，而在十七大没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下面几个有名的党的工作者：拉·卡尔特维拉什维里、K·A·鲁勉采夫，K·B·苏霍姆林、德·亚·布拉托夫、H·П·查普林等。但是，另一方面，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些知名的工作人员（弗· 317

阿·巴利茨基、E·Г叶甫多基莫夫）在十七大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没有经过候补中央委员的阶段）。拉·巴·贝利亚和尼·伊·叶若夫也未经过任何候补阶段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在十六次代表大会时连代表都不是的列·托·麦赫利斯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亚·尼·波斯克列贝舍夫也享有了同样的荣幸。亨·格·亚哥达从候补委员升为中央委员。在十七大时不经过候补阶段被选为中央委员的还有尼·谢·赫鲁晓夫。第一次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的有三十五人，其中有不少人不愧为党和国家的活动家，但也有M·Д·巴基罗夫这样的人。

紧接十七大后在党的领导层中也进行过一些复杂的人事变动。象叶若夫和麦赫利斯这样的人被提拔到中央机构的要害岗位。根据米·伊·罗姆的证实，就在这期间，拉·莫·卡冈诺维奇有一次在自己朋友之间说过，很快要大批更换党的领导干部。斯大林还坚持要求把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组织局书记和委员的谢·米·基洛夫从列宁格勒调到莫斯科。对基洛夫很熟悉的老布尔什维克A·M·杜尔马什金证实，基洛夫并不愿意离开列宁格勒。为了此事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代表团曾来莫斯科，但是斯大林对他们的接待十分冷淡。①

根据基洛夫妻妹的证实，在党的十七大后斯大林一次也没有给谢·米·基洛夫往家里打电话（而过去他是经常往他家打电话的）。A·M·杜尔马什金也证实，还在1934年前斯大林和基洛夫之间就有些疏远。1934年夏天召开了州委书记会议，讨论了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的命运问题，谢·米·基洛夫在这次会议上相当尖锐地指出要在农村中“恢复苏维埃政权”。斯大林在总结发言中对基洛夫的讲话保持完全沉默。

318

① 法国《新文学》杂志在1968年11—12月号发表过在美国逝世的孟什维克历史学家鲍·尼古拉也夫斯基书中的一段。尼古拉也夫斯基强调指出，正是斯大林反对基洛夫从列宁格勒调到莫斯科，此问题似乎没有经过斯大林同意于1934年十一月重新提出，但我们的材料来源并未证实这个说法。

值得提到的还有一个事实——基洛夫允许"未放下武器"的斯大林政策的反对者达·梁赞诺夫迁来列宁格勒。

当1934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统一战线政策上出现分歧时，基洛夫是属于这样一些人，他们坚持共产国际在社会民主党问题上对原有路线应作某种改变。

所有这些虽然还是很零散的事实，使我们已经有可能做出这样的结论：1934年斯大林和党的基本骨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对我们党来说，斯大林作为领导人早已是不需要的了，但中央许多有威望的活动家只是到1934年才意识到这点。对党的领导层中这种情绪上的变化斯大林本人无疑是觉察到了，他对任何降低他的影响的事情是异常敏感的。

如果说1934年以前和以后的斯大林没有什么原则区别是正确的话，那么正是1934年在许多方面成了我国和我党历史上转折的一年也同样是正确的。而1934年12月的悲惨事实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二、谢·米·基洛夫被暗杀。大规模镇压的新浪潮

1934年12月1日，政治局委员、联共（布）中央书记、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党的著名活动家谢·米·基洛夫在斯莫尔尼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了。

基洛夫的逝世激起苏联公众的深切哀悼和极大愤慨。他们要求追查凶手并对他们严厉制裁。

关于基洛夫被暗杀的通报中说，向基洛夫开枪的年轻党员列昂尼德·尼古拉也夫在他企图逃跑时被捕获。本来已经有可能通过周密的侦查找出有关案件的全部线索，找到所有了解凶杀案的策划经过和协助凶杀的人。但是暗杀基洛夫案件的整个侦查过程同法律、同健全的思想以及同追捕并制裁这一暴行的真正凶手的 319

愿望形成了令人发指的矛盾。

暗杀谢·米·基洛夫案件绝不是尼古拉也夫个人干的。著名的党的工作者和基洛夫关系密切的同志彼得·察金对本书作者讲过，1934年期间暗杀基洛夫的企图有过几次。这纯粹是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指挥的真正的“追杀”。例如，1934年夏天基洛夫去哈萨克斯坦时有人企图暗杀他。至于尼古拉也夫，他从开始就是自愿干的。这个神经不正常的人认为自己就是新的热里亚波夫①，他把暗杀基洛夫看做某种重要的政治行动（后来散布的关于尼古拉也夫向基洛夫开枪是由于争风吃醋的说法，是为了损害基洛夫的名誉或为了其他目的）。谢·米·基洛夫喜欢在列宁格勒散步，尼古拉也夫仔细研究了他散步的路线。当然，基洛夫在散步期间是受到严密保卫的，他的警卫人员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鲍利索夫领导，他们穿着便衣在基洛夫前后成梯形走着。有一次散步时，一个过路人因企图靠近基洛夫而引起这些警卫人员的注意。他们把可疑的人拘捕了，这人就是尼古拉也夫。在他的皮包背面有一处开口的地方，从中可以不打开皮包就能抽出手枪。上了子弹的手枪就放在此处，里面还有基洛夫散步的路线图。尼古拉也夫当然马上被带到列宁格勒内务局。询问他的是州内务局副局长扎波罗热茨。（后来搞清楚了，正是扎波罗热茨和列宁格勒一批内务局工作人员是这次阴谋的积极参加者。至于局长Ф·Д·麦德维基，看来，他没有参加暗杀基洛夫的组织工作。）在询问尼古拉也夫后，扎波罗热茨打电话给莫斯科并把审讯内容一一告诉了亨·亚哥达，当时亨·亚哥达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是斯大林最信任的人之一。过几小时后亚哥达打电话给扎波罗热茨，指示他们把尼古拉也夫释放。当时亚哥达同谁商量的？1938年在所谓“左派托洛茨基联盟”案件审判过程中，被告人亚哥达证实了上述事实，但他说1934年他似乎是从叶努启泽和李可夫那里得到指

① 热里亚波夫·安得烈·伊万诺维奇（1850—1881），民粹派分子，1881年因参加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被处以绞刑。——译者

示的。现在这个说法已经完全不能成立了，我可以毫不怀疑地说，亚哥达当时的靠山是更有影响的人。

然而，恢复了自由的尼古拉也夫的行动非常愚蠢，过几天他在桥上又被基洛夫的警卫人员拘捕了。从他身上第二次找出那支上了子弹的手枪。列宁格勒内务局工作人员释放尼古拉也夫的莫名其妙的"自由主义"引起了基洛夫警卫人员的极大怀疑。其中一些人表示抗议，但是内务部门告诉他们：这件事用不着他们去管。个别警卫人员的党证暂时被收回并威胁他们说要开除他们出党。这些事情如此奇怪，使鲍利索夫决定告诉谢·米·基洛夫本人：说有人想暗杀他，曾两次被拘捕的带武器的恐怖分子尼古拉也夫再次被释放了。

我们不知道基洛夫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采取了什么措施，可能质问亚哥达、麦德维基和扎波罗热茨要他们做解释。不管怎样，阴谋策划者知道了基洛夫和鲍利索夫之间的谈话，因而这件事很快就决定了后者的命运。

众所周知，正是尼古拉也夫于12月1日在斯莫尔尼终于打死了基洛夫。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亚哥达、日丹诺夫、柯萨列夫、阿格拉诺夫、扎科夫斯基当天从莫斯科来到列宁格勒，在列宁格勒的莫斯科车站上斯大林见到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麦德维基时，他连手套都没有摘，就打了麦德维基一记耳光。到列宁格勒后，斯大林立即把对此案件的一切领导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尼古拉也夫被提出来由斯大林亲自审问。

321

根据几个证人核对的情况（日丹诺夫的助手И·M·库拉金，尼古拉也夫被审问时他在场；上面已提到的彼·綮金、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M·C·丘多夫的朋友——B·Ш·），可以把斯大林审问尼古拉也夫的情景描写如下：

"在一个大房间里，桌旁坐着：斯大林、莫洛托夫、伏洛希罗夫、日丹诺夫、科萨列夫等人。后边站着一群列宁格勒党的工作人员，和一批契卡人员。（扎波罗热茨在基洛夫被暗杀那天正在南方休

假，他大概不可能于第二天赶回列宁格勒。）尼古拉也夫被提了出来。两边有人扶着他。斯大林问他为什么要向基洛夫开枪？他马上瘫跪下去，并指着斯大林身后的契卡人员喊道：‘是他们逼着我干的！’这时几个契卡跑到尼古拉也夫身边用手枪托打他。血迹斑斑不省人事的尼古拉也夫被抬到外边去了。当场的一些人，包括丘多夫都认为尼古拉也夫在审询时被打死了。所以他们认为，在12月底出席审讯的不会是尼古拉也夫本人，而是顶替他的旁人。丘多夫曾在晚一些时候向B·Ш·讲述了这一情况。但实际上尼古拉也夫没有被打死。他被送到监狱医院，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被救活，甚至采用了热水浴和冷水浴①交换进行的办法。

尼古拉也夫之后应该受审问的是鲍利索夫。所有被捕的人都是用小轿车送到审问的地点，可是不知为什么，派去接鲍利索夫的 322 是有棚的卡车，里边坐着几个手持铁棒的契卡人员。一人坐在司机身旁。在沃伊诺夫大街，当汽车驶过某仓库的一面高墙时，和司机坐在一起的契卡人员突然转动了一下方向盘。但司机终于设法防止了撞车事故的发生，汽车只是侧面擦了墙，又继续向前行驶，一直开到审问的地方。但是，鲍利索夫已经被人用铁棒打死在车里了。医学鉴定做了假的结论，结论说：鲍利索夫因汽车事故死去。在这个鉴定下面签了字的医生当中，有些活到二十大以后，他们说鉴定决议当然是被迫做出的，鲍利索夫是被很重的金属棍棒打在头上致死的。

众所周知，有关基洛夫的警卫队长在如此奇怪情况下死亡的问题，二十二大时已详细向大会汇报过。赫鲁晓夫在大会上说过：“引起注意的是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曾两次在斯莫尔尼宫附近被契卡拘捕过，而且都发现他带有枪支。但因某人的指示两次都被释放。而且这个人后来又进入了斯莫尔尼宫并出现在基洛夫经常经

---

① 这是一种急救的方法。——译者

过的走廊上。不知为什么就在基洛夫被暗杀时，他的警卫队长远远落在后边，然而按规定他没有权利落在被保卫者的后边那么远。下面的事实也很奇怪。当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带去审问时，他应该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亲自审问，然而在半路中提他的人员，正如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后来所说的那样，有意制造了事故。然后，这些人宣布，警卫队长是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而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把他打死了。就这样，保卫基洛夫的人被打死了。然后，那些杀害这些人的人也被枪决了。这事绝非偶然，这乃是预 323 谋的罪行。谁可能干这件事？现在还在对这件复杂案件的情况，进行细致的研究。"①

苏共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后，几百的共产党员和非党干部给苏共中央写信阐述他们对基洛夫暗杀案件官方说法的怀疑，他们提出了不少有助于弄清这件罪行的事实和证据。

例如，苏共老党员 И·П·阿列克萨欣说：他在"林科威"矿山遇到了另一个犯人杜波申，他过去是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内务局局长。杜波申告诉阿列克萨欣说：他于 1934 年 11 月住在莫斯科"塞连特"旅馆时，有一次一个和内务部中央领导机构有密切联系的内务部负责工作人员跑进他们的房间，他说："列宁格勒正在蕴酿着可怕的暗杀。"杜波申当时没有很注意到他说的这句话，但基洛夫被暗杀后他问了这个人："原来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正在策划暗害基洛夫。"但那个人没有能给与令人满意的回答。

根据 Е·П·伏罗洛夫（他 1919 年加入苏共，1934 年在联共（布）中央工业部任机器制造司司长）的证实，12 月 1 日早晨叶若夫（当时任工业部部长并受斯大林委托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进了斯大林的办公室，他在这里度过此日白天大部分时间。这是不寻常的事，过去叶若夫从来没有过在斯大林办公室逗留长达数小时之久的事。到晚上 7 点叶若夫来到工业部并把自己助手之

①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稿》，第 2 卷，莫斯科，1962 年，第 583—584 页。

一B·策萨尔斯基叫来，要他准备和叶若夫一起立即去列宁格勒。

苏共党员И·M·库拉金（曾在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任日丹诺夫的助手）证实，基洛夫被暗杀几个月后，基洛夫的警卫队长鲍利索夫的妻子到斯莫尔尼宫去了一次。她说，她被强制送进疯 324 人院，她有幸逃出来了，她要求给予保护，因为似乎有人要把她毒死。她还告诉库拉金，内务部讯问过她，企图了解在基洛夫被暗杀前她丈夫是否对她说过点什么。这个妇女同意把她转到任何一个普通的医院去。但库拉金无权不经过内务部对鲍利索娃采取任何措施。他打电话给内务局副局长询问能否把这位向他提出请求的妇女送到市立医院。经过同意，她进了医院。但过了一段时间库拉金得知：鲍利索娃在医院里死去了，她有被毒死的迹象。

П·И·斯莫罗金的女儿M·斯莫罗金娜说，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麦德维基得知基洛夫被暗杀后，帽子都没有戴，大衣也没有穿就跑到斯莫尔尼宫去了。但在斯莫尔尼宫门口被一个他所不认识的来自莫斯科的契卡人员挡住了。这些人不知为什么比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到得还早。

基洛夫的好友П·П·彼得罗夫斯基的妻子C·H·奥斯莫洛斯卡娅说，在基洛夫被暗杀前几天，企图暗杀彼得罗夫斯基：两个陌生人在街心公园用铁器殴打彼得罗夫斯基，但他有幸抱住了头，跑掉了。后来，在得到基洛夫被暗杀的消息时，彼得罗夫斯基马上说，这是斯大林干的。

类似的说法还有不少。

还有，众所周知，在基洛夫被暗杀后不久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Ф·Д·麦德维基和他的付手扎波罗热茨，因被指责在国家安全基本要求方面表现出罪恶的疏忽而被调离工作岗位。对这些内务局工作人员开始时惩罚得很轻，仅仅调到远东内务机关去工作。他们一直到1937年才被枪决。尼·谢·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不是毫无根据地说：“可以设想，枪决他们是为了对基洛夫谋害案件的组织者灭口。”

还值得指出的是：在1934年12月1日晚上，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没有经过政治局决议（两天以后用个别征求意见的方式办了手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本决议中写道：

"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在侦察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1、有关这些案件的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2、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3、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4、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5、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①

这一在我国和平时期条件下史无前例的决议为各种非法行为大开了方便之门，因为任何"政治案件"，只要愿意的话，都可以称之为恐怖活动的准备。侦察过程缩短，限期只有十天，使审理案件只能表面化和直接进行伪造，这样就有碍去判断被审查的人有罪或无罪，有碍去调查清楚和这一或那一罪行有关的人。

依据此决议，12月1日正在各级法院审理的几十个和基洛夫谋害案件没有任何关系的反革命罪行的案件也被急急忙忙地交给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审理。几乎所有被告人都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巡回法庭于1934年12月5日的秘密会上判处枪决立即执行，并于次日，即举行基洛夫葬礼的日子公布了。列宁格勒枪决三十九人，莫斯科——二十九人。（通知中说，军事委员会还是撤回了几件由它审理的案件，以便进行补充侦查，这又一次证明，上述关于加快侦查过程的决议从法律方面看是多么荒唐。）几天内，又公布明斯克逮捕十二人（其中九人被枪决），基辅逮捕三十七人（其中二十八人被枪决）②。

---

① 《社会主义刑事法规史资料集》莫斯科1938年版第314页。

② 在乌克兰被逮捕的37人中，有A·Б·克鲁舍利尼茨基和他的两个儿子：伊凡和达拉斯。伊凡和达拉斯，根据通知所说，已被枪决。克鲁舍利尼茨基本人显然不是白匪，他是乌克兰进步作家。他于1941年11月在监禁中去世，苏共二十大后被恢

关于基洛夫谋害案的整个侦查工作也同样是非常匆忙地进行的。在12月22日就发表了通报，说什么列·尼古拉也夫是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这个恐怖组织是由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组成的，他们接受了所谓“列宁格勒反对派总部”的委托而暗杀了基洛夫，这是季诺维也夫分子为了报复基洛夫而干出来的，因为反对派和基洛夫有特别的帐要算。通报中也列出已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逮捕的“列宁格勒总部”成员的名单。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过去是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12月27日报纸上公布了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下面签字的有苏联总检察长安·亚·维辛斯基和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列·舍伊宁。控告结论断言，谋害基洛夫是一个长远计划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暗杀斯大林和联共（布）327 其他领导人。还断言，已被发现的有两个阴谋恐怖组，一个由沙特斯基领导，另一个由卡达雷诺夫领导，后者委托尼古拉也夫暗杀基洛夫。通报中说，凶手从某外国领事那里得到五千卢布，这个某领事是阴谋者和托洛茨基之间的联系人。(1934年12月底苏联驱逐了拉脱维亚总领事乔治·比辛尼耶克斯。但拉脱维亚政府绝对否认它的领事和基洛夫谋害案有关系。)

从控告结论中可以看到，承认自己有罪的只有尼古拉也夫和他的两个好友，然而他们不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其他被告人只承认自己参加过季诺维也夫小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说尼古拉也夫是季诺维也夫“总部”的成员。说季诺维也夫分子与基洛夫谋害案有关，而尼古拉也夫是季诺维也夫小组的成员，唯一的证据是尼古拉也夫本人的交待，可是这不仅和其他被告人的交待，而且与此案件有关的其它旁证材料相差很远。例如：此案件的物证——地址、各种记录材料、尼古拉也夫的日记等并不能证明存在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说法。但是侦查员完全没有注意到这点。所以在尼古

复名誉(见《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3卷。在基辅同一“反革命”名单中还提到另一个乌克兰作家B·A·马司卡的名字，有关他的苦难的遭遇可在《文学报》(1967年第33期)上读到。

拉也夫那里找到的所有书面材料都在控告结论中极其简单地被宣布为伪造的，是为了“伪装”自己，制造假象而泡制出来的。

这充满矛盾的控告结论是此案唯一公开发表的材料。判决的全文，被告人的交待，被告人的最后的讲话，始终没有公布出来，而申诉人和辩护人的发言在这次审判中则根本没有，因为审理这一案件根本没有检察员和辩护人，被告人也根本无权提出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

根据参加审讯的军事法官 A·Б· 的说法，尼古拉也夫在开庭审判时的表现同在斯大林询问他时不一样。他承认自己根据“列宁格勒总部”交给他的任务有意谋害基洛夫并揭发了这个“总部”的成员。大部分被告仍不承认自己有罪，许多人说自己第一次见到尼古拉也夫。但这并没有妨碍判处所有被告人以枪决并立即执行。有关处决的通告是在 12 月 30 日报纸上发表的。

328

更重要的证据是原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卡恰发的揭发。他于 1934 年 12 月一直在尼古拉也夫的牢房中值班（因怕尼古拉也夫自杀）。尼古拉也夫把谋害案是如何组织的告诉了卡恰发，并说他已得到保存他生命的保证，条件是：他要指出列宁格勒的季诺维也夫分子是此次恐怖行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尼古拉也夫还问卡恰发：会不会骗了他？当法庭向尼古拉也夫宣布了判决时，尼古拉也夫喊叫起来并企图从押送者手中挣脱跑掉。

下面的事实也能说明问题。在此案件刚开始侦查时，斯大林询问列宁格勒内务局契卡人员，他们那里谁管原季诺维也夫分子案件，并要求把有关的整理好的材料给他送来。列宁格勒确实有一个秘密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小组。列宁格勒契卡人员知道这个小组的成员并要求基洛夫批准逮捕所有的成员。但基洛夫拒绝了，没有批准。他认为，对原反对派的成员不应镇压而应从思想上争取。所以在列宁格勒几乎没有逮捕过原反对派的成员。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分子名单连同上面的基洛夫批示放在内务部档案库里。此刻就已经送到斯大林手里了。斯大林得到这个名单和莫斯

科季诺维也夫分子名单，便自己杜撰出一个“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总部”。这个由斯大林亲手杜撰的“总部”的所有成员名单至今还保存在斯大林的文库中。(不管怎么说，二十大后最初几年里这份手稿还存于斯大林文库中，有人拍过照和作过字体鉴定。)斯大林把一些原反对派先列入“莫斯科总部”，后改为“列宁格勒总部”或相反。他的这一作法是很有代表性的。所有被斯大林点了名的人都被逮捕了。

不能不指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加速侦查过程的决议的部分在以后的年月里已不再使用了。多数“政治案件”的侦查一拖几个月。这再一次证明，正是在基洛夫谋害案中斯大林急需以最快的速度结束法律惩处，使所有对他不利的痕迹被消灭掉。(《12月1日法令》的其它各条不但被保留了而且还加强了。所以在1937—1938年被指控为进行恐怖活动成为最常采用的控告。这类控告允许人们不去考虑审判和侦查的任何法律规定。)

谢·米·基洛夫被暗杀后，国内所有企业和机关立即召开职工大会和集会。在莫斯科，格·季诺维也夫作为中央消费合作总社领导成员在总社的大会上宣布了这次暗杀的消息。格·叶甫多基莫夫作为“奶制品总公司”管理局局长12月1日晚上在宣布这一暗杀事件的大会上讲了话。但是只过了几天，季诺维也夫，叶甫多基莫夫，加米涅夫和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许多领导人，都被逮捕了。

1935年1月经过短期侦查，对“新”反对派原领导人第一次开庭进行政治审判。被告是：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格·叶·叶甫多基莫夫、А·М·格尔蒂克、И·П·巴卡也夫、А·С·库克林、Я·В·沙罗夫、Б·Л·布拉沃、С·М·盖森等共十九人。

在非常短促的侦查过程中全国各地举行集会要求对所有被告判处枪决。但是，在这个案件侦查过程中还没有使用“不能允许的手段”，换言之，没有使用刑询，所以未能“证明”“莫斯科总部”和基

洛夫谋害案有关。在审讯决议中说，“侦查结果没有得到充分根据足以证明季诺维也夫分子教唆谋害谢·米·基洛夫的事实。”所以季诺维也夫“仅仅”被判处十年监禁，加米涅夫判处五年监禁。其他被告也得到类似的判处。 330

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特别会议，即没有经过任何法律审理程序，对大批原来相当知名的党员判处二至五年监禁，他们被控告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总部成员。（这些人当中有：И·К·纳乌莫夫、彼·安·扎鲁茨基、伊·维·瓦尔金—穆格拉泽、А·П·科斯京娜、В·С·布拉赫、А·И·亚历山大罗夫、И·И·杰里科松等。）

1935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给全国党组织发了一封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去击溃敌对分子，深挖党和人民敌人的反革命巢穴。1935年初，所有的州，特别是列宁格勒掀起了大逮捕的第一个高潮，后来在集中营里通常称之为“基洛夫急流”。同时，在列宁格勒进行了迁出大批原贵族和他们家属的运动，而这些人绝大多数并没有从事任何地下的和反苏的活动。

在苏共二十二大后出版的苏共党史著作，则没有一本上把谋害基洛夫归罪于季诺维也夫和季诺维也夫分子。

但在1934年，斯大林提出的关于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支持者是谋害基洛夫的组织者的说法则显得很真实。因为大家知道，正是基洛夫于1926年接替了季诺维也夫分子叶甫多基莫夫担任列宁格勒党组织领导者的职务。所以毫不奇怪，基洛夫被暗杀后，许多人的视线马上转到原列宁格勒反对派即新反对派方面。但这个由斯大林提出的看起来好象很清楚、很真实的说法迫使我们对它产生了怀疑。因为暗杀基洛夫——当时按他在党内的威信来说，仅次于斯大林的人——不会给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带来任何政治利益。 331

相反，由斯大林领导的整个侦查过程及以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另外一说法变得更为真实，即认为基洛夫谋害案不会不与斯大林有关。基洛夫长期以来是斯大林的朋友，但我们现在知道，对

斯大林来说，如果事情涉及到要达到他所需要的政治目的的话，那么个人情谊又算得了什么。我们现在知道，在1937—1938年期间，斯大林的多少朋友和亲属都被枪决了。

似乎也没有必要为基洛夫涂脂抹粉。他也具备着所有在斯大林周围的人们所具备的许多特点。二十年代末所发生的许多应该被谴责的事件，谢·米·基洛夫是很积极地参加了的。但是尽管如此，谢·米·基洛夫个人和斯大林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别。他平易近人，接近群众，具有充沛的精力，他的高度理论水平和讲演者的天才结合在一起，这一切使基洛夫当时成为全党的宠儿。基洛夫在国内的影响不断在增长，到1934年他在党内按他的威望来说无疑已成为仅次于斯大林的人物了。

我们也知道，1934年当斯大林患病时，产生了什么人可能去继承他总书记职务问题，中央政治局提出谢·米·基洛夫作为候选人。

斯大林很粗暴、多疑、残忍，而且是一个权力狂，他很难容忍那些才华出众的，独立性强的人在自己身边。基洛夫日益增长的威望和影响不能不引起斯大林的嫉妒和怀疑。基洛夫在党内的极高威信和他不愿意总是在斯大林后边被牵着走的特点妨碍着斯大林实现他虚荣的想法。所以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基洛夫的死不会引起斯大林的任何惋惜。不仅如此，基洛夫的死给他以渴望已久的借口去严惩那些阻碍他实现无限权力的对手。基洛夫谋杀案成为斯大林在国内最后篡夺一切权力的一系列事件的重要环节。所以基洛夫被暗杀归罪于斯大林的说法虽然在1934—1935年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今天却显得很真实，并从逻辑上和政治上几乎得到证实。相反，在1934—1935年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暗杀基洛夫案件中是有罪的说法好象很真实，可是今天却是不可想象的了。

三、关于1935—1936年上半年的镇压

在对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领导人进行审讯后，整个1935年

和 1936 年上半年国内和党内的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这几个月各地党组织都进行"坦白和承认错误的运动"。女共产党员叶·谢·金兹堡①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满都是人的大礼堂变成了忏悔堂。虽然宽恕罪过往往是很不容易的（相反，忏悔者的发言往往被认为是不够的），但'悔改'的规模越来越大。任何一次会上都照例有一个重点的人或重点的问题需要进行检查。人们检查自己对不断革命论的错误理解和 1923 年对反对派观点表决时弃权，检查自己大国沙文主义'旧病复发'和对第二个五年计划估计不足，以及和一些什么'罪人'相识，沉醉于迈耶尔赫里德的戏剧等等……"②

一年半中每个州和共和国都有几十或几百人被捕，其中有原反对派成员，也有从来不属于反对派的共产党员。同时，许多共产党员被开除党籍，理由是"和敌对分子有联系"或"警惕性不高"。那时逮捕和开除党籍一般说来还不是大规模的，而是"有重点"的。原反对派的多数领导者和积极参加者在 1935 年和 1936 年初，还没有失去自由，甚至还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部门和学校里担任领导职务。在这几个月中，拉狄克、皮达可夫、布哈林和其它许多原反对派成员的文章几乎每天都在中央报刊和杂志上发表。

333

镇压还没有触及到党和国家最高层。但中层的一些工作人员：远东边区党委会成员巴·伊·沙巴尔金，伏尔加河-顿河管理局领导人之一——В·В·嘉科夫等已被捕了。

1935 年初列宁国家图书馆馆长、有名的党史学家弗·伊·涅夫斯基被捕了，他过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军事组织领导人之一。根据Н·А·索恩采娃的证实，涅夫斯基是在不允许从图书馆书库里提取列宁图书馆保存的相当一部分政治文献（他

---

① 金兹堡，叶甫格尼娅·谢苗诺夫娜（1907—1977），作家，苏联知名持不同政见者之一。——译者

② 叶·谢·金兹堡著《陡峭的征途》纪事小说，未在苏联发表。（本书未经作者同意，先后在意大利、西德、法国、英国、西班牙、荷兰、美国发表，引起了西方社会舆论的广泛重视。——译者）

不管斯大林所下的书面命令）后被捕的。他当时说："我不是看门人，是受党的委托保存这些文献的。"

联共（布）中央委员中受到迫害的大概只有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阿维尔·叶努启泽，他被解除中央委员职务并被开除出党，但当时并没有被捕。叶努启泽过去是斯大林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他被指责为丧失警惕性和道德败坏（这些伪造的罪名现在都已平反）。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审查叶努启泽问题时，有几个人发言反对他，叶努启泽本人虽然出席了这次会议，但他既没有交待错误，也没有提出反驳意见。中央全会后还继续在各级党组织中对叶努启泽进行"批判"。

由于陷害，当时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任市委书记的维·维·洛米纳泽死于非命。那时斯大林采取过一个办法，把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的审问记录的副本寄给政治局委员和其它一些著名的党 334 的工作人员。有一份记录中记载着加米涅夫交待他自己在夏天休假时和洛米纳泽的一次谈话。这就决定了后者的命运。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冶金工作者时的做法使洛米纳泽明白，斯大林已把他一笔勾销了。回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后，洛米纳泽不久被召去车里亚宾斯克，途中他在汽车里自杀了。

1936 年取消了共产党员可以携带武器的决定，因为斯大林在准备对党采取大规模恐怖行动时还是怕有人给予反击。

1935—1936 年在加强专横和镇压的同时，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也加强了。对他歌功颂德越来越厉害。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斯大林的像，给斯大林的贺词，歌颂斯大林的文章、讲话等等。似乎所有的人都在竞赛，如何更鲜明地歌颂"伟大领袖"的功绩，表达对他的爱戴和忠诚。

1935—1936 年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确实很显著。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形势大为好转。1934 年工业总产值增加了百分之十九，1935 年——百分之二十三，1936 年——百分之二十九。农业生产经过几年的停滞不前也开始增产；1935 年农业总产值和 1933 年比

较增加了百分之十八。配给制度取消了，开放了集体农庄粮食贸易。因为有了物质刺激，庄员对粮食增产的兴趣提高了。（而国家征购制度则因征购价格很低而不能引起这种刺激。）另一方面，市场价格也开始下降。1935—1936 年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了。生活确实"比较愉快"了，一切都使劳动者产生了一定的热情。但是这种热情的表现被纳入那过分的和歪曲了的对斯大林的赞美的模式之中，一望而知，这都是有着一定的政治企图的。与此同时，斯大林本人继续用各种办法鼓励和维持对他个人的迷信。最接近他的政治活动家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也极力鼓吹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335

1935—1936 年的镇压和逮捕在国内和党内没有遇到明显的反抗。虽然这些镇压引起了一些党员的极大不安，但没有发生任何反对镇压的有组织的抗议行动。这种情况使斯大林更加没有顾忌了，1936 年他着手实现在国内的篡权计划的下一阶段——策划旨在反对他原来的政敌和私敌以及反对全党的新的骇人听闻的阴谋。

四、对反对派领导人的审判

1936 年 8 月 15 日所有报纸都发表了苏联检察院关于结束基洛夫谋杀案的新审讯和关于惩办和这案件有关人的通报。这些人是：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格·叶·叶甫多基莫夫、伊·尼·斯米尔诺夫、И·П·巴卡也夫、瓦·阿·帖尔-瓦加尼扬、С·Д·穆拉奇科夫斯基、Е·А·德雷采尔、Э·С·哥尔茨曼、И·И·赖因霍尔德和一系列其他原反对派成员，其中许多人已经是第二次坐在被告席上了。同时，通报中说，这些人已完全承认了自己既暗杀了基洛夫又组织反对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恐怖活动的罪行。

在 1936 年 8 月进行的审理过程中，被告方面没有发生任何

“拒不认罪”现象。相反，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被告主动和流利地谈了自己在组织暗杀基洛夫时的作用以及谋害斯大林、莫洛托夫及邱巴尔、波斯蒂舍夫、柯秀尔、埃赫的计划。（大家知道，后四位我党活动家是两年后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被枪决的，不必说，他们的被杀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无关。）

根据季诺维也夫的说法，谋害斯大林似乎是准备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期间进行的。这一行动，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来，应该导致全世界共产党人拥护托洛茨基的强大运动。而联共(布)中央的领导面对这一强大运动会仓皇失措并不可避免地要开始和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谈判，请他们来领导党。

只有一个被告——伊·尼·斯米尔诺夫（他被宣布为我国全体托洛茨基分子的领导人）企图推翻审讯和预审中向他提出的大部分指控。但是他被其他被告的“交待”所“揭穿”，这些被告是：穆拉奇科夫斯基、帕尔-瓦加尼扬、叶甫多基莫夫、加米涅夫。

“联合总部”案件是公开审理的。但是这次审讯过程仍然是完全违背了最起码的法律程序的。没有提供出任何物证和文献证明来证实被告有罪。所有控告都自始至终建立在充满矛盾的被告人自己的“交待”和“承认”上面。他们被剥夺了辩护的权利，许多外国律师所提出的自愿为被告辩护的建议当然都被拒绝了。

对“联合总部”案件的审讯过程时间不算很长。被告的交待都是千篇一律的，其基本内容是供认他们各种骇人听闻的罪行或者更多的是讲这些罪行是如何由“总部”和个别成员策划出来的。

今天，这些“交待”的虚伪性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不难猜测，只有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才能强迫被告把类似的罪名加诸自己身上。但1936年党和人民对斯大林、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以及对苏联法院的信任还是很深的。

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件的审讯及对此案所有被告处以极刑的做法导致了新的、波及全国的镇压浪潮。首

先被捕的是原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参加者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和这些"人民敌人"有关的许多人。当时的报纸满篇都是关于暗藏的和伪装的托洛茨基分子被揭露出来的报导，可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想都没有想到要隐瞒或伪装自己的历史。"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的庇护者"，"思想战线上的托洛茨基分子"，"在科学领域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的破坏"，"女作家谢列勃里亚科娃的托洛茨基分子沙龙"，"乌兹别吉斯坦土地人民委员部中托洛茨基分子的痕迹"——当时在所有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这样的文章。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总部"案件的被告在预审时突然开始作补充交待，讲他们和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及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谢烈布里亚科夫、乌格拉诺夫、施利亚普尼科夫等人的"有罪的"联系，这些原反对派成员当时还没有被捕。紧接着，1936 年 8 月 21 日的报纸发表了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的命令，宣布开始对上述和反革命阴谋案件有关人的侦查。全国的企业和机关纷纷集会要求"彻底搞清楚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和丑恶的恐怖分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指出，《消息报》社论也登了同样的要求，同时报纸的最后一页上标着该报总编辑就是布哈林。

拉狄克在审讯的第一天就发表了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文章，但他也和谢烈布里亚科夫、索柯里尼柯夫及其他许多人一样很快被捕了。托姆斯基，根据报纸报道，自杀了。但是布哈林、李可夫和其他大部分原"右倾"反对派成员在 1936 年底还没有失去自由。不仅如此，报纸在 9 月 10 日发表了苏联检察院的通报，宣布停止侦查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总部审讯过程中有些被告的交待，他们供出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同他们的罪恶的反革命活动有不同程度的牵连。检察院通报说："侦查结果没有从法律方面证明应向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追究法律责任，因此本案宣布停止审查。"但是，对所有原"右倾分

338

子"来说，这只是暂时的喘息时间。

结束对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的侦查，这显然是斯大林批准的。对他来说，这只是为更好的准备下一阶段镇压的一种策略。斯大林不仅暂时为布哈林"恢复了名誉"，而且还假装自己对布哈林怀有"美好感情"。据布哈林的妻子 A·M·拉林娜说，1936 年 11 月 7 日布哈林还没有被捕，他决定到红场庆祝节日，但不像过去那样上列宁墓，而是拿着《消息报》的通行证和妻子一起上了观礼台。A·M·拉林娜回忆说："观礼台靠近列宁墓，斯大林从上面看到了

历史上，也可以说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起了最可耻和最可怕的作用。

叶若夫相当快就晋升为斯大林的宠臣和心腹。早在二十年代末，当时还是个比较年轻而且很少为人知晓的党的工作者叶若夫，任哈萨克斯坦一个州的州委书记。1929 年他被任命为苏联土地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在党的十六大时，尼·伊·叶若夫只是列席代表。1930 年叶若夫被调到党的机构工作。他被任命为联共(布)中央干部调配部和人事部部长。他还没有成为中央委员以前，在党内已是很有影响的人物，因为他决定许多重要人事安排和变动。就在这期间斯大林注意到他，他的特点是对“领袖”无条件的忠诚，百依百顺，勤勤恳恳，性格残忍而且智力较低。

在党的十七大叶若夫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从此他青云直上。他被选为中央组织局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工业部部长。从 1935 年起，叶若夫是联共(布)中央书记和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不知叶若夫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什么样的贡献，他还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就在这一时期，叶若夫已代表党中央控制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并积极参与了对共产党员的首次逮捕和镇压。所以任命他为内务人民委员，对叶若夫本人来说并不是突然的。

310

和亚哥达一起被免除内务人民委员部职务、后来被捕的有他的许多助手，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构的主要干部和州内务局的局长。但是由亚哥达培训的内务部的许多干部仍保留在叶若夫手下工作。叶若夫对特务机关的工作业务还不了解，在这方面像扎科夫斯基、雷登斯、伏里诺夫斯基等人帮助他掌握了这项业务。

叶若夫被任命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更加扩大了人员编制。从 1937 年初起，镇压和恐怖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降临到我党和我国所有公民头上了。

1937年是从新的政治大审讯开头的。这次被军事委员会审判的有：格·列·皮达可夫、卡·伯·拉狄克、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列·彼·谢烈布里亚科夫、Я·А·利夫什茨、尼·伊·穆拉洛

夫、雅·纳·德罗布尼斯、米·索·鲍古斯拉夫斯基、И·A·克尼亚捷夫、C·A·拉泰恰克、Б·O·诺尔金、A·A·舍斯托夫等共十七人，其中大部分被告过去是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出名活动家，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几乎所有被告在二十年代中期都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为此被开除党籍。但三十年代初，他们实际上和托洛茨基断绝了过去的关系，恢复了党籍并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机构及其他单位中任领导职务。而现在他们都被指控为参加了所谓的“平行总部”，策划恐怖行动 841 (其中一条也是暗杀基洛夫)，从事间谍活动，企图挑起和加速同法西斯德国、日本的战争并力求在这次战争中打败仗。被告被控告为企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并把沿阿穆耳河区和滨海边区交给日本，把白俄罗斯、波兰和乌克兰交给德国，作为对这些国家在复辟资本主义所给予援助的报酬。

如果说1936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总部”案件没有辩护人，那么“平行总部”案件在表面上还是遵守了一些审判程序。多数被告都有由国家指定的辩护人。(但是这些辩护人中没有一个力图真正为自己所辩护的人加以辩护，以推翻那些不公道的毫无根据的控告。没有一个辩护人力图干预审讯过程，更没有对侦查机构结论提出怀疑。没有一个辩护人能够在对被辩护人没有压力的条件下和后者见面。所以毫不奇怪，辩护人的发言和国家公诉人的起诉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确信他的骇人听闻的“审查”机器是可以为所欲为之后，邀请了大批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出席审判会。不过，就在这时仍未公布任何能证明罪行的书面证据和物证。每当检察长宣布要交给法院“某一国外侦探机构”的什么材料时，公开审判立即停止，转为秘密审判。实际上审讯的唯一证据仍然只是被告人的供词。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什么因素迫使被告诚恳地承认自己的罪行呢？因为根据控告的内容，这些人早已完全丧失了任何羞耻和良心，已经堕落为雇佣的杀人犯和暗害者。因此他们已不能指望任何被宽恕的可能。

更加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被告声明自己没有受到任何严刑拷打或逼供。也许为了及时防止这种疑问的产生，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他在这次开庭时作为国家公诉人)几乎向每一个"杀人犯、破坏者、叛徒和间谍"提出同一个问题："什么动机使您诚恳地承认自己有罪?"举一次类似对话作为例子来说明吧。维辛斯基问(穆拉洛夫，他被指控为组织西伯利亚的破坏和恐怖行动)：342

"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要坦白交待真实情况？在研究侦查过程材料时，我发现，您在几次询问中否认自己进行过地下工作……，讲一下您决定把一切都坦白出来的动机是什么。……"

穆拉洛夫答："我想，使我能够克制自己并矢口否认一切问题，其中有三个原因……先从我的性格谈起。我是很急躁和器量小的人。把我监禁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受了委曲，所以很气愤。第二，我对托洛茨基有感情。第三，你们知道，任何事情都可能有过火的地方。我那时想，如果今后还把我当作托洛茨基分子的话，那么我就可能成为反革命的旗帜。这使我非常害怕。同时我亲眼看到干部队伍的成长，工业、国民经济在发展。我不是瞎子。所以我对自己说，要服从那个我曾在三次革命中积极为之奋斗的国家的利益……我怎么能够继续去危害这一事业呢？我的名字会成为那些还留在反革命行列中人们的旗帜。对我来说，这是决定性的，所以我说：好吧，去交待一切真实情况吧……"①

这类"诚恳"坦白交待的虚假性是显而易见的。

1937年1月审讯过程中已完全肯定和清楚地点出了（或更确切说用被告人的嘴讲出来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间谍恐怖活动问题。

例如，拉狄克于1937年1月29日在他最后的讲话中说："我还有一个罪过。我已经承认自己有罪并揭露了组织，但我顽固拒绝交待关于布哈林的问题。我知道，布哈林的处境和我一样毫无 343

① 《真理报》1937年1月27日。

希望，因为我们的罪过就是不从法律上讲，而从实质上说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是亲密朋友，而精神友谊比其他任何友谊都更加牢固。我知道，布哈林和我一样很受震动，我相信他会向苏维埃政权作出忠实的交待。所以我不愿意叫他被捆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我对我们其余干部的态度也是这样的，希望他们自己放下武器。这能说明我为什么一直到最后，眼看要审判了才懂得，如果我不把另一个恐怖组织说出来的话，就不能出席法庭。”①

拉狄克和其他人在自己的供词中非常肯定和详细地向法庭交待他和布哈林—李可夫小组之间的反革命的“联系”。（无论拉狄克、皮达可夫还是穆拉洛夫都没有交待他们和军人小组的“联系”。他们当然很“诚恳”，但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图哈切夫斯基及其朋友和战友。而后来的审讯确认这些“联系”是很密切的。看来，1937年初斯大林还没有安排逮捕图哈切夫斯基，所以他没有被包括到“平行总部”参与者伪造的“供词”中。）而正是拉狄克和“平行总部”其他成员的供词决定了原“右倾”反对派的命运。1937年1月17日的《消息报》上已经没有了总编辑尼·伊·布哈林的名字。阿·伊·李可夫也被撤职了。但是，斯大林还在拖延逮捕这些我党著名活动家的日期，而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已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已被逮捕和经过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适当加工的原“右倾分子”的 344 “交待”材料，几乎每天都要送到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家里。这是一种精神刑罚，是斯大林的拿手好戏。他用这种办法对待自己不久前的反对论者。根据李可夫的家属证实，他在这些日子里想自杀，但家里人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意味着他承认自己有罪。至于布哈林，为了抗议对他的控告，他在克里姆林宫自己家里宣布绝食。

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被提到中央二——三月全会上，所有参加会的人都给发了专门搜集好的、用以诬陷这两个原“右倾”反对派领导人的伪造的交待材料。斯大林甚至把他们两个人

① 《消息报》1937年1月30日。

请到全会上。还继续绝食的布哈林出席了第一次会议。斯大林以他所特有的虚伪走到布哈林面前，并说："你向谁宣布绝食——党中央？你看，尼古拉，你成了什么样子了，瘦得皮包骨，为你绝食向全会道歉吧！"布哈林回答："有什么用呢？反正你们要把我开除党籍"。"谁也没有想开除你的党籍，"斯大林答道。

在全会上斯大林把指控和诬蔑布哈林的"主动权"交给了自己最亲近的助手，此时特别卖力的是莫洛托夫。当布哈林在全会发言中说到："我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加米涅夫，不会说谎话！"时，莫洛托夫宣称："不承认本身证明您是法西斯走狗，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报刊中说，我们的审讯是有阴谋的。把您抓起来，您就会承认啦！"布哈林回家后说："原来陷井在这里！"①

布哈林面对伪造的控告力图为自己辩护，他以自己和李可夫的名义在全会上宣读了共同声明：他们述说在皮达可夫一拉狄克审讯中和其他被捕人供词中，一切反对他们的材料都属于诬陷材料；这些供词又一次证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中有问题，应该组织调查内务人民委员部活动的委员会。斯大林向他喊道："好吧，我们就叫你到那里去，你自己去看看好了"。

315

为了最后解决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命运，全会组成了一个以阿·伊·米高扬为主席的委员会。在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每个人都要表态（按字母表顺序：安德烈也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科萨列夫等许多人）。字母"C"以前的几乎所有的人的回答是："逮捕、审判、枪毙。"轮到斯大林时，他说："把案件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处理。"这种提法在1937年的条件下和第一种提法没有什么区别，后边的其他一些人也重复了这一公式。（要指出，阿·伊·米高扬在问了所有出席会议的人们之后，自己没有表态，记录上没有写上他的意见。）

委员会的决议交给全会后，1937 年 2 月底布哈林和李可夫被

---

① 引自布哈林的妻子A·M·拉林娜回忆录。

开除了党籍并开除出中央，被捕了。斯大林在中央二——三月全会一次总结会上发言时要求加强同"人民敌人"的斗争，不管这些人打出什么旗号，托洛茨基的还是布哈林的。可是几天前他还说，谁也不打算开除布哈林的党籍。

但是对"右倾分子"案件的侦查拖延了一年多，审讯是在1938年3月举行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审判会议组成是：主席В·В·乌尔利赫，成员И·О·马图列维奇和Б·И·伊也夫列夫，秘书А·А·巴特涅尔。国家公诉人为维辛斯基。被任命为辩护人的是И·Д·布劳德和Н·В·柯莫多夫。

在这最后的对"人民敌人"公开的大审判中被告人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所谓"右倾"反对派的原领导者外，被告当中还有从来没有参加反对派的，是被捕后被斯大林亲自随意算到右倾反对派中去了的。此外这里还有原"左派"，所以审讯被称为"右派托洛茨基总部"。除了1936年和1937年审讯中早已提出的控告（谋害基洛夫，策划谋害斯大林等）被重复用在新的被告头上外，还提出一些新的控告：谋害高尔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1918年谋害列宁未遂，还有企图不仅使乌克兰、白俄罗斯和远东，而且还要使外高加索和中亚细亚都脱离苏联版图，并且把这些地方出卖给帝国主义。后两个地区似乎打算出卖给英国帝国主义，还说这些被告似乎从1921—1922年起就已和英帝国主义保持间谍联系。受审的被告有：尼·伊·布哈林、阿·伊·李可夫、尼·尼·克列斯廷斯基，М·А·切尔诺夫、伊·阿·捷连斯基、格·费·格林柯、阿·巴·罗森霍尔茨、克·格·拉柯夫斯基、В·И·伊万诺夫、亨·格·亚哥达、法伊祖里·霍扎也夫、阿克马利·伊科拉莫夫、В·Ф·沙朗哥维奇等。

在第一次审判会上，主席В·В·乌尔利赫宣读了控告结论后便逐个向被告提出同一个问题："您是否承认自己有罪？"布哈林、李可夫和亚哥达都说："是的，我承认。"可是轮到克列斯廷斯基时，他突然说："我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从来没有参加'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我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联盟。强加

于我的罪行，没有一个与我有关，特别是不能承认我和德国侦探机构有联系的罪行。”

乌尔利赫慌了，再次提出自己的询问，他仍然得到同一的坚定的回答。审判委员会主席又问了其他被告，他们都承认自己有罪。此后，宣布休会二十分钟。

休会期间发生了些什么？无疑，将询问顺序改变了。排在首位的是别索诺夫，他应该揭穿克列斯廷斯基。可是当维辛斯基为了查证别索诺夫的一些供词而审问克列斯廷斯基的时候，后者又一次推翻了自己在预审时的交待，并否认自己参加“右派—托洛茨基联盟”和从事间谍活动。维辛斯基和克列斯廷斯基的对话如下：

347

维辛斯基：和别索诺夫见过面吗？

克列斯廷斯基：是。

维：谈过话？

克：是。

维：谈什么？关于托派的事情？

克：我和他没有谈过，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

维：那么，别索诺夫说了谎话，而您说的是实话了?!您从来都说实话吗？

克：不是。

维：就是说，别索诺夫说的是假话？

克：是。

维：但是，您也不总是说实话，对吗？

克：在案子审理过程中不是总说实话。

维：而在其他时间说的都是实话吗？

克：说实话。

维：为什么如此不尊重调查工作？在调查过程中，您说的不是实话吗？请解释一下。（克列斯廷斯基沉默。）听不到回答。我没有问题了……。

维：主席同志，请您允许把克列斯廷斯基带到别索诺夫的旁

边，使他能听得清楚一些。我怕他在关键时刻听力不好。（克列斯廷斯基移到别索诺夫身旁。）

维：我请别索诺夫专门为克列斯廷斯基重复一下已经讲过的话，并请克列斯廷斯基仔细听。（别索诺夫重复交待给德国搞间谍活动和自己及克列斯廷斯基同托洛茨基的联系。）

348 维辛斯基问克列斯廷斯基：您听到别索诺夫详细叙述了你们谈话的内容，其实质和您的说法距离太远。怎么办？

克：这些谈话内容是没有过的，尽管于1月对质时我承认了部分内容。

维：您和别索诺夫对质时承认了上述内容？

克：是。

维：那么，这个谈话有过？

克：没有……我没有参加托洛茨基总部，因为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

维：从来都不是？

克：不，1927年以前我是托洛茨基分子。……

维：那么，您在1927年以前是托洛茨基分子吗？

克：是。

维：1927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托洛茨基分子了？

克：在党的十五大以前……我和托洛茨基本人及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裂以1927年11月27日为标志，这时我通过刚从美国回来正在莫斯科的谢烈布里亚科夫给托洛茨基发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我尖锐批评了他，是一封措词强硬的信……

维：我们这里没有这封信。我们有另外一封信，这是您给托洛茨基的信。

克：我所说的那封信在法院侦查员那里，因为这封信是在搜查时拿走的，请你们把这封信归案。

维：在您的案卷中只有1927年7月11日的信，是在搜查时没收的。

克：11 月 27 日的信也在那里。

维：没有这封信。

克：不可能。

维：我在预审中询问您时，您说的是实话吗？

克：不是。

维：您为什么不说实话？我请您讲假话了吗？

克：不是。

维：我请您讲实话了吗？

克：你这样说过。

维：您为什么在我请您说实话时，还是说假话？使侦查员把 349 假话记录下来，然后您又在上面签字？

克：我过去在预审时的交待是不对的。

维：……那么后来您也一直没有改变假交待。

克：后来也一直没有改变假交待，因为我的亲身经验告诉我，在开庭审判会之前（如果能够开庭的话），我不可能推翻自己的供词。

维：而现在您以为您能够推翻您的供词吗？

克：不是，这不是主要的。重要的在于我声明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

维：您说过，您自己处在特别秘密地位。什么是“特别秘密地位”？

克：您知道。

维：您不要把我当作这一案件的证人。我问您，什么叫特别秘密地位？

克：这句话是在我 7 月 5 日或 9 日供词中，而这个供词从头至尾是不对的。

维：您使检察院造成误解……为什么您要我也陷于误解？

克：我就是认为，如果我以前讲了今天我说的这些话，就是说，如果我讲事情都是不符实的，那么我这样的声明是不会被送到

党和政府领导人那里。

维：但是您已在记录下面签了字？

克：签了字。

维：您记得吗，我不是直截了当地问过您，对调查有什么声明或意见吗……现在让我来读一下您对侦查员舍伊宁的回答。

克列斯廷斯基的答复是："我对调查没有任何意见"。

350 接着维辛斯基再一次询问别索诺夫，然后宣布休会两小时。外国记者纷纷跑到电话接谈处，把克列斯廷斯基的表现报告自己的报纸。

3月2日晚是开庭审问格林柯和切尔诺夫。当他们交待自己通过克列斯廷斯基和法西斯建立联系时，维辛斯基又询问克列斯廷斯基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克列斯廷斯基又一次坚决否认自己和法西斯有任何联系。

3月3日上午的会上，维辛斯基审问伊万诺夫、布哈林、祖巴列夫和证人瓦西利也夫。没有再问到克列斯廷斯基任何问题。但是3月3日晚上法庭在审问拉科夫斯基时，维辛斯基又审问克列斯廷斯基：

维辛斯基：您已听到了拉科夫斯基有关您所谓脱离托洛茨基主义的详细说明。您是否认为拉科夫斯基的解释是正确的？

克列斯廷斯基：他说的是对的。

维：如果拉科夫斯基在这里讲的一切都是对的话，您是否还要继续欺骗法庭，否认自己预审供词的正确性？

克：我完全承认预审时我的供词。

维：……那么您昨天的声明是怎么回事？这只能解释为托洛茨基分子在审判会上的阴谋伎俩。

克：昨天因受到一时的虚伪的耻辱心的强烈感情支配，因为坐在被告席上和宣读控告结论时给我以极沉重的印象，使我的精神状态不允许我说真话，不允许我说出自己是有罪的。所以自己本应说：是的，我有罪。可是我很机械地事不由己地说：不，我没有

罪。

维：机械地？

克：我实在无能为力在世界舆论面前说出自己始终进行托派 351 活动，反对苏维埃政权。我请法庭记录下来我的声明：我完全承认自己有罪，接受向我本人提出的所有性质严重的控告，我承认自己对我的卖国行为和叛变行为负全部责任。

维：我对被告人克列斯廷斯基暂时没有什么问题。①

尼·伊·布哈林在审判过程中的交待也很值得重视和分析。从审讯速记稿中可看到，布哈林从一开始就承认自己有下面几条罪状：

a）参加了反革命的"右派-托洛茨基联盟"；

b）参加了反革命的右派组织；

c）是这个"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回答这个组织的目标问题时，布哈林说："他追求的主要目标实质上——虽然说起来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或者说在思想上还没有想清楚——就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利用苏维埃政权遇到的所有困难，包括利用战争，可以预料战争在未来是要发生的。"② 但是在回答维辛斯基和乌尔利赫所提出来的关于具体罪行的问题时，布哈林虽不采取克列斯廷斯基那种强硬态度，但他力图推翻其中的许多控告。例如，布哈林否认自己直接参与了任何间谍活动。他否认自己和暗杀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马 352 克西姆·彼什科夫③ 有关。布哈林否认"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18年有谋害列宁、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的计划，并反驳与此有关的

---

① 见《反苏维埃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案件的审讯报告》速记稿全文，法律出版社1938年版第46—146页。引人注目的是简短的审讯报告和报纸把审问克列斯廷斯基的相当部分删掉了。至于全文，只发出去少量份数。

② 见《反苏维埃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案件的审讯报告》速记稿全文，法律出版社1938年版第332页。

③ 彼什科夫·马克西姆·阿列克谢也维奇（1897—1934），高尔基的儿子。——译者

证人雅柯夫列娃和曼采夫的交待。

维辛斯基：这是您的说法，可是雅柯夫列娃说的和您讲的正相反，那么，她说的是假话吗？

布哈林：我不同意她所说的，她说的是假话。

维：那么，曼采夫说的也是假话吗？

布：是的，他说的也是假话。我说的都是我所知道的事，至于他们怎么说，这要问他们自己的良心。

维：揭发您的是您过去的三名同伙，这您应该如何解释呢？

布：您要看到，我既没有足够的证据，也没有足够的条件去进行心理分析，使我能够答复这个问题。

维：不能解释？

布：不是不能，很简单，是拒绝解释。①

最后，布哈林在他最后讲话中对整个审讯给予了一定的法律评价。他说："被告人的承认不一定需要。被告人的承认只是中世纪的法律原则。"他在这里指的正是完全建立在被告人口供基础上的审判。所以毫不奇怪，对布哈林的询问引起了"审判官"的愤怒。在一次审判会上主席乌尔利赫忍不住了，他对布哈林宣称："您还在绕弯子，关于您的罪行并没有交待出什么。"②

布哈林表现中的某种策略手法维辛斯基也发现了。他说："看来，您是遵循一定的策略，并不愿意说出真话，而是用源源不绝的词藻掩盖自己要的花招，讲一大堆政治、哲学、理论等等道理，可是这些东西您应该永远忘掉，因为您的罪行是间谍活动。根据侦查材料，您显然是一个侦探机构的间谍。所以放弃您要的那些花招吧。"③

有关布哈林采取的特殊策略，当时的报纸上也提到过。《消息

① 见《反苏维埃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案件的审讯报告》速记稿全文，法律出版社1938年版第427页。

② 同前，第348页。

③ 同前，第377页。

禁》写道："这一套都是策略。布哈林的一切回答都是以这个策略为指导。没有一句直接的回答，一直到对质或交相询问或证人供词足以证明为止，逼得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最凶恶的最卑鄙的罪人。这个策略的目的就是什么都不说，他用科学形式的语言把对他的控告搞乱，颠倒是非，以达到隐蔽自己的目的。干打雷不下雨地宣称他对一切负责，可是对他的一切具体的控告都推翻了。"①

一些现代研究者(И·А·勒-奥里)，依据对布哈林当时的交待和行为的分析认为，布哈林完全自觉地力图不直接和审判员冲突而击中审判在法律上面的要害，指出这次审判是非法的，被告供词也是假的。(这次审判的目睹者驻莫斯科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Ф·马克林准将在他写的一本书中也持这种观点。)

* * *

大家知道，"平行总部"和"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案件的大部分被告人被法院判处枪决。只有几个被告被判了不同限期的监禁(普列特涅夫、拉科夫斯基、别索诺夫、拉狄克、阿尔诺德等)。但他们后来也通过各种途径在被监禁的地方全部都死于非命了。如：别索诺夫、索柯里尼柯夫和奥新斯基于1941年战争爆发后被转移到奥勒尔监狱，并未经过任何审判被枪决了。1936—1938年莫斯科政治审判时判决的人没有一个活了下来，也从来没有一个人重新获得自由。 354

列·托洛茨基也被缺席判处死刑。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它在国外组织了对托洛茨基的真正的追捕。三十年代后半期几次暗害托洛茨基未遂，其中有些外国共产党员也参与了这个活动。这以后不久，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在非常奇怪的情况下死去了，后来托洛茨基的一个女秘书被暗害。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本人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里的那幢严加防守的住宅中也被暗害了。杀他的凶手是年轻的西班牙共产党员，内务人

① 《消息报》1938年3月9日的文章：《间谍头子》。

民委员部暗探拉蒙·麦尔卡捷尔。他设法取得了托洛茨基身边的关系亲密的人和卫队的信任。有一次和托洛茨基见面时，麦尔卡捷尔用凿冰斧头砍了托洛茨基头部。凶手未能逃脱，墨西哥法院判了他二十年监禁。斯大林命令给拉蒙·麦尔卡捷尔授与苏联英雄称号，他的母亲因帮助他实现暗害而授与列宁勋章。这次行动的领导者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重要工作人员埃廷根也被授与列宁勋章①。

五、莫斯科“公开”政治审判是假案

英国共产党一位领导人帕·杜德在苏共二十二大后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到1936—1938年苏联“公开”审判时说：“对这些审判的最后评价是未来历史学家的事情，而这些审判是否有道理，许多人是持怀疑态度的。”② 我们自然不能同意这个观点。不仅是将来的历史学家，而是当代的每一个诚实的历史学家都有权了解有关1936—1938年审判的真实情况，因为这些事情对我国战前和战后整个政治形势起了多么巨大的影响。因为真实情况就是：上述政治案件都完全是假案。这些审判是一些骇人听闻的演出，是可怕的戏剧，上台给观众演出之前不知经过多少次排练。

只有很小一部分被告供词符合真实情况，比如说他们这些反对派过去的某些活动。很明显，是原内务人民委员亚哥达和基洛夫谋害有关，谋害基洛夫案件决不是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或布哈林授意组织的。

在有关克列斯廷斯基同别索诺夫和德国国防军有联系的口供

① 拉蒙·麦尔卡捷尔，1960年刑满后从墨西哥监狱中释放出来，现住苏联。（麦尔卡捷尔已于1978年10月在古巴治病时去世，终年六十五岁。——译者）他的母亲脱离了共产主义运动，移居法国。埃廷根在贝利亚被枪毙后，被苏联法庭判了十年监禁。1963年释放后在“国际书店”当编辑组长。

② 帕·杜德：《国际》莫斯科 1966年版第251页。

中也有一部分是事实。但在这些联系中没有任何间谍或叛卖行为。克列斯廷斯基同别索诺夫在1921—1922年确实和国防军代表见过面。但是他们这些会面是根据苏德政府在拉巴勒达成的秘密协议而进行的，是经过列宁批准的，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斯大林也是不可能不了解这些会晤情况的。二十年代初期对苏联政府来说，突破西方列强对苏联外交上的孤立和经济封锁是很重要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和战败的德国之间达成某些协议，甚至包括在军事问题上达成协议，对我国是有利的。但是经过17年后把这些国际协议说成是克列斯廷斯基、别索诺夫和托洛茨基做出来的事情就是荒唐的了。

至于其他大部分被告的口供，那显然都是谎话，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刑讯室里由惨无人道的审讯员蓄意逼着被告招供而炮制出来的。

人所共知，今天再也不会有人控告原来的反对派，说他们谋害了基洛夫、高尔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对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加马尔尼克、乌波列维奇和其他苏联著名军事将领的彻底的无条件的平反，也证明在最后一次审判"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时提出来的大部分指控是假的。正是因为被告人和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等军人的"有罪的联系"构成这次审判的主要案由。1938年3月在审判中有些被告是多么"坦率和诚恳地"承认自己有罪，他们指出雅基尔和"右派"分子有勾结，说他们共同委托一个恐怖分子去杀害叶若夫，而加马尔尼克仿佛又委托另一个恐怖分子杀害斯大林。"右派"分子还在他们的口供中揭发图哈切夫斯基和加马尔尼克早在1934年就策划攻取克里姆林宫，杀害中央委员和逮捕党的十七大代表。在这次审判中沙朗哥维奇也"坦率"交待白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戈洛杰德和切尔维亚科夫似乎是波兰间谍，白俄罗斯的任何重要任命都要经波兰暗探机构的批准才行。现在戈洛杰德和切尔维亚科夫都已完全恢复名誉。乌兹别克斯坦中央第一书记阿·伊克拉莫夫和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委员会议主席法·霍

356

扎也夫也已完全恢复了名誉，可是当时对右派分子审判时诬陷他们力图把中亚细亚交给英国人之说也曾甚嚣尘上。《真理报》1964年4月9日的文章称伊克拉莫夫为列宁党的忠实战士。《消息报》称霍扎也夫为“为伟大事业而斗争的战士”①。在同一审判中，被告人经常提到一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卢祖塔克的名字，称他为同伙。现在卢祖塔克也死后被彻底平反了。叶努启泽也同样完全恢复了名誉，而如果相信李可夫当时的口供的话，那么，当时也说他曾出席了“托洛茨基-布哈林总部”的秘密会议，而且在这次会上还似乎通过了谋害基洛夫的决议。

357 在审判“平行总部”案件过程中有关1934年在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谋害莫洛托夫未遂问题占了很大的比重。许多被告人（穆拉洛夫、阿尔诺德等）详细讲述了如何组织这一次行动，什么人坚持要暗杀莫洛托夫云云。但我们现在从尼·米·什维尔尼克在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知道，1934年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根本没有过任何谋害莫洛托夫未遂案件，这事完全是莫洛托夫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捏造出来的。

上面我们已讲过尼·尼·克列斯廷斯基，他是在对右派分子审判中的主要被告人，他原来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副人民委员。审判第一天时，克列斯廷斯基企图否认强加在他头上的诬告，此后所有报纸都谩骂他。可是在1963年，伊·迈斯基院士所描绘的克列斯廷斯基的形象则是完全另一个样子，说他是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之一，和李维诺夫、契切林、克拉辛一起为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打下列宁对外政策的基础②。《历史百科全书》也给克列斯廷斯基活动以很高的评价③。

1964年2月《真理报》发表了列·斯·邵武勉纪念党的十七大三十周年的文章。在列举我们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从事经济

① 《消息报》1966年5月24日。

② 《列宁学校的外交家》载1963年9月27日《消息报》。

③ 《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8卷莫斯科1966年版第76页。

和文化建设的优秀布尔什维克的名单时，提到了苏联财政人民委员格·费·格林柯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主席伊·阿·捷连斯基。而他们在对右派分子审判时曾被指控为进行间谍和破坏活动并被最高法院判处死刑（那时曾断言，捷连斯基从1911年起是沙皇的密探并出卖了许多布尔什维克）。现在原林业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В·И·伊万诺夫也被彻底平反，可是当时他不仅被控告为参加了"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而且说他从中学八年级的时候起就是一个密探①。

高尔基的私人秘书П·П·克留奇科夫也被平反，他在"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案件中被指控为暗害高尔基和他儿子马克西姆·彼什科夫的人。在最近出版的И·С·什卡普著的《和高尔基在一起的七年》一书中，多处提到克留奇科夫。

1904年入党的瓦·尼·雅柯夫列娃也被彻底平反了。她在对右派分子审判案件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在法庭上宣读了事先由侦查员准备好的假交待材料（根据苏共党员Р·Г·金兹堡的证实，雅柯夫列娃于1938年被杀害前告诉同牢的同志们，请他们在出狱后转告人们，她是在法庭的压力下被迫作出了那些完全伪造的交待）。

这种能够证明三十年代政治审判中被告人所交待的假材料和事实的清单还可以继续列举。

至今为止，所有在莫斯科政治审判案件中的被告人的公民权都已被恢复，其中十七人恢复了党籍。这样一来，所有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平行总部"和"右派-托洛茨基总部"的控告结论和判决实际上已经撤销了，但是正式的和公开的撤销判决可惜还没有实现。

党的二十大后出版的所有党史方面的书再也没有提到三十年代的审判，1960年和1961年出版的苏共党史教科书也没有提到

① 《东方真理报》1963年7月20日。

这些审判。只是在1962年的苏共党史教科书中出现了两行关于三十年代政治审判案的话。这本教科书写道："三十年代的镇压是针对原来的思想上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被说成是帝国主义、外国暗探机构的奸细。"1964年在《苏联历史》第9卷的样本中出现了比较肯定和详细的，但相当谨慎的对三十年代审判案的评价，这本书是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写的，曾分发给我国的历史学家供讨论用。样本中写道："基洛夫被暗杀后，1935—1938年期间对原反对派进行了四次审判：1935年1月、1936年8月、1937年1月和1938年3月。其中三次是公开审判。所有被追究责任的人指控为出卖祖国，进行间谍活动，破坏活动，策划谋害斯大林、莫洛托夫的恐怖行动，以及暗杀了高尔基和其他的人。对原材料的分析表明，甚至在公开审判时案件的审理也是违犯法律程序的。犯罪的根据建立在被告的交待基础上的，这和无罪的推论原则是直接相违背的。卡·伯·拉狄克在审讯时宣称，整个的审讯建立在两个人的口供上面，即他和皮达可夫的口供，并带讽刺地问维辛斯基：既然我们是土匪和间谍，我们的口供怎么能作为证据呢？他问维辛斯基："您坚信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都是无可辩驳的真话吗？您的坚信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现在已完全查明，审讯过程中多数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的交待是无根据的。这就使整个口供的确实性引起了怀疑。总检察长安·亚·维辛斯基的做法是对法律程序的粗暴违犯。例如，当尼·尼·克列斯廷斯基拒绝承认自己被指控的那些罪时，维辛斯基宣布休会，直至第二天才恢复审问。当再次审问时，克列斯廷斯基说，他是机械地事不由己地回答："不，我没有罪"，而应该说："是，我有罪。"尼·伊·布哈林断然说自己没有参加策划暗杀和破坏的活动，法院提出的对他这方面的指控没有任何证据。他说："除了沙朗哥维奇口供外，你们没有任何证明，而关于这个人，我在听到控告结论之前根本没有听说过。"维辛斯基在指控发言中谈到这一问题时，曾厚颜无耻地宣称：起诉时并不是所有罪行都需要有证据。上述一切情况促使我们得

到这样的结论，即在审讯过程中粗暴地违犯了法律。”①

虽然有以上这类证据，为什么对这些案件连撤销手续都没有进行呢？为什么许多在逮捕前是党员的被告人还没有恢复党籍呢？在这些方面，不可能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辩解。

尼·伊·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请他的妻子A·M·拉林娜把这封信背下来。拉林娜从监禁中被释放后把这封信写下来了，并于1961年3月准备为布哈林平反时交给了党的监察委员会。尼·伊·布哈林在这封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他们这些行动非常果断而且是有信心的。

现在捷尔任斯基已不在人间，契卡的优良传统已成为过去了，当时革命思想指导了他们的一切行动，使他们对敌人无情，对付了各种反革命，保卫了国家。所以契卡机构受到了特殊的信任，享有特殊的荣誉、威信和尊重。而现在所谓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就其多数人来说，是由无原则的、腐化的、物质上得到满足的官员组成的蜕化变质的组织。他们利用了契卡原来的威信，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怀疑心理，我不敢说得更多。为了追求奖章和荣誉，从事最可卑的事情，而他们不懂得，他们同时在消灭他们自己，因为历史不能容忍卑劣行径的见证人继续存在。 361

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为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他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么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的。

乌云笼罩在党的头上：我的丝毫无罪的头会株连几千无罪的人，因为要制造出一个组织——布哈林的组织，而这个组织不但在

① 《苏联通史》第9卷样本第137—138页。

今天，在我和党7年来没有任何分歧的情况下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在右派反对派时代也从未曾有过。关于留京和乌格拉诺夫的秘密组织，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公开地说出了我们的观点。

我从十八岁起就在党内，我生活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为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以一个神圣的名字命名的报纸——《真理报》，这几天却刊登了卑鄙无耻的谎言，说什么我，尼古拉·布哈林，企图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的无耻谎言，这个谎言按其卑鄙程度，按其对人民不负责任的程度，只能和下面这样的谎言划等号，就等于说：现在发现尼古拉·罗曼诺夫①一辈子从事和资本主义、君主制度作斗争，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如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犯过错误，我希望后代不要对我的批评严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们是第一次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在人们未曾走过的道路上。那个时代不一样，风尚也不同。那时《真理报》上辟有辩论专栏，大家在争论，寻找途径，争论后又和好，继续共同前进。

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历史赋予您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罪行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大，象火焰一样越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

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几天里，我坚信，历史的过滤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将会把我头上的污秽冲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如果是为了列宁的生命我会毫不动摇的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情。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者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

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的旗帜上也有我洒的一滴血。

尼·布哈林"

382

① 罗曼诺夫·尼古拉——沙皇尼古拉二世。——译者

这封信不仅说明了布哈林的悲剧，而且也说明了他直到最后也没有懂得所发生的事情的全部可怕的含义。在这封信里布哈林只为自己辩护，没有提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和其他已经被处以死刑或被捕的我党活动家。布哈林写道，他一点也不知道关于留京和乌格拉诺夫秘密组织的存在，并没有对这些"秘密组织"是否存在发生怀疑。布哈林还首先强调自己"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但不管怎样，对这封世界闻名的信不能在今后不给予答复。

在苏共二十二大后，我党的四名最老的活动家：叶·斯塔索娃(1898年入党)，维·卡尔宾斯基(1898年入党)，P·卡塔尼扬(1903年入党)和A·鲁登科(1905年入党)，写了一封信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其内容如下："亲爱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同志们！我们向您们提出一个重要问题。革命者布尔什维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走过的三十年的道路是很复杂的。他犯过理论和政治方面的严重错误，列宁不止一次狠狠地批评了他。但是列宁批评布哈林从来没有怀疑布哈林对党和革命的忠诚；这是在布尔什维主义基本问题上同自己的志同道合者之间的批评和争论。

尼·布哈林是具有这样特点的人：他承认自己的错误时，是没有虚伪自尊心的，而且改正了这些错误。正是因为这点他在列宁时代并不因为他犯过错误把他开除出党，而是继续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做了十二年中央党报《真理报》的编辑。

列宁给予一些党的工作者以某种总结性鉴定时充分估计了他们的历史，他在'遗嘱'中称布哈林为'党的最宝贵的，最大的理论家。' 363

布哈林在1937年'审讯'时，仅仅根据所谓的他进行过间谍和恐怖活动的口供而被开除党籍和开除出中央，而这些口供的荒谬性，现在是一目了然的了。苏共中央委员彼·波斯佩洛夫同志于1962年12月在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毫不含糊地说(已在报纸上发表了)，布哈林当然不是间谍或恐怖分子。怎么可以在两千人参

加的大会上和在报纸上已经肯定了他之后，仍保留法院对他的判决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因为这是完全不能构成罪行的对他的判决和处分。

这使法院丧失威信。他被审判和开除党籍并不是因为在布勒斯特和约问题上，以及在集体化问题上有意见分歧时他所犯的错误。

废除非法判决和恢复布哈林的党籍不仅是为我党列宁时代的一位杰出的活动家个人申张正义，而且对相应时期历史的进一步研究有着重要作用，现在因为禁止提布哈林的名字因而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我们关于布哈林只能写坏的，因而导致对有关历史时期的歪曲。

我们想，恢复真象和废除建立在假材料基础上的决议只能更进一步提高我党的威信和我国的威望。

我们在我党光荣历史的许多阶段都亲自了解布哈林，了解他作为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缺点和优点。我们完全了解和同意列宁在他生前最后几天里好像向党告别时所讲的关于尼古拉·布哈林的那样亲切的话：'党的合法的宠儿'。这些话是列宁讲到别人时所没有谈过的。

这些话使我们所有的人负有更大的责任，正是因为这个原故迫使我们请求你们——中央主席团成员们，请求你们不要把具有列宁这样评价的人的名字留在叛徒营垒中，取消1937年对布哈林的指控，恢复他的名誉，撤销判决和恢复他的党籍。

364

列宁称之为'党的合法的宠儿'的人不能留在叛徒和被党抛弃的人的名单之中。"

这封信也仍然还没有得到回答，尽管在这封信上面签了字的四名最老的党员今天都已不在人间了。

终究必须懂得，保持沉默这种臭名昭著的方法对我们历史科学来说是多么荒谬和可笑。荒谬和可笑地作出一付样子，似乎三十年代中期没有任何政治审判，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皮达可

夫、托姆斯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其他人从来都不是我党和我国的杰出的领导者，似乎他们从来没有在列宁领导下工作过，他们虽然犯过许多甚至常常是很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但他们都在我党内进行过巨大的和有益的工作。荒谬和可笑的是，上述这些活动家的名字，在今天我们出版的百科全书和参考书中都是找不到的。如果不得不把这些人的名字包括进某一个人名索引时，下面也只是"很关心地"列举他们的毛病、缺点和错误。

这里所涉及的是我们历史科学的荣誉，它应对每一个历史活动家严格地按他的功过，给予评价。如果在指出我党和人民伟大而无可争辩的成就的同时，我们的历史科学不忘记所有那些用自己的劳动、斗争、往往是以鲜血帮助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建立的那些人们的话，那才是列宁式高尚感情的真正表现。

*　　　*　　　*

很自然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叶若夫和亚哥达利用了什么方法准备了三十年代的非法审讯，他们怎样从过去许多是坚强革命者的被告人那里得到斯大林所需要的"口供"和"交待"？

365

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有各种不同的假设。例如，曾有这样的推测：在法庭上作为"被告人"的不是布哈林、加米涅夫、拉科夫斯基和其他人，而是化了装的专门训练出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暗探。但是这个推测被曾出席审判会的一些苏联同志推翻了（叶・亚・格涅金、伊・格・爱伦堡等）。例如，爱伦堡曾出席过对"右派分子"的审判会，他同本书作者谈话时肯定地说，坐在被告席上的正是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罗森霍尔茨、拉科夫斯基等人；但爱伦堡又说，大多数被告人精神萎靡不振，都很消极。这些人用机械的语言作交待，没有本人所特有的语调和风度。被告人发言中虽有一些本人所特有的词汇，但许多被告人显然不是用自己的语言讲话的，而是用一种中等水平办事员的语言，他们使用的一些提法是在过去生活中他们从来没有用过的。同时，这些人并没有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他们不久前受到长时间的严刑拷打。

爱伦堡根据自己的观察作出这样的推测，说许多被告人是受着使人失去意志的药物的支配。这种说法值得注意。医药中是有这样的药物，它能使精力充沛和意志坚强的人变为顺从的傀儡。

老党员С·И·别尔季切夫斯卡娅（1919年入党）证实，她被监禁时在一个拘留所中遇到内战时期就熟悉的列沃尔托夫监狱的医生。这位医生告诉别尔季切夫斯卡娅说：对“右派分子”审讯开始后第二天，她在列沃尔托夫监狱里见到了被毒打得浑身是血的尼·尼·克列斯廷斯基。所以别尔季切夫斯卡娅推测，如果第一天在审判会上出席的克列斯廷斯基是真的话，那么以后的审判会上在被告席上的是和他长得相像的人。在审理这一案件的过程中，受委托办理有关外交人民委员部一些具体事务的叶·阿·格涅金认为，这种推测是可能的。根据K·伊科拉莫夫的证实，他在集中营里见过一个出席过这次审判会的人，这个人在1937年以前就很熟悉克列斯廷斯基。他告诉伊科拉莫夫说：“你知道，他们显然是对克列斯廷斯基使用了某种可怕的办法，因为第二天我简直认不出克列斯廷斯基。他连声音都变了。”

360

今天有些同志说，侦查人员可能使用了催眠和催眠暗示方法。和这有关的是三十年代中期，当时有名的催眠专家阿尔诺利德失踪了。

有些外国作者不是没有根据的推测，在准备审判时对犯人采用对思想和心理起作用某种很有效的手段。一位西方历史学家Ф·费托写道：“这些手段是：他们专门利用被告人的诚挚，在被告人不了解斯大林主义的真面目的情况下打主意，因为他们都把斯大林主义看成是在现阶段历史条件下，在激烈阶级斗争条件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形式。他们依赖搞骇人听闻的各种证明体系，依靠这些人的信念和诚挚，说服他们，因为根据他们似乎是赞同的观点或者他们诚实地认为是他们所赞同的观点，他们在‘客观’上（用我们的语言说‘不自觉地’）成为罪人，成为自己敌人的同盟军，不自觉地成为敌人的工具。一旦就这点说服了他们，他们就好像

被卷入齿轮联动机里一样，就必须同意满足对他们提出来的一切要求，使他们愿意在真正的审判官（即在后代及自己的良心）面前赎罪，为了那怕是最后一次为党作一件大有益处的事情，因为这个党的领袖已经认为他们的活动是有害的，和职业革命家的称号不相称的了。胜利者永远而且肯定是正确的。所以他给失败者提供挽救党的统一、团结和荣誉的可能性，因为这三者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他们的过失（他们自己承认了这点）受到了威胁。所以那些在全体党员，也可能在全国人民看来是新政策的反对派的人，他们应该把自己说成是不可救药的、卑鄙无耻的家伙，不值得尊敬和怜悯的鬼迷心窍的人，从来没有做过，甚至也从来没有想去做一件对共产主义运动有好处的事，诚实的有益的事情"。[1] A·凯斯特列尔在自己的小说《中午的暮色》中也持这种说法。[2] 367

所有上述的这些推测显然都有部分的道理。无论是在1930—1931年审判的准备阶段，还是在1936—1938年的审判中，都对被告人采取过各种"加工"方法。但是我们掌握的一些证据，说明在预审时侦查员在对付上述审判中多数被告人的主要办法是极残酷的非刑拷打，使这些人的毅力被摧残，使他们被迫接受由侦查员早已写好的这样或那样的关于他们"罪行"说法，并在这些材料上签字。苏共党员H·K·伊柳赫夫证实，1938年他在布蒂尔卡监狱和别索诺夫关在同一牢房里，别索诺夫在对"右倾分子"审判中被判处长期监禁。别索诺夫和伊柳赫夫在红色教授学院里从事教学工作时很熟，他告诉伊柳赫夫，在审判前对他长时间地进行了非刑拷打。最初对他连续17昼夜采取了"车轮战术"[3]，不让他睡觉，不给饭吃。别索诺夫倒下去，失去知觉，但他被弄醒过来，一

---

① Ф·费托：《匈牙利的悲剧》，译自法文，外国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57年版第55页。

② A·凯斯特列尔：《中午的暮色》（小说）。

③ 原文是"传送带"，是一种酷刑，意思是不停顿的受刑，即昼夜不停的站着，不吃不睡。——译者

次一次地叫他站起来。后来开始有计划的拷打，把他的肾脏打坏了，使这个原来很健康结实的人成为消瘦不堪、精疲力尽的残废人。对待有些被告人采取了更加卑鄙的方法。有人证明，布哈林是在侦查员威胁他要把他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消灭后才开始“交待”的，而克列斯廷斯基是在威胁要把他的妻子和女儿打死后才在侦查记录上签了字。因为事先对被告人宣布，如果他们在审讯时不提供所需要的口供的话，那么审判后还要对他们严刑拷打。同时，又对许多被告人许愿要保留他们的生命，把他们派到北方或远东地区作党的或苏维埃的工作。还劝说一些人，说他们的口供是为了当前国际形势的需要，将来会为他们平反。根据德罗布尼斯的妻子证实，在准备对“平行总部”审讯时，对她的丈夫许过这种愿。德罗布尼斯设法转告家属，“要他们不要担心”。有材料证明，拉狄克同样被这种许愿所说服，在准备他的主要罪行控告材料时，他自愿和侦查员合作。不用说，这些许愿一条也没有兑现。索柯里尼柯夫也对同牢房的人讲过严刑拷打之事。

六、对原反对派成员的大规模的镇压

斯大林在1937年3月5日中央全会上说，要镇压那些还继续忠实于托洛茨基的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斯大林声称：“我们的同志当中有一定数量的原托洛茨基分子，但他们早已离开了托洛茨基主义，而且和这个主义进行斗争。如果打击这样的同志那是很愚蠢的。”

斯大林的讲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地方机构开始缩小镇压的范围。但这些机构很快又得到适当的解释，因此镇压又以比过去更大的规模重新恢复了。到1937年底实际上几乎所有原反对派成员都被捕了，不管他们被捕时持什么观点。

在这方面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攻克冬宫的领导者之一，逮捕临时政府的英雄弗·安东诺夫—奥弗申科的

命运非常典型。这位十月革命的非凡英雄，后来在内战时期不仅指挥了军团，而且还指挥了方面军，他在1923—1927年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但1927年后他完全脱离了托洛茨基并谴责了托派的政治路线。所以党又信任他，安排给他重要军事和政治工作。1936—1937年安东诺夫—奥弗申科在西班牙作战。1937年8月他被召回莫斯科，回来后，一个月都没有分配他任何工作。9月斯大林把他叫到克里姆林宫，同他谈了有关西班牙的事情①。

这次谈话后，安东诺夫—奥弗申科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司法人民委员。这样，就把共和国范围内正确遵守法律的责任放在他身上。但是几个星期以后，安东诺夫—奥弗申科突然被捕了，不久被枪决了②。

著名革命者E·埃什巴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他积极参加了高加索的革命活动和内战，于1921年领导了阿布哈兹劳动人民起义。1926年埃什巴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但很快脱离了它并承认了错误，他被恢复了党籍。以后，埃什巴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担任重要职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他的一切力量。但是1937年埃什巴被控告他参加托洛茨基活动而被捕身亡了③。

现在安东诺夫-奥弗申科和埃什巴已被昭雪平反，同我党一名最老的党员亚·康·沃龙斯基一样，他是列宁时代有声望的批评家和政论家。他在1925—1928年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但后来和它断绝了关系。

370

原反对派死于非命的还有Г·Ф·费多罗夫——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第一号党证享有者，他在三十年代中期担任全苏地图托拉斯的领导人。《消息报》登了一篇长文，纪念这

① 见A·B·拉基廷著小册子《为了革命》，莫斯科1965年版。

② 关于这个十月革命英雄在侦查过程中和枪决以前的勇敢而不愧为英雄的表现，见К·托姆斯基1964年11月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③ 《东方曙光》1968年3月20日。

位有功绩的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工人自修知识分子，在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积极参加十月武装起义的人①。但这篇文章却没有提到费多罗夫于1937年被枪决的事。

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逮捕和消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反对派原成员的同时，还打击了其他较早和较小的反对派。如“民主集中派”(1920—1921年)的许多成员被捕了，可是他们在1937年任何反党的事情都没有做过(苏联中央统计局领导人Н·奥辛斯基，莫·斯图科夫，И·К·达什科夫斯基等)。所谓“工人反对派”(1920—1922年)的领导者和成员也被捕了(叶·伊格纳托夫、亚·施略普尼柯夫等)。其中后来被平反的有阿·谢·基谢廖夫，他是1898年入党的职业革命家和我党著名活动家，1924—1938年担任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二十年代初阿·谢·基谢廖夫参加过“工人反对派”，但很快就脱离了他们。可是他仍被逮捕并从肉体上被消灭了。

“工人反对派”的另一名成员尼·阿·库比雅克也被捕牺牲了。他最后的职务是联共(布)中央书记，土地人民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全苏城市公用事业委员会主席。

所谓司佐尔夫-洛米纳泽小组的大部分成员也牺牲了。各加盟共和国中对过去被指责为“民族主义倾向派”的党员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如布都·穆迪瓦尼等)。

371

这些1937—1938年间遭到镇压的人，早已没有进行任何反对派活动了，有些人我们在下面还要提到。在这里我们还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现在虽然讲的是逮捕了“没有再参加反对派”的人，但我们完全不是说，反对派活动本身可以成为刑事追究的理由。

1935—1937年间，内务部机构在大规模地逮捕党内反对派成员的同时，也逮捕了其他党派原成员即原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崩得分子、立宪民主党人等，他们都是前几次镇

---

① 《消息报》1967年4月6日的文章：《革命的委任书》。

压的幸存者或者是在内战结束后前几年里没有被驱逐国外的人。其中大部分人还是1922年大赦时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有些是刑满释放的。他们这些人中几乎全体都继续留在流放地或者在离莫斯科较远的城市（乌法、塔什干、撒马尔汗等），有些在近一些的城市的经济或苏维埃机关里或教学单位工作。他们互相保持友好来往和通信关系，但并没有从事政治活动，更不用说反苏和反革命活动了。

例如：被捕的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著名领导人——玛·亚·斯皮利多诺娃、鲍·卡姆科夫、И·А·迈奥罗夫，亚·阿·伊兹马伊洛维奇、伊·康·卡霍夫斯卡娅；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著名领导人阿·拉·郭茨等。我们在前面已写过，大部分孟什维克是在1931年—1932年被捕的，这时又镇压了余下的少量尚未失去自由的人（K·戈古阿等）。

许多民粹派老人也没有被饶恕。谢·米·基洛夫被暗杀不久，"原政治犯和流放者协会"被解散了，他们的刊物《苦役和流放》被封了。与此同时逮捕了一些革命前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如：1935年逮捕了民粹派分子А·В·普利贝洛夫和Н·М·萨洛娃。此外，也逮捕了一些未曾从事恐怖活动的民粹派分子，如："南俄罗斯工人联盟"活动家Е·Н·柯瓦里斯卡娅，她在二十至三十年代始终是《苦役和流放》杂志编辑部成员。有些民粹派分子（瓦·伊·苏霍姆林、А·И·普利贝洛娃-科尔巴等）是后来被捕的。他们几乎全都牺牲了。从长期监禁的苦难中活下来的只有伊·康·卡霍夫斯卡娅，她在五十年代末去世前给她的朋友们留下了一部简短回忆录，回忆她在斯大林时代的监狱和集中营里度过的可怕的岁月。 372

许多其他党派的党员在他们被捕时不仅早已完全停止在他们党内的任何政治活动，而且早在1918—1920年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组织断绝了一切来往，并公开谴责了自己原来的政治观点，后来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参加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内战，担任过国家、经济和党机构及共产国际的许多重要职务

(鲍·费·马尔金、Г·扎克斯、А·П·柯列加也夫、Ф·Ю·斯维特洛夫、Е·雅尔邱克、Г·Б·桑多米尔斯基、Э·沙托夫等)。为消灭原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没有进行公开的政治审判，报纸几乎没有报道关于逮捕这些人的消息，这是一个特点。显然是认为，如果党内原反对派是“人民敌人”的话，那么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理所当然的更是如此。

七、谈谈消灭原反对派成员的原因的问题

毫无疑问，一切逮捕原反对派的主要活动是斯大林亲自指挥的。很自然产生这样的问题：斯大林从肉体上消灭这些在三十年代中期对他的政权不构成任何严重威胁的原思想对手的动机是什么呢？

关于斯大林进行大规模非法镇压的动机问题，我们将在本书其它章节中去讨论。所以在这里只谈几点看法。

显然，对斯大林来说，消灭一切原反对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事并不是偶然的行动，而是事先经过周密考虑和计划好的政治安排。从这个意义上，斯大林于1933年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月全会上的讲话是很引人注目的。斯大林当时说：“必须注意到，苏维埃国家威力的增长一定会使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的抵抗加强起来。正因为他们正在死亡，他们已经面临末日，所以他们一定会从一种袭击形式转到另一种更猛烈的袭击形式，向居民中的落后阶层呼吁，发动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从前的人物用尽一切危害和诬蔑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企图以此发动落后分子。在这个基础上，过去的反革命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残兵败将、中部和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残兵败将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关于斯大林的这个包含多方面意思的凶多吉少的“预言”在1937—1938年说得不少。)这当然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迅速肃清这些分子而

避免特别的牺牲，我们就必须注意到这一切。"[①] 我们看到，斯大林毫不犹豫地力图迅速而不付出特别代价去消灭"这些分子"，尽管他们还没有蠢动起来，而只是"能够蠢动起来"。

也许，斯大林因为预见到原反对派必然要起来反对社会主义，所以决定先下手并用基洛夫被暗杀为借口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吗？这种说法，斯大林本人可能向有些亲近的人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表达过（因为连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都不能不明白：这些指示和命令，是非法的，是需要给予解释的），但是我们想，这类想法在斯大林的行动中不会起什么重要作用。 374

也许，斯大林想在国内建立个人专政制度，怕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其他人会建立一个新的，比过去历次反对派威胁更大得多的反对派，因为正是这时斯大林已走上了离开马列主义越来越远的道路。但这种考虑恐怕在斯大林的行动中也不会起什么重要的作用。

从肉体上消灭所有原反对派的领导人和几乎所有原反对派的成员，是因为：第一，是斯大林对自己原政治敌人的报复，因为这些人当时和他斗争时讲过的话和对他作出的评价都是相当不留情面的。二十年代斯大林还没有足够的权力和影响足以从肉体上消灭反对自己的人。他正在等待时机。反对派向党的投降，斯大林只是从形式上接受了。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反对派的许多领导人，虽然似乎得到了谅解，恢复了党籍，甚至被任命到苏维埃和经济各种领导岗位上去工作，但从斯大林方面来说，这种"谅解"并不是真诚的。对斯大林来说，这只是政治手腕，就是说，正是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欺骗党，耍两面派，说的是一套，而准备做的和正在做的是另一套。一旦他感到自己的力量已足够用来对付他们时，他马上对原反对派的一切活动家下手了。第二，不仅如此，击溃这些原反对派和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指控他们为间谍，背叛祖国，从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90—191页。

事破坏活动等又使斯大林在更大的程度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当然，事情的实质还不仅在于斯大林的记仇性格和个人报复的作法。

原反对派过去已在党面前部分丧失了威信，所以看来似乎很容易使人相信他们的过错，而他们自己因为失掉同党和人民之间原有的关系而在斯大林面前显得已毫无自卫能力和软弱无力了。对这些原反对派成员组织政治审查时，斯大林企图对党对人民采取恐怖手段，在国内造成一种非常局势，以便利用这一局势把国家政权更加集中在自己手里，即集中在国家的“战士”和“救星”的手里。

斯大林企图把国内还存在着的政治和经济困难统统推到“人民敌人”头上。这一想法在他的思想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任何独裁者在他推行个人迷信时，总是需要有“替罪羊”。如果说1928—1932年这种“替罪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暗害分子”，那么在三十年代中期起这种作用的是各反对派的原成员。

与此同时，斯大林并不能也不想只限于消灭原反对派。在国内和党内夺权斗争的逻辑，犯罪的逻辑把斯大林引向更远的目标——利用三十年代政治审判为烟幕来消灭我党和我国的基本干部队伍。这样，上面我们所讲的斯大林的罪行，只不过是引起严重后果的更严重罪行的烟幕而已。

第 六 章

377

对党和国家基本干部队伍的打击（1937—1938年）

对原来参加过反对派的人的非法和犯罪的镇压，给党和国家基本干部队伍以很大的打击。但这仅仅是开始。到了1937年最初的几个月，原来的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已有两三万人被监禁起来，有些人已经被枪决了。虽然如此，但1937一整年和1938年镇压活动仍然有增无减，而且越来越具有群众性和具有不祥之兆。

实际上，斯大林领导和指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参加过反对派的人、以及同反对派持不同政见的人并不加以区别，而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去消灭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干部队伍，这些人都肩负过革命的地下斗争、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国民经济恢复以及完成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的重任。这种对几十万人，儿百万人的无情的消灭（这些我们下面要谈）是三十年代悲剧中的最可怕的一幕。

一、对中央一级党、苏维埃和经济机构中干部的打击

378

沉重的打击，首先是针对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的。1939年初，在诬陷为与人民敌人同谋、破坏、间谍活动、预谋进行恐怖行为等形形色色的罪名之下，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

委员中的正式中央委员一百一十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三十九人，也就是占总人数百分之八十的人被捕了。在这种情形下，我党几十个优秀的活动家和列宁的战友死于非命了。例如，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弗·雅·邱巴尔被赶出了政治局，还撤掉他的副主席的职务。起初他被派往索里卡姆斯克担任党的工作，几个月之后就被捕和被枪决了。到1938年1月一直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职务的另一名政治局委员斯·维·柯秀尔也遭到和邱巴尔同样的命运。1938年1月柯秀尔被加上了缺乏警惕性的罪名，解除了他在乌克兰的工作，但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和苏联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然而柯秀尔于同年被逮捕，并于1939年2月26日被枪决了，当时他才五十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巴·彼·波斯蒂舍夫也被害身亡了。他是一位有名的党的干部，曾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的职务。在被捕前一年左右，他被赶出了政治局并被派往古比雪夫州担任州委第一书记。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西西伯利亚州党委第一书记罗·埃赫也被捕并死于非命了，他于1937年10月被任命为苏联农业人民委员。

过去任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扬·卢祖塔克于1937年5月突然被捕，不久被处决了。

党的机关的许多负责干部，中央各部部长也遭逮捕并被枪决。其中有：曾任中央组织局委员、书记，当时任中央科学局局长卡·雅·鲍曼；农业人民委员、中央农业部部长——雅·阿·雅柯夫列夫；印刷和出版部部长——Б. М. 塔里；联共(布)中央鼓动和宣传部部长——А. И. 斯捷茨基等。

379

1937年，我们党的著名活动家А. М. 纳扎列其安也牺牲了。他是1922年根据列宁的建议被任命为斯大林的助手，后来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监察机关、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所属的信访局工作。

和党的中央机关同时，党的监察委员会机关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党的十七大选出的监察委员会多数成员被逮捕了，其中有：И. М. 贝克尔、Н. С. 别烈津、В. С. 鲍古舍夫斯基、С. К. 布里科、Е. Б. 根金、М. Л. 格拉诺夫斯基、瓦·雅·格罗斯曼、Ф. И. 扎伊采夫、Н. Н. 季明、М.И.科希阿尼、А. А. 列文、И. А. 雷切夫、Ж. И. 美耶尔宗、К.Ф.普舍尼琴、Н. Н. 拉比切夫、Н. Н. 鲁宾诺夫、А. А. 弗伦克尔、С. К. 沙东茨等等。这些人一个也没有能活下来。

和中央委员，监察委员（也包括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同时被镇压的还有绝大多数中央视察员和中央直属机关的专业工作人员。

我党著名的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谢尔哥·奥尔忠尼启泽于1937年2月也身亡了。他是非常有名的地下革命工作的活动家，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积极参加者，1937年他是政治局委员，重工业人民委员。

大家知道，在1937年2月19日专门发布的"政府公告"中说，2月18日17时30分谢·奥尔忠尼启泽由于心脏麻痹在他的家中突然逝世。所有的报纸都公布了谢·奥尔忠尼启泽死亡原因的详细医疗报告。一直到二十年以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才正式宣布谢尔哥·奥尔忠尼启泽是自杀身死的。他的惨死的主要罪魁祸首无疑就是斯大林、贝利亚和叶若夫，正是他们的诬陷和造谣导致了谢尔哥的自杀。

380

斯大林不敢直截了当地对奥尔忠尼启泽进行指控，而是以其固有的恶毒手腕开始暗地里进行活动，使谢尔哥遭受不白之冤，以至于名誉扫地。首先逮捕了谢尔哥的哥哥波普利亚，然后把假造出来的对波普利亚的审讯记录在奥尔忠尼启泽生日那天交给了他。同样，奥尔忠尼启泽的一些亲朋好友被判处了死刑。根据奥尔忠尼启泽的推荐被任命担任重工业企业重要岗位的许多领导人当中，也抓了许多人。斯大林又把被捕的人在重刑下不得不提供的假交代转给奥尔忠尼启泽看。他还写道："谢尔哥同志，你看看，

他们关于你写了些什么。约·斯·。”

我们现在知道，奥尔忠尼启泽对逮捕人曾经表示抗议，他拒绝批准逮捕许多工厂的厂长，在许多情况下，他甚至委托他领导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到地方去进行调查，检查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采取的逮捕措施是否有根据。但是斯大林和叶若夫没有理睬奥尔忠尼启泽的抗议。相反，正是斯大林建议委托谢尔哥在中央二、三月全会上作有关工业部门中暗害活动的报告。斯大林和叶若夫甚至做出了搜查奥尔忠尼启泽的克里姆林宫寓所这样的奸细伎俩。根据И.杜宾斯基-穆哈泽的证实："谢尔哥知道了这次搜查之后，因为受了侮辱已愤怒到了极点，他连夜给斯大林打电话，凌晨才打通了，但是他得到了这样的回答：'这是一个连我的家都能够进行搜查的机关，没有什么了不起……'17日早晨他和斯大林谈了话，两人单独谈了几小时。第二次谈话是在谢尔哥回家以后，谢尔哥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他们彼此都说了侮辱对方的话并且用俄语和格鲁吉亚语相互漫骂起来。他们之间的友爱和信任一点不剩了，一切都完了……对无法防止的一切事情，谢尔哥不能分担责任。他不愿意去阿谀奉承耍两面派，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把过去的一生都一笔勾销了……他能做的事是只有离开这个人间了。"[1]

381

后来，一些老布尔什维克提出一种看法，说谢尔哥是死于暗杀，而不是自杀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发生这一悲剧的前一天，谢尔哥不但还在人民委员部工作，而且还发了一批指令和安排了第二天的几个约会。E.П.伏罗洛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1937年对奥尔忠尼启泽的死亡原因没有进行过任何调查，连弹伤都没有被检查过，在医疗报告下面签了字的医生随后全部被镇压了。奥尔忠尼启泽的卫队长B.H.叶菲莫夫和奥尔忠尼启泽的私人秘书谢穆什金在他死后马上遭到了逮捕。据当时在克里姆林宫汽车队工作的汽车司机A.切尔卡斯基的说法，不但卫队长，卫队的所有工作人

---

① И.杜宾斯基-穆哈泽：《奥尔忠尼启泽》，莫斯科1963年版第6—7页。

员均被逮捕。难道卫队能够对自杀负责吗？所有在奥尔忠尼启泽身旁工作的服务人员，包括他别墅的看门人在内都被捕了。奥尔忠尼启泽的原副手鲍·里·万尼科夫证实，谢尔哥去世几天之后，叶若夫把万尼科夫叫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并要求他写一份有关奥尔忠尼启泽所签发的"破坏性"指示的报告。伏罗洛夫肯定地说，奥尔忠尼启泽的私人材料大部分被拿走并随后交给了和奥尔忠尼启泽有仇的拉·贝利亚去"研究"。1941年谢尔哥的两个弟弟康斯坦丁和瓦诺也被捕了，谢·奥尔忠尼启泽的其他许多亲属也遭逮捕。这一连串事件使人们的思想上产生了不少问题。但不管怎样，我们觉得，奥尔忠尼启泽自杀事实是没有任何根据争辩的事。

谢尔哥的妻子季娜伊达·加甫利洛夫娜证实，2 月 18 日晨，在中央全会前夕（这次会议延期了十天开幕的）谢尔哥·奥尔忠尼启泽没有起床，没有穿衣服也没有吃早饭。整个早晨和白天他一直在写什么。白天Г.В. 格瓦哈利亚来看谢尔哥。但谢尔哥没有 382 让格瓦哈利亚进去，也没有出来见他，只是让他的朋友到饭厅里去吃饭。他的妻子很不安，给自己的姐姐维拉·加甫利洛夫娜打了电话，叫她来，2 月日短，17 点后天就黑了。季娜伊达·加甫利洛夫娜决定再一次去看看她的丈夫去，经过客厅时她打开了电灯，就在开关响时，谢尔哥的卧室里传出来枪响。季娜伊达·加甫利洛夫娜立即跑进房间，她看到丈夫躺在床上，已经死了，他的内衣上全是血。

根据季·格·提供的情况，通往奥尔忠尼启泽住宅的除了大家使用的后门外，还有正门。但是正门总是关着的，而且有书柜挡着。另外，进正门之后还要经过客厅，所以，要是暗杀谢尔哥是无法使用正门的，因为枪响时季娜伊达·加甫利洛夫娜正在客厅里。

谢尔哥的妻子马上打电话给斯大林，告诉他发生的情况。斯大林的住宅虽然就在奥尔忠尼启泽的住宅对面，但是他并没有马上来看他原来的朋友。他命令首先把所有政治局委员叫来。在斯大林来之前，维拉·加甫利洛夫娜跑来了。她进卧室以后发现在

写字台上有写得密密麻麻的几张纸，都是谢尔哥写得珠子般小的手迹。她机械地把这些纸拿过来，握在手里，当时她当然顾不上去读它。当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终于进了卧室时，斯大林马上看到维拉·加甫利洛夫娜手里握着的这几张纸，于是他几乎是一下就把它们抢了过去。这时季娜伊达·加甫利洛夫娜哭得泣不成声，她向斯大林喊道："你没有为我也为党把谢尔哥保护好！"斯大林回答她说："住口，蠢东西！"

奥尔忠尼启泽的弟弟康斯坦丁是坐了十五年监牢的幸存者，他的有关这一悲惨的日子的回忆，也很值得注意。

他在自己的未发表的回忆中写道："现在我要讲一讲和我亲爱的哥哥谢尔哥之死有关的一些详细情况。谢尔哥是1937年2月18日17时30分自杀的。

383

象往常一样，那天晚上我在索科里尼基滑了冰之后就去克里姆林宫我哥哥谢尔哥那里。在门口谢尔哥的司机H. И. 沃尔柯夫对我说：

'快点！'

我没有听懂。上了二层楼之后我就和妻子一同想到餐厅去，但被站在门口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挡住了。后来还是让我们进了谢尔哥的办公室，在那里我看见格瓦哈利亚，他对我说：

'我们的谢尔哥离开我们了。'

我急忙进了卧室但是我被挡住去路，不让我去看一眼死者。我被惊呆了，回到办公室里，我完全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也来了。他们先来到餐厅。日丹诺夫的额头用黑布包着。突然从谢尔哥的办公室里把格·格瓦哈利亚带走了（不知为什么是经过浴室走的）。此后，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从饭厅走进卧室。他们在遗体旁站了一会儿，然后一起回到了餐厅。我听到了季娜伊达·加甫利洛夫娜在饭厅里讲的话：

'这件事应在报纸上发表。'

斯大林回答：

'在报纸上说他是因心脏破裂致死的。'

季娜伊达·加甫利洛夫娜反驳他说：

'谁都不会相信'。她并且补充说：'谢尔哥喜欢真话，报纸上应该讲真实情况。'

'为什么会不相信？谁都知道，他有心脏病，所以大家都会相信的。'

斯大林就是这样结束了这一番对话。

卧室的门是掩着的。我走过去，稍微打开一条缝，我看到叶若夫和卡冈诺维奇坐在死者脚旁的椅子上。他们不知在谈什么。我马上把门关紧了，免得别人来找我的麻烦。

过了一些时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都来到了餐厅。贝利亚也来了。季娜伊达·加甫利洛夫娜当着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和其他人的面称贝利亚是坏蛋。她向着贝利亚走去打算给他个耳光。贝利亚马上就溜走了，从此再 334 也没有到谢尔哥家里来。

遗体从卧室转移到办公室里。莫洛托夫的弟弟在遗体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波斯蒂舍夫、叶若夫及党政其他领导人及季娜伊达·加甫利洛夫娜照了像。这时我站在墙旁边，没有想到也许我应该走开一些。这以后著名的雕塑家谢·德·美尔库洛夫来了，他给谢尔哥取了石膏面型。

季娜伊达·加甫利洛夫娜要叶若夫和帕乌克尔通知格鲁吉亚的亲属并要求哥哥波普利亚参加追悼会。叶若夫的回答是：

'波普利亚·奥尔忠尼启泽现在被监禁，我们认为他是人民敌人，让他服满他的刑期，可以给他送棉衣和食品。其他亲属我们去通知，请给我们他们的地址。'

我把弟弟伊万和妹妹尤利亚及波普利亚的妻子尼娜的地址交给了他们。

夜深了，叶梅里扬·雅罗斯拉夫斯基来了。他一看到遗体，马

上昏了过去。好容易才把他抬到沙发上。叶·雅罗斯拉夫斯基醒过来以后，把他用小汽车送回家去了。这以后，谢穆什金来了。因为是星期天，他正在塔拉索夫卡别墅里休息。当他看到这样可怕的场面时受了刺激，大闹起来，于是不得不几乎是把他捆绑了起来，硬把他送回家去了。

谢尔哥的秘书马霍维尔也被他看到的这一情景惊呆了，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永远记在心里了，他说：

'这些混蛋们，把他害死了！'

1937年2月19日夜里把遗体火化了。

第二天，2月20日举行了追悼会。弟弟伊万和妻子及妹妹尤利亚和丈夫到莫斯科时已经晚了没有赶上。

过了一段时间，大批抓人就开始了……谢穆什金和他的妻子及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和谢尔哥直接有联系的许多干部都被捕了。385 我们大哥波普利亚·奥尔忠尼启泽的妻子尼娜·奥尔忠尼启泽也遭逮捕。同时，我们的另一个亲戚Г. А. 奥尔忠尼启泽也被抓去了。

最后，我也于1941年5月6日被捕了"。

* * *

1937—1938年严重的镇压降临在我国中央苏维埃和经济部门的头上。此时，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工农红军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大部分成员、以及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多数人民委员遭到逮捕并且都死于非命了。成百成百的党的最著名的党员殒灭了。到1935年一直担任苏联执委会和红军执委会书记的老布尔什维克阿维尔·叶努启泽被开除了党籍，过两年又被逮捕并且被枪决了。叶努启泽是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基洛夫、邵武勉的亲密朋友。同时他长期以来也是斯大林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但是他干扰了斯大林，于是斯大林就推开了他，并且置他于死地了。①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长期以来一直担

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在经济方面富有经验的党的领导干部瓦·伊·梅日拉乌克这时也被逮捕并被枪决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新任主席Г.И.斯米尔诺夫也死于非命了。这位有名的经济工作者1937年只有三十四岁。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埃·约·克维林也被处决了。长期从事苏联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和国家计委负责工作的格·伊·洛莫夫（奥波科夫）也被枪决了，他是我党的老一辈的活动家，曾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的活动。

336

被逮捕后丧命的还有：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瓦·施米特和Н.К.安蒂波夫；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议主席Д.Е.苏利莫夫，他的副手Д.З.列别季、С.Б.佐兹诺钦科和土·雷斯库洛夫。

1937—1938年被捕后牺牲的有：苏联国防工业人民委员莫·里·鲁希莫维奇、苏联轻工业人民委员И.Е.柳比莫夫、苏联林业人民委员（后来任俄罗斯联邦食品工业人民委员）С.С.洛博夫、苏联国内贸易人民委员И.Я.魏采尔、苏联卫生人民委员格·纳·卡明斯基、苏联邮电人民委员英·安·哈勒普斯基、苏联粮食和畜牧业国营农场人民委员莫·约·卡尔马诺维奇和Н.Н.杰姆钦科、俄罗斯联邦地方工业人民委员康·瓦·乌汉诺夫、苏联水运人民委员Н.И.帕霍莫夫、苏联机器制造业人民委员А.勃鲁斯金、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建委主席С.Л.卢卡申、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局主席Л.Е.马里雅辛。苏联政府最年轻的成员征购人民委员尼·波波夫也遭逮捕身亡，当时他还未满三十五岁。著名的党的干部，被捕前是电影事业委员会领导人波·兹·舒缅茨基也被害了。

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十月革命的积极分子尼·

---

① 斯大林领导着整个镇压活动的过程中曾亲手在他的许多个人朋友的逮捕证上签了字，他还签署逮捕了他的第一个妻子（娘家姓斯瓦尼泽）和第二个妻子（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早在1932年就自杀了）的亲属。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1967年在国外出版的书中对斯瓦尼泽和阿利卢耶娃亲属的这种迫害力图解释成是贝利亚的过错，斯大林是受了贝利亚的影响。这显然是有意在说谎。

瓦·克雷连柯也被逮捕，并遭枪决。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929—1937年期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安·谢·布勃诺夫遭逮捕后被枪决。在沙皇统治年代里布勃诺夫曾经十三次被捕和流放，但是他总有办法能脱身虎口。1937年他第十四次遭到逮捕，并被处决了。（值得指出，上述苏维埃和经济方面的领导人大多数都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

当然，当我谈到1937—1938年的时候，我们要指出，问题还不只是逮捕了一些人民委员，而且由他们领导的整个人民委员部遭到了真正的洗劫，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遭逮捕。例如：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完全被毁灭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捏造了所谓在重工业部里存在着一个以奥尔忠尼启泽的副手皮达科夫为首的"间谍暗害匪帮"，捏造了罪名之后，在谢尔哥去世前就开始逮捕部里的领导人。这时被捕和被枪决的人有：副人民委员，第一枚劳动红旗勋章获得者А.П.谢烈布罗夫斯基、副人民委员А.И.古列维奇和О.П.奥西波夫-施米特；司局长和部委委员К.А.诺伊曼、А.Ф.托洛康采夫、伊·维·柯秀尔、А.И.兹科夫、Ю.П.菲加特涅尔、С.С.德别茨、Е.П.布罗多夫等等。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其它人民委员部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被害身亡的成千有才能的经济工作者当中有著名的和享有威望的我党和国家的活动家，他们是：沙·祖·埃利亚瓦、尼·巴·布留哈诺夫、安·马·列扎瓦、阿·巴·哈拉托夫、奥拉斯·帕乌尔、弗·巴·米柳亭、К.П.索姆斯、弗·伊·波朗斯基、В.纳奈什维里、М.В.巴利诺夫、И.И.托多尔斯基、В.А.康格拉里、С.С.奥京措夫、瓦·安·特里弗诺夫、伊·伊·拉德琴科、М.М.迈奥罗夫、格·伊·勃拉冈拉沃夫、亚·伊·穆拉洛夫、Я.Л.博比斯、卡·达尼舍夫斯基、Г.查比也夫和其他许多人。

1937—1938年外交人民委员部机构也遭到残酷的清洗。长期从事外交的副人民委员列文·卡拉汉被捕身亡。另一个外交副人民委员波·斯·斯托莫尼亚科夫也牺牲了。我国许多有才能的外

387

交家、代办和专员被召回莫斯科，他们被镇压了。他们之中有：苏联驻日本全权代表康·尤列涅夫、苏联驻波兰全权代表达夫其扬、苏联驻土耳其全权代表 M.A.卡尔斯基、驻法国全权代表 E.B.希尔施菲里德、驻蒙古全权代表 B.X.塔伊罗夫、驻中国全权代表鲍哥莫洛夫、驻罗马尼亚全权代表奥斯特罗夫斯基、驻德国代办 Г.A.阿斯塔霍夫、驻挪威全权代表 И.C.雅库波维奇、驻芬兰全权代表阿思穆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司长 A.B.萨比宁、A.Ф.诺伊曼、M.A.普洛特金、楚克尔曼、A.B.费希纳、叶·亚·格涅金。苏联著名的外交家马尔萨里·罗森贝尔格，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对改善芬苏关系有过功劳。象 B.B.叶哥里也夫和 Б.米罗诺夫-科尔涅夫这样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干部也都死于非命了。苏联驻保加利亚全权代表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及苏联驻希腊全权代表 A.Г.巴尔明都作为“人民敌人”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们因为知道回去肯定就是去送死，因此拒绝回莫斯科。驻国外塔斯社的记者也遭到镇压。 338

* * *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三十年代的命运也是很艰难的。早在二十年代后半期，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就受到各式各样直接和间接的限制以及对她进行各式各样的造谣中伤。特别是她在鲍曼区党代表会上发表了反对集体化过程中歪曲政策的现象的讲话以后，对她就“整”得更厉害了。1934 年克鲁普斯卡娅出版了《回忆列宁》一书。该书出版后斯大林亲自打了电话给克鲁普斯卡娅祝贺她出版了这样好的和有益的书。但是这一祝贺之后没有几天，《真理报》发表了对克鲁普斯卡娅写的这本书极不公正的、措词尖锐的评论。评论的作者是年轻历史学家彼·彼斯佩洛夫，他硬说（显然是经过斯大林同意的）对列宁的描写以及对党史某些问题的阐明克鲁普斯卡娅犯了“错误”。①

① 见《历史百科全书》第 8 卷莫斯科 1966 年版第 192 页。

1936年大规模的逮捕开始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不只一次地力图保护许多她所熟悉的党的活动家，想使他们免遭镇压。例如，联共(布)中央1937年6月全会上克鲁普斯卡娅发言反对逮捕约·皮亚特尼茨基，当时他已经被宣布为沙皇暗探局的奸细。克鲁普斯卡娅说，皮亚特尼茨基是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时期的非常重要的干部，他负责同俄罗斯的联系工作，在他管的范围内党在地下时期没有发生过一次破坏。但是她的一切抗议都没有人理睬。

289 只在个别的情况下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争取释放了一些对党忠心耿耿的干部。正是由于克鲁普斯卡娅的积极活动伊·德·初古林得到释放，他就是1917年4月3日给弗·伊·列宁发了党证的人。①

但是对克鲁普斯卡娅的一切抗议无论斯大林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都很快就完全不加理睬了。1938年1月在纪念列宁的隆重的大会上，克鲁普斯卡娅曾问过叶若夫她认识的许多同志的命运如何，叶若夫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转身走开了。甚至在克鲁普斯卡娅做了许许多多工作的人民教育阵地上，人们也不把她放在眼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于1939年初逝世。斯大林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一起抬着她的骨灰盒为她举行了葬礼。但是就在葬礼的第二天克鲁普斯卡娅住宅受到了搜查，而且把她的许多个人材料都拿走了。克鲁普斯卡娅安葬后不久教育人民委员部接到上面的指示说："今后关于克鲁普斯卡娅的事迹一个字也不能见报。"②

确实如此，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去世以后，她的名字实质上已经被遗忘了。她的书在各种借口下已经从图书馆的书架上提走。甚至在一次纪念《火星报》的展览会上连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火星报》的工作。③

---

① 《真理报》于1963年12月22日说，初古林并没有被恢复党籍。过去他曾任国家重要职务，但一直到死都只做一名盖房顶的工人。

② 《全苏历史学家会议》莫斯科1964年版第260页。

③ 《真理报》1964年2月26日。

从1936—1939年这段岁月里，一些长期和列宁在一起并肩工作过的我党的最老的党员没有遭到逮捕，如：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费·雅·柯恩、彼·阿·克拉西柯夫、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尼·伊·波德沃依斯基、阿·叶·巴达也夫、德·扎·曼努伊尔斯基、马·康·穆拉诺夫、Ф.И. 萨莫伊洛夫、尼·亚·谢马什柯、伊·伊·施瓦尔茨、亚·米·柯伦泰，等等。但他们这些人实际上已被排除于党的领导之外，他们被置于恐怖政策之下，对事态的发展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斯大林丝毫不加掩饰地蔑视他们，称他们为在新条件下没有能力领导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以后对他们的大多数人就再也记不起来了。 300

在专横的岁月里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的命运也很悲惨。他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乌克兰执委会主席和苏联执委会主席之一，他因自己的亲密战友——柯秀尔、邱巴尔、苏霍姆林等被捕受了极大的震动。彼得罗夫斯基的大儿子彼得也被捕了，他是国内战争的英雄，1919年乌拉尔斯克著名保卫战的领导者之一，是一位有名的理论家，不久前任《列宁格勒真理报》的编辑。彼得罗夫斯基的小儿子列昂尼德被开除了党籍，撤了职，他也是国内战争的英雄，是建立首批共青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37年列昂尼德·彼得罗夫斯基任莫斯科无产阶级师师长。彼得罗夫斯基的女婿，切尔尼格夫斯克执委会主席C.A.扎格尔也被逮捕，并且不久就被枪决了。

1938年底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突然被召回莫斯科。在一次和斯大林时间很短的难堪的会晤之后，他被撤除了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然而不久以前全国还纪念了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六十诞辰。出于恫吓的目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把他立为“政治案件”，他被指控为和“人民敌人”有联系。在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彼得罗夫斯基没有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一年时间没有安排他任何工作，直到战争前夕才被任命为革命博物馆负责总务工作的副馆长。

布尔什维克诗人、列宁的亲密战友杰米扬·别德内依在个人迷信时期的命运也很不好。

本书第三章中我们已经谈到三十年代初期如何迫害和“整”杰
391
米扬·别德内依。但1935年斯大林企图恢复同别德内依的关系，显然是打算叫杰米扬积极参加歌颂“伟大领袖”的行列。斯大林突然邀请别德内依到他的别墅去作客，还有一次是他亲自到别德内依家里去并把他带到自己家中作客。在1936年迎新年的时候，斯大林又一次邀请别德内依到他别墅来过年，那里只有很少几个斯大林的心腹近臣。但是就在1936年别德内依的创作又受到一次“批判”，别德内依作词的音乐剧《勇士》被禁止公演。这时斯大林已经拒绝同这位诗人见面和谈话了。当1938年杰米扬·别德内依为《真理报》写了一篇抨击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地狱》时，斯大林不但禁止这篇文章的发表，而且亲自在稿子上写了侮辱他的批语：“转告这位新出现的‘但丁’，他可以停止写作。”① 1938年8月杰米扬·别德内依被开除了党籍，后来又被开除了作家协会。一直到战争开始时一切报刊的门在这位著名的诗人面前都关闭了。

其他许多老革命虽然表面上没有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镇压，但也承受了同样悲惨的命运。

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指出和弗·伊·列宁许多关系非常密切的、长期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人，他熟悉的和他尊重的人都遭到了逮捕。尼·亚·叶梅利扬诺夫是1935年被捕的，他就是那位在拉兹里夫的草棚里藏过列宁的彼得堡工人，他为党为革命救了列宁。1921年11月列宁在一封信里写道：“我特别请求对我在十月革命前就熟悉的、党的老干部、彼得堡工人阶级先锋队著名活动家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叶梅利扬诺夫同志给与完全的信任和各种协助。”②

392
根据A.B.斯涅戈夫证实，在叶梅利扬诺夫被捕以后，克鲁普斯

① 见《关于杰米扬·别德内依的记录》莫斯科1965年版第220—222页。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24页。

卡娅泪流满面地向斯大林恳求保存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生命。但到斯大林去世为止，叶梅利扬诺夫一直被关押。叶梅利扬诺夫的家属也全被捕了，他的妻子，三个儿子——康德拉蒂，尼古拉和亚历山大，1917年他们三个人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在拉兹里夫帮助掩护过列宁。

1939年，忠实的革命战士老布尔什维克亚·凡·绍特曼被捕身亡。他在1903年是著名的奥布霍夫保卫战的领导人。1917年夏天他是中央和转入地下的列宁之间的唯一的交通员。党在困难时刻把保卫列宁以及从拉兹里夫把列宁转移到芬兰的工作交给了绍特曼，我们知道，他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早在1918年列宁写道："绍特曼同志是党的老同志，我个人对他非常熟悉，应该绝对信任他。"但是斯大林首先不信任的正是象绍特曼这样的人，即列宁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人物。①

瑞典著名的左派社会党人，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弗里茨·普拉廷也在恐怖时期死于非命。普拉廷于1917年曾给予俄国革命以无法估量的巨大帮助——他组织了列宁和他的同志取道德国回俄国的转移。大家知道，普拉廷在这次转移中护送了列宁，随即积极参加了我国的革命斗争。大家还知道，1918年1月1日普拉廷还在士兵大会之后护送列宁，并在列宁通过方坦卡时在西蒙诺夫桥上反革命恐怖分子要暗杀列宁时，救了他的生命，可是自己的手臂却受了伤。1923年，弗里茨·普拉廷作为对俄国革命胜利作出许多贡献的同志，连同家庭一起迁居苏联。1937年他和妻子（共产国际的著名活动家）都被逮捕了。普拉廷坐过沙皇俄国和贵族罗马尼亚的监狱，在佩特留拉的审讯室受过刑，关过科夫诺的苦役监狱，坐过柏林的矛比特和瑞士的牢房。但是弗里茨·普拉廷死于卡尔戈波尔集中营（残废者集中营），这位著名革命家就在这里锯板条和编筐子。②

---

① 见T.邦达列夫斯卡娅：《亚·绍特曼》莫斯科1963年版。

② 《列宁格勒真理报》1964年10月1日。

1937年9月列宁的另一个战友——雅·斯·加涅茨基被枪决了，他过去是波兰工人运动的有名活动家，列宁亲自介绍他加入俄共(布)党。象弗里茨·普拉廷一样，雅柯夫·加涅茨基为我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1914年8月，当列宁被瑞士当局指控为俄国进行间谍活动遭到逮捕时，他设法营救，使列宁获释。1917年加涅茨基也参与了组织安排列宁回俄国的活动，他在瑞士迎接了列宁，并且保证了列宁返回革命彼得格勒途中的安全。十月革命后加涅茨基担任苏联经济和外交战线上的重要职务，最后几年任莫斯科革命博物馆的馆长。

联共(布)的老活动家C.И.卡纳特奇科夫也被逮捕，他是列宁创立的《为工人阶级解放而斗争的联盟》的成员，三十年代担任党的一系列重要职务。

列宁一代因年老或身患重病而退休的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也遭到了镇压。H.Φ.多勃罗赫托夫就遭到了这样的命运，他是许多次党代会的代表，早在1929年就退休了。① 尤有甚者，斯大林在消灭列宁一代活着的党的老干部代表人物的同时，连许多已经去世的人也不饶过。有些人死后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另一些人是再也不提起他们了。例如，列宁政府中第一任司法人民委员彼·伊·斯图奇卡遭到了毫无道理的谩骂。从1918年底起斯图奇卡领导了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拉脱维亚苏维埃政权被镇压之后他就在莫斯科工作。他于1932年去世，葬在红场上，但这都并没有妨碍在1937—1938年宣布他是敌对思想的代表，甚至是在法学领域的有意识的破坏分子。

对我党非常有名的活动家，列宁极亲密的战友谢·伊·古谢夫，斯大林毫无根据地极为反感。这位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历史中起过很大的作用。众所周知，他是1933年去世的，以军队礼仪把他安葬在红场。但是此后古谢夫的名字再没有

---

① 《革命的战士们》雅罗斯拉夫里1963年版第102页。

提起过，把他从党的历史中勾销了。古谢夫的许多朋友和亲属都被镇压。神话般的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卡莫的名字也不再提到。1922年这位英雄悲惨逝世时在梯比里斯市中心的小公园里他的墓上立的那块很朴素的墓碑也被丢掉了。卡莫的妹妹被逮捕。同样，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兄弟维尼阿敏·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也被捕身亡了。

列·波·克拉辛、维·巴·诺根、格·瓦·契切林、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许多其他著名布尔什维克在个人迷信时代也都不被提起了。

二、对各州及共和国党和苏维埃机构中干部的打击

在打击我党和国家中央机关的同时，可怕的镇压浪潮也席卷了苏联所有的州和共和国。例如，在俄罗斯联邦百分之九十的州党委和执委被镇压了，多数市、地方和区的党委和执委也被毁灭了。有些州几任州党委和执委的成员一个接一个遭逮捕。在这时期成千上万牺牲了的党和苏维埃干部当中有不少是我党著名活动家、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俄罗斯联邦州党委书记 395 中被捕身亡的有：拉·约·卡尔特维拉什维里、约·米·瓦雷基斯、И.П.诺索夫、尼·尼·柯洛季洛夫、А.И.克里尼茨基、А.И.乌加罗夫、费·格·列昂诺夫、В.В.普图哈、伊·德·卡巴科夫、К.В.雷金、德·亚·布拉托夫、彼·伊·斯莫罗金、В.П.舒布利科夫、Б.П.舍波尔达也夫、Э.К.普拉姆内克、М.拉祖姆诺夫、И.В.斯林金、И.鲁勉采夫、М.С.丘多夫、М.Е.米哈伊洛夫、Н.М.奥西莫夫、Л.И.拉甫连齐也夫、П.А.伊尔克利斯、А.С.卡雷青娜、Я.Г.索伊费尔、Г.巴伊图尼、И.И.伊万诺夫、Н.Д.阿基里努什金、Б.П.贝克尔、Е.里亚比宁、Г.П.拉科夫、П.М.托尼金、С.П.柯尔舒诺夫、В.Я.西莫奇金、А.Я.斯托里亚尔、С.М.索波列夫、М.С.萨维诺夫、В.Я.西米亚金、德·亚·布

拉托夫等许多人。和他们同时牺牲的地区和州执委会主席有Г.М.克鲁托夫、Н.И.帕霍莫夫、П.И.斯特卢佩、扬·波鲁扬、Ф.И.阿德里安诺夫、С.Б.阿格也夫、М.Л.沃尔柯夫、Н.Н.茹拉夫列夫、В.В.伊万诺夫、И.Ф.诺维科夫、А.Н.布罗夫、Д.А.奥尔洛夫、И.Н.皮沃瓦罗夫、Г.Д.拉基托夫、И.И.列希科夫、А.А.施皮利曼、И.Ф.吉希欣、И.Я.斯米尔诺夫、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 И.Ф.科达茨基等等。与此同时，在大多数情况下，逮捕了州党委书记和州执委主席就意味着对本州领导干部的全面消灭。例如：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被逮捕和其中多数被枪决了的州党委和市委书记中有：А. Н.波格莫洛夫、Т. А.布拉塔诺夫斯基、Е.С.科甘、Н.В.马尔戈林、Н.И.杰季科夫、瓦·叶哥罗夫、М.М.库利科夫、С.З.科雷特内。莫斯科州执委会主席Н. А.菲拉托夫被消灭了，他的两名副手费多托夫和С.Е.古别尔曼，州执委会书记比金斯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И.И.西多罗夫以及莫斯科苏维埃及莫斯科州执委会的许多其他负责干部也被消灭了。①

到1939年年中的时候莫斯科区党委和州党委一百三十六名书记中只有七名还在原工作岗位上工作。其他几乎所有的人被逮捕，而且多数被枪决了。他们之中有：В.П.塔尔哈诺夫、Н.Е.沃洛维克、И.列文什泰恩、马尔格维奇、萨文、Б.Е.特雷瓦斯、С.Е.哥尔布利斯基、Е.彼尔什曼、古宾科、古京。州及市党委的许多部长也被镇压了，其中有：М.Д.克雷姆斯基、Т.Р.伏罗希洛夫、库连科夫、韦尔科洛夫、巴尔列宾等同志。莫斯科一些有名的布尔什维克自杀了，如：富列尔。区党委许多部长及政策指导机关的许多负责人也都被逮捕了。

1937—1938年以市委书记Л.И.普加切夫斯基为首的高尔基市委的全体成员和以市苏维埃主席А.П.格拉切夫为首的市苏维埃全体成员被关在高尔基市监狱里一幢专门牢房里，和他们关在

① 《关于苏共莫斯科党组织的历史片断》莫斯科1967年版。

一起的有九个区委书记——韦里科列钦、舒米洛夫、美尔尼科夫等，此外，还有高尔基市和州的成百负责干部。1938年高尔基州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州内务管理局局长拉甫鲁申宣称：高尔基州"一大将反革命分子被击溃了"。①

列宁格勒党、苏维埃和经济领导骨干几乎全部被消灭了，在这里镇压活动猖獗了四年。俄罗斯联邦的其他大城市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俄罗斯联邦所有自治共和国的干部也遭到了镇压。卡累列阿自治共和国州党委第一书记古斯达夫·罗维奥被捕，而且牺牲了，他曾经是赫尔辛福斯市的"红色警察"②，1917年他曾帮助掩护过列宁。卡累列阿人民委员会议主席爱·居林，卡累列阿中央执委会主席Н.В.阿尔希波夫，卡累列阿自治州委书记П.А.伊尔克利斯等都被枪杀了。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政权创立者之一，共和国著名活动家М.Н.叶尔巴诺夫也被枪决了。

鞑靼自治共和国鞑靼州党委书记А.К.列帕，鞑靼州执委会主席Г.Г.巴伊丘林，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议主席К.А.阿布拉莫夫和А.М.诺沃肖洛夫及他们的副手，以及几十个区委书记和市委书记，执委会主席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都被捕入狱了。鞑靼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议第一任主席西·赛德-加里也夫也牺牲了，他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忠实战士，曾经批评过担任民族人民委员的斯大林，因为斯大林对待鞑靼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们的态度是没有原则的。③

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州委书记贝塔尔·卡尔梅柯夫死于狱中。犹太自治州委书记Г.Н.苏哈列夫和М.П.哈甫金等人都一个接一个地被捕了，自治州执委会主席Ш.А.卡尔特利和约·

① 《关于苏共高尔基党组织的历史片断》第2部高尔基市1966年版第392页。

② 古·罗维奥当时的公开职业是赫尔辛福斯市的警察。赫尔辛福斯市即赫尔辛基市。——译者

③ 见《关于鞑靼共和国党组织的历史片断》喀山1962年版。

李别尔别尔格也被捕了。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议主席马麦特·伊布拉吉莫夫和A.A.萨美伊多夫被枪决了，巴什基里亚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议主席З.П.布拉舍夫，马里自治共和国州委第一书记Ч.И.弗卢勃列夫斯基，伏尔加河流域德裔共和国州委书记弗列舍尔及该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Д.Г.罗森贝尔格也都被枪杀了，这些自治共和国有成千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死于非命了。

达格斯坦和沃舍梯，切禅-印古什梯和楚瓦什，莫尔多瓦和乌德摩尔梯，亚库梯和卡腊查耶沃-切尔克斯各自治共和国的党组织蒙受了重大损失。例如：北沃舍梯州党委十一名成员中被捕的有九名。两年中，在这里更替了四名书记(С.А.塔科也夫，К.С.布塔也夫等)。[①] 甚至在象科米自治共和国，这样的离开国家主要中心十分遥远，而且幅员极小的地区，以州委书记A.A.谢米切夫和Ф.И.布拉舍夫为首全区四分之一的党员受到了镇压。[②]

338 所有联盟共和国党组织也遭到同样沉重打击。

我们已经谈过乌克兰共产党(布)原领导人邱巴尔、波斯蒂舍夫、柯秀尔是如何牺牲的。同时中央机关和共和国各州的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及苏维埃和经济组织的领导人也都被捕了。专横制度的牺牲者当中有：弗·彼·扎东斯基、И.Е. 克利缅科、К.В. 苏霍姆林、М.М. 哈塔也维奇、В.И. 切尔尼亚夫斯基、Е.И. 韦格尔、Ф.И. 哥卢布、С.А. 扎格尔、С. 库德里亚策夫、А.С. 叶哥罗夫、О.В. 皮拉茨卡娅、В.Д. 叶列缅科、А.В. 奥西波夫、А.К. 谢尔比钦科、Н.И. 哥卢布、Г.И. 斯塔雷、М.И. 康达科夫和其他许多人。(这些同志中只有A. 奥西波夫和O. 皮拉茨卡娅幸存人间。) 乌克兰人民委员会议主席А.П. 柳布钦科的命运异常悲惨。柳布钦科害怕自己死后家属也会遭到镇压，他先打死了妻子和儿子，后来自己也自杀了。

光荣的扎波罗热茨革命家族几乎全体成员都在乌克兰被捕，

---

① 见《北沃舍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党组织的历史片断》，奥尔忠尼启泽市1966年版第247页。

② 见《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共产党组织史》1964年版。

他们是：维克多·扎波罗热茨、安东·扎波罗热茨、玛利亚·库齐米尼奇娜·扎波罗热茨及他的丈夫——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塔拉年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计委主席，国内战争英雄老布尔什维克尤里·柯秋宾斯基也牺牲了，他是有名的乌克兰革命民主党人的儿子。

因为遭受了镇压乌克兰党员的总数从1934年的四十五万三千五百人减少到1938年的二十八万五千八百人。①

白俄罗斯党组织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因为在白俄罗斯早于其他任何共和国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白俄罗斯的党组织减少了一半以上。1937年，白俄罗斯党中央实际上已经没有人工作了。共和国的各州中心的党的干部紧急地被调到明斯克去工作，但是他们在这里也被卷进这巨大的绞杀党的干部的绞肉机里。在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以及其它许多城市中几任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成员都被镇压了。当时白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几乎全部牺牲了，399 如：尼·马·戈洛杰德、亚·格·切尔维亚科夫（根据报纸报道，他是因为"家庭问题"自杀的）、M.O. 斯卡孔、C.Д. 卡缅斯坦、A.M. 列维茨基、Д.И. 沃尔柯维奇、A.Ф. 柯维列夫、H.Ф.吉卡洛。（吉卡洛是全国有名的国内战争英雄，后来他在北高加索、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领导了党的组织。）白俄罗斯有名的干部 Я.И. 扎沃德尼克、A.И. 哈茨克维奇、格里谢维奇、柳博维奇和其他几百个同志牺牲了。

阿塞拜疆的镇压活动也十分厉害，这里的镇压是在斯大林的走卒巴吉罗夫领导下进行的。外高加索最知名的布尔什维克之一，曾任外高加索联邦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加·穆·穆萨别科夫在阿塞拜疆被枪决了。阿塞拜疆人民委员会议主席，中央书记古塞恩·拉赫曼诺夫也被枪决了。阿塞拜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C.M. 埃芬季也夫牺牲了，

---

① 见《乌克兰共产党的历史片断》基辅1964年版。

还有党和苏维埃知名干部：米·达·吉塞伊诺夫、A.П.阿科波夫、鲁·阿洪多夫、达·布尼亚特-扎德、M.策拉菲别科夫、A.Г.卡拉也夫、M.库利也夫、M.纳里曼诺夫、Г.苏尔塔诺夫、A.苏尔塔诺娃也都死于非命。①

1937—1938年格鲁吉亚党组织也遭受了重大的牺牲。被枪决或在监狱中死亡的有如下这样知名的布尔什维克：米哈·卡希阿尼、列凡·果戈别利泽、雅松·马穆利亚、索索·布阿奇泽、彼得·阿格尼阿什维里、列凡·阿格尼阿什维里、伊凡·波尔克瓦泽等以及其他许多同志。列宁党的忠实战士马米亚·奥拉赫拉什维里也牺牲了，他是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长期以来他担任外高加索联共（布）区党委第一书记。他的妻子玛利亚·奥拉赫拉什维里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她是1906年入党的党员，妇女运动有名的活动家。

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议主席Г.姆沙洛布利什维里和Л.苏希什维里先后被捕，共和国大部分人民委员，机关和企业负责人及高等学校教员也都被捕了。以贝利亚和卡布洛夫为首的格鲁吉亚内务部机构还阴谋制造了一个所谓菲力浦·马哈拉泽"案件"，企图对这位老布尔什维克施以恐怖政策。

阿布哈兹劳动人民的领导人涅·阿·拉库巴与这个共和国的其他著名党的干部一起牺牲了，他是奥尔忠尼启泽、基洛夫、加里宁、捷尔任斯基的好朋友。阿布哈兹州党委第一任书记（后来是阿布哈兹州执委会的主席）阿·谢·阿格尔巴被枪决了。阿布哈兹中央执委会委员，州委常务委员莫·阿·拉科巴的生命也在1937年悲惨结束了，他是加格拉疗养院的创建人之一。

格鲁吉亚的镇压规模之大还可以举一事实来说明：格鲁吉亚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于1937年5月15至20日召开，大会代表六百四十四名。不久以后有四百二十五人被逮捕、流放或被枪决，②

① 见《阿塞拜疆共产党组织的历史片断》巴库。

② 《格鲁吉亚共产党历史片断》梯比里斯1963年版第158—160页。

占代表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六。

亚美尼亚的大规模镇压也很早就开始了。大家知道，把贝利亚提拔为外高加索边疆党委第一书记引起了亚美尼亚领导人某种程度的不满。贝利亚知道这一情况。此外，共和国的领导干部还指责了贝利亚写的那本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历史的书。例如，亚美尼亚教育人民委员涅尔希克·斯切潘尼扬批评了贝利亚的这本“著作”，他认为书中有许多是有意伪造和不科学的。所以毫不奇怪，贝利亚在他那大肆叫嚣的文章《粉碎社会主义的敌人》中大肆诬陷涅·斯切潘尼扬，并要求把他从肉体上消灭。对亚美尼亚党组织的恐怖活动实质上是1935年就开始了。那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伪造了几起蛊惑人心的案件，把矛头指向共和国的知名的党的干部和作家。实际上他是企图毁坏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阿·汉德然的声誉。1936年7月9日联共(布)外高加索监察委员会常务局听取了外高加索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揭露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反革命恐怖小组》的报告。就在这次常务局会议上汉德然被指控为丧失警惕性。同一天晚上汉德然死去了。根据某些材料，说他是自杀。① 但根据另一些更为真实的材料，说汉德然是被贝利亚亲手枪杀的(亚·谢列平、苏·奥·加扎梁、A.伊万诺娃等证实)。《亚美尼亚共产党的历史片断》一书直截了当地说，汉德然是专横行为的牺牲品。 401

汉德然死后，贝利亚的走卒，亚美尼亚的新领导人Г.阿马图尼和C.阿科波夫借口与民族主义和达什纳克反革命进行斗争，对共和国党和苏维埃的诚挚的干部采取了恐怖政策。这次恐怖行为的牺牲品是亚美尼亚革命运动的老干部，他们是：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C.斯拉比奥尼扬(卢卡申)、A.约尼扬、Г.奥弗谢比扬和A.科斯达尼扬；原亚美尼亚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萨·帖尔-加布里埃梁；原亚美尼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C.马

① 见Д.阿加扬著《涅·斯切潘尼扬》一书，埃里温1967年版。

尔蒂基扬；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直属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П.М.库兹涅佐夫（达尔比尼扬）；党的老活动家——Д.沙维尔江、А.美里基扬、А.沙赫苏瓦梁；人民委员——涅·斯切潘尼扬、А.叶尔津基扬、В.叶列米扬、А.叶萨扬、А.叶基扎梁和许许多多的其他人。① 所有这些共和国的活动家能够活下来的只有约尼扬一人。

哈萨克斯坦的镇压活动也具有极大的普遍性，涉及范围也十分广阔。1937 年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常务局的全体成员（共和国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无一例外都被捕和被枪决了。牺牲的人有：哈萨克斯坦中央书记——Л.И.米尔佐扬和С.努尔皮伊索夫；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У.库鲁姆别托夫；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议主席——У.Д.伊萨也夫；哈萨克斯坦中央常务局委员，著名科学家和理论家——И.Ю.卡布洛夫。同时被捕的还有：哈萨克斯坦中央多数委员，州党委书记和州执委主席，几乎所有的市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在牺牲的人当中有许多老革命家，他们都是创建哈萨克斯坦苏维埃政权的人，他们是：У.К.姜多索夫、С.谢基兹巴也夫、Ю.巴巴也夫、А.罗兹巴基也夫、А.М.阿瑟尔别科夫等。现在这些共产党员已全部都予以平反了。②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议主席А.拉希姆巴也夫被捕了，列宁认识他并对他给予很高的评价。早在第十一次党代会上А.拉希姆巴也夫根据列宁的提议被选进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Ш.绍特莫尔也被捕了，被捕的还有党的知名活动家：Х.巴基也夫、С.安瓦罗夫、Б.多多巴也夫、К.塔舍维、А.Г.勒金等。③

在吉尔吉斯共和国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④ 恐怖下牺牲的

---

① 见《亚美尼亚共产党的历史片断》埃里温 1964 年版。

② 见《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的历史片断》阿拉木图 1963 年版。

③ 见《塔吉克斯坦共产党的历史片断》1965 年版。

④ 见《吉尔吉斯共产党的历史片断》伏龙芝市 1966 年版。

人有：吉尔吉斯中央第一书记马·基·阿姆莫索夫，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M.Л.别洛茨基，监察委员会主席Д.С.萨达也夫和共和国的许多其他知名干部。

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被镇压的有：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T.A.穆哈默多夫和Я.A.波波克；土库曼人民委员会议主席K.阿塔巴也夫；土库曼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H.艾塔科夫；共和国著名国家、党和社会活动家Ч.韦利科夫，X.萨哈特穆拉多夫、凯·库利也夫、O.塔什阿扎罗夫、Д.马麦多夫、Б.阿塔也夫、库尔班·萨哈托夫等。土库曼由于不断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有几个月没有土库曼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常务局。①

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在前一章中我们已提到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阿科马利·伊科拉莫夫和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委员会议主席法伊祖里·霍扎也夫是如何身亡的。和他们同时被捕身亡的还有共和国党组织这样著名的活动家：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Д.丘拉别科夫；卡拉卡尔巴克斯基州委书记Д.里扎也夫；乌兹别克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Д.И.曼扎拉；霍列兹姆斯基州委书记H.伊斯拉伊洛夫；土地人民委员P.伊斯拉莫夫和其他区、市、州的几百名领导者，苏维埃和经济组织的负责干部。②

403

三、对工会和共青团组织领导人的镇压

1937—1938年因为各种诬陷材料，工会机构不少领导干部遭到了镇压。例如：全苏职工会总会书记E.H.叶哥罗娃被捕身亡。1917年她在彼得格勒的维堡区担任区委书记的时候曾给弗·伊·列宁签发了党证。1917年7月叶哥罗娃协助掩护过列宁。这位有名的布尔什维克，克鲁普斯卡娅的女友被指控为进行反苏活动，把

① 见《土库曼共产党的历史片断》阿什哈巴德1965年版。

② 见《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的历史片断》塔什干1964年版。

她从肉体上消灭了。①

工会其他担任领导职务的许多共产党人也牺牲了（亚·阿·柯罗斯帖廖夫等）。但是以尼·米·什维尔尼克为首的全苏职工会总会书记处的大部分成员却没有受到迫害。

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干部的命运更为悲惨。1935—1937年间许多二十——三十年代著名的共青团领导人被捕了，他们后来虽然已经转到党和经济工作岗位上工作，但仍然和共青团有很多联系。例如：1918年在共青团第一届代表大会被选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奥斯卡尔·雷夫金于1937年被捕身亡。被捕前雷夫金担任克拉斯诺达尔市委书记。1920—1921 404 年任全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拉扎里·沙茨金也牺牲了，1935年他在共产国际工作。上面已经讲过，列宁共青团的创立者之一，1921—1924年担任全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彼得·斯莫罗金也被捕身亡，1924年1月正是他在列宁遗体前代表共青团宣读了忠于伊里奇遗嘱的誓词。彼得·斯莫罗金在1937年担任列宁格勒市委书记，他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1924—1928年担任过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尼古拉·恰普林也牺牲了，被捕前他是东南铁路局局长。1928—1929年担任过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亚历山大·米里恰科夫也被捕了。

这样一来，如果我们相信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诬陷的说法，那么列宁的共青团从一开始一直到1938年的全部历史中都是由"人民敌人"领导的。

与此同时，一些属于新一代的共青团领导人也被捕了。但是对共青团和青年人的最初镇压的规模相对而言是有限的。这引起了斯大林的不满。根据瓦·皮金娜、亚·米里恰科夫和A.季缅特曼的证实，1937年6月A.B.柯萨列夫和其他共青团中央的书记们被斯大林叫了去。当时在斯大林办公室里还有叶若夫。斯大林

① 见《苏维埃拉脱维亚报》1964年3月22日。

开始指责柯萨列夫，说共青团中央没有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揭露"人民敌人"。柯萨列夫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济于事。斯大林在大约长达一小时半的谈话中总是在肯定一点，即共青团中央应该协助在共青团中揭露"人民敌人"。1937 年在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共青团中央第六次全会（这是一次秘密的会议）的决议里也对柯萨列夫提出类似的指责。全会决议中说，共青团中央常务局和柯萨列夫个人的罪过在于，他们没有及时主动地揭发共青团中的人民敌人，在共青团骨干中甚至散布所谓共青团内没有人民敌人的情绪。①

405

在这一决议之后，对共青团干部的镇压明显地加强了。被捕的有：共青团中央书记法因贝尔格和 П.С.哥尔舍宁；共青团中央委员、少共国际执委会委员瓦西里·切莫达诺夫；共青团中央委员Д.鲁基亚诺夫、Г.列别捷夫、А.库雷列夫，《共青团真理报》编辑 В.М.布别金，乌克兰共青团中央书记 С.安德烈也夫，哈萨克斯坦共青团中央书记 К.泰什托夫，乌兹别克斯坦共青团中央书记 И.阿尔蒂科夫，共青团莫斯科州委书记 В.А.亚历山大罗夫等等。

1938 年底就轮到柯萨列夫本人了。1938 年 11 月 19 至 22 日召开了共青团中央全会。斯大林、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出席了这次由安·安·安德烈也夫主持的全会。斯大林利用了送到他手里的共青团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米沙科娃写的诬陷材料，把全会变成为迫害共青团领导的大会。柯萨列夫和共青团中央多数领导人被撤了职，过一时期他就被逮捕了。《共青团真理报》社论说："共青团在自己内部揭露人民敌人的工作大为推迟了……当联共(布)中央指示柯萨列夫必须在共青团内部揭露敌对分子时，柯萨列夫总是推托说，'关于敌人问题，在共青团里比其它组织情况要好得多'。这是腐朽的、瓦解战斗力的观点。敌人不可能不企图钻进共

① 见革命博物馆为纪念 A.柯萨列夫诞生六十周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记录稿第 16 页。

406 青团。相反，和敌对分子进行斗争的全部经验证明，他们总是想把青年网罗到自己手里来，把赌注压在青年人的没有经验和思想不成熟上面……因此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有必要亲自干与粉碎钻进共青团中央领导里面的人民敌人这群匪帮的工作。从共青团队伍里把政治上的敌对分子和道德败坏分子清洗出来的工作一分钟也不应该停止。毫无疑问，共青团领导中的敌对分子和政治上堕落的人已经在许多领域安插了自己的'干部'。这些敌人的走卒还远没有被粉碎。"① 这就是《共青团真理报》写的文章，而它曾在几个星期以前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庆祝了列宁的共青团成立二十周年，并对它的光荣的里程和巨大胜利作了总结。

和柯萨列夫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许多朋友和战友，如：瓦连廷娜·皮金娜、博加切夫、韦尔什科夫等。

亚·米里恰科夫——他是长期监禁后幸存者中的一个——在他写的书② 中也提到一些被逮捕的共青团中央和少共国际执委会书记，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的名字，他们是：奥斯卡尔·塔尔哈诺夫、莉玛·尤罗夫斯卡娅、弗拉基米尔·法伊金、安德烈·绍欣、德米特利·马特维也夫、格奥尔基·伊万诺夫、古赛恩·拉赫曼诺夫、伊格纳季·沙拉维也夫、谢尔盖·萨尔达诺夫。

他们全都是非常年轻的人，只有少数几个满了三十五岁。他们大部分人的经历和尼古拉·奥斯特罗夫斯基及其书中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完全一样。这正是保尔·柯察金一代人物，是他的朋友和战友。(在牺牲了的共青团领导人当中有不少尼古拉·奥斯特罗夫斯基个人的朋友。大家知道奥斯特罗夫斯基没有活到这些可怕的日子。)这些曾为国家作出不少贡献的、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本来他们的前途应该是远大的，然而他们被宣布为人民敌人、间谍，他们大多数人或死在集中营里或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被枪决了。

---

① 《共青团真理报》1938年11月24日。

② 亚·米里恰科夫：《光荣的十年》莫斯科1965年版。

四、镇压和消灭红军优秀干部

1937—1938年苏联正在进行准备，以便同法西斯国家作战，因为这场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这时法西斯国家已经开始入侵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和中国。苏联人民不惜人力和物力巩固自己的国防，以极大的热情和关怀抚育自己的骄子——红军，它和我们的人民是骨肉相连的。 407

正在这样千钧一发的时刻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打击了红军的优秀干部，在这两年中有几万忠于党和人民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被消灭了。

1936下半年——1937年上半年军队里捕了第一批人。这时被捕的人里有象这样的著名军事将领和国内战争的英雄，如：И. И. 加尔卡维、И. 土罗夫斯基、盖·德·盖伊、Ю. В. 萨布林、Д. М. 施米特、Б. 库兹米切夫、Я. 奥赫特尼科夫。他们被指控的罪名是同托洛茨基分子及季诺维也夫分子有联系。

1937年6月11日报纸上发表了关于逮捕首批著名军事将领并且把他们交付军事委员会审判的消息。他们是：米·尼·图哈切夫斯基、约·埃·雅基尔、伊·彼·乌波列维奇、Б. М. 费尔德曼、阿·伊·科尔克、Р. П. 埃德曼、В. М. 普利马科夫和В. К. 普特纳。同时通告说，红军政治部部长，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扬·波·加马尔尼克似乎是因为和人民敌人关系暧昧自杀身死。在为时很短的审讯之后这一批被告都被处决了。

他们都是对我军有过很大贡献的人。

众所周知，雅基尔是红军最著名的军事将领之一。他是国内战争的英雄，素养很高的指挥员，他的军事才能和威信不仅被我国而且被国外所承认，他是联共（布）中央委员。雅基尔被捕之前是负责领导基辅特别军区的。

乌波列维奇同样是一位优秀的将领。他二十二岁时指挥南线的第十四军，在奥勒尔打败了邓尼金将军的白卫军师团。二十四岁时乌波列维奇就指挥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进攻斯巴斯克及解放符拉迪沃斯托克① 战役就是他指挥的。普利马科夫是“红色哥 408 萨克”师著名的师长，他和埃德曼（他是卡赫夫卡战役的英雄、全苏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同时又是拉脱维亚苏维埃文学创始人之一、著名诗人。）都是天才的指挥员。

扬·波·加马尔尼克也是我党和军队的一位著名的、有非常高的威信的活动家。

图哈切夫斯基的牺牲对我军是重大的损失。“在米·瓦·伏龙芝之后，图哈切夫斯基按其战略观点及指挥作战的才能来说，无疑是一位最优秀的军事家。……他思考的战略规模是广阔的，具有远见的创造性的智慧，并且对军事装备，对空军及运输的技术问题具有特殊兴趣，这就保障了他在建设，改造和准备苏维埃武装力量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②

我们失去了图哈切夫斯基、乌波列维奇、雅基尔及他们的同志对我军的打击虽然已经是如此沉重，可是这还仅仅是悲剧的开始。

1937年 8 月斯大林在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真是患了间谍狂症，他号召在红军中根除“人民敌人”并要求把他们的活动汇报上来。斯大林这番讲话之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对武装力量发布了命令。命令中说，红军中存在着一个分支密布的间谍网。因此向部队提出了要求：凡是和间谍多少有关系的人作出交代；那些多少知道或怀疑别人有间谍活动的人，要汇报。

根据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的这些指示，在 1937 年下半年——1938年期间镇压机构对红军的基本领导骨干给与了一个接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农红

---

① 即海参崴。——译者

② 《军事史杂志》1963 年第 4 期第 65 页。

军政治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我国各军区和海军舰队，大部分军、师、团的大多数主要领导干部都被逮捕了。国内战争时期最优秀的最出色的，当时最著名的红军将领几乎全部牺牲了。 409

红军总参谋部部长亚·伊·叶哥罗夫元帅遭逮捕并在监狱中牺牲，1919年他是南线司令员，领导了粉碎邓尼金的战役。远东特别军司令员勃柳赫尔元帅也被捕了。他是国内战争神话般的英雄，他走过了一条无产阶级将领和革命者的史无前例的可敬可佩的道路。1938年夏天勃柳赫尔领导了哈桑湖粉碎日本侵略者的战役，因为特别红旗远东军在这次战役中表现得十分英勇，所以有几万红军战士和指挥员受奖，但在他们之中却没有勃柳赫尔的名字。他于1938年8月18日被召回莫斯科，11月9日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被枪决了。他在国内及军内享有很高的威望。因此，斯大林不敢公开指控勃柳赫尔，甚至也不敢宣布他死亡的消息，人民长期不愿相信这位著名的将领已不在人间。当时曾经有过谣言，说勃柳赫尔现在改用另一名字在中国作战，但遗憾的是，这只是谣言而已。

国内战争英雄И.Ф.费季科军长也于1938年牺牲，逮捕前不久他被任命为苏联国防副人民委员，他是四枚红旗勋章获得者。

被捕身亡的还有：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海军和空军副人民委员В.М.奥尔洛夫和Я.И.阿尔科斯尼斯、国防人民委员部司局长А.И.谢贾金、Э.Ф.阿波格、Г.勃基斯、Н.Н.彼廷、Я.М.费什曼、Р.В.龙格瓦、А.И.黑克尔、军政委И.Е.斯拉文、工农红军政治部副部长——Г.А.奥谢彼扬和А.С.布林以及国防人民委员部其他许多领导干部。红军的著名活动家，苏联人民委员会议领导下的国防委员会书记Г.Д.巴基列维奇也是这个时候牺牲的。

与此同时，我国各军区和各舰队几乎所有的指挥员都遭逮捕和被处决了。牺牲的人当中有象巴·叶·德宾科这样的国内战争英雄，他以前曾任伏尔加河军区和中亚细亚军区司令员，后来任列

宁格勒军区司令员，他是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苏联执委会委员，410 以前曾担任波罗的海海员革命中央委员会①主席。瓦·弗·古比雪夫的弟弟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员尼·弗·古比雪夫，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C.E.格里波和H.Д.卡什林也都牺牲了。1938年被枪决的还有：外贝加尔湖军区司令员M.Д.韦里卡诺夫、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И.П.别洛夫、中亚细亚军区司令员И.K.格里亚兹诺夫、西伯利亚军区部队司令员Я.П.盖利特、哈尔科夫军区司令员И.И.杜勃沃伊。

还有其他许多红军将领也在这一时期牺牲了，他们之中有：机械化军团司令员A.H.波里先科，特别红旗远东军沿海集团司令员M.K.列万多夫斯基，特别空军司令员B.B.赫利平，远东空军司令员A.Я.拉平。拉平在国内战争时期只有二十二岁，那时他就指挥阿穆尔军了。上述的这些英雄们现在已经予以平反。

谢拉菲莫维奇在他的小说《铁流》中所描写远征塔曼地区的英雄叶·伊·科夫丘赫也被捕身亡了。下述的如此著名军事将领也都牺牲了：原拉脱维亚步兵师师长、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员约·约·瓦采齐斯，二十二岁时就接替了瓦·伊·夏伯阳岗位的И.C.库其亚科夫，曾任著名的二十五师师长，还积极参加了影片《夏伯阳》的拍摄工作。被处死的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还有：达·费·谢尔基奇、И.Я.斯特罗德、Б.C.哥尔巴乔夫、B.M.穆林等。

原东线第五军司令员Г.X.埃赫也被捕了，他领导下的红军在伊尔库茨克粉碎了高尔察克。（Г.X.埃赫是经过长期监禁的苦难之后幸存的少数红军指挥员之一。）

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对苏联海军也给予十分沉重的打击。海军中被捕身亡的有：太平洋舰队司令员，一级海军最高

① 这是1917年成立的准备十月起义的海员革命组织。——译者

指挥员M.B.维克多罗夫，黑海舰队司令员，二级海军最高指挥员 411
И.К.科然诺夫，北方军区小舰队司令员 К.И.杜申诺夫，波罗的海海军司令员海军中将A.K.韦克曼。同时被捕和被处决的还有我们海军的许多最高指挥员、上将、中将和少将：A.C.格里申，Д.Г.杜普利茨基，Г.П.基列也夫，И.М.卢德里，P.A.穆克列维奇，Г.С.奥库涅夫，B.M.斯米尔诺夫，Э.С.潘采尔然斯基，С.П.斯塔维茨基。

几乎所有的红军军事学院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被镇压的有：军事运输学院院长C.A.普加切夫，军事政治学院院长Б.М.伊波，工农红军摩托化-机械化军事学院院长M.Я.格尔曼诺维奇，总参谋部学院院长Д.A.库钦斯基，军事工程学院院长A.Я.萨宗托夫。才华横溢的新闻工作者军事将领亚·伊·托多尔斯基这时也被捕了，被捕前不久他还是空军学院院长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高等院校局局长。① 和这些学院院长一起被捕的还有几百名教员(和学员)。牺牲的人当中有许多军事科学方面的著名代表人物，如：П.И.瓦库里奇、亚·伊·维尔霍夫斯基、A.B.巴甫洛夫、A.A.斯维钦等等。

1937—1938年尤其沉重的打击降临列宁军事政治学院头上。斯大林为了解释他荒谬地逮捕红军政治干部的行为，突然想起了所谓的"白俄罗斯－托尔马乔夫反对派"，这个"反对派"是指在1928年的时候白俄罗斯军区和军事政治学院有一些政治工作干部批评了当时正在开始实行的一长制。到1937—1938年的时候大家早已忘记了这个所谓的"反对派"了。然而事过十年之后，却借口什么"白俄罗斯－托尔马乔夫反对派"逮捕并枪决了军事委员会的 412
成员和几乎所有各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如：M.П.阿麦林、Л.H.阿龙什塔姆、Г.И.韦克里切夫、Г.Д.哈哈尼扬茨、A.M.

① 波·嘉科夫著《亲身经历的一切》一书中描写了亚·伊·托多尔斯基的悲惨命运和他刚毅不屈的表现，他是幸存者。

比特、A. И. 梅基斯等等。多数被捕的政治工作干部都和“白俄罗斯－托尔马乔夫反对派”一点关系也没有。①

许多后来调到地方工作的天才的军事将领也在大镇压时期被捕身亡了。他们之中有：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空军管理总局局长，1937年起任苏联执委会书记的约·斯·温什里希特，在国内战争期间指挥东线第三军，后来指挥南线第九军的莱·约·别尔津，他于国内战争结束后曾在军事工业部门和苏联土地人民委员部工作。国内战争英雄Д.П.日洛巴也被捕了，内战以后他就转到库班从事经济工作了。

也象逮捕党的工作者那样，斯大林对三十年代中期已因年老和病重退休的许多军事活动家也没有宽恕。例如：很有才能的军事将领瓦·伊·绍林已经六十八岁了，他也被枪决了，他在国内战争时期指挥过军队和整个战线。早在1925年他因病退休了。1925年11月24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中曾指出：绍林 413 在建立工农红军方面有着巨大功劳，他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天才地指挥了大兵团作战并表现了英雄主义气概。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红军历史上首次把绍林终身编入工农红军名单中。但是斯大林丝毫没有考虑这项命令，他不仅从我们军队的编制中去掉了绍林的名字，而且批准了处决这位国内战争英雄的命令。

斯大林在消灭成百成千活着的红军领导人的同时，对许多早已去世的军事将领都视如草芥。我军著名的活动家，如B.特利安达菲洛夫、K.卡林诺夫斯基、Я.法布利齐乌斯、斯·加米涅夫、C.沃斯特列佐夫等人都不再被提起了。

---

① 不能不指出，当斯大林逮捕那些早已被大家忘记了的“白俄罗斯-托尔马乔夫反对派”的同时，他自己却在1937年恢复了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他用这个办法限制了红军中的一长制。1940年我军又恢复了一长制，但是1941年政委制度又实行起来，一长制被取消了。到1942年政委制再一次被取消，此后，没有再恢复起来。还应该指出，斯大林对红军优秀指挥员和政治委员的镇压行为的本身，就是鼓励了对指挥人员和政治干部的不信任，因此也就破坏了军队纪律的基础。

还应该指出，我军不仅因干部遭逮捕而蒙受了损失，而且几千名天才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都因为“丧失警惕性”被降了职或被开除转为预备役和被开除了党籍。

从总的方面看，红军和海军的损失是异常巨大和不可弥补的。根据亚·伊·托多尔斯基的计算，战前被捕的人的数目如下：苏联五个元帅中三人，四名一级指挥员中三人，十二名二级集团军军长中十二人，六十七名军团长中六十人，一百九十九名师长中一百三十六人，三百九十七名旅长中二百二十一人，两名一级海军最高指挥员中两人，两名二级海军指挥员中两人，六名一级海军指挥员中六人，十五名二级海军指挥员中九人，两名一级军政治委员中两人，十五名二级军政治委员中十五人，二十八名集团军政治委员中二十五人，九十七名师政治委员中七十九名，三十六名旅政治委员中三十五人。① 中下级指挥系统的损失也很大。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无论那一次战争，无论那一个军队都没有象苏联军队在战前那样遭受这么大的损失。 414

多年来我国军事学院在培养干部方面所做的工作等于全部白废了。军队中的党员数量大大的减少了。1940年秋天步兵总监进行了秋季检查，结果表明：集训的二百二十五名团长中没有一人是军事学院毕业的，毕业于军事学校的二十五名，其他二百名只上过少尉训练班。②

1940年初，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师长，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团长和百分之六十兵团部队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都是任职只有一年左右的新人。这一切情况是在我们祖国和整个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艰巨的战争前夕发生的。

显然，红军最优秀军事将领被消灭引起了希特勒阵营中的极

---

① 在这里亚·伊·托多尔斯基列举的数字显然是不完全的。根据《伟大的卫国战争简史》（莫斯科1965年版第39—40页）的说法，战前所有集团军长，几乎所有师长和旅长，半数团长，多数集团军、师和旅军事指挥员和三分之一团指挥员都被捕了。

② B.A.安菲洛夫：《伟大卫国战争初期》莫斯科1962年版第28页。

大喜悦；希特勒在计划进攻苏联的时候对此予以特别的重视。根据纽伦堡审讯中凯捷利的供词，许多德国将领提醒希特勒不要进攻苏联，因为他们认为红军是很强大的敌人。但是希特勒驳斥了这些怀疑。他告诉凯捷利说："苏联高级军事干部最优秀的部分已于 1937 年被斯大林消灭了。这样一来，那些正在成长的接班人，暂时还缺乏作战必需的智慧。"

1941年 1 月 9 日，希特勒在高级纳粹将领会议上谈到准备进攻苏联时说："他们没有好的统帅。"①

415

五、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法院和检察院机构内部的镇压活动

斯大林在国内进行镇压时，首先依靠的是法院侦察机构和惩治机构。但不能不指出，这些机构本身的成百成千的干部从肉体上被消灭了，也是大规模非法镇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前提。

1936—1937年间对这些惩罚机构进行的紧张而无情的"清洗"措施，性质是极其复杂的。这一时期，这些机构的领导人已经不能说他们仍是完全真诚和纯洁的契卡人员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法院和检察院的多数工作人员积极参加了1930—1933年迁移几百万富农和中农家庭的活动，他们参与了对"资产阶级"专家的镇压、1930—1931 年"黄金运动"、1935—1936 年非法镇压活动以及在这以前的反对原反对派成员的活动等等。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伴随这些镇压运动而来的是歪曲政策的、和苏维埃政权性质不相称的做法。自然，惩罚机构应该对这些做法负相当大的责任。所以毫不奇怪，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法院和检察院机构里早在 1936 年以前就开始发生某种独特"淘汰"过程，结果类似亚哥达、扎波罗热茨、乌尔利赫、维辛斯基这样的人就被提拔上来了。许多领导干

① А.И.波尔托拉克：《纽伦堡的结局》莫斯科 1965 年版第 324—326 页。

部腐化堕落，失去了捷尔任斯基在他的助手身上培养出来的那些品质。但是这种更新过程在三十年代前半期并不象斯大林所要求的那样快。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多领导人如果说对阶级异己分子和原反对派成员进行各种诬陷中伤还比较容易同意的话，但是他们不可能也同样容易地同意去打击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基本干部队伍。远不是惩罚机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同意和能够接受法庭审讯的"新"方法。所以斯大林于 1936 年秋天决定对惩罚机构进行普遍的"更新"。另外，斯大林想摆脱他的那些以前的罪行的见证人和参加者，他的这一想法也对决定"更新"班子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后来他的这种想法也不只一次地出现过。 410

前面我们已讲过内务人民委员亨·亚哥达和他的许多副手和助手，如：弗·阿·巴利茨基，雅·萨·阿格拉诺夫等被逮捕和被处决的情况。1937年著名契卡人员，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帖·德·杰利巴斯被逮捕和被枪决了。他在三十年代中期领导了远东内务部的机构。根据远东一些党的干部（巴·伊·沙巴尔金）的证实，杰利巴斯反对过毫无根据地镇压党和苏维埃的干部。

格·叶·叶甫多基莫夫，是契卡人员中第一个荣获四枚红旗勋章的人，他也被捕了。叶甫多基莫夫是审理"工业党"案件的组织者之一，1936年调到罗斯托夫州从事党的工作，在本州"清洗"原反对派方面出了不少力气。但是 1937 年他自己被捕和被枪决了。亨·亚哥达的一些著名战友也被枪决了，他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政治司司长 Г.А.莫尔恰诺夫、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司司长 Л.Г.米罗诺夫、外事司司长A.A.斯卢茨基、业务司司长卡·维·帕乌克尔、特别事务司司长马·伊·加伊、运输司司长A.M.沙宁、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吉·波·卡茨涅里松。

1936—1937 年被捕的著名契卡人员当中有：马·拉齐斯、C.梅辛、H.贝斯特雷赫、C.斯蒂尔涅、阿·阿尔图佐夫、格·勃拉冈拉沃夫、C.阿尔沙库尼、A.皮利亚尔、B.P.东布罗夫斯基、M.B.斯洛尼姆斯基、H.Г.克拉比维扬斯基、Г.E.普罗科菲耶

夫、Л.Б.扎林、Т·洛尔德基帕尼泽、Б.А.扎克等等。根据苏·奥·加扎梁、М.В.奥斯特拉格拉德斯基和М.М.伊诺夫的证实，上述这些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中的多数人从主观上说都是诚实的共产党员，他们不愿意参与镇压党和国家基本干部队伍的活动。例如，阿·阿尔图佐夫1937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骨干会议上发言时说："自从明仁斯基死后，已经形成了十分粗暴的领导作风，在这种作风下个别的契卡人员、甚至我们组织的环节已经走上了极危险的道路，这使我们变成内务部衙门单纯的技术人员，使我们成为和可恶的资本家的特务、暗探一样的人，并具有衙门的一切缺点。"① 在这次发言以后，阿·阿尔图佐夫就被逮捕并且被枪决了。

417

捷尔任斯基个人的朋友瓦·尼·曼采夫被枪决了。自俄罗斯内务部人民委员格·莫·列普列夫斯基也因为拒绝使用"新方法"被枪决了。

捷尔任斯基亲自培养的第一批契卡人员之一，光荣的契卡Ф.Т.佛明被逮捕了。②

著名契卡和教育家马·萨·波格列宾斯基也在镇压年代牺牲了，他是许多儿童劳动公社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当时苏联的优秀电影《走向生活》③ 就是以波格列宾斯基建立的和领导的波尔舍夫斯卡亚劳动公社的历史为内容的一部片子。波格列宾斯基被任命为高尔基州内务管理局局长，根据他死前留下的信件，我们知道，他是因为不愿意参与当时搞的那些不法行为而自杀的。乌克兰内务部的一个管理局的局长科泽利斯基也自杀了。④

国家建设局远东分局的领导人，科累马河第一批集中营的组织者 Э.П. 别尔泽，他曾做过捷尔任斯基的秘书和拉脱维亚步兵

---

① Т.格拉德科夫和М.斯米尔诺夫：《明仁斯基》，《名人传记丛书》，莫斯科1969年版第327页。

② 佛明是幸存者，他的书《老契卡杂记》1964年由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

③ 影片《走向生活》三十年代曾在中国上演，译名为《生活之路》。——译者

师师长，1937年也被捕了，而且1938年被枪决了。

个人迷信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会成员卡什林兄弟之一——И.Д.卡什林也牺牲了。内务部委员会另一名成员格·伊·博基也遭逮捕，他是1900年入党的党员，地下党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十一次被关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捷尔任斯基培养的契卡人员雅·克·彼得斯也在个人迷信时期牺牲了。 418

捷尔任斯基一代的老契卡人员，格鲁吉亚和外高加索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司司长苏·加扎梁是1937年被捕的，但经住了长期监禁的一切折磨和苦难。他在他的尚未出版的《这一切都不能再重复了》一书中以一个加盟共和国为例出色地描绘了1937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存在的那些可怕的恐怖和不法行为的环境。他叙述了格鲁吉亚内务人民委员部几十个忠诚干部遭到逮捕的情况，他们是被自己原来的朋友和下级抓走，并且送进匆忙建立起来的监狱。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些可怕的年代贝利亚的一些走卒如科布洛夫和哈赞，克利米扬和萨维茨基，德康诺佐夫和美尔库洛夫，戈格利泽和米里什泰恩等人却飞黄腾达起来，他们先爬上格鲁吉亚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岗位，然后又爬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岗位。

苏联侦查机关也遭受了重大打击。（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都有专门的侦查司局。）斯鲁茨基被镇压之后，接替他工作的施皮格利格拉斯也被捕和被枪决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许多驻在国外的侦查机关的秘密领导人被召回莫斯科，然后送进疗养院去疗养，他们"休息"之后就被抓起来枪杀了。（如内务人民委员部驻法国的侦查机关秘密领导人尼克·斯米尔诺夫（格林斯基），军事侦查机关派出的人员里沃维奇等等。）

---

④ 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几乎所有机构和机关都出现了自杀浪潮。不仅一些诚实的工作人员自杀，连一些已在犯罪的道路上走得很远的人也自杀了。例如：特别重要案件侦查员库尔斯基也自杀了，不久前他由于"顺利"准备"平行"总部案件的审理工作而被授与列宁勋章。

但是也有不少侦查员拒绝回苏联去送死。为了镇压这些人和那些不愿回国的外交人员以及斯大林不称心的人，叶若夫建立了一个管理在国外执行特殊任务的局。结果在长期追捕之后被杀害的人有：伊格纳季·雷斯（在瑞士被发现和被害的），在荷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机关领导人克里维茨基（在美国被发现和被害 413 的），1929 年和我们的侦查机关断绝了联系的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土耳其侦查机关领导人阿加别科夫（在比利时发现和被害的）等许多其他人。

苏联军事侦查机关的创建人和领导人扬·卡·别尔津也和许多其他侦查人员一样地死于非命了。别尔津于 1937 年被任命为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总顾问。他曾经因为参加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革命运动两次被沙皇法庭判处死刑。我党和红军的这位有名活动家教育和培养了几百名秘密战线的战士，他培养的战士中有象苏联英雄里查德·佐尔格这样的人。但是他从西班牙被召回莫斯科后被抓了起来枪决了。[1] 里查德·佐尔格的战友卡尔·拉姆也从上海被召回枪决了。艾诺·库西宁（奥托·库西宁的妻子）也从日本被召回后抓了起来。当时她和佐尔格一起工作，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侦察任务。佐尔格的妻子叶卡特林娜·马克西莫娃在莫斯科被捕身亡。里·佐尔格本人也接到回莫斯科的命令。但是他拒绝回苏联，理由是没有人能接替他，因为他不能断绝已经建立起来的单线联系。毫无疑问，佐尔格已经猜到在莫斯科等待他的是什么。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岗位，继续把非常有价值的情报汇报给他的新领导人。

1918年被暗杀的彼得格勒契卡主席莫·索·乌里茨基的侄子谢·彼·乌里茨基遭逮捕而且被枪决了，他是接替扬·卡·别尔津担任国防人民委员部侦查局局长职务的人。

* * *

① 《共青团真理报》1964 年 11 月 13 日。

1936—1938年在法院和检察院系统也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清洗。我们在前面已讲过苏联司法人民委员尼·克雷连柯遭到逮捕死于非命了。苏联总检察长И·A·阿库洛夫被撤了职，调了工作，不久也被捕了。他是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时期的老活动家，1912年彼得格勒著名的六万工人示威游行就是他组织的。早在三十年代初，阿库洛夫就力图和亚哥达的不法行为进行斗争，所以亚哥达和维辛斯基（当然是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一直要求把阿库洛夫调离检察机关。①

在个人迷信时期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司法人民委员部总检察院，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最高法院和所有加盟和自治共和国的检察院和法院的许多其他著名的干部也被捕了。被迫害身亡的有：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成员，莫斯科市法院主席H·M·涅木采夫，苏联最高法院成员A·B·麦德维杰夫，白俄罗斯联邦检察长B·A·焦戈季以及其他许多人。苏联检察院负责人P·П·卡达尼扬和M·B·奥斯特罗果尔斯基也被逮捕了。

军事检察院和军事法院的许多负责人也牺牲了：军事检察院中央机关有H·H·哥麦罗夫、Ю·A·捷尔维特等，乌克兰军区的军事检察长E·Л·贝尔菲利也夫，列宁格勒军区军事检察长库兹涅佐夫；莫斯科军区军事法院主席Л·Я·普劳夫尼克等。

苏联最高法院副主席彼·阿·克拉西柯夫于1938年没有说明任何原因就被撤了职，把他转为预备人员，他是列宁的老战友，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副主席。

苏联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克拉斯京1936年就自杀了。根据P·Г·阿里哈诺娃证实，死前克拉斯京给他的朋友和家属留下了一个条子，内容大致是：正在准备的对反对派领导人的案件完全是捏造，他不能参与这样的事情。

党内出名的干部阿朗·索尔茨在专横时期牺牲了，人们都称

① 见革命博物馆纪念阿库洛夫会议的速记稿。

他是“党的良心”。作家尤·特里佛诺夫写了一本叙说他的父亲瓦·特里佛诺夫以及父亲的好朋友索尔茨的笔记，在笔记里讲了索尔茨的悲惨的命运。尤·特里佛诺夫写道：“当1937年斯大林发动的大规模镇压开始之后，象索尔茨这样的人是不能沉默的。也许他就是少数的企图进行斗争的人们之一。索尔茨当时是总检察长的助理，管理日常诉讼工作。他要求提出证据用以证明那些被称为‘人民敌人’的人真正有罪，他要求看审讯材料，因此和叶若夫和维辛斯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有一次他来找维辛斯基，要求看特里佛诺夫案件有关材料，他说，他不相信特里佛诺夫是人民敌人。维辛斯基回答他说：‘如果一个人被抓了，他就是敌人。’索尔茨气得满脸通红，喊道：‘撒谎！我认识特里佛诺夫三十年了，他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我只知道你是孟什维克！’他把公文包一扔，就走了……

从此以后索尔茨逐渐被排除于工作之外。但他不妥协。1937年10月，镇压正在高潮时，他在斯维尔德洛夫克斯党的骨干会议上突然讲了话，他批评了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并要求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维辛斯基的整个活动。他当时还认为，列宁活着时实行过的方法还是有效的……会场的一部分人被吓呆了，但是多数人喊叫了起来：‘滚！从讲台上滚下去！披着羊皮的狼！’但是索尔茨还继续他的讲话。那些怒气冲冲的人自发地跑到老头子身边，把他拖下了讲台。为什么斯大林没有最简单不过的把索尔茨抓起来了事呢？这很难说……1938年2月索尔茨才彻底被赶出检察院大门之外。他曾设法得到斯大林的接见。他于1912—1913年在彼得堡地下工作时和斯大林同榻而寝，但斯大林没有接见他。索尔茨还是不投降，他宣布绝食。这时把他关进了精神病院。两个彪形大汉的卫生员跑到谢拉菲莫维奇街上的索尔茨住宅，把这位身材矮小、满头白发的老人一把抓住，捆了起来，把他抬到下面塞进马车里。后来让他出院了，但他的意志已被摧毁了。”①

422

① 尤·特里佛诺夫：《篝火的余辉》莫斯科1966年版第26—27页。

不久以后索尔茨就去世了，他已是一个孤单的、病魔缠身的、被人遗忘了的人。

成百成百的苏联法律界的干部都遭到了和索尔茨同样的命运，代替他们的是那些没有任何原则的残酷无情的人，如：马图列维奇、德米特里也夫、Г·П·利波夫、С·Я·乌里扬诺娃等等。

六、对兄弟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活动家的镇压

三十年代中期，欧洲、亚洲和美洲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还处于地下。为了保存这些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几乎所有外国共产党的相当一部分中央委员都住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国际工会及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①]等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国际组织的基本总部都设在莫斯科。苏联还有几所专门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培训外国年青共产党员如何从事地下工作。所以，苏联实际上在为全世界劳动者完成它应尽的义务，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地和中心。

所以毫不奇怪，我国1937—1938年开展的恐怖运动不能不给兄弟的共产党带来很大损失。

自然，首先遭到不幸的是国际共产主义组织中的苏联工作人员。联共(布)中央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约·皮亚特尼茨基被捕牺牲了，他是列宁非常尊重并且给予很高评价的我党的老活动家。我们上面已写过，长期以来领导少共国际的拉法埃利·希塔罗夫于1938年被从肉体上消灭了。(在逮捕以前不久，希塔罗夫被从少共国际调到切里亚宾斯克州作党的工作。)中山大学校长巴维尔·米夫[②]牺牲了，他不仅是共产国际的著名活动家，而且是

423

① 中国过去译为国际红色救济会。——译者

② 米夫在共产国际积极支持王明、康生，维护王明路线，给中国党造成了巨大损失。——译者

一位大科学家，长期以来他领导了苏联的中国问题的研究。共产国际人事局局长 Г·阿里哈诺夫也被捕身亡，他过去是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牺牲的人还有共产国际的负责人：К·И·斯莫梁斯基、Г·萨法罗夫、Б·А·瓦西里也夫、克拉也夫斯基。被枪决的还有：共产国际国际关系部（行动部）部长——米罗夫-阿布拉莫夫，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巴·路·拉品斯基（米哈尔斯基）等。

象梅·阿·特利里塞尔这样著名的活动家也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消灭了。特利里塞尔在二十年代曾担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副局长，三十年代中期他被任命为共产国际特别事务部领导人并且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书记处成员。根据 В·С·-娅的证实，梅·阿·特利里塞尔受到特别全权委托的一项任务，就是在他和他领导的局的干部面前提出了在共产国际内进行清洗"人民敌人"工作。但是到了三十年代末，特利里塞尔自己也成了这一无情清洗的牺牲品。

和共产国际中苏联的干部同时受到惩罚机关打击的，还有外国共产党的许多活动家。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建人、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实际领导人贝拉·库恩被捕并被枪杀了。当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镇压之后，贝拉·库恩来到苏联担任共产国际的负责工作。（1920 年贝拉·库恩曾是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苏维埃政府中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和库恩一起牺牲的还有匈牙利共产党的其他著名活动家：弗·卡利卡什、Д·博卡尼、Ф·加鲍尔，Л·马季亚尔等。1919 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原十二名人民委员都在内务部的刑讯室里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匈牙利多数同志都是匈牙利共产党员，又是联共（布）党员，一个党员有两个甚至于三个党的党籍，这种情况在那时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对波兰共产党的打击尤为沉重。1937—1938 年间在苏联的几乎所有波兰共产党员都被抓起来了。例如：波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波兰非常著名的革命者尤里昂·列申斯

基-连斯基被逮捕并被处决了。波兰工人运动的老活动家，七十岁高龄的阿·瓦尔斯基被枪决了，他是波兰社会民主党（后来是波兰共产党）的建党人之一。和他同时牺牲的有维拉·柯斯特舍娃（即玛利娅·柯舒特斯卡娅），她献身波兰工人运动已经四十多年了。当时在苏联还有几十名波兰共产党有名活动家也同时被捕了，而且大多数人都牺牲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共产党的多数领导干部也遭逮捕，如：Р·Д·沃尔夫、Э·А·伊德利、И·К·洛吉诺维奇、М·С·马伊斯基、Н·П·马斯洛夫斯基、А·С·斯拉文斯基等。尤有甚者，1938 年夏天，当波兰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战线的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时，波兰党以及它所包括的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产党被宣布解散了。根据诬陷材料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决议给波兰、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以沉重的打击，这一决议束缚了波兰工人阶级的力量，给反击德国侵略者和开展民族解放运动增加了困难。

在波兰共产党同法西斯反动派进行斗争的高潮时，党突然被解散了，它在莫斯科的几乎所有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均遭逮捕，这两件事给波兰党员以极为沉重的印象，当时有许多波兰共产党党员还在波兰当局的狱中。

波兰共产党党员马利昂·纳什科夫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信使每日画报》(Иллюстрованы Курьер Нодзенны) 中在一些其它通知里面有一个短短的简报报道了波兰共产党解散的消息。

425

我们都受了极大的震动。

我们首先认为这是警察局卑鄙地造谣生事……但过了几天报纸上出现了更详细的报道。不管我们如何想稳住自己不安的心情，但是报纸越来越清楚地揭开了可悲的真情。最后，新来的犯人给我们带来了正式的证实。

监狱里充满了难堪的沉默。

怎么能相信这些可怕的指控呢？被指控犯下了那些滔天罪行

的人和我们心目中的那种光辉形象怎么能连在一起呢？

连斯基、瓦尔斯基、维拉·柯斯特舍娃、根科科夫斯基、普鲁赫尼亚克、勒瓦尔、布隆科夫斯基——他们都是英雄人物，是我们运动的巨擘……

人们在寻找原因，想起过去宗派斗争历史，'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斗争……但这和现在又有什么联系呢？一切都显得极不真实。

在'被消灭了的间谍'中，如共产国际的通知中所称呼的那样，不是有'多数派'，也有'少数派'的成员么?!

虽然如此，但是我们，最后还是确信我们党的领导已被奸细活动腐蚀了，所以我们马上提出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运动会怎么样？'

'现在我们自己都是干什么的？'

'难道我们光荣的战斗的党骄傲地培育了我们，我们引以为荣的党，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为她献出生命的党只不过是彼尔苏斯基的间谍机关吗？'

我们所有人的答复：

'不是，一百个不是。'

为唤醒民众的革命精神而作了这么多工作的党，领导着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同资本主义、法西斯进行战斗的党不可能是一场骗局。

……我们以非常痛苦的心情获悉我们的领袖背叛的'事实'，我们心灵深处都受到极大的震动，但是我们并没有对我们的信念，对我们的运动，对我们的党的正确性发生一丝一毫的动摇。这种信念给几千共产党员以力量去渡过已经来临的艰难的年代，这也是将来恢复我党的基石。"①

426

直至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这些强加于波兰共

① M·纳什科夫斯基著《不平静的日子》，是一部记述三十年代的回忆录，译自波兰原著，莫斯科1962年版第209—210页。

产党，西乌克兰共产党，西白俄罗斯共产党的诬陷的指控才被推倒，苏联、芬兰、保加利亚、意大利共产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一起发表了一项专门声明，阐明了这一情况。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年代牺牲的波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被彻底平反了。

三十年代末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各共产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领导干部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这些共产党领导人当时都是在苏联指导他们党的活动，对他们也进行了毫无道理的镇压。被镇压牺牲的人有：共产国际和爱沙尼亚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 X·贝格利曼和扬·安维尔特。被捕的人有：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扬·别尔津-季耶美利斯和 Я·伦茨乌尼斯，书记处成员 Я·克鲁敏-皮拉特和 Э·阿皮涅。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共产党的下述著名活动家也成了镇压和诬陷的牺牲者：鲁道夫·雅·安德鲁普、E·塔乌特凯徒、H·扬松、Ф·德格拉夫、P·米尔林格、O·里亚斯塔斯、И·基亚斯帕尔特、P·瓦克曼、Э·费德雷特尔、Ф·帕乌泽尔、O·捷尼斯等许许多多的人。

由于这些镇压，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止了，爱沙尼亚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也断了。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实际上也被撤销了，拉共中央国外局已经做了十六年工作，而且对党有巨大的帮助也被解散了。里加委员会，它是一个具有党的庞大组织的党委也被取消了。由于大规模的镇压，拉脱维亚共产党长期和共产国际失掉了联系，这就使他的处境非常艰难。立陶宛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处境也变得同样困难了。①

427

许多在苏联的比萨拉比亚共产党员也都遭逮捕（如 C·布勃诺夫斯基、K·司尔布、C·班特克、И·福尔土纳等等②）。

伊朗共产党领导人之一阿·苏尔坦-扎德也在镇压年代牺牲

① 见《爱沙尼亚共产党的历史片断》第2卷塔林1963年版；《拉脱维亚共产党的历史片断》第2卷里加1966年版。

② 《莫尔达维亚共产党的历史片断》1964年版。

了，他是1932年来苏联侨居的。墨西哥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哥麦斯也遭逮捕（但是活了下来）。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南共建党人之一菲里普·博什科维奇死于非命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弗拉基米尔·查皮克也牺牲了，他刚刚从西班牙回来，他是西班牙第十五国际旅的军官。被捕的还有一些党的著名活动家，如：C·茨维伊奇、Д·茨维伊奇、福尔瓦廷、齐利加、波波维奇、诺瓦科维奇等。根据约·勃·铁托的证实，当时解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问题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为南共党在苏联的全部领导人都被逮捕了。铁托写道："只剩下我一个人。"①

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干部也受到严重损失。他在共产国际的代表伊斯科罗夫和斯托莫尼亚科夫被捕了。特别要提到的是波波夫和塔涅夫的命运，他们两人曾经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一起在有名的莱比锡审讯时发过言。当法西斯法庭不得不宣布季米特洛夫、波波夫和塔涅夫无罪之后，苏联接受了这些共产党员参加苏联国籍。但几年之后波波夫和塔涅夫被捕了，而且根据诬陷材料给他们判了刑（波波夫现在还活着，在保加利亚工作）。为了达到阴谋诬陷的目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还专门为共产国际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立了案。

428 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郭绍棠及许多其他中国共产党员也都被捕了②。共产国际朝鲜支部也全体受到镇压。印度共产党被消灭了的领导人有：慕克吉、查塔帕扎伊亚、洛哈尼和其他一些人。

德国共产党员在苏联的命运尤为悲惨。在外国共产党员各支部中德国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的侨民的队伍最大。这是很明白的，许多德国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分子由于躲避希特勒恐怖而逃到（或根据党的决定转移到）苏联。在我国等待他们之中的大多数

① 铁托本人显然只是因为他于1936年底秘密回到南斯拉夫，才得以幸免于难。

② 1938年在苏联被捕的还有李立三等许多同志。——译者

人的也是恐怖，而且是更加残酷的恐怖。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对德国反法西斯分子大规模的镇压甚至还企图寻找什么“意识形态的根据”。例如，《莫斯科杂志》1938年4月12日（第19期）曾说：“如果我们说，每一个住国外的日本人都是间谍和每一个住在国外的德国公民都是盖世太保的特务，这无论如何不是什么夸张。”1938年4月底在共产国际德国代表处经过登记的、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德国反法西斯战士已达八百四十二人。实际上被捕的数字要大得多。许多德国政治侨民都是直接从莫斯科的政治侨民楼抓走的。例如：1938年3月9日在政治侨民楼里就捕去十三人，11日捕去十七人，12日捕去十二人。

被捕和牺牲的德国共产党员当中有三名是德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赫尔曼·勒麦列①、佛里茨·舒尔特科和赫尔曼·舒巴特，还有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冈斯·弗利克（中央书记）、冈斯·诺伊曼、亨利希·祖斯坎德（《红旗报》主编）、胡果·埃贝莱因（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的代表、德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和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希尔什·维尔涅尔（台尔曼的秘书和朋友）和其他许多德共有名的活动家以及反法西斯的积极战士。共产国际优秀的干部和共产国际的筹建人之一威廉·明岑贝尔格也在这时被开除了党籍，因为他拒绝从巴黎回莫斯科来送死。后来，他于1940年在法国被害，死情不明。

429

维也纳（奥地利）反法西斯起义“保卫同盟”的许多参加者都被捕了。1934年这次起义失败后，几百名参加起义的人逃到苏联，当时他们被当作英雄受到迎接。可是1937—1938年“保卫同盟”的几乎全部参加者都被关到苏联的监狱和集中营里去了。

在苏联避难的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家属也遭到了迫害。李卜克内西的儿子被开除了党籍，他的侄子库尔特·李卜克内西被捕

---

① 过去诺伊曼-勒麦列小组在德国共产党内持宗派立场。他们在三十年代初期反对统一战线政策，实际上是执行了斯大林在这一问题的政策。逮捕他们可以把德共和斯大林本人的一切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

了(库尔特·李卜克内西被平反后回到德国担任了重要职务)。根据苏·加扎梁的证实，德国大批共产党员被关在索洛维茨克监狱里。当把他们从这个监狱里转移到集中营的时候，他们造了反，抗议转移途中的非人待遇。根据 Н·П·斯米尔诺娃的证实，德国大批女共青团员被关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监狱里。叶·谢·金兹堡在布蒂尔卡监狱里和一个德国女共产党员谈过话，这位德国女共产党员给他看过身上满脊背的伤痕，这些伤痕先是在法西斯监狱里，后来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狱里用刑时留下的。根据 С·И·别尔季切夫斯卡娅的证实，原来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之一，后来是在共产国际积极工作的干部维里·布季赫在 1937 年被捕，后来身亡了。在审讯过程中他和其他人一样受到非刑拷打。维里·布季赫给同牢的苏联共产党员看他那被砸扁的手指头时说:"为此，德国工人阶级永远也不会饶恕你们。"

还应当指出，1939 年 9 月同德国签订了友好条约之后，斯大林犯下了新的，在我国史无前例的罪行——他把那些受到盖世太保追捕逃到苏联避难的相当大的一批(约六百人)德国反法西斯战士和犹太人交给了法西斯德国。从此以后，我国的边界实际上已不再向被法西斯奴役的欧洲逃亡者开放了。

许多意大利共产党员(如埃德蒙多·佩鲁扎、帕·罗波蒂)，比利时共产党员(如 M·威列姆斯)，土耳其共产党员(如萨利赫)，芬兰共产党员(如赫伊洛，维尔捷年)，西班牙共产党员(如斯捷尔尼-科列别尼)，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如查里·约翰逊)，法国，罗马尼亚(如 M·帕乌克尔、A·多勃罗杰那乌)，荷兰，甚至美国和巴西共产党员都被镇压身死。我们看到了难以置信的可怕的对比:许多外国共产党住在苏联的那些领导人和积极分子都牺牲了，而 1937—1938 年关在本国监狱里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却大部分活了下来。

三十年代末几乎所有的共产国际的学校都被关闭了，没有人学，也没有人教了。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机构对兄弟共产党的镇压，对那些在我国政治避难的革命者的迫害，不必说，更是加倍

的非法和犯罪的行为。所以很奇怪，不知为什么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今天如此关心对斯大林的平反问题，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贡献”。

七、对苏联科技知识分子的镇压

从三十年代中期形成的悲惨局面不能不影响我国的科学事业。1936—1938年，由于斯大林直接干预，由于科学界的各种个人野心家和冒险家利用了当时形成的间谍狂和暗害狂气氛、使用各种卑鄙伎俩达到个人的目的，几千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工作者死于非命了。学术刊物上开始的许多辩论和探讨，最后以内务人民委员部刑讯室的非刑拷打和枪杀而告终。

总的来说，我们的科学由于这些毫无意义、残酷无情的镇压而受到的损失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例如：历史科学领域长达几年的大辩论以悲剧宣告结束。对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派的个别错误别有用心的批判，却逐渐变成了政治上的迫害运动。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许多学生和追随者被宣布为托洛茨基分子、暗杀者和恐怖分子而遭逮捕。当时有一篇具有指导性的文章写道：“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揭露出来的所谓波克罗夫斯基‘学派’成为人民敌人进行暗害活动的基地，不是偶然的，他们这些托洛茨基-布哈林法西斯奴仆、暗害者、间谍和恐怖分子巧妙地用米·尼·波克罗夫斯基有害的、反列宁主义的论点把自己伪装了起来。这批反列宁主义的狂妄的匪帮之所以能长期逍遥法外，在历史领域进行暗害活动，只能用下面的事实来解释：即历史战线的干部都是不可饶恕的白痴，他们高枕无忧，万事大吉，完全失掉了警惕性。”①

著名历史学家和革命者，《消息报》最早的编辑之一尤·米·

① 《反对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观》第1卷莫斯科1939年版第5页。

斯切克洛夫也成了斯大林恐怖的牺牲者。著名党史学家弗·哥·索林也牺牲了，他是最早写列宁传记的作家，也是列宁全集最早的编辑，他是马恩列研究院的副院长。研究党史的红色教授学院的院长、我党和国际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联共（布）中央委员 В·Г·克诺林被枪决了。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Н·М·卢金院士在 1936 年就被逮捕并且死于非命了。牺牲的学者还有我国如此著名历史学家和党史学家，如：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尼·尼·波波夫、Н·Н·瓦那格、С·彼恩特科夫斯基、С·班特科、Г·С·弗里德利扬德、Э·魏斯、В·М·达林、Ю·Т·铁沃斯扬、С·П·柯尔舒诺夫等。历史学家 С·洛特、С·М·杜波罗夫斯基、П·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也都被捕了，但他们都有幸活到了平反之日。历史学家米·凯尔迪什死在狱中，他是现在苏联科学院院长①的亲兄弟。

412

哲学"战线"的斗争也被极端畸形的方式所代替。大家知道，苏联哲学界各流派之间的基本争论早在 1930—1932 年间就结束了。在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研究院等学校参加这些辩论的人已在三十年代初期都已分散到全国各地并积极参加了经济和文化建设工作。但是某些哲学家并没有忘记自己原来的反对论者。在已经开始的同"人民敌人"斗争的新条件下，他们就企图算老帐，但不是求助于科学的论证，而是求助于惩罚机构了。原来的哲学领域中的错误（机械主义、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主观主义、马赫主义、诡辩论等等）很快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等刊物上被各种各样的政治性指责所代替，后来又被当时更流行的（和更有效的）指责所代替，说他们参加了敌对的、甚至是恐怖的活动。这一迫害运动的结果（它的积极的组织者与参与者中有象马·鲍·米丁、巴·尤金、费·康斯坦丁诺夫、Б·察金这样的人）使几十名苏联哲学家被捕了。而受到打击的不仅有原来的"机械主义论者"和"孟什维

① 即穆斯季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凯尔迪什，他已于 1978 年 6 月 26 日去世。——译者

克化的唯心主义者"，而且还有许多完全是正统的辩证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受迫害的哲学家中有：A·И·瓦利亚什、И·К·卢波尔、勃·巴·米柳宁、И·拉祖莫夫斯基、Н·卡列夫、В·鲁达什、С·彼丘金、Г·蒂米扬斯基、А·Р·麦德维杰夫、美·雷尔希克、Г·德米特里也夫和其他许多人。他们之中多数人死在狱中。

特别应该讲一讲象扬·斯特恩这样著名苏联哲学家和党的干部的命运。

他的朋友И·П·伏罗洛夫在回忆斯特恩的札记中写道："没有比斯特恩更了解斯大林的人。大家知道，斯大林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斯大林不懂得哲学问题。所以他在1925年把当时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大哲学家扬·斯特恩叫来指导他学习黑格尔的辩证法。斯特恩为斯大林订了学习计划，每周两次给他的这位显贵的学生最热心地讲解黑格尔的深奥的道理（那些年代学辩证法是按红色教授学院米·尼·波克罗夫斯基所制订的体系，同时平行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逻辑学》及《精神现象学》。斯特恩信任我，经常讲上课的一些情况，讲他作为老师教这样一个很难掌握黑格尔辩证法的学生感到的难处。扬在给斯大林上课后经常到我这里来，他的情绪抑郁、阴沉，他平常是很乐观的人，但这时却总是心绪很乱，不能保持镇静。斯特恩不仅是一个大哲学家，而且是积极的政治活动家，是列宁时代的著名老布尔什维克之一。他同斯大林见面时以及和他上课时谈论哲学问题时也总是接触到现代的一些政治问题，这使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斯大林的真面目，看到他追求个人专制，看到他的一些阴险的用心以及实现这些阴险用心的各种方法……早在1928年斯特恩在他的朋友们的小圈子里说过：'柯巴将来要做的事使德雷福斯和贝利斯案件[①]大为逊

433

① "德雷福斯案件"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大冤案。1894年9月法国国防部长提出控诉总参谋部的参谋德雷福斯向德国出卖了国防秘密军事文件，被判处终身苦役。1896年法国总参谋部情报局局长证实不是德雷福斯出卖了秘密军事文件，而是参谋爱斯其尔加吉出卖的，于是这一消息见报后，引起社会各种力量的斗争。作家左拉

色。’当同志们要求他谈谈斯大林领导国家十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他是这样回答的。这么说，斯特恩对斯大林的领导的评价以及对他实现血腥的凶险用心的时间都没有估计错。②1928年斯大林就不和斯特恩上黑格尔辩证法的课了。过了几年之后，斯特恩被开除了党籍，而且被流放到阿克莫林斯克去了。1937年斯大林亲自指示把斯特恩抓了起来，斯大林宣布斯特恩是‘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哲学小组的领袖之一。斯特恩是1937年6月19日在列沃尔托夫监狱被害的。”③

安·亚·维辛斯基作为斯大林的吹鼓手，在法学领域里组织了同样的迫害运动。这种诬陷运动导致许多著名法学家死于非命（如叶·勃·帕舒坎尼斯等）。

人民教育及教育科学领域也形成了极其悲惨的局面。我国人民教育许多著名创建人之中牺牲的有：俄罗斯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M·C·爱甫斯坦、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委会成员M·A·阿列克辛斯基，他早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因为第九军扫盲工作成绩卓著

为此指控国防部长，他被判处一年徒刑，他逃往英国，得免于难。后来因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各派都利用这个案件，最后，于1899年9月被赦，1906年恢复名誉。

“贝利斯案件”是二十世纪初沙皇俄国政府制造的一个冤案。贝利斯是犹太人，1911年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男孩安·尤申斯基在基辅被害，黑帮党人把凶手藏了起来，利用这次被害事件，指控贝利斯出自宗教的仇恨，杀死了尤申斯基。案件调查了两年，沙皇政府利用这个案子，掀起反犹太运动，对犹太人进行屠杀。1913年俄罗斯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布尔什维克对这一冤案进行揭发，组织群众游行，抗议活动，高尔基和科罗连科等有名作家代表的知识界组织了专门的委员会，反对沙皇政府的反犹太运动。贝利斯终于被释放。——译者

② 见E·П·伏罗洛夫所保存的个人材料。

③ 斯特恩被捕时，按顺序应出版的大百科全书的卷次不仅付排了，而且已经完全印好了。出版的这一卷的主要条目之一是斯特恩写的《辩证唯物论》。那时，类似的事情是常常发生的，最后往往是把“人民敌人”的著述或者有他们参加编写的整本的书都全部消毁。但百科全书出版社却找到另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只换了一页，在《辩证唯物论》条目下面把“扬·斯特恩”改成“马·鲍·米丁”。这位未来的院士和《哲学问题》杂志的主编用这种办法不费什么劳动就在自己著作的书单上补充了一篇真正堪一引人注目的著作。

而荣获红旗勋章。象如下这样的人民教育阵线著名的教学法专家，科学工作者和组织者也牺牲了：阿·彼·平克维奇、C·M·加米涅夫、A·П·绍欣、M·M·彼斯特拉克、C·A·盖希诺维奇、M·B·克鲁平宁娜等。

1937—1938年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全被砸烂了，其中牺牲的不仅有教育部的许多工作人员，而且还有几万名普通的教师。

阿列克塞·加斯乔夫是有光荣革命经历、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被捕牺牲了。加斯乔夫是一位职业革命者，工人战斗队的组织者，他的代号“拉夫连基”是很有名的。同时他又是工人诗人，是《工人突击诗篇》的作者。十月革命后，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献给了当时的新的知识领域——劳动问题科学研究组织和职业教育。但是在加斯乔夫（及他许多助手）被捕后，他领导的劳动研究所也被关闭了，教育学、心理学及劳动问题科学研究组织的多少认真的研究工作都停止了。当然，他领导的中央劳动研究所的活动不是没有某些缺点和错误的。但是总的来说他的工作都是在列宁的基本指示的轨道上进行的，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一项工作。

苏联语言学和语文学也受到了重大损失。在牺牲的科学家当中有基辅语言学院院长H·M·西雅克，他1919年入党的时候列宁为他提供了保证。优秀的苏联语言学家和东方问题专家H·A·涅夫斯基也被捕身亡，他曾经解出通古斯的象形字。涅夫斯基的巨大学术著作《通古斯语言学》幸好还保存在苏联科学院的档案中。他的这一著作后来出版了，而且获得了1962年的列宁奖金。

其他科学领域也损失了许多很有才能的科学家。1937—1938年间被捕的人有：苏联科学院秘书长尼·彼·哥尔布诺夫院士，他过去做过列宁的秘书和人民委员会议及全苏劳动国防会议两个办公厅的主任；全苏地理协会学术秘书，著名地理学家H·Ф·波格丹诺夫教授；大百科全书出版工作领导人之一，经济学家加·伊·克鲁敏；经济学家И·H·巴尔哈诺夫；著名化学家И·Ф·尤什

凯维奇；研究北极地区的著名学者，全苏北极地区研究所的创建人Р·Л·萨莫伊洛维奇等。

土地问题的著名专家之一，老布尔什维克伊·阿·泰奥多罗维奇也被捕牺牲了，他是苦役政治者及流放移民协会[1]的会长。这一时期牺牲的人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А·В·奥金佐夫，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和经济学家А·Я·坎托罗维奇，劳动管理科学研究组织的专家，如О·А·叶尔曼斯基等等其他经济科学方面非常著名的或比较著名的活动家。土地问题研究实际上被摧毁了，它的研究机关也关闭了，它的领导人（如А·盖斯特尔，克里茨曼等）都被捕了。

436

自然科学领域的干部也遭到镇压和迫害，或用当时《苏联科学》杂志的语言说，被“尖锐的阶级搏斗”一把抓住了。我国几乎所有的领头的物理学家（伊·叶·塔姆，В·А·福克等）在报刊上遭到诽谤，称他们为“唯心主义者”和“敌对思想的走私犯”。许多物理学家，其中一些未来的院士都被捕了，如：阿·伊·贝格、Л·Д·兰道、П·И·卢基尔斯基，以及Ю·Б·鲁麦尔等等。苏联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М·П·布朗施坦也在大镇压年代牺牲了，现代物理学直到今天还时常要参考他的著作。他是1938年三十二岁时被枪决的。机械学最大的专家А·И·涅克拉索夫院士也被捕了。如下物理学家没有返自己的家，也没有回到工作岗位上，他们是：有名的理论物理学家В·К·弗雷德里克斯，机械学及数学物理学专家Ю·А·克鲁特科夫，年轻的理论家、伊·塔姆优秀学生之一С·П·舒宾，非直线性振荡苏联学派创始人之一А·А·维特，及物理学家И·Н·施皮利雷恩。

甚至象数学这样的科学里“阶级斗争”也非常尖锐化了。1936年夏天《真理报》刊登了两篇文章：《答卢津院士》和《关于披着苏维埃外衣的敌人》。在这两篇文章中著名的苏联数学家，当时最大的

① 该组织成立于地下党时期，革命胜利后，仍保存下来，其成员皆为曾在沙皇俄国从过军，被流放的老干部，他们写了很多回忆录和党史材料。——译者

莫斯科数学学派的创建人和领导者 H·H·卢津被宣布为整个数学战线上的"黑帮分子"、"反革命"和"暗害者"。整个莫斯科数学学派被宣布为反动的和资产阶级的，一些有名的数学家如：A·H·柯尔莫哥罗夫、穆·弗·凯利迪什、C·Л·索波列夫等人都属于这一学派。(但是卢津没有被捕，他仅仅受到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给与的警告处分。)

有些苏联科学家为免遭镇压流亡国外，他们出差外国时拒绝返回苏联。这些"拒不回国的人"中有：著名的化学家 A·E·契契巴宾院士、H·H·伊帕提也夫院士，遗传学家 H·B·季莫菲也夫-列索夫斯基等等。所以毫不奇怪，从三十年代后半期开始，斯大林已经最大限度地削减了苏联科学家出国的机会。 437

在恐怖时期生物学和土地学的命运尤其悲惨。一些大生物学家由于被指控为进行托派活动和间谍暗害活动都于1936年被捕了。苏联著名遗传学家之一，乌克兰科学院院士-秘书 И·И·阿戈尔教授被捕牺牲了。苏联医学遗传学最大的专家、医学遗传学研究所的领导人 C·Г·列维特也牺牲了。他领导的研究所停办了。有名的达尔文专家和自然科学历史学者 Я·M·乌拉诺夫斯基教授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捕的，现在已被彻底平反了的那些科学家也都遭逮捕。这一时期被提拔起来的年轻的农艺师特·杰·李森科利用了已经开始的大逮捕的机会大喊大叫地开展诬陷许多著名的生物学家和农艺学家的运动。李森科和他的最亲近的助手伊·伊·普列津特在生物学、遗传学和农业科学方面并没有很深的知识，他们也不懂得世界上科学里的巨大成就，但是他们用肆无忌惮的造谣蛊惑性的宣传，以及对自己科学方面的反对论者使用毫无根据的从政治上指控他们的办法用以补偿他们科学知识方面的不足。其结果就是大规模地逮捕和镇压生物学家及农业科学家们。

苏联列宁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亚·伊·穆拉洛夫院士被逮捕和枪决了。棉花、畜牧、农业化学、植物保护等研究所的领导人也

都作为“从事暗害活动”的领导人被镇压了。大科学家Г·К·迈斯特尔院士也牺牲了，在这以前不久还因科学上的贡献授与他列宁勋章。我国最大的生物学家之一Н·К·柯利佐夫受尽污辱后被撤了职，不久他就去世了。

438 上述这些科学家虽然遭到逮捕和迫害致死了，但是生物学方面的辩论并没有停止。这一争论还继续进行，但还是用那种不能允许的方式进行着，对科学家的逮捕也还在继续着。苏联最大的科学家之一、著名的育种学家、遗传学家和地理学家、我国农业科学的组织者、苏联列宁农业科学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尼·伊·瓦维洛夫院士于1940年被捕，1943年在狱中逝世。这是个人迷信时代苏联和世界科学的最重大的损失之一。瓦维洛夫的学生，杰出的科学家也都被捕了，他们的学术论文都是世界上有名的，他们之中有：Г·К·卡利也钦科教授、Г·А·列维茨基教授、П·И·哥沃罗夫教授、Н·В·柯瓦廖夫教授等许多人。（上述这些科学家之中幸存者只有Н·В·柯瓦廖夫。）

瓦·罗·威廉斯和他的一伙追随者在农业科学领域也进行了类似的迫害和从肉体上消灭自己科学上的反对论者的运动，他们密切配合了李森科和普列津特主要是在生物学方面的行动。结果是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有一批知名的农业科学家被捕了，他们被指控为从事暗害活动。1937—1938年期间由于批评农业的草田耕作制而被捕的人员名单中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名字。农业人民委员部轮作制局的许多干部，苏联计委的许多工作人员和全苏肥料研究所的许多领导干部和职员也都被捕而且牺牲了。苏联杰出的科学家、共产党员尼·马·土莱科夫，由于反对威廉斯的草田耕作制而被逮捕，他后来死在集中营里。普利亚尼什尼科夫院士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大化学家Ш·Р·秦查泽也牺牲了。

遭到重大损失的不仅有遗传学、育种学和农业化学，而且还有生物学的其它学科。例如，微生物学领域悲惨的事件连连出现。因受到诽谤诬陷的指控而遭逮捕的苏联著名微生物学家有：П·Ф·

兹德拉多夫斯基院士、B·A·巴雷金教授、O·O·加尔多赫教授、И·Л·克里切夫斯基教授、M·И·施图采尔教授。还有这样的一些微生物学方面的大学者：Л·A·季利别尔、A·Д·舍波尔达也娃、Г·И·萨佛诺娃等人也被抓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在狱中身亡了。诗人纳德松的哥哥、著名微生物学家Г·A·纳德松在北方的一个集中营里死去了。他被逮捕时已经是七十三岁高龄的人。

有名的布尔什维克和国内战争的积极参加者康·亚·梅霍诺申被逮捕而且牺牲了，三十年代中期他曾任海洋和渔业研究所所长。生物学家和植物学家A·A·米歇也夫在克累马河地区集中营被看守毒打致死。① 同时牺牲的还有：有名的生物学家И·H·菲利皮也夫，昆虫学家A·B·兹纳缅斯基、H·H·特罗伊茨基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

在镇压年代医学也受到重大损失。中央结核研究所所长、世界有名的肺痨学家B·C·霍利茨曼教授被捕牺牲了。有名的外科专家K·X·科赫教授由于在克累马河集中营没有完成开采黄金的定额而被枪决了。不过，并不是所有被捕的医生都在金矿上劳动。克累马河地区的一些医院按其拥有著名的医生的人数说都不亚于莫斯科的最好的医院。

*　　*　　*

苏联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有名的科学家、发明家和设计师，厂长及总工程师，和我国几百几千个企业的车间主任都遭到了沉重的镇压。

例如：以中央气体液体力学研究所所长H·M·哈尔拉莫夫为首的该所的大批工作人员被捕了。下述有名的飞机设计师也因诬陷的指控而被捕了：安·尼·图波列夫、B·M·佩特利亚科夫、B·M·米雅希谢夫、Д·Л·托马舍维奇、P·巴尔蒂尼、K·斯齐

① 克累马河集中营：位于伯力附近，为关押政治犯的著名的集中营，许多干部无辜地在这里受迫害致死。——译者

拉尔德、И·Г·捏曼。实质上，苏联航空科学的精华全都被关到监狱里去了。为了使新飞机的制造不致于停顿，内务部不得不建立一个特别监狱，即监狱-研究所（代号中央设计局——第二十九号）。在这里工作的除了上述飞机设计师外，还有这样一些有名的飞机设计师和飞机主件设计师：В·Л·亚历山大罗夫、Б·С·瓦赫米斯特罗夫、А·А·恩基巴梁、А·М·伊扎克松、М·М·卡奇卡梁、Д·С·马尔柯夫、С·М·马尔柯夫、С·М·美耶松、А·В·纳达什克维奇、А·И·普蒂洛夫、В·А·契热夫斯基、А·М·切列姆欣等。还有许多与飞机有关边缘学科杰出的工程师和专家（化学家А·С·法因什坦、工程师和教授Н·Н·巴津科夫、Б·А·萨乌克、И·Г·努罗夫、А·Р·波宁、Ю·В·科尔涅夫、Г·А·奥捷罗夫、Ю·В·卡尔加诺夫，等等）。这些飞机设计师和科学家只有部分在1940—1941年间被释放了，还有一部分人是战后释放的。许多人是苏共二十大后死后被平反的。

440

著名水利建筑专家И·帕尔-阿斯特瓦查特梁和В·契契纳泽，著名的桥梁建筑专家А·乔治瓦泽等也都遭逮捕。许多火箭专家也在三十年代末牺牲了，其中包括在当时还是屈指可数的第一批热心火箭事业的领导人，第一批火箭发动机的创建人——火箭科学研究所所长伊·帕·克莱麦诺夫和他的助手格·埃·朗格马克（朗格马克是著名的“卡秋沙”火箭炮的真正的发明人）。大家知道，不久前去世的苏联火箭总设计师谢·巴·科罗廖夫，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家和设计师之一，三十年代却因诬陷的指控而被捕过。审讯人员曾向科罗廖夫宣布说：“我们的国家不需要你们造花炮、爆竹的手艺，不需要你们的焰火，而且这些东西是有危险的。”科罗廖夫被弄到克累马河黄金矿作工，后来被转到“中央设计局——第二十九号”（后来他又调到另一个这样的研究所，在这些监狱研究所和设计局被监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把这些机构叫做“禁闭棚”）。直至战后科罗廖夫终于被释放。报纸上公布的谢·巴·科罗廖夫逝世前的病情通告中列举了他患有的许多严重的疾

病。毫无疑问，这许多疾病是起源于集中营时代的“勤杂劳动”。许多军械设计师和工程师也受到迫害。他们被从肉体上消灭的人有：几种武器的发明家 В·И·别卡乌里、苏联天才的坦克设 441 计师 В·И·扎斯拉夫斯基、尖端产品无后座力炮的发明家 Л·库尔切夫斯基，等等。对工农红军军械管理局许多科技部门的镇压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国防。大家知道，苏联早在三十年代初已经从事雷达理论的研究，1934 年已建立了观察飞机的第一批雷达站，这些雷达站就是建立在电磁波反映原理之上的。因此，1934 年可以称之为无线电探测的发明年。美国和英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从 1935 年才开始进行。1934 年末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列宁格勒工厂签订了第一个协定，建立五个用电磁探测飞机的试验站。而美国是五年后才签订同样合同的。

但是第一批雷达装置的发明家之一，工农红军军械管理局的总工程师、发明家 П·К·奥谢普科夫却于 1937 年 8 月被捕了。雷达探测工作的领导人 Н·斯米尔诺夫也被关进了监狱，防空管理局试验部的许多其他工作人员也被捕了。非常重要的防空研制工作都被推延了。因此，我军在没有雷达设备的情况下开始了卫国战争。探测法西斯飞机而使用的第一批雷达装置是 1941 年底从英国和美国购买的。①

茹科夫斯基学院附设的星际旅行协会的创建人莫·加·莱滕仁也遭迫害。还是 1936 年初的时候设计师 С·М·丹斯克尔就因受诬陷而遭逮捕，飞机制造特别设计局被关闭了，设计局附属的飞机制造试验生产以及飞机场的配套工程都停工了。从此，飞翼型的飞机（设计师是 Б·И·契拉科夫斯基）的研制工作就长期无法进行。

所有的主导工业部门都受到了重大损失。厂矿、联合企业、工 442 地、铁路的成百成千的领导人及总工程师被捕牺牲了。在这里可

① 见 П·К·奥谢普科夫：《生活和理想》莫斯科 1965 年版。

以提一提下面这些当时出名的人物：库兹涅茨克工程的领导人谢·米·弗兰克福特，德聂伯水电站工程领导人瓦·米·米哈伊洛夫，哈尔科夫拖拉机工厂厂长И·П·邦达连科，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公司工程领导人钦吉兹·伊里德雷姆，索里卡姆斯克钾类化工产品拖拉斯经理В·Е·齐伏利诺维奇，扎波罗热钢铁公司经理М·卢利叶，马克耶沃冶金厂厂长Г·В·格瓦哈利亚，高尔基汽车厂厂长嘉科诺夫，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厂长В·И·米哈伊洛夫-伊万诺夫，基洛夫(原普蒂洛夫)工厂厂长К·М·奥特斯，罗斯托夫农机厂厂长格列博夫-阿维洛夫，库兹涅茨克钢铁公司经理Г·П·布坚科，亚速钢铁厂厂长Я·С·古哥里，克拉马托尔斯克钢铁厂厂长И·П·赫列诺夫，索尔莫夫工厂厂长苏尔科夫和М·М·察列夫斯基，哈尔科夫拖拉机厂厂长П·И·斯维斯童，大型化学企业经理П·Г·阿鲁丘尼扬茨，Л·Т·斯特列日，页贵-乌拉尔铁路局局长Г·К·卡夫塔拉泽，塔什干铁路局局长З·Я·普罗科菲耶夫，奥德萨铁路局局长Л·Р·米尔赫。阿穆尔铁路局以及几乎所有其他铁路局的局长都被镇压了。白俄罗斯铁路局局长弗拉基米尔斯基的命运尤为悲惨。他得知卡冈诺维奇的副职Я·利夫什茨已经被捕之后，就先枪杀了他的妻子和儿子，然后自杀了。只有小儿子逃了出来。苏联各铁路局政治部的大部分的领导人也都被捕了(如Н·福金等人)。

工业方面镇压活动的规模，例如以下事实即可证明：冶金工业部门不仅冶金工业总管理局的几乎所有领导人被捕了，各公司、工厂及车间的多数领导人都被捕了。而且代替这些被捕的有经验的干部是新的没有经验的人，就是他们这些人中，也多数遭到了迫害。1940年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即一百五十一个主要大企业的领导人中有六十二人担任工作的时间还不到一年，五十五人只工作了一至两年；一百四十名总工程师中五十六人任职还不到一年等等。

443

为了进行比较，可以举这样的一个例子：1935年在整个重工

业人民委员部系统中只有五名经理（或厂长）调换工作，黑色冶金系统只有一位总工程师调动了工作。①

那时《布尔什维克》杂志在谈到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干部时自豪地写道：

“由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掌握的二百名大型机器制造厂厂长中，一百九十八名是共产党员，其中百分之十一是1917年以前入党的，百分之六十二是1917—1920年期间入党的。机器制造业绝大部分高级领导干部是无产阶级，他们曾经都是从事矿工、车工等的劳动的。现在他们正在领导着那些名列世界技术前茅的大企业。”②

但是到1939年这些大型机器制造厂几乎所有的厂长都被捕了，许多人已经不在人间，虽然他们都是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人。

1937—1938年电力工业、化学工业和轻工业及国民经济许多其它部门都遭到同样规模的镇压。这些镇压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对我国战前时期工业的发展起了阻挠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

八、对苏联文艺活动家的镇压

苏联的文学和艺术也没有能逃掉三十年代后半期的总的悲惨命运。 444

前面我们已讲到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初期各个文学小组之间的尖锐斗争。但是许多作家寄希望于拉普被撤销后建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可以结束各种形式的迫害和文学上宗派教条主义的限制。苏联作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几乎所有的发言中都可以感觉出他们满腔热情期待着这样的变化。但是这些期望没有能够实现。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代在越来越加强的官僚集权主义的

① 见《苏共党史问题》1964年第11期第72—73页。

② 《布尔什维克》杂志1935年第18期。

条件下，苏联作家协会的成立虽然有其好的一面，但同时就有可能加强对每一个作家的活动进行官僚主义的监督，对作家个人及对他的创作增加压力。协会内部和各文学小组之间的斗争也丝毫没有减弱。相反，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在文学领域里得到更多的机会和新的可能性进行活动。结果是：到1935年时文学上的辩论已采取非常生硬的方式，时常对待不同看法的人采取摧毁的方式，企图把他们从文学领域中赶出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提出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伊利亚·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戏剧工作者会议上整了塔伊罗夫和迈耶尔赫里德……电影工作者动手处理多夫任科和埃津施坦。文学批评家先揭发了帕斯杰尔纳克，扎波洛茨基，阿谢也夫，基尔萨诺夫，奥廖沙。正如法国人所说'越吃胃口越好'，所以很快把'形式主义的娇柔造作'的责任推到卡达也夫、费金、列昂诺夫、弗斯·伊万诺夫、利金、爱伦堡身上。最后一直整到吉洪诺夫，巴别利和库克雷尼克斯① 等人的头上。"②

1936年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件之后，作家中间被指控从事托派活动的人也开始遭到镇压。著名作家波·安·皮利尼亚克（斯大林早就要和他算帐）和年轻女作家加林娜·谢烈布里娅科娃都被宣布为"人民敌人"。苏联作家协会秘书长 445 B·斯塔夫斯基在莫斯科作家会议上说："我们当中存在着如谢烈布里娅科娃这样的死敌。我们同她相处如同自己同志一般，但我们没有辨认出她是敌人。我们的个别同志的警惕性丧失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他们连续许多个晚上都还在讨论她的作品。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帮助了敌人……现在我们开除了谢烈布里娅科娃这样的人。但是谁敢担保我们当中再不会有工人阶级的死敌呢？"③

谁也不能给作家担保，所以对他们如同对其他从事创作的知

① 库克雷尼克斯是苏联三个漫画家的联合笔名，他们三人的名字是：库普里扬诺夫、克雷洛夫和索科洛夫。——译者

② 《新世界》杂志1962年第4期第60页。

③ 《文学报》1936年8月27日。

识分子一样，不仅继续遭到逮捕，而且逮捕活动具有更加广泛的性质。

1936—1939 年被逮捕和被从肉体上消灭的作家无法一一列举。根据某些统计数字说明：这几年被捕的作家有六百多人，即作家协会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

苏联杰出的作家伊·埃·巴别利被抓了起来，他于 1941 年死于狱中。

另一名优秀的苏联作家布鲁诺·雅先斯基也在狱中身亡。杰出的俄罗斯诗人奥·曼德尔施塔姆于 1938 年再次被捕而且不久就饿死在苏昌了。牺牲的作家、剧作家、诗人、评论家们有：阿尔乔姆·维肖雷、В·И·诺尔布特、谢·特列季亚科夫、亚·古里奇、伊·卡达也夫、И·М·别斯帕洛夫、波·科尔尼洛夫、Г·尼基福罗夫、Н·А·克柳也夫、维克多·金、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М·洛斯库托夫、弗尔伏·埃尔利赫、Г·О·库克林、马·格拉西莫夫、尼·克·古贝尔、В·基里洛夫、Н·Н·扎鲁金、Р·瓦西里也娃、Г·Е·哥尔巴切夫、弗·米·基尔松和列·列·阿韦尔巴赫。天才诗人帕维尔·瓦西里也夫被枪决时只有二十六岁。А·Я·阿罗谢也夫是 1917 年莫斯科武装起义的积极参加者，后来他把肩上的枪换成了手中的笔，他也在这些年代牺牲了。有些被捕的文学家，他们是经过长期监狱生活后的幸存者，如：А·К·列别坚科、阿·科斯捷林、А·С·果列洛夫、С·斯帕斯基、А·В·马克多诺夫、Н·扎波洛茨基、И·М·格龙斯基、В·Т·沙拉莫夫、叶·德拉勃金娜。苏联著名的女诗人奥·别尔戈利茨被捕后关了两年。苏联文学界杰出的活动家亚·康·沃龙斯基死于狱中，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曾公正地称他为“我们的艺术界或者说是科学艺术共产主义世界的最有文化、水平最高的代表人物之一。”苏联的一位最大的文学家Ю·Г·奥克斯曼也被捕了，但是他活了下来。

著名作家，政论家和党的工作者米哈伊尔·柯尔佐夫在从西班牙回来不久，于 1938 年 12 月被捕而且被处决了。

共和国的作家组织也受到重大的损失。在乌克兰牺牲的有：苏联大作家伊·康·米基坚科，乌克兰作家协会书记、作家叶平，作家В·П·博宾斯基，剧作家М·库利什，等等。在白俄罗斯被捕的有：诗人З·阿斯塔片科、Ю·塔乌宾、作家普拉顿·哥洛瓦奇、Г·哥尔特内、В·И·哥卢波克。在亚美尼亚牺牲的有：亚美尼亚伟大的诗人叶·查连茨，亚美尼亚苏维埃文学创始人之一、亚美尼亚诗词中反映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优秀代表人物、杰出的共产党员作家阿克塞里·巴孔茨。有些作家被捕了，但幸存下来的有：古尔根·马阿利、瓦吊·托托文茨、阿拉赞、В·诺连茨、姆克尔蒂奇·阿尔缅。

格鲁吉亚文学也遭到重大损失。苏联名作家季齐昂·塔比泽被逮捕而且死于非命了。格鲁吉亚大诗人帕奥洛·雅什维里几次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叫去谈话后自杀身亡了。散文作家М·贾瓦赫什维里、Н·米齐什维里，批评家П·基科泽也都牺牲了。造诣很高的文学批评家别尼托·布阿契泽当时只有三十二岁也被害死了。

阿塞拜疆被镇压的作家有：Т·沙赫巴兹、В·胡鲁伏鲁、鲁·阿洪多夫、古塞恩·贾维德、谢伊德·古塞恩，等等。

在哈萨克斯坦杰出的作家，哈萨克斯坦苏维埃文学的创始人之一萨肯·塞福林被捕而且牺牲了，牺牲的还有知名作家И·姜素古罗夫和В·麦林。

几年前苏联各界纪念了杰出的鞑靼作家加·伊布拉吉莫夫。苏联共产党鞑靼州党委第一书记Ф·塔别也夫在《消息报》上写道："加利姆江·伊布拉吉莫夫的名字象一颗明亮的星照耀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史上，他是杰出的鞑靼作家和革命者、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加·伊布拉吉莫夫作为国家活动家、宣传家、新闻工作者、作家在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创建上，在新文化和人民教育的创建上都起了巨大的作用。"① Ф·塔别也夫不知为什么

① 《消息报》1967年3月16日。

没有提起加·伊布拉吉莫夫在三十年代末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枪决了。和他同时牺牲的还有以下鞑靼作家：K·廷丘林、K·纳德日姆等。

其它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年轻的文学家也遭到同样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牺牲的人有：乌德摩尔梯文学创始人德米特利·利列帕诺夫-克德拉，米哈伊尔·柯诺瓦洛夫，契尔克斯文艺散文的奠基人马可麦特·德舍科夫，那乃族第一个作家、那乃地区执委会第一任主席波·霍杰拉，马里族诗人伊帕伊·奥雷克，马里族文学批评家И·T·柴凡，第一批布里亚特作家茨·东，伊·达姆比诺夫，以及切禅文学创始人萨伊德·巴杜也夫。看来，巴什基里亚作家阿·加·阿曼泰、萨·加利莫夫、吉·达夫列特申、伊·纳斯里，哈卡斯族作家瓦·科比亚科夫，犹加吉尔作家奥杜罗克，都是被处决了。亚库梯苏维埃文学奠基人、亚库梯自治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普拉顿·奥伊翁斯基死于狱中。可怕的恐怖时期牺牲的作家名单还可以写出好几页。

杰出的匈牙利诗人、作家安达尔·吉达什也在苏联被捕了，但经过十七年的艰难的监禁生活幸运地活了下来。

当然，在个人迷信时期受迫害的这些苏联作家，从才能方面，从对待苏联现实态度方面说，他们之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包括共产党员作家，所谓的“同路人”作家，以及在三十年代中期对苏维埃政权持观望甚至持批评态度的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许多文学家和文学小组过去犯过严重的错误，思想上产生过动摇，他们在创作和个人问题上都出过毛病。但无论如何这一切错误都不能构成什么“罪行”，正如今天最高法院为这时期受迫害的文学家平反的决定中所写的那样。上述多数作家和诗人写的书现在都已经再版并受到苏联人民的欢迎。然而这些悲惨地牺牲了的人们曾构思想写的那些书，是任何人都没有可能予以出版，他们大多数人牺牲时还不到四十岁。此外，这些作家已经写出来的，但还没有发表的著作也不能与读者见面了，因为他们被捕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机

构把他们的全部手稿都没收而且销毁了。

布鲁诺·雅先斯基1938年在狱中写的一首诗有力地反映出这些诚实的苏联作家经受的可怕的、毫无意义的悲剧。

“战争的狂风
在全世界的上空怒吼，
这讨厌的咆哮
惊搅我祖国的疆土，
我呵！我这关在监狱石墙内的囚徒，
此时此刻，
不能置身在祖国儿女的队伍……

从那依稀可辨的如丝的电线上，
我听到：德聂伯河心脏的跳动；
我听到：钢铁生产的新成就；
我听到：那马格尼特工地上
　　　　小火车的歌唱、奔跑……

共产主义不朽思想的承宣吏①
传颂着我们时代的伟绩，
可是我呵！坐在铁窗之下，
试问可能有比这更荒唐的境遇?!

然而，我并不责怪你，
祖国呵——我的母亲！
我知道：
　你能说服你的儿女，
　不再去相信那些胡言乱语，
　你能说服他们

① 古代发布国家消息的官吏。——译者

不再把我的歌声，
当作长剑折毁。

我的歌呵！
你和飘扬着红旗的队伍
　一同前进吧！
不要悲泣我和你相聚那么短促，
不要悲泣我们命运里蒙受的侮辱，
或迟或早，总有一天
祖国会发现她自己的谬误！”①

其它一切从事创作活动的组织在三十年代后半期也遭到镇压。许多著名的演员、画家、电影和音乐工作者、建筑师这时被捕了。

例如，在国内战争期间领导敖德萨地下斗争的神奇的女布尔什维克叶列娜·索柯洛夫斯卡娅在莫斯科被捕，不久被枪决了。三十年代中期她任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艺术指导。才华横溢的电影工作者А·И·彼奥特罗夫斯基在列宁格勒被捕而且牺牲了，他是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剧本创作部的领导人。著名新闻电影和新闻摄影专家А·Ф·多尔恩被捕了，在1917年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他拍摄了十月革命的现场纪录影片。

弗·埃·迈耶尔赫里德的牺牲对我们文艺界的损失尤为沉重，他是杰出的苏联导演，1918年入党，把毕生心血全部献给新的戏剧事业，他称这种新戏剧是“和时代共鸣”的戏剧。

大家知道，对迈耶尔赫里德的诬陷早就开始了，而且为此创造了一个新术语，称之为“迈耶尔赫里德思想”，当时党的决议里也可看到这一“术语”。1936年，对迈耶尔赫里德的诬陷已经是开足马力在进行了，导演的反对派利用了他的一些探索和个别错误进行

① 布·雅先斯基：《纪念雅库布·舍里》（诗集）莫斯科1962年版。

投机。但是迈耶尔赫里德并不想认错。例如，1936年在那次为讨论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和整迈耶尔赫里德而召开的文艺干部的会议上，这位伟大的导演坚决反对了对艺术上现实主义的那种过于狭窄的理解。他尖锐地驳斥了那种给戏剧艺术规定一个高度的作法，他反对把莫斯科艺术剧院作为这个高度的唯一的样板。迈耶尔赫里德坚决反对对剧场活动建立什么"预防监督"。他说："应该知道，戏剧是大家的热情充分发挥的地方，是活的创作事业。应该给我们自由！自由！"①

但是对他的迫害还在继续进行着。在"上面"的倡议和领导下召开了戏剧工作者全体大会，对戏剧界领导人迈耶尔赫里德及其创作方法群起而攻之。大会决议中写道："大会最坚定的回答说：苏联观众不需要这样的戏剧。"②迈耶尔赫里德剧院于1938年1月被关闭。一年以后这位优秀的戏剧和社会活动家被捕而且从肉体上被消灭了。这正是他的活动全盛时期，我国年轻一代最优秀的部分正象追随马雅科夫斯基一样，都是紧跟他工作的。据说，他是在受了极其严酷和恶毒的非刑之后死去的。

苏联的另外一个杰出的导演，"乌克兰的迈耶尔赫里德"——列希·库尔巴斯也被捕了。在监狱和集中营里监禁的还有以下戏剧家、导演和演员：桑德罗·阿赫麦捷里、伊戈尔·其连齐也夫、К·埃格尔特、И·普拉沃夫、Л·韦尔巴赫夫斯基、米·拉法利斯基、娜塔利娅·萨茨、利亚多夫，以及乐队指挥叶·米克拉泽。演员阿列克塞·吉科依在三十年代末也被捕了。但是1941年他被释放了，以后他就扮演斯大林，只是台词里没有斯大林本人说话时的口音。

从国外回国的苏联的名画家В·И·舒哈也夫也被捕了。被捕的还有列宁格勒人像画家沙拉波夫。这位作家为了给"领袖"画像曾被召到莫斯科去。斯大林给沙拉波夫摆了两次姿势，但画了

① 《文学报》1936年3月15日。

② 根据文化史学家Л·М·扎克的材料。

两次后沙拉波夫就被捕了。大概这是因为斯大林不喜欢他画的草稿，因为草稿上他的一只手患痹痿症的毛病看得太明显了（而斯大林一生都掩盖着自己的这个毛病）。

1937—1938年间中央、共和国和各州的多数报刊编辑也都身亡了：《莫斯科晚报》编辑格·叶·策平，《莫斯科工人报》编辑 Д·В·安托什金，《文学报》编辑波罗特尼科夫，《东方曙光报》编辑 Д·勃拉根斯基，《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萨·马·扎克斯，《无产阶级真理报》(基辅）编辑 Е·С·库西利曼，《贫农报》编辑 Н·И·斯米尔诺夫，《红色克里米亚报》编辑 С·莫多诺夫，《太平洋报》编辑 А·В·施韦尔等许多人。当然，按当时的习惯作法，各编辑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和记者也同总编辑一起都被关进监狱。

九、对人民各阶层的大规模镇压

在本章的前几节里我们只提到大约为数一千名高级的和最有名望的国家和党的活动家、军事将领、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但是在我国的大镇压运动并不仅仅限于逮捕党、国家和军队系统中的最高级人员。这些镇压的规模异常广泛，涉及到中下层大量的工作人员，并毫无例外地在各阶层中进行。

首先遭到不幸的是几十万普通党员，使党的队伍明显地缩小了。

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共有二百八十万零九千正式党员和候补党员（其中候补党员九十多万人。在正常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候补党员应在十七大和十八大之间被转为正式党员）。1935—1936年期间停止吸收党员，直至1936年11月才又开始吸收党员。从这时起到1939年春天，按党内统计，新吸收的候补党员共一百万多一点（其中三分之一应在十八大以前转为正式党员）。五年内（1934—1939年）在更换党证时，可以估计，因各种各样个人原因及在当时为数不多的因自然死亡而离开了党的约三、四十万人。就

是在经过这种淘汰的情况下，到1939年初我国的党员和候补党员人数应该不少于三百五十万人，其中正式党员不少于二百六十万人。可是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只代表了二百四十七万八千正式党员和候补党员（其中正式党员只有一百五十九万）。党的队伍如此大的减员只能用三十年代大规模的镇压来解释。这样，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两年里，在大镇压运动中逮捕和被杀害了的共产党员的人数就超过了整个地下斗争年代，三个革命及五年战争时期党员的总数。损失最大的是我党的老党员，这就大大影响了党的代表大会的构成。例如：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约百分之八十的代表是1920年以前入党的，而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这样的代表只有百分之十九。年轻的党内知识分子是我党的希望和未来，他们也受了很大的损失。

非党群众所受的损失更大，其中有普通的工人、农民和职员。例如，根据列·马·波尔特诺夫证实，莫斯科电力厂被镇压的人有千人以上，其中不仅有企业领导人，还有许多普通职员和工人突击手。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在镇压高潮时期每周都要丧失许多工作人员：车间主任、工程师、斯达哈诺夫工作者、职员。① 莫斯科地下铁工程的集体中几十名领导人，成百的工人和职员遭到镇压。在其它几千个企业里也出现同样的毫无道理的毁灭人的行动。而且，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首先逮捕那些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美国和德国工厂里实习过的工人、工程师和职员。

453 苏联农村也受了很大的损失。亚·伊·托多尔斯基在监禁时遇见北高加索粮食收购公司的基层工作人员。那位同志告诉托多尔斯基，说在他被捕的那天夜里，同时逮捕了区里的二百名积极分子，他们都临时被关在区里的拘留所里。不过，被镇压的不仅有区里的积极分子，而且还包括许多普通男女农民。叶·谢·金兹堡在她的回忆录里讲到一位年老的集体农庄女庄员，她被指控为托

---

①《基洛夫工厂史》莫斯科1966年版第535—542页。

洛茨基分子。老太太还以为说她是拖拉机手就努力证明说农村里不让老年人当拖拉机手。白俄罗斯党的干部 Я·И·德罗宾斯基在他的尚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一个年老的集体农庄庄员坐在我们牢房的角落里。他已瘦得可怕，他从自己的那份面包中，每次都留下一块给他那出庭作证人的儿子。这个强壮的农村小伙子不知是经不起毒打和侮辱，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他供出自己的父亲曾劝他打死集体农庄主席。老头子矢口否认这样的指控，因为良心不允许他说谎。任何非刑拷打都没有使他动摇。他去跟儿子对质的时候还是坚持要说真话。但是当他看到被折磨得不象样子、遍体鳞伤的儿子时，他内心里不知什么东西使他屈服了，他对侦查人员及儿子说：对，我证明是事实，伊留沙，你不要怀疑，我证明你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他马上在对质的记录上签了字……老头准备在法庭上和儿子见面，为此他每天留下一块面包，去法庭的时候他就非常迅速摆脱哨兵，把这几块面包交给伊留沙。于是，伊留沙忍受不住了，他跪倒在老头面前，撕下胸前的衬衣，大哭大叫又是呻吟地说：'爹爹，请原谅我，我供了你，原谅我吧。'老头子嘟嘟囔囔不知说了些什么，一面抚摸儿子的头，儿子的背……哨兵不知如何是好，甚至连见过世面的法官大为震动。他们拒绝审判老头和他的儿子。但是案子还是没有撤销。老头还是留在监狱里了。牢房的内行认为，案件被交给特别会议解决。老头一直一句话都不说，还继续把自己少得可怜的一份面包留下来，等'和伊留沙见面时'交给他。象这样的悲剧真有成千上万"。

454

在这里还应该提一提 1937—1938 年几乎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小案件"公开"审讯的浪潮。

当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著作中提到三十年代"公开"审讯时，人们都认为这首先是指 1936、1937 和 1938 年对原反对派领导人的莫斯科诉讼案件。

这些审讯是一场戏，列席的不仅有苏联各界的代表，而且还有几十名外国记者。被告人的供词，起诉人和辩护人的讲话等等都

被登在苏联的报纸上，而且在国外报刊上也广为登载和讨论。

但是只有少数人知道，在那些年代不仅在莫斯科举行了“公开”的审讯。几乎每一个共和国、州和地区都进行了“自己的”“公开”审讯。而这些“地区性”的“公开”审讯一般不在中央刊物中登载，但在州和区的报刊上都作了详细的报道。除了“公开”审讯外，地方上还举行了各种秘密审讯。某些秘密审讯报纸上没有发表任何消息，但对另一些秘密审讯地方报纸却也作了详细的报道，登载了起诉结论和判决。（显然，大部分情况，逮捕和判决都未经过任何法律手续。）

例如，几十个州的几百个区都在1937年下半年被卷入“公开”审讯的浪潮。表面上这些案件都是公开审理的并且有许多证人出庭。被告人有集体农庄庄员，有地区党的骨干。几乎所有案子的名称都是“千篇一律”的。或者称“某某区反苏暗害小组案件”或者说什么“某某区集体畜牧业右派-托洛茨基暗害分子案件”，或者报纸上写着“某某区右派-托洛茨基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案件”。当然，也还有其它一些名称。

455

通常，对“人民敌人”地区性的审判是由有关的州法院特别委员会在州检察长参与下审理的。州和地区的报纸登载与案件审理有关的材料。

这些案件的特点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犯都是担任同一职务的人，这就说明在中央某处有一个预先制定的统一计划。例如：在“反苏暗害活动”案件中被指控的人都是：党区委书记、区执委会主席、土地部主任、机器拖拉机站站长、集体农庄的一两个主席、总农艺师和土地部的农艺师、总土地整理员。

在暗害集体畜牧业案件中被指控的人都是：党区委书记、区执委会主席、土地部主任、区的畜牧师、总兽医、集体农庄一两位主席。在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案件中被指控的人都是：党区委书记、区执委会主席、土地部主任、农业品采购部全权代表、税收视察员、国营农场一两位主席、集体农庄一两位主席。同时，“公开”审理的案

件一般是在那些农业生产指标低于区平均水平的那些区里。几乎在所有的区里起诉的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公式：由某州的一个领导干部把区党委书记招募进一个什么反革命组织，这个书记又在他领导的区里组织反革命暗害组织。然后把集体农庄及国营农场工作中的一切缺陷（迟收庄稼，耕地质量低劣，牲畜死亡，缺乏饲料。）都被作为这个组织的反革命活动，而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为了造成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 458

1937年末列宁格勒州赤卫队区的一个案件在这方面是非常典型的。列宁格勒州法院特别委员会在州检察长波·巴·波捷恩参与下在区里审理了这个案子，受审的人是：区党委书记 И·В·瓦西里也夫，区执委会主席 А·И·德米特利钦科，土地部主任 Ф·И·曼宁恩，机器拖拉机站站长 С·А·谢苗诺夫，总土地整理员А·И·波尔特诺夫和其他一些区的干部。他们受到如下的指控：1.为了达到危害国家的目的，他们把集体农庄破坏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多数集体农庄庄员的工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某些集体农庄庄员一工分能得到二十个戈比。2.在一切农产品的交售方面该区多数集体农庄都没有完成国家的定额。据起诉结论说，这一切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

区委书记瓦西里也夫在他的供词中承认区里集体农庄状况严重是事实，但是他坚决否认有任何故意破坏的行为，否认参加了什么反苏组织。其他被告人则完全"承认"了自己的反革命活动。在检察长波捷恩讲话之后（他赞同了起诉结论），宣布了判决：全体被告被判处枪决。

类似的案件审理在几乎所有州里都进行了。许多州除上述"千篇一律"的审理（三、四个区）之外还在三、四个区里进行了更为"专业化"的案件审理，例如对"粮食征购局"的干部的案件审理。受审的人有：收购站的站长，技术指导员，二、三个仓库管理员。这类案件有时也有州和共和国一级的。例如，1937年在明斯克食品工作者俱乐部里对粮食采购办事处的"暗害分子"进行了"公开"审

判。1937年10月23至28日在北沃舍梯自治共和国对达尔加夫
457 斯村领导人及集体农庄庄员进行了"公开"审判。农业劳动组合领导人的个别滥用职权行为被夸大到"人民死敌"的破坏活动的高度。共和国最高法院特别委员会指控被告人"对苏维埃政权、共产党、集体农庄持敌对态度"，甚至于指控他们参与了捏造出来的什么反革命的富农暴动组织。十三名被告中六名被判处枪决。[1]古比雪夫、沃罗涅什、雅罗斯拉夫等城市也进行了类似的审判。

1937—1938年许多州和民族共和国都对商业系统干部中的"暗害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受审的被告人有：区商业局局长、商业系统的领导干部、区委商业局局长或他的副职。通常他们都被指控为有意识地破坏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工作，以便造成劳动人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各州对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干部也进行了同样的审判。铁路系统"暗害活动"案件尤其多。例如，1937年5月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的巡回法庭在斯沃波德内市审理了阿穆尔铁路上发生的"托洛茨基间谍恐怖组织"案件。牵连此案的有四十六人被处决了。1937年6月4日斯沃波德内市又进行了第二次开庭审判，根据调查材料又有二十八人被处决了。一个月后，7月4日斯沃波德内市又进行了第三次开庭审判，被判处枪决的有六十人，1937年10月9日进行了第四次审判，被判处枪决的又有二十四人。这样，只是地方报刊公布的判决，仅在斯沃波德内一个城市里1937年几个月内被枪决的阿穆尔铁路的工作人员就达一百五十四人。军事委员会巡回法庭在哈巴罗夫斯克[2]，符
458 拉迪沃斯托克市[3]对远东铁路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类似的开庭审判。在这两个城市里被判处枪决的有一百多人。

有些州的那些发了疯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不仅指控成年人进行反革命和恐怖活动，而且还指控小孩进行这些活动。例

---

① 《北沃舍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奥尔忠尼启泽市1966年版。

② 即伯力。——译者

③ 即海参崴。——译者

如，在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克市，在市内务管理局局长A·T·卢尼科夫，处长 A·M·萨夫金，行动特派员 A·И·别洛乌索夫以及市代理检察长 P·M· 克利鲁等人参与下，逮捕了六十个十岁至十二岁的小孩，他们被指控建立“恐怖的反革命组织”。这些孩子在市的监狱里被关了八个月，同时还有一百多个孩子被“立案”审查。这种行为引起了全市劳动人民极大的愤怒，以至于在州有关组织的干涉下不得不释放这些孩子并给予“平反”，对上述内务管理局的干部追究了法律责任。①

三十年代末对各种宗教的教士也进行了极严酷的镇压。早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苏维埃国家对宗教界就给予了沉重的打击，首先打击了俄罗斯正教。有些镇压活动是因为当时的阶级斗争尖锐化引起的，因为教堂也牵连到这些斗争里面去了。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惩罚机构及苏维埃政权机构的行动已经时常远远超出苏维埃政权自己的利益需要的范围。几百座教堂和寺庙被破坏了，几十个修道院被取消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甚至追捕居士们，而且把他们关进集中营。许多城市连宗教建筑异常珍贵的古迹也给毁坏了。（例如：莫斯科人民捐献盖起来的耶稣救世主教堂，斯巴斯克修道院等都被破坏了。）1937—1938 年这些镇压活动还继续进行着，其实这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了。不仅许多普通教士被捕，而且许多主教，高级僧正和大司祭也被抓起来了。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从 1935 年起被捕的宗教人士有：八百多名正教和革新教高级僧正和各宗教几万名普通教士。人民当中影响很大的著名宗教活动家亚美尼亚大主教赫林一世-穆拉得庇扬就是这些镇压活动的牺牲者之一，他是 1937 年在他的府邸中被暗杀的。在战前，我国只剩下了几百个还进行宗教活动的教堂。 459

沙皇制度下建立起来的大批的监狱，现在对几百万被捕的人来说是太少了。许多城市都急忙建造起几十座新监狱，原来的修

① 见《苏维埃西伯利亚报》1939 年 2 月第 39—45 号。

道院、教堂、旅馆，甚至浴池和马房也都改建成监狱了。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以后那些特别出名的沙皇监狱，包括有名的列沃尔托夫监狱，都被改成革命历史博物馆了。在列沃尔托夫监狱的牢房里放着腊制的人，象征革命前这里曾被监禁的犯人。但是大规模镇压运动开始以后，这些腊制的模型被扔出监狱的牢房。这个监狱里不但关了许多活人，而且监狱安装了现代化设施和扩建了，此外还盖了一幢新的审讯大楼。三十年代末期，连克里姆林宫里面也为特别重要的犯人盖了一座不大的监狱。

全国各地，特别是在远东，北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卡累利阿，以比建设新监狱更快的速度建立起新的集中营。

1936—1938 年斯大林在政治恐怖方面创立了史无前例的纪录。

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在罗马苏拉政变时，被打死的元老、骑士和普通罗马人有几千人。

在暴君提比略、卡里古拉、尼禄① 统治期间又有几万罗马人被打死。

中世纪最残暴的宗教裁判官——西班牙的总裁判官托马斯·德·陀克维玛达，他曾使所有教会的刽子手们黯然失色，在他十八年“活动”中（1480—1498 年）活活烧死了一万零二百二十人，烧掉六千八百六十缺席的或已死去的异教徒及持异端思想模拟形象，判处了九万七千三百二十一人穿称之为“圣宾尼陀”的耻辱衣服，没收财产，终身监禁等。② 西班牙整个宗教裁判时期的牺牲者共三

460

① 古罗马帝国提比略、卡里古拉、尼禄王朝的三个皇帝，均以暴政、挥霍、放荡闻名于古代史。尼禄（37—68年）曾杀死母亲、妻子，并勒令他的老师塞涅卡自裁身死。公元 64 年罗马城遭大火，传尼禄有唆使纵火嫌疑，他乘机迫害基督教徒。他喜欢演戏，作诗，凡在这方面超过他的人，都遭到他的杀害。后因为作恶多端，各省人民反罗马益烈，又为元老院、近卫军所唾弃，穷途自杀。卡里古拉（37—41 年），提比略（14—37年）。——译者

② X·A·利奥连捷：《西班牙宗教裁判的批判历史》第 1 卷莫斯科 1936 年版第 200 页。

十四万一千人，其中被火烧死的约三万二千人。①

在法国一百年迫害新教徒时期，天主教打死了约二十万新教徒，其中几千人是惨死于那个有名的称之为“巴托罗缪之夜”的。②

伊凡雷帝的皇室直辖区制度使几十万人丧命，在这一制度最猖獗的时期莫斯科每天有十至二十人被打死。

在雅各宾恐怖时期，根据美国历史学家Д·格里尔的统计，由革命法庭判决而上断头台的共一万七千人。（在这一数字上还应该加上同样数量的那些没有经法庭而被打死的和死在监狱里的人。）因“嫌疑”被雅各宾关到监狱中的人的数字不明。历史学家认为，Л·雅科布公布的数字较为可靠约七万人。

俄国十九世纪，在一百年中由于政治原因被处死的有几十人，死在监狱里和流放地的“政治犯”有几百名（最多几千名）。

而斯大林恐怖的规模之大是无法比拟的。根据最谨慎的估计，1936—1939 年受迫害的政治犯不少于四、五百万人，其中至少五十万人很快就被枪决了（而被枪决的首先是负责干部），其余犯人被判处长期监禁。1937—1938 年镇压和枪杀活动是如此猖獗，仅仅在莫斯科有时根据法院判决枪杀的，一天就有上千人。1937—1938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内部监狱路比扬卡平均每天登记的执行枪决数字就有二百起之多。莫斯科火葬场的炉子整夜火化被处决犯人的尸体。这已不是鲜血流成的小溪，而是鲜血汇成的大河，这里奔流着诚实的苏联人民神圣的、纯洁的鲜血。往昔的任何暴君都没有对自己的同胞进行过如此规模的镇压，也没有消灭掉这么大数量人的生命。 461

① 此处手稿不清。——原出版社注

② 1572 年 8 月，胡格诺教徒的重要人物聚集巴黎，参加领袖那瓦尔王亨利的婚礼。23 日夜，亨利·吉斯以巴黎各教堂钟声为号，率领武装部队，屠杀胡格诺教徒二千人。那瓦尔的亨利因同意奉天主教幸免于死。这次惨杀历史上称为“巴托罗缪之夜”，因为 8 月 24 日正是巴托罗缪节。——译者

第 七 章

463

1939—1941 年期间的平反和镇压

一、叶若夫的撤职和贝利亚的任命

1937—1938 年巨大规模的镇压不仅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形势，而且也影响了国内政局和人民的情绪。在苏联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是或多或少的和镇压有关的。所有的监狱和集中营里都毫无例外地超额挤满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现有全部人员无法应付如此大量犯人的审讯工作和看守工作。需要改变这种状况。斯大林，这个会使用政治避雷器的能手，也懂得这点。

1938年初秋拉·巴·贝利亚被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无论在国内或在国外，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任命。但是对叶若夫及其最亲近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警报信号。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上层机构里开始作了一些人事变动。9 月底叶若夫的著名助手之一И·И·伊利茨基晚上坐小船划到莫斯科河中心，把身子探到船舷外边，往自己头上开了枪。

1938 年 11 月 17 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逮捕、检察和审讯》的秘密决议。该决议提出“整顿”惩治机关工作的任务。

464 1938 年 12 月 8 日，莫斯科报纸的最后一版上在“新闻简报”栏里登载了简短通知：尼·伊·叶若夫因本人请求免除内务部人民委员职务，保留其水上运输人民委员职务。这一通知后的几个星期里叶若夫还没有被捕，甚至于在 1939 年 1 月 21 日和斯大林

一起出现在大剧院举行的盛大纪念会的主席团的席位上。但不久叶若夫失踪了，他的名字就永远没有因为某种原故在任何报纸上出现过，可是《真理报》曾断言，叶若夫是“人民的宠儿”，具有“极高的警惕性，铁一般的毅力，非常敏锐的无产阶级嗅觉，异常的组织天才和超群的才智。”

现在我们知道，叶若夫是1939年初被捕的，被指控企图暗杀斯大林和篡夺我国的领导权。老布尔什维克巴·伊·沙巴尔金（1965年去世）对本书作者讲了以下有关叶若夫的情况：“……我从索洛维茨克监狱再一次转到布蒂尔卡监狱进行复审，这时我和当时知名的党的工作者德·布拉托夫关在一间牢房里。布拉托夫拒绝作交待并要求叶若夫本人来讯问他。（几年前布拉托夫和叶若夫同是中央两个不同的部的领导者，他们又是邻居，经常互相作客。）1938年秋天，布拉托夫第五次被提审。墙上的门突然敞开了，叶若夫走进审讯员的办公室里。他问审讯员：‘怎么样，布拉托夫交待了吗？’审讯员答：‘一点也没有交待，总委员同志。’叶若夫说：‘那么，你们就好好地收拾他一顿’，于是又从进来的那个门走出去了……此后，布拉托夫几次挨打，但后来似乎把他忘记了。几个月后，在1939年，布拉托夫又被提审了，他一昼夜多没有回牢房。回来后，他倒在床上大哭起来。过了两天他才告诉我（沙巴尔金），他被带到另一个监狱里，进了审讯员办公室并看到了叶若夫，他已经被捕监禁。这是一次对质。叶若夫用单调的无所谓的声音开始讲他如何企图排除斯大林并篡夺国家领导权，布拉托夫是他的组织成员之一，为了‘更好的保存’他，他们决定把他放在布蒂尔卡监狱里。布拉托夫当然拒绝承认这一诬陷，但是叶若夫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几小时审讯后叶若夫被带走了，布拉托夫被汽车带到列佚尔托夫监狱，逼他脱光衣服后带到地下室去。他在那里看到另一个脱光衣服的人，他认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局长。布拉托夫问：‘要对我们干什么？’这位不久前还是叶若夫的战友很了解这类事情，他回答：‘显然是要枪毙。’但是几小时后，布拉托夫被从

465

地下室叫上去，给了他衣服又把他送回布蒂尔卡监狱。布拉托夫是过了一段时间被枪决的，叶若夫是在比这次还早就被枪决了。”

根据A·B·斯涅戈夫的说法，叶若夫是1940年夏天被处决的。最后几个星期他被关在莫斯科市郊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监狱——苏哈诺夫监狱里，这里关的都是特别“重要的”“人民敌人”。有名的细菌生物学家П·Ф·兹德拉多夫斯基1940年春天也关在这里。负责他案件的审讯员指给他看一个小教堂的窗户对他说，那里关的就是尼·伊·叶若夫“本人”。（大家知道，当时人民中传说，叶若夫得了精神病，关在精神病院里。显然，这些谣言都是有意传出去的，因为由此可以看出这是对大规模镇压的一种解释，同时这些谣言又是政治避雷器，使人们产生各种各样的幻想。）

代替叶若夫被任命为内务部人民委员的是拉·巴·贝利亚。这无疑是“叶若夫传统”的称职的接班人和继承者。贝利亚从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从早期活动时起，他就是可以干出任何罪恶勾当的毫无原则的致力于功名利禄的人。贝利亚作为巴库苏维埃城市公用事业住宅部的一个很不显眼的视察员开始，走上他的可怕的升官发财之途。冒险家巴吉罗夫在国内战争期间吸收他参加了契卡机构的工作。那时苏维埃政权在高加索还不太牢固，所以毫不奇怪，象贝利亚这样的人会想方设法在局势有所变化时保住自己。正如1953年对贝利亚审讯时搞清楚的那样，他早在1919年就和“平等党特务组织”① 建立了联系，1920年又和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暗探局建立了联系。1921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务部的部长米·克德罗夫在检查阿塞拜疆契卡工作时（契卡主席是巴吉罗夫，副主席是贝利亚）发现，贝利亚不知是什么原因释放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然而却判处了一些无辜的人。克德罗夫怀疑这是叛卖行为，所以通知了在莫斯科的捷尔任斯基。克德罗夫在信中建议把贝利亚作为不可信任的人予以撤职。但是不知为

① 平等党为阿塞拜疆1912—1920年反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后来亦称穆沙瓦特务组织，因为内战时期，它已变成了英国资助的特务组织。——译者

什么这封信当时没有收到效果。①

二十年代后半期，贝利亚被调到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他耍尽阴谋和干尽了罪恶勾当，爬上了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职位，后来又成了整个外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

1931年以前斯大林自己并不认识贝利亚。当然，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外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人贝利亚的名字。他也无疑知道贝利亚和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拉·卡尔特维拉什维里之间的敌对关系，也知道巴吉罗夫对贝利亚的庇护。斯大林也可能会从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泽那里听到对贝利亚的尖锐的评价。高加索的许多布尔什维克和一些高加索人（谢·奥尔忠尼启泽、Г·阿里哈诺夫、А·汉德然等）和贝利亚见面时都不打招呼。

根据А·В·斯涅戈夫的说法（他在1931年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组织部部长），斯大林和贝利亚是在下述情况下认识的：

467

1931年夏天，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突然收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斯大林休养和治疗的专门决议。这次休养的组织工作，找房子等交给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很快就决定斯大林在茨哈尔图博市休养和治疗。斯大林的警卫工作交给了贝利亚。这时贝利亚开始非常积极地活动起来了，他派了许多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到茨哈尔图博，并且亲自领导了警卫团的工作达一个半月之久。在这几个星期内经过和贝利亚多次谈话，斯大林看出他是“有用的”人。

9月底或10月初斯大林回到了莫斯科。但是他没有忘记贝利亚。不久梯比里斯（梯弗里斯）收到指示，要求外高加索边区委

---

① И·维克托罗夫：《地下工作者·战士·契卡》1963年版第81—83页。关于拉·贝利亚早期的政治生涯还有一些其他材料。有的材料说，贝利亚在平等党的警察局（而不是在侦察机关）工作时，表示愿为布尔什维克地下委员会工作，条件是加入党。这件事是和米高扬协商的，贝利亚被吸收入党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米·克德罗夫的信没有得到结果。

员会和外高加索三个共和国准备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汇报。但是并没有指明汇报的内容。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和三个共和国中央常务局的全体成员都到莫斯科去了。主持政治局的是拉·卡冈诺维奇。斯大林当然也在场，而且显然很不高兴。第一个汇报的是拉夫连基·卡尔特维拉什维里。接着是Г·达夫达利阿尼代表格鲁吉亚中央作汇报，弗·波朗斯基代表阿塞拜疆中央，А·汉德然代表亚美尼亚中央作汇报。不知为什么谢尔哥·奥尔忠尼启泽没有出席会议。А·В·斯涅戈夫问了坐在旁边的人，他回答说："谢尔哥为什么要来参加贝利亚的加冕礼呢？他早就认识这个骗子。"

在外高加索来汇报的人讲话以后，斯大林发言了。他发表了长篇讲话。斯大林首先讲了外高加索的民族政策、棉花和石油生产。讲话快结束时他转向了组织问题，而且突然提出要贝利亚担任外高加索边区党委第二书记，即拉·卡尔特维拉什维里的最亲近的助手。许多人惊呆了，卡尔特维拉什维里高声说道："我不能和这个招摇撞骗的人一起工作"。诚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了卡尔特维拉什维里，其中就有弗拉基米尔·波朗斯基，他不知从什么样的派别利益出发，当时正向贝利亚暗送秋波。但是外高加索边区党委员会多数委员反对了斯大林的建议，因为在这以前贝利亚在格鲁吉亚党组织内的名声很坏。斯大林对这样的反应十分生气。他红着脸怒气冲冲地说："好吧，我们通过工作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会议结束了。

468

外高加索边区党委员会常务局成员会后直接去奥尔忠尼启泽的住处。他在家里，心情很沉重。大家问谢尔哥，他为什么同意提拔贝利亚，他怎么能再回梯弗里斯。谢尔哥本来想转个话题，但后来忍不住了，说："我早就告诉斯大林，贝利亚是骗子，但斯大林不听我的，谁也不能说服他。"

就在第二天，按"工作程序"通过了关于外高加索边区党委员会领导组成和常务局多数原成员命运的决议。拉夫连基·卡尔特

维拉什维里被调到西西伯利亚任边区党委第二书记。外高加索边区党委会第二书记 А·И·雅柯夫列夫被任命为《东方黄金》托拉斯经理。Г·达夫达利阿尼被派到红色教授学院去学习。А·В·斯涅戈夫被派到伊尔库茨克作党的工作。马米雅·奥拉赫拉什维里被任命为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贝利亚为第二书记。过2—3个月后贝利亚被选为格鲁吉亚中央第一书记，不久成为外高加索联邦的第一书记。马米雅·奥拉赫拉什维里被召回莫斯科，被任命为马恩列研究院的副院长。在贝利亚转到格鲁吉亚作党的工作不久，那里就开始大批更换党的干部。这时各区的内务管理局的三十二名领导人担任了各区的党委第一书记。

贝利亚牢牢记住了谁反对他被提拔为外高加索党组织的“领导人”。他在1936—1938年期间对这些人进行了报复。有些原高加索的工作人员（拉·卡尔特维拉什维里、马·奥拉赫拉什维里、Е·阿斯里别科夫等）在大镇压年代里专门从莫斯科，甚至从远东带到梯弗里斯受审，并在贝利亚直接领导下受到特别恶毒的刑讯。469 不过，在这以前，于1932—1935年期间被斯大林提拔和支持的贝利亚就对外高加索党组织简直是实行镇压，残酷迫害那些不合他心意的人，而且使用了那些不诚实的，不正派的，但是会阿谀奉承的干部。贝利亚酗酒纵饮，淫荡无度。他目无法制，不择手段，当时就已经不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而且是一个刑事犯了。

也许，这个未来内务部人民委员的这些品质对斯大林是保秘的吗？不是，完全不是这样。我党许多著名活动家，如：奥尔忠尼启泽，奥拉赫拉什维里等人多次提醒过斯大林，表示过对贝利亚政治上不可信任。

在中央2—3月全会上格·卡明斯基的发言中也包含着对贝利亚的否定评价。

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在外高加索就流传着贝利亚和平等党分子有着老关系的说法。根据Е·Д·果戈别利泽的证实，早在1933年列凡·果戈别利泽同拉科巴就谈过这个问题。外高加索党员知

识分子中间流传关于贝利亚愚昧无知的事，当时说，"古登贝格时代"以来的书他一本也没有读过。外高加索党组织许多干部写的揭发贝利亚的罪行及道德败坏的信件和通报也都送到了斯大林手里。但是斯大林不仅不指责贝利亚，相反，虽然他自己本性多疑，但仍然把贝利亚这个头号骗子当成自己的心腹。斯大林正是把全国惩罚机构的大权交给了这个早已连最后的一点良心和正直都丢光了的人。

但是，也不能不指出，1938—1939 年能认识贝利亚真正面目的人还不多。因此对叶若夫撤职和贝利亚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一事人们还是寄予希望。

470 果然，在叶若夫被撤职后，大规模的镇压暂时停止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已经准备好了的几十万个案件暂时被搁置在一边，而这些案件会使几十万人遭到逮捕和枪杀。甚至还组织了以安·安·安德烈也夫为首的调查内务人民委员部活动的专门委员会。（安德烈也夫本人积极参与了 1937—1938 年粉碎"人民敌人"的斗争，所以才被选为这类委员会的领导人。）

不出所料，在叶若夫被撤职和贝利亚被任命后马上掀起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内部新的撤职和逮捕的浪潮。几乎所有叶若夫的最亲近的助手都被逮捕和枪决，内务人民委员部几十名负责工作人员也遭同样的命运。被捕的人当中有象扎科夫斯基这样的人，他是叶若夫的副手之一，长期从事莫斯科，特别是列宁格勒的镇压活动。诺沃西比尔斯克州的内务局局长马里采夫也被捕，他是一个大刽子手。白俄罗斯内务部部长——患迫害狂者别尔曼也被监禁了。在高尔基市拉甫鲁申和他的州内务局副手卡明斯基和利斯滕古尔特被捕交付法庭审判。

多数典狱长亲自尝到自己监狱的制度。（如布蒂尔卡典狱长波波夫、雅罗斯拉夫尔典狱长魏恩什托克、索洛维茨克典狱长等）许多曾以毒刑加人的审讯人员自己受到了同样的折磨。甚至连象雷登斯① 这样有名的斯大林和叶若夫的战友也被逮捕和枪决了，

他是斯大林第二个妻子娜·阿利卢耶娃的姐夫。1937年雷登斯是莫斯科内务管理局的局长，并领导了莫斯科的大规模的镇压。后来他又被任命为哈萨克斯坦内务部人民委员，同样积极参与了粉碎共和国党和苏维埃机构的运动。但不久他自己被捕枪杀了。

1939年春夏被捕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干部和一般干部，其中包括叶若夫的亲信和他的司令部的成员，他们过去曾编造了那么多假的、蓄意制造出来的所谓的“阴谋”案件，而现在他们自己 [471] 又异口同声地老老实实地交待了自己的“阴谋”和准备进行“中心恐怖活动”，即暗杀斯大林。

有关叶若夫被捕以后，笼罩着内务部许多工作人员的那种惊惶失措的情形，可举象柳什科夫这样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重要干部作例子。根据原罗斯托夫州检察院副检察长 M·П·巴托格林及苏共党员巴·伊·沙巴尔金及A·B·斯涅戈夫的证实，柳什科夫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领导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反托洛茨基的专门小组，并且在那时就广泛地使用了阴谋手段。1935年正是柳什科夫负责审理季诺维也夫—叶甫多基莫夫案件。1937年柳什科夫被调到罗斯托夫州任内务局局长，他在这里领导并镇压了党和苏维埃干部。后来柳什科夫被任命为远东内务局局长，在这里他又迫害了当地干部。柳什科夫知道叶若夫和内务部许多其他领导人被捕以后就逃到满洲里，身上带着外币、文件和内务印章。同时他把苏联军队在远东的布署情况出卖给日本关东军的领导机关，他还“揭发”了斯大林的暴行，然而他本人就是这些暴行的积极参与者。

二、1939—1941年期间的局部平反

所有无辜被判决的人们及几百万的亲友所期望的尽快进行普遍平反之事落空了。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虽然对无辜被

---

① 雷登斯是著名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老干部，斯大林的连襟，有关他的情况请参考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写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译者

判决和被诬陷的人进行平反谈得不少（安·亚·日丹诺夫的讲话尤其引起许多受害者的很大的期望），但实际上平反工作进行得很有限，只涉及到几万人。斯大林在世时平反工作不可能或多或少具有普遍性，因为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几十万人已被枪决了，对他们的平反等于承认斯大林自己的罪行。

472 首先被平反的是红军的部分指挥员，这显然是由于军队中指挥干部严重缺乏，1939—1940年因国际形势紧张和苏芬战争而进行的第一批动员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这时被平反的主要是中级队列指挥员（不高于师级指挥员）。被平反的人当中有不少后来都成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英雄：如后来的元帅，苏联英雄康·罗科索夫斯基，苏联英雄、苏联元帅季·阿·美列茨科夫，苏联英雄亚·瓦·哥尔巴托夫大将，第二坦克军团司令、苏联英雄 С·И·波格丹诺夫上将，海军中将和苏联英雄 Г·Н·霍洛斯佳科夫，乌克兰游击兵团政委，苏联英雄 С·В·鲁德涅夫少将，列宁格勒自卫战的英雄 Н·Ю·奥捷梁斯基，他因战功荣获两枚列宁勋章和三枚红旗勋章等等。

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的小儿子列·格·彼得罗夫斯基被恢复了军籍并任命为第六十三步兵师的指挥员。1941年8月在争夺德聂伯河战役中他作为英雄牺牲了。但是具有同样天才的大部分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在战争年代还继续在自己祖国的劳改集中营和监狱中受着折磨，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坚决要求派他们到前线去。例如：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当他的小儿子列昂尼德牺牲后，写信给斯大林要求释放他的大儿子彼得和 С·А·扎格尔[1]，并派他们到前线去。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在信中写道："反法西斯战争初期我给您写了一封信寄到中央请求释放我的儿子彼得出狱，我曾说他将和列昂尼德一样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战斗。我没有收到回信……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任何爱国的因素都会减轻人

473 民在战争中的重担。'一切决定于人'。对我曾经是最亲近的和遥

① 扎格尔是彼得罗夫斯基的女婿。——译者

远的一切，我都失去了，但是如其在鬼知道什么地方丢掉这一切，还不如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失掉他们。我再一次请求中央释放彼得·彼得罗夫斯基和扎格尔出狱，给他们机会在前线或后方为红军服务……"但是斯大林没有回信。国内战争英雄，乌拉里斯克英勇保卫战的领导人彼得·彼得罗夫斯基于1942年被枪决了。①

部分科学工作者和设计师也被平反了。例如，有名的物理学家Л·兰道和阿·贝格在战争前夕被释放了。在战争初期获得自由的有：安·图波列夫，В·佩特利亚科夫，В·米雅希谢夫，Н·波利卡尔波夫等十几名其他航空设计师和工程师。被横行的瘟疫吓坏了的斯大林允许在战争期间释放细菌生物学家П·兹德拉多夫斯基，他是我国防治瘟疫的优秀专家之一。细菌生物学家Б·А·季利别尔也被释放了。

党、苏维埃和共青团干部被平反的幅度少得多。我们只能提出几个人的名字：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Ф·М·齐亚夫金，维拉·霍鲁热伊(白俄罗斯人民后来的女英雄)等一些人。

对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来说，这些平反只是转移视线的策略。斯大林打算用这种办法安定一下被大规模恐怖手段弄得惶惶不安的社会舆论，并为逮捕和消灭叶若夫给予解释。此外，根据斯大林的想法，少量的平反是强调说明主要镇压活动是正确的，是有根据的。

三、1939—1941年期间的新镇压

对惩罚机构新领导说来，逮捕内务人民委员部原领导和局部的平反当然不是他们的主要工作。由贝利亚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很快恢复了对诚实的苏联人，对党和军队工作人员，对作家和科学家的镇压。诚然，这些新的镇压后来一直没有再达到1937—1938年那样的巨大规模，但斯大林已走上了违法和恐怖的道路，也 474

① 引自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的家人所提供的材料。

就再也不能停止或放弃这条道路。因此，直至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天，镇压和枪杀一直伴随着他。

还在叶若夫时期开始审理的成百上千的判处了极刑的案件，在 1939—1940 年期间予以执行了。有些案件中逮捕和判决的人，原因是被诬陷指控这些共产党员准备暗杀叶若夫，及勃柳赫尔、波斯蒂舍夫、埃赫等人，而这几个人当时已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可是连这些案件也没有被复查。根据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 C·库德里亚策夫的交待而被捕的乌克兰的一些干部也没有被释放，而安·亚·日丹诺夫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列举出来的诬陷的例子正是库德里亚策夫的交待。（显然，这些交待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查人员自己编造出来的，而库德里亚策夫只是在严刑拷打下“承认的”。）

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作家和科学家的镇压在 1939—1940 年间仍在继续。就是在这个时候逮捕了我们前面已提到的：A·B·柯萨列夫、尼·伊·瓦维洛夫、Γ·K·卡利彼钦科、伊·埃·巴别里、弗·埃·迈耶尔赫里德、弗拉基米尔·查皮奇，等等。

很老的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积极参加者，后来曾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著名工作人员米·谢·克德罗夫正是在这一时期悲惨地牺牲了，他早在 1921 年设法揭发过贝利亚。1939年克德罗夫已退休养老了。他的一个儿子在亚哥达时代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构的一名侦查员，他积极参加了一些审理政治案件的准备工作。而且他广泛地使用了非法的审讯手段。伊·米·克德罗夫在叶若夫时代继续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中工作。我们不知道，米·谢·克德罗夫对他的儿子，对亚哥达和叶若夫的活动持什么态度。但是当他知道贝利亚被任命为内务部人民委员时，米·谢·克德罗夫和他的儿子一起于1939年 2 — 3 月间给斯大林写了几封揭发贝利亚的信。对这些信件的第一个回答是伊戈尔·克德罗夫的被捕和被枪决。1939年 4 月米·谢·克德罗夫也被逮捕了。

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了米·谢·克德罗夫给联共

(布)中央书记安·安·安德烈也夫的信，当时安德烈也夫在斯大林的大镇压机器中也起过不小的作用。克德罗夫写道："从列沃尔托夫监狱阴暗的牢房里我向您发出求救的呼声。当您听到我悲惨的呼声时，请不要置之不理，来保护我吧，请帮助我们除掉那些残酷不堪的审讯吧，揭发错误吧…… 我是无辜地受着迫害。请相信我吧，时间会证明的。我不是沙皇暗探局的特务奸细，不是间谍，不是反苏组织的成员，这些指控是根据诬陷材料提出来的。我对党对祖国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行。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我没有玷污过这个称号，我在党内为人民的福利和幸福忠诚奋斗了已经快四十年……然而，今天，侦查人员对我这六十二岁的老人施用了更厉害、更残酷、更加具有侮辱性的肉体上的折磨手段进行威胁。他们没有能力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们已没有能力承认自己对我的作法是非法的和不能容忍的。他们把我说成是最凶恶的、不肯放下武器投降的敌人，并且坚持加紧对我的迫害，用以来为自己辩解。让党知道，我是无辜的，任何办法都不能使党的忠诚的儿子，至死忠于党的人变成敌人…… 一切总会有个结束。我已疲惫到了极点。我的健康已被糟踏完了，精力已耗尽，最后时刻就快来临了。脸上带着可耻的特务和祖国叛徒的金印死在苏维埃监狱中——对一个诚实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事呢！多么使人毛骨悚然！极大的悲哀和痛苦使我的心都快不能跳动了。不能就此结束！不能！我在呼救，不能这样死去，不应该这样死去。党和苏维埃政府都不能允许这样残酷的、无法纠正的不公正事情发生。我相信，当心平气和地、公正地、不用谩骂，没有险恶用心，不加以可怕的侮辱去进行调查以后，那么，就很容易断定所有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我深信，真理和公正会取得胜利。我相信如此，我相信如此。" 476

米·谢·克德罗夫是无罪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就连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也认为他完全无罪。但贝利亚不管有这个决议，仍然不允许释放克德罗夫，1941年10月他被枪决了。而且对克德

罗夫的新的判决，在枪决后才补办了手续。

我党最老的活动家菲·伊·戈洛舍金于1939年被捕牺牲了，他早在1912年布拉格代表大会上就被选为俄国社会主义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三十年代末他是苏联人民委员会议的总调解员①。

马·马·李维诺夫被撤职后，又逮捕了一些苏联外交官员。甚至已经开始筹备对所谓"外交部人民敌人案件"进行审理，但后来这一案件被取消了。

因为苏芬战争初期的失利，又有不少军人被逮捕了。如：列宁格勒军管区总参谋长H·E·瓦尔福洛麦也夫失踪了。

参加西班牙国内战争的军事干部也普遍地被逮捕了。前面已讲过，这次逮捕浪潮是在1937—1938年间开始的。例如，苏联驻西班牙武官B·E·果列夫被召回莫斯科后就被枪杀了。他是马德里保卫战的真正的组织者（西班牙的米阿哈将军在组织马德里保卫战中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在果列夫被捕两天之前米·伊·加里宁还在克里姆林宫授予他一枚列宁勋章。

象联共（布）中央委员Г·M·施特恩这样高级的军事指挥员也遭逮捕，而且被枪决了，他是为了接替勃柳赫尔担任特别红旗远东军司令员的职务从西班牙调回国的。Г·M·施特恩领导了哈勒欣河战役，他坚持要大大增加远东军的数量。（1941年12月时，

477

在我国东方已拥有一支强大的装备良好的基干部队，它在粉碎进攻莫斯科的法西斯战役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大家知道，许多远东师被调到西线。）1940年施特恩突然被召回莫斯科，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部防空局局长。但不久也遭到了和勃柳赫尔同样的命运。

战前不久又有一大批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军人遭逮捕。其中有二十二名苏联英雄和几名两次苏联英雄，包括两次苏联英雄雅·弗·斯穆什克维奇，他在1937—1938年期间在西班牙指挥了空

① 苏联在宪法制定以前，凡属民事纠纷，由调解部门处理，如调解无效，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故行政各级，除法院外，有调解系统。——译者

军，回国后任我国空军司令员。

西班牙内战的另一个英雄，苏联英雄巴·雷恰戈夫也牺牲了，他同斯穆什克维奇一起指挥过苏联空军。斯大林下令枪决了空军旅指挥员，西班牙战争英雄П·И·普姆普尔，以及其他几名苏联英雄：叶·萨·普图辛，И·И·普罗斯库罗夫，Э·沙赫特，阿尔让努欣等，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可以完全肯定地说，1939—1940年在苏联被处死的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军官比在西班牙战场死于法西斯子弹的军官还多。在佛朗哥胜利以后逃到苏联的一些西班牙共和党人也被逮捕了。

战前不久还有一位著名军事指挥员А·Д·洛克蒂奥诺夫也被逮捕，后来牺牲了，他曾是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波罗的海滨军区司令员。苏联武装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鲍·里·万尼科夫也在战前这些日子里逮捕了，不过只有几个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党的十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斯大林也毫不客气的加以迫害。）

1939—1941年在比萨拉比亚，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以及波罗的海滨地区也进行了大量的非法逮捕。在苏联这些新的西部地区，除了一些真正的无产阶级敌人、暗探、反动政客、法西斯和半法西斯组织的成员外，还镇压了几千的完全无辜的人们。在这一些地区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实行了罪恶的迁移出境的政策——把几十万地方人口迁移到东方地区。这样的作法引起了波罗的海沿岸，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比萨拉比亚人民极大的不满，不满反过来又导致更加严重的镇压。所以毫不奇怪，里沃夫，基什涅夫，塔林，里加和其他城市的监狱在战争前夕全部超满额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战争爆发后最初日子里因为手忙脚乱，慌成一团，来不及把一些城市［里沃夫，塔尔图］的犯人撤出来，结果他们就又犯了新的罪行——下令枪杀了这些犯人。死者的尸体都没有来得及处理掉，里沃夫的人民在德国人来到之前赶到监狱里去辨认尸体。这种恶毒的作法更加引起西部地区的无比愤怒，而且

478

这被法西斯和宾德尔分子① 广为宣传利用。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内务部机构罪恶的作法，我国西部地区的抵抗运动在法西斯占领时期发展得很慢。这些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比我国其他被希特勒军队占领的地区开展得消极得多。）

综上所述，斯大林和他的新内务部人民委员贝利亚在1939—1941年期间继续补充他们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清单。

四、国际舆论对苏联三十年代后半期政治镇压的反应

国际舆论对苏联三十年代违法行为和镇压的反应值得我们特别提一提。

这些各式各样的反应是很矛盾的。

478 理所当然，资产阶级和法西斯报刊广泛利用了苏联政治恐怖的消息，用以进行反苏反共宣传。对 1936—1938 年“公开”的政治审判，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应则特别多。

这些审判案的具体细节和内幕显然谁都不了解，但是西方观察家、记者和政治活动家不难判断，被告人的绝大部分供词纯粹是一场骗局。西方报刊指出了被告人供词中许多不衔接和矛盾之处，有些地方与事实不符，还有许多在审判中提到的事实实际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例如，在第一次“公开”审讯时被告人哥尔茨曼宣称，他在 1932 年去过柏林并在那里见过谢多夫，后来和他商定与托洛茨基见面，他们这一会见是在哥本哈根“布利斯托里”饭店里。但是审讯结束后第六天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就发表通告说，哥本哈根没有“布利斯托里”饭店，这一饭店早于 1917 年就被拆除了。而且还为此事件建立了一个以美国一位科学家为首的委员会，它证明哥尔茨曼并没有见过托洛茨基，而谢多夫在审讯所提到

① 西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宾德尔，逃亡国外后，成了法西斯的雇佣宣传机构的领导人。——译者

的日子里没有去过哥本哈根。

在第二次"公开"审讯时皮达科夫"承认"自己1935年底在国外的时候，在12月25日夜里乘机飞往奥斯陆和托洛茨基会见。在皮达科夫这一声明的两天之后，挪威《晚邮报》发表通告说，1935年12月间没有一架飞机在供词所提到的飞机场上降落。1937年1月29日另一挪威报纸《工人日报》上发表了该飞机场场长的专门声明，他说1935年12月在皮达科夫所提到的飞机场没有任何一架外国飞机降落过。

多数资产阶级报纸在报道关于苏联恐怖的消息时，对恐怖的牺牲者并没有表示任何惋惜或同情。许多白俄侨民的报纸在发表 480 苏联大镇压消息时，则有着幸灾乐祸的情绪，他们说，俄国的共产党人杀死另一些共产党人。

但是，许多自由资产阶级，左倾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特别是那里的共产党人觉得莫名其妙，他们不懂在苏联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人当中有些继续相信斯大林并支持他的一切论点。另一些人发生怀疑，他们沉默了。只有少数人提出了抗议。

里昂·费赫特凡格尔对这一事件的立场是很典型的。他于1937年初到了莫斯科，而且和斯大林见了面，他从莫斯科发出的第一篇文章里，把斯大林描写成一位"朴实而十分善良"，"有幽默感，听到对他的批评时并不生气"的人。费赫特凡格尔列席了"平行总部"的开庭审判之后，他完全同意控告结论的全部荒谬的说法。他在《1937年的莫斯科》一书中写道："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讯事件，我是从报纸上和目击者的讲述中了解到的。我亲自出席了对皮达科夫和李可夫的审讯。第一次开庭审讯时我是处在西欧的环境里，第二次开庭审判时我处在莫斯科气氛之中。对第一次案件我的认识曾受了欧洲的影响，第二次我则受到莫斯科的影响，这使我有可能特别尖锐地感觉到苏联和西方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别。我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是一些很聪明的人，他们说这些审讯从头到尾是一出悲喜剧，是野蛮的，不能令人信服的，从内容到

形式都是骇人听闻的事件。一批又一批原先是苏联的朋友的那些人在这些审判案件之后成了反对苏联的人。许多把苏联社会制度看成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理想制度的人，在这次审判事件之后，感到不知所措了，他们感到那颗打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子弹，同时打死了一个新世界。我自己在欧洲时，也对季诺维也夫案件的审理所提出的控告，认为不能令人信服。我觉得，被告人的歇斯底里似的交待是经过某种秘密途径取得的。当时整个审判在我看来是一场戏的排演，是一种以非常可怕而且是极高的技巧排演出来的戏。可是，当我出席了莫斯科的第二次审判时，当我看到和听到皮达科夫、拉狄克及其同伙之后，我感到，我的怀疑如同盐在水里一样被溶化了，因为我受了被告人所讲的内容以及他们是如何讲了这些内容的影响。如果说这一切是有意编造出来的，是经过精心安排的，那么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真实了。”……

西方报刊上的与审判有关的许多文章的作者都在问，在莫斯科进行政治审讯时为什么被告人不但不拒绝承认，而且相反，在交待问题时为什么一个被告总想超过另一个被告呢？为什么他们要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肮脏不堪的、卑鄙的罪犯呢？为什么他们不象一般的被告人在法庭上那样为自己辩解呢？即使他们已被揭发出来，为什么他们不想办法讲一些能减轻自己处境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而是恰恰相反却要使自己的处境更加困难呢？既然他们相信托洛茨基的理论，那么这些革命者和思想家为什么不公开站在自己领袖和他的理论的立场和观点上说话呢？为什么他们现在、最后一次能在群众面前讲话的时候，不去颂扬自己的事业？因为他们应该认为他们的事业是值得自豪的，西方评论家们说：可以设想某些被告人是被压服了，但全都被压服了不大可能。

里昂·费赫特凡格尔也力图答复这些问题，他在他的书中写道：“在法庭面前所展开的这次审判无疑应被看成是某种党的审判。被告人都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参加了党，有些人被认为是党的领导人。如果认为在党面前受审判的人应该和西方一般在法庭上

受审判的人一样行动，那么这是错误的。甚至连拉狄克的最简单的失言，他称审判员为'审判员同志'，主席就马上纠正他说：'要说审判员公民'，这样的事表现出来的意义是说明审判的内部性质。被告人还觉得他还和党连在一起，所以审讯案件从一开始就带着外国人觉得格格不入的辩论性质。审判员，检察长和被告人——这不仅是一种表面现象——他们还被一个共同的目标连在一起的。他们如同工程师一样正在试验完全新式的复杂的机器，有些人并非出于恶意把这架机器的某一部件弄坏了，而只是因为他们是想把自己改进这一机器的理论试验一下。然而他们的方法是错误的，但是这个机器对他们来说和对别人一样是和他们的心连在一起，所以他们也和别人一起在研究自己的错误。对这部机器的共同兴趣，对它的热爱把人们都连结在一起了。正是这样的感情激起审判员和被告人相互间的如此友好的合作。" 482

费赫特凡格尔这个说法的无知是显而易见的。它完全不符合起诉的性质。这里讲的不是什么错误，而是骇人听闻的罪行，不是对"党机器"的热爱，而是企图完全毁灭这个机器，说的是在我国恢复资本主义等等。费赫特凡格尔写道：指控托洛茨基和希特勒有关系那是合情合理的。但这里说的不是是否"合情合理"的问题，而是要搞清楚指控是否是真实的。正象戈倍尔所说过的，慌话只有当它合情合理时在政治上才会有益处。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费赫特凡格尔写的关于政治诉讼案的书不仅是不真实的，而且态度是不诚恳的和虚伪的，虽然它当时对许多人产生了影响，因为他们都认为它是一份诚实的材料。费赫特凡格尔在本书中自己也承认，关于莫斯科政治诉讼案件内幕的许多方面他还没有弄明白。但是，他马上急于补充了这样的话："我的话无论如何不意味着我想丑化诉讼案件本身及其成果。如果问，我的意见的焦点是什么，那我就援引英明的证论家恩斯特·布洛赫使用苏格拉底解释赫拉里特的话中的某些不清楚之处时所说的话来做答复，他说："我已明白的是美好的。由此我可以得出结

论，所剩下的不明白之处也是美好的。”①

483 费赫特凡格尔在解释斯大林安排这次公开的政治审判的动机时既没有说服力也不诚恳。因为这些解释破坏苏联在相当一部分西方进步知识界和工人阶级中的威信。费赫特凡格尔却马上放弃了下面的设想，认为：斯大林具有毁灭一切的专横性格，恐怖能使他兴高采烈，他的感情是变态的，充满了权势的欲望、无竭制的复仇心理。他又把这些审讯和……苏维埃社会的民主化连在一起。按他的说法，政府不愿意让托洛茨基分子利用这个国家的民主化。

理所当然，斯大林马上利用了费赫特凡格尔的书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本书译成了俄文并在苏联大量发行②，尽管其中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某些畸形表现也有所批评。斯大林这时是利用了费赫特凡格尔的书，把它作成一个很方便的政治避雷器。

象罗曼·罗兰这样忠实的苏联的朋友，为了1936—1938年的镇压活动，感到十分难过。他当时的心情可以从他1938年3月5日写给赫尔曼·哥瑟的信得到证明。哥瑟请罗兰替两个在苏联被捕的人说情。罗兰回答，他已几次在类似情况下力图维护自己的苏联朋友，并且写了信给斯大林，但是没有得到回信。罗兰写道：“高尔基在世时，我还可以经过他办许多事。可是现在我什么也不能办了。显然，‘哲学家’（正如让·雅克·卢梭时代所说的那样）对当权者来说，是算不了什么的。”③罗曼·罗兰谈到斯大林及其助手时感叹道：“幸亏事业超过了他们这些人。”

罗曼·罗兰处于非常矛盾的心理状态，他没有公开站出来谴责苏联的大镇压。但是在那些日子里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这484 是一种绝对不受任何监督的专横的制度，是连起码的自由、公正和人道这些神圣权利都得不到丝毫保障的制度。我感到：痛苦和愤

① 里·费赫特凡格尔：《莫斯科·1937年》莫斯科1937年版。

② 里·费赫特凡格尔的书于1937年11月23日发排的，1937年12月24日签字付印。

③ 《新世界》杂志1966年第1期第233—235页。

怒充满了我的心。我压住自己想把这一切都说出来写出来的要求。我也处于瘫痪状态了。只要我对这个制度发表那怕是很小的谴责，那些雇佣的敌人……马上要利用我的话，把这些话用他们最罪恶的居心加以毒化以后当作武器来使用。”①

斯大林暴行的事实是如此骇人听闻，以至于进步的西方知识分子中有不少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相信有关我国发生的这些罪行的报道。例如，英国伟大的戏剧家和社会学家肖伯纳一直到死都还继续赞扬斯大林，把斯大林的行为和自己所接近的社会主义思想等同起来。但是肖伯纳也没有能使自己相信德国有死亡集中营的存在。他也不相信，希特勒分子把西欧几乎所有的犹太人，包括儿童在内都消灭了。②

意大利社会党的领袖彼特罗·南尼也没有彻底搞清楚苏联审判剧的彩排。他于1938年在《新前进报》发表的文章中把莫斯科审判案的原因归结为两方面的蜕化：一方面，党的官僚主义和警察式的蜕化，另一方面是反对派的阴谋和罪恶的蜕化。这样，三十年代的镇压在南尼看来，就有一定的法律根据了。

罗斯福驻莫斯科的特使戴维斯也没有搞清楚莫斯科政治诉讼案是怎么回事。在一个审判开庭的日子里他给自己的女儿写信说：由于政治审讯的结果，在苏联清除了一次危险的阴谋。戴维斯后来在他的《在莫斯科的使命》一书中也是这样写的。他想让美国读者相信，苏联在战前就粉碎了“第五纵队”。戴维斯在1941年写道：“当我翻阅1937—1938年审讯材料时——我亲身出席了这次开庭审判并且密切注意了审判的整个进程——我看到：我们现在知道的德国‘第五纵队’的行动方法实际上经过俄国的吉斯林分子的自我揭发已经暴露无遗了。现在很清楚，这些当时显得如此严厉、使全世界为之震惊的审讯，清洗和清算，乃是斯大林政府力图防止内部政变和外部侵略的坚决而果断的措施的一部分。苏联政

485

① 引自Ж·彼卿斯：《罗曼·罗兰和马克辛·高尔基》巴黎1968年版。

② 见Э·希尤兹：《肖伯纳》莫斯科1966年版第272页。

府在国内进行了彻底清洗和排除叛卖分子的工作。过去的一切怀疑都在有利于苏联政府的情况下得到了解决。1941年在俄国已经没有'第五纵队'的代表——他们都已被枪决了。清洗使国家安定了，使国家避免了叛卖行为。”

甚至象丘吉尔这样的消息灵通人士也是这样想、这样说的。但是他相信的情报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暗探局通过西方秘密渠道传出去的阴谋伎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目的正是要搞乱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舆论的视听。在丘吉尔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中可以看到如下叙述：“……俄国的高级人士和德国政府的秘密联系是通过布拉格的苏联大使馆进行的。这是企图推翻斯大林和建立亲德派新制度的军人和老共产党员的所谓阴谋的一个因素。贝奈士总统不失时务地把听到的一切，通知了斯大林。此后，在苏维埃俄国军政机构里马上就进行了残酷的、但可能不是无益的清洗工作，1937年1月进行了一系列审讯，维辛斯基作为国家公诉人发表了精彩的讲话。”①

486 众所周知，和莫斯科政治诉讼案进行的同时，托洛茨基企图在美国举行“反诉讼”，以便证明自己与莫斯科对他提出的指控毫无关系，他还想证明审讯时证人和被告人交待的主要事实都是假的。当托洛茨基约请西方多数左派知识分子支持他的时候，他们拒绝参与托洛茨基的“反诉讼”行动方案，而且还维护了斯大林。例如：美国在保卫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反诉讼”的宣言下面签字有：西奥托·德莱塞、希克斯、雷蒙特、马克斯·莱涅尔、罗宾斯、安娜·路易沙·斯特朗。为斯大林辩护的有：路易·费希尔和维特·居兰蒂。在美国，维护托洛茨基委员会里的成员主要是彻头彻尾的反共分子。在西方著名知识分子中只有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参加了“反诉讼”。1937年9月杜威组织的委员会在长期研究了各种文件的基础上发表了自己的评论说：“在明显的事实

①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莫斯科第226页。

的基础上，我们认为，1936年8月至1937年1月的莫斯科诉讼是纯属假造出来的案件。"但是他们这个决议，注意到的人很少，在西方报刊中几乎是没有人知道就过去了。

象赫·威尔斯和安·纪德这样的西方著名作家也不知所措了。他们不愿意支持托洛茨基，但也不愿意支持斯大林。许多西方进步知识分子象肖伯纳一样，不愿意相信从莫斯科传出来的有关大规模枪杀和死刑的消息。例如：德国伟大的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长期不相信关于苏联的那些违法行为的消息。他对费赫特凡格尔写的关于审讯的书的问世是很高兴的。布莱希特认为，现在他找到了最好的解释，所以他写信给费赫特凡格尔说，他的书是西方关于这个题材出版的书中最好的一本。① 可是当布莱希特于1941年春天来苏联短期访问，并知道许多德国反法西斯战士被捕，台尔曼俱乐部和李卜克内西学校都被关闭，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老师，他的朋友苏联作家特列季亚科夫被枪决时，他又开始产生怀疑了。就在这时候布莱希特写了一首名为《人民难道无罪?》的诗，其中写道：

"特列季亚科夫，我的老师，
如此伟大和如此诚实，
他却被处决。
人民的法庭审判了他，
罪名是间谍，
他的名字被诅咒，
他的书被焚烧。
连提到他都非常可怕。
大家沉默了。
可是如果他无罪呢？
他有罪，——人民的儿子在回答。

---

① Л·柯培列夫：《布莱希特》莫斯科1966年版第255页。

他是敌人，——那些属于劳动者的、
工厂和集体农庄也在重复这样的话，
敌人，——全体国人都异口同声赞同这样的话。
这是世界上最英勇的国家。
没有一个人那怕说出一句为他辩护的话。
可是如果他无罪呢？
……谁敢怀疑，在人民法庭里就有人民的敌人呢？
没有法官的法庭还叫什么法庭？
要请去看白纸黑字写着罪行的文件是可笑而愚蠢。
胡说！没有这样的文件。
叛徒手中握着他清白无罪的一切证明，
那无罪的人却没有任何证明无罪的证件。
那么，只有沉默吗？
可是如果他无罪呢？
五千人在从事创造，一个人在从事毁灭。
也许，投进监狱的五十人中，
能找到一个无罪的人？
可是如果他无罪呢？
如果他无罪，
你们怎么敢于竟把他枪决？”

（H・高尔斯卡娅俄译）

西方知识界的许多苏联的朋友陷于不知所措的程度可以从西方著名的科学界和文化界的代表人物致斯大林、维辛斯基和加里宁的信中看得出来。下面我们列举其中的一封，是三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于 1938 年 6 月写的。他们三人——伊琳和弗雷德里克・若里奥-居里夫妇和让・彼茨安是因为苏联当局逮捕了两名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反法西斯战士而写了信的。信中说：“本信书者是苏联的朋友，他们感到有责任提醒你们注意以下事实。

两位杰出的外国物理学家——弗里德里希・崔乌特尔曼斯博

士(1937年12月1日在莫斯科被捕)和亚历山大·魏斯别尔格(同年3月1日在哈尔科夫被捕)受到监禁引起了欧洲和美国科学界的极大不安。霍乌特尔曼斯和魏斯别尔格在科学界是知名人士，所以我们担心，他们的长期被监禁会给与那最近已大大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威信和打击苏联同西方著名的民主人士之间共同合作的政治运动以新的借口。这些情况更加困难了，还因为那些以苏联的朋友闻名、在敌人攻击苏联时维护过苏联的西方科学家们，对霍乌特尔曼斯和魏斯别尔格的命运一无所知。他们虽然已被长期监禁，但苏联政府迄今并没有给予任何解释。这使我们对你们的这类措施失去了向我们国家社会舆论进行解释的任何可能性。"

二十世纪杰出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于1938年5月16日专门写信给斯大林。他抗议俄国逮捕许多受到西方同行的极高尊重的著名科学家。

但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维辛斯基和加里宁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这类信件和电报都不予答复。

西方所有社会党对斯大林恐怖政策采取否定立场。诚然，许多社会党相信了1937年发生的图哈切夫斯基及其同伙的"阴谋"。盖世太保千方百计把有关该"阴谋"的"真实"消息送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接近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国侦探系统。这些消息又从法国侦察系统传到社会党的积极分子手里。但总的来说，欧洲社会党对于歪曲社会主义民主，专横和苏联其它的畸形现象，并没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显而易见，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的迫害行为和法制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社会党人只是在解释产生布尔什维克党这一悲剧的原因时才出现了不同意见。某些人认为，苏联国内正在发生往法西斯式国家迅速蜕变的过程，随之而来的就是消灭那些仍然忠于自己理想的老革命家们。另一些人则认为，苏维埃社会内部正在进行争夺政权的残酷斗争，而斯大林在这斗争中依靠了新一代苏联人，他们渴望作实际事情，而对托洛茨基、布哈林之类的理论问题之争则毫不关心等等。上层采取的工业和农业革命

489

的措施不可避免要伴随着出现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第三批人认为，对老布尔什维克进行迫害的原因很简单，这只不过是由于斯大林的自大狂和虐待狂所致。

在那一段时间里，毫无保留的支持了苏联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共产党的领导，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西方的共产党报刊往往是完全重复着《消息报》和《真理报》所登载的一切。而且，共产党的领袖们在解释审讯事件时的主要理由是说：苏联审判是无产阶级的审判，因而不可能是不公正的。西方共产党报刊关于苏联“第五纵队”的报道，按其调子和性质和莫斯科报刊的报道没有什么区别。至于有关非刑和虐待传闻，全世界的共产党报刊对此都作为恶毒的诬蔑加以否定。甚至当一些外国共产党著名活动家在莫斯科遭到逮捕，驱逐和枪杀时，共产党报纸则既不过问也不怀疑。应该指出，共产党运动的多数积极分子在那时确实相信，问题乃是涉及在苏联国内消灭危险的人民敌人、内奸和阴谋家。1956年美国共产党员古·迈耶尔在他的书中写道：“那时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够相信，斯大林会下令消灭无辜的人，因为他们自己无法设想自己会干出这样的罪行。全世界都清清楚楚地亲眼看到了社会主义取得的无可辩驳的历史功绩：……科学和教育领域中的巨大成绩、看到多数苏联人民对自己领袖的不容置疑的爱戴和忠诚。因此，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大量罪行的存在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所以他们认为：共产党人如果不赞同对待敌人采取残酷态度，或者如果说共产党人完全不了解对待‘人民敌人’使用了过分作法，那都是错误的。‘严峻的措施’被认为是合法的。怀疑态度则被蔑视为‘软弱’。至于有关苏联的违法行为的报导他们则作为反苏谣言加以驳斥。”①

还应该指出，普通工人，包括共产党员工人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同意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和领袖们的这种信心。正如伊·迈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那样，他说：“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

① 迈耶尔：《赫鲁晓夫报告和美国左派运动的危机》莫斯科1957年版第10页。

流派马上就抓住了来自苏联的有关逮捕和镇压的消息，在工厂里广泛地进行宣传并且得出结论说：'这就是共产主义带来的结果。'我清楚地记得，在这些年里当我见到一些英国共产党员时，他们痛苦地甚至是绝望地向我提出了和威尔斯向我提出过的同一问题：'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能相信，有这么多老的，有功绩的，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的党员竟成了叛徒。'他们还告诉我说：在苏联发生的事情如何使工人们抛弃了苏维埃国家，如何破坏了共产主义在无产阶级中的影响。法国、斯堪的那维亚国家、荷兰、比利时等许多国家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①

401

一些因为害怕受到斯大林惩罚机构打击而拒绝回苏联的外交官和侦察人员致西方舆论界的信和声明也给西方社会舆论以一定的影响。例如，1937 年 12 月有些欧洲报纸(包括米留可夫的报纸《最后消息》)发表了克里维茨基将军的《公开信》，这封信是发给法国社会党的事务委员会，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第四国际常务局的。

1937年在国外负责办理苏联军事订货的克利维茨基写道："十八年以来，我忠诚地为联共(布)和苏维埃政权服务，我深信自己也是为十月革命事业及整个工人阶级事业服务。我是1919年参加联共(布)的党员，多年来属于红军的最高指挥系统，后来是军事工业研究所的所长，近两年来在国外完成特殊任务。党和苏维埃机构的领导一直是信任我的。我曾荣获红旗勋章，而且荣获所谓的'荣誉钢刀'的称号。

近年来，我观察了苏联政府的政策使我越来越觉得忧心如焚。但是我用维护苏联合法利益的思想压制着自己的这种担忧，我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为我的政府服务，因此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但以后发生的事件使我深信：斯大林政府的政策不仅越来越违背苏联的利益，而且也违背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

---

① 伊·迈斯基：《肖伯纳和其他人》莫斯科 1967 年版第 83 页。

在莫斯科审讯中，特别是在秘密审讯中，老布尔什维克的最优492 秀代表被作为间谍和‘盖世太保的暗探’问罪了。

现在付诸消灭的人，他们不仅只是一些老年人，而且他们是十月革命的一代人，以及其后的整代人，即一切在国内战争熔炉中，在饥饿和寒冷中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一代优秀分子。斯大林甚至于冒了使红军没有了指挥的危险，他命令消灭最优秀的和最有才能的军事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波列维奇，加马尔尼克等。他象对付其他牺牲者一样诬陷他们是出卖祖国的人。实际上，正是斯大林的政策破坏了苏联的军事威力，它的国防力量，它的经济，它的科学成就和苏联建设的其它各个方面。

长期以来，我力图压制我内心的震惊，反感和忧虑，说服我自己，无论如何应该继续完成交给我的军事工作。我应该承认，我不得不以最大的毅力决定断绝同莫斯科的联系，并且留在国外。

在国外期间，我希望自己有可能促进几十万所谓‘间谍’和‘盖世太保暗探’的平反工作，因为他们在实际上是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的忠实战士。今天统治着国家制度的主宰正在对那些在列宁领导下建立了这苏维埃制度和在他逝世后继续巩固了这一制度的人们进行逮捕，枪杀，流放，消灭。

我知道（我已掌握了确实证据），现在已经悬赏取我的首级了。我知道，格别乌为了使我能够沉默，将用尽一切手段暗杀我。在叶若夫指挥下的，已经有几十个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正在追捕我。作为一个革命战士，我认为我有责任将这些情况告诉国际工人舆论。

B·克利维茨基（瓦尔特）

1937年12月5日”

几天以后，欧洲的许多报纸又发表了原苏联驻希腊全权代表493 A·Г·巴尔明的类似的一封信，这封信他是寄给《人权和公民权同盟》的。

巴尔明在信中写道：“在我拒绝继续为苏联政府工作之时，我

认为有责任把以下事实转告你们，我从人道主义及人权出发，对日益增多的罪行表示强烈的抗议。

我为苏联政府工作了十九年，我参加联共(布)党已经十九年了，我一直为苏维埃制度奋斗着并且为工人的国家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力量。

……莫斯科的审讯使我感到震惊和恐怖。我不能同意对老的革命领导人判处死刑，尽管他们自己供认了，然而正是他们的这些交待使我的良心受到震动，使我心情十分沉重地产生了疑虑。

我对工人阶级及苏联人民的深厚感情，以及我曾深信领袖们是不可能有犯罪行为的信念，使我克制自己，和事实妥协了。我当时认为，我的克制是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但是近几个月来的事态使我的幻想破灭了。那些轰动一时的审讯原来却是为大规模的消灭联共(布)干部作准备，即消灭所有那些从事地下斗争，完成革命，进行国内战争和捍卫了第一个工人阶级国家取得胜利的干部。今天给他们抹黑，把他们交给刽子手了！

……为了那些至少还活着的人们，我向社会舆论发出坚决而绝望的呼吁，我对那些假造出来的，卑鄙的指控表示抗议。现在我在想那些在欧洲，亚洲及美国的，在自己的岗位上从事工作的朋友们，和我同样的命运每天都在威胁着他们，在他们面前也摆着一种选择：是回国去迎接死亡还是因拒绝回到祖国而冒险被格别乌在国外的暗探所暗杀，这些暗探不久前还在到处跟踪我。

对我来说留在岗位上为斯大林政府工作就是意味着失掉任何道德准则，就是对每天在我国犯下的反人民的罪行负有部分责任。这就意味着背叛自己终身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

494

原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发表的与此事件有关的谈话，特别值得提一提。

1930—1939年期间著名作家和政论家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爱沙尼亚，丹麦，保加利亚从事外交工作，他是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英雄，1917年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喀琅施塔得委员

会主席，后来是海军副人民委员和波罗的海海军司令员。早在党的十七大以后(根据B·C·扎伊采夫的证实①)，拉斯科尔尼科夫越来越忧虑地看到个人迷信在日益发展，接踵而来的是我党最优秀的列宁时代干部的牺牲。他也注意到起初是叶若夫，后来是贝利亚派去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暗探总是在跟踪他。1939年7月，他在法国的时候得知，在他的祖国他已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并且已成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了。拉斯科尔尼科夫于是发表了公开声明，题为《怎样把我变成人民敌人的！》，作为回答。在声明中他坚决维护了自己和其他无辜遭到迫害的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几个月以后，拉斯科尔尼科夫写了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在信中他再一次揭露了斯大林的专横、违法乱纪，以及破坏苏维埃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行为。拉斯科尔尼科夫谴责斯大林对无辜的人们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而特别使他忧虑的是红军最优秀的指挥干部被消灭。

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这封信中写道："斯大林，您开辟了一个在我们革命史中将被称之为'恐怖时代'的新阶段。在苏联没有一个人会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任何人当他上床睡觉时，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夜间被逮捕。真是无一人能幸免。正确的人和犯了错误的人，十月革命的英雄和革命的敌人，老布尔什维克和非党员，集体农庄农民和外交全权代表，人民委员和工人，知识分子和苏联元帅——所有的人都在同样程度上遭到迫害。所有的人都在魔鬼般的血腥的旋转木马②上转圈……您一开始，血腥地镇压了原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后来转向消灭老布尔什维克，接着又杀害在内战时期成长的，那些肩负最初几个五年计划建设重担的党和非党的干部，而且还组织了对共青团的洗劫。您用和托洛茨基、布哈林'间谍'进行斗争的口号来作掩饰，但是您手里的权力不是昨天才开始取得的。如果没有您的允许，任

495

①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3年第12期。

② 公园中儿童玩耍的大的旋转木马，这里比作斯大林的血腥的镇压机器。——译者

何人也不能钻到重要岗位上去。那么谁把那些所谓的'人民敌人'安插在国家、军队、党和外交的重要岗位上去的呢？……是约瑟夫·斯大林！是谁把所谓的'暗害者'安排到苏维埃和党的机构的各个环节里去的呢？……是约瑟夫·斯大林！……

您借助于肮脏的捏造排演了审判，这些审判按其荒谬程度超出了您在神学校的教科书中就已知道的中世纪对魔鬼的审判。您自己很清楚，皮达科夫并没有坐飞机到奥斯陆去过，马·高尔基是自然死亡的，托洛茨基也没有干使火车出轨的破坏行为。您明明知道这都是谎言，可是您鼓励您的那些走狗——你们诬陷吧！你们诽谤吧！……造谣中伤总会留下一点什么痕迹的。

您在列宁的灵前庄严地宣誓：实现他的遗嘱，要象保护眼珠一样维护党的团结。您是一个违背了誓言的罪人！您违背了列宁的遗嘱。您诬陷和枪决了列宁的许多战友，他们都是无罪的人，这是您非常了解的。在他们面对死亡时，您还强迫他们承认那些他们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而且强迫他们从头到脚把自己抹得漆黑。

那么，现在十月革命的英雄们在哪里？布勃诺夫在哪里？克雷连柯在哪里？安东诺夫一奥弗申柯在哪里？德宾科在哪里？是您，斯大林，把他们逮捕了！……　老布尔什维克都在哪里？……他们都已不在人间了。是您，斯大林，枪杀了他们。您败坏和玷污了您的战友们的灵魂。您强迫那些和您一起走的人踏着昨天的同志和朋友血泊，满怀痛苦和厌恶之情往前走。在您领导之下写出来的假的党史中，您把那些被您害死，枪杀和受尽您的凌辱的人们的威就和功绩窃为己有。

在战争前夕，您毁掉了红军，它受到我国人民的爱戴，它是人民的骄傲，是我国威力的靠山。您使红军和红海军没有了领导。您把那些在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考验中培育出来的、以光荣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首的天才的统帅们都消灭了。您把内战的英雄们消灭了，他们用最现代化的军事技术改造了红军并使它无敌于天下。在巨大的战争威胁面前，您继续消灭红军的领导人，消灭红

军的中级和下级指挥体系。勃柳赫尔元帅在哪里？叶哥罗夫元帅在哪里？……是您，斯大林，逮捕了他们！

您在苏联人民的压力下，虚伪地恢复了对俄国历史人物的崇拜，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基，米哈伊·库图佐夫，您似乎希望他们在未来的战争中比被您枪杀的元帅和将军会更能助您一臂之力……”

正如海军上将B·格利沙诺夫于1964年在《消息报》上公正地写的那样，这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给作者增添了荣誉。①

但是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发表的，因此当时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

①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是在俄侨《新俄罗斯报》于1939年10月1日发表的，即在作者死后。可以设想，拉斯科尔尼科夫把信寄到法国消息通讯社，这个通讯社当时把这一情报提供给许多报纸，包括一些侨民的报纸。拉斯科尔尼科夫没有其他向舆论界呼吁的办法。1964年侨居在法国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夫人，把拉斯科尔尼科夫这封信的手稿带到莫斯科交给在作家协会领导下成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遗稿整理委员会。大家知道，拉斯科尔尼科夫死于1939年9月，根据法国报纸的报道，他是从窗户跳出去自杀的（也许是被扔出去的？）。不管怎样，有关拉斯科尔尼科夫死因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八章

497

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构使用违法的审讯和监禁方法

对完全无辜的苏联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普通劳动者的大规模的逮捕，这一切本身就已构成了严重的罪行。但是在斯大林建立起来的骇人听闻的恐怖机器的活动中，这只是可怕的一连串罪行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哪怕是简短地分析一下这一链条中的其它环节也是有必要的。

一、对囚犯的严刑拷打

对斯大林来说，仅仅把他不称心的人关起来或消灭掉是觉得不够的。他还想摧毁他们的意志，污辱他们，强迫他们自称是人民敌人，逼他们承认自己的各种“罪行”和“阴谋”。很明显，按法律所规定的审讯方法和形式是不可能逼迫诚实的苏联人作出这种自我毁谤。所以，这时已经是不择手段的斯大林，于 1937 年下令对“人民敌人”广泛地使用体罚，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如何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反苏总部”和“集团”，可以从 1937 年在列宁格勒逮捕的党员罗森勃留姆同志 498 的交待中看得很清楚。①

1955 年在复查科马罗夫案件时，罗森勃留姆讲述了下面的事

① 尼·谢·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讲了有关这些交待。

实：他于1937年被捕后遭到非刑拷打，在上刑的过程中逼迫他交待了关于他自己和别人的假材料。后来把他带到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扎科夫斯基办公室里，扎科夫斯基向罗森勃留姆建议，如果他同意在法庭上作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已经炮制好了的有关"列宁格勒暗害、间谍、破坏、恐怖总部案件"的假交待，那么就可以释放他。这时扎科夫斯基厚颜无耻地把他们如何人为地建立了假"反苏阴谋"的卑鄙"内幕"告诉了罗森勃留姆。

罗森勃留姆说："扎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面前展现了建立这个总部及其分部设想的几种方案……在向我介绍了这些方案以后，扎科夫斯基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筹备有关这个总部的案件，而且审讯将是公开的。将来受审判的是总部的头目，共四、五人：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个分部审判二、三人……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案件应该搞得象个样子，这里证人起决定性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证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是过去的地位）和党龄。扎科夫斯基说："什么都用不着你自己去编，内务部会为你准备好底稿，每个分部分开交待，你的任务是把底稿背下来，记住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一案件可能要准备三、四个月，也可能半年。在这期间你就好好准备，不要使审讯人员和自己下不了台。审讯的过程和结果将决定你今后的命运。害怕了或说错了，只能怪自己。经受住了，你的脑袋可以保下来，将来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死。"

499 过了两年，扎科夫斯基和他的助手们也被卷入我们在前面讲过的同样可怕的审讯机器之中。苏共党员A·尚曾和扎科夫斯基的助手——列宁格勒内务局副局长尼科诺维奇关在一起。尼科诺维奇本应被枪决，但不知为什么他得以幸免了，改判成二十年徒刑。他总是害怕别人知道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原领导干部，所以表现得特别顺从，不争论问题，跟谁都不吵架，对一切人，甚至对小官和看守的要求他都听从。有一次尼科诺维奇告诉A·尚说，"新任"的审讯班子是如何残酷地折磨扎科夫斯基和尼科诺维奇本

人。

现在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工作人员，不顾成千上万的被平反的苏联人的证实，企图否认在个人迷信时期广泛对犯人进行了非刑拷打。我们手头有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的原相当负责干部的札记，他写道：“我们庄重地声明，只有个别的道德堕落和无原则的契卡人员使用了肉刑和非刑，拷打了犯人，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1月(1938年)发表的有关侦查中过火行为的信以后，这些人已于1939年被枪决了。”类似的“庄重”声明是对真实情况的有意歪曲。内务部工作人员使用肉刑和进行非刑拷打完全是根据下达指示的机关的精神，而不是出于自己倡导。当然，使用非刑拷打犯人并不是一下子，也不是从某一天起，在内务部里兴起来的。向“新”的审讯方法的过渡在格别乌——内务部机构中是逐渐地形成的，经过了几年的过程。众所周知，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在没收黄金和珍宝的时候，格别乌机构对被捕的耐普曼分子就使用了拷打办法，不让睡觉和吃饭，并关在牢房及监禁室里，直到这些耐普曼分子或他们的亲属把这些黄金“为了工业化需要”交出来为 500 止。1930—1931年间在对待所谓的“暗害者”时，以下“侦查”方法也广泛使用——毒打犯人，审讯时的“车轮战术”，不让睡觉，日晒火烤，冷冻办法，叫犯人挨饿或不给水喝。但在三十年代初期，格别乌和内务部机构对逮捕的共产党员的态度比较“人道”。至1937年春天为止，非刑拷打显然是对个别犯人由个别的，而且是专门挑选出来的侦查人员使用的(如，在筹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平行总部”审讯案时)。至于其他侦查人员，只允许他们使用“车轮战术”，不让吃饭和睡觉等方法。在中央二—三月全会以后多数侦查人员被允许对“顽固的”“人民敌人”采用一切肉刑，甚至是十分狠毒的酷刑。在这期间大量的越来越完备的肉体刑罚几乎用于所有的犯人，因为他们抗拒了“审讯人员”的要求。1939年在叶若夫被撤职后，这些非刑及对犯人的各种迫害也并没有取消。

据当时正在顿河-罗斯托夫一座监狱里受审讯的瓦·伊·沃

尔金证实，贝利亚上任后审讯方法只在表面上有所变化。沃尔金在回忆录中写道："过去，审讯员对我们说：'喂，恶棍，快写，叫你坐牢坐死'。可是这时他们对犯人的做法变了，说：'好吧，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您写吧（称呼是"您"），签个字，亲爱的，反正要坐二十年牢'"。

* * *

使用严刑和进行迫害是斯大林及他建立的恐怖机器的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大家知道，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俄国在审讯时也极广泛地使用了酷刑。诚然，即使是在当时的俄国已经充分认识到非刑作为审讯方法是不妥当的。因此形成了一个规矩，简单归结为："告状者先得挨一鞭子"，这就是说为了"检查一下"告的状是否属实，在被 591 告人之前，先对告状的人用刑。（西方的宗教裁判所则相反，不仅不惩罚告状的人，而是鼓励他们，把被判决者部分财产分给告状的人。但是宗教裁判所对搞清事实真相最不感兴趣。）

使用酷刑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对，以至于叶卡特林娜二世签署了一项命令说："任何案件为在审讯时取得真实情况，不得以任何借口在公开场合对任何人使用肉体惩罚。"这一禁令远不是处处和时时都在执行着，特别是在普加乔夫起义后，更是如此。所以亚历山大一世不得不再一次公开强调严禁酷刑，并于 1801 年给枢密院下达了一道命令，说："在全帝国范围内普遍严肃重申，任何地方，无论在上级或下级政府及法院，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从事，或纵容，或实行任何非刑，否则严惩不贷……"。亚历山大一世在该命令中写道："'刑罚'本身为当今人类之羞耻，应受到谴责，据此应从人民的记忆中永远消除。"① 我们当然知道，沙皇俄国的审讯机构不会严格执行这一命令。亚历山大一世时，犯人被鞭打，要走过受

① 弗·加·柯罗连科：《俄国旧时期的酷刑》，载《全集》第 9 卷 1914 年版第 215 页。

到规定为二千次的杖刑的队列。① 在革命斗争尖锐化时期，狱吏、宪兵和黑帮分子对许多革命者，包括妇女在内，使用了最恶毒的刑法。在内战时期，凶恶的反革命恢复了普遍的非刑拷打。马雅科夫斯基写道：

“波兰的督军
　在我们的脊背上烙上了一颗颗五角星。
马蒙托夫匪帮把我们活活埋在土里，
　只将头露在地面上。
那些日本鬼子把我们塞进机车锅炉里
　活活烧死，
他们把熔得火红的铅水
　灌进我们的喉咙里。”

但是对共产党人的这些惨无人道的酷刑，难道导致我们党在那些严酷的年代也去使用同样的残忍的斗争方法吗？ 502

在这方面有一个插曲对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生活是非常典型的。大家知道，1918 年夏天全俄非常委员会机构发现了反苏维埃政权的阴谋，为首的是英国的外交代表洛克哈特。阴谋的参加者被逮捕了，洛克哈特被驱逐出苏俄国境。在《全俄工农红军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中发表的关于揭发这次阴谋的通告中有一句话说道：“被揭露出来的英国外交代表十分窘迫地离开了全俄非常委员会。”② 大约是同一时期，莫斯科一家不大的刊物《非常委员会周报》开始出版了。该《周报》第 3 期中发表了俄共诺林斯克委员会主席和诺林斯克非常委员会主席的信件（没有写出他们的姓名，也没有加编者按）。在标题为《你们为什么要姑息？》的信中，作者引了《消息报》的上述引文并感叹道：“我们要直截了当地指出……　全俄非常委员会没有摆脱革命前的可咀咒的遗产——市侩思想。请

---

① 帝俄时代，有一种刑罚，叫列队杖刑，即犯人要经过手执粗大的棍子的长长队列，每人都用棍子打他，有时达二千次之多，一般犯人多死于杖刑之下。——译者

② 《消息报》1918 年 9 月 3 日。

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没有对这个洛克哈特使用最恶毒的刑法，以便得到情报和地址？这个家伙应该是掌握大量情况和地址的。因为，如果这样做，你们就可能很容易地揭露出一系列反革命组织，甚至有断绝他们今后经费来源的可能，这就等于粉碎了他们；请你们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没有对他使用这样的酷刑，使反革命分子一听到说要用刑就会吓得全身都凉了，可是你们却允许他十分舒适地'离开'了全俄非常委员会？或许你们认为，对一个人施以酷刑是很不人道的吧！那么，这比为了推翻苏维埃政权在饥饿痛苦中寻找同盟者时爆炸桥梁和粮库的行为更不人道吗？……让每个英国工人了解，他们国家的官方代表做出了那样的事情，以至于不得不对他施以酷刑。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工人不会赞成这个坏家伙（而他又有更高级的坏家伙领导他）不会赞成爆炸和收买特务的办法的。已姑息够了；抛弃那些和你们不相称的什么'外交'和什么'代表资格'的游戏吧。"①

503

但是诺林斯克工作人员的号召没有得到全俄非常委员会机构本身的支持。就在同一期《周报》中发表了一篇捷龙关于审问原看守的文章。文章写道："在旧社会，我们总以为，那些残忍的看守，宪兵和警察是没有人的灵魂的：他们在看到他们的全部力量淹没在有觉悟的工人的血泊中和无知的受尽痛苦的俄国农夫的泪水里时，他们的心都不跳一下。当我们受到宪兵的非刑拷打快要死去时，我们经常不觉要问：难道你们不懂得，你们可以一下子把我们打死、枪杀、吊死，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折磨我们？"捷龙接着写道："可是现在，所有这些看守和宪兵当他们面对无产阶级政权时，变得那么一钱不值，他们都在发抖，一个个昏厥过去。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是无情的。但同时他又是坚不可摧，十分强大。他们对凶恶的敌人没有一句咒咀。不加任何严酷刑罚！没有多余的话！应该把那些原来迫害工人的已被战败了的出卖灵魂的东西从地球上扫

① 《全俄非常委员会周报》1918 年第 3 期，第 7—8 页。

除干净。"①

根据女作家叶·雅·德拉勃金娜(1918年她做过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秘书)证实,《你们为什么要姑息?》一文引起了广大党员群众的愤怒。许多读者给报刊编辑部写抗议信,这些信有的发表了。

斯维尔德洛夫知道这次辩论。当他了解了送给他的材料,他愤怒极了。有关这篇《全俄非常委员会周报》的文章问题被提交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主席团通过了下面的决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了登载在《全俄非常委员会周报》第3期《不要姑息》一文,认为,其中提到的有关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的思想是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和任务背道而驰的。由于需要,我们在同反革命运动斗争中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我们清楚地知道,同反革命的斗争采取公开武装斗争形式,在这一斗争中无产阶级和贫穷农民不得不采用恐怖措施,但苏维埃政权从根本上拒绝采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所坚持的手段,因为这些手段是有损于为共产主义斗争的利益的,对它是有害的,和它是相矛盾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严厉谴责该文作者及选登了这篇文章的《全俄非常委员会周报》编辑。"同时还决定停办《周报》,撤除《你们为什么要姑息?》一文作者的职务,并且禁止他们在苏维埃政权机构中担任职务。与此同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指出,必须继续同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 504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这一决议并不是偶然的。各派的俄国革命者从来对各种肉体刑罚都是持极不能容忍的态度。例如,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主要5名组织者被处死后,"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С.С.兹拉托波里斯基被逮捕,关在彼得巴夫洛夫斯克要塞的特鲁别茨克三角堡垒,这里是"特别危险的国家罪犯"的单间牢房,条件十分可怕。兹拉托波里斯基设法从他被关的监

① 《全俄非常委员会周报》1918年第3期,第9页。

狱的号子里向外面发出过"很长的信"，这封信后来作为传单在全国广为传播。信中在描写了彼得巴夫洛夫斯克要塞，特别是特鲁别茨克三角堡垒对政治犯所规定的骇人听闻的制度之后，兹拉托波里斯基用下面的号召结束了他的这封实际上是死前的最后的一封信："朋友们和弟兄们！从我们黑牢最深处，我们也许是在世时最后一次了，向你们寄去我们的遗言：在革命胜利时（它是进步的胜利），请不要使用暴行和残酷的行为对待战败的敌人，玷污这神圣的字样。啊！如果我们能够做为赎罪的牺牲，不仅能够在俄国实现自由，而且能够在全世界扩大人道主义，那有多好啊！人类应该摒弃单独监禁，摒弃对犯人的暴行和迫害，不管其形式如何，正如人类曾摒弃了用辗刑、吊刑和火刑一样。向你们致意，向亲人们致意，向一切活着的人致意。"

505

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初期监狱行政鞭笞和动手打犯人时，通常不仅引起布尔什维克，而且也引起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为此，曾发生不少集体绝食、起义事件，甚至在特殊情况下还发生过大规模的自杀。连沙皇监狱的当局在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考虑这些集体抗议。所以毫不奇怪，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真正革命者的良心甚至对革命的敌人也不能同意使用任何肉刑。因此斯大林的作法，即不仅允许，而且在惩罚机构的工作实践中推行酷刑和迫害，是对所有俄国革命者的斗争及对他们的缅怀的践踏。

在评价斯大林的这些做法时，我们应该探讨的不仅是说无产阶级国家原则上不能使用严刑，我们还不能不把问题说清楚：酷刑和迫害是审讯中最不完善的一种方法。在多数情况下非刑拷打不会把问题搞清楚，而是相反，会导致对真实情况的歪曲。作为审讯方法，酷刑通常会导致假口供，即被告同意作任何交待，只要使难以容忍的折磨停止下来。也就是说，酷刑的目的不在于找到犯罪的人，而是要把无辜的人说成有罪，强迫他诬陷自己和别人。中世纪的宗教裁判者曾强迫作了他们牺牲品的人们交待自己同魔鬼的

联系，他们是非常清楚这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侦察机构也很了解这点。著名的英国反间谍工作人员O·平托在他的书中写道："毫无疑问，体刑会使最有毅力，身体最强壮的人屈服。我认识一个具有惊人毅力的男子，盖世太保分子把他的指甲全部剥掉，然后折断了他的腿，但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后来这个人承认，当刑吏停止用刑时，他的忍耐力已经到了尽头，但如果还继续对他用刑的话，他大概就再也忍受不住了，他会什么都承认的。没有一个人能忍受得了一种水刑：水一滴滴地相隔几秒钟滴在人的头上。我坚信，任何人过几分钟就不能不开口了，过一小时他就会发疯。毒刑能逼得无辜的人甚至于'承认'要被判死刑的'罪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为，一下子就死掉比受非人的折磨要好得多。体刑总归会逼得任何人开口，但不一定说真话。"① 不过，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在强迫诚实的、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交待自己和我国人民的敌人及外国间谍的假关系时，对这点也是非常清楚的。 506

*　　*　　*

大家知道，甚至于在中世纪，广泛使用非刑对付"异教徒"的宗教裁判所也试图用一些办法去限制宗教裁判者的专横。"异教徒"被鞭打，被吊到拷问架上，把人体拽长，还用水刑、饥饿、不给水喝折磨他们。但按官方规定，不允许宗教裁判官在用刑时流血。在审讯过程中对"异教徒"只能用刑一次，而且时间不得超过一小时，以便使记录人、刽子手和宗教裁判官得到休息。

这一切限制都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人员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在审讯过程中对犯人多次用刑而且一用刑就是连续几个小时。野兽般的审讯员和刽子手的刑询使犯人成为残废，不仅毒打他们，还用不让睡觉，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的办法去折磨他们，甚至挖掉他们的眼睛，捅破鼓膜（如对待马米亚·奥拉赫拉什维里那样），打断他们的腿，胳膊，剥掉指甲，用烧红的铁烙他们等等。 507

① O·平托：《追捕间谍》第2章《讯问方法》。引自《秘密使命》汇编，军事出版社莫斯科1964年版。

一些活着出来的苏联人讲了不少使人毛骨悚然的用刑的事实。

根据Р·Г·阿里哈诺娃证实，著名党的工作者И·汉苏瓦罗夫在审讯期间连续十天站在水里。С·柯秀尔的妻子告诉阿里哈诺娃，柯秀尔坚决拒绝作假交待，他的刽子手们把柯秀尔的十六岁的女儿带到审讯室里，当着父亲的面把他的女儿强奸了。此后，柯秀尔就在所有"交待"上签了字，可是他的女儿被放出来以后卧轨自杀了。

布蒂尔卡监狱的审讯员暴徒因为没有能够在一个共产党员身上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交待材料，他们当着他妻子的面折磨他，然后又当着他的面折磨他的妻子。

而在这方面，最可怕的是苏哈诺夫监狱。这个监狱的审讯员告诉细菌生物学家П·Ф·兹德拉多夫斯基说："你要知道，我们的监狱是什么都允许做的。"在苏哈诺夫监狱关押的犯人几乎全都是过去很高级的干部，每一次审问往往都是从笞杖受审者开始的。他们想用这种办法给他个下马威，煞犯人的威风，使他屈服。П·Ф·兹德拉多夫斯基说："我很幸运，只挨过耳光，没有被鞭笞过。"而波普利亚·奥尔忠尼启泽的妻子①的命运则是另一样了，她在苏哈诺夫监狱被鞭笞死了。

根据А·В·斯涅戈夫的证实，在列宁格勒内务局的用刑牢房里，让一些犯人坐在水泥地上，然后把一个里边四面都钉满钉子的箱子盖在他们上面。向上的一面有一铁丝网，有个倒霉的医生一昼夜来看一次犯人。这箱子只有一立方米的容量。1938年，个子不高的斯涅戈夫被关在里面，身体特别高大的巴·叶·德宾科也被关在里边。这一"方法"是从芬兰的暗探局那里学来的。

508

内务部一个上校在叫来一个提审的犯人后，就往一个杯子里小便，然后让犯人把尿喝掉。如果犯人不喝，那么往往还没有被讯

① 波·奥尔忠尼启泽是谢尔哥·奥尔忠尼启泽的哥哥，他的妻子是尼娜·奥尔忠尼启泽。——译者

间就身亡了。

根据苏连·加扎梁的揭发，当索索·布阿奇泽（他是格鲁吉亚师师长、革命英雄诺依·布阿奇泽的儿子）没有供出所需要的交待材料时，这个共产党员被他的刑吏剖了腹，然后快要死去的索索被关到牢房里。布阿奇泽的一个朋友达维德·巴格拉蒂奥尼刚被捕后，在受刑前也和他关在同一牢房里。加扎梁本人也遭到非人的折磨，他不久前（1937年6月前）还是外高加索内务部的负责干部。在他写的尚未出版的书中这样描写了这些酷刑：

"艾瓦佐夫（审讯员）收拾好桌上的材料，锁在抽屉里。桌子上只剩下我的供词'记录'。

'好吧，我走了，工作队很了解自己的任务'，他转过头来对我补充说，'我在桌上放了你的审讯记录。你一旦愿意签字，告诉一下。'

他走了。

……'工作队'来了。他们共5人。第一个进来的是雅科夫·柯彼茨基。他是内务部的老工作人员，我们彼此很熟。个子很高，身体强壮。他是个很神经质的人，被称为'神经病雅沙'①。他知道这个绰号，但不生气。在他后边进来的是伊万·艾瓦佐夫，他是古尔根·艾瓦佐夫的弟弟。他也在内务部机关工作几年了，也认识我。第三个是特别事务局的下级工作人员，过去是边区公安干校的学员。他生有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胡须很长，大个子。他几乎没有额头，眉毛上面长着浓黑的长头发。他姓什么我忘记了。最后两人是边区干校的实习生。其中一人拿着（按他们的话说）一个'工具'箱。

没有什么可说的，个个都身强力壮。

'啊！今天我们工作的对象原来是你啊！'柯彼茨基说，'那我们是很高兴的。'

① 雅沙是雅科夫的爱称。——译者

我还是坐着不动。他们把我围起来。柯彼茨基在后边抓住我的领子，把我提了起来，一使劲儿就把我推到房间的中间去。不知谁使劲踢了我一脚，我就倒下了。……第三人把我的裤子扯了下来，……这时我回忆起巴格拉蒂奥尼回牢房时没有穿外裤，只穿着一条短裤的情景。

酷刑开始了。

五个人使劲毒打我。他们拳打，脚踢，鞭子抽，用擦枪用的通条打，拿用布手巾紧紧拧成的鞭子抽，随便拿起什么东西就打，碰到什么地方就打什么地方：头、脸、背、肚子…… 多半他们打我的腿。因为不知是谁，发现了我的腿有病，所以专门打腿……

'我们现在来治你的腿！'

打呀，打呀，没完没了地打，越打他们的兽性越发作，特别使他们恼火的是我没有喊叫。

'你叫不叫？喊不喊？告不告饶?!'柯彼茨基一面大骂，一面继续打，打……

不知打了多长时间。

'喂，小伙子们，抽烟了，'柯彼茨基命令道。

我的干干净净的衬衣成了血染的布片，地上是一滩血，我躺在血泊里。我的眼睛肿了，我勉强睁开眼皮，模模糊糊地看见了我的刽子手们……

他们在抽烟，休息。

他们用最下贱的话谩骂，污辱，折磨，哈哈大笑……

不知谁走到我的身边，我马上感到特别痛疼，有什么东西在烧我，痛得浑身发抖。为了不喊出来，我咬紧牙关。可是他们捧腹大笑……后来一次又一次地烧我……我明白了，他们正在我身上熄掉烟头……

他们休息完了，毒打又重新开始了。

很奇怪，打得更凶了，但疼痛反而轻了。当我醒过来时，感到有药味，不知有个什么白色的东西在我眼前晃动。

啊，原来我失去知觉，他们使我恢复了知觉。

'好了，我走了，'护士说。

'好了'！这意味着可以重新开始了。但是'工作队'在抽烟。我心惊胆战地想，他们又要在我身上熄烟头了。拿烟头烧时是非常疼痛的，开始烧时全身都烧痛了。难道又要来了吗？是的，抽完烟的人会来到我身边，他们准来污辱我，在我身上熄灭烟头，漫骂，吐唾沫，然后走开，让给另一个人再干。

一切都按一定的顺序进行：毒打，抽烟，熄烟头，又是毒打，昏倒，弄醒过来，又是毒打，又是熄灭烟头……

天快亮了，而'工作队'继续'工作'……

艾瓦佐夫来了。

'好了，小伙子们，睡觉去吧！'他打招呼后说，'好，你们的工作都明摆在这里了'。

'睡觉去'。这就是说，'工作队'夜里工作，白天休息。

'工作队'走了。

'每天都要这样干，直至签了字为止。懂吗？'

艾瓦佐夫给警卫队打了电话：

'来两个人押送犯人'。

两个值班看守把我拖回牢房，和昨天拖回巴格拉蒂奥尼的情景一模一样"。

白俄罗斯党的干部Я·И·德罗宾斯基在他写的回忆录中也描写了同样可怕的情景。他的书讲的是1938年明斯克中央监狱里的"审讯"方法。他写道："十点钟又通过这条走廊把他带到同一个房间里。但这是多么大的差别！……白天这儿还是安安静静的走廊，安安静静的，讲究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那些穿戴整洁的，头发梳得光亮的人们翻阅着卷宗。可是晚上安德烈走过这里象通过一个行刑队列一样：受刑的人在喊叫，刑吏的最下流的肮脏的漫骂声从每一房间里传出来。某处眼前闪过了躺在地上的身躯，安德烈看到了一个发紫的熟悉的面孔……这是柳博维奇，老布尔什维克，共

和国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计委主席。他参加了列宁在 1917 年10月组成的第一届政府。他是邮电人民委员波德别里斯基的副手。他是小人民委员会议① 的成员，和列宁一起工作过。现在他躺在地上，挨橡胶皮带的鞭打，他这个六十岁的老人正在喊'妈妈'……这只是一瞬间，可是一辈子也忘不了……这是二十世纪的刑讯室。他被带到办公室里。和白天一样，室内有两个人：多夫加连科和一名运动员。'怎么样？'，大尉煞有介事地问道，'想明白了吗？'安德烈摇摇头。

'脱上衣'……安德烈没有动。那个年轻人把上衣往上一拉，上衣被撕开了，破了。'唉，那怕能打他一次也好！'安德烈猛地伸出右拳去打年轻人的下巴，但是扑了空。就在这同一瞬间他的双臂受到对手的两次掌击。剧烈的疼痛通过双臂，于是他的上肢象鞭子一样垂下来了。紧接着那个青年人一次、两次、三次打在他的胸部……安德烈靠在墙上了。他们两个人走到衣架前，拿下两个大棍子，开始认真地工作了。他们从两边有节奏地打他的后脑，两肋和脊背。安德烈咬紧牙齿，痛苦地哼着，要紧的是绝不喊叫，绝不因此叫他们高兴……开始时疼痛难以忍受，但后来麻木了。这时，他们不知用什么东西，碘酒，盐水或普通的水浇他，于是真疼得无法忍受，可怕极了。身体好象被野兽的牙齿撕着一样，似乎有成百成千条野狗在啃这个可怜的受尽了折磨的躯体。

'怎样？写不写？'

他没有回答。为了回答必须张嘴，那样的话他就会喊出来。不能喊。其他房间里传出喊声。有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在喊：'杀人犯，法西斯分子，不许动，不许动！你们怎么敢！'安德烈在想：'我的上帝啊！他们要把她怎么样啊？'可是这两个人还在休息"……②

---

① 小人民委员会议，即指人民委员会议的常委会。——译者

② Я・И・德罗宾斯基是白俄罗斯的党的干部，过去是联共（布）莫基列夫市委书记。他的回忆录《在考验的年代》得到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高度评价。

* * *

我们觉得，也应该简单谈谈那些受过内务部非刑的苏联人的表现。大家知道，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由于忍受不了连续许多天的非人折磨，而在假的审讯记录上签了字。

老布尔什维克C·П·彼萨列夫回忆说："光在两个监狱里（路比扬卡内部监狱和列沃尔托夫监狱）我就经受了四十三次骇人听闻的折磨——包括往脸上吐唾沫和最肮脏下流的谩骂等各种污辱，这都名不副实地称之为'审问'（！）。其中二十三次是各种各样的体罚，这仅仅是因为我拒绝诬告自己。在那可怕的年代里，象我这样经受了如此长的、把刽子手弄得筋疲力尽的酷刑的犯人是不多的……在莫斯科四个最大的监狱中，先后和我在同一牢房住过的和我一样的犯人，大约有四百人。除了两人外，其他全是共产党员。几乎所有的人党龄都很长。党龄最长的是1905年入党的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兰道，他多年来领导莫斯科国营苯胺染料工业托拉斯。其中还有教授，红军的团长，许多从西班牙回来的军事领导人和政治干部、文学家，甚至检察长苏彼茨基。这些有过功劳的共产党员之中，到最后共有四个人（着重点是C·彼萨列夫加的）经受住了种种酷刑，没有诬陷自己和别人。我是这四人当中的一个。我们都在等待枪决或到集中营去。多数人期望能去集中营，以便得以免受非刑，不至于被枪决。"①

现在，当三十年代镇压的悲剧含义对我党和人民越来越清楚了之后，显然就很难去严厉谴责那些被关起来的人们，说他们面对专横的暴行，没有表现得十分坚强和没有足够的反抗精神。这些人 精神上被解除了武装，他们不知所措，他们不明白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们的斗争意志。对这些人的行为的许多方面，如果说我们不能完全为之开脱责任，那么我们是能够为之解释清楚的。所以我们不能同意亚·瓦·哥尔巴托夫将军的

① C·П·彼萨列夫是老共产党员。他在从区委到苏共中央的各级机构中担任过各种职务。在斯大林专横时期他被逮捕过四次。

态度，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发表在《新世界》杂志①）与其说是把他的愤怒集中在折磨苏联人的审讯人员身上，还不如说集中在没有经受得住这些折磨的人们的身上。我们现在知道，被监禁的人们的表现是不同的。有些被捕的人马上迎合了审讯者的愿望，没有进行任何反抗就诬告了自己和几十几百个同志。根据M·B·奥斯特罗果尔斯基的证实，原《农民报》编辑C·被内务部关起来后，马上开始交待并诬告了本报社的几十名工作人员。在这些软骨头当中，有些人走得很远，他们不仅满足审讯员的要求，而且还觉得这是一种残忍的乐趣，主动地写了材料，诬陷了他的许多同事和朋友，要求逮捕他们，尽管他们完全清楚这些人是无辜的。

这些软骨头后来往往还继续和内务部工作人员合作，变成他们的“情报员”，“同党”，“背后搞小汇报的人”，密告自己同牢房或集中营同营棚的人。

还有不少犯人，在几次审讯后自杀了，他们把头撞到洗脸池或墙上，或者是出去放风时去打看守，或者是从窗户跳了下去。

有些人长时间地、顽强地反抗非法的审讯，但最后经不住严刑和折磨，在由审讯员炮制的假记录上签了字。根据苏·奥·加扎梁回忆，著名的格鲁吉亚共产党员达维德·巴格拉蒂奥尼已经受了连续十五夜的酷刑，最后他被折磨得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514 在审讯记录上签了字。根据И·П·阿列克萨欣的回忆，重工业部的著名活动家巴甫路诺夫斯基连续几个月没有交待自己的“暗害”活动，可是当把他关在满是老鼠的单间水牢里后，他实在受不住了，敲了一下牢房门说：“暴徒们，你们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吧……”，于是他在审讯记录上签了字。根据M·B·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回忆，原司法人民委员尼·瓦·克雷连柯在受了极残忍的刑罚后才同意作交待。他要来几张纸，在牢房里当着同牢的同志的面无可奈何地开始“建立”自己的“反革命组织”。此时，他嘟哝

① 《新世界》杂志1964年第3—5期。

着说:“伊万诺夫我舍不得他,他是好干部,好同志,我不写他。可是彼得罗夫是坏蛋,把他写上……”

列宁格勒州党委的负责干部M·P·马也克被捕后,给他拿来了波·巴·波捷恩的交待,波捷恩“承认”自己在列宁格勒建立了庞大的反革命组织,吸收了包括马也克在内的许多人。马也克了解波捷恩是诚实的、有文化的人,他是1917年红卫军的组织者之一。他不相信,波捷恩会在类似的记录上签字,马也克要求当面对质。隔一天,这样的对质当着审讯员的面进行了。很多年以后,当M·P·马也克已经平反了的时候,他讲述了这一段情况,他说:一个疲备不堪的老头子走进审讯员办公室,他勉强认出这就是波·巴·波捷恩。马也克问他:“波利斯·巴夫洛维奇,您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胡言乱语的东西,说把我吸收进反苏组织中了,是吗?”但是波捷恩眼睛看着地板,一边说:“没有关系,亲爱的,我吸收了,我吸收了。”马也克立刻什么都明白了。

有些被审讯的人在涉及自己的任何交待上面签字,但是坚决拒绝诬告自己的同志。M·Д·拜卡里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不愿意说谎,好象自己在受审时是英雄好汉,在任何记录上都没有签过字。我签过字,但只是在涉及我一人或涉及任人皆知的事情时。当审讯员叫我牵连一些还活着的人们时,我就坚决否认。曾要给我加上一个顶头上司,我没有上当。他们还千方百计要把鲍利斯·哥尔巴托夫牵进去,我还是坚持不牵连他,也就是竭尽全力否认他和我有任何关系。看来,还是有成效的:他得以死在自己的床上,而不是死在集中营里,尽管审讯员对我说:‘奖金获得者对我们是一文不值的,你的军功勋章也不值什么。一千次都表现得好,但只有一次叫我们不顺心,就够你受的了。明白吗?’”①

515

① M·Д·拜卡里斯基:《为孙子们留下的笔记》,未发表的手稿。M·Д·拜卡里斯基于1967年给我们看了他的回忆录,并允许我们引用它,但是不提作者的名字。现在M·Д·拜卡里斯基请我们用作者的真实姓名代替原来的笔名(Д·米哈伊洛夫)。在我们引文中写的是战后的审讯情况。

我们知道，许多被捕者在任何审讯记录上都没有签字，尽管受尽了最残酷的折磨，我们前面提到的苏连·加扎梁就没有签字。北哈萨克斯坦州委书记H·K·库兹涅佐夫经受住了最恶毒的折磨，自己没有承认也没有诬告别人。他连续八昼夜站在他的刑吏面前，不吃不睡，第九天他失去了知觉，倒下了，但还是没有在已准备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

涅斯托尔·拉科巴（死后被宣布为“人民敌人”）的妻子也没有在任何伪造的记录上签字。在被贝利亚毒死的拉科巴去世不久，他的妻子——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被人们称为格鲁吉亚的公主——被捕了，关在梯比里斯监狱里。根据列凡·果戈别利泽的妻子，努查·果戈别利泽证实（她同拉科巴的妻子关在同一间牢房里），这个沉默而安静的女人每天晚上都被带走，进行非刑讯问，早晨拖回牢房，全身是血，失去知觉。女同志们都哭着要求叫医生，并想办法使她恢复知觉。她醒过来后说，他们要求她在名为《拉科巴怎样把阿布哈基亚出卖给土耳其的》的文章下面签字。她对刽子手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不会诬蔑我丈夫的英名。”她甚至在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面前也经受住了考验：她的爱子，十四岁的中学生被捕了，在审讯时，哭着的儿子被推到母亲身边并向她宣布说，如果母亲不签字的话，儿子要被打死（后来他们实现了这个威胁）。但是科拉巴的妻子在和儿子会面后也没有诬告自己的丈夫。有一次在一整夜非刑后，她在牢房里死去了。

以科萨列夫为首的共青团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在审讯期间也表现得很坚决。虽然用尽了最残酷的刑法，也没有使这些年轻而顽强的人们屈服，根据В·Ф·皮金娜的证实，正是由于科萨列夫及他战友的顽强表现，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想制造一起公开的“共青团”案件一事，才未能得逞。

哥尔巴托夫将军什么都不承认，也没有诬告其他人。

我们不能谴责前者的软弱。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象加扎梁、库兹涅佐夫、彼萨列夫、拉科巴的妻子、科萨列夫、哥尔巴托夫这些

人的功勋，他们的功勋是在比我们所知道的许多丰功伟绩更艰苦的条件下作出的。

但是我们不能，也没有权利谴责象巴格拉蒂奥尼，巴甫路诺夫斯基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柱，不明白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象哥尔巴托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所断言的那样，说这些不幸的人们在伪造的记录上签了字，"就使审讯工作产生了错误"这类话是不对的。在个人迷信时代内务部的牢房里所发生的一切，不是什么审讯，而是知法犯法的犯罪行为。

当H·库兹涅佐夫和诬告他的一个朋友关进一间牢房时，他并没有不理他的朋友，而是走到他的同志身边，拥抱了他。苏·加扎梁对自己的同志(也在加扎梁案子上提供了假交待)也持同样的态度。可是哥尔巴托夫对和自己关在一起的难友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他声称："因为你们写了假供词，你们已经犯下了应把你们关在监狱里的重大罪行。"① 我们并不认为，哥尔巴托夫的作法是 517 正确的。女共产党员叶·谢·金兹堡是在审讯中没有屈服的人，她在《陡峭的征途》一书中写道："我不愿意把自己说成英雄和蒙难的圣者。我也远不认为自己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勇敢才能拒绝在阴谋伪造的记录上签字。我也不愿谴责那些在无法忍受的迫害之后在要求他们签字的所有材料上签了字的人。我只不过很幸运，因为我的案子在开始广泛使用'特殊方法'之前就完结了。当然，从判决上来看，我的顽强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我也和那些上了当的人一样被判了十年徒刑……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优越性，那就是我有着纯洁的良心，我知道没有一个人由于我的原因或因为我的软弱而掉进了'柳齐弗的罗网'② 之中。"

在1965年去世的老布尔什维克巴·伊·沙巴尔金的日记中我们看到有关被捕的人表现的有趣的事实和看法。沙巴尔金本人曾两次受审，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关了大约二十年。巴·伊·沙巴尔

① 《新世界》杂志1964年第4期第119页。

② 柳齐弗是基督教神话中的魔王，是地狱的主宰。——译者

金问过自己："为什么那么多忠实于革命、宁肯为革命去献身的人们，那些经过沙皇监狱和流放，不止一次面对过死亡的人们，在审讯期间屈服了，并且在伪造的记录上签了字，而且'承认'自己有各种各样他们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这些'交待'和'自我诬陷'的原因在于：

1.逮捕后，马上开始对被捕的人进行积极的处理。首先是进行谈话，多少还有一些礼貌，以后就是喊叫和谩骂，煞威风和污辱，往脸上吐唾沫，挨打，但打得还不算重，以及嘲弄等等，如说：'你是坏蛋'，'你是下贱货'，'你是叛徒和间谍'，'你是真正的败类'等等。把人污辱到最大限度，叫他明白，他是一钱不值的东西。

这样日以继夜地进行着所谓的'车轮战'。审讯员在更替，可是犯人一直在站着或者坐着，昼夜不停。例如，我就这样渡过了八昼夜。不让睡觉，总是硬给茶喝。'车轮战'是非常可怕的刑罚。在车轮战期间又是踢，又是污辱，如果反抗的话，就挨打。'车轮战'的任务是让人屈服，变为一个懦夫。

518

但如果你经受住了'车轮战'，没有被'粉碎'，接着就是上刑。受刑的人最后被折磨到一种什么都无所谓的状态，他什么都会同意。

'你是坏蛋'。——'是，坏蛋'。

'你是特务'。——'是，特务'。

'你过去是内奸'。——'是，我过去是内奸'。

'你曾想暗杀斯大林'。——'是，我曾想暗杀斯大林'……

这时候，把由审讯员编造的一些供词强加于被逮捕的人们，他们就都驯服地接受了。审讯人员急于巩固已取得的成绩。他们就正式编好初审记录或'亲笔交待'。

2.下一阶段是巩固已达到的'成绩'阶段。被捕的人得到较好的饮食。给他烟抽，把亲人送来的东西转交给他们，甚至允许他们看书看报。但是对这些不幸的人们进行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审讯人员使他们明白，现在想翻案已经不可能了，为了挽救自己，只有'诚恳地悔改'，他自己现在应该考虑：还有什么事情应该告诉审讯

人员。犯人得到纸张、墨水，让他在牢房里写‘交待’，提醒他应该写什么内容，并监督他写好。

被处理过的对象往往会发生动摇。但是内务部已想好成千上万种能压倒这种动摇的方法。犯人有机会去和他同样不幸的人进行对质。这时会发生‘相互影响’。于是又采用体罚的补充方法。犯人被叫到‘检察长’那里，他实际上是审讯员化装假扮的。这时就搞阴谋进行假‘开庭’审判。

3. 如果受审的人要在法庭受审（绝大多数犯人是背着他们由各种三人委员会、特别会议等定罪的），那么还要进行辅助性工作，某种审判排练。这时一切手段都被搬出来了：威胁、劝导，进行‘严肃的谈话’，说：‘你要知道，不是简简单单枪决你，而是要折磨你，把你一块块撕碎’。许多人都被劝导说，都不会被枪决，说这只是为了登报，实际上大家还会活着，不会受到损害。为了说服他们，把那些‘被枪决的’活着的人带给他们看（后来这些人还是会被枪决，但这时是用来欺骗活着的人）。在开庭时期，刽子手和残酷的刑讯人员都在场，他们就在犯人的眼前。他们的在场，使犯人能活生生地感到：如果他们有反复的话，结果会如何……

519

4. 审讯者制造了一套很复杂的对受审者进行‘个别对待’的方法。首先通过暗中汇报的人，通过提他到审讯者那里受简短讯问（如果他是关在单人牢房），对他进行研究。在牢房里，在审讯员办公室里进行处理。对某甲进行恫吓，对某乙进行劝说，对某丙进行许愿，对某丁则综合使用上述各种方法。但最主要的是，犯人失掉为自己当场辩解的任何可能性。

5. 很有毅力的，不止一次面对过死亡的人，在审讯中往往被屈服，进行骇人听闻的自我诬蔑，其主要原因还不在于审讯的极端残酷。原因在于，这些人突然失去了从小时就培育了他们的土壤。这时，人也如同一棵被从土地里拔了起来、扔掉，任凭风吹雨打的植物一样，失去营养，水分和阳光。理想破灭了。在你面前似乎也看不到阶级敌人。人民，苏联人民对你持敌对态度。你是‘人民敌

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依靠。一个人掉进了深渊，自己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为什么缘故？……"

沙巴尔金接着写道："可以理解，有不少人不战而降了。监狱中审讯的恐怖气氛也促使这种绝望情绪的形成。许多刚进来的犯人马上在强加于他们的一切材料上签了字，他们认为反抗是没有用的，辩解是不可能的。这时在审讯实践中产生一种新现象，即双方心平气和地协商有关'罪行'和'惩罚措施'问题。许多军人的这种'软弱'，使我吃惊。他们说：'不，我不让他们打我。如果不需要我，那就枪毙我好了。他们所要求的，我都签上字。'他们这样做，毫不反抗，不斗争……这也是对专横的某种反抗。"

* * *

二、戏剧性的审判。监狱和流放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写过的那样，绝大多数政治犯是背着犯人由各种"特别会议"和"三人委员会"判决的。但在许多情况下（显然，是为了以后写历史）还是举行秘密法庭审讯，没有观众，辩护律师和检察长。这样的审判，不管案件如何复杂，通常不超过五、十分钟（对阿·科萨列夫的开庭审判进行了十五分钟，这是少见的例外）。亚·瓦·哥尔巴托夫对军事委员会法庭有如下的描写：

"在小礼堂的桌旁坐着三个人。我看到坐在中间的主席衣服上有宽条的金色袖章。我想：'他是海军上校'。我一直很高兴，因为我正是渴望我的事情通过法庭来解决。审讯共进行了四、五分钟。问过姓名，父名，生日和籍贯。然后主席问：

'您在审讯过程中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我没有犯过罪，没有什么可以承认的，'我回答。

'为什么已被判决的十个人都交待了有关你的材料？'主席问道。

我这时的情绪特别好，我坚信自己会被释放，所以我非常自然

地作了回答，后来我是多么后悔。我说：

‘我读过维克托·雨果的一本书。里面写道，十六世纪在不列颠岛上审判了十一个人，罪名是他们和魔鬼有联系。十个人承认了这种联系，当然是在受刑之后，但是第十一个人不承认。这时詹姆士国王下令在大锅里把这个可怜的人活煮了，从一锅煮他的汤里看这人是否和魔鬼有联系。显然，那十个承认并指控我的人也是和那十个英国人的感受到的一样，他们不愿意经受第十一人要经受的。’

法官笑了一下，互相看了看，主席（他似乎是姓尼基特钦科）问了旁边的人：

‘怎么样，一切都清楚了？’

他们点了点头。我被带到走廊。过了两分钟，我又被带到礼堂，向我宣布了判决：十五年监禁（监狱和集中营），刑满后剥夺公民权五年。

这对我是多么突然，我瘫倒在地上了。”①

在叶·谢·金兹堡的回忆录《陡峭的征途》中我们也看到对审判的同样的描写。

“决定我的命运的时刻来临了。桌旁坐着最高法院的军事法官。有三个军人，坐在旁边的是秘书，我面对着他们，两边是两个看守。这就是‘公开开庭’的‘审判’……七分钟！整个悲喜剧只进行了七分钟，不多不少。司法人民委员部法庭主席德米特利也夫的声音和他的眼睛一样……在这里连狂热的影子都看不到，不象我的审讯者在他们工作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样子。法官只是应差，挣自己的工资。可能还有定额，并为超额而奋斗。

‘起诉结论看到了吗？’法庭主席用那种无法忍受的枯燥无味的声调问道。‘承认自己有罪吗？不承认？但是证人已经交待了……’

① 《新世界》杂志 1964 年第 4 期第 122 页。

他翻阅厚厚的'档案'咬牙切齿地说：

'例如，证人科兹洛夫……'

'是科兹洛娃，她是女人，而且是很坏的女人。'

522 '是，是科兹洛娃。还有证人季亚钦科……'

'季亚科诺夫……'

'是的，他们说……'

他们在说什么法庭主席并不想知道。他停顿一下，又问我：

'对法庭有什么问题要提出吗？'

'有。我是按58条第8项受审的。这是控告我进行恐怖活动。我请你们给我指出来，按你们所说的，我想暗杀的是哪个政治活动家，他姓甚名谁？'

法官沉默片刻，对这莫名其妙的问题的提出觉得奇怪。他们责怪地看着这位妨碍他们'工作'的，多事的女人。然后那个满头白发的人咕咕哝哝地说：

'您已经知道，基洛夫同志在列宁格勒被暗杀。'

'是的，但是打死他的不是我，而是叫尼古拉也夫的人，另外，我从来没有在列宁格勒住过，这种情况叫做'不在现场'吧？'

'您是法律工作者？'那位满头白发的人不耐烦地说。

'不是，我是教员。'

'您为什么要强词夺理？没有在列宁格勒住过……那么是你的同谋打死的，就是说，您要为此负道义的和刑事的责任。'

'宣布暂时休庭，下面进行讨论'，主席又喃喃地说。所有'开庭'参加者都站了起来，懒洋洋地伸了伸发麻的腿。

我又看着圆盘钟，他们是来不及抽一支烟的，没有过两分钟，这一'大集会'[①]的参加者又回到自己的坐位上。主席拿着一大张纸，非常好的厚纸，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打字稿，很长，这个稿子打一遍至少要二十分钟。这是判决。这是关于我的罪行和与之相应的

① 原文用了古希腊高级官员的大集会，以商议重大问题，这里是讽刺当时的法庭审判。——译者

惩罚的国家文件。它是以下面的庄严的词句开始的：'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名义……'，后边是长长的语义不清的话。啊！这就是控告结论中的'简短序文'，还是写着那些'怀着复辟资本主义之目的'……'地下恐怖'……等词句，只不过'被控告'的字样现在换成'已确认'的字样罢了…… 523

我感到周围是一片黑暗。宣读判决的人的话是通过这片黑暗，如同远处的浑浊的急流渗进我的耳朵里的。现在这急流马上要把我卷进去。在这样的荒谬状态中，我突然明确感到站在我两边的看守人员所做的完全实在的动作，他们把我的两手反扣在一起了。这是为了当我倒下去时，不至于碰到地上。难道我一定会倒下吗？是的，他们是有经验的。可能许多女人在宣布'极刑'时都要昏倒的。

黑暗继续压过来，现在要把我卷走。突然……

这是什么？他说了什么？如同闪电一样，使我清醒过来。他说……我不会听错吧？

'判处十年监禁，严格隔离，刑满后剥夺公民权利五年……一切都变得明亮和温暖起来。十年？这就是说还能活着！'

亚·瓦·哥尔巴托夫和叶·谢·金兹堡分别被判处十五年和十年监禁。但对许多犯人，包括多数苏维埃，党、军队的领导人，判决之日就是他们生命的最后的一天。根据1934年12月1日法令，死刑是要立即执行的。只有极少数被判了死刑的人在死囚牢里再待几天或几个月。绝大多数是在宣判后马上拉出去枪毙，枪毙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通往地下室的梯子上某处朝后脑上开一枪；在小路比扬卡监狱和列沃尔托夫监狱的地下室里枪毙掉，据一些犯人说，那里安装了一个拖拉机上用的发动机，以便压住枪声。E·П·伏罗洛夫有一次记录了一个解送犯人的士兵的话，他押送过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原押送兵说，他曾押送这些犯人到赤色普列斯年斯克区的刑场，这是紧靠墓地的一块空地，用高墙围着。被判处死刑的人就在这墙下被枪毙。执行的有两个专门的人，他们住 524

在土窖里。当押送兵送来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时，土窖里就出来一个醉鬼，接了犯人和有关处决证件，就立即枪决。押送兵进过土窖，那里摆着两个瓶子，一个盛着水，一个盛着酒。

被枪决的有男，有女，有年轻人，也有很老的人，有健康人，也有病人。根据老布尔什维克 A·П·斯蓬德证实，1965 年以前就是布尔什维克的著名共产党员加文是被抬在担架上去枪决的。加文在沙皇苦役营里呆过许多年，并患有肺病，革命后他担任克里米亚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是肃委领导人之一，这个对党有功的人，早在二十年代就表示过他在政治上不信任斯大林。

*　　　*　　　*

没有被枪决的人，在审判之后或者在特别会议作出决定后，长期被关押在监狱里，以后被送进集中营。

有关斯大林的监狱，集中营，流放地的历史，可惜目前还没有写出来。1962—1965 年期间我们的报刊登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文艺作品和回忆录。还出现了一些未发表的故事、小说和回忆录，这些作品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是所有这些材料只不过是一个总的画面上的很少几笔线条，而这一画面还没有被我们的科学和文献绘制出来。

当然，这是非常困难的题目。斯大林的监狱和集中营的历史在我国历史上是最可怕的一页。把个人迷信时代我们生活的这一部分说成是什么极不重要的片断，对苏维埃社会的不断发展不起重大作用，那是很可笑的。至于把监狱和集中营的真实情况说成是什么“现实中的‘小’真理”，在我们生活的“大”真理中不占什么地位，那也是荒谬的。不对，按其意义，根据它对社会的生活及心理上所产生的影响，它对全世界社会舆论所引起的反应，有关斯大林的专横的这些事实对历史学家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我国工业发展成就，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军事胜利及科学文化方面的成就等有关的事实。

525

大家知道，关押政治犯的各种监狱和政治隔离室在我国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属于政治犯的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即所谓“社会主义”党的代表。至于其他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人，平等党人及一般白俄分子，统统称为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关在一起。）还应该指出，二十年代关押政治犯的制度一般来说是比较宽的。政治犯得到额外食品，免除强制性的体力劳动，不受侮辱性的检查。在政治隔离室里允许自治，政治犯选自己的班委，由他出面和行政方面交涉。他们可保留衣服、书籍、文化用品、刀子，可订阅报纸和杂志。

全俄非常委员会于1920年12月30日颁布一项命令，规定：“根据全俄非常委员会所收到的情报表明，监禁因政治问题而被捕的各种反苏党派的成员的条件很不好……全俄非常委员会指出，上述范围人员应被看作不是受惩罚，而是为革命的利益暂时与社会隔离，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应带着惩罚性质。”① 下面的一件事很能说明当时监狱里的风气。当无政府主义的创建人之一彼·克鲁泡特金去世时（他住在莫斯科附近，列宁亲自关心过对克鲁泡特金的安置），因反苏活动而关在布蒂尔卡监狱的几百名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者要求放他们出来参加他们导师的安葬。捷尔任斯基来到布蒂尔卡监狱，他下了命令：如果全部无政府主义者保证回来，就放他们去送葬。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不漏的在克鲁泡特金安葬结束后排着队回到了监狱。事后，监狱里还出版了一个打印的小册子：《悼念克鲁泡特金的逝世》。

526

二十年代初期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曾公开宣布（不是没有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成就之一是在我们苏维埃监狱里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最仁慈和人道的制度。

当然，就在那时，在二十年代，犯人的生活待遇也被一点一点地进行克扣。例如，1923年底限制散步时间，这引起了立宪民主

---

① 见M·Я·拉齐斯（苏德拉布斯）：《非常委员会同反革命的斗争》国家出版社莫斯科1921年版。

党人和索洛维茨克监狱看守的著名冲突事件。监狱行政当局也有过其他一些“过火行动”，但这些在那时确实不带有制度性质，而是一种例外。

三十年代监狱制度继续恶化，大规模镇压开始以后，我国的千百个监狱的制度达到了极端残酷的程度。首先，原来规定关押一个人的牢房里，这时关了二、三人，甚至五人；原来关押十人的牢房，这时塞进去四、五十人，人们连呼吸都很困难了。二十五人的牢房这时关了七十五至一百人。犯人禁止走近窗户，禁止白天躺在床铺上，有时禁止讲话。任何借口都可以把犯人关到特种禁闭室，取消放风，通信和看书的可能。

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时代监狱制度的惨无人道，现在我们可以举出大量的材料加以证明。

原西西伯利亚军区的军事检察长M·伊绍夫于1938年在诺沃西比尔斯克被捕，关在诺沃西比尔斯克的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里，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被带到二楼，在一间牢房门口叫

527 我停下来，看守用钥匙开了锁，把门打开一个缝就真是不折不扣地把我挤进牢房里了。是真正挤进去的，因为里边的人多得不得了，只能使劲挤，才能进得去。如果回忆一下古代故事中的天堂和地狱，而且设想一下是什么样子，那么我们关的牢房真正配得上称之为地狱。唉！这已不是故事，而是悲惨的现实。面积为四十平方米的牢房里关了二百七十人左右。在牢房的两层铺板上要容纳下所有推进来的犯人。在铺板上面和铺板底下都蹲满了人，甚至在角落里放着的一个便桶盖上也是人。在牢房的门边上及铺板中间的过道里都挤满了犯人。没有地方坐，连个能靠一下身子的地方也没有。许多人站着，筋疲力尽。他们渴望那怕稍坐一会儿，休息一下。但是没有地方可坐下或躺下。在地上躺着的，在过道里站着的犯人互相对骂着。所有的人都已烦燥和愤怒到了极点。很难想象还有比在这里关着的人更为复杂的人群。这里有大强盗、小偷、骗子、杀人犯、投机商、各种描写人民风俗、生活的作家和我

们——指控犯有刑事法典第58条所规定的罪行的人。在牢房中称我们为'反革命'。听了这称呼是多么难过啊！在这里还有许多各兵种原来的军人。还有大、中工业企业的干部、工人、职员、农民、大学生。也有少年偷窃犯。有很顽强的人，也有意志薄弱和生病的人。有时呆在这间牢房简直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三、四十厘米见方的小窗户一直开着，但流进来的空气极少。牢房里很闷。臭味熏天。呼吸越来越困难。不仅刚来的人，而且早就在这里的人，自我感觉也很不好，他们都勉强能喘过气来。甚至很难想象，在这样相对来说不大的牢房里怎么会容纳那么多的人。"①　528

几个月后，M·伊绍夫被关进莫斯科列沃尔托夫监狱。这里已不那么挤，单间牢房里只关了两个人。但是这监狱的制度比拥挤不堪的"地方"监狱，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更严厉的。伊绍夫回忆说："犯人彼此讲话和同看守讲话都只能小声，白天严禁躺在床上，夜间睡觉时要面向着门。严禁把头蒙上和把手放在被子里面。如果睡着后手偶然挡在脸上或者放到被子里面，看守会马上把睡着的人叫醒。白天也不好受。不能背向门坐在板凳上，任何时候都要面向门上的观察孔的方向。白天不但不能睡觉，就是坐着打盹也不允许。如果偶尔打盹的话，看守会马上命令你说：'犯人，在牢房里走动走动！'如果还打盹，他就又下命令：'犯人，去洗脸！'你就得走到水管子前去洗脸。一切措施都是为了把犯人折磨得精疲力竭。……街上的光线勉强透进牢房，一盏镶在天花板上的电灯昼夜都开着……牢房里很冷，只有6—7度，不能长时间地坐在一个地方。为了身子能暖和一点，我们不仅在牢房里来回走动，简直是在跑步。列沃尔托夫监狱的伙食实在太恶劣。早晨给一块黑面包，一小勺糖和白开水。中午给一勺坏菜汤，汤里漂着蓝色的白菜叶子，两勺稀饭是稀而无味。晚饭给两勺稀饭和开水。这种伙食无论含热量和数量都是微乎其微的。盛饭菜的容器实在使人恶心。　529

① M·M·伊绍夫：《令人震惊和严重考验的年代》列宁格勒1966年版第94—95页(手稿)。

酸白菜汤是盛在生锈的铁盆里，发出恶臭味和铁锈味，吃这种食物是无法下咽的……"①

其它所有监狱的制度几乎也同样残酷到无法忍受的程度。罗斯托夫的农技师瓦·伊·沃尔金回忆说："我被关到内部监狱的第47号牢房，面积约三十五平方米。牢房里总是有五、六十人。那是1939年6月初。外面天气炎热，烤着牢房。我们爬在地板上，吸着地板缝里透进来的新鲜空气，我们轮流走到门前去，呼吸门缝里能感觉到的过堂风。老人经受不住这种生活，很快就被抬出去，长眠不起了。"②

瓦西里·格罗斯曼在他的《时过境迁》一书中真实地描写了可怕的斯大林的监狱。他写道："37年的牢房挤得满满的，原来关几十个人的牢房现在关了几百人。被7、8月的炎热弄得满身是汗、晕头涨脑的人们一个挤着一个地躺在铺上；夜里翻身只能按班长(他是一个骑兵师长)的命令一齐翻。去上马桶要踩着别人的身体走，马桶旁边睡着刚来的人，大家叫他们'跳伞员'，③在这样可怕的闷热和拥挤中的睡眠如同昏厥、休克状态，如同患斑疹伤寒时的谵妄……牢房的窗户都用厚木板钉着，外面的光线是通过细缝透到牢房里来，时间不是根据太阳和星星的转移，而是按牢房的日程判断的。电灯是昼夜都开着，亮得要命，似乎残酷的闷热是出自电灯的白光。通风机日日夜夜响着，但是7月份能把柏油马路都晒化了的炎热空气是不会给人们带来轻松的感觉的。夜里受审的人们清晨回到牢房，他们筋疲力尽地倒在铺板上，他们有的人在低声饮泣和呻吟，另一些人眼睛直呆呆地向前瞪着，一动也不动地在床上坐着，还有的在搓他的那浮肿的腿，疯狂地在讲述着什么……有

530

① 同前第141—142、144页。

② 瓦·伊·沃尔金：《石头口袋里的故事》(手稿)顿河罗斯托夫1965年版第16页。

③ 这里是文字游戏，因为俄文"马桶"二字是 параша，"跳伞员"——парашютист，前五个字母是一样的。——译者

些人是被押解的士兵拖回牢房的……”

叶·谢·金兹堡在她的书中讲道：雅罗斯拉夫尔监狱中看守们把一个意大利女共产党员推进不生火的寒冷的特种单间牢房，拿着水龙带用刺骨冰冷的水浇她。

在古比雪夫市许多犯人被关在供暖气管道通过的监狱的宽大的地下室里。夏天犯人们在这个地下室里发现了三十三种虫子，当然包括虱子、臭虫和跳蚤。冬天由于可怕的闷热，这些虫子都不见了，可是人们遍体溃疡，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莫斯科郊区的苏哈诺夫监狱中的犯人受到饥饿的折磨。在这里所给的食品量，使一个人过两个月就变成皮包着的骨头架子。这所监狱位于楼房的低层和地下室，楼上的几层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干部的休养所。这就使各种刑罚变得特别讲究了。

根据老布尔什维克 И·П·加甫里洛夫的证实，在巴尔拿乌尔市监狱里，犯人的恶劣生活条件导致了1938年犯人的大规模的反抗行动，犯人从挤满了人的牢房中冲到监狱的院里。

这一行动之后，几个犯人被枪决了，但是管理制度上有所改善。这类材料可以举出很多很多。

在审讯，审判和狱中监禁之后，解送犯人的兵站和羁押站的条件也是那样残酷可怕。例如：时常把二、三十个人用枪托推进“斯托雷平”时代的监狱式包房里(规定关六个人)，时常把一百或更多的人推进闷罐车里。

有些列车里，人们一个紧挨着一个地长达数日之久就一直在车厢里站着，只吃一些咸鱼，一天只给喝一、两杯水。这些东行列车要走上几十天，几乎每个车站都有犯人的坟墓。

531

M·Д·拜卡里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没有等我看到过路人的同情的目光，就爬上了车厢的扶梯。我们被塞了进去，门上了锁，铁栏前面的过道上出现了押解犯人的班长——他是一个军容整齐、姿态挺拔的年轻的上士，他说：

‘人民的敌人，犯人们！注意！现在向你们宣布：一昼夜供应

两次水，每一包房一桶。一昼夜带你们去一次卫生间。明白吗？'

上士说'卫生间'是为了表示说话有礼貌。

人民的敌人抱怨起来。但是上士不怕已被打倒的人。

'向你们宣布：你们说得太多了。谁如果闹，就根本不让他上卫生间。明白吗？'

……听他的口音，他是沃洛格达人。我们在集中营经常听到这样的俗话：'沃洛格达的押送兵不爱开玩笑。'正是象这样的上士经常在重复着这句俗话。是的，每人都有可自豪的地方……

过了两天、三天、四天。我们腹痛得都卷缩着，用手捧着肚子，我们尽可能少喝水，使疼痛缓和一下。但是不喝水比不吃饭还难。路上给我们吃的干粮是面包加咸鱼。

我们腹痛一天比一天严重，好象把一块大石头塞到肠子里似的。火车长时间的停在车站上。

'人民的敌人，犯人们！注意！'上士在宣布。'停车时间不定。车开动后再去卫生间。谁一还一在一说一话！'

八天中一人也不例外，这是他所遵循的正义，是不断地灌输给他的无情的正义。我们请求叫医生来。他回答说：

'没有医生。犯人们，你们的话讲得太多了！'

他相信，我们是法西斯分子。无论是押解兵，看守或刑事犯都经常这样称呼我们。我并不怪罪上士。他只是在执行被高级思想家形成为理论的那一套东西。

我们不知道我们到什么地方去。车站的名称我们看不到。八天后我们终于被带出了车厢。这是沃尔库塔！"

532 M·Д·拜卡里斯基还是很幸运，因为许多人转移时间长达一个半月之久。

E·Г·韦列尔-古列维奇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走到停在备用线的货车厢前面，命令我们按顺序从一个很陡的梯子爬上货车厢。闷罐车的一个角落里只有一盏不亮的灯照明。在车厢的两侧搭着三层铺。地中间有一窟窿，即'厕所'，这里还有一个小

铁炉子。一百个妇女安置在这个供运输八匹马用的车厢里。大家都挤在一起取暖。脑子真是容纳不下发生的一切事情……从莫斯科到托姆斯克的转移走了十九天。这是没有尽头的，漫长的日子；不可思议的拥挤、饥饿、寒冷、渴、虱子、肮脏、恶臭、疾病，不能活动一下身子，绝望和期望的斗争。”①

“他发现转移是新阶段，
人上路时，还撒出了警犬；
愤怒和羞耻充满他的胸膛，
他却默默无言。
他看见：
　押送的士兵
　　剥光人们的衣衫，
　他那粗暴、放肆的爪子
　　随意处理那些骨瘦如柴的躯干；
他看见：
　在这军用列车里，
　人们两天滴水未见，
　却给他们吃咸鱼，
　　非常的咸；
他看见：
　关在车厢里的是
　　拄着拐杖的残废，
　和怀抱婴儿的女眷。”

这是列宁格勒女共产党员叶·弗拉吉米罗娃在自己的长诗《克累马》中所描写的情景，她自己曾和成百万苏联人一起走过那去东方的这条可怕的路途。

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用船把人运到克累马的条件更加

① Е·Г·韦列尔-古列维奇：《回忆1937年》（手稿）。

可怕。在拥挤的船舱里人们往往就躺在别人身上，而面包是从舱口 533 给他们扔到下面来的，就象喂野兽一样。航行时死者的尸体就扔下海去，而死者的数量是不小的。如果遇到犯人们闹事或有组织的反抗，押送兵甚至于把鄂霍次克海的冰冷的水放进船舱里来，在这种“沐浴”之后，成百成千的犯人死亡了或冻伤后被送到马加丹医院。

在许多监狱里“政治犯”和刑事犯是分开关押的。所以在转移中许多政治犯第一次遇上刑事犯，而这些相遇往往是以悲剧告终。提起抢劫，根据瓦·伊·沃尔金的说法，“刑事犯对政治犯的抢劫几乎是公开进行的，因为刑事犯受到看守们的保护。刑事犯从衣服下面拿出刀子威胁着被看中的对象，于是后者的东西就转到刑事犯的手里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和这些盗窃犯斗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只能无谓地流血，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只能在幸灾乐祸的看守面前，在他们明显的怂恿下被刑事犯捅死。我们在路途中知道这种可怕的情况，谁也不愿意为一块破布失去生命。这时我们知道，对政治犯转移是最可怕的事情，而这种对人的新的虐待是受到集中营当局的支持，是作为从肉体上消灭的一种措施。关于政治犯和刑事犯分开转移的规定从来没有取消过，甚至在旧时代这一规定也是严格遵守的，可是在我们的时代故意不执行这一规定，就是为了把政治犯交给刑事犯去虐待。”

但是政治犯组织起来给“黑社会”以坚决回击的事也还是屡见不鲜的。

三、“劳动”改造营制度

在个人迷信年代主要关押犯人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那些成千上万的集中营，在斯大林时代集中营网几乎遍布全国各地。

大家知道，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在我国的边远地区就组织了所谓的劳改营。在卡累利阿建立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劳改营，西伯

利亚建立了贝加尔湖-阿穆尔河干线劳改营，还有西伯利亚劳改营，基米特罗夫劳改营等。1932 年开始建立克累马河劳改营。这种监禁方式按其原来的想法比监狱和政治隔离室更符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因为这个社会不光要惩罚人，而且要改造那些走上政治和刑事犯罪道路的人。 534

大家也知道，苏维埃政权在其最初的刑事法典中直接明确地禁止对犯人使用可称之为虐待的手段。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刑事法典第 49 条说："为了真正贯彻劳动改造政策，监禁地的制度中应该消除任何虐待的迹象，不允许使用肉刑：脚镣、手铐、特种禁闭室、严酷的单身牢房关押，不给饭吃等等……"①

当然，就是在三十年代前半期在劳动营中也可以遇见过分残酷和专横的不少事例。但同时也可看到不少诚恳帮助走上犯罪道路的人的改造。例如，根据老"克累马人"作家 В·Т·沙拉莫夫的回忆，远东工程的领导人 Э·П·别尔津在 1932—1937 年力图能马上解决两个问题：开发自然条件艰难地区和同时解决"改造"及隔离问题。为达到这些目的，规定了被判十年徒刑的犯人二、三年后可以回去，还有很好的伙食，衣服等供应，冬天四至六小时工作日，夏天十小时工作日，有较高的工资，使犯人有可能帮助家庭，当他回去时，他已成为在物质上有保障的人。

这样的劳改营制度对犯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原克累马劳改营的领导人之一 В·维亚特金在他写的《两次诞生的人》② 一书中也谈到这点。 535

但是 1937 年这一套"自由主义"的秩序被叶若夫和斯大林废除了。他们宣布，这类自由主义是一种破坏行为，其追求的目的是要使犯人喜欢"人民敌人"别尔津及其助手，帮助他们把克累马从苏联版图分裂出去。其他的劳改营也废除了原规定。根据新指示规定，"劳改"营被改变为真正的苦役营，其目的与其说是改造犯

①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刑事法典》1930 年版。

② В·维亚特金：《两次诞生的人》马加丹 1964 年版。

人，还不如说是消灭犯人。

叶若夫-贝利亚的集中营，更精确说是斯大林的集中营的常规（而不是例外）是：十分沉重的，使人变得愚钝的十小时、乃至十二至十六小时的劳动日（连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也被强迫从事劳动），为生存而进行的残酷斗争，犯罪行为和专横。在各种惩罚性的和专门的集中营里及开采黄金区的犯人的生活条件尤其骇人听闻，这些集中营实际上已变成死亡集中营。B·沙拉莫夫在《克累马故事》中写道："在集中营里，为了使一个年轻力壮的人（一开始他在集中营的新鲜冬季空气的工作面上工作）变为只剩下一口气的'瘦弱不堪的小老头'，不下二、三十天时间就行了，因为每天十六小时的劳动日，没有休息日，经常饿着肚子，穿着褴褛的衣服，在零下60度严寒中睡在破帐篷里。加上工长、黑班长①和看守的打骂会加速这一过程。这种能使人变成奄奄一息的期限是已多次被证明了的。开采黄金季节开始时，那些以自己班长名字命名的各班，到季节结束时，原来的人几乎一个也剩不下来，（除了班长本人，值日人员和班长的一些个人朋友）。班组的成员一个夏天要换

536 几次。金矿不断向医院、向所谓的疗养队、向残废营地及公墓抛出'废料'。"①

在集中营里人们已经消耗到如此可怕的程度，以至于战后最初的那几年金矿上的两、三千人的编制中只有约一百人能出来劳动。

克累马和北方多数集中营的制度是完全有意识地去消灭犯人。瓦·伊·沃尔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首先，在十小时工作日条件下发给的食品显然是吃不饱的。而且是有意识地把犯人的食品搞成对健康不利……犯人在严寒时也被赶出去劳动。工棚没有应有的取暖措施，湿衣服不能烤干。秋天让这些衣服湿透了

---

① 黑班长指让刑事犯任班长，他们残酷地虐待政治犯。——译者

② B·沙拉莫夫的几本《克累马故事》的打字稿，在国内被广泛传播。在苏联1963—1964年期间只发表了三个故事，但是在国外发表了沙拉莫夫的许多故事。

的人们在阴雨和寒冷的条件下继续完成规定的定额，但是这些只剩下一把骨头的人们是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定额的。……犯人穿不上气候条件所需要的衣服，比如说象在克累马这样的地方。发给他们的是穿过三年的旧衣服，即破布，脚往往只用一条裹脚布包着。破帽子不能挡住严寒的袭击，成批成批的人被冻坏。在这种条件下造成了成批的病人。而对病人的治疗往往导致'成群瘟毙'①(这是服务人员的说法)。病人只能在医生是犯人的那些地方得到救治……克累马还有一种叫'体弱者病房'，在这里关的是出院后恢复健康的人，这里关三个星期。伙食确实好一些，每天有七百克面包。但对一个皮包骨的只剩一口气的病人来说，三个星期如同一条饿狗得到一块骨头一样。我认为这种'体弱者病房'是为了掩盖犯人大批死亡而采取的措施。"② 和这一切成鲜明对照的是克累马所有集中营的门口都挂着集中营的章程中的话："劳动是光荣，豪迈和英雄的事业"。(我们马上就想起，在奥斯威辛集中营③门口也挂着一个牌子，上面说："劳动使人获得自由"。)

537

在集中营里用以消灭政治犯的方法不仅仅是把人折磨得精疲力尽的劳动。集中营行政领导把"政治犯"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实际上用这种办法唆使刑事犯去反"政治犯"。原刑事罪犯米那也夫在他写给别人的信中说道："(监方)利用一切机会使我们盗窃犯明白，对祖国来说，我们还不是没有指望的(虽然是败家之子)儿子。但对'法西斯分子'、'反革命'(即政治犯)来说，在地球上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永远不会有。……因为我们是盗窃犯，所以我们睡觉的地方是在炉子边上，而'法西斯分子'等家伙应睡在墙角里和门

① 看守用的词，它是专门用于牲畜大批死亡，表示他们是和牲畜一样看待犯人的。——译者

② 瓦·伊·沃尔金：《石头口袋里的故事》，顿河罗斯托夫，手稿。

③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设在波兰的有名的法西斯集中营，炼人炉烧死六百万人，人油做肥皂，头发织成布，人皮做台灯罩等等，是最可怕的人间地狱。——译者

务的地方……"

众所周知，刑事犯在多数情况下有自己的某一组织，已经形成和存在了几十年（有些国家甚至几百年）。监狱和劳役营并没有能使这些组织瓦解，相反，往往使这些组织更加巩固起来。所以把刑事犯和政治犯放在一个集中营里——斯大林惩罚机构的这个措施并不亚于奥斯威辛，特列穆勃林斯克及其它希特勒消灭犯人的集中营里建立炼人炉的措施。①

对政治犯的侮辱和嘲弄不光来自刑事犯，还来自集中营的许多大大小小的头头。他们为了侮辱和嘲弄政治犯，什么办法都想得出来。在一个大型的北方集中营里，一个管生活的长官在接收了刚刚转移来的、被长途跋涉弄得疲惫不堪的犯人后，让他们在集中营门口排好队，命令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向前一步。"部分犯人期望自己的知识在集中营里会有用处，向前迈了一步。

438

这个管生活的长官又下命令道："全体犯人到棚子里休息，"他随即对着那些向前迈了一步的原来的知识分子说："你们，科学家们，开步走，刷洗便池去。"

在集中营里因被指控怠工或企图暴动的成千的无辜的人被大规模地毫不掩饰地加以镇压，他们不经过法庭和审讯而被枪毙。例如，根据亚·伊·托多尔斯基证实，1938年北方集中营里有几个中央派下来的委员会，他们向已被判处五年或十年徒刑的政治犯宣布了死刑。其中有一个这样的委员会，它的成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北级区的干部卡什克钦，古拉格②特别处处长格利戈利申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三业务处处长郎切洛夫。由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的这个委员会于1938年把科米自治共和国的乌赫钦集中营

---

① 直到1949年，在内务部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后，政治犯和刑事犯也分开关押了。但是在1949年后，"政治"集中营里也还有不少刑事犯，例如，因逃跑而补判刑的刑事犯等。

② 古拉格，即俄文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Лагерей集中营管理总部的缩写。——译者

里大批政治犯处决了。这个“卡什克钦委员会”① 在沃尔库塔集中营里也进行恐怖活动。它借口发现犯人建立什么反革命组织，准备进行暴动，在北方集中营里枪杀了几千人。根据幸存的“沃尔库塔人”A·彼尔加缅特的回忆，大批的“政治犯”是在沃尔库塔砖厂被枪杀的，是用机枪扫射了那些正在从一个营地转移到“另一个营地”的犯人，他们一点不知道要对他们进行镇压。

卡什克钦和他领导的“委员会”完成他们的刽子手的使命后，都被逮捕和枪决了。M·Д·拜卡里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年春天（1938 年）从河下游的营地（科奇梅斯、希瓦亚·马斯卡等）紧急地向沃尔库塔转移了一批列入特别名单的犯人。押送犯人的士兵拚命催他们赶路。但是有些人因河流涨水没有来得及过河去。人们很久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如此紧急转移，原来这是急于处决他们。来得及按时转移过去的人被枪杀了。那年有一个人在沃尔库塔集中营里是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人们在讲到他的名字时要谨慎地向四面看看是否有人，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卡什克钦。后来在科特拉斯监狱中有人听到从窗里传出来的喊叫声，他喊道：

533

“转告人们吧！我是卡什克钦！我就是那个在沃尔库塔枪杀了所有人民公敌的人！转告人们吧！”

这些喊叫人们是当年听到过的，但许多年后才把这件事告诉了别人！那个执行枪决的警卫排也消失了。

当然，卡什克钦是准确执行了他的上级的指示，那些上级是从上帝本人得到具体的指示。卡什克钦之流被派往全国各处：西伯利亚北方集中营，伯绍拉、远东和其它地区的集中营，政治隔离地和监狱。他们手持机枪秘密地进行了党内清洗……判决是根据莫斯科批准的名单进行的。执行者是在等待莫斯科批示“同意”，至于是谁同意的，没有写。

许多地方的集中营当局也不亚于各式各样的中央派来的委员

① 指卡什克钦领导的委员会。——译者

会。1938年在克累马由于被指控"怠工"和妄加诸犯人的其他莫须有的罪名，远东建设管理局局长巴夫洛夫，他的助手加拉宁和他们手下的一帮人，就处决了不下四万犯人之多。

在克累马加拉宁上校更是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到了极点。他已丧失了全部人性。加拉宁到集中营后，命令"拒绝工作的人"排好队。属于这类拒绝工作的人往往是病号和"只剩下一口气的人"。把他们排好队后，有一些人站不住，发了疯的加拉宁在队列前走过，他边走边向犯人开枪。他身后紧跟着两个战士，轮流把上好子弹的手枪递给他。

被枪杀的人的尸体往往象搭的井架一样搭在值班室门口并指给从这里路过的班组看，说："你们如果怠工，也会得到同样的下场。"（加拉宁和卡什克钦一样于1939年因被指控犯有"间谍罪"和"暗害罪"而处决了。这是对所有刽子手的又一个教训。）

540

四、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及他们应负的责任

还必须谈谈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及他们应负的责任问题。正是他们实现了由斯大林组织的整个恐怖制度，正是他们开动了那个可怕的镇压机器，我们对其个别环节已在前面作了简短的描写。这里我们指的不仅是审讯人员，还有那些指导审讯的，组织对犯人的审判和镇压的那些人。

当然，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面，就是在斯大林专横的最恐怖时期也有各种不同的人。

其中有一些人，他们真诚地认为，他们进行的是反对苏维埃政权敌人的斗争，反对的是暗害者和间谍。可以肯定地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担任押送的部队的多数士兵和下级军官并不知道，他们被迫看守的不仅有罪犯，而且有几百万的诚实的苏联人。

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当然也有这样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心灵深

处明白，在他们面前的不是敌人，而是无辜受迫害的被诬陷的人们。这些工作人员不能彻底搞清楚这种可怕悲剧的原因，他们在许多情况下力图在某种程度上帮助犯人。鲍·嘉科夫写的中篇小说中，叶·谢·金兹堡写的纪事中，B·T·沙拉莫夫写的短篇小说中及苏·奥·加扎梁写的回忆录里，以及其他已经发表或未发表的资料中，都有不少有关的片断，可以证明上述的情况。叶·雅·德拉勃金娜曾向本书作者讲述过很有意义的例子。北方的一个工业企业长期没有完成生产计划，在这里工作的大部分人是政治犯，所有职务(除了最高的职务)都由"黑社会"，即刑事犯担任。战争初期该企业新调来一个领导人，他是因犯有"自由主义"的错误从列宁格勒调到集中营工作的，他名叫B·A·孔杜什。他把车间调度员(原联共(布)党员)叫来，要他把在下一班组工作的所有原共产党员名单造表报上来。名单报来后，孔杜什用共产党员替换了所有刑事犯。企业马上变为先进的，在战争年代一直是内务部的红旗单位。战后，孔杜什以"工作优秀"为理由为许多犯人争取到提前释放，但是他自己不久却成了犯人。 541

但是，在叶若夫-贝利亚时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多数工作人员的行为则是另一个样子。这些人很明白，他们为谁服务，反对谁，他们也很清楚，在他们面前的基本上是诚实的苏联人，但这并不能使他们不去卖劲儿地干坏事和少施一些暴政和少用些骇人听闻的毒刑。正是这些内务部工作人员炮制出大部分陷害的事由，而这些理由就成为犯人被控告的根据，然后就强加于被告。审讯员梅里尼科夫曾恶毒地对作家鲍利斯·嘉科夫说："请您向我们证明您是百分之百的纯洁得象水晶一样的人，那就判您十年徒刑，不然您只会得到一颗铅头子弹。"①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有几十万人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有意识地制造了诬陷材料。例如，据苏·加扎梁说，巴尔拿乌尔市有一位

① 《十月杂志》1961年第7期第82页。

老教师A·A·阿法纳西也夫，他首先被指控为早在内战时期就在市里建立了一个恐怖组织，其目的是：如果列宁来巴尔拿乌尔的话，就暗杀他。但是上级没有批准这个案子，因为这一指控太明显是编造的。这时审讯员又提出了另一个罪名，说阿法纳西也夫是日本间谍。这位已经失掉了反抗暴行能力的生病的老人说："好吧，作一个日本间谍也可以。"但是案子又没有被批准，因为没有指明阿法纳西也夫通过谁传递情报给日本。因此在巴尔拿乌尔市就开始"寻找"新发明出来的"间谍"的"同伙"。"寻找"的结果甚至还找到了日本特务机关在巴尔拿乌尔市的"代表"——一位铁路工人。所有这些完全无罪的人都被判处了死刑。

在这方面瑞士共产党员弗里茨·普拉廷的命运是很典型的，他是1917年组织转移弗·伊·列宁回俄国的。根据M·Ф·波齐贡（1920年加入苏共）的证实，他曾和普拉廷关在一间病房（监狱医院），普拉廷首先被指控为从1917年起就是德国间谍。普拉廷拒绝承认这个说法，尽管对他用尽了酷刑。他告诉审讯员说："如果你们宣布我是德国间谍，那么这就会引起对列宁的怀疑，所以你们不管对我采取什么办法，我都不能承认。"普拉廷同意"承认"自己是美国或阿根廷间谍，但不是德国间谍。审讯员在他坚持之下"让步了"，在记录中写道：普拉廷不是德国的间谍，而是另外一个国家的间谍。（波齐贡忘记了是哪个国家）

根据瓦·伊·沃尔金的回忆，在顿河罗斯托夫审讯员要求一个内河区舰队的舰长在一份审讯记录上签字，那里写着，这个船长指挥"勇敢号"油船时用水雷炸沉了"暴风号"驱逐舰。船长笑着问审讯员，他是否知道什么叫油船？审讯员喃喃地说："油船……和坦克差不多吧①，就是武装起来的船。"船长向他解释："不是，油船是运载石油的，它不能击沉驱逐舰。"审讯员和气地说："那就算了，你看着办，怎么办合适，把事情倒过来写也行②，再抄一遍，然后到

① "油船"俄文为танкер和"坦克"танк前四个字母一样。——译者

② "把事情倒过来"，即把油船击沉了驱逐舰，改为驱逐舰击沉了油船。——译者

集中营去呼吸新鲜空气，在这里你会烂掉的。”

在同一牢房中二十七个人根据审讯员的要求承认自己出于暗害目的“烧掉了”罗斯托夫的磨房，还有十三个人“承认”自己炸毁了被称为电动活动式① 顿河铁路桥。但是桥和磨房至今都还在罗斯托夫市原封不动地屹立着，只有卫国战争期间的一些破坏痕迹。

根据Я·И·德罗宾斯基证实，白俄罗斯军区一个指挥员（波瓦罗夫）“承认”自己建立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并提供了被他招募的

543

四十人的名单。这名单中的人和指挥员是他在审讯期间编出来的，实际上并无其人。波瓦罗夫根据这样的“交待”受到审讯并据此定了罪，判了刑。审讯员不知道这些人并不存在，但是他们知道被供出来的人是跑不了的，可把他们“存下”，延期逮捕。

逮捕计划是从莫斯科布置给各州的。密码电报通知说：“你们的州，根据中央侦察机关的材料，有某某数目的恐怖分子和反苏宣传员，把他们找出来并交付审判。”于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机构就必须去完成这个“任务”，并且还等待下月或下季度的新“任务”。

乌克兰一家报纸主编，苏共党员А·И·巴比涅茨于1937年有一次被邀请去内务局。在那里委托他为已“结束的”“富农恐怖总部”案件的控告结论的序言定稿。当他夜里在内务局局长办公室里工作时，他十分清楚地听到这位局长给各区分局打电话，要求他们提高反“人民敌人”斗争的“指标”。他在电话中喊道：“今天你那里逮捕了多少人？十二个人？太少，太少。”他又给另一区打电话：“你那里逮捕多少了？六十个人？好，好样的，你可要当心，一直到月底不要出毛病！”他在给第三个区打电话时，指责他们说：“怎么了！你只逮捕了五个人，你那个区是否已完全建成了共产主义？”后来，他又转过头来，对巴比涅茨说：“不得不抓紧。不然，莫斯科很快要来电话，我怎么说？怎么向他们汇报？”

内务部多数值勤人员在搜查所谓“人民敌人”时，其粗心的程

---

① 指电控开合的桥。桥梁打开时，可供吨位大的船通过。——译者

544 度令人吃惊。内务部工作人员在捕人时，通常只拿走属于被捕的人的文字材料和信件，并不进行非常仔细的搜查，也不撬开地板，不拆开沙发和褥子等。根据自己的经验，他们清楚地了解，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找到能"证明被捕者有罪"的文件。因此他们就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进行搜查。他们都是自己去编造一个事由，然后用非刑拷打逼着犯人去承认它，那就快得多，也简单得多。在审讯过程中内务部的审讯人员也不愿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分析搜查时所得到的文件及材料；经过大致翻阅后，这些文件通常被销毁。简直难以想象，不知有多少很有价值的手稿和材料就是这样被毁掉了。例如，没收的瓦维洛夫院士及其他科学家的全部手稿和材料无影无踪了，成百的作家、诗人的手稿和材料也都不见了，我党和国家许多著名活动家的回忆录、日记和信件也下落不明。几乎没有一个审讯人员把这些逮捕时没收来的文件和材料看成是可以"揭发"犯罪人的物证。例如：在没收某一文学家的材料中有伟大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封书信手稿，这是很珍贵的材料。本来，这些用德文写的信可能作为物证，应该引起审讯人员的特别注意。但是这些信件并没有被翻译出来，就被烧掉了。在档案中记载的是：三封用外文写的"不知名作者"的信。

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当逮捕某些人时，甚至是逮捕了很重要的活动家时，也不搜查。例如，内务人民委员部并没有搜查利夫什茨（交通部副人民委员）莫斯科的住宅，而他是"平行"总部案件中的主要被告之一。利夫什茨是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被捕后押解到莫斯科的，审讯几个月后被处决了。根据他的妻子M·H·利夫什

545 茨的证实，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莫斯科住宅没有受到搜查，没有人对利夫什茨桌子里放着什么材料、记录、信件等感兴趣。直到利夫什茨被处决以后，他的妻子给有关部门打了电话，要他们来，把她丈夫的枪支带走。

多数法官和检察长，他们批准大批逮捕那些完全无辜的人，并且随即判处他们死刑或长期监禁时，不可能是无意地作了这些事

情。这些"司法"工作人员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做的是违法行为和肆意专横，但是他们宁愿自己去肆意专横，也不愿成为肆意专横的牺牲者。原军事检察长M·M·伊绍夫（他不愿成为骇人听闻的斯大林死亡机器上的螺丝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回想起在总军事检察院第二部工作的索妮娅·乌利亚诺娃，不能不使人心惊肉跳。由内务部炮制出来的陷害诚实苏联公民的材料全部都是经过这个沾满鲜血的女人的双手的，为了保存自己的渺小的生命，她宁肯从堆积成山的诚实共产党员的尸体上走过去。"

集中营的许多领导人及相当部分军官都很清楚，他们同什么样的犯人打交道。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以极端的残忍态度对待犯人。

也许有人要问——什么使内务部工作人员（当然不是全部）变为一伙虐待狂？他们为什么超出了人道主义的任何界限？这些人中，许多人过去看来还是不错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并不是自愿去内务部工作的，而是由党团组织动员他们、派他们去的。这里原因很多。第一，一种恐惧心理支配他们，怕自己也成为犯人，这就阻止了其他感情的涌现。第二，在内务部机构中也正如我们所说过的，也是经过了可怕的选择的，部分工作人员筛选掉了，剩下的是最恶劣的和最愚昧无知的人。斯大林所给予内务部机构的对犯人的无限权力也腐蚀了专政机构的许多工作人员，使他们变成具有变态心理的人，这点也不能不考虑到。

549

费·陀思妥也夫斯基在《死亡营里的日记》中写道："谁要是哪怕只有一次感受过他对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的身体，鲜血，精神是有无限权力的，是可以完全主宰的，谁要是感受过，他对另一个人有权，有一切可能进行最大的污辱，那么这个人就已经不自觉地不能主宰自己的感觉了。暴行是一种习惯，它的本性是发展的，最后，它就发展成为一种病态。我认为：就是一个最好的人，由于习惯的原故也可以变得粗野，失去理性到野兽的程度。鲜血和权力会使人陶醉：粗野和道德败坏就会发展起来，于是思想和感情会对

最不正常的现象感到甜蜜。在暴行中，一个人，一个公民会永远堕落下去。使他恢复人类的尊严，使他改悔，复活则几乎是不可能了。”①

不能不指出，在个人迷信年代在内务部就是培养了这种能够完成任何命令，甚至最罪恶的命令的工作人员。大家知道，例如，根据审讯员的“决定”，虐待犯人的特种刽子手班通常吸收内务部学校的十八——二十岁的学员参加工作。这样，他们被培养成虐待狂，他们被带到刑讯室，正如医学院的学生被带到解剖室一样。

大家知道，这些叶若夫－贝利亚时代的许多刽子手早在个人迷信时代就已经被消灭了，许多人是在1953—1955年期间及党的547 二十大以后的时期受到了惩罚。但有不少人只不过受了一点惊吓，他们被撤了职，有的退休了，有的调到另一工作岗位。这些罪人和虐待狂在大多数情况下，把自己的罪行和惨无人道的行为解释为斯大林，叶若夫和贝利亚等其他“上级领导”的命令。作家费·沙赫马戈诺夫在他的未发表的小说《水星反对天蝎座》一书中的解释也和上述的说法差不多。他描写了（多少是真实的）有关图哈切夫斯基被捕和牺牲的一些情况，小说中叙述了叶若夫时代内务人民委员部两个局长之间的谈话。其中有一位老革命家凯德林，这样教育自己的朋友普罗沃罗夫（普罗沃罗夫接到执行逮捕图哈切夫斯基的命令，但他不愿意执行这一命令）。凯德林说，看来还是要服从，因为站在叶若夫背后的是斯大林，可是暂时还没有办法搞掉斯大林。普罗沃罗夫感叹道：“难道没有办法对付叶若夫？”凯德林回答：“暂时没有。我要您懂得这点，并认真对待我的话……，您

---

① 此外，陀思妥也夫斯基不是没有根据地指出，例如，这种蛮横行为可能对全社会有感染作用，因为权力是诱惑人的。如果社会对这种行为已熟视无睹，那就是说从基础上受到了感染。'总之，一个人有权对另一个人施以肉刑，这本身就是社会脓疮，就是消灭一切健康的萌芽，消灭一切追求文明的尝试的最厉害的手段，也就是导致社会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堕落、腐化的基础。（见《陀思妥也夫斯基全集》（十卷本）第3卷1956年版第595—596页。）

的生活中有另外一个任务。无论何时何地您都是契卡，知道自己应该知道的，看见的和想到的，要珍惜自己的知识。如果和您有关的事，在适当的情况下，衡量一下自己的力量后去支持真理，尽自己的力量去支持。还要有许多年，我们国家，我国人民和党的头上会笼罩着一片乌云，这乌云之所以可怕是因为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驱散它。不然，会导致自相残杀，也就是等于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敌人就是等待着我们自相残杀的。所以不要再把自己的命运加在这一切悲惨的命运上面，时刻准备着，也许这样的时刻会到来，到那时您就有可能去打击敌人或在敌人打击朋友时助他一臂之力……让您的记忆成为这些灾难和不幸的朴满吧！我们相信，这样的时刻会到来，到那时，您的记忆将发挥作用”……

类似的论断显然是言不由衷的，只是为了给内务部的行为辩解，因为他们似乎是被迫执行斯大林的命令。但是枪杀几百万苏联人民，把他们关进监狱和集中营——这正是自相残杀，而且是自相残杀的最恶劣的形式。费·沙赫马戈诺夫写的小说的主人公——普罗沃罗夫显然是很好地执行了他的刽子手职责，他在叶若夫时代是内务部作战局的局长，贝利亚时代仍然保住了这个职位。在这里我们想提到一件事：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在自己决议中指出（苏联代表也在此决议上签了字）：违犯基本道德，践踏人类社会所赖于立足的道德标准，破坏人类共同生存的最基本的原则的那些命令，对执行这些命令的人没有理由给他们以道德的和法律的辩护！

548

第 二 部 分

斯大林主义产生和巩固的原因及条件